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理查德·戈特，1938年生于英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获得历史学的学位；1962年到1965年，在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1964年到1969年，曾担任美国《前卫报》主要撰稿人和记者，以及和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本书就是在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写成的。

戈特在本书导言中，谈了古巴革命胜利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及古巴革命胜利后十年中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这十年中，在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发生了比较重大的游击战运动，它们是：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本书写的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游击战运动。《危地马拉的兵士和农民》一章，主要写了起义军的形成和斗争的情况。《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一章，主要讲委共和“左派革命运动”围绕着游击战运动的斗争情况。《哥伦比亚的暴力》一章主要写了亲古巴的民族解放军，并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卡米洛·托雷斯神父参加游击战运动的经过。《秘鲁的灾难》一章主要写的是“左派革命运动”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领导的游击战运动。《玻利维亚的悲剧》一章写的是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进行游击战，最后被俘遭杀害的经过情形。在“结束语”中，作者列举了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失败的原因。

本书材料比较丰富，可供参考。作者自称本书是给德布雷所宣扬的“游击中心论”提供事实基础的，因此对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应注意予以批判。同时，书中多处攻击我国和拉美某些左派组织，

也应予批判。

本书附录十一篇,包括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游击队伍、游击阵线以及个别参加游击战的知名人士的宣言、决议、公报或纲领,可与正文参读。

本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组织翻译,参加翻译、校对、加注的除本室的同志外,还有本校国际政治系、经济系部分同志及校外个别同志。由于译者、校者的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

1975.7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 危地马拉的兵士和农民	39
一 阿本斯下台和游击队的起源	40
二 游击队开始行动了	53
三 容·索萨、托洛茨基分子与危地马拉“十一月十 三日革命运动”	62
四 图尔西奥斯·利马和起义军	79
五 选举与图尔西奥斯·利马之死	90
六 塞萨尔·蒙特斯与反共组织的滋长	101
七 各个游击运动的重新联合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决 裂	110
八 美国充当的角色：大使之死与被放逐的教士	117
第二部分 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	125
一 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垮台	126
二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得势	134
三 游击战的开始	146
四 民族解放军	165
五 城市斗争：选举与选举之后	177
六 游击队员对共产党人	193
七 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卢文·佩特科夫的民族解 放军	210

八 共产党人对菲德尔	217
九 一个共产党人的结论?	225
第三部分 哥伦比亚的暴力	233
一 “暴力”时期及其遗产	234
二 共产党人和独立共和国	242
三 “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革命行动统一阵线”	252
四 马克塔利亚的陷落	259
五 民族解放军	269
六 卡米洛·托雷斯和教会	282
七 卡米洛·托雷斯和“统一阵线”	289
八 卡米洛·托雷斯和游击队	309
九 人民解放军	317
第四部分 秘鲁的灾难	321
一 秘鲁的背景	322
二 乌戈·布兰科和拉孔本西翁山谷	330
三 哈维尔·埃劳德在马尔多纳多港之死	347
四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左派革命运动”	353
五 “图帕克·阿马鲁”和吉列尔莫·洛瓦顿	370
六 “帕查库特克”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	386
七 埃克托尔·贝哈尔和“哈维尔·埃劳德”	393
八 共产党人和游击队	402
九 游击队的总结	412
第五部分 玻利维亚的悲剧	419
一 豪尔赫·马塞蒂和萨尔塔游击队	420
二 中苏分裂	424
三 拉巴斯的准备工作	431
四 尼阿卡瓦苏	442

五	新的“穆里略呼声”	448
六	背叛与行动	464
七	雷吉斯·德布雷	475
八	共产党人袖手旁观	481
九	华金的命运	489
十	切·格瓦拉的被俘与死亡	497
	结束语:是革命的失败吗?	506

附录

一	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危地马拉,1964年 12月	520
二	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1965年):“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开展人 民革命战争”	525
三	起义军宣告脱离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声明 1968年1月(摘要)	532
四	“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纲领(1963年)	537
五	哥伦比亚马克塔利亚游击队的土地纲领 (1964年7月)	541
六	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央报 告的一章(1966年1月)	545
七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原则和纲领(1965年1月)	548
八	卡米洛·托雷斯争取人民团结运动的纲领 哥伦比亚,麦德林(1965年3月)	552
九	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宣言:人民解放军万岁 (1968年2月)	558
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在利马市圣马丁 广场的讲演(1964年2月)	563

十一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原则的团结， 斗争的团结”，哈瓦那（1964年12月）·····	581
大事记·····	585

导 言

在 1967 年 10 月 8 日，一个暖和的星期日夜晚八时半，我同一位英国朋友在玻利维亚东部的圣克鲁斯的中心广场一带散步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咖啡馆的桌旁向我们招手。

他说：“有新闻告诉你们。”我们说：“切·格瓦拉？”因为格瓦拉可能被俘的事我们已注意了一个星期。几天前，我们在巴列格兰德的小镇时，曾听到玻利维亚第八师师长华金·塞顿诺·安纳亚上校表示不用一星期就能把格瓦拉抓住的信心。上校说明了他的部队如何得到刚从圣克鲁斯北面由美国特种部队主办的训练营派来的六百名“突击队员”的增援。他还告诉我们：游击队是怎样被包围的，只有一面才有逃走的可能性，而即使在那边，军队也布置了乔装成农民的士兵，只要有游击队通过，就可迅速提供告急警报。从 9 月底游击队进入的一个村庄的居民们和被俘的两名游击队员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切无疑是这伙被围游击队的领袖。

那位咖啡馆里的联系人告诉我们：“切被俘了，但是由于伤势严重，可能过不了夜。其他的游击队员决死苦战，企图把他抢回去。政府军连长用无线电要求派一架直升飞机去，以便把他载走。”连长兴奋得很，他的讲话含糊不清。人们所能听到的只是：“我们抓到他了，我们抓到他了。”

我们的联系人，建议我们应该租一架直升飞机立即飞往游击区。此人不知格瓦拉的生死，但是他感到格瓦拉多半是活不了很久的。我们没有钱租用直升飞机，即使有一架的话。而且，无论如何，在玻利维亚决不可能夜航。因此，我们改租了一辆吉普车，

于10月9日星期一清晨四时出发,驶往巴列格兰德。

我们在五个半小时后到达那里,径直开到了机场。在那里,小镇的一半居民似乎在等待着,包括身穿白衣服的小学生,以及急于拍摄已死游击队员照片的业余摄影者们。因为,仅仅在两星期之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科科·佩雷多和古巴的游击队员“米格尔”的尸体曾被运到这里。在机场附近的墓地里,埋葬着美丽的女游击队员塔妮亚的遗体。她和另外九名游击队员于8月31日在格兰德河中了埋伏的奸计而阵亡。巴列格兰德的居民们,现在变得习惯于军队的来来往去了。

人群中最激动的要数孩子们了。他们指着天边,跳上跳下,因为孩子们较成人可以看得远些。转瞬间空中出现了一个黑点,很快就能看清它是一架直升飞机,在降落架上载着两名士兵的尸体。它们被解了下来,随便装上卡车,运到镇上去了。但是当人群散去时,我们暂留一下,把放在机场外围由巴西武装部队供应的一箱箱燃烧弹拍摄下来。我们借助于望远镜头,把一个身穿黄绿色军服但无军人标志的人拍了下来。经人证明,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

外国记者这样卤莽——因为我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首先到达巴列格兰德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同几个玻利维亚军官在一起的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企图把我们逐出巴列格兰德。但我们有足够的证件表明我们确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并于几经力争之后,才允许我们留下来。那架唯一的直升飞机随即载了一位大人物塞顿诺上校再度飞往西南面大约三十公里外的战区。下午一时刚过,直升飞机又飞回来了,载回了一员得意扬扬的上校,忍不住露齿大笑。他宣布格瓦拉死了。他已经看到了尸体,毫无怀疑余地了。塞顿诺上校是个诚实人,除了绝对必要的外,他是不习惯于随便透露任何事情的。看来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我们赶到一家很小的电报局,把我们发向外界的报道,塞给一个惊奇和

怀疑的职员。对于所发的电报会不会到达目的地，我们都没有多少信心。

四小时以后，五时正，直升飞机再次飞回，这一次只有一个个子小的尸体绑在机外的降落架上。

但是，与前几次降落在我们站立的附近不同，直升飞机却在机场中央停了下来，停得远远的，使得好打听新闻记者的眼睛瞧不到。我们被禁止越过由坚定的士兵们所组成的封锁线。但是，老远的那具尸体非常迅速地被装入一辆密闭的雪佛莱牌大篷货车后，车子便开足马力，急疾驶离了机场。我们马上跳上停在一旁的吉普车，大胆的司机驾车紧紧跟在货车后面。大约一公里之后，这辆雪佛莱车来了一个急转弯，在一所很小的医院的院子里停了下来。虽然士兵试想在我们通过之前关上大门，但因为我们跟得紧，使得他们不能那样做。

那辆雪佛莱开上了很陡的坡，然后倒车靠近一所墙头褪色的小屋，屋顶是竹头的，一头露天。我们跳下吉普车，趁货车后门尚未开启前跑到了那里。当货车后门终于开启时，中央情报局的那个特务跳下车来，不恰当地用英语叫嚷：“好吧，让我们把魔鬼卸在这里。”笨坯，他可不知道车门两旁各站了一名英国记者哩！

货车里面，一副担架上放着切·格瓦拉的尸体。从最初时刻起，我毫不怀疑这就是他。几乎整整四年以前，我在哈瓦那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不易使人忘记的人。从那时起，我的个人记忆无疑同报纸上经常发表的他的照片混杂在一起了，但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忘记了他那稀稀落落的胡须的黑色了。他也显得比我记得的要瘦小些。在丛林中度过的岁月，显然使他的健康状况有所耗损。尽管我思想上有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确是格瓦拉。当他们把尸体从车上取下来，放在平时作为洗衣作的小屋里的临时性的桌上时，我确实知道格瓦拉是死了。

胡须的式样、面孔的形状、多而飘垂的头发，准没有错。他穿

了黄绿色的军装和一件拉链茄克衫。脚上穿了褪色的绿短袜和一双显然是自制的南美鹿皮鞋。由于他全身穿得好好的，很难看出他伤在那里。在他的颈底有两个明显的弹孔，后来，当他们清洗尸体时，我看到腹上另一伤处。我不怀疑他的腿上和心脏附近有几个伤处，但我没有看到。

医生们正在探查他的颈部的伤处，我的最初反应是认为他们在寻找子弹，但是事实上他们只不过准备放进管子把防腐的福尔马林注射进去而已。其中有一名医生开始对这个已死的游击队员满布血迹的双手进行清洗工作。除了这些以外，尸体还没有别的使人恶心的地方。他看来异乎寻常地奕奕如生。他的眼睛睁开着，是明亮的；当他们把他的手臂从茄克衫中取出来时，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不相信他已死了许多钟点；那时候，我不相信他是在被俘后遭杀害的。我们都认为他大概在星期一凌晨因伤重缺乏医治而死的。

尸体周围的活人比死者更教人恶心：一个修女忍不住她的微笑，有时甚至大笑；军官们用贵重的照相机拍摄现场情景；当然少不了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那个家伙似乎在指挥着整个活动，谁如果把照相机对着他所在的方向时，他就显出愤怒的样子。“你从哪里来的？”我们用英语问他，并且，开玩笑地补充问，“古巴？波多黎各？”但是他却并不觉得有趣，用英语粗率地回答说：“不从什么地方来。”后来我们再问他，但是这一次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你说什么？”并假装不懂似的。此人矮胖，三十四五岁，有一双凹陷的猪似的眼睛，头发稀少。很难说他是北美人还是古巴逃亡者，因为他讲英语和西班牙语同样流利，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口音。随后我发现他的名字叫做埃迪·冈萨雷斯，古巴革命之前，他曾是哈瓦那一个夜总会的老板。

早在格瓦拉死去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东南部产油城镇卡米里被俘和随后受审这一事件，

已经使活动在该国那一带的游击队的消息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对这一支游击队的了解，可能比对本大陆其他游击队的了解更清楚。但是，一般说来，虽然拉丁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洲，人们对革命者的了解却是很少的。这些革命者在古巴革命的榜样鼓舞下，几乎十年来一直战斗在五、六个国家的深山丛林之中。

别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了解得多一些。在亚洲的一些地方，自从日本最先从他们的岛国向外扩张以后，游击战争几乎变成一种连绵不断的现象。在非洲南部，占居多数的黑人反对白人压迫者的激烈的内部斗争，尚处在萌芽状态；但是未来斗争的样式，早已在战斗中勾划出来了。甚至在欧洲，在纳粹威胁下迫不得已的时候，连一些最不象会那样做的人也逃到山里去了。对外人铁蹄下或在本国傀儡统治下的暴政，实行武装反抗，是我们全世界人类遗产的一部分。

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诚然，十九世纪击败西班牙帝国的，主要不是靠游击队。直至最近，国内的暴力行动，主要局限于传统的阶级冲突——枪击罢工者、农民和矿工，以及屠杀印第安人。与公认的看法相反，有计划的政治暴力行动，在拉丁美洲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从欧洲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较之于美洲著称的经常发生的政变，牺牲了更多的生命。

然而，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0年在第一个《哈瓦那宣言》里所称的那样，“我们的美洲——博利瓦尔、伊达尔戈、胡亚雷斯、圣马丁、沃伊京斯、‘拔牙者’^①、苏克雷和马蒂期望取得自由的美洲”，已拥有不少革命英雄。而且，还限于十九世纪。墨西哥的萨帕塔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②，保持了并加强了一种反抗的传

^① “拔牙者”是巴西的爱国者（1748—1792），他的真实姓名是若泽·若阿金·达席尔瓦·沙维尔（José Joaquim da Silva Xavier）。——译者

^② 关于桑地诺最新的书，是尼尔·麦考莱著的《桑地诺事件》，四角图书公司，美国芝加哥，1967年。

统，这种传统哺育了今天的革命者。卡斯特罗对这一传统作了下面一段描述：

真正的人民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煤矿和锡矿的深处，来自它的工厂和制糖厂，来自它的遭受封建统治的土地。在那里，萨帕塔和桑地诺的后继者们里托人、丘洛人、高丘人、希瓦罗人拿起了自由的武器。这种声音在他们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他们的学生、妇女、孩子和他们的老人和无依者的心中共鸣着。

他的丰富的历史传统，被用这样出色的辞藻加以夸张之后，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根据约略估计，近二百年以来，全世界经历了五次真正的革命：法国、俄国、越南、中国和古巴。于是问题产生了，那些智力能够掌握深刻和重大变化的革命者们，在几次革命之间，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回答显然是，他们把时间用来组织革命，但是失败了。虽然这些革命失败了，但从革命中却产生了一部民间神话故事集，被用来哺育终将胜利的一种革命传统。

古巴革命成功以后，作为其后果之一，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反革命阶段，就象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把古巴孤立并封锁之后，美国感到可以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为所欲为了。哪里有倾向于独立的政府出现，美国就赶到哪里，手持最为合适的斧子随时准备下手。美国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援助体系，它不仅训练了拉丁美洲的军人，还向他们的孩子推荐应该用些什么教科书——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大量识字的居民生活在内的文化环境。通过这一援助，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了控制，其专制不亚于过去任何殖民强国对其属国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值得高兴的是，在有些国家里有些人造反了，即便他们所组织的革命多

半是失败了。

当我最初开始考虑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这方面唯一的英文指引书是《新左派评论》^①中题为《拉丁美洲的长征》的文章，作者是那时还不知名的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从他所掌握的关于拉丁美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细致和第一手情况来看，德布雷似乎想写同我想写的相同的一本书——把极不充分的现有材料收集在一本书里，以便把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性质、纲领、人物以及他们卷入进去的行动告知、启发更广大的与尚未有一定立场的读者。

然而，从德布雷在这方面所写、于1967年1月在哈瓦那出版的下一本重要著作《革命的革命？》来看，他意识到他的首要事业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事业，把他的思想传播给革命同志们。他们当然会确切地知道他谈论些什么。德布雷认为毋需用不必要的历史材料来把那本书拉长。但是，正如在那本书的英文版在那年早些时候出版时，我为它写书评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于拉丁美洲就是如此无知，英国人当中想知道德布雷借以建立他的理论的事实基础是什么从而能提出问题者屈指可数。”本书就是打算为帮助弥补那种无知而写的。

本书决不是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以后，在拉丁美洲崛起的一些游击运动而撰写的一本完整的或最终的历史著述。在现阶段，这样的任务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者力所能及的。那些往往只是用油印形式开始发行的文献资料还很难获得。重要的当事人往往死了，隐蔽起来了，或者还在山里难以见到。

但是，如果要由一个不可避免地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大规模的考察组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会成功的。拉丁美洲的左派，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极为怀疑，这种怀疑是很正当的。这种考察组的目的往往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粹学术性的。因此，谁要是为了调查游击战运动的事迹去拉丁美洲旅行而大事张扬的话，

^① 1965年10月至12月一期。

就立刻会在各紧要现场吃闭门羹的。即使一个留有胡须的英国激进分子，也无疑地会碰上困难。玻利维亚前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博士有一次对我说：“我经常被告知要警惕留胡须的人。他们有一半是卡斯特罗分子，另一半是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①

然而，写书总得有个开端。正如 F. W. 迪金为他的关于意大利法西斯垮台的不朽著作所写序言中所说：

当代史的研究充满着诱惑和陷阱，诱使人们发表不成熟的个人判断和不加批判地堆砌过多的材料。尽管有着丰富程度不等的文字资料，但是许多材料在战祸中被毁了，也许更多的材料是由于重要的目击者的死亡而被埋葬了，或者给活人扣压了。尽管有这些困难（这是历史学家注定的命运），看来当代史学者的主要的、卑微的责任，是要在历史纪录烟消云散之前把基本纪事确定下来。^②

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一个英国观察者所提供的这方面主题的入门著述；这个主题吸引了拉丁美洲一大部分有政治觉悟的人们的兴趣，却使五角大楼与国务院的人员感到各式各样的头痛。这里收集到的情况出自各种来源，大部分来自不著名的左翼刊物中的文章，来自报纸，有时来自某些人们和书本。有三种西班牙文的刊物特别有用，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得维的亚出版的《前进》双周刊、在圣地亚哥出版的《最后一点钟报》双周刊以及在墨西哥城出版的《事件》杂志。^③ 这三本杂志除了总的说是亲古巴的并刊登一定数量的游击战运动的材料之外，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是非

① 由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领导的古巴共产党中的亲莫斯科派，用以反对德布雷的一项指控，是说德布雷不仅被法国共产党开除，而且是受雇于法国情报局的。

② F. W. 迪金：《粗暴的友谊》，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伦敦，1962年。

③ 《事件》杂志于1968年停刊。该刊编辑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创办了一本类似的新杂志，叫做《为什么？》。

常出色的刊物。《思想评论》从1967年创刊以来就证明是不能缺少的一种古巴杂志。

此外,任何拉丁美洲现状的外国研究者应当格外地感谢《世界报》和它的不疲倦的记者马塞尔·尼德尔冈。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的《轻骑》杂志也是十分有用的。在英语方面,除了刊登在《新左派评论》上的雷吉斯·德布雷著作的译文以及刊登在休伯曼和斯威齐所主编的《每月评论》上的和来自游击阵线的经常性的但有倾向性的文章而外,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了。《壁垒》杂志近来对于这方面开始产生了较为热切(虽然有些天真)的兴趣。

当卡斯特罗刚获得成功时,许多人相信拉丁美洲行将进入一个革命动乱时期。但自从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开始对考查社会动乱的原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正在设法对付游击战争的威胁。尽管人们广泛地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事实仍然是自从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产生了重大的游击战运动,这五个国家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

这些游击组织只有在前面三个国家里得以生存下去。1965年爆发的秘鲁游击战,尽管是周密策划的,在六个月之内就被粉碎了。1967年玻利维亚的历时不到一年的命运悲惨的“游击中心”,要不是切·格瓦拉和雷吉斯·德布雷亲临参加的话,那么全世界的报纸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会事,正如在巴拉圭^①、厄瓜多尔^②和阿根廷^③那些相仿而未获成功的起义,没有受到人们注意一样。

我没有把上面三个国家的游击运动选入本书,部分是因为手头现成材料不充分,以致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另一部分是由于当它们还处于秘密行动的过程中时便都逐一被武装力量实际上扼杀了。我也略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④以城市基地为主的游击运动,以及巴西的农民联盟^⑤的内容,部分是为了限制本书的篇幅(两者,无论如何,都已经比本书涉及的一些运动得到更广泛的宣

传与研究);另外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运动都不完全符合我的关于游击战运动的概念。根据我的狭隘的和比较沉悶的定义,游击战运动就是:一个政治组织,通过在农村的武装战争,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至于有关政治组织起而掌握最高权力的事,可以发生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前、之后或正在达到的过程中。

切·格瓦拉在他的《游击战》一书中写道:“在现行的状况下,至少在拉丁美洲和几乎所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农村为战斗提供了理想的条件。”^⑥但这不是说所有农民运动一定要统统归属于游击起义一类。许多那样的农民运动——也许是大多数——在为什么而战斗的问题上,他们的视野是被严格地局限于他们的村庄、山谷或地区的。^⑦我对于乌戈·布兰科于1960年初在秘魯拉孔本西

① 游击运动曾于1959年11月间,以后又在1962年初的短时间里在巴拉圭活跃一时。从亚松森通到同巴西交界处的斯特罗斯纳港的一条用碎石铺的道路,已经为日本移民们开辟了一块土地,那里过去是适宜于游击活动的地方。

② 1962年3月间厄瓜多尔学生组织的一次运动,得以在山区持续了两天。

③ 1959年12月间图库曼发生过一次游击运动,它是由乌图隆科司令官领导的持不同意见的庇隆派分子所组成的。关于这个运动所知甚少。在1963—1964年,由司令官塞贡多领导的人民游击队(阿根廷)在萨尔塔区秘密地活动着。塞贡多(豪尔赫·马塞蒂)是格瓦拉的朋友。在塞贡多的组织里还有一个叫做帕比或里卡多的古巴人。此人是格瓦拉所率领的玻利维亚远征军的成员,于1967年7月被杀死。人民游击队(阿根廷)在行动之前就被消灭了。塞贡多的下落不明,被认为是死了。详见里卡多·罗霍著《我的朋友,切》,编者: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第175—193页。

④ 参看弗兰克林·J·弗朗哥:《多米尼加共和国、阶级、危机、指挥权》,《美洲之家》,哈瓦那,1966年。

⑤ 特别参看下列书刊:弗朗西斯科·儒里奥:《农民联盟是什么?》;安东尼奥·卡拉多:《伯南布哥州的干燥剂工业和“加黎利人”》,里约热内卢(巴西)1960年;霍苏埃·德卡斯特罗:《土地上的七棵棕榈树和一只大箱子》,圣保罗(巴西),1965年;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巴西的革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纽约,1964年,第13—34页;安东尼·利兹:《巴西与弗朗西斯科·儒里奥的神话》,载约瑟夫·梅尔与理查德·W·韦瑟黑德主编的《拉丁美洲变革的政治》,纽约,1964年第190—204页;贝诺·盖尔贾特:《巴西农村的阶级与拥护者》,《拉丁美洲》杂志,1964年7—9月号;《关于村社发展与农村社会研究的若干札记》,《拉丁美洲》杂志,1965年7—9月号。

⑥ 切·格瓦拉:《游击战》,古巴革命武装部,哈瓦那,1960年(?)

⑦ 参看格里特·休伊塞:《拉丁美洲农民的骚动》,国际劳工组织——“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研究拉丁美洲各国农民组织在土改过程所起作用的札记集。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泛美联盟,华盛顿,1967年6月。

翁山谷组织农民所进行的努力,是否能恰当地算作游击战运动,表示怀疑,虽然为了给后来爆发的游击战运动提供背景材料,也已经把它包括在本书之内了。^①

对于1964年的哥伦比亚形势,当时陆军对共产党的马克塔利亚“独立共和国”发动了重大攻势,我虽然谈得相当详细,但我自己感到哥伦比亚的暴力行动应该算作内战,而不属于我所下定义中那种出于政治动机的战争。^②(人们很难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在暴力行动期间,“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农民游击队不是去杀地主,而是互相残杀,付出了二十至三十万条生命的代价。)

我采用这个狭窄的定义,多半是为了抵销德布雷和其它人(包括格瓦拉自己)的著作的影响,即随着古巴卡斯特罗的胜利,武装革命组织在整个拉丁美洲兴起,从而人们能够这样说:“拉丁美洲的革命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举例说,德布雷高兴地收集了拉丁美洲所有起义活动的信号以后,从这样少量的证据中,得出了各种各样应用于全洲的结论。第一,当德布雷在1964年写作时,他把拉丁美洲自从古巴革命胜利后所经历的时期,称之为“巨大、分散的‘1905年’的严酷考验”。^③接着,在1965年的第二篇论文中,他下结论说,由于委内瑞拉革命者在城市多次失败之后转向了农村,因此,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必须继续走这条历史上注定的道路。^④(德布雷认为,委内瑞拉人遵循了毛泽东的方式,毛泽东于1927年在广东、上海血战之后,把他的追随者带上了长征的道路,通过农村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① 参看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编者:胡安·梅希亚·巴卡,利马,1967年。

② 参看赫尔曼·古斯曼:《哥伦比亚的暴力行动》,波哥大,1962年;与奥尔兰多·法尔斯·博尔达:《哥伦比亚的颠覆活动》,第三世界出版社,波哥大,1967年。

③ 雷吉斯·德布雷:《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载《现代》,巴黎,第224期,1965年1月。

④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革命战略的几个问题》,载《美洲之家》,哈瓦那,第31期,1965年7—8月。

我虽然对于作为一个专心致志的革命哲学家德布雷十分钦佩和尊敬，不幸的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只能得出结论，他的著作中夹杂着许多事实错误，因而他的一些理论必须大大加以修改。你不能把农民的起义、军官的反抗、矿工的罢工和学生的闹事混为一谈，从而下断语说，它们都是同一现象的各个部分，它们都是为了同一目标而战斗的，特别是因为推动游击组织的思想意识，现时有苏联或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仅仅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每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如此不同——从共产党的态度以至于对它进行镇压的性质——所以很难有全洲适用的普遍道理，能为站得住脚的哲学原理，提供基础。

然而，尽管 1959 年以来拉丁美洲游击战经验的性质只是片断的，仍有可能把它的经历区分为三个截然不同阶段：

1. 1959-1961 年。空想阶段，德布雷称之为“沸腾的英雄主义的年代”，游击战运动主要由学生领导，他们相信取得胜利是几个月的事情。

2. 1962-1965 年。在这个阶段里，某些重要的游击战运动，是由正统派共产党支持的，或者有时由正统派共产党控制的。

3. 1966-1969 年。1966 年 1 月于哈瓦那举行三大洲会议以后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共产党逐渐放弃了他们对于游击战的兴趣。

卡斯特罗于 1959 年 1 月 8 日率领了一队衣衫褴褛、有胡子的非职业性的士兵胜利地进入哈瓦那，这对整个拉丁美洲的许多革命同情者来说，似乎拉丁美洲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而古巴革命者自己，也迅速地宣告他们是席卷全洲风暴的先锋。正如德布雷 1965 年所写的，“古巴革命自从开始起就表现它自己为拉丁美洲革命的先锋队，古巴人民和它的领导们经过六年斗争之后，并未放弃过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也是从一开始，有人强调这样的事实说，假定拉丁美洲各国具有类似的条件，那么古巴游击队所用的许多方法，也能够成功地在其他各处重复应用。智利的社会党—共产党联盟的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60年写道：

古巴的命运如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命运一样。它们都是不发达国家——原料的生产者和工业品的进口者。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帝国主义使拉美各国的经济成为畸形发展的经济，它榨取了巨额利润，并建立了它的政治势力。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革命，但它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一次革命。它指出了我们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①

在古巴，最接近于下列观点的人就是切·格瓦拉，这一观点认为古巴岛上的革命代表着历史性运动的第一步，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拉丁美洲大陆。格瓦拉本是一个阿根廷人，他在墨西哥时已牵涉到古巴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去，因此他的思想必然不会局限于古巴范围之内。早在1959年1月27日，格瓦拉在对哈瓦那的“我们的时代协会”的一次讲话中，概括地提出了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含义：

我们给拉丁美洲的革命榜样，以及我们的革命所包含的教训，粉碎了各种咖啡馆理论：我们已经表明，一小批果断的、有人民支持的、必要时不惜牺牲的人，能够抵挡一支有训练的正规军，并完全击败它。那是基本教训。此外，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们，在经济上如同我们一样，是以农业为主，因此他们应该吸取的另一教训，也就是必须实现土地革命，并且战

^① 塔瓦雷斯·德尔亚雷尔：《古巴革命》，序言，哈瓦那，1960年；引于鲍里斯·戈登堡：《古巴革命与拉丁美洲》，艾伦和昂温书店，伦敦，1965年，第311页。

斗在农村和山区。革命必须从农村向城市发展，而不是从城市开始，因为城市不具有全面的社会意义。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卡斯特罗或格瓦拉曾在这样早期制订过任何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输出”革命的计划，但古巴游击斗争的胜利，肯定有助于激发 1959 年其余时间中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的革命尝试。卡斯特罗容许一些国家的流亡者利用古巴作为基地，他也并不试图掩饰他的同情在哪一边。在夺取政权三周之后，他飞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要求在美国洲国家组织之内组成一个“民主集团”，并且提出应该把独裁政府从那里赶出去。他指名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三个政府是尤其该反对的。他后来宣布说，来自这些国家的流亡者们，能够依仗他的援助和同情。

古巴革命后的第一次革命尝试，却不是发生在上述这些国家，而是在巴拿马沿岸发生的——有象征意味的是，它发生在拉丁美洲的美国军事活动的中心。据一个对卡斯特罗明显地敌视的美国评论员、新闻记者塔德·苏尔克说，“这次远征是由卡斯特罗政权武装、装备和组织的、并由卡斯特罗的一个军官所领导的。在登陆的或试图登陆的百余人的队伍中，古巴人多于巴拿马人。当地政府在几小时内就把‘入侵’粉碎了。”^①

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指出，事实上入侵者于 5 月 1 日向美洲国家组织指定的五人调查委员会投诚了，他们坚持说，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卡斯特罗呼吁的结果”。^② 巴拿马政府从未指控古巴政府与入侵有何牵连，卡斯特罗自己还对入侵事件进行了

^① 塔德·苏尔克：《输出古巴革命》，载约翰·普兰克主编的《古巴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华盛顿特区，1967 年，第 79 页。

^② 杰弗里·沃纳：《拉丁美洲》，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1959—1960 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 年，第 471 页。

谴责。^①

一个月之后，又发生了另一次企图在加勒比地区建立革命滩头堡的事件，这一次是在尼加拉瓜。起义者乘了两架飞机于6月1日从哥斯达黎加飞到那个国家，第二天，尼加拉瓜政府对美洲国家组织声称：满载武装人员的快艇正前来支援这些人。在洪都拉斯国境内，意外地发生了与起义者冲突的事件，而洪都拉斯人声称缴获了格瓦拉的一封信，当时他担任哈瓦那的拉卡瓦尼亚要塞司令，信中要求古巴政府为尼加拉瓜当局提供“各种形式的合作与援助”^②。

6月下旬，反对特鲁希略的起义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展开了一次行动。卡斯特罗对特鲁希略特别敌视，因为后者窝藏了从古巴逃去的巴蒂斯塔和其他被通缉的战犯。美国评论员塔德·苏尔克作了以下的描写：

在这里，卡斯特罗能够利用合法的多米尼加流亡者，这些人是在古巴由卡斯特的起义军军官对之进行过游击战术的训练的。卡斯特罗曾经想空投一支游击队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山区立下脚跟，正如他曾经在马埃斯特腊山所做的那样，另外，再派一支游击队在北海岸登陆。有一架飞机装载了起义者在康斯坦萨着陆，另外还有两艘汽艇的袭击者在普拉塔港登陆。但是阴谋失败了，因为在特鲁希略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下，人民慑于淫威，不敢向入侵者提供支援。事实上，农民还支援了特鲁希略的军队赶跑未来的解放者，而整个插曲

^① 《纽约时报》，1959年4月20日。格瓦拉自己后来于1964年12月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说：“一批冒险家是由一个开酒吧间的大胡子领导的。此人现在迈阿密，或者某个基地，或者某个地方，但从未到过马埃斯特腊山。此人设法煽动了一批孩子们的热情去进行那次冒险。古巴政府的官员与巴拿马政府共同粉碎了它。他们确是从一个古巴港口出发的，那时我们和巴拿马政府进行着友好的会谈。”

^② 杰弗里·沃纳：《拉丁美洲》，第471页。

在几天之内就结束了。①

潜在的游击队很少有越过滩头堡的。他们死搬了古巴的做法，以致象 1956 年 12 月在“格拉玛号”②上的搭乘者那样等待被人一一击毙，但却没有留下生还者为建立新的马埃斯特腊山根据地而继续斗争。

最后，在 1959 年 8 月 13 日，据报道有三十人曾经入侵海地。杜瓦利埃总统的秘书告诉记者们说，入侵者的首领是一个曾在卡斯特罗军队里服役过的阿尔及利亚人。据说入侵者全是古巴人，入侵行动是由杜瓦利埃的头号对头、海地前议员路易斯·德儒瓦提供资金，并得到了格瓦拉的全力支持。③ 象那年加勒比地区以前所发生的其他起义一样，这次起义仍然是不成功的。

菲德尔于 1 月间在加拉加斯明确地攻击了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拉圭的政权。但是直至那年年终，在 11 月，才有一伙八十名的游击队从巴西进入了巴拉圭的北部。这些人在一个星期内就被抓住了，虽然少数人得以逃入阿根廷。没有发现什么古巴牵连在内的证据。

这些早期的政治运动，基本上相信只要照抄古巴榜样中较为显著的特点就足够了。在短短的两年里，卡斯特罗和他的追随者用计谋制胜并最后击败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由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并支援的职业军队。古巴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各个游击队，也希望单单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政府就会象古巴前政府一样地垮台，正如以色列人曾经吹了几声喇叭就把杰里科④的城墙吹倒了一样。

① 塔德·苏尔克：《输出古巴革命》，第 79 页。

② 指菲德尔·卡斯特罗组织一批青年乘“格拉玛号”游艇在古巴奥连特省登陆的事件。——译者

③ 杰弗里·沃纳：《拉丁美洲》，第 478—479 页。

④ 巴勒斯坦的古都。——译者

尽管有这样早期的挫败,大多数游击运动继续相信,古巴革命已经点燃了拉丁美洲的“第二次独立”之火,并指引了能够赢得这种新独立的途径。虽然这是游击队的一个信念,它是以一系列给人以相当深刻印象的论点为基础的,而其中大多数论点是由格瓦拉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文章题为《古巴: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例外事例或先锋》,1961年4月发表在古巴革命军的刊物《绿橄榄树》周刊里。^①在这篇文章里,格瓦拉企图批评那些人们,他们“断言古巴革命的形式和途径是一个独特的产物,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人民的历史性的过渡形式将是不同的”。

格瓦拉一方面承认“有一些例外因素形成了古巴革命的特性”,但也强调了古巴革命中“对美洲所有人民都是共同的因素”。在例外因素中,他列举了以下各点:(1)堪与“拉丁美洲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并列的卡斯特罗的个性;(2)北美帝国主义“迷失了方向,它不能估量古巴革命的真正深度”这个事实;(3)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革命战争”这个事实;(4)“在古巴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大资本家的经营和半机械化耕作方式,农村人民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并已进入了组织起来的阶段,因而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这个事实。(但在承认这点以后,他指出,“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文化和社会根源上,不同于居住在辽阔的、半机械化的古巴农村地区的一个农民阶级”。)

格瓦拉随即直截了当地声称,依他看来,“再也没有例外论的其他因素了”。接着,他考察了他称为“美洲所有社会现象的经久不变的根源”——大庄园制度,经济的不发达以及“人民的饥饿”。

格瓦拉认为古巴的榜样能够适用于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信念,也是美国方面大多数观察家写作时所持的共同观点。美国作

^① 参看切·格瓦拉:《革命事业》(罗伯托·费兰迪斯·雷塔马编选并作序),时代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墨西哥城,1967年,第515—526页。这本书虽然并不是格瓦拉著作的全集,但是把他以各种文种出版的著作收罗得最广的一本集子。

者当然通常是关心卡斯特罗为什么“变成共产党人”，甚于关心为什么游击队能够打败巴蒂斯塔的军队。因此，厄恩斯特·哈尔普林这样写道：“对的，古巴经验能够重复应用于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他这样写，所指的是关于变成“共产党人”的经验，而不是“革命”的经验。^①另一方面，格瓦拉则关心1959年1月发生的革命，甚于关心1960年及其前后的所谓“第二次”革命，那时古巴与苏联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了。^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格瓦拉关于古巴革命“非例外论”的信念，并不为每个人所接受；那些不象美国那样深深地卷入冷战的学术界尤其不同意这种见解。两个英国作者，罗宾·布莱克本和休·托马斯教授，是并不敌视古巴革命的，他们按照古巴具体历史背景对革命进行了研究之后，进一步地分析出另外一些古巴革命所独有的特点。例如罗宾·布莱克本正确地指出：“古巴由于最近获得的独立，显著地并立即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分隔开来了。”^③他还提到，从暴力程度上看，“古巴的独立战争在质量上明显地不同于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各次起义”。^④

他还提出了关于古巴贵族以及关于古巴的基本农作物食糖的一些耐人寻味的观察所得。他透露，在1929年的经济不景气中，在古巴的外国公司，较之古巴本国的公司，更好地度过了这一难

^① 参见安德烈斯·苏亚雷斯：《古巴：卡斯特罗主义与共产主义，1959—1966》，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厄恩斯特·哈尔普林写的《前言》第11页。奇妙的是，哈尔普林认为古巴之所以参加苏联阵营，不是因为害怕美国可能侵略以便求得另一强国的保护（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假如不是不合理的观点），而是因为，具体地讲，古巴有了苏联支持，“在苏联核保护伞下……得以打开把革命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前景”。这种观点现在似乎成了美国官方与学术界的正统见解；这种见解建筑在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全然无知的基础上面。

^② 举例说，参看J. P. 莫雷：《古巴的第二次革命》，每月评论出版社，纽约，1962年。

^③ 罗宾·布莱克本：《古巴革命的序幕》，《新左派评论》，第21期，1963年10月。古巴于1898年才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

^④ 当时西班牙派军队前往对付古巴的局势，在比例上相当于美国在1968年间派三百万的军队往越南；二十一万八千西班牙人镇压一百五十七万古巴人民。

关。因此，到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在古巴经济中的投资，若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它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七倍。美国的利益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以致它不再象在拉丁美洲的其他一切地方那样支持并保障当地的地主阶级了。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古巴的地主阶级”。古巴的地主贵族也不例外。古巴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有着那样紧密的关系，连布莱克本也断言说：“古巴的资产阶级被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不适当的。”休·托马斯独立地得出了同布莱克本一样的许多结论，指出在卡斯特罗起义的时候，古巴的一些传统组织诸如军队、官僚系统以及教会，“要末早已枯萎，要末根本没有按照古巴的国情适当地调动起来”。托马斯的结论是，在古巴，“早在卡斯特罗起来造巴蒂斯塔的反之前，用来对革命进行遏制的绝大部分传统势力就已经崩溃了”。^①

在这些情况下，反对巴蒂斯塔的战争的性质，正如布莱克本指出的那样，最好用1885年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里的一句话来表达。在这封信里恩格斯谈到：“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②这是古巴革命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小阿瑟·施莱辛格形容了当卡斯特罗于1959年春向美国哈佛大学学生讲演时学生们的喜悦心情：我想学生们在卡斯特罗身上看到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物；在此‘听话的人’的时代里，他这一人物兴高采烈地冒旧制度之大不韪，召集了十来个朋友，把罪恶的老人的政府推翻了。^③

用罗宾·布莱克本与休·托马斯所提供的论点，证明古巴革

① 休·托马斯：《为什么民主政治在古巴失败了？》《观察家》，1964年2月9日，并参看他的《古巴革命的起源》，《今日世界》1963年10月。

② 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译者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安德烈·德意志书局，伦敦，1965年，第199页。

命的“例外论”，并不完全是具有结论性的。详尽的研究，也许足以显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有可与比拟的、虽然不尽相同的一些结构上的弱点。休·托马斯本人也同意，虽然“古巴革命的根源，应从古巴食糖业的状况中去找”，然而，“类似的情况，可能也存在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另外一些农产品之中”。^①但是，正如别处游击队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游击队自己也承认——这样下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即如果要使古巴革命的成功经验在别处重复的话，那就需要比恩格斯提到的“轻轻一撞”花更多一点力量才行。本书所叙述的，就是那些迄今为止经过尝试的“撞”的性质。

虽然自从1962年起，特别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②的一些游击运动是由当地的共产党支持的，我们不妨在一开头就强调一下拉丁美洲游击队从正统派共产党那里得到的帮助实在是少得惊人的。事实上，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共产党把游击运动当作夺权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或唯一的项目。共产党从未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游击运动组织。共产党总是企图利用或控制已经存在着的游击运动。此外，除了委内瑞拉共产党之外，拉丁美洲各国没有一个共产党曾经承认过他们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革命形势”。由于他们（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沿用了极端狭隘的列宁主义定义——它当然不适用于古巴的情况——看来将来它们也不会承认

① 举例说，有一个美国作者指出，“拉丁美洲所有卡斯特罗派游击队的起义，包括卡斯特罗自己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的起义，发生在种植咖啡的区域内或附近。那里，居住着丘陵地带的居民，他们依靠小得仅能糊口的土地谋生，地主与农民之间在当地特有的矛盾，由于世界咖啡价格下降而激化”（玻利维亚当然是例外）。作者随即建议，把世界咖啡价格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游击队，也许要比通常的“反叛乱”方法，更加有效。——见诺尔曼·高尔：《切·格瓦拉的遗产》，《评论》，纽约，1967年12月。

② 哥伦比亚当然例外。在整个暴力行动期间，哥伦比亚共产党——象自由党与保守党一样——有着他们自己的游击队。然而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要表现自己能顺应时代标准的一个事例，而不是革命激情的一种标志。

“革命形势”的存在。^①

北京也同样如此。拉丁美洲的亲华组织，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如何热中于武装斗争，总的来说，采取了同样被动消极的态度。但当亲华组织拒绝了选举道路时，亲俄的党派却从未放弃过什么机会——除非被拒于选举之外时——去支持一个中间偏左的候选人，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多么惨痛。在1958—1959年间，委内瑞拉共产党支持了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联合政府，然而到贝坦科尔特任职中期的时候，共产党人都已下了监狱。在秘鲁，虽然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于1963年当选为总统，他后来在许多场合疯狂地反对共产党，以便向军队方面证明，他并未受共产党的骗。在危地马拉，1966年由文人马里奥·蒙特内格罗当选为总统的那次选举，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但随之而来的是右翼暴行的无比的增加。在哥伦比亚，自由革命运动是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领导并由共产党支持的，这一运动总是深深地投入选举活动里去。自由革命运动既不支持游击队，甚至也不支持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所领导的抵制选举的运动。

美国作者厄恩斯特·哈尔普林曾指出，拉美各国共产党要设法“在拉丁美洲的政治机构里为它们自己取得一个适中的地位”，本书在这里不准备对拉美共产党这种做法继续进行批判。但也很难对哈尔普林所作关于拉美共产党的一些结论表示异议，这些结论是：

以城市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有一定的学生的支持和极少数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由职业政治活动家们加以领导，后者为人家做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小

^① 根据列宁的讲法，一个“革命形势”得先有下列客观条件：一个政治危机使得旧的统治阶级无法继续以老样子统治下去；群众的生活条件显著恶化；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恩小惠，例如为了得到召开秘密会议的许可，得以发行报纸或文学刊物或在工会里占有某些职位。他们这些人不是用金钱收买过来的。他们的腐败堕落属于更加严重的一种。他们能被收买，却不是用金钱，而仅仅是要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使得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能够保持着一种幻想，即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他们将注定成为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①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特别在1962年后的三、四年中，正统派共产党把支持武装斗争作为一种有用的政治策略。虽然通常认为拉丁美洲共产党是听命于莫斯科的，但由于各国的经验如此地不同，以致很难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路线”下明确的结论。严格来说，例如，委内瑞拉共产党直到1965年4月才决定给合法斗争以优先的地位。哥伦比亚共产党至1966年1月仍然赞成武装斗争；而危地马拉共产党至1968年1月才与游击队分手。然而，在本书涉及的阶段里，正统派共产党事实上表现出显然不情愿把武装斗争作为革命过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考虑——这种不情愿在古巴革命之前就已有了。

六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他们正处于被三种不同的分子所超越的危险地位：（1）他们自己队伍中的亲北京的极端主义分子；（2）从失败的改良主义党派〔象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和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3）军队方面。拉丁美洲的游击运动事实上常常起源于军队的起义，或者起源于这些分裂出来的党派，它们具有较共产党人为左的政治纲领。这些游击运动没有一次是正统派共产党有意识的决

^① 厄恩斯特·哈尔普林：《北京与拉丁美洲共产党人》，《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号。

定的结果,虽然它们常常有共产党人参加或领导。^①

在1962年初开始建立的委内瑞拉游击队,主要是在1960年从民主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左派革命运动”所组织的。自1965年中期开始建立的秘鲁游击队,完全是由秘鲁的“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而后者是于1959年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分裂出来的。(秘鲁的“左派革命运动”是公开敌视共产党的。)同样,在哥伦比亚,自从1965年开始活动的民族解放军依靠自由党中老盖坦派中反对分子的力量,甚于依靠共产党的力量。

虽然委内瑞拉游击队是在1962年^②的头几个月中开始活动的,但是民族解放武装部队于1963年2月正式组成之前,1962年5、6月份在卡鲁帕诺和卡贝略港的军队起义中,许多军官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一个重要来源。另一个来源于军队的游击运动是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1960年11月13日,危地马拉发生一次起义,来抗议美国为使古巴逃亡者准备入侵猪湾而建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基地。参加这次起义的有两个军官: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和路易斯·图尔西奥斯·利马,他们后来于1962年发动“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游击战。

由于共产党人担心各种游击运动会不受他们的控制,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对游击运动予以关心。他们特别致力于不同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的政府军对抗。共产党人毕竟不想重复制古巴的经验;在古巴,卡斯特罗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不依附共产党而独自夺取了政权,从而给古巴共产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直到1958年中期才在马埃斯特腊山同卡斯特罗会合。自从古巴革命以来,“保守派”共产党一向处于不能保持他们的政治影响的地位。

例如,在1962年,这一年是委内瑞拉共产党正式决定赞成武

^① 前面已提到的哥伦比亚除外。

^② 此处原书误刊为1965年,译文里已予以改正。——译者

装斗争的一年，那时看来革命组织确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有一个委内瑞拉共产党人于1967年9月^①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上写文章，赤裸裸地宣称：“在1962年，一个革命形势在这个国家里成熟了。”但他随即补充说，事实上这种形势并没有发展成为一场胜利的革命。委共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承认犯过错误。因为他们曾经把一种运动“估计为‘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而其实这种运动尚未达到如此的性质，它主要是旨在推翻政府的”。

1962年初，委内瑞拉执政者贝坦科尔特的各党联盟完全垮台了。1960年“左派革命运动”成员的分裂活动，使得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失去十四名议员席位，另外，在1962年，又有由拉蒙·西门尼斯领导的二十六名议员分裂出去了，使得贝坦科尔特失去议会中的多数。“共和民主联盟”的三名内阁部长早在1960年就抛弃了贝坦科尔特，以抗议委内瑞拉参与“美洲国家组织”在圣何塞谴责古巴。1962年，“共和民主联盟”中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法夫里西奥·奥赫达——他曾领导过从加拉加斯内反对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斗争——辞去了议会职务而参加了游击队。此外，疯狂反对共产党的贝坦科尔特停止了委内瑞拉共产党本身和“左派革命运动”的活动，这样就落入了共产党内部积极分子的圈套。在这些情况之下，当委共有被实际上剥夺了合法活动的自由之后，委共在1962年12月第四次全会上公开宣布主张武装斗争就不足为奇了。附带说一下，原来被认为是反帝的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已严重地背叛了它的反帝事业，这种背叛现在已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到了，但奇怪的倒是，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总的来说居然逃脱了如此严厉的判决。然而，贝坦科尔特由于背叛了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的人民运动，他在两年之内便失去同党的一半人的支持。他的背叛行为，至少相当于阿亚·德拉托雷的背叛

^① 胡安·罗德里格斯：《委内瑞拉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新面貌》，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7年9月号。

行为。

人们可以揣测，委共决定支持游击队，是因为在委共党内，如同那时在拉丁美洲所有共产党内一样，有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赞成武装斗争。这些人终于分裂出来，加入了独立的亲北京的组织。中国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决心是在1963年底下定了的，是在196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周扬讲话（题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宣布的。^①

那么亲北京的组织究竟有多大呢？根据现有的一些数字，1964年1月间的亲北京的秘鲁共产党成立会议——拉丁美洲第一个成立的亲北京的共产党——是由老的亲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十七个地区委员会中的十三个的代表们所召开的。^②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玻利维亚共产党于1965年分裂。亲苏的共产党方面承认中央委员会四十四名委员中有九名脱离了该党，而这些脱离者在该国三个省份中拥有巨大的势力。新分裂出来的组织，得以在十四个省的六个省中建立了平行机构，在那六个省中，亲苏的党是有地区党委的。巴拉圭共产党以其总部和它的大多数成员流亡在阿根廷而保存下来，也在1965年宣告分裂。党的大多数的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在内，转而参加了亲华的组织。没有数字可以估量其他国家中党派分裂的程度，但是可以合理地假定，其分裂的规模是差不多的。

1968年1月，中国人得以宣布走毛泽东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组织”已经在拉丁美洲“十个以上的国家里”成立起来了。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承认这些组织显然是谨慎的。只有巴西、秘鲁

^① 196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并无周扬的这篇讲话，而只有他的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内容应予批判。本书作者在此污蔑我们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亦应批判。——译者

^② 事实上，一个亲北京的党，在这以前早已建立。从未接受过1966年苏共二十大宣言中所包含的政策变化的一批巴西斯大林主义者（这些人在1961年被开除出巴西的共产党）在北京给予的一些经费的支援下，于1962年2月另行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对立的党。参看厄恩斯特·哈尔普林：《北京与拉丁美洲共产党人》。

和哥伦比亚的组织正式被北京承认为党。因此，同苏联的分裂并不一定会使亲华组织方面的革命活动增加。在同俄国人闹翻以后，亲华党的革命目标已大部分达到了。

事实上，战斗性较强的成员退出亲莫斯科的党，这一分裂的主要后果是：正统派共产党转向右倾，主张合法斗争，并放弃武装斗争。亲北京分子一旦分裂了出去，他们就不成其为对于共产党的内部威胁了：他们的分裂工作已经完成，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基本上没有力量，不起作用，其对于大陆上的游击队和亲古巴运动所构成的威胁，甚于对正统派共产党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亲北京的组织，自从1964年末以来，是一贯敌视古巴路线的。这些组织不仅反对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游击战运动，而且在1967年召开的亲华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哥伦比亚代表实际上号召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反对卡斯特罗的阵线。^①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哀悼过格瓦拉司令之死。

在北京派已不在党内并且已经实际上中立而失去了它的作用以后，反对把正统派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革命智慧源泉的唯一举足轻重的力量，便来自游击队本身了，其中有些是“左派革命运动”的人或前军官，另有一些实际上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例如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就是这样。不可避免的并且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游击组织的领导究竟应该呆在城市里还是在山区里的问题上引起了辩论——这个问题在德布雷的著作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假如共产党准备用更大的精力支持武装斗争，这个问题可能决不会以那么尖锐的形式提出来。

^① 这方面请参看，玻利维亚共产党亲北京派首领奥斯卡·萨莫拉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刊登在1968年7月的《时代报》（科恰班巴出版）上。这封信攻击菲德尔·卡斯特罗，并且含蓄地攻击格瓦拉依赖玻利维亚的亲俄共产党来开展游击战运动。1968年1月间，一个新的游击战运动在哥伦比亚展开，叫做“人民解放军”。它表现了亲华的情绪，但是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足以说明中国人自己对它有任何兴趣。

可是，事实仍然是，委内瑞拉共产党在1965年4月的第七次中央全会上，决定了把合法斗争放在优先地位。拉丁美洲的其他共产党在以后的三年中也群起而仿效。1965年12月间，由于委内瑞拉共产党采取的态度，委内瑞拉游击队领导人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另行建立了由他们自己掌握的农村游击队的政治局。他们两人是共产党的道格拉斯·布拉沃与法夫里西奥·奥赫达，后者过去是属于委内瑞拉“共和民主联盟”的。事实上，他们已断绝了同共产党的联系，布拉沃因而于1966年5月被正式停止了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委内瑞拉共产党为什么特地要在1965年4月的这一时刻决定反对武装斗争，不是完全清楚的。政策的改变可能是由于：第一，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内部的分裂，该运动迄今为止是坚定地支持在山区和城市的游击行动的。这个运动的最重要成员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自1963年起监禁在狱），出狱后的第二年就主张放弃武装斗争。这意味着共产党不再需要面对来自非共产党的左派组织的严重的反对了。第二，1964年12月间，委内瑞拉新总统劳尔·莱昂尼开始实行了一种使共产党“恢复名誉”的新的政策，容许共产党从事他们的正常活动，条件是应该停止运用暴力的手段。曾被排除在1963年12月的选举之外的共产党，也迫切地想恢复合法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内瑞拉共产党支持武装斗争的短暂岁月中，他们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在狱中。

哥伦比亚共产党则有点例外，它主张武装斗争，一直到1967年。这是由于与马克塔利亚“独立共和国”相联系的特殊情况所引起的。共产党对保卫马克塔利亚是负有义务的，因为在暴力行动中推上去的所有农民领袖之中，它的司令员曼努埃尔·马鲁兰达，即众所周知的神枪手，是共产党的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因此，当军队于1964年开去摧毁马克塔利亚，而马鲁兰达随即宣布了要继续作战的意图时，共产党实际上是被迫支持了他。

1965年1月，受到古巴人鼓舞的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投入战斗，它在最初阶段生存下来了，并且获得了一些胜利——包括重要的心理上的胜利，即把卡米洛·托雷斯神父争取过来，使他于1965年底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共产党害怕民族解放军壮大起来因而无法加以控制，就于1966年初把马鲁兰达所领导的农民正式改编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个决定是于1966年1月在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上通过的。参加会议的显然有48%的人是农民。会议“集中了农村武装行动的领导，以符合我们国家革命过程的需要”。至少有四个游击队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引人注目的决定，似乎是对民族解放军认为游击队的领导只能在山上的信念，所作出的让步。当然，涉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一些政治决定，仍要在城市中定夺下来；但是哥伦比亚共产党比玻利维亚共产党肯定要灵活些，后者拒绝支持一种会使拉巴斯（玻利维亚首都）的共产党失去直接控制的政治军事指挥权。危地马拉共产党也是这样，直到1968年才放弃武装斗争。

另一方面，秘鲁共产党对游击战从未表现过任何兴趣。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乌戈·布兰科领导的强有力的游击运动是受到托洛茨基主义鼓励的，而后来路易斯·德拉普恩特所做的努力是受到秘鲁“左派革命运动”支持的，而这个组织继承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若干反共的特征。

各国共产党之间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示它们不是按照莫斯科拟定的任何控制全盘的计划行事的。苏联共产党，至少到1964年底以前，还是相当地倾向于支持游击运动的。那年8月，苏共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提出主张武装斗争，直到12月，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集会于哈瓦那时，虽然是勉强地，但仍然同意支持这个洲的革命战士，特别提到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巴拉圭的革命战士。可是到1965年，俄国人已经反对这种

主张了。他们为什么改变看法,引起人们的猜测,也许与1964年11月赫鲁晓夫下台有关,更大可能是鉴于与中国的分裂日益扩大,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之故。

游击战运动的第三时期,即最近时期,就是说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以后,它的特点不仅是缺少了共产党支持,并且在纲领方面也有了重要改变。

直到那时为止,人们普遍相信可以按照古巴的榜样行事:这不仅是强调游击战争和强调通过游击中心创造革命条件的可能性,而且也表现了不要跟资产阶级对立的一种愿望。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革命力量,象古巴的中产阶级的情况那样。实际上所有的游击队组织都相信,在这个意义上,走古巴的道路是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可能与共产党人结成临时性的同盟,而共产党人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它的长处的。

首先反对这种观点的是危地马拉的容·索萨。他在1964年12月提出了一篇《拉斯米纳斯山第一次宣言》,该宣言充满刺激地号召制定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并取消与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盟。这个宣言是在托洛茨基分子影响下写成的,其结果造成了在1965年3月间和共产党人的破裂。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因而分成托派与共产党人两派达两年以上。

看来相信可能得到资产阶级支持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的最后一个运动,是秘鲁的左派革命运动,这个组织在1965年的后几个月的不幸事件中宣告结束。卡米洛·托雷斯似乎也抱有类似的幻想。

然而1965年12月道格拉斯·布拉沃和法夫里西奥·奥赫达两人所采取的行动使他们同这一立场的决裂变得明确了。他们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并在农村建立新的领导机构。这个新的机构(亦称“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于1966年2月发布了第一批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包含着下面一段:

举例来讲，今天看来在古巴出现的事情，不见得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别处重演。解放运动，既不能指望出其不意的因素，也不能依靠象过去时代那样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除了帝国主义已从它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要尽一切可能来封锁通向革命的道路这一事实而外，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也意识到，拉丁美洲革命道路的目标一定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了解，折磨本洲的病症只有社会主义方法可以医治。所以，即使我们在开始时可以谈论资产阶级革命，而在事实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是不容长久推延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关于拉丁美洲形势的主张，就必定要作若干保留。从巴西出现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说明今天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在运动早期交付给他们的革命传统任务的。^①

在这种形势下，除非用所谓“持久战”去考虑拉丁美洲的斗争外，从其它方面去考虑，很清楚，都是肤浅的。以为古巴的业绩可以搬用于委内瑞拉，便是忽视了这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便是对形势不作适当的分析而盲目行动。

到六十年代中期，游击战士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是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反美斗争的一部分，相信除非斗争胜利，拉丁美洲或其它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纲领。于是这些新的游击战士就同共产党人有了分歧，不仅在战术上（武装斗争），而且在纲领上有了分歧。共产党人仅含含糊糊地谈论帝国主义，但是正如格瓦拉在他给三大洲会议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讲到摧毁帝国主义，我们就必须认定它的头目——它不是别人，而就是美国。”

游击战士在早些时候是严格地按民族主义谈论问题的：说他

^① 1964年，巴西左倾的若奥·古拉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被得到美国大使馆同意的卡斯蒂罗·布兰科元帅所推翻。

们的外国同盟者是一般讲的社会主义世界和新的急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坦桑尼亚。当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时，他们就只同实际参加武装斗争的运动结盟，他们所指望得到帮助的外国首都仅有哈瓦那、河内、平壤三个地方。

斗争的国际主义变成了决定性的原则。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在上面早已引用过的文件中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回到古老的久经考验的原则上来，即同时在许多地方打击敌人最敏感的要害。这些都是过去在反对西班牙斗争中取得成功的战术。”

格瓦拉在他上述的信中申述了这一点，即同越南团结的唯一方式，是和他们一道战斗。他写道：“那不仅是希望受害者成功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担其命运，和他们同生死共胜利的问题。”格瓦拉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未主张必须走古巴的道路。不，今天，“人民应该走的是越南的道路，这也是美洲将来要走的道路。”

当然，德布雷要求他的读者要多重视古巴的经验。但是，他所以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支持他的主张武装斗争的论点。他要论证的要点是：第一，游击战士应该建立自己的先锋队的党，象古巴所做的那样，而不要依靠原有的共产党；第二，斗争的重点应放在摧毁旧的军队——这也是古巴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些时候，至少到1962年10月为止，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信念，认为革命者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完成初期的革命的问题，即夺取政权的问题。夺得政权以后，社会中的革命变革，将在苏联保护之下进行。但自从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表明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关心是有限的，于是转而强调“持久战”，并趋向于这样的想法，即通过游击战争建立起一种社会，它能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后保卫自己不受外界的攻击。危地马拉游击队领袖塞萨尔·蒙特斯于1966年就说过，“现在锻炼人民的时间愈长，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将会愈少。”

事实上，研阅后来各个游击队领导人的声明以及德布雷的著作之后看来，似乎新的一代的游击战士，也不只主张游击战争是达到经过各个团体广泛同意的某一目标的最好手段。似乎即使是该目标的本身，事实上也不是其他左派政治组织所赞同的。事实上，游击战士谈论的目标，是只有通过游击战争才能达到的目标。这种态度，多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来源于弗朗兹·法农，他强调：经过暴力革命的斗争以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是可取的。换一句话说来表达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意思，就是方法已变成了纲领。

这个最后时期，也就是古巴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兴趣增加的时期。奇怪得很，美国从古巴革命的头几个月，就宣称古巴又企图颠覆其余拉丁美洲国家，而它却提不出什么结实的证据来支持它的说法。美国学者有意地避开这个主题。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书讲到古巴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却没有谈到卡斯特罗对待拉丁美洲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虽然致力于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但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过认认真真研究这些运动的书籍。因此，美国纳税人出钱给军队去镇压那里的运动，而对这种运动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

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成功的最初几年里，有证据暗示，他在做法上宁可向后略退一些，免使南面邻国口出怨言。他作过大量演说，特别在两个哈瓦那宣言中，预言寡头政治即将为被剥夺者打倒。1960年他建议可以把安第斯山脉变为南美的马埃斯特腊山。许多革命者成群地到哈瓦那去寻求革命，无疑地许多人接受了金钱和训练。但所有这些只是与加勒比海范围有关，那里的逃亡在外的革命团体，多年来就在计划着胜利地返回自己的国家。那个地区的政府对于逃亡者的活动，一般地是装做视而不见，当革命企图以失败告终时，就匆匆地否认与他们有任何关系。1954年卡斯特略·阿马斯由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1956年卡斯特罗从墨西哥袭击

古巴；1961年古巴逃亡者由危地马拉入侵古巴。卡斯特罗没有从墨西哥政府得到什么援助，但他从委内瑞拉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的政府那里，确曾得到了一架飞机的军火。^①

在墨西哥负责训练菲德尔·卡斯特罗部队的西班牙共和国将军阿尔维托·巴约将军，讲到他和这个古巴革命家〔卡斯特罗〕在第一次会唔以后的思想：

这种想法好象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曾经同那些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者进行过上千百次类似的谈话，他们梦想组织游击队去推翻佛朗哥、索摩查、特鲁希略、佩雷斯·希门尼斯、庇隆、卡里亚斯、奥德里亚、巴蒂斯塔、斯特罗斯纳、罗哈斯·皮尼亚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所有这些谈话，一经谈过，就象卷烟散发出来的烟雾一样，倾刻就消失了。^②

但许多人就象卡斯特罗一样，还是开始了他们的无望的远征，虽然都没有成功。当卡斯特罗上台时，他很难否认他是如何起家的。他难以拒绝让革命者离开古巴去进攻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圣多明各的特鲁希略、海地的杜瓦利埃。毫无疑问，对于他们的活动，他假装不知道；但是，这个地区任何声称有着人民支持的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只能这样做。当有人发动对巴拿马的袭击时——比起上述三个独裁者的政权来，巴拿马政权不被信任的程度还是较轻的——卡斯特罗竟毫不容情地对此加以谴责。

因此，在最初几年，古巴对拉丁美洲革命的支持，显然是有限

① 很显然，这些武器是无要紧要的。据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那一百五十件武器在1958年12月来到时，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古巴圣地亚哥推进，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埃内斯托·格瓦拉两支部队早已拿下圣克拉腊的重要的一部分了。”——1967年8月10日卡斯特罗演说。

② 阿尔维托·巴约将军：《我参加了古巴革命》，载《起义军》，哈瓦那。1960年1月号。

度的。卡斯特罗喜欢搞正常外交。1959年，他飞往加拉加斯去感谢委内瑞拉人民给予的帮助，他飞往美国去阐明他的政策。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参加会议。切·格瓦拉参加了1961年为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会议。他表现得特别温和。那时他会见了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和巴西总统夸德罗斯。古巴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对与资产阶级政权搞在一起的偏见。

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的过去，美国加紧了对古巴的封锁，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说服其他拉丁美洲盟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于是，美古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宣告断绝。古巴变得越来越孤立了。

古巴政权是在这个时候，即1963—1964年期间，才开始认真对待关于鼓励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问题。政府内部有些人一定已经感到，古巴的生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拉丁美洲大陆革命的成功。因为与美洲大陆隔开的古巴，正变得愈来愈危险地依赖于数千里外的苏联。而1962年10月的核武器危机，似乎已经表明俄国人的支持受到严格的限制。

但即使是古巴人对游击战的关心增加了，它支持的程度仍然是微小的。1967年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的报告中“只发现四个关于古巴直接支持叛变集团的业经证实的事例”：

1963年11月，委内瑞拉西部发现一个埋藏几吨武器和弹药的地窖，它被确认与古巴有关。

1966年2月至9月，一个由古巴人支援的并以墨西哥城与墨、危边境上的塔帕楚拉为据点的联络网，为危地马拉叛变者准备了大量的小型武器。这个联络网后为墨西哥当局破获。

1966年7月，有二、三十名武装叛乱者，其中有些人曾在古巴受过游击训练，乘船在委内瑞拉海岸登陆，船只大约是古

巴提供的。

1967年5月8日，在委内瑞拉的秘密登陆，这是有证据表明古巴军队直接卷入的第一个例证。古巴武装部队两人被打死，两人被捕。^①

根据1968年1月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研究资料，古巴在财政上的卷入，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从已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关于古巴给予拉丁美洲叛变者直接与间接的援助，不可能提出一张精确的数额一览表。这里也不准备这样做。但是有两点论断似乎是合乎道理的。一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于古巴援助的货币价值有夸大的趋势，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无根据的假定所引起的，说苏联为古巴的颠覆活动准备了一本空白支票簿。苏联为此目的，虽然可能提供若干援助，但从间接证据来看，他们喜欢把钱直接地或者通过更加听命于他们的代理人交给受援者，……

卡斯特罗的金钱支援一向是少的，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颠覆集团，被迫依靠抢劫和绑架来筹集资金。并不是卡斯特罗不想多给一点，只是他没有能力担负这项开支。卡斯特罗至少运过三批货物到委内瑞拉，但这对缺乏物资的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来说，只是极为有限的无济于事的一点支援。

古巴对于拉丁美洲人民在古巴受训和宣传方面花的钱，大约较其他援助方面多些……卡斯特罗政府也派了少数人到战地为游击队服务并担任训练和领导工作，特别是在玻利维

^① 1967年7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泛美小组委员会报告：《1967年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活动》，1967年7月，第7页。

亚和委内瑞拉。^①

尽管如此，到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期间，古巴就决定为支持大陆革命承担义务了。第二年，即1967年5月8日，在委内瑞拉的登陆有四个古巴人被捕以后，古巴共产党就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最强烈的声明，对游击队表示团结并承担责任：

他们指责我们援助革命运动。事实上，我们是在给予援助，只要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不管它是世界那个地方的反帝斗争运动。^②

当古巴新出现的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热情开始表现出来的时候，恰好是俄国人和依靠俄国人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开始强调与美国及南部大陆被保护国政府实行和平共处并和睦亲善的时候。卡斯特罗与委内瑞拉共产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刻毒的辩论，结果委内瑞拉共产党被排除在1967年8月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之外。

在三大洲会议上，智利社会党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具体地讲，即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组织，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点遭到了参加三大洲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们，实际上还有卡斯特罗自己的反对。而卡斯特罗是在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提出的各个论点之下才被说服勉强同意的。即使这样，拉丁美洲

① 《争取进步联盟的调查：拉丁美洲的暴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戴维·D·伯克斯教授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美洲各共和国事务小组委员会之请准备的一份研究材料，1968年1月，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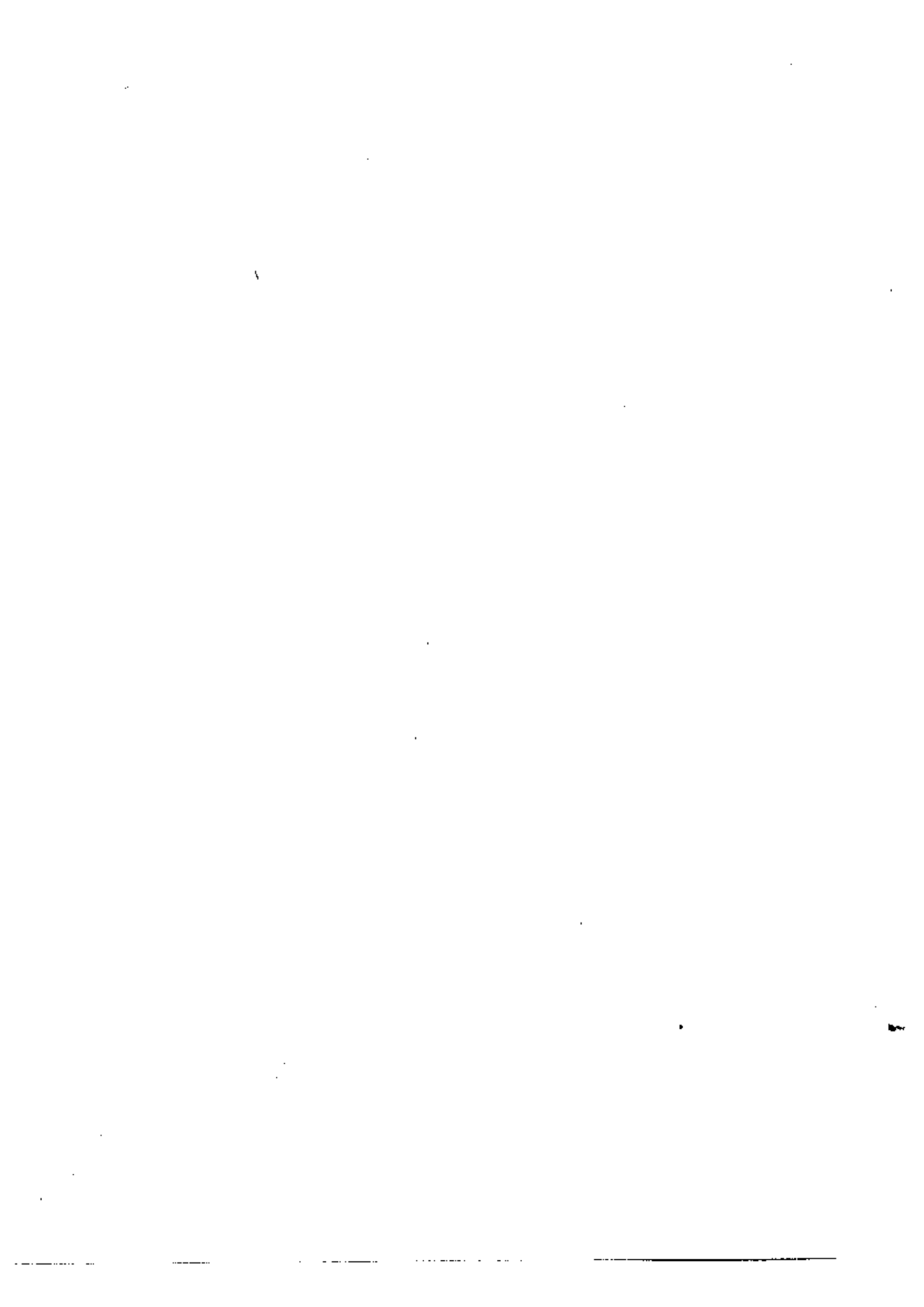
② 请参阅我于1967年8月1日和3日登载在《前卫报》上的两篇文章：《当卡斯特罗的人与共产党人发生纷争的时候》以及《规划革命的道路》。当然，这种态度与以前迥然不同。1961年格瓦拉在乌拉圭埃斯特角讲过：“我们不能象美国所要求的那样，答应不输出我们的榜样，因为榜样是一种精神和具有精神原素的东西，是能够超越国界的，但我们保证不从古巴运出军火去攻打任何拉丁美洲国家。”

团结组织这个新机构，花了十八个月以上的时间，才得以产生。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把这个洲的二十七个共产党和革命团体聚集在一起（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三国共产党缺席，亲华党没有参加）。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正统派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赞成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至今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同时也是因为美国黑人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出现于哈瓦那，第三世界的革命组织第一次和美国激进运动联系起来。看来，反帝斗争和种族斗争确实已第一次携起手来了。

被拉丁美洲团结组织鼓起的大部分热情，是由于同年早些时候开始的玻利维亚“游击中心”的存在的缘故。虽然，当时关于切·格瓦拉参加玻利维亚游击斗争的消息，外边还不大知道，但他是大会无声无形的鼓舞者。他被选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由于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事实上与格瓦拉如此紧密相联，在格瓦拉死后，该组织就简直难以存在下去了。

自从那次大会召开以来和格瓦拉死后，到现在已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里，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和革命家之间的争论激情已大都消失。他们以悲伤甚于恼怒的心情各走各的路。但这是一种深刻而不幸的分裂，因为游击队员需要共产党人——除此而外，他们到哪里去找人力呢？而共产党人也需要游击队员，否则，他们又怎么能自称是革命者呢？



第一部分

危地马拉的兵士和农民

一 阿本斯下台和游击队的起源

“我们不是政府里的人；阿本斯上校才是政府里的人，他只不过是我们的朋友。”

——危地马拉农民的话

根据宪法选出的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1954年6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了。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的历史，甚至拉丁美洲当代史本身，除非参照这个主要事件，那就不能有所理解。因为推翻阿本斯一事，至少对后一代的革命家来说，似乎表明了，即使试图实行最温和的经济、社会改革的拉丁美洲政府，也经受不起美国的敌视。一种有力的神话就被制造出来，据说，在美国随心所欲推倒各国政府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可望取得成功。^①

四年半以后，神话破产了，古巴革命胜利地证明了这种神话的谬误。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也许是卡斯特罗胜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一种危险的信念产生了，那就是，美国并不是无敌的，人们可以向它挑战而取胜的。而1965年，即阿本斯上校下台十一年之后，美国侵略圣多明各又再度表明，不管“争取进步联盟”说得怎样好听，美国决不准备忍受甚至最温和的走向激进变革的行动。也许可以说神话毕竟不是神话了。

^① 推翻一个革命政府，甚至也并不是经常必要的。玻利维亚1962年革命，原由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后来由西莱斯·苏亚索领导，就是由美国从内部加以破坏的。



图 1

(按原图译制)

拉丁美洲的革命家们，从危地马拉 1954 年经验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他们得出结论，革命如果不是“一直”剥夺富有者，并给农民和贫苦阶级以在革命中的坚实地位，那么革命不免失败。^① 阿本斯上校本人是推翻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的 1944 年危地马拉革命的继承人。虽然这次革命做了些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却小得无以吸引被剥削者，而对富豪和有权势的人则又是大得不可忍受。在两极社会中，富豪掌握的权力如果受到威胁，反革命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反革命有美国予以支持，而在受到革命利益的人却不具有保卫自己的手段的形势下，反革命行动是不会失败的。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 1954 年 5 月 25 日声明中解释了美国对阿本斯恼怒的原因。

杜勒斯说，第一，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唯一投票反对美洲国家组织于 1954 年 3 月通过的决议的国家，该决议声明：“任何美洲国家的政治组织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统治或控制……将造成对美洲国家的威胁，危及美洲的和平。”第二，危地马拉没有批准 1947 年里约热内卢防务协定——该协定旨在实际保证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归美国控制。第三，阿本斯总统曾经从东欧国家购买军火。

上而最后一点指责，实在不是阿本斯的过错，因为他的政府正是美国封锁的受害者，而美国政府成功地说服许多盟国参加封锁。

^① 切·格瓦拉于 1960 年 8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上，说明阿本斯失败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要对哈科沃·阿本斯特别致敬，他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第一个毫不畏惧地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的总统；这个国家在一个深入而又勇敢的土地改革中，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愿望。我们也应向他表示感谢，向夭折了的（危地马拉）民主政治表示感谢，因为他和民主政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且促使我们对种种弱点能够作出正确估量，而这些弱点正是该国政府未能加以克服的。这使我们可以抓住事情的根本，并且一下子把掌权者和他们的狗腿子斩尽杀绝。”——格瓦拉讲话，见《革命事业》，时代出版社，墨西哥城，1967 年，第 309 页。危地马拉的重要经验是，在任何革命进程中，必须将旧军队予以摧毁。只有 1952 年玻利维亚革命和古巴革命，实际驱除了旧军队。危地马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55 年 6 月一个文件中分析阿本斯的失败。明白写道：“在寻求革命的变革中，保持旧军队原封不动，是一个错误。”引自阿连·霍西《中苏在拉丁美洲的冲突》，阿尔卡出版社，蒙得维的亚，1967 年，第 35 页。

例如，英国外交部就在1954年7月18日发表声明说：“女王政府强烈反对向危地马拉出售军火，英国拒绝签发向该国输出军火的许可证已达数年之久。”^①

当时，针对美国介入危地马拉内部事务的许多评论家相信，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出于愤恨征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未开垦的土地，这个企业在危地马拉经济上占有关键地位^②。但从事后的剖析来看，似可合理地认定，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仇恨与怀疑，是国务院作出决定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由于一个小型美国公司受到了次要的损害。杜勒斯认为阿本斯“对共产主义爱慕倾倒”：再也不需要为干涉行动作更进一步的辩解了。

事实上不论是阿本斯上校或者是他的前任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都没有对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有过同情。即以激怒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阿本斯的土地改革而论，那种土改是特地为了改进条件以便从事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而设计的。^③只不过阿本斯和阿雷瓦洛两人确实企图从美国那里获得微小程度的政治独立。就是为此，他们的“革命”必须予以制止。

美国中央情报局预定的危地马拉总统候选人是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在1950年大选中，他竞选失败，阿本斯得到胜利。他又是以前一次失败政变的组织者。1954年6月中旬，卡斯蒂略·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入侵，没有什么困难就把阿本斯推翻了^④。

① 基辛斯：《当代档案》第13677页。从法律意义来说，英国没有支持封锁。

② 这个论点由于下列事实而显得更有理：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是一个法律事务所的成员，该事务所战前起草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与危地马拉政府间的协议；而他的兄弟即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从前又任过该公司的总经理。

③ 土地改革法序言讲到，“革命的土地改革，目的在消灭封建的农村地产及其生产关系，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方法，为危地马拉工业化开辟道路”。参看1965年“泛美联盟”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出版的一份资料：《危地马拉农业区耕地的使用与社会经济的开发》。

④ 有位撰写游击战争的作者，认为应该把卡斯蒂略·阿马斯的侵略军列为游击队，他并且把此人的胜利当作一般性的游击战的胜利。参看1966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安德烈斯·卡西尼略·佩雷斯：《游击队与反游击队的作战》，第154页。

有个阿本斯的拥护者，阿根廷人名叫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曾经希望他把工人农民武装起来驱逐入侵军队^①。但是阿本斯的胸怀中没有足够的热情来实行这样一个革命行动。6月底，他温顺地辞职，向上校军官们的政府让路。

推翻阿本斯以后，危地马拉开始了一个长时期反革命政府的统治。有个记者在几年后写道，卡斯蒂略·阿马斯“证明是个够不上称为民主战士的角色。他不去推进土地改革，倒反而将阿本斯政权征收的约计一百五十万噶土地实际上全部退还给大地主，结果落得许多农民的愤恨。”^②正是由于对阿本斯的公认为有限度的土改有了这种反复，这就创造了游击队后来能够蓬勃兴起的条件。

可是卡斯蒂略·阿马斯生前来不及看到他发动政变的全部结果就死掉了。1957年7月22日，他被他的一个宫廷卫士击毙，政府立即指控此人与共产党有组织关联。艾森豪威尔总统按照礼节地宣称，“阿马斯之死对我国和整个自由世界都是一项重大损失。”

选任总统接替人的大选于10月20日举行，但当前最高法院法官奥尔蒂斯·帕萨雷利胜利在望时，获得第二位选票的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弗恩特斯将军立即宣称这次选举无效。1958年1月19日再一次进行选举，伊迪戈拉斯·弗恩特斯获得胜利。第一次选举并不是很公正的，因为不仅共产党，甚至稍带左翼色彩的革命党都不准参加选举。而在第二次选举时，革命党被容许参加了，它提出以律师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充当候选人，此人在选举中得到了一定的选票。^③伊迪戈拉斯获胜，主要是因为有些票

^① 事实上，格瓦拉只是在1954年2月才到危地马拉的，尽管如此，在反阿本斯势力看来，这段时间显然已经足够让他闻名为“鼓动家”了。阿本斯下台后，他被迫呆在危地马拉城阿根廷大使馆，度过了一个月的政治避难生活。参看1968年4月29日《快报》里卡多·罗霍著：《我的朋友格瓦拉》以及196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朋友，切》，第59—71页。

^② 《华盛顿邮报》1966年3月13日丹·库兹曼文。

^③ 门德斯·蒙特内格罗虽然在1954年以后时期，负有中间偏左的名声，但事实上他早在1949年已是图谋发动反阿雷瓦洛政变的领袖之一。

投给门德斯了。

美国于 1960 年再度卷入危地马拉的事务。艾森豪威尔总统虽于 1959 年 4 月接到副总统尼克松的报告说，古巴的非德尔·卡斯特罗“要么对共产主义倾心备至，要么受到共产主义的纪律约束”，^①以致总统对古巴政权具有潜在威胁的顾虑越来越大。因此，他在周游拉丁美洲之后，随即于 1960 年 3 月 17 日开动了机器，着手摧毁古巴政府。下面一段见于他的自传：

我命令中央情报局对古巴逃亡者，主要是流落在危地马拉的古巴人，开始加以训练，以便有朝一日他们可能重返祖国。此外不可能有更切实的计划，因为逃亡国外的古巴人没有动手从自己一伙人中推选出一个我们认为可以充当流亡政府领袖的人来。^②

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卡洛斯·阿莱霍斯有个兄弟罗伯托，此人在危地马拉边远地区拥有大规模的咖啡种植园，又是伊迪戈拉斯总统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罗伯托·阿莱霍斯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总统之间的主要居间人，所以他能够很方便地把他自己所有、位于赫尔维希亚—德雷塔卢莱乌的一个咖啡园，提供给中央情报局作为训练基地。古巴流亡者在此被训练为飞机驾驶员和通讯专门人员，并受到一般训练，用以准备在预定下一年内侵入古巴。^③小阿瑟·施莱辛格描述了看到的情景：

那是雨季，他们必须在海拔五千呎的粘湿火山泥地上建

① 艾森豪威尔：《为和平而战》，海纳曼公司，伦敦，1966 年，第 523 页。

② 同上，第 533 页。

③ 戴维·怀斯与托马斯·B·罗斯：《看不见的政府》，乔纳森凯普书店出版，伦敦，1965 年，第 23—29 页。

立宿营地。在空隙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一个菲律宾上校的训练，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组织过对抗日本人的游击队。^①

这样的活动，不久当然在危地马拉广泛传开——但是外国还不知道——危地马拉军队对此却并不是一致赞同的。^②一些有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卡斯特罗没有敌对情绪的军官（卡斯特罗在那个阶段尚未宣称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危地马拉作为美国侵略古巴的跳板。^③他们特别不满的是，他们还不得不弄虚作假，仿佛雷塔卢莱乌基地正被用来训练危地马拉新兵，此外没有进行其他罪恶勾当。

随后，计划了一次政变。1960年11月13日夜，由拉斐尔·塞斯桑·佩雷拉上校领导的军事起义，在危地马拉城外马塔莫罗斯要塞举行，支持者当中有两名青年尉官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和路易斯·奥古斯托·图尔西奥斯·利马，当时图尔西奥斯在佩滕省，但他回到都城来帮助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为了阻止古巴流亡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危地马拉作为对古巴作战的基地。但是民族主义军官们也希望借此结束军队和政府里的贪污腐化和无能现象。

图尔西奥斯后来宣称，训练古巴流亡者的活动在危地马拉出现，“是对我国主权可耻的侵犯。为什么容许存在这种情况呢？因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安德烈·德意志书店出版，伦敦，1965年，第206页。也可参看海恩斯·约翰逊：《猪湾》。

② 《纽约时报》1960年10月26日载：在危地马拉的克萨尔特南戈，某学生团体10月间发表声明，否认反卡斯特的古巴人和北美洲人已准备从危地马拉领土入侵古巴。尽管罗纳德·希尔顿教授在《民族》周刊与《西班牙美洲报道》11月号发表过文章，但使用危地马拉作为入侵古巴的跳板一事，却是在下一年才被广泛传开的。参看1961年4月8日《纽约时报》，该报最后鼓足勇气，指出危地马拉存在秘密基地。

③ 伊迪戈拉斯总统于5月14日宣布：危地马拉武装部队将继续进行游击战争训练演习至另行通知时为止。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于4月间停止——《纽约时报》，1960年5月15日。

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傀儡。”但是他强调说，他参加起义的理由实质上是“青年军官们的传统理由，厌恶贪污腐化，盼望对军队实行机构改革；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①

这次起义，虽然政府说其中有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支持，而事实上是一次典型的民族主义军官起义。起义标志着几个月来政治和军事的纷乱达到了顶峰。危地马拉城经常发生爆炸事件达一年多之久，并且长时期谣传着国内左翼团体同曾任阿雷瓦洛总统国防部长的卡洛斯·帕斯·特哈达上校有接触，而他是公开反对继阿本斯之后的各届政府的。^②

伊迪戈拉斯总统难免要指控这次反抗是由古巴资助和组织的，当8月2日前总统阿本斯在哈瓦那电视上宣布他打算在古巴定居下来之后，伊迪戈拉斯的论据就更有内容了。（以前阿本斯流亡在乌拉圭。）^③

佩雷拉上校在玛塔莫罗斯要塞的起义集团，大约由一百人组成，杀死了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后逃走了，据政府公布，“他们带走了部队和武器”。^④

另一部分起义者设法夺取萨卡帕军事基地，以及首都东北一百五十哩沿大西洋岸的香蕉港口巴里奥斯港。据阿道弗·吉利叙述，起义部队到萨卡帕军营时，有八百农民前来参加，“要求发给武器，攻打政府。此举原不在起义计划之内，甚至是没有预料到的，起义者这时下不了决心去武装农民。”^⑤

巴里奥斯港正是训练古巴流亡者的地方，危地马拉政府鉴于

① 与阿兰·霍华德的谈话，《纽约时报》，1966年6月26日。

② 《纽约时报》，1960年7月23日。

③ 《纽约先驱论坛报》，1960年8月4日。

④ 《纽约时报》，1960年11月14日。

⑤ 阿道弗·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每月评论》，1966年5月号。（这是研究危地马拉游击运动的一篇重要材料。第二篇有关文章发表在该刊6月号上。吉利是一个乌拉圭的托派分子，倾向于将农民的作用加以浪漫主义化。）

形势微妙，立即电告华盛顿。^①

艾森豪威尔总统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说该地形势“不妙”，(据他后来回忆)就作出决定：“如果危地马拉求援，我们就立即进兵，毫不迟延。那时古巴流亡者正在危地马拉受训，我们必须考虑到卡斯特罗可能派兵图谋推翻危地马拉政府。”^②因此，即刻派出了五艘军舰前往危地马拉海岸，同时将雷塔卢莱乌基地新训练的古巴逃亡者飞行员调去帮助镇压危地马拉军官的起义。其中有一个，驾驶了一架载有军队的飞机，力图在巴里奥斯港机场降落，但为敌方的炮火所击退。^③另一架飞机轰炸了市区和机场。危地马拉一份军方公报宣布，这些飞机轰炸了机场跑道，借以阻止可能企图支援起义者的古巴飞机降落。

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不能持久。伊迪戈拉斯总统于11月17日宣布胜利，他在危地马拉城总统府阳台上宣称：

我们对被欺骗的士兵将予以宽大处理，但对叛卖的军官则将断然依法制裁。对接受卡斯特罗金钱的叛国领导者将不予宽恕。不仅对于在国内的不予宽恕，即躲藏在洪都拉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也不加以宽恕。^④

但这是发生刚不久的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在12月间自危地马拉城写稿指出：

起义军在政府得知叛变之前就可以拿下两处军事防地，以及政府大军花了四天工夫才制服装备低劣的起义士兵，这些事实引起此间议论纷纷。这表明了不满程度之大，为大多

① 见约翰·杰拉西：《拉丁美洲的大恐惧》，第184—185页，叙述这些电报，如何被公开了。

② 艾森豪威尔：《为和平而战》，第613页。

③ 怀斯与罗斯：《看不见的政府》，第33页。

④ 《世界报》，1960年11月19日。

数人所想象不到。这里有许多人相信，由于美国海军在沿海出现，确实使当地共产党人不敢利用这次起义和从古巴得到可能的援助。^①

但是起义者本身也有可责备之处。据阿道弗·吉利说，那些于年初开始密谋、组成秘密团体、举行宣誓的一百五十名领导人和军管中，到11月13日发动起义时，只剩四十五人参加。四年之后，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政治动机上更加强烈了，发表过一个文件，讲到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正是这次运动在政治方向问题上的狭隘性，造成了它的军事失败。虽已控制了一个大兵工厂和一个军事区域，只要军事领导者不明确为什么打仗，也不了解向着什么目标前进，那就简直等于没有控制一样。^②

起义军官面临着军事失败和一旦被俘将被处死的前途，就退往山区，然后逃亡。佩雷拉上校设法逃往墨西哥，容·索萨越过边境逃往洪都拉斯，图尔西奥斯·利马前往萨尔瓦多。

容·索萨和图尔西奥斯两人，于逃亡四个月之后，同另一军官亚历杭德罗·德莱昂又回到危地马拉，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同军队分手，开始寻找继续对抗现政权的斗争方法。阿道弗·吉利在叙述危地马拉游击运动起源时，曾相当详细地描绘了起义军官在逃亡时受到农民欢迎的情节。例如，亚历杭德罗·德莱昂是受到过农民隐藏和保护的；有一个农民，“看到他在逃跑，认出他是一个

①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0年12月12日。这次起义确实造成这样的影响，使得伊迪戈拉斯总统重新考虑一下，让古巴逃亡者继续在危地马拉训练在政治上是否明智。1961年3月，罗维托·阿莱霍斯被派去见肯尼迪总统，随带一信，要求逃亡者在4月底之前离开危地马拉。他们果然离开了。4月中旬逃亡者前往古巴，在猪湾遭到了闻名的惨败。

②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起义四周年所发表的文件。

起义军官，表示愿意把他掩护下来。那夜适逢下雨，而家里没有粮食。农民在小屋的一端砍掉了些木头墙板，说：‘把木板用来烤火，我没有干柴，而你全身都是湿透了。墙明天就可以修好的。’”^①容·索萨在洪都拉斯和图尔西奥斯·利马在萨尔瓦多与农民相遇一样，也有同样的经历。吉利讲的事情，虽然显著地带有宣传性质，而不是严格的历史叙述，但他对出身于危地马拉军队的起义军官如何转变为左翼游击队员，提供了一些解释。

〔吉利写道〕，在危地马拉，同在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一样，所有农民都帮助和保护起义者，尽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到农民这边来。农民的动机，不仅是要求和他们团结，也是为了争取他们在土地斗争中成为同盟者和领导者。农民对许多起义战士三番五次地这样做了，他们已经做了好多年，做了几世纪。许多起义者不作反应，但农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有些起义军官对这种影响是感受到的，虽然不是那么迅速。容·索萨和亚历杭德罗·德莱昂以及他们的战友们没有急于决定，但农民逐步把他们争取过去。^②

那时图尔西奥斯·利马少尉刚满十九岁。他是1941年11月23日生的，据他自己讲，出身在一个中下等家庭。父亲是钟表修理工人，母亲在机关里做事。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小。1966年访问他时，他把母亲说成是一个“反动分子”，因为她曾经赞成过美国支持下的卡斯蒂略·阿马斯的1954年叛乱。^③图尔西奥斯·利马先在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读书，后在政府办的一所职业专校读书。

他的母亲曾经要他将来做个军官，所以在十五岁时就送他到

① 吉利：《危地马拉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6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与亨利·吉尼格的谈话，《纽约时报》，1966年3月18日。

危地马拉军事学院的工艺学校读书。1959年毕业，得少尉军衔。后来在1959年末到1960年初他在美国乔治亚州本宁要塞的突击队训练学校呆了六个月。

有一次人家问到他在美国的体验如何，他答复说：“从军事观点来看，那是很好的。”他对另一访问者解释他为什么喜欢那里：“我们有军官俱乐部，有每块重十五盎斯的得克萨斯牛排，好的服装，最好的装备。同时，有的是钱，每月我寄一百五十美元给我母亲。我有什么可担心的？”^①

对于危地马拉游击战士，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军事出身，事实上是难以了解的。美国记者阿兰·霍华德1966年初访问了图尔西奥斯，着重地说明了后者的民族主义观点。

图尔西奥斯·利马骤然间发现他已处于政治领导人的地位，但他主要还是一位为新的荣誉守则而奋斗的军人。如果他有一位至交的话，那不是列宁或毛泽东以至于卡斯特罗，他们的著作他是学习和崇拜的，而是尼加拉瓜的奥古斯托·桑地诺，这位尼加拉瓜将军在美国的柯立芝和胡佛执政期间同美国派去的海军陆战队打仗。^②

容·索萨中尉比图尔西奥斯·利马大三岁，具有中国人的血统。他也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古利克要塞受过美国军事训练，但是他没有被感动。后来他告诉一个访问者：“我把在巴拿马学到的一点起码东西很好地加以利用了，起码的原因在于课程蹩脚，老实说，我在这里山区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所学到的东西，比在那里学到的多得多”。^③

① 与阿兰·霍华德的谈话，《纽约时报杂志》1966年6月26日。

② 吉利：《危地马拉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6页。

③ 同上（第2篇），第31页。

在1961年一年中，图尔西奥斯·利马虽花了些时间同不少政党的领袖们会谈，想“找出他们究竟主张什么”。他们对他似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最后，在7月间，他见到了被禁止的危地马拉的共产党即劳动党的领导人，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在几年后向一个访问者谈到：“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真正关心人民。”据图尔西奥斯·利马说，自从最初的一些接触之后，他的军人起义集团便同劳动党之间开始“密切合作”了。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控制图尔西奥斯·利马拥护者的集团。有一个游击队领导人卡米洛·桑切斯回忆说，当他在这个阶段参加起义军之时，他发现“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忠诚的革命者、天主教徒和其他人们，他们唯一的愿望是推翻现政权，而代之以比较公正的事物。”^①

即使在斗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参加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容·索萨运动的人员的生命，随时均在危险之中。1961年7月，正当同劳动党进行政治会谈时，亚历杭德罗·德莱昂被政治警察头目兰努尔福·冈萨雷斯·奥瓦列逮捕并谋害了。据吉利叙述，“亚历杭德罗·德莱昂之死所产生的震动……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导致他们的运动结束同各在野党的谈判，决定发动游击战争”。此外，他们看来深受一群农民的主动性所感动，因为后者在1961年12月提出，如果游击队开展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的话，愿意提供支持。

事实上，前一年从起义中逃生出来的军官，既成了不法之徒，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已很少别的道路可走。在乡间比在城市里容易逃避逮捕。农民，特别是11月13日逃亡出来的人所遇到的农民，要比在城市内所遇到的政客看来更为友善。有了古巴作为榜样，游击运动似乎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了。从此以后，容·索萨和图尔西奥斯·利马放弃了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谈判，跑到山区里去了。

^① 卡米洛·卡斯塔尼奥：《和危地马拉游击队员们在一起》，《轻骑》，第38期，1967年7—9月号，第150页。

二 游击队开始行动了

“1962年2月6日标志着我国游击战争的自觉开端，这是一种在农村展开的武装斗争，得到农民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支持，最初以一种小型的、朴素的、非正规的武装力量予以实现。”

——塞萨尔·蒙特斯

1962年2月，在仓促准备之后，容·索萨和图尔西奥斯·利马两支小游击队和路易斯·特雷霍·埃斯基维尔一起，从他们在米纳斯山脉的伊萨巴尔山区的藏匿处开始投入行动。他们给自己定名为“亚历杭德罗·德莱昂游击运动—十一月十三日”这个名字的用意是既纪念了他们已经牺牲的同志，也纪念了1960年那次失败的起义。游击队员们在首次声明中宣告说：

“民主在我国早已消逝。人民不能在没有民主的国家中生活下去。正因为这样，在我们国家里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必须打倒伊迪戈拉斯政府，成立一个尊重人权、设法解除我国困苦和遵循一种严肃自尊的外交政策的政府。”

声明号召危地马拉人民奋起斗争，一天也别再容忍暴政和屈

辱。^①

看来时机是有利的。正如后起的游击队领袖之一塞萨尔·蒙特斯所写的：“已经产生的全国性冲击使人民起义的条件成熟了。”^②象往常一样，第一个被唤起的社会力量是大学生。引起学生骚动的直接原因在于去年12月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要改选议会的半数席位，虽然政府于危地马拉城内四个席位中只赢得一个席位，它在农村中却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许多人认为这个结果是伪造的。

这次选举余波所引起的紧张气氛，又因为1月24日秘密警察头子兰努尔福·冈萨雷斯的被刺而更加激化。这个头子在离家时被一辆驶过的汽车里的人枪杀。伊迪戈拉斯总统立即宣布戒严，并说这次暗杀是“由古巴指挥的为马克思主义效劳的危地马拉籍和国际刺客们”所干的。^③

但是，虽然这次新的起义运动组织起来是为了从事游击战争的，它在实质上却同1960年11月一批军官的起义是差不多的。游击队旨在对军事设施进行袭击的战略计划，就同佩雷拉上校当年所干的十分相象。第一批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只着眼于迅速推翻政府，并没有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游击队的起义始于1960年2月6日对两个军事哨所的袭击和对联合果品公司一个办事处的抢劫。据报纸报道，“约有五十人参与了巴纳尼拉和莫拉莱斯两镇军事哨所的袭击。总统说：这些袭击者坐着几辆卡车来到。他们从军事哨所和联合果品公司办公室劫走了武器和钱钞。”^④

① 我能找到的这个声明的唯一出处是新华社1962年2月20日的电讯。因此，是相当稀奇的英语。

② 塞萨尔·蒙特斯：《一场逻辑的必然的决裂》，《最后一点钟报》，第53号，1968年4月23日。

③ 《纽约时报》，1962年1月26日。

④ 《纽约时报》，1962年2月7日。

2月10日，起义者宣称他们曾打下了一架危地马拉军用飞机；2月26日，起义的同情者又在首都占领了两家电台。^①在2月14日一篇访问报道中，伊迪戈拉斯总统说：据情报，参与这次叛乱的人数约有一百。他在指出叛乱者与忠于政府的军人都曾受过运河地区古利克要塞美国游击战争训练学校的训练以后，又说：“我们的巨大困难之一，就是双方都曾受到相同几个专家的共同战术训练。我们的指挥员是十分机灵的，但叛乱者也是很机灵的。”^②

3月间，由帕斯·特哈达中校领导的一支新游击队组成了。它叫做“十月二十日游击阵线”，为的是纪念1944年10月20日导致独裁者乌维科垮台和导致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执政的那次革命。在3月发表的声明中，这支队伍谴责伊迪戈拉斯政府是造成深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控告它蹂躏了人权，增加了贫困。12月里选举出来的议会，“则不再能够作为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机构履行其职能，而已经变成由政府傀儡所构成的组织了”。声明谴责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我们对在我国建立军事基地感到愤慨，对同外国缔结的军事条约感到愤慨。”它还说：外国军事基地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主权，而现存的军事条约则以新的国际挑衅相威胁，以镇压中美洲各国人民相威胁。

帕斯·特哈达中校继续指出，危地马拉人民已经采取了他们能够采取的各种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但是独裁政权却继续执行着它的迫害政策。

现在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起义的道路。消除那些折磨我们祖国的灾难的唯一办法是推翻伊迪戈拉斯暴政，建立一个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府。

由于意识到对祖国的义务，并广泛地倾听了人民的意见

① 新华社电讯稿，1962年2月28日。

② 《纽约时报》，1962年2月16日。

和相信他们的爱国支持，我们建立了“十月二十日游击阵线”。我们宣布将进行公开的起义。

不管是在我们祖国领土的哪个地方，我们都要拿起武器，我们决不承认伊迪戈拉斯政府有权统治这个国家。

我们重申，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斗争。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在这项声明中再次指出，我们运动的动机就是促使“亚历杭德罗·德莱昂一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爱国军官们起来进行斗争的那种动机。我们的目的同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目的是一致的。站在我们一边的有大学生、工人、农民、爱国的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和保安部队里的正直的军人。^①

虽然2月份在巴纳尼拉的起义在一周内就被镇压，但是骚乱、罢工和学生示威仍然在危地马拉城继续着。三个政治党派，即“民族解放运动”、基督教民主党和革命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要求伊迪戈拉斯总统辞职，组成一个联合的文人—军官的议会以恢复秩序。

3月16日，总统命令军队管制全城。前两天至少有二十个学生被杀，两百余人受伤。在从内地调来了两千名后备兵以后，政府宣告要以四万名士兵布满全城。在下一个月里，因为意识到能够使他保持政权的唯一政策就是镇压，伊迪戈拉斯总统改组了他的内阁。除了外交部长一人外，他全部选用了军人充当阁员。

革命形势已处低潮。这次起义，正如塞萨尔·蒙特斯以后所写的，实际上缺乏“明确的方向、鲜明的方针和恰当的组织”。^②这些起义者除了回到山区去医治创伤外，已经没事可干了。游击队的存在，肯定曾在危地马拉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危机情势，无奈那些反抗政府的力量还未强大得足以利用这次危机。

^① 新华社电讯稿，1962年4月4日。

^② 塞萨尔·蒙特斯：《一场逻辑的必然的决裂》。

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容·索萨在两年之内再度面临失败的局势。而且这一次失败更为严重，因为这次不只是少数兵士的命运问题，而是卷入了更多的人。学生和农民和士兵一样都参加了从2月到4月的总起义。要补充这样的伤亡，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而且镇压更加残酷了，在城市里企图再组织什么新的活动，要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有可能。游击队领袖们又一次退回到农村里，在农民中间，他们才能避开城市里的疯狂镇压。

在那年较晚时候还有过建立一个游击战线的企图，但是，这个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图尔西奥斯·利马对这个尝试作了如下描述：

1962年11月，更确切地说是该月13日，为了纪念1960年的起义，曾经有过在国内西部的韦韦特南戈区建立另一个游击战线的打算。这是一个多山而人口稠密的区域。运动的领袖们没有作过政治上的准备，他们几乎不了解地势，又没有得到农民组织的支持。他们到处转来转去，徒然地在各次闪电式的集会上试图向农民宣传自己在为什么而战。这是一次挫败。他们全被逮捕和枪杀了……^①

在损失惨重的1962年的剩余的日子里，游击队的遭遇就很少听说了，但是看来前一年的政治讨论重新开始了。因为在12月，“亚历杭德罗·德莱昂—十一月十三日阵线”幸存的力量，发起组织了一个与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四月十二日革命运动”（后面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学生组成的，它的崛起是该年年初学生示威运动的产物）^②的政治军事联合组织。这个新的联合组织取名为起义军，

^① 《世界报》，1966年2月7日。

^② “四月十二日革命运动”于1965年退出“起义军”。见《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第56期，1965年10月20日，第42—43页。

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筹划和调度各个尚在孕育中的游击战线的军事行动。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图尔西奥斯·利马第一次见到了塞萨尔·蒙特斯这位年青的法科学生，此人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游击队领袖。同另外两个人在一起，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塞萨尔·蒙特斯开始在米纳斯山到处流动，接触农民。他们在农民中做着宣传、组织工作，不过当时起义军在没有把握取得农民的支持、足够的情报以及物资的供应线之前，还不打算组织各种作战小队。^①据吉利说，“起义军仅仅是执行任务的。它是一种‘武力’，而政治上的指挥权仍然在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其他集团所组成的统一抵抗阵线手中，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游击队战士在这个阵线中是没有代表参加的。”^②吉利还对起义军在此时期的政治态度作了如下的说明：

它的纲领是由危地马拉劳动党规定的；目标并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一个工农政府。它号召通过民族民主革命以建立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这个政府的纲领是以实现工业化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求得危地马拉的发展为基础的；它将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某些措施，同时又维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社会地位和合作关系。

后来各种内部矛盾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播下了。危地马拉劳动党规定得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游击队的行动都不得支配该党所作的政治抉择。

^① 《纽约时报》，1966年6月26日。

^②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8页。又见何塞·米利亚：《危地马拉联合民主战线的问题》，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4年12月号。

这年年底,在 11 月里,正是起义军建立的同一个月,危地马拉劳动党决定要支持豪尔赫·托列略作为危地马拉市长候选人。后来,游击队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共产党。塞萨尔·蒙特斯在 1968 年写道:“支持豪尔赫·托列略这样一个很少民众支持的本地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政客,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和革命力量,这种注意力和力量从 1962 年 3 月至 4 月的起义到今还处在沸腾的状态中,不仅如此,而且还把托列略以及支持他的力量引向到可悲的和可以预见的政治失败。”^①

自然,当时使用选举策略似乎还是容许的,但是三个月以后,到了 1963 年 3 月,当伊迪戈拉斯总统被一个比他更为保守的军人推翻之后,任何一种民主形式包括自由选举在危地马拉都变成异常遥远的希望了。

1963 年 3 月 30 日,伊迪戈拉斯的国防部长恩里克·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上校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武装部队所发表的声明说,它们采取行动,是因为危地马拉“已处于内战的边缘,这是由于亲共方面挑起的破坏活动和日益严重的共产党渗透所造成的结果”。在第二天给新闻界的一篇声明中,佩拉尔塔上校说:军队无意于执政,这次进行干预只是为了促使“混乱”的政治形势恢复平静,并为大选创造气氛。但他强调指出,当政治活动被允许恢复后,任何有亲共倾向的政党仍要取缔。

在佩拉尔塔政变之前,伊迪戈拉斯将军事实上一直在酝酿大选。这本来是预定在 1963 年 10 月举行的。有希望的获胜者是前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他在墨西哥城流亡了近十年之后,在佩拉尔塔政变的前几天秘密返回危地马拉。究竟为什么伊迪戈拉斯允许他回来是不得而知的,不过有谣传说,这样做“被认为最终将有利于罗伯托·阿莱霍斯,伊迪戈拉斯将军希望把此人选作自

^① 塞萨尔·蒙特斯:《一场逻辑的必然的决裂》。另一个候选人是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博士,民主革命团结党的总指挥,此人以后与游击队进行谈判。

己的继承人”。^①大家可以回忆，阿莱霍斯正是那个把咖啡农场借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便发动猪湾登陆战的那个人。

不管是哪种原因，反正没有什么疑问，阿雷瓦洛在国内的出现，以及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前景，对军人中的某些分子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必须介入，以制止这样一种发展。^②

佩拉尔塔的改变，意味着自由选举已没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游击战的道路显得更加正确，虽然这也是比较危险的道路。1963年4月间，三个主要的游击队组织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三个组织就是“亚历杭德罗·德莱昂—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十月二十日革命运动”和“四月十二日革命运动”。声明是直率的。

联合声明说，危地马拉人民被迫以武装行动作为“目前反对佩拉尔塔·阿苏迪亚独裁政权的唯一形式。目前正在萨卡帕和伊萨尔山区战斗的各游击组织是爱国者和人民的武装力量……起义军准备为缔造一个没有暴政统治，没有贫穷，没有投降主义和没有贪污腐化的祖国的崇高和正义的理想而献出生命”。

声明号召所有的危地马拉人民，不分政治信仰，在重建祖国这个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积极合作。它还谴责了阿苏迪亚独裁政权在有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对居民进行血腥镇压。它指出，独裁政权派遣飞机到这些地区用火箭和燃烧弹袭击农民，毁坏了庄稼，在农民中造成了伤亡。

这个文件指出，游击队曾给政府军以不断的打击。在3月22

① 《纽约时报》，1963年4月28日。

② 在1963年5月4日的一封信上，切·格瓦拉就危地马拉形势作了如下评论：“危地马拉的游击队正在战斗。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已拿起了武器。从各种迹象看来，这场斗争将发展成为古巴式或阿尔及利亚式的革命；要延缓这种发展，只有一种可能做法。帝国主义掌握着这种可能做法，虽然我很难肯定它会不会采取，这就是有阿雷瓦洛参加的‘自由选举’。这是我们对这问题的看法。你能不这样想吗？”这封信载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著《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一书的第265页，纽约，小林书店出版。格瓦拉大概是很正确的。美国无疑喜欢有一个阿雷瓦洛—阿莱霍斯政府。佩拉尔塔上校则是一个典型的反美的右翼民族主义者。

日的一次战斗中，政府军有五人被打死（其中有一名中尉），二十八人受伤。在4月18日和19日的战斗中，政府军又遭受新的伤亡。声明说，目前在政府军的军官和士兵中间，已出现了动摇迹象。

声明坚信，统治集团绝不可能消灭拥有人民支持和合作的游击队武装。它最后说，起义运动最终定将取得胜利。而“现在那些正奴役着我们人民的罪犯必将受到惩罚。”^①

然而，胜利仍是很遥远的。缺乏经验，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雷吉斯·德布雷叙述了1963年7月在伊萨瓦尔山区有一个游击中心的全体人员（二十一个人）因丧失警惕而遭到了覆灭的经过：

一个游击队的通讯员在城里被捕了，敌人用一支机关枪胁迫他，要他带领一支中美洲军队的分遣队到游击队的驻地去。通讯员带着这支队伍走了一条最难走的道路，他以为这是有游击队哨兵守着的。在到达他以为有哨兵站岗的地方之前，他大叫一声以显示自己的到来。没有人回答他。通讯员被杀害了，分遣队在深夜里进入了营地。哨兵在傍晚时早就下班休息了，因为这条通路被看成是别人进不去的。^②

在危地马拉早期的游击战斗中，许多过失、错误可以用缺少经验来解释，但就长期趋势来说，游击运动内部产生的种种政治分歧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① 对于这个文件中的希奇措词，只能再一次这样解释：它的来源是新华社电讯稿（1963年4月30日）。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44页。

三 容·索萨、托洛茨基分子与危地马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

在佩拉尔塔·阿苏迪亚自 1963 年至 1966 年的独裁统治之下，不只是共产党的日子不好过。其他政党不是被禁止活动，便是在选举活动中看不到前途。因此游击队得以与反对派政党恢复谈判，这个谈判早在 1961 年开始，而于 1962 年初因游击队过急地设防自卫而告中断。

特别是容·索萨，似乎急于要为他的游击队得到某些有组织的政治支援。他多次接近一个左翼、但是反共的政党，叫做民主革命团结党，它是由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领导的。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后来回忆说，有一度曾经认真地考虑了他领导的党与容·索萨的游击队的联合问题。两个组织的代表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但是当克拉梅尔的党最后于 1964 年 5 月决定走选举活动的道路之后，会谈便决裂了。克拉梅尔说：“索萨集团坚持危地马拉的唯一的政治解决办法是用革命来推翻佩拉尔塔政府，参加选举的决定是在索萨集团激烈反对之后作出的。”^①

由于容·索萨拚命地想从一个现存的、有组织的团体得到支援，所以在 1963 年 11 月间，他告诉克拉梅尔愿意接受“共产党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克拉梅尔的党，作为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的反共的社会民主党，自然马上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已经在控制

^① 《纽约时报》，1964 年 12 月 20 日。

容·索萨的游击队了。^① 克拉梅尔回忆说，在那时，他的党深信容·索萨的集团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害怕如果他的党与游击队联合，那么他的党也要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了”。

事实上，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游击队撇开被控制的命运，毫无困难。但是政治谈判，不管同共产党或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也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游击队与游击队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容·索萨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集团内部，而且存在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与起义军中其他集团之间。容·索萨当前的牢骚是，虽然“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参加了起义军，但是起义军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是由“统一抵抗阵线”决定的，而起义军在那里却没有代表权。“统一抵抗阵线”之中说话最响的当然要数危地马拉劳动党了——即危地马拉共产党。

当时属于容·索萨集团的一个坚定的同党阿道弗·吉利就当时形势作如下说明：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由于缺乏自己的纲领，只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除了武装斗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人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分工，就是说，在外界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武装斗争，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却不直接参与这种政治领导的决定。

但是在起义军内部，酝酿着象前些时候导致“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分裂的同样矛盾。“统一抵抗阵线”的领导经常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与希望，即最终的谈判将使武装斗争转变为选举斗争。“统一抵抗阵线”认

^① 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把他自己的组织“归属于著名的拉丁美洲的‘民主—左派’一类的组织，象由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领导的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党，委内瑞拉的执政党民主行动党，和由秘鲁总统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然而，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的党不认为自己的党是“反共”的，因为在危地马拉，“反共”这个名词同极端保守以及军事统治是同义词。

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所计划的游击行动不是推翻现有制度的手段，而是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以此来迫使政府谈判，并在选举和民主方面作出让步。

同时，在把武装斗争移到山区之后，不管经历了多少起伏兴衰、进退两难、陷入绝境等情况，“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常处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之下。战士手中握着武器与农民群众并肩作战的游击战争，有它自己的逻辑。“统一抵抗阵线”的政治领导，念念不忘民主协商，朝着调和的方向前进，而武装斗争的领导，则朝着革命方向前进。游击队员与农民并肩作战，从各方面看到了贫穷与剥削，并且从农民群众中受到了向前进的压力。同时游击队员与群众团结在一起，得到群众的支持并见到了群众无数次献身革命的表现，他的活动因此不是谈判而是斗争。他感到谈判与把谈判作为目标来赞扬的纲领会经常阻碍他的主动性。^①

当体会到武装斗争策略的必要性时，容·索萨的游击队不只是变得更加激烈了，而且，除此之外，他们的纲领的整个重点已经开始改变了。阿道弗·吉利于1963—1964年间写道：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历了一个内部变化的时期。从一个民族主义的、反帝的方向开始，它进而接受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与行动的一种方法，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斗争的目标。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概念出发，它进而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遵循中国与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主张工农政府作为革命斗争的目标。这种变化为过去已经进入死胡同的游击斗争展现了新的眼界；它为组织群众开辟了道路；同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6页。

时，它还改变了游击队自己的作用和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的概念。^①

吉利没有指出(按理他是应该这样指出的)，即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与索萨受到了某些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影响是第四国际为了填补肯定存在于游击运动内部的政治真空而派遣进来的。正如德布雷所说的那样，第四国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分支机构——拉丁美洲局(由波萨达斯主持)“利用了其他政治组织抛弃‘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并使它孤立无援的机会。”^②

德布雷虽然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抱有仇恨的看法，但他曾就托洛茨基分子对待游击战举动的态度，作了相当公正的说明如下：

托洛茨基思想今天又从几个方面出现了，它借口革命行动遭受到若干暂时性的挫败，但是它经常提出同样的“夺权策略”。让我们把托派思想摘录如下：

无论那里的工农群众都渴望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因为他们还处在斯大林分子的官僚主义统治之下。为此必须唤起工人们的潜在自发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游击战运动不是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根据地必须建立“双重权力”，就是说，必须发出号召，组织工厂与农民的委员会，而工厂与农民委员会的滋生，最后会导致建立单一的“工人联合会”；通过在山区与城市同时和普遍发生的起义，这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9页。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37页。有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较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强大。托洛茨基主义插手于危地马拉、秘鲁和巴西农村的政治鼓动。托洛茨基主义是非常分散的，它的行动是很难追踪的。至今还没有史学家写它的历史——但是应该有一个。

个联合会将成为夺权的工具。从现在开始，鼓动工作一定要针对发动罢工与工人的示威。在农村，目标应该是组织农民协会；占领土地；组织地区性的起义，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性的呼声，逐渐发展到城市。工人们一定要逐步控制生产工具。他们一定要立即起来直接反对国家的权力，不需要中间人或特遣队。革命将从现有的或潜在的经济斗争中产生，这种斗争将激化为一种群众起义——这就是从工会行动到起义的一个直接通道。^①

成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全国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分子弗朗西斯科·阿马多·格兰纳多斯，1965年初在与阿道弗·吉利一次会见中，就同一观点作了更加热情的说明：

我们计划去组织如同现在存在于农民中间的武装工人以及学生的地下委员会；我们将提倡合法的或地下的工会主义；我们将为建立一个革命工人中心^②而把群众的条件与思想准备好。我们的早已传播着的口号将成为居民中大多数人的现实：“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武装起来！”^③

有了这个行动的前景，容·索萨的集团把亚历杭德罗·德莱昂从他们的名称上取消了，而开始自称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而在新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内部，有好几个游击阵线。其中有一个由容·索萨自己领导的组织，保留了亚历杭德罗·德莱昂

^①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36页。德布雷更冷酷无情地补充说：“托洛茨基主义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很重要的，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纲领是很重要的，并且希望人们纯粹从措词上来判断革命，好象宣称一千遍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便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来到。”

^② 同德布雷所指的工人联合会一样。

^③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2篇），第29页。

的名字；另一个组织，由路易斯·图尔西奥斯领导的，使用了“埃德加尔·伊瓦拉阵线”的名称。图尔西奥斯似乎从来没有象容·索萨那样酷爱托洛茨基教条。随着时间的转移，两个阵线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分歧。但是在开始时，一切还是和谐的。在1964年12月，新的托派“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起草了它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声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全国指导委员会”于1964年12月10日至22日在米纳斯山称为“兰花”的游击队营地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发布了“米纳斯山会议的第一个宣言”，最初刊登在1965年2月出版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刊物《社会主义革命》上。

宣言强调指出，“如果不武装群众，不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即不可能象古巴那样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危地马拉便一无所得。革命的最低纲领包括没收帝国主义者的公司和资产，特别是没收联合果品公司，进行土改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宣言明确指出，“北美帝国主义”是危地马拉革命的首要敌人，但是“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也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修正主义的调和路线”（赫鲁晓夫在两个月之前被免职了）。^①

在危地马拉国内，宣言号召学生与士兵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宣言警告说，参与镇压的士兵将受到无情的惩罚，不管在革命胜利之前或者革命胜利之后。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游击运动特别注意做试图转变军队的工作。容·索萨与图尔西奥斯·利马都是军人出身，可能与此有关。他们无疑感到军队首先是补充兵力的适当的来源。以下传单表明了“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针对军事人员进行宣传的范本：

士兵们：拒绝向你们的农民弟兄们开枪；拒绝放火烧村庄；拒绝拷打俘虏！

^① 宣言的部分正文见本书附录一。

士兵们：掉转你们的枪口，对准掠夺、迫害农民的人。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的斗争：为了土地和工农政府而斗争！

士兵们：支持村中的农民委员会的组织；与你们的兵营、驻地、岗哨的其他士兵一道，组织地下委员会，讨论你们怎样能够帮助农民与游击队的斗争！

士兵们：支持农民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土地不是属于庄园主或联合果品公司的！

士兵们：把你们军官中那些拷打并残杀过你们的农民弟兄的人提出来审判！

士兵们：与农民游击队团结起来，参加农民自卫队！

士兵们：游击队员不是你们的敌人。游击队员是为土地而战的工人、学生和农民！

与农民、工人与士兵的联盟一起前进！

在为土地的斗争中前进，反对驱逐农民，反对军队镇压农民，在没收大庄园的斗争中前进。

工人们，学生们，农民们，武装起来！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

危地马拉，1964年10月27日。①

在托派控制下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只能在阿道弗·吉利的两篇长而有启发性的文章中看到，题为：《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我们早已引用过了。吉利在那年初与容·索萨的游击队一起度过几个星期。虽然他专心致志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那时所拥护的特殊思想意识，并且看来他对于危地马拉农民的革命潜在力量似乎过分地乐观，他的文章对于那个时期游击队的形势与活动，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透彻的看法。

根据吉利的归因于农民自己的论点，“（1954年）反革命之所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31页。

以胜利，是因为人民没有武装起来”。他举出了无数的事例，说明农民向阿本斯政府要求发给武器时遭到拒绝。有一个农民叙述了以下的故事：

那时我正在蒂基萨特干活。在卡斯蒂略·阿马斯叛乱的时候，政府代表们来到我们这里，问我们的领导，在我们干活的六个农场里，可否召集三百人武装起来。我们回答可以。我们就各自回农场去了。当我们从每个农场召集五十名志愿人员时，农民发火了，告诉我们说他们全是志愿人员。第二天，集合的是三千人，而不是三百人，等候领武器。但是政府代表从未再露面，不久阿本斯政府垮台了。^①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一个领导人、1954年曾任阿本斯参谋本部成员的奥古斯托·维森特·洛阿卡中校，讲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卡斯蒂略·阿马斯叛乱三天后，中校对阿本斯说：“上校，让我们召集一千人。这将是轻而易举的，并且，由你来领导，全国将会起来。”阿本斯说已经太晚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而他也早已辞职了。洛阿卡补充说：“当时他只要接受我的劝告，群众会粉碎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这样我们就不必做象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了。”^②

此外，吉利提示说，由于阿本斯的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许多农民所得很少，不足以保卫自己。一个农民说：“那边的土地分给我们了。随后‘解放’了，土地又从我手中拿走了。”他又指着另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0页。

^②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2篇），第32页。格瓦拉的思想也差不多。据里卡多·罗霍说：“格瓦拉的建议是：应该首先把城市严密控制住，这样，军事进攻力量极小的敌对部队便很容易被孤立起来。这种双重目标的军事行动，将注定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冒险行为的命运，但这样做是与阿本斯的军事素养完全相背的。把武器给民众组织，给对革命表示忠诚的许多党派以及工会与农民团体，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步骤。”——《我的朋友，切》，第70页。

一方向说：“那边的土地没有分掉。那是最好的地，为富人所有，因而没有碰它。”

由于这些原因，吉利断言：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危地马拉游击队今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工农政府而战斗。他们的战斗方法和纲领，都不是象一批纯粹理论家的空谈那样设想出来的。假如危地马拉兴起的游击运动，首次在拉丁美洲公开宣布它的社会主义目标，这无疑受了世界革命发展进程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但这也特别是由于危地马拉人民的深刻的、共同的经验，由于1954年所遭受的失败，以及从此以后，工人和农民们不是消极与退却，而是尽力参加战斗的影响。^①

在托洛茨基派当权时期，游击队的实际组织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与别的地方、别的时候的情况不同。“亚历杭德罗·德莱昂游击阵线”中的一个领导人埃瓦里斯托·阿尔达纳把组织系统解释给阿道弗·吉利听：

首先，我们为我们的游击队各单位组织了一个我们所称的“中心”。这个“中心”组成指挥部。接着，我们建立了许多“小组”；“中心”的每个成员在“小组”内活动，并对“小组”负责。“小组”领导的职位是轮换的。在组织“小组”时，我们考虑到成员的文化程度、政治讨论水平以及军事能力等事实。这种组织系统产生了优良的效果。

……〔游击“中心”〕为阵线〔提供了〕军事和政治领导。经验教育了我们，“小组”的作用，以及作为统一体的阵线的作用，取决于“中心”的作用。“中心”的负责职务是由那些在行动和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11页。

讨论中都表现了具有最大的进取心、最强的责任感以及最好的集体精神的同志们担任的。

……确定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及斗争发展的条件后,我们必须依据所谓“民主集中制”。我们不能搞“纯民主”,也不能听从群众中和运动中较为落后部分的话;我们必须依靠具有最大决心、最高觉悟和最有胆略的那部分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顾觉悟还不高的同志们和部分群众。当他们看到那些具有较高觉悟和目的性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果断行动的时候,他们也将前进并成熟起来。^①

阿尔达纳指出,由于队伍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大多数人既不会读又不会写。他们是在参加游击队伍后学习的。

面临着无知的、政治上落后的农民阶级,游击队的目标是用“武装宣传”的方式争取转变者——这是通过集会和辩论,使农民变成革命者的一种尝试。组织者当然是持枪来到农民之中。阿兰·霍华德曾把他于1966年所见到的活动方法,叙述于后:

这个村庄在军事上必须是安全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常有些起义者就改革、剥削、人民军队和保安措施等不同主题讲话。在与公众初次接触中,起义者常把村中的领导人物找出来,以便使他们成为地方性的秘密委员会的核心。地方性的秘密委员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位,当它发展到最高级的阶段时,它是村里的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

起义者时常把当地政府官员争取到他们的事业方面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起义者试图说服他保持中立。如果他绝对反对起义当局,他就可能被处决。根据起义者自己的计算,在过去一年中枪决了该地区的十三名人员以及其他地区的数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2篇),第36—37页。

十名警察与军官。罪状是拷打并杀害过起义党人。政府军往往采取报复手段，抓一些嫌疑犯，加以监禁审讯，最后才释放他们。施用毒刑是常见的事，因此嫌疑犯有时回不了家。^①

以上，艾伦·霍华德事实上是在谈论 1966 年图尔西奥斯·利马集团所采用的体制。但是容·索萨的游击队有一种类似的策略。吉利评论说：

〔容·索萨于 1965 年初对吉利解释说〕，我们的斗争不是以军事为主的，而是社会性的。运用军事手段摧毁政府，这不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想用社会的行动使政府解体。这就是说，我们一定同时要组织替代旧政府的政府基础，即一个工农的政府。我们的游击力量是在社会水平上组织起来的。诚然，我们手持武器进行战斗，但是我们也组织农民群众和城市工人。将打倒资本主义的，正是他们。

危地马拉游击队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所有军事行动都从属于这个任务。当一支游击队在丛山峻岭中行军时，它的机关枪、来福枪和手榴弹不是斗争的主要武器，它们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提供了安全的根据。但是，主要的武器是言语——书写和口说的，特别是口说的。^②

游击队在这个时期里的进一步目标，是使自己成为农民群众所必不可少的。吉利写道：

游击队团结农民群众。与工人不同，农民没有具备组织起来一致行动的方便条件。他们都是分散的，各自守着一块

① 《纽约时报》，1966 年 6 月 26 日。

②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 1 篇），第 20 页。

地或住在村子里，受到掌握着军队和其他镇压工具的权力的敌人包围着。游击队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从这个区到那个区，体现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共同斗争和共同愿望。有一个关键事实必须记住：游击队员是带着枪来往的，农民在起义者的武器中，看到了他们自己不能被征服的尊严的一个标志。

当游击队的侦察班经过一个村子时，农民不是象欢迎一队武装战士那样的欢迎他们，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其他许多村子的成百个农民的代表们。侦察班把他们的许多讨论内容传达到整个地区里，通过经常性的来往行军，把村子联系得更紧密，并传递行动的新建议。^①

吉利引用了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埃瓦里斯托·阿尔达纳在一次这样的访问村子时所做的报告说：

你们注意到了我们是有武器的。我们有了武装就能够同政府和地主作斗争，与剥削工农劳动的资本家作斗争；与保护他们、镇压你们的军队作斗争。我们为土地而战斗着，使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不要向大地主缴租缴税。但是光靠我们是得不到土地的。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帮助下把土地拿过来。我们将用我们的武器帮助你们，但是你们必须组织起来，并准备占有土地。你们必须好好作准备；你们必须同地区里的所有农民进行宣传。如果你们要收回土地并保卫土地，你们必须要有武器。我们必须为这个事业一起组织起来，等到完全准备好了就发动进攻。你们肯定记得，在阿本斯政权时期，这里的土地是经过分配的，但随后又来了所谓“解放”，土地又从你们手里被抢走了。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20页。

因此，把土地分给你们还不够，你们必须有用以保卫土地的武器。每个农民都应该有武器。此外，我们必须有一个政府保护我们工人和农民，而不是保护大庄园主。假如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有准备，同时团结其他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工人。^①

游击队持枪进入村子，向民众解释游击斗争的动机，这种游击手法被称为“武装宣传”。它的主要特点是，它不一定需要与国家的武装部队开火。然而，作为一种策略，这种做法遭到了后起一代的拉丁美洲游击队的很多的非议。特别是德布雷，他认为武装宣传虽有它的作用，但它应该在军事行动之后，而不是在军事行动之前进行：

把武装宣传作为一个不同于军事行动的阶段来考虑，并把它放在军事行动之前进行，似乎是不必要地去激怒敌人，暴露了作为宣传员的同志，使他遭受敌人暗杀，或迫使他必须转移，并且把未来的或可能进行游击行动的地区暴露出来。由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农民的社会、思想和心理状况，由于有各种各样由敌人控制的情报机构（自从古巴革命以来大大强化了），无论是武装的或非武装的鼓动队，将会遭到监视、揭露和清除；必要时在萌芽状态就遭到这样的对待了。更坏的是，鼓动队的联系对象、建立起来的小组织以及在农村、村子里和邻近城镇“工作”的人们，也许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假如敌人狡猾地不露声色，它甚至要到后来才采取行动，以便让情报工作渗透进去。敌人在组织里给你安插一个“农民”，于是整个游击队的行踪从一开始就泄露出来，游击队就很快地被清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20页。

除了。①

然而，容·索萨的游击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把重点放在“武装宣传”上面，而是在于它是在拉丁美洲头一个采用明白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游击运动。这与古巴游击队早先建立起来的先例，有着重要的差异；而且它使人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统治阶级和美国再不能象他们在古巴那样被愚弄，去支持一个显然具有有限目标的激进运动。正如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奥·贝尔于1965年年中对一个新闻记者解释的，“这里，在政治上最容易动摇的，要数中等阶级——包括工业、商业和自由职业中的人们——在古巴经验之后，他们是一批最不会支持共产党的人。”②阿道弗·吉利在1965年初访问了容·索萨。容·索萨在以下访问记中更详细地解释了他的主张：

容·索萨：在战斗过程中，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且碰到了许多挫折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危地马拉，群众唯一能实现的真正的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自从得出那个结论之后，我们前进了很多。许多事情过去显得似乎是混乱的，现在得以澄清了。有的同志在理论上同意社会主义的必要

①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56页。乌拉圭新闻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1967年初访问过塞萨尔·蒙特斯，透露了塞萨尔·蒙特斯反对德布雷关于武装宣传的观点：“在我们的谈话中，塞萨尔·蒙特斯强烈地不同意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关于武装宣传的观点。蒙特斯告诉我，‘毫无疑问，德布雷是完全了解古巴的经验。他能看到许多完全保密的文件。但是他对于危地马拉的经验却很少了解。他只是从我们运动中的、但曾在国外住过相当时候的人们身上，了解到一些方面。我想他也不怎么了解其他运动的情况。根据他讲的话而称他为冒险家，并不是贬低他；但是我认为：对于每一国家的情势，以及他们批评的所采用的某些措施，应该加以更彻底地考察。在古巴，游击队从未举行过武装宣传的集会。他们也不需那样做。’塞萨尔·蒙特斯这些话，并不妨碍他肯定德布雷对于拉丁美洲革命正在取得的自觉性上所作的有价值的贡献。”——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信号》，蒙得维的亚，东方书店出版，1967年，第29—30页。

② 《拉丁美洲时报》，1965年7月27日。

性，但是担心农民不会懂得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并认为农民会被这样一个剧烈步骤的思想所吓跑。其实，正是这些同志不懂得农民。对于一些被认为是村社的领导的农民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得如此简单和理所当然，以致如果别人企图建议别种解决办法，他们就觉得不耐烦。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不仅是物质力量，也是纲领的力量。

阿道弗·吉利：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样的纲领将引起资产阶级的反对？

容·索萨：当然我们受到这种必然结果的警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犹豫，恐吓我们。但当看到了农民们对我们的纲领的反应以后，我们就深信不疑了。纲领经受了群众的考验，自从那时起，我们就非常坚强了。不管怎样，资产阶级说些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现在已经反对我们了。你可曾发现有一个资本家支持游击队员或战斗的农民领袖的？民族资产阶级究竟有些什么力量呢？在危地马拉，一点也没有。而且，由于我们拿起武器上山去了，他们同帝国主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勾结得更紧密，并更加激烈地反对我们……。

阿道弗·吉利：你们怎么全都变成社会主义者的呢？

容·索萨：是当我们在躲开枪弹的时候。同农民并肩作战很久而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的。一个武装的革命一定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是哪些类似我国的国家，能够摆脱了落后状况的？古巴、中国、北越、北朝鲜——它们全都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不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你只要四周看看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能不赞成社会主义呢？

但是，你必须承认，仅仅赞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认为，虽然他们自己是能够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

却不能够，因此谁也不应该谈论它。这说明不相信群众。这些同志认为农民所关心的只是庄稼问题，而今天的农民却对古巴、中国、刚果和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发生兴趣。你只要同他们交谈，便会知道这点。但是你必须用单纯的语言，而不是用抽象的公式同他们交谈。再也没有比一个由工农组成的政府这样的想法更单纯的了。

阿道弗·吉利：你对越南的看法怎样？

容·索萨：但是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昨晚你听到了同其他游击队员的讨论吧；你竟至提出了不值一答的问题！但是假如你喜欢，我将作为一个游击队的指挥者来回答一个新闻记者。我认为帝国主义者是一帮劣种，你只能用枪炮赶走他们，越南游击队员正是这样做的。这样做，越南游击队在帮助我们，不管是多么遥远。同时，我认为工人的国家必须以武器、兵力、他们所有的一切，必要时甚至原子武器来支援越南人民。工人的国家一定要以武器支援他们，不允许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原子讹诈的威胁而缩手；他们也必须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支援越南人民。我们正在尽力支援他们——不是通过宣言，而是用枪炮来试图推翻危地马拉的资本主义，打击帝国主义。刚果游击队员也正在做同样的事。当我们危地马拉有一个工人政权时，可以肯定我们不会讲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将发展革命，帮助拉丁美洲所有其他国家也起来革命，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①

有人常说容·索萨是亲中国的。1966年，当问他“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同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相象时，他回答说：“我们认为与中国及其政治路线较为相象。我们不能接受苏联的‘和平

^①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2篇），第29—35页。

共处’。”^①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容·索萨在任何阶段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指导或控制。

阿道弗·吉利于1965年初，就“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对于中苏分裂问题所处的立场，问了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弗朗西斯科·阿马多·格兰纳多斯。他得到了如下的回答：

我们不抱那种认为中苏冲突与我们无关因而我们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这个问题关系到全世界的革命者；因为这牵涉到革命战略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全然同意中国同志们的主张，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反对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的总的革命路线，有助于推动革命，并且能够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剧烈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上，为彼此协商提供基础，并重新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族的革命力量。^②

这多少就是正统的托洛茨基派对于中苏分裂的立场。这种立场同古巴对中国的理论姿态所持的看法有些相似，虽然格兰纳多斯的头一句话是直接谴责古巴人的。古巴的主张一贯是，中苏争端对第三世界是灾难，因而非当事人还是保持中立为好。

① 《时代》(蒙特维的亚)，1966年8月10日。

②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37—38页。

四 图尔西奥斯·利马和起义军

“军事训练没有政治理解力，正如枪支使用潮湿弹药一样无用。有了政治理解力，即便一把弯刀也足够了。”

——图尔西奥斯·利马

容·索萨——以及他的托洛茨基顾问们——的极端先进的思想，决不是被游击运动的所有成员所理解。特别是图尔西奥斯·利马对此存在着很大的怀疑，主要倒不是在于社会主义目标，而是在于达到目标的方法。他的特殊组织，“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开始有了它自己的思想，同容·索萨的思想重大不同的思想。早在1964年10月16日（就是说，在容·索萨的“拉斯米纳斯山宣言”之前），“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的领导，曾经写过一封信，促使人们注意到阵线与容·索萨在思想上的分歧。这封信是写给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危）”的全国性领导的。信中提出了以下的评论：

这整个〔托洛茨基派的〕立场，通过一种灵巧的策略的运用，导致游击运动的革命内容都给抽掉了：否认游击运动能够变成人民的军队；否定了农民群众在我们国家的革命战争中的作用；还否定了在军事上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的必要性；它把武装斗争的持久性掩盖起来

了；它造成了错觉，把暴动的前景看成是短时期能够实现的；它造成人民武装力量的分裂，并使革命力量转而以和平的手段组织工会和群众组织……

号召占领土地与工厂的口号，在斗争的某些阶段是有益的，但当它被滥用时，会给一时尚无力量抵挡敌人侵犯的农民和工人带来屠杀和极大的挫败。当统治阶级控制着全部镇压机构时，与资产阶级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进行著名的“争论”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种策略能够应用到一些地区，要是在那里游击力量或人民军队早已发展到足以遏制敌人镇压的浪潮。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策略徒然把人民的最脆弱的目标暴露给敌人打击。采用这种策略的行动会使敌人真的激怒起来，造成人民的挫败，迫使人民在政治上退却，作为保护自己不受镇压的唯一途径。^①

随着这封信的发表，“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明确地提出了它是在军事和政治观点上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显然不同的一个实体。但是这封信决不是正统派共产党对于托洛茨基派所使用的方法的一种反驳。看来是图尔西奥斯·利马一方面不喜欢“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内部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急于与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同志疏远。作为“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他的阵线不能再留在托洛茨基派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之中了。从那时起，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从此分裂，容·索萨负责“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图尔西奥斯·利马控制着危地马拉起义军。大约在一年之后，1966年1月份，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上，图尔西奥斯·利马向法国记者马塞尔·尼德尔冈说明了他同容·索萨的分歧：

^① 引于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38—39页。

这个中国人^①正试图完全由他自己来代表革命……对他来说，游击战争是一种修改政治关系的“兴奋剂”。对我们来说，游击战争是基本的，这就是我们起来反对时常过于胆小谨慎的共产党的原因……当全国还不具有任何社会主义觉悟的迹象的时候，这个中国人侈谈什么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他侈谈“加勒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苏维埃”……他是一个空想家。^②

容·索萨的激进主义是非常坚决的。1966年晚些时候，在一次访问中，他重复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当被问到危地马拉起义军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究竟是什么时，他答道：

起义军主张一次民主革命，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主张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同资产阶级有任何瓜葛，但是起义军争取使资产阶级参加这个运动。起义军的民主革命代表着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但是他们同阶级敌人调和，谁不知道那个过渡要多长。在“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和起义军之间达到统一是可能的，但是这种统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之下。起义军正在前进中，我很高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起义军也会象我们一样为同一目标而战斗。^③

① “中国人”是指容·索萨带有中国血统的意思。——译者

② 《世界报》，1966年2月6日。

③ 《时代报》(蒙得维的亚)，1966年8月10日。根据图尔西奥斯·利马，两个组织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容·索萨相信城市革命会向农村发展，而起义军则强调农民的行动。”——《纽约时报》，1966年3月18日。

起义军的一个司令卡米洛·桑切斯 1967 年 2 月在卡米洛·卡斯塔尼奥对他的访问中，提出了他对于容·索萨的评论：

总而言之，必须弄清楚的是，容·索萨是一个诚实的同志，对革命和人民是真诚的。他和托洛茨基分子共事，但自己没有成为托派。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由于他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希望革命运动采取的途径（托派在他们第四国际的旗号下，要把危地马拉的斗争独断地控制起来），起义军便与容·索萨领导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脱离了关系。（“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原来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们中间，早已失去了影响。）我们相信——不是宗派主义地看问题——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参与了“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使得运动从先前曾经是全国性的变成了地区性^①的运动。^②

正是由于存在着一个全国性的与地区性的组织之间的冲突，最后使得容·索萨自己于 1966 年间与托洛茨基分子脱离关系。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放弃了第四国际：“有两个同我们一起的托洛茨基同志，不正当地使用了筹集来的经费。他们没有通过协商，擅自把勒令资产阶级交出来的款项（约六万格查尔危币）的一部分，送给了第四国际。”

容·索萨认为在危地马拉筹集的钱要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没有道理的。当一个记者问他“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政治路线是否随即也变更了，容·索萨回答说：“没有。我们的路线一如往昔。那两个同志经审讯后被驱逐了，我们与第四国际便脱离

① 这是指运动给托派控制变成拉丁美洲地区的运动。——译者

② 卡米洛·卡斯塔尼奥：《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员们在一起》，《轻骑》，第 38 期，1967 年 7—9 月号，第 156 页。

了关系,但是我们并未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①

但是图尔西奥斯·利马比容·索萨更早领悟事情的真相,当一旦决定同托洛茨基分子脱离之后,他随即被迫开始阐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这对于一个过去是军官的人来说,可不是容易的事。图尔西奥斯·利马当初就不喜欢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他对于危地马拉劳动党也没有多大好感。为了急于阐明他的思想,他于1965年3月间召开了一次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地区反抗组织的领导人——自从上一年分裂以来他们多少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这次会议产生了起义军的“临时革命领导中心”,它是使革命运动和游击队得以集中指导和领导的一种尝试。根据德布雷的说法,这个新的运动集中地体现了上年10月“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的信中所表达思想和情绪:“在这个关于危地马拉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的卓越的系统阐述的基础上,并取得了更新过的和充实过的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同意,在1965年晚些时候,新的起义军组织起来了。”^②由于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题为“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开展人民革命战争”,整个纲领便在1965年晚些时候发表了。也象上年10月的信件一样,发表的决议决不是正统派共产党的一份声明,它包含了一份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耐人寻味的控诉,决议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公式是一个总的模式,托洛茨基分子很想将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实际情况套进去。”这些“假革命的讲话”是虚伪和危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觉悟的程度,而是为历史所证实的科学理论。”

但是除了从理论上阐述以外,决议还提出了行动的确切号召。

^① 访问记载于蒙得维的亚出版的《时代报》,1966年8月10日;转载于1967年1月第4卷第1号香港的《环球文摘》。容·索萨于1966年5月1日把他过去的托派朋友们从危地马拉驱逐出境;参看《危地马拉:战争中的国家》,三大洲出版社,哈瓦那,1968年第6期。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41页。

决议说，成立一个临时革命领导中心，以“组织并推进人民革命战争”是必要的。^①

这一份非常直率的文件，必然使得苏联人感到惊异，因为决议中几乎每一点都显得很接近中国的路线而背离苏联的路线。然而，危地马拉劳动党对于武装斗争与革命战争的热情是短暂的。大约三年后，当起义军同危地马拉劳动党决裂时，塞萨尔·蒙特斯写道，他对“更新过了”的党，没有什么幻想：

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全国会议，通过提拔在游击斗争以及有关任务中表现出色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更新中央委员会。但是全国会议没有实现宣布过的把整个危地马拉劳动党带进〔游击〕战争里去的目标，它仅仅是用来抵制更激进的观点，并通过复杂的纪律机器，把军事领袖制服下去的一种策略。在这次会议之后，欧洲共产党的一些国际刊物，开始把起义军称之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武装力量”，决不是偶然的。

塞萨尔·蒙特斯还强调了共产党的支持不充分：

在我们的革命游击战争还很短暂的历史中，凡属形成一种趋向或构成决定性阶段以及客观性的进展的事件中（我们的革命中一系列积极的与民族的特点），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在这些事件中，从未表现出主动、具有远见与分析力、起鼓舞作用或在组织上有所帮助。唯一例外的是，建立了起义军与起义军临时革命领导中心，这是由于其他一些力量的主动，他们也被迫参加了。危地马拉劳动党的主要作用是，减缓并歪曲原来的冲力与目标，而不是鼓励并发挥它们。在其他事件中，他们完全是不介入的。^②

① 文件全文，参看本书附录二。

② 塞萨尔·蒙特斯：《一场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决裂》。

但是这些事情在 1965 年都是不明显的。当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被邀请参加 1966 年 1 月召开的三大洲会议的请帖从哈瓦那发出去时，图尔西奥斯·利马与共产党的起义军被邀请参加，而容·索萨与托洛茨基派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则被忽视了。

尽管容·索萨决定不要托派的支持而自己搞下去——这是 1965 年末作出的决定——他发现自己却成为卡斯特罗在一次罕有剧烈地痛骂托洛茨基主义的演说中的攻击对象。事情发生在三大洲会议上卡斯特罗的闭幕词中。卡斯特罗曾经受到托派不断的讽示，说他谋杀了切·格瓦拉（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失踪”了）而激怒，因而决定发动一次反击。

卡斯特罗讲话的开始，是引用了意大利期刊《工人斗争》中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政治局的首脑写的一篇长文章。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谴责卡斯特罗为了扼杀拉丁美洲革命而清除了格瓦拉，文章结束时对危地马拉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提出了良好的评语。当引用了有关的文句之后，卡斯特罗转到了危地马拉的问题：

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第四国际的这位领导先生，在这里很骄傲地谈到了危地马拉的情况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因为正是关于这个运动，美帝国主义应用了它的一种最隐蔽的策略来瓦解这个革命运动，也就是派遣第四国际代理人渗透进去……

怎么回事呢？容·索萨无疑是一个爱国军官。容·索萨领导了一批由军官组成的运动。（事实上，后来入侵吉隆滩的雇佣军是参预了粉碎这个运动的。）而第四国际却把一个商人安插到这个运动中去，成为这个运动政治上的负责人。第四国际利用这个领导人对于革命思想的深刻的政治与历史问题的无知，让那个托派代理人负责主编一张报纸。（我们毫不怀

疑，他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此人把第四国际的纲领原封不动地搬到报纸里去了。

因此，第四国际这样的所作所为，是反对革命运动的一种真正的罪行，它把运动孤立于其他人民与群众之外，用愚蠢、失信以及令人厌恶和作呕的事（那就是今天政治领域里的托洛茨基主义）来败坏这个运动。因为，假如托洛茨基主义在某一时期代表着一种错误的立场，而这种错误立场还是限于政治思想的领域里面的，那么，近年来它已变成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一个庸俗的工具了。

这些先生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例如在南越，一个广大的革命阵线团结了绝大多数人民，把居民各个方面都紧紧地组织在反帝斗争的解放运动的周围，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这种作法是荒谬的，是反革命的……

幸运的是，危地马拉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拯救。它之所以倖免于难，是因为军官之中有一人具有清醒的观点，他曾与容·索萨一起倡导了革命运动，但当了解到愚蠢与糊涂的做法以后，便脱离了“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并且同其他进步的与革命的方面在一起，组织了危地马拉起义军。

这位年轻的军官，对形势保持了如此清醒的观点，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危地马拉革命运动的代表图尔西奥斯·利马司令。应该归功于图尔西奥斯·利马司令的是，他不仅是首先参加为解放他的被压迫人民而进行武装斗争者之一，并且是他把危地马拉革命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隐蔽和狡诈的策略中解救出来……

容·索萨在斗争开始时的爱国愿望是无庸置疑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情况也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态度，我们则保持十分严肃的保留看法。我们希望容·索萨不久就会使自己同那些分子决裂，重新回到危地

马拉的革命运动中来……

图尔西奥斯·利马如今领导着危地马拉最重要的游击运动。他在五年前参加了1960年11月13日的起义。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陆军中尉，从那时起，他有了极大的变化。他已经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特别是，既借助于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支持，又从未丧失过他的独立性。

图尔西奥斯·利马在1966年3月告诉一个访问者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虽然他同时指出他的哲学同共产党的哲学是接近的。^① 尽管图尔西奥斯·利马在三大洲会议上得到了卡斯特罗的称赞，他拒绝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争端中偏袒一方。他宣称，他意欲把他的运动独立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潮流之外。他说：起义军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既不受莫斯科支持，也不受北京或哈瓦那的支持”。

后来，图尔西奥斯·利马的副手，塞萨尔·蒙特斯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斗争自然应该放在全洲的高度上加以考虑。那时我们将需要一个具有全洲水平的领袖。当我们需要他时，我们将会自己推选他的。对我们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是活生生地证明了我们的斗争是能够胜利的。我们敬仰他，但是我们绝对拒绝听命于他。”^②

图尔西奥斯·利马表示，他的组织在那时还不具备力量，也不急欲夺取政权。他们还处在求得“生存”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期间，他们正试图组织农民群众。到将来，第二阶段，还得在几年以后，将达到游击队与政府军之间的“力量均衡”，这样就将容许更多的直接交锋和公开打仗了。

^① 《纽约时报》，1966年8月18日。

^② 吉安·拉特盖在《巴黎竞赛画报》的文章，1967年8月26日。

有一个新闻记者于1966年6月访问了塞萨尔·蒙特斯之后说，起义者承认，他们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和希望。他们的目的是在农村建立一个抵抗的根据地，并通过发展有高度觉悟的农民群众来建立一个安全的隐蔽的地方。蒙特斯说：“我们组织人民，现在所花时间愈多，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困难就愈少。”^①

然而，强调“持久战”与农民的品质，是不得已的事。游击队不过认为，就传播他们的思想来讲，农村较城市有更大的收获。

图尔西奥斯·利马在1966年中回答墨西哥《事件》杂志的主编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的访问时，就他所领导的运动的战斗目标，提出了一个简短的纲要：

我们是为土地而战斗，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首先，我们必须不受别人的干预；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走向进步并采取适合于今天现实的一些措施，我们必须有自由。你不能忽视我们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事实：土地的占有是极不均衡的，生产制度还是原始的。因此，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必须实现普遍的、彻底的土地改革；就是说，不只是把土地分送给农民，还要给他们以必要的信贷、借款和农具。我们必须采取增加生产的措施，并稳步地带领农民自愿地采用优越的生产方式、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有自由，而自由是不能通过选举或类似的其他途径获得的。摆在危地马拉面前的就是一条道路，即武装力量的道路。我认为，革命将由农民、工人以及城市的中间阶层来实现，换言之，革命将由被剥削者来实现，因为他们清楚地体会到：那些占有一切或几乎所有一切的人们，毫无意图按合理分配的原则，交出并分配他们所占有的东西。相反，他们决心用尽一切手段来保卫他们的一切。

^① 《纽约时报》，1966年6月26日。

当被问到类似发生在圣多明各的美国武装干涉是否会在危地马拉重演时，图尔西奥斯·利马回答说：

当傀儡政府、军队和警察认为他们无法控制人民，无力保护垄断集团，并且象在越南一样，傀儡政权开始垮台时，我们相信，类似的武装干涉是会发生的。然而，如同越南的英勇人民一样，我们准备好了，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样的一种形势，即出现大规模干涉的形势，不是纯粹的假定而已，而是客观的现实。但是由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潮流的高涨，侵略将遇到更大的困难，因为侵略需要更多的海军陆战队，需要以百万计的更多的美元，以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物资。争取解放的斗争可能是长期的，但击败帝国主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目标。胜利的曙光必将最后显现。^①

游击队经常回顾 1965 年美国侵略圣多明各以及占领南越的事件。在拉丁美洲历史上，圣多明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它似乎否定了走古巴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阿本斯被推翻时，危地马拉又回复到 1954 年的处境。但圣多明各事件后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却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而不是回到 1954 年至 1959 年的失败主义的时代中去，当时拉丁美洲的左派认为在美国威胁面前不能有所作为。假如侵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恐怕还应当欢迎它。当圣多明各的革命运动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而被粉碎时，越南的革命运动则大大地加强了。而且，假如美国人被迫同时在几个地方进行干涉，那么越南的经验，而不是圣多明各的经验，倒是会很重演的。在 1965 年之后，这变成游击战争理论上的一个重要主题了。

^① 《事件》杂志，1966 年 6 月 18 日。

五 选举与图尔西奥斯·利马之死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到底，生存下去。”

“危地马拉起义军”一个领导人

1967年对吉安·拉特盖的讲话

游击运动的分裂，并没有造成游击活动显著的低落。1965年2月9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哈罗德·豪泽上校在驾车回家时遭到枪击。“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承认是他们干的事，并声称这个举动“是危地马拉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在北越与南越所犯罪行的回答”。^①

5月间，危地马拉国防部代部长埃内斯托·莫利纳·阿雷亚加上校在家门口走下汽车时被枪杀了。在11月与12月份，发生了几起有组织的绑架危地马拉富人的事件。据《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除了要索三十万美元以上的赎金外，恐怖笼罩着首都的居民；并且，由心怀不满的军官所策划的反对政府的政变阴谋差一点

^① 阿道弗·吉利对弗朗西斯科·阿马多·格兰纳多斯的访问。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34页）。“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司令接着说：“我们所袭击的不是作为武官的个人，而是他所担任的任务。他到危地马拉是来组织镇压危地马拉人民群众的，正如他的同伙在越南所做的一样。我们的行动有着这样的附带目的：即吸引美国人民的注意力到我们身上——这样做是争取他们支持我们的斗争的办法。武官是个罪犯，是一伙罪犯中的一分子。他们这些人，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名义，准备着一场世界范围的原子战争。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人民拖向这样的战争里去。”

爆发了”。^①

豪泽上校被袭击后，佩拉尔塔总统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并暂停了宪法的应用。弗朗西斯科·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与民主革命团结党的组织者被机敏地撵出国去。

据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说，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这时期对民主革命团结党“曾经施加了巨大压力”，作为进一步的尝试使得民主革命团结党也参加反对佩拉尔塔的暴力革命。他说：“当时发展到这样地步，即他们对我们威胁说，将把我们当作‘人民的敌人’和军事政府的一部分来看待。”

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于7月间一次记者访问中，对形势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佩拉尔塔采用了镇压民主派反对者的政策，而正在把和平解决危地马拉问题的门关上。他正陷入了共产党想要实现的形势，即除了暴力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办法。”^②

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继续说：“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政策是，创造一系列的条件，迫使美国象在圣多明各所做过的那样进行干涉，他们所持的理论是，美国的干涉将使得危地马拉人民团结起来，参加在他们的领导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回忆了在1—2月份，民主革命团结党内曾开展一场激烈的辩论，内容是究竟支持游击队，还是试图寻求和平政治解决的办法。他无奈地说：“政府用驱逐我们出境的办法，使得整个辩论消失了。”但是“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一个司令在谈到民主革命团结党时评论说：“民主革命团结党的人们，正因相信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而受到惩罚：他们相信通过‘和平’办法以解决独裁统治。这里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办法，也不可能有选举的办法。”^③

和平解决办法，也许没有。但出人意外的是选举问题显然提

① 《纽约时报》，1966年3月18日。

② 《拉丁美洲时报》，1965年7月22日。

③ 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第1篇），第33页。

到佩拉尔塔上校的日程上来了。一部新宪法于 1965 年 9 月 15 日被通过，它宣布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为非法，并宣布总统的选举将于下一年的 3 月举行。

总统候选人共有三名，两名上校和一名文官。后者名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是革命党领导人，10 月 31 日发现被枪杀在他的家中。尽管有人企图把他的死说成为自杀，随后又承认他是被暗杀的。革命党于第二天推选了死者的兄弟、圣卡洛斯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两名上校，有一名是米格尔·安赫尔·庞西亚诺·萨马约亚，曾担任陆军参谋长之职。他有着由卡斯蒂略·阿马斯领导的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另外一名上校，胡安·德迪奥斯·阿吉拉尔·德莱昂，是由佩拉尔塔上校本人支持的。

后来证明选举问题也是危地马拉劳动党与起义军争论的另一个主因。图尔西奥斯·利马在 1966 年 1 月的三大洲会议上站出来坚决反对支持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或者说实在，坚决反对同选举程序有任何牵连：

我们并不建议阻挡选举的进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这样做。还有许多人仍然天真地想在选举游戏中得到什么的。因此可以举行选举。但让我们讲清楚，当我们足够强大的时候，当我们的人民较好地觉悟到在一个当政的反动政府下所进行的选举的虚伪性时，我们将强行阻止这种卑鄙地欺骗人民的事情继续下去。

……假如我们革命者参预这些选举，或者号召人民参加选举，选举革命党或其它反对派中的任何一派，那就是把我们的支持、有原则的支持、我们的革命的认可、以及相信我们的群众的支持，给予那些我们知道是肆无忌惮、我们知道是反动

派和帝国主义帮凶的人。^①

这种观点不是为危地马拉劳动党所有领导人所欢迎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对于三大洲会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他们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性地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以及特别对容·索萨的攻击表示欢迎，但是当他们想到图尔西奥斯·利马与起义军将来可能更忠诚于古巴，而不是忠诚于受莫斯科影响的危地马拉劳动党时，就感到有点不安。

因此，当图尔西奥斯·利马还远在哈瓦那时，在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唆使下，“起义军的临时革命领导中心”决定支持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和革命党，尽管当图尔西奥斯·利马缺席时，由塞萨尔·蒙特斯领导的“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投票反对这个决议。

等到图尔西奥斯·利马回到危地马拉之后，他事实上还是忠诚地依从他不在时所作出的决定。那年晚些时候，在选举以后，他把“起义军”的态度对一个访问者作了如下解释：

首先，有必要把起义军同意的对于最近选举所采取的路线的唯一真正的意义，加以说明。尽管选举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带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这种色彩是今天危地马拉复杂形势的直接反映。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这个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下的国家里，不少人对于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的血，感到厌倦，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些公民寻求并期望运用和平的手段，使得这个制度有一个决定性的改变。正因为这样，充分理解形势并经常想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满足各方面人民的需要、要求和热望的革命的“起义军”领导，决定投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票，这不是

^① 图尔西奥斯·利马，引于塞萨尔·蒙特斯的《一场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决裂》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著名的律师将会改变目前的形势，我们知道，他是无法担负这个任务的。目标是十分清楚的，投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票，代表着反对政府专断横行的一种斗争形式，并且是向公众舆论，特别是国际公众舆论表示全部、彻底否定独裁政权的意思。因此，革命党候选人的胜利，标志着起义军的一个政治胜利，因为危地马拉人民通过选举表达了他们要求改变制度的不可抑制的强烈愿望。

无论如何，有必要重申与强调，游击队对于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这条道路决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①

然而，危地马拉劳动党关于支持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决定，特别是该党愈来愈相信图尔西奥斯·利马所强调的武装斗争，在当时形势下不是最好的前进方法，这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确切的细节还不清楚，但看来是这样的：逃亡在墨西哥的一些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人，为游击队的日益增长的好斗精神而感到不安，因而决定在选举日之前回到危地马拉来进行安排。^②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因为在选举前夕的1966年3月5日，警察包围了危地马拉城里的一所普通的二层楼灰泥房子。^③在一阵枪战之后，二十六名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包括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人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和“全国农民协会”总书记莱昂纳多·卡斯蒂略·弗洛雷斯都被捕了。

出乎人们意料，尤其出乎军队意料的是，胡里奥·门德斯·蒙

① 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对图尔西奥斯·利马的访问，载《事件》杂志，1966年6月18日，转载于香港《环球文摘》，1966年10月，第3卷，第10号。

② 《拉丁美洲》（新闻通讯社），1968年1月26日。

③ 《纽约时报》，1966年8月7日。

特内格罗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尽管没有以绝对多数压倒代表军队方面的对手们。他必须得到国会投票赞成，才能正式当选总统。起先，对于佩拉尔塔是否真的会在6月30日放弃权力而卸任，是有些怀疑的。但是这种怀疑，以及害怕心怀不满的庞西亚诺上校要搞政变的同样疑虑，证明都是没有根据的。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就于5月5日被国会选上了。

军队方面为什么会同意让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掌权，其中一个理由似乎是，后者同意国防部长得由军队指派，并对军队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因而从他掌权开始，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就被他的上校们有效地控制着。美国对于上校们施加压力，可能也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3月间被警察逮捕的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等一伙的命运，表示一定的关心。起义军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特别在大学里企图迫使政府透露被拘留的政治犯的下落。

5月4日，有两个重要人物被游击队绑架了。游击队指出，除非政府宣布那些失踪的左派人士的情况，被绑架者将不会被放回去。被绑架的人是：总统新闻秘书巴尔塔萨·莫拉莱斯·克鲁斯以及最高法院院长罗米欧·奥古斯托·德莱昂。根据新闻报道，巴尔塔萨·莫拉莱斯·克鲁斯是在危地马拉城的中部在一次枪战以后被俘获的，他的儿子和司机都被打死了。^①图尔西奥斯·利马于6月间回答墨西哥杂志《事件》的主编访问时，就绑架一事作了如下说明：

绑架他们两人的目的，在于迫使佩拉尔塔·阿苏迪亚统治下的军事政府宣布几个月以前失踪的二十八位政治犯的下落……绑架他们两个官员，决不意味着起义军以死来威胁他

^① 《纽约时报》，1966年5月6日。

们。起义军将保护他们生命的安全，即使独裁者拒绝我们早已提出的条件。

我们不是象正在进行统治的军阀们那样的刽子手。我们是意识到我们起着社会改革作用的年轻人。我们只不过是革命正义同反革命暴行作斗争。

军政府的宣传部长与发言人莫拉莱斯·克鲁斯深知起义军在政治犯问题上的声明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至少看来是这样的：他对于杀害游击队一事，他是一无所知的。由于佩拉尔塔·阿苏迪亚曾经命令把捕获的人全都枪毙，他当然不能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了。所以他就采用了否认一切的办法。

在另一方面，且不说这样的事实：即绑架两名政府官员的事显示给国内外的舆论是，二十八名革命领袖被佩拉尔塔·阿苏迪亚的警卫部队枪毙了，这种杀害行为，发生在恢复“宪法”的前夕，对于军政府的政治打击，在危地马拉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这方面，最重要的结论有如下述：

(1) 反动阶层首次采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对付起义军。

(2) 佩拉尔塔·阿苏迪亚统治下的非法政府，早已同起义军开战了，不再把起义军当作“匪徒”、“暴民”和“无赖”等等看待了。

(3) 有些组织原先站在混乱的政治形势之外，现在关心当前形势了。它们已经考虑到起义军的建议，而对统治着的军阀们提出了强烈的谴责。红十字会与大主教管区就属于这一类。

(4) “大学”、“大学学生会”、“律师公会”、“法科学生会”、“法学院”与其它进步组织同它们的领导人，全都倾向于新的政治潮流。它们公开谴责危地马拉的所有灾难都是由独裁政府造成的，并敦促独裁政府接受起义军的要求。

(5) 危地马拉的有些报纸，过去对于佩拉尔塔·阿苏迪亚及其同伙的一切行动，都无不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甚至于拒绝发表关于逮捕政治犯的消息，或不理睬被捕者的母亲们提出把他们的儿子进行公开审判的请求。但是现在他们有了根本的转变，而开始全文刊登起义军领导中心发布的所有公报了。

(6) 公众舆论支持我们，主要因为过去许多人不知道军事独裁政府的劣迹。在新国会里，有一部分人提出一种意见，要求内政部长马克西米利亚诺·塞兰诺·科尔多瓦上校站出来交代“起义军”所揭露的事实。政府当局无耻已极，甚至在被绑架的巴尔塔萨·莫拉莱斯·克鲁斯与罗米欧·奥古斯托·德莱昂的亲属中挑拨离间，散布仇恨的种子。^①

当绑架发生之后，政府照例宣布全国戒严。尽管如此，另一件绑架案又于5月26日发生了。这一次被绑架者，是新选出的国会两个副主席之一，埃克托尔·门德斯·德拉里瓦(后被释放，在饱受惊吓之后，退居到美国的迈阿密去恢复健康)。直到7月份，在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真相才泄露了。

在7月16日，两个前警察人员把事情经过告知了大学学生会。3月间被捕的人，全给行刑队枪毙了。其中三人，包括两个工会领袖，在危地马拉城警署受了酷刑以后，被驱到太平洋的一个军事基地上枪杀了。他们的尸体放在麻袋里，用军用运输机扔到海里去了。

据说其他被杀的有容·索萨的侄女克里斯·容·塞尔纳以及一个墨西哥大学生戴维·阿吉拉尔·莫拉的妻子欧尼西·坎皮兰·德阿吉拉尔·莫拉。她是在她的丈夫12月间在危地马拉被捕后而失踪的。她到危地马拉来是寻找她丈夫的。那两个妇女，据

^① 《事件》杂志(墨西哥城)，1966年6月18日。

说是用棍棒打死后草草地埋葬在萨卡帕军事基地附近的坟地里的。^①

那些被捕者惨遭杀害的广泛流传的谣言被证实之后，游击队把两名官员释放回去，换回一个学生游击队员何塞·玛丽亚·奥尔蒂斯·比德斯，他于6月间被警察逮捕。

尽管佩拉尔塔独裁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充满着这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但是许多人相信，有一个文职的总统上台，可能创造出全国团结的气氛，因而政府军与游击队之间的休战也许是可能的。

图尔西奥斯·利马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种看法。当3月间访问他问到他对于新总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归根结底，不会有何改变。军队方面不会中止镇压。因此我们也不会罢休。”^②

塞萨尔·蒙特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告诉一个记者说：“我对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是非常尊敬的。他曾是我的法学院教授，我相信他是一个诚实而聪明的人。但是军队绝不会让他实现我们的国家正需要的深刻的改革的。”^③

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于7月1日正式就任总统。他的副总统，克莱门特·马罗金·罗霍斯发出了要求游击队同政府合作的呼吁。容·索萨的回答，如同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塞萨尔·蒙特斯一样地直截了当：

我们未曾要求休战。现在并无休战。我们过去有过的暂时和平期间，只有助于反动政府调动巡逻队到其他省份去。根本没有休战可言……我想任何具有马克思观点的人，那怕是在梦境，也不会接受大赦的。假如我们接受大赦，敌人过去所犯的一切罪行都将被一笔勾销了。何况我们又不是罪犯，

①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8日。

② 同上，1966年3月18日。

③ 同上，1966年6月26日。

我们并没有犯罪，因此，我们并不要求赦免。^①

危地马拉劳动党渴望大赦建议能被游击队接受下来，但是最后由于右翼的政治团体与军队对政府施加了压力，大赦附带了这样麻烦的条件，甚至正统派共产党员也感到不得不反对它。共产党一个发言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的文章里，作了这样的阐述：

右翼阴谋分子巴望看到总统在与游击队对话的努力中失败。为此，他们对于政府送交国会的大赦法案加以阻挠。奇怪的是，政府比革命者对于大赦关心得多，尽管大赦是针对革命者而提出的。不附带万难接受的条件的大赦（政府提出的正是属于这一种），会给总统以足够的道义理由，与游击队进行对话。但是右翼党派的议员们和革命党中更加反动的一翼，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条件，其中有一项是规定游击队必须在八天之内交出他们的武器。这样，反动派就把大赦建议变为送给业已打败或行将打败的敌人的最后通牒，而实则游击队的处境确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就完全有理由拒绝最后通牒与大赦。^②

7月16日，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就任总统后两周，起义军发表一项由图尔西奥斯·利马和游击队的主要的文职领导人贝尔纳多·阿尔瓦拉多·蒙松签署的声明，声明说：“尽管新政府很得人心，但军队把持着绝大部分的实际权力。危地马拉军队仍然是国内财阀和外国公司的反动工具，因此必须与之斗争到底。”^③

^① 《时代报》（蒙得维的亚），1966年8月10日；香港《环球文摘》转载。

^② 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危地马拉：政治形势与革命策略》，《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第10卷，第2号，1967年2月。

^③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8日。

军队实际上是在准备着并等待着。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就任总统以后的危地马拉历史,是怎样从小范围的、局部的游击战发展成为一场类似内战的故事。但是这一章将不是由图尔西奥斯·利马去写了。

1966年10月2日清晨,图尔西奥斯·利马正在危地马拉城郊外的罗斯福公路上驾驶着一辆奥斯汀·库珀的汽车。同他一起的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席尔维亚·伊博·弗洛雷斯·莱托纳。根据新闻报道,汽车碰撞了路上的一样东西,翻了车,烧了起来。后来,哈瓦那电台一项广播中声称,汽车在燃烧之前,“车中先有一次性质不明的爆炸”。^①

图尔西奥斯·利马当场身死,那个女郎在到达医院时死去。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第三个人,是一个妇女,遭受烧伤与撞伤,幸免于死。第二天,危地马拉城估计有一千五百名哀悼者在墓地上参加了图尔西奥斯·利马的葬礼。他曾经说过:“我明天就可以死去。世界上的事物还是这样。别人会继续下去的。”

他的一个朋友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说:

朋友们,危地马拉同志们……象所有的真正的革命者一样,图尔西奥斯·利马知道人生就是应该全心全意地贡献给一个高尚和可贵的理想。图尔西奥斯·利马司令热爱生活,以便运用革命手段,建立为全体危地马拉人共享的未来胜利……他的逝世,使得危地马拉革命失去了一位最年轻、最有经验的领导人。^②

^① 《纽约时报》,1966年10月4日。吉安·拉特盖的报道同样是可能的:图尔西奥斯·利马为了把他的女友带出去兜风,在一家饭店外面偷了汽车逃走,撞到了一座墙上去。

^② 吉安·拉特盖:《游击队员:游击队员的画像》,《巴黎竞赛画报》,1967年8月26日。

六 塞萨尔·蒙特斯与反共组织的滋长

去年(1967)春天参观游击区的一个美国教授报道, 这里学校的热午餐, 是危地马拉军队和“肯尼迪总统联盟”所赠施的, 每天正向三十万个小孩供应。还钻了一百多口井, 修建了几公里道路。农民们很了解这些事的意图何在, 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但是, 有个非游击区(因而没有实施上述计划)的农民, 却面带愁容, 对着教授说:“倘若我们能有一些游击队员的话……”

——塞德里克·贝尔弗雷奇

图尔西奥斯的当然继承人, 是他的副司令塞萨尔·蒙特斯, 图尔西奥斯从 1963 年起就和蒙特斯亲密结交了。蒙特斯与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关系, 虽然比图尔西奥斯同该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但游击队领导的掉换并不比初看时那么重要。蒙特斯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一事实使得游击队与正统派共产党之间不可避免的破裂推迟了, 而不是加快了。更重要的是, 蒙特斯是个文人, 和军队缺少接触, 不象图尔西奥斯一向与军队保持接触。当军队正在发动新的进攻的时期, 这是大为不利的。

“起义军”的新领导人蒙特斯生于 1942 年。十三岁在天主教

学校读书时，因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阿本斯总统的政变表示敌意，被学校开除。十八岁时他已在领导学生示威运动，二十岁就逃到山里去了。四年之后，他才二十四岁，已是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了。他矮小的身材和孩儿脸，赢得了“小孩子”的浑名。他有某些原由，对于危地马拉当前的状况，表示不满。他的兄弟是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早些时候被政府军队逮捕，拷打死了。

图尔西奥斯于1966年10月死亡，正在这时，政府军对游击队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部分地看来，这是政府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手段。因为在门德斯·蒙特内格罗于1966年7月就任总统以后的整个时期，他遭到右派想推翻他的危险，要比来自左派的还大一些。因为他们(右派)的人在3月间大选中未能获胜而感到恐惧，军队的某些部分开始策划一次卡斯蒂略·阿马斯式的政变。军火从尼加拉瓜运入，在本国东部和洪都拉斯建立了若干军事训练营。门德斯总统不得不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总统那里取得不介入危地马拉事务的特别保证。

在危地马拉城本身，右翼团体发动了新的暴力行动。他们向报馆、广播电台、公共建筑物投掷炸弹，正如某记者所说的，力图“借此造成不安气氛，鼓动军队再一次夺取政权。”^①

由于军队怀疑门德斯总统同情共产党，为了抚慰军队，门德斯总统被迫允许军队放手扑灭游击队。这样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国内挑起更多的敌对与仇恨。显然他也受到美国的强烈要求，要他一劳永逸地解决清除游击队问题。

军事独裁者恩里克·佩拉尔塔曾经拒绝过美国军队卷入危地马拉，而文人总统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却没有这种顾忌。不久，就有一连美国“绿贝雷帽特种部队”被安置在国内，协助反叛乱运动。美国很快表示，美国与危地马拉的关系，在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当了

^① 《纽约时报》，1966年10月15日。

总统时，要比佩拉尔塔当权时协调得多。^①据《纽约时报》报道：“新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当地代表团，终于找到了美国这一个乐意的伙伴，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经过同无能的军人政权打了三年无效的交道后，也突然发现了一个谈得来和可以一道做点事的集团。”^②

就经济发展来说，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在对付游击队问题上，危地马拉军队因为有美国顾问的关系，便有了根本清除游击队的机会，这在以往军事独裁的整个时期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当上总统时，游击运动仍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萨卡帕省作战的图尔西奥斯和塞萨尔·蒙特的起义军，另一部分是在伊萨巴尔活动的容·索萨及其“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门德斯总统认为，游击队问题主要是个军事问题，要用军队去解决，所以任命了一位比较凶狠的上校卡洛斯·阿拉纳去担任萨卡帕省的军队司令。

阿拉纳上校很快发现他的部队训练极差，而且在当地居民中间名声扫地，因此他决定留出1966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专门进行集中训练。就在这几个月中，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向游击队提出了他的大赦，虽然明知将遭拒绝。无论如何，这些政治行动使军队赢得时间来改善它的面貌。

政府在进行单纯军事训练的同时，接受美国建议，草订了一个“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试验计划”。这项计划从1967年2月1日起实行，其中包括有国防、卫生、教育、公共工程等五个部的合作。其目的在使游击区的农民有充分的福利享受，以便把他们从对游

^① 恩里克·佩拉尔塔——如拉丁美洲其他几个成功的右翼独裁者，喜欢强调他的反美精神。据某一方面消息说，他限制派到美国或巴拿马去接受训练的危地马拉军官的数目，拒绝答应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危地马拉建立教育电视（理由是美国将审查内容并塞进大量广告），不答应向美国提供有关游击队活动的情报，认为他们已经了解得“够多了”。——见容·弗拉培尔：《危地马拉：在自由派指挥下的军事营垒》，《越南报告》（纽约），1968年4—5月号。

^② 《纽约时报》，1966年10月13日。

击队采取友好态度中哄骗过来。塞萨尔·蒙特斯曾恰当地痛斥了美国顾问们充当的角色：

他们(指美国顾问们)象机器一样行事。他们在毛泽东著作中读到,游击队和人民是鱼水关系,没有水,鱼就要死,于是他们坚信同样可以这样做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孤立起来。他们也许在某一时期能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永远如此。农民们需要土地,但他们一无所有;需要房屋,但政府只给军官造房子。假如你不给农民所需要的东西,你便不能阻止农民帮助我们。①

大约在开始实行“实验计划”的同时,阿拉纳上校对游击队采取了行动,既使用了正规军,又使用了军事辅助团体。这些军事辅助团体原来是作为反共防卫队设计建立的,很快就发挥独特作用了。它们逐步归并成为三大反共组织:“白手团”、“新反共团”和“危地马拉反共协会”。根据“反共协会”一张传单所载,该会会员“须在祖国圣坛之前宣誓,决心参加战斗,肃清以下各类反爱国分子”,即“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勾通起义者的人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与共产党有来往的自由职业者”以及“试图录用‘赤色分子’的教育部副部长所委派的人们”。传单末尾附了一份注明予以处死的二十二人的名单。②

这些法西斯团体之一发布公报说:“要是有一个士兵、警察或其他反共人员”被游击队杀害,它将杀死“十个左翼分子”。在此后不久的1967年5月发现了十具被枪杀的尸体,死者伤痕累累。③

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信号》1967年,蒙得维的亚东岸书店出版。

② 《泰晤士报》,1967年5月23日。

③ 《纽约时报》,1967年5月27日。

政府军对右翼恐怖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公开否认有何责任。有个《纽约时报》记者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管军队如何否认,也不能动摇此间消息灵通人士这样的信念,即大多数右翼和反共团体,事实上是军队的产物,其中许多成员就是下级军官。此外,人们坚信,政府对这些地下行动至少是默许的”。^①不管是谁授权使用了这些军事辅助防卫队的,它们确已非常成功地慢慢侵蚀到游击队的农村根据地。这里到底是游击队已经活动过五年以上的地方。可是,游击队面临着有系统的军事推进、使用检举人、采取民政措施,以及皂白不分的袭击,在无辜农民当中造成大量损失诸情况,这就使得游击队不久发现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防御地位,被迫非采取机动战略不可。

塞萨尔·蒙特斯于1967年初接见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他概述了起义军被迫采取那种新战略:

我们的部队是极其机动的。这是政府军队不管如何进攻决不能抓住我们的原因。我们在国内各地有几支巡逻部队在作战,他们之所以不能搜获我们营地的简单原因是:我们从

^① 《纽约时报》1967年7月15日。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在给《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杂志所写文章中,叙述了劳动党对这些事件起因的看法如下:“1965年5月22日,佩拉尔塔·阿苏迪亚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派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联络官埃内斯特·莫利纳·阿赖加上校被革命党人处决后,政府高级军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建议政府将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抓起来,毫不迟疑地予以处决,作为对阿赖加之死的报复。几小时后,部长会议审查了这一建议,‘经过热烈讨论’,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提请美国国务院作最后决定。

“机器开动了,当晚宣传部部长拉斐尔·埃斯科瓦尔·阿尔圭略前往美国‘会商’。他回来宣称,华盛顿认为这个建议‘不适宜’,实行之后将有损政府和军队威信,而且,更甚的是,将造成公众的严重不满。美国顾问们另提建议,由政府、军方和反共领袖们组织并训练特种团体,‘悄悄地’谋杀革命领袖。

“这个‘意见’连细节都被接受了。不久,一群群的刺客就在全国各地,主要在游击队活动区出现。今天晓得,这批家伙有他们自己的特别营地,军队非但假装不知,而且指派军官协助他们。”——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危地马拉:政治形势和革命策略》,《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7年2月号。

不固定扎营。我们的储粮仓栈只有少数被发现，如此而已。走那么多路是困难的，但不久也就习惯了。例如，游击队曾经从伊萨巴尔湖走到圣阿古斯丁—阿卡沙瓜斯特兰，那就是说不得不跨过危地马拉最高的一些山峰。我们行军只花了二十天工夫，途中没有停留，每天早晨六点钟动身，直到夕阳西下，仅在动身前吃顿早饭，晚上睡觉前吃顿晚饭。^①

流动虽然成为每天活动的惯例，而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却未被忽视。无论何时，游击队只要可能就在村庄里停下来，继续他们习以为常的工作，向农民说明他们的各种活动及其动机。美国玛丽诺尔修道会的一位教士布拉塞·邦帕内神父被驱逐出危地马拉后不久，在1968年1月被访问时解释说：“游击队曾给自己下的定义是：他是一位教师。”据邦帕内神父讲：

游击队员从长期经验中认识到，他如不保卫自己，就不可能对别人进行宣传教导，因此要武装起来。游击队员不是一个蹩脚的革命者。拉丁美洲有过几百次宫廷革命的例子，一小批人发动了政变，接管了国家，不久又和以前情况一样，只是在不同的管理之下继续贪污腐化罢了。

但游击队则是为着人民在思想上成长起来而工作，为着人民大众的成长而工作的。他们在小村庄里教人文化，读书写字。旁边放着轻机关枪。老百姓最初看到他们当然会害怕，因为知道他们是武装着的，而过去只看到过军队手里有武器。农民有时要经过长时间才能改变观念，理解到游击队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农民而存在的。

原来游击队在这方面并不是经常成功的，也犯过些错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吹嘘运动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在某一个村

^① 加莱亚诺：《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信号》。

庄里，一名游击队员向农民要吃的，遭到拒绝后，就开枪打死了他。但我要率直地讲，类似这些事例的情况，领导方面是反对的。领导方面希望农民拥护他们，从而发扬一种军民团结的精神。^①

游击队也要求运动蓄积力量而没有任何宗派主义情绪。塞萨尔·蒙特斯告诉加莱亚诺说：“在这营地里，你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印第安族同志们，都是天主教徒，虔诚的天主教徒。”

起义军中有若干共产党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运动是作为任何政党的军事部门而行事的。起义军不是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军事部门。我们的运动是一种广泛的爱国运动，具有极为单纯的纲领：我们危地马拉人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不管是军事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干涉。我们为进行革命战争而正在组织人民；游击队是伟大人民军队的种子，最后将能提供一个替换的政权。^②

象邦帕内神父所讲的一类错误虽在游击队员中是难免的，但总的来讲，看来游击队是竭尽全力去和农民搞好关系的。但是，游击队对于敌人却是无情的。塞萨尔·蒙特斯向加莱亚诺讲过，有次有个叫罗纳德·霍恩伯格的美国人到游击队营地来，他自称是同情游击队的新闻记者：

他装得很沉着，在山里我们和他谈了几天。他开了许多在首都的人的名字和地址，但我们在几天之内反复查对，却发

^① 容·弗拉培尔1968年1月24日访晤布拉塞·邦帕内神父的谈话，载《越南报道》(纽约)，1968年，4—5月号。

^② 加莱亚诺：《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信号》，第20页。

现他所提到过的人们中间没有一个认得他。关于他所谓寄放他的行李的地方，他也说了谎。他好象只对于我们斗争的军事方面感到兴趣，而对于我们的政治鼓动却全不关心。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却是具有高度专门军事性质的。他是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能手，带来了些武器，说是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

我们审问了他，将他处死了。在他衬衫下的腰间系着一根漂亮的尼龙绳，这种绳子是“绿贝雷帽特种部队”用来勒杀别人的。^①

现在还难以估计美国干涉的范围有多大，以及这对逆转游击队在前几年所取得的胜利究竟起了多少决定性作用。起义军虽经总结过，认为“危地马拉迟早要成为美国干涉的又一战场。它从干涉目标出发的初步的军事行动早已实行了。随着我们斗争的增长，干涉必将扩大。”^②

1967年9月危地马拉副总统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在接见一名新闻通讯社记者时透露，美国飞机从巴拿马美国基地飞往游击队隐蔽处所，已经作了若干次出击：

马罗金·罗哈斯宣称，近几月来有一队美国飞机由美国人驾驶自巴拿马基地起飞，向被怀疑为游击队出没处的目标投掷凝固汽油弹，然后不在危地马拉国土上降落就飞回基地。^③

这同一记者继续写道：

① 加莱亚诺：《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信号》，第20页。

② 引于福尔图尼：《危地马拉的政治形势》。

③ 《拉丁美洲》（新闻通讯社新闻稿），1967年9月15日。

美国特种部队对当地人员正在进行反游击战术、审问战俘和坚持丛林生活的集中训练。美国顾问也经常伴同危地马拉巡逻队执行反游击战任务。美军除了给予进攻战术训练之外，也在乡间的民政措施计划方面予以合作，譬如分配奶粉一类食物、分配药品以及完成简单的公共工程项目。

危地马拉军队如果没有这种外界援助，未必能如此迅速地对付游击队。然而游击队也因队员的变节背叛遭受了损失，这是一切秘密运动特有的毛病。游击队所经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可能就是一个旧陆军军曹“埃尔·加略”的背弃，此人本来是在杀了人之后加入游击队的。^①

埃尔·加略投降了政府军，非但将人物、地点等十分宝贵的情报供给敌人，并且将游击队的邮递方式也泄露了。由于他的背弃，城市与乡村间的通讯联系几乎全被摧毁了。背叛是一种日常危险，游击队战士不得不时常估计到。然而，叛变的可能发生以及事实上的经常发生，必须认为是游击战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要困难之一。

^① 吉安·拉特盖详述了这一经过细节。

七 各个游击运动的重新联合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决裂

面临着这些严重的军事失利，游击队对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开始进行一次较大的重新估价。这牵涉到起义军同危地马拉劳动党以及同容·索萨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关系。自从卡斯特罗那次在三大洲会议上对容·索萨的攻击以来，起义军的游击运动与容·索萨所领导的游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冷淡的，然而容·索萨在1966年间就已抛弃了托派对他的支持。因此，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理由使他们两个组织分裂开来；在1967年间，容·索萨同塞萨尔·蒙特斯就未来的共同策略，进行了多次的商议。

图尔西奥斯·利马之死，使可能发生的谁当未来联合运动领导人的问题缓和下来了。问题终于在1967年后期获得解决——1967年10月切·格瓦拉之死，以及加强队伍团结的必要性，似乎成为加速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容·索萨参加了“起义军”，担任领导人，塞萨尔·蒙特斯任副司令。^①

容·索萨以及来自“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前托派分子结合到“起义军”的队伍中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同危地马拉劳动党关系之间的困难。但是事实上游击运动与上级党的关系，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就已经很紧张了。到1967年末，起义军与共产党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联系罢了。1967年8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丁美洲团结会议”上，对于这种维系着的关系，私下有些批评，特别来

^① 由容·索萨和塞萨尔·蒙特斯签署的联合公报刊登在《三大洲会议》刊物上，1968年3月。

自“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因为它在前一年已经同委内瑞拉共产党决裂了。^①在拉丁美洲团结会议之后，包括蒙特斯在内的危地马拉代表团出发前往莫斯科。许多人相信蒙特斯将接受俄国的观点，这时俄国主张游击队作战略上的退却。

早些时候，危地马拉劳动党对于游击活动曾经是比较热情的，虽然它常常采取一些保留的态度。危地马拉主要的共产党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 1966 年 12 月撰文登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上说：

有些人认为：目前的政治形势，为改变党的路线提供了许多理由，把转向和平道路当作代替现行路线的唯一可能的抉择。那样想的人们，最好也不过是把斗争的形式同革命的总路线混淆起来了，或者，最坏则是把党的路线问题贬低为纯粹是战术上的事情。

党早已把党的立场讲得很清楚，但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认为确定革命的途径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斗争形式的选用则是一个战术问题。重新制订总路线问题，只能是由客观产生，是由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质的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只能是由人民的、反帝的革命的胜利才能实现。我们的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能遵奉武装行动的战略才能完成……斗争的形式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战术问题，取决于斗争的场所与各种具体情况，换句话说，取决于暂时的、不属于本质的各种因素……

如同他以前的马克思一样，列宁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

^① 鲁思·谢里夫：《西半球的革命：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一份报告》，《越南报道》，1968 年 4—5 月号。

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①假如我们应用这个基本原则到革命的人民战争(因为它只不过是起义的另一提法)上去,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采用着一种机械的态度。由于这个国家的特定条件的缘故,危地马拉共产党已采用了革命的人民战争的办法。^②

福尔图尼又把他这论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阐明,游击战争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反帝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

革命行动的稳步发展(特别是开辟新的游击阵线),决不会损害党在(建立联盟上、或)同其余左派以及所有在民众中有影响的团体、组织达成统一行动的努力。特别是劳动党,坚决不允许“革命党”(即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党)利用我们在宗派主义上的错误而赢得这些团体的支持,从而使共产党在起义军之中被孤立起来。

游击队自己早已逐渐地背离了这种立场。说实在,游击队从未同意过这种观点。但是游击队的态度与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态度之间所存在的固有的矛盾,经过相当时间才完全明朗起来。可是到1968年初,游击队已准备好进行决裂。1月10日,起义军五名最重要的领导人,从米纳斯山的一个营地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告起义军脱离危地马拉劳动党。^③

宣言列举了:自从1965年起义军临时革命指导中心成立以来,存在于游击队与共产党之间的主要不满。游击队争论说,共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0页。——译者

② 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危地马拉的政治形势》。

③ 这个宣言的全文刊登在《思想评论》上,(哈瓦那),第16期,1968年3月;宣言摘录也请参看本书附录三。

产党从最初即坚持要求在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军事领导，应该从属于他们的政治指令。他们继续说，事情演变到如此地步，以致“即使是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2月一直呆在山中的图尔西奥斯·利马本人，也被迫下山到城里去完成一些纯粹的政治任务”。

游击队反对正统派共产党的怨言，从下面这些话里最显著地表现出来：“战斗了四年之后的资产负债表如下：三百名革命者在战斗中牺牲，人民中有三千人被胡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政权杀害。危地马拉劳动党(统治集团)出主意而起义军则去牺牲性命。”

塞萨尔·蒙特斯未能参加发表这个文件的会议，但是十天以后，在1968年1月21日，他也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他的游击战战友们的立场。他写道，起义军与危地马拉劳动党最后的分裂“决不是一件意料之外或偶然的事件”。“两种思想以及对于战争、革命和人民的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两种思想和两种态度都是由深刻的阶级根源和一个历史时机所决定的。”

一方持有革命的思想，认为战争是人民的工具，是夺取政权到他们自己手里的方法，使他们得以解放，并用来干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种思想不怕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残酷的并且是普遍的。这是一种激进的观点，革命的、大胆的、朝气蓬勃的、有力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一种假革命的思想。它不相信人民有夺取政权到他们自己手里的能力；它却相信资产阶级有能力指导国家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向社会主义和平地前进，平静地发展。因此，这是一种反对战争的观点，对于赢得这一种战争的可能性持有谨慎的观点，主张掌权的资产阶级派系不断地被替代，直到后来联合成立一个组织，使左派得势而参加政府。在各种事件与人民大众情绪的压力下，这种观点只能接受一种有限的、小规模、静止的和不明

确的战争，并以此作为一种政治论据，企图使资产阶级承认它有权参加政府。这是一种投降的、机会主义的、懦弱的、过时的和消极被动的观点。

塞萨尔·蒙特斯接着表示支持其它游击队的意见，即危地马拉劳动党事实上从未明显地积极地为战斗提供过领导人：

人所共知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武装斗争中的军事行动，从未有过一次是由自称为党的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领导集团，直接地或间接地加以鼓动、指导或领导的。“劳动党”的成员们，从来不屑去学习战争的问题或其规律；他们从未试图分析人民的战斗经验；他们甚至从未忙于为战争制订一项战略计划。他们自己口头上承认，这个革命的途径是战争的途径，那么他们怎敢假装领导这个革命呢？

蒙特斯在结束他的声明时，宣布他辞去了危地马拉劳动党的职务。

我也许应该公开宣布我退出危地马拉劳动党并辞去我在该党中担任的各级职务。本声明将向危地马拉人民以及其他各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宣布我的辞职。但是我永远不会辞卸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它是通过斗争，通过战斗，并通过在意识形态上符合无产阶级的行动——即一切都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获得的，而不是由一张党证而获得的。^①

^① 把这段话对照菲德尔·卡斯特罗 1967 年 3 月 13 日的讲话：“假如在任何国家里，那些自称为共产党的人，不知如何去履行他们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将支持那些不自称为共产党，但在行动中和斗争中表现得象真正的共产党的人。”塞萨尔·蒙特斯的声明转载在《三大洲会议》(公报)上，第 26 期，1968 年 5 月。

面临着大批游击队员退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情况，危地马拉共产党人不得不匆忙地策划了一个计谋，使劳动党得以继续在口头上支持游击战争思想，但并不干什么事。他们忽然想出组织他们自己的起义军的念头，并且，为了避免混淆——或者也许是为了造成混淆——他们把它取名为“革命武装部队”(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原起义军的西班牙文起首的字母 FAR，迄今为止代表着起义军 (Fuerzas Armadas Rebeldes)。^① 危地马拉劳动党政治局 1968 年 3 月 1 日发表的一项声明，把它同游击队的分裂，说成是起义军内部的“冒险主义的少数派”与持有“团结态度”的多数派的内部分裂。它还说：鉴于这种形势，“多数派”决定成立“革命武装部队”。

很难知道这个多数派究竟由什么百分比所组成。但据游击队说，分裂导致了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50% 成员辞职，党的政治局有 40% 成员辞职。^②

“危地马拉劳动党”的一些领导人于 1968 年 8 月间访问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在同亲卡斯特罗的《最后一点钟报》的一次谈话中，说明了共产党的新立场。被问到危地马拉劳动党与重新团结起来的游击运动的分歧时，这些危地马拉人作了以下的回答：

存在着的分歧，也许可称为只是战术上的分歧，因为各个危地马拉革命组织一直充分地表明，唯一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党一贯主张的论点。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伙伴中间的一部分人，有些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同意酝酿一种人民革命战争——而人民革命战争是党主张的和起义军据此

^① 1968 年间驻危地马拉的美国大使馆习惯于把两者分别称为“近 FAR”和“远 FAR”。

^② 《危地马拉的经验》，《三大洲会议公报》，(哈瓦那)，第 31 期，1968 年 10 月。

建立起来的论点。换句话说,走什么道路不存在什么分歧,因为党从一开始就支持并且继续支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分歧关系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法问题。

当被问到危地马拉劳动党是否也相信其他共产党所持的观点,即认为切·格瓦拉追随一种错误的战略时,他们回答说,对于玻利维亚的经验,因所知不多因而不能作出明白的判断。他们断言:“我们能够向你们保证的是,危地马拉共产党和它的军事力量——‘革命武装部队’——将把染透鲜血的危地马拉变成另一个越南。”^①

^① 《最后一点钟报》(圣地亚哥),第63期,1968年9月10日。

八 美国充当的角色：大使之死与 被放逐的教士

虽然危地马拉在 1968 年并不象变成了另一个越南——即使连五十年代后期的越南也不象——但它肯定是日益浸在血泊中。刚巧在 1967 年的圣诞节之前，右翼匪帮组织之一——“白手团”暗杀了年轻妇女罗赫利亚·克鲁斯·马丁内斯。曾经当选为 1959 年“危地马拉小姐”的马丁内斯，以与左翼有联系知名。为了报复，起义军在 1968 年 1 月 16 日枪杀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头目约翰·韦伯上校与美国海军武官。起义军在一项声明中宣布，这两个美国军事顾问早已被指定要处决，因为在“美国号令下所产生”的危地马拉军事集团，曾在国内散布恐怖与死亡。声明还说：“这些搞暗杀的匪帮们所犯的灭绝种族的罪行，使得近四千个危地马拉人遭受杀害。”^①

3 月间，“白手团”为了报复，绑架了危地马拉的大主教蒙西格诺尔·马里奥·卡萨列戈，尽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清楚的。大主教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但是“白手团”的幕后策划者劳尔·斯图亚多·洛伦萨纳接着于 4 月间被枪杀在他的汽车里。

在大主教被绑架之后，政府开始意识到右翼的恐怖主义搞得太过火了。在 3 月底迅速采取的行动中，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总统把被认为右翼集团幕后操纵者的三个主要军官解除了职务。这些人包括国防部长、警察局长和卡洛斯·阿拉纳上校。阿拉纳上校主管萨卡帕基地，是 1967 年重要的反游击运动的负责人。

^① 《泰晤士报》，1968 年 1 月 18 日。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些军人悄悄地下台了。没有发生政变。但是暴行仍然没有中止。将近8月底，塞萨尔·蒙特斯的主要副手之一卡米洛·桑切斯在危地马拉城被捕，并被禁止与外界接触。为了引起人们注意他的下落，并使他免受毒刑或被杀害，起义军图谋绑架美国大使约翰·戈登·米恩。但是计划走了样。当美国大使的汽车在危地马拉城中心的雷福尔马大街上驶过时，游击队迫使他停车。大使跳下车来拒捕，他立即被击毙。起义军在一个声明中说：

今天，星期四，15时25分时，残暴、贪婪的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里的首要代表戈登·米恩大使被处决了。我们由于政治原因而试图绑架他，但他进行抵抗。我们对他的绑架，是为了对起义军司令卡米洛·桑切斯的被捕而作出的反应。卡米洛·桑切斯于24日星期六凌晨2时50分，在12区第5大道与第18街的转角地方，在政府的镇压军同起义军的两个同志的冲突中被捕的。卡米洛·桑切斯司令就是其中之一。

迄今为止，卡米洛·桑切斯的被捕是不让公众知道的。“起义军”要求释放他。他现在被监禁在11区的第5分哨所。这个哨所是由军队中的法西斯团体“白手团”、“危地马拉反共协会”等等的头目、全国警察第4团的前任头头、虐待狂者诺埃·比列加斯·德尔加多管辖的。在危地马拉，反动暴行的六千名受难者，绝大多数是在第4团这个反动的魔窟里遭受酷刑和杀害的。

美国佬大使的处决，只不过是一系列将要实行的措施之中的第一个，直到卡米洛·桑切斯司令被释放为止。“起义军”在公布司令被捕与失踪消息的同时，重申它的不能改变的决心，即同人民一起战斗，直到打败并驱逐贪得无厌的与寄生的资产阶级为止。

我们将战斗下去。

危地马拉必胜，否则毋宁死！

起义军司令部

米纳斯山

游击队之年

对游击队员来说，美国大使是他们与之战斗的力量的象征。但并不是所有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人，都是对游击队仇视的。有兄弟两人，托马斯·梅尔维尔与阿瑟·梅尔维尔，在若干年之前曾被玛丽·诺尔修道院的神父们从美国派遣到危地马拉工作。正象在哥伦比亚工作的卡米洛·托雷斯一样，他们认为与游击队一起工作，比同政府一起工作，更加与他们的基督教职业合拍。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教士也牵涉进去了。听说他们“在把富有人家的子女争取到他们的事业中来的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①

梅尔维尔两兄弟于1967年12月被危地马拉政府驱逐出境。美国玛丽·诺尔修道院院长谴责他们说，他们的行动构成了“在一个侨居的国家里，对于那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进行了个人的干预”。

但是托马斯·梅尔维尔于离开危地马拉之后，在墨西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回答说，“假如美国政府不支持危地马拉寡头政治并且不训练军队，游击战可能会自然终止，因为人民将立即逐出他们的压迫者”。

〔他继续说〕 眼看一个蹂躏着危地马拉群众的经济制度不断地达到它的目的时，难道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吗？美国正在训练拉丁美洲军队，以维持其剥削状态这一事实，不得不迫使美国公民为挽回这种可悲的形势而战斗。

^① 《金融时报》，1968年1月23日。

梅尔维尔神父宣称自己准备战斗下去，“把危地马拉寡头政治所组织的暴力制度”永远埋葬掉。他最后说，“假如美国政府不介入冲突，也就不会死那么多的人，造成那么多的痛苦。由总人口 2% 构成的寡头政治，将怕得要死，以致我们也许很幸运地毋需再继续斗争了”。

在离开危地马拉后不久，梅尔维尔写了一封信，给在美国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它很好地概括了美国对于危地马拉十年以上的干涉所造成的现状：^①

华盛顿特区，
美国参议院大楼，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

敬爱的参议员阁下：最近几周以来，由于许多暴力行动不断地发生在危地马拉这个不幸的国家里，它的名字经常登在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属下的两名美国官员被杀的事情。

在过去十八个月中，二千八百多名劳工领袖、工会组织者、学生、知识分子，甚至连普通的农民也被政府的秘密警察、军队和右翼组织杀害了。右翼团体之一“白手团”，其中干部都是警察，总部设在危地马拉城警察大楼的主楼上，承认被杀“十人中也许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各国报刊从未披露过这些杀害的事情，而被杀害者的尸体被发现和登上当地报纸时，已经很难辨认是谁了。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军事代表团主持下进行的，虽然都是秘密的。假如美国要知道为什么美国的两个官员被杀，那最好读一读关于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引文，登载

^① 引于《革命的性质》，外交委员会上的意见听取会，第 90 届美国国会第二次会议，1968 年 2 月 26 日，美国政府印务局，华盛顿特区，1968 年。

在1968年1月28日的《时代杂志》上。^①

我在危地马拉已经工作了十年以上，亲自开办了三个信用社、两个农业合作社、一个工业合作社、两个土地分配方案以及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合作联盟，帮助组织了将近十二个其他合作社，并且象危地马拉的任何人一样努力工作，以改善农民的悲惨的命运。我的成就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总是受到政府的冷淡，这还算是最好的，在最坏时总是受到政府的阻挠。假如任何方案显示了一点成功的迹象，那么“争取进步联盟”的人们肯定在那里，准备出钱以获得挂出他们的宣传标志的权利。

我写这封信，不是作为一种申诉而写的，而是提出一个警告。拉丁美洲的群众显得愈来愈不安宁了。他们的政府不要任何真正的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实现将付出牺牲地主寡头阶层的代价，而这个阶层又控制着这些政府。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我愿意这样想，即这些革命能够和平实现，但从我个人的经验知道，把人剥削到极点的2%的寡头，将不会和平地放弃他们的权力。权力必须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因此，挑起暴行的是他们，而不是穷人。

这些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用金钱豢养着国家的军队以维护他们的权力。为使这些军队现代化，美国送去了技术援助、

① 《时代杂志》写道：“韦伯与芒罗两个官员，从某点上讲，是因为韦伯在危地马拉的成功而自食其果。当那个凶狠的职业军官韦伯于十八个月之前到达危地马拉时，二百名共产党游击队正对农村实行恐怖手段。韦伯立即在五千名危地马拉军队中展开了反颠覆的训练，运去了美国吉普车、卡车、通讯器材与直升飞机，使得军队具有更多的火力与机动性，同时还革新了军队的民政措施计划。

“临近1966年年终时，危地马拉军队得以对危地马拉东北部的游击队根据地米纳斯山脉发动一次重要的进攻。为了加强进攻，军队方面还雇佣并武装了一伙伙当地的‘老百姓合作者’，特许他们杀害他们认为是游击队员的农民或‘可能的’游击队员。在暴行遍地的危地马拉，有些人对于鼓励实行这些措施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韦伯却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韦伯说：‘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共产党用了一切手段，包括恐怖，因此必须以牙还牙。’”

金钱和军火装备。去年有四架新的运输军队用的直升飞机送给危地马拉；全部由“争取进步联盟”支付薪金、购置制服与最新式武器的两千名警察，补充了武装部队。反游击战争的美国军事专家，在古巴、波多黎各与多米尼加等国的职业拷打手的帮助下，使得农村处在恐怖之中。回答是什么呢？

假如美国政府继续实行它的政策，即相信所有民族起义是由莫斯科或北京操纵的，那么它将在拉丁美洲发现：不只一个越南。

我于12月间同另外两名教士和一名修女被驱逐出危地马拉，只是因为曾参加一个聚会，在那里我们听信了游击队方面的观点。把我们驱逐出境是由美国大使馆策划的。我们一直是献身于危地马拉的穷人的。我们的被驱逐，并不意味着献身于他们的终结。援引一个伟大的美国政治家的话，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我很不愿有朝一日与美国军人作战。但假如美国的对外政策继续为保尔·沃基之流所控制，他们认为：在当地寡头政府为了保持他们的剥削群众的自由而邀请时，美国就有到处进行干涉的道义责任，那么，与美国军人作战的情况恐怕就会发生的。

我知道你正全神贯注在越南形势上。但也正应该把你的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拉丁美洲去。总之，人们似乎都声称不明白我们怎么会牵连到那遥远的国土上去的，而目前面临的很大困难是如何“体面地”把我们摆脱出来。假如越南的这样一种经验也在这里重复，那将是很可耻的。但是真正可耻的将是，成百万计的挨饿的人们，最后将意识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当地的寡头政府。只要美国不干涉的话，他们至少有希望推翻他们的腐败的政府。当美国牵连在内时，他们便不得不向莫斯科、北京或向随便什么地方求助了。

希望你在各方面运用你的威望，俾能对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荣幸地亲自见到你，并请求上帝帮助你保持勇气。

你最忠诚的托马斯·梅尔维尔

1968年2月14日，于墨西哥

梅尔维尔的信，表达了可钦佩的感情，同时几乎肯定是过高地估计了危地马拉激烈的变化的可能性。在六十年代之末，危地马拉问题的解决办法，如同拉丁美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当然是革命；但是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推移，革命变得愈益不象会实现了。在危地马拉的未来历史里，容·索萨与图尔西奥斯·利马以及塞萨尔·蒙特斯的名字，将光荣地被称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但他们的日子还未来到，时机也未成熟。



第二部分

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

一 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垮台

前几章已经提到过，危地马拉早期的游击战运动主要是由于两大因素而获得蓬勃地开展。首先，它建立在哈科沃·阿本斯的被推翻以及他的改革方案被废弃后在人民当中所引起的失望上，其次是得力于军队内部广泛的不满情绪。委内瑞拉的形势也颇相似，因此它容许一个可与相比的游击战运动蔓延壮大。在委内瑞拉，也是由于一次未遂的武装反抗而迫使民族主义的军官们加入了游击队伍。可是，如果在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 1954 年的干涉为一连串的保守的军事独裁者扫清了道路的话，那么在委内瑞拉，使随后几年蒙上阴影的关键性事件正是 1958 年初的佩雷斯·希门尼斯这样一个独裁者的垮台。但是，它非但没有在委内瑞拉历史上引进一个新的进步的纪元，这个搞掉佩雷斯·希门尼斯的人民革命，却落入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及其民主行动党的掌握，并很快地流产了。委内瑞拉游击队所得到的支持，大都来自由于接受了错误的指导而对 1958 年的革命产生了希望但又随之而感到被民主行动党执行的反动路线所出卖的那些人。

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当权十年之后，于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胜利的前一年，即 1958 年 1 月间，被加拉加斯的人民起义所推翻了。尽管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强大支持（艾森豪威尔在一个不必要的团结的行动中赠给他很高的勋章），佩雷斯·希门尼斯在其当权的最后一整年里所处的地位还是不稳的。教会背弃了他的事业也很有关系。委内瑞拉大主教拉斐尔·阿里亚斯·布兰科在其给教区教友的信中说：“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非人的

条件下。失业使许多委内瑞拉人陷于失望……我们大量工人所赖以生存的十分低微的工资是不能宽恕的……而且情况正在恶化。”^①

佩雷斯·希门尼斯试图通过在1957年12月举行的公民投票来使其地位合法化。这一次投票显示出该国有85%的人赞成他继续当权。这样明显的一种欺骗性的投票结果，只能有助于加强要求变革的热情，因而在1958年1月间一部分军方人士就开始自己行动起来了。在距加拉加斯以西约五十哩的马拉凯空军基地发生了起义，喷气式飞机在首都上空飞行，但是由赫苏斯·玛丽亚·卡斯特罗·莱昂上校领导的起义很快地被镇压了。然而，在武装力量内部激进分子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佩雷斯·希门尼斯感到不得不把他的亲近的随从当中最不得人心的成员——主要是内政部长和秘密警察头子——解除职务。

但是这对加拉加斯大学的学生们说还是不够的，他们于上一年一直在秘密地组织对独裁当局的反抗。1月14日起在加拉加斯开始了几天的骚动，而由二十九岁的记者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所领导的称为“爱国委员会”的地下反对派组织发出了要求在1月21日举行总罢工的呼吁。

据奥赫达说，要搞这一委员会的想法是于1957年6月他在《民族报》当记者时产生的。他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在独裁当局下都受到排斥）反对党的支持，而在1957年12月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②除了在民主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和共产主义者这样不同政党之间搞协作工作外，他也指导那些致力于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的工厂和学生委员会的组成。奥赫达自己是来自“共和民主联盟”的，这个党的政治色彩是接近于左的边缘的。

^① 约翰·D·马尔茨：“民主行动党”：一个委内瑞拉现代政党的演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93页。

^② 基辛斯：《当代档案》，1958年2月15—22日。

同“爱国委员会”紧密联系的有：由一个民主行动党学生阿梅里科·马丁和一个共产党学生赫尔曼·莱雷特所建立的秘密的“大学阵线”。象“爱国委员会”一样，它也是在党派间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还存在着由莫塞斯·莫莱罗作为民主行动党在里面的代表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把“大学阵线”同其他反对该政权的激进青年运动联系起来。^①所有这些在推翻佩雷斯的努力中起带头作用的学生，后来都卷入了游击战运动的组织工作。

共产党员一方面在这些人民阵线组织中进行工作，他们同时也制订他们自己的计划。后来和法夫里西奥·奥赫达在一起，成为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道格拉斯·布拉沃在1967年6月的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对这些计划有下面一段描述：

1957年底，当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将军正在欺骗的基础上来准备他的选举把戏的时候，共产党就在党内建立了我们能称之为它的军事机器的组织。有一些领导成员被指定去进行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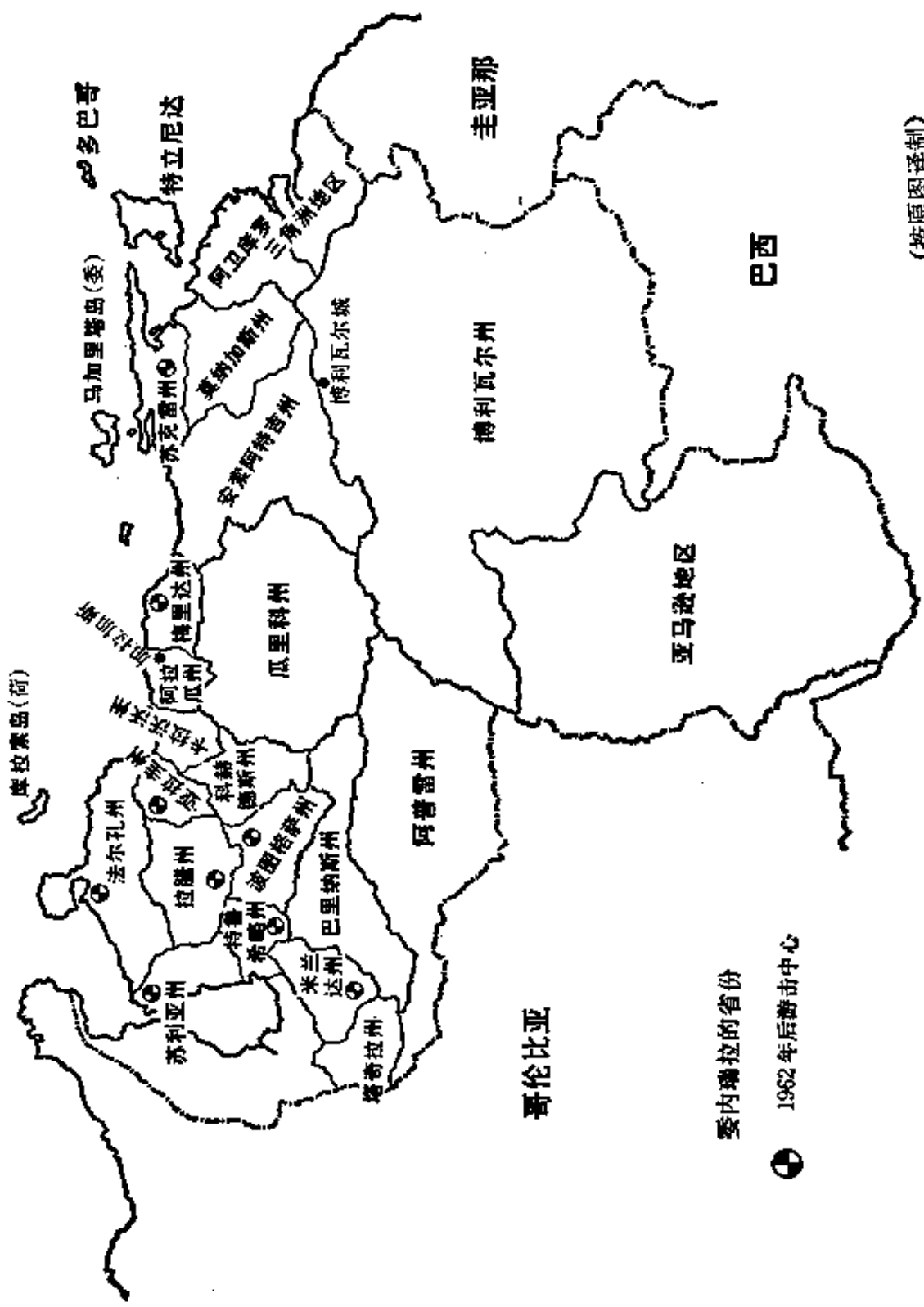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第一委员会形成了；它由一个工会领袖，一个大学生领袖和一个农民领袖所组成。当然还有其他成员。中央领导核心是由埃洛伊·托雷斯、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和我自己所领导。它组成了一个突击队，其作用是为预期在12月15日的选举时将会发生的战斗寻找武器。

第一批队伍是由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所组织成的。他们当中我要提一下被警察拷打致死的何塞·格雷戈里奥·罗德里格斯和民族解放军现在的第二司令卢文·佩特科夫。

但是直到1958年1月，这些队伍才能开始采取行动。

1958年1月，由空军军官领导的军事政变占领了马拉凯城。

^① 莫塞斯·莫莱罗：《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哈瓦那），第106页，1967年。



(按原图译制)

图 2

1月2日，政变虽被扑灭，但政府被动摇了，并且在军队里和人民当中发生了自发的运动。

1月5日，于一次在西兰西奥广场进行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中，共产党的突击队第一次对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武装部队使用了他们的武器。1月8日发生了一次甚至更大的示威。1月14日在加拉加斯举行了有来自首都下层地区大量工人参加的又一次示威。最后，1月21日的总罢工推翻了希门尼斯政府；共产党的武装小支队手持武器参加了这个罢工。^①

“爱国委员会”罢工的号召得到广泛的遵守，而经过两天巷战之后，佩雷斯·希门尼斯于1月23日凌晨就离国去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以海军总司令、海军少将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为首的五人军政府当即接管。可是，在“爱国委员会”的要求下，拉腊萨瓦尔去掉了小组里的两个上校改以两个文官来代替。^②同一天宣布的他的内阁成员全是文官，只是包括了发动马拉凯起义的卡斯特罗·莱昂上校，算是例外。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海军上将拉腊萨瓦尔（当时46岁）曾经在华盛顿当过三年海军武官，并且例行地作过委内瑞拉将同美国保持传统友谊并保护外国投资的保证。1月27日，他答应年内进行立宪议会和总统的选举。

同时在1月23日，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的流亡领袖曾在纽约会面签订了一项避免党内相互敌对、直到民主充分恢复的协议。协议是由民主行动党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博士、基督教民主党

^① 《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委内瑞拉游击队里》，游击队人员档案，马斯潘罗，巴黎，1968年，第40页。

^② 在《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一书中，莫塞斯·莫莱罗对“爱国委员会”的要求很有意见，他指出有关的两个文官，欧亨尼奥·门多萨和布拉斯·兰巴尔迪就象军人一样反动。莫莱罗显然认为“爱国委员会”可能提出比它事实上已提出的更加革命的要求。他大概过高估计了这个组织的力量。见《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第107—108页。

的拉斐尔·卡尔德拉博士以及“共和民主联盟”的霍维托·比利亚尔瓦博士所签署的。

这一项公告已经播下了将来冲突的种子。因为在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这样的人和各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在独裁统治期间仍然逗留在委内瑞拉，并认为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垮台预示着革命的变化；而后者则曾流亡于墨西哥或纽约，并认为该独裁者的逃亡只不过是一个机会，使他们能重新开始十年前停手没有干完的政治把戏。

民主行动党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并且一度是最进步的政党，但是，就象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那样，它已完全失去它那种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在流亡期间，贝坦科尔特已被公认为可能受到美国青睐的领袖。可是，这一流亡党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进行改组，而直到1958年7月4日才举行第一次主要的群众会议。据说贝坦科尔特利用了这个机会，作了一次长而动听的关于该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情况的讲话。^①

民主行动党内部的分裂差不多立即显现了，虽然不仅是存在于那些已流亡的人们和那些留下的人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一代人的分歧。最重要的反对贝坦科尔特及其密友劳尔·莱昂尼的“老保守”领导的激进分子，有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被美国观察家描述为一个“才气焕发的、坚持己见的、大声叫嚷的、说写滔滔不绝的好争论的人”）和西蒙·塞斯·梅里达（“一个顽强的激进的党人，一位马克思主义读者，并且早已是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游击战士的狂热的敬慕者”）。^②两个人都将成为委内瑞拉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人物。

受到贝坦科尔特激烈反对的塞斯·梅里达已在1957年作为

^① 约翰·D·马尔茨：《民主行动党：一个委内瑞拉现代政党的演变》，第99页。

^② 同上，第101页。

民主行动党的总书记秘密返回委内瑞拉了。他曾负责代表该党参加奥赫达的“爱国委员会”，这使流亡的“老保守”极为生气。他们不愿同共产党人搞合作，并且对“爱国委员会”的革命含义并不同情。贝坦科尔特于1957年告诉一个哥伦比亚记者：“我们并不在煽动革命。”^①

以兰赫尔和塞斯·梅里达为首的激进分子，在1958和1959两年中，一直同民主行动党耽在一起，但是，当看到该党向右急转时，他们就感到不能久留党内了。

由于当代历史学家方面的某些疏忽，大部分注意力被集中于确定：为什么在1959年1月卡斯特罗革命成功后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并没有追随古巴的型式，而只有很少人费心去过问：为什么委内瑞拉在古巴革命前一年发生的剧变并没有产生更大的革命冲力。

尽管拉腊萨瓦尔海军少将作了保持委美友谊的一切保证，在独裁者垮台后委内瑞拉人民反美情绪仍然非常高涨——部分原因是由于佩雷斯·希门尼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同特鲁希略作短暂逗留之后，就躲到美国去了。因此，1958年5月15日，当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很不成功的周游拉美结束途中抵达加拉加斯的时候，他受到敌对的人们用石块和棍棒对他的接待。加拉加斯市参议会把他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和尼克松夫人所乘坐的小汽车被捣坏了。他们险些被拖出汽车在街上挨揍。

虽然拉腊萨瓦尔海军少将公开表示：如果他是学生的话，他也会这样干；可是政治首要人物们（贝坦科尔特、卡尔德拉和比利阿尔瓦）全批评示威者没有礼貌，而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特有姿势，命令派往某些加勒比海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准备开进去（这一行动是他后来针对古巴所组织的策划的预兆）的时

^① 引于莫塞斯·莫莱罗的：《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第100页。

候，他们却没有抗议一声。^①

委内瑞拉国内似乎也处于进步状态之中。7月，卡斯特罗·莱昂陆军上校，在其他一些军官的支持下，要求重新采用报刊检查制度，并将大选推迟三年举行。于是立即号召举行总罢工来支持政府，拉腊萨瓦尔迅即迫使卡斯特罗·莱昂辞职。^②两个月之后，一群不满的军官所发动的军事叛乱被迅速地粉碎了，而工会又号召举行一次罢工以支持政府，并敦促对叛乱者采取强烈措施。这一号召在全加拉加斯都遵照执行了。

强大的人民的战斗精神似乎预示了向左的动向，而拉腊萨瓦尔少将由于希望从中得到好处，就在1958年11月4日辞去了当权的军政府首脑之职，以便作为总统候选人。就象他以前所答应的那样，选举将于12月间举行。虽然他是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候选人，可是他却得到“共和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的支持。他的对手是民主行动党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拉斐尔·卡尔德拉。

^① 同一天，正好碰上了在阿尔及利亚、缅甸和黎巴嫩等地的反美骚动和示威。对于最后这一个国家，艾森豪威尔命令派遣了第六舰队的小队前去。那天傍晚他告诉他的妻子：“可能我还得找出我的制服来，看看还能不能穿得上。”——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推行和平》，第159页。

^② 1960年4月卡斯特罗·莱昂将军在塔奇拉州发动了另一次未遂的叛乱。

二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得势

就在1958年12月选举之前，三个主要党派——民主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和“共和民主联盟”——签订了一个原则性的联合宣言，通称为菲霍角公约。该公约规定获胜一方将组织“一个没有党派称霸的民族团结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民族主义政治倾向和社会上各独立阶层均有代表”。理论上，这一公约的意图在于把现存的政治停火延长到选举的时候，但事实上它却成为压倒同民主行动党具有不同观点的对手所设置的圈套。

由于贝坦科尔特拥有一个效率较高的党的机器，因此他以显然的多数在选举中获胜了。他获得了一，二八四，〇九二票。拉腊萨瓦尔得九〇三，四七九票，而卡尔德拉居于末尾，得四二三，二六二票；93%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可是，在加拉加斯，拉腊萨瓦尔获得五对一以上的票数而获胜，在12月8日和9日两天中，由于他的支持者要想改变全国选举的结果而在加拉加斯重新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但是拉腊萨瓦尔本人呼吁恢复平静，该城市当即回复了正常。然而，次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开始掌权，他对委内瑞拉进行了扬扬得意的访问，加拉加斯居民很快地就告诉了他关于他们对贝坦科尔特的看法。数年后，卡斯特罗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的回忆：

贝坦科尔特对首都居民深为不满，他不能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给他支持，并且又如此给他难堪。

在革命的早期，在我访问我们的兄弟国家，对西兰西奥广

场在场三十万人讲话中提到贝坦科尔特名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他，因为他是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总统），广大人群当中就发出了一阵嘘声。

作为该国的访问者，使我们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我感到我不得不坚决声明我提到人名不是为了给他们嘲弄的，而正式提到选举后要接管政府的某某人，这仅仅是我的责任。^①

象雷吉斯·德布雷在他的一篇早期的论文里所指出的那样，卡斯特罗的访问对贝坦科尔特具有持久的影响。这使他相信他在自己的首都城市里是多么不得人心：

在五十年代中贝坦科尔特仍然可以相信他自己领导着一个人民反帝抵抗运动；1959年在菲德尔对委内瑞拉进行闪电式访问之后，贝坦科尔特就懂得他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他不久后对“卡斯特罗—共产主义”（这是在大陆通行的一种用语）所进行的疯狂的诬蔑，还有他的偏执狂的不正常状态，这两点事实上说明了贝坦科尔特是一个被囚禁于装甲车里的孤零零的、渺小的、精力已经耗尽的政客，这个政客1959年某一天在加拉加斯西兰西奥广场五十万人面前被剥夺了他的权力和全身武装。^②

可是，在最初几周时间里，贝坦科尔特好象在玩弄民主。11月11日，他宣布根据他选举前的诺言和菲霍角公约，他要任命一个包括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他信守诺言，他的第一个内阁仅包括了两个民主行动党成员。“共和民主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各有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1967年3月13日在哈瓦那大学的讲话。

②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革命战略的几个问题》，《美洲之家》，第31期，1965年7—8月。

三个成员，还有四个独立人士和一个军人。

但看来一开始他就决意不理睬共产党人，而这些共产党员毕竟参加过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活动的。^①1959年2月13日就职时，他在就职演说里强调“共产主义的哲学是不适合委内瑞拉的发展的”。他警告说：对于立宪当局的不敬，将受到坚决的镇压。按照这一调门，他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执政。

虽然他做满了总统的〔四年〕任期，可是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仅仅是由于他付出了令人想起佩雷斯·希门尼斯最糟糕的时代的那样残酷镇压的代价。关于这个时期，没有客观记叙的历史；革命的游击队所留传下来的叙述很自然地对贝坦科尔特存有严重的偏见。当然很容易把他们的许多叙述斥为仅仅是共产党宣传，但事实仍然是那样，即虽然贝坦科尔特是在除共产党而外的各个政治集团的正式支持下才能开始他的统治，可是到头来他差不多同国内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敌对起来，以至于无可挽回地分裂了他曾大力为之缔造的党。而且在开始时，共产党本来会很愿意支持他，是贝坦科尔特自己向左派宣战。

贝坦科尔特力量主要来源之一是他能说服局外人相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没有比肯尼迪总统受骗更甚的人了。1963年2月，当贝坦科尔特访问华盛顿，肯尼迪欢迎他时，他被说成是：

代表一个政治领袖所具有的受人钦佩的一切。您对您自己国家自由主义的领导，您对改善您人民生活的一贯的决心，您不仅为贵国本国并且为整个加勒比海地区争取民主领导的长期战斗，您和本半球其他开明和进步的领袖们的伙伴关系，这一切，使您成为我们为本国和我们姊妹共和国所希望的东

^① 我们确实可以论证：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同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斗争中，要比古巴共产党对巴蒂斯塔进行的斗争更加积极。

西的象征。①

然而，事实上在短短的几年里，贝坦科尔特已表现出他在打倒其政敌方面的能力并不稍逊于任何军事独裁者。使他旧日的同僚把他抛弃的，主要是他的那种做法。1962年春天，他深有自信地写信给肯尼迪说：

我们遵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在认真深入地对反动派和共产党员这两个集团进行打击……不耐烦的人们要我们越出成文法——甚至超越虽不成文而为尊重人类尊严所需共同遵循的法则来干。然而，我不愿意偏离委内瑞拉的根本法和我自己的良心为我所规定的道路。②

在委内瑞拉，对于在贝坦科尔特四年统治期间是否还没有超越“为尊重人类尊严所需共同遵循的法则”一点感到怀疑的，并不乏人。

道格拉斯·布拉沃在1966年墨西哥出版的对记者的谈话中解释了贝坦科尔特执政第一年所发生的情况：

1959年2月13日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接管政权的时候，他的国情咨文实际上就是对人民的宣战。可是，他们还是继续以和平方式进行了战斗。来自贝坦科尔特政府的回答是凶暴的。1959年8月4日在加拉加斯康考地亚广场，五万失业者举行的示威队伍就遭到了枪击，而前面三个提出和平请愿的工人被杀害了。

几天后，一群为支持他们的要求在加拉加斯街上进行示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第660页。

② 同上，第668页。

威的学生也遭到凶暴的袭击。有几个人被杀了。

同时，从阿拉瓜州来的一群农民开始掌管土地而被国民保卫队凶狠地镇压下去了。在为了支持他们的要求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工人们试图举行示威甚至举行室内的和平集会，但是他们受到凶暴的袭击，就象在拉古尼利亚斯那样，那里的民主行动党组织和镇压机器袭击了石油工人的集会。有几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受了伤。

在加拉加斯本地，一群学生同工人和知识分子一起为支持古巴革命在街上进行了示威而受到凶暴的袭击，有数人伤亡。

所有人民示威都被凶暴地镇压了。^①

1967年在另一次对记者谈话中，布拉沃还是谈了同样的观点：

必须认识到贝坦科尔特制订了一个反对革命和人民的明显的进攻性的战略。一开始他就和军事最高当局、寡头和美帝国主义中最反动的阶层结了盟。凭借这些联盟他可以对人民运动发动攻势。但是贝坦科尔特破坏革命运动并未得逞。群众已经获得了教训并决心继续战斗。我们还应该加上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在拉美，一个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爱国解放运动已经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者，击溃了他的军队并掌握了政权。在这一强烈的影响之下，委内瑞拉人民很快地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武装斗争。古巴人民夺权的影响不仅对我国而且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②

莫塞斯·莫莱罗（他是从民主行动党分裂出去的支持游击战争的左派革命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几年后对记者谈话时谈了类

① 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委内瑞拉紧握武器》，《事件》杂志（墨西哥城）1966年12月17日。

② 《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委内瑞拉游击队里》，第41—42页。

似的观点：

古巴革命的例子不仅对左派革命运动的诞生起到影响，也改变了整个拉美的政治结构，至少就总的概念来说是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谈论革命有三十年之久，可是在古巴，通过两年的战斗后，革命就胜利了；一方面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谈论土地改革已三十年而且他两次当政也没有对此有所作为，而在古巴，一个影响深远的土改正在进行；一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关于民族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斗争也谈论了三十年了，可是他们每一次掌权时都象懦夫般地回避这个题目，而在古巴他们就能坚决地面对美国佬的压力、帝国主义的^①压力。

古巴革命的影响对拉美究竟有多么重要，1960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上就变得很清楚了。在这会上，美国试图威胁拉美国家接受一个敌视古巴的动议，这样干立即在委内瑞拉引起了一次政治危机。委内瑞拉外长伊格纳西奥·路易斯·阿尔卡亚博士和他秘鲁的同事一起竭力冲淡这一反古巴的动议，希望古巴能被说服而签名于上。阿尔卡亚由于没有达到目的而拒绝签名，因此当即被贝坦科尔特总统召回撤职。这就激起了在加拉加斯街上的一个强大的亲古巴示威和一次严重的政府危机。阿尔卡亚博士是“共和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在那个时期这个党已经开始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比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左得多的立场。

这一年早些时候，民主行动党本身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内部危机。1960年3月，民主行动党的青年组织领导人之一阿梅里科·

^① 奥古斯塔·贝拉尔都：《同“左派革命运动”最高领导人的谈话》，《为什么？》（墨西哥城），1968年5月8日。

马丁写了一篇关于民主行动党的姊妹党、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的文章,称赞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左翼领导人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年前采取的退出该党,另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组织”的行动。^①虽然党的执行委员会命令停止撰写这样的文章,但马丁还是继续抨击贝坦科尔特总统的伙伴——哥斯达黎加的非格雷斯和波多黎各的穆尼奥斯·马林。

同时,在关于同外国公司缔结的石油协定问题上,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和该党之间有巨大的分歧。^②兰赫尔和马丁不愿意摊牌,但他们作出了退出民主行动党,另行组织新党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的决定。4月9日,在马拉开波召开的青年会议(完全不顾该党不许召开此会的命令)投票赞成组织这样一个党。^③

这一新党最初称为“左派民主行动党”,虽然后来改成了“左派革命运动”。该党的第一期刊物名为《左派》的是在1960年5月13日出版的。而在7月初召开的全国立宪会议上,“左派革命运动”自称是一个马克思党。^④

一个美国观察家指出,“民主行动党分裂的影响是有极为严重的,因为党的青年运动被粉碎了。党的领导人承认在青年运动中有整整80%的人叛了党去支持‘左派革命运动’了”。^⑤“左派革命运动”分子得到了民主行动党七十三个代表中的十四个代表和相当

① 见下面秘鲁部分,第321页。

② 兰赫尔后来告诉一个记者说:“贝坦科尔特已背叛他的所有的原则。最早时,他同左派结了盟,随后在圣约瑟之后就转向右了。如果他把石油国有化并将所得款项资助土改的话,我甚至可以接受圣约瑟宣言。”见1967年1—2月出版的《越南报道》(纽约)上刊载的约翰·杰拉西的文章:《拉美——下一个越南》。

③ 马尔茨:《民主行动党》,第180—182页;以及莫莱罗:《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第137—143页。

④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左派革命运动的政治理论和党的现状》。在莫莱罗所著《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一书中第147—175页有所概述。虽然共产党后来同“左派革命运动”一起工作了,但是它当时并不是那么热情地欢迎民主行动党内的分裂(第146页)。据一个观察家看来,委共可能较“左派革命运动”要小(《拉丁美洲的问题》,第6期,第8页)。

⑤ 马尔茨:《民主行动党》,第182页。

多的基层群众支持，包括象塞斯·梅里达和莫塞斯·莫莱罗这样的人在内。

可以料想得到，政府对于从其肉体上分割出去的这个新的躯体的反应是严厉的。10月20日“左派革命运动”的六个成员被指控要颠覆和鼓吹推翻现政权而被捕。对包括兰赫尔和塞斯·梅里达在内的其他八个成员的活动开始调查。

在逮捕后接着就发生了几天的街头示威抗议。示威者当中有许多大学生和中学里来的孩子。10月24日晚上，在国会大厦前面发生的同警察的冲突中，有一人死亡。

贝坦科尔特迫不及待地命令关闭所有学院和其他高等院校。当局关闭了学生正举行静坐罢课的加拉加斯大学，还出动了部队。随后几天又有一些骚乱，示威扩展到了工人区。到了月底，至少有六人被杀，七十一人受伤并估计有五百人被捕。

11月1日，在一次政府组织的大会上，贝坦科尔特告诉群众说：委内瑞拉不会容忍“任何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或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式的独裁统治的企图”。

如果那些最近使加拉加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处于惊慌状态的人们身上有什么可谴责的话，那就是他们利用闲逛于加拉加斯贫民区的中学生和无业的或失业的孩子们作为工具来进行颠覆活动这一事实。对待这些颠覆活动的爆发（有警官搜到的文件可资证明），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可以说是温和的。有三四天时间，几百个年轻人到处焚烧摩托车和袭击人们和抢劫财产。政府本来宁愿不去干涉，怕子弹会射到几个十四岁的男孩或女孩的身上，但是当由这些极左的人（他们是专制统治的残余和无业游民）搞的巩固而荒谬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干涉的时间可就来到了。^①

^① 基辛斯：《当代档案》，1961年3月4—11日，第17966页。

在列举政府在土改、房屋建筑和给予低收入者造屋贷款等方面的成就后，贝坦科尔特企图驳斥他称为“莫斯科和哈瓦那奴颜婢膝的追随者”所捏造的关于他的政府是“屈膝投降外国资本的政府”这种说法。他补充说：

我们是反帝的，但是我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理解为维护委内瑞拉和美洲的利益而不是要攻击美国以便为苏联扩张主义政策服务的反帝……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要保卫国家的利益，我们愿意同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进行谈判——他们要同已经意识到国家财富的存在和有着一个不再容忍饥饿工资的工人阶级的政府打交道。^①

可是，对待大学生的严酷的措施，导致了目前联合政府的终了。阿尔卡亚博士在圣约瑟会议后遭受的待遇已经激怒了“共和民主联盟”，该党的三个内阁成员提出辞职表示抗议。11月11日，内阁总辞职，十天之后就任命了一个没有“共和民主联盟”参加的新内阁。看来该党的内阁成员对美国在拉美所扮演的角色和委内瑞拉特别是在石油工业方面对外资的依赖是特别有意见的。一般地说，他们是赞成古巴革命而且不喜欢美国反对古巴的做法的。

但是此时对于贝坦科尔特的反对主要来自“左派革命运动”方面。这时该党领导人之一莫塞斯·莫莱罗对于1960年最后两个月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作了下面一段叙述：

“左派革命运动”自称为“一个符合宪法的另一党派”，意即该党已明白表示它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斗争！但是面对

^① 基辛斯：《当代档案》，1961年3月4—11日，第17966页。

漫骂和专横的措施,它就开始想到回答这些日常的攻击了。得到同样待遇的委共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

一个月后,在1960年11月份,委内瑞拉电话股份公司举行了一次罢工。政府匆匆宣布罢工为非法,根据是这一公司是公用事业。同时,政府试图用国民警卫队来镇压罢工者,他们侵入公司事务所并对工人进行威胁。这一行动引起了人民的抗议。党的领导没有正确估计真正的力量对比就开始着手去推翻政府。虽然“左派革命运动”力量不足,但该组织还是号召了群众起义。该组织指望军队内部正在发展的危机和同警察在街上战斗的人民的愤怒情绪来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他们认为只要产生了动摇政府的危机,贝坦科尔特就不可能抵抗得住人民力量的进攻。“左派革命运动”以一次起义来进行赌博。这一错误对人民力量说来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除了让“共和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参加起义外,中级和高级领导人也参加了。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了,并号召了一次总罢工。但这次总罢工始终没有实现。所以会产生这一代价高昂和严重的错误,是由于政府的经常漫骂和党领导内部有一些冒险者的集团掌了权的缘故。这一错误不在于用群众的暴力来回答一贯的暴力镇压,而是在于抱有速胜的幻想和没有考虑应用最好的办法去推动武装斗争。^①

尽管“左派革命运动”没有能利用这一点,可是革命的气氛在整个1960年11月中都存在着。最后一周,警察在催泪弹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不得不再一次开枪来镇压示威者。虽然,一次要占领无线电台的企图没有成功,可是在靠近总统府的地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战斗。学生就在大学校园里和国民警卫队大打了一仗。

^① 莫莱罗:《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第154—156页。

11月28日，贝坦科尔特再一次调遣了部队来镇压他称之为“旨在建立相仿于古巴现存政权的一次起义”。他责备“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组织了暴动，并无限期地在全国停止了宪法的保证。他说“宽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切非法的示威和罢工将被禁止。他强调，政府无意让内战爆发。要恢复宪法的保证，必须具备“和平与平静的气氛”。军方占据了印刷共产党报纸《人民论坛报》的厂，他们也开进了油田以阻止破坏。“左派革命运动”的周刊《左派》被禁止了。在随后发生的示威当中，另有八人被杀和百余人受伤。

贝坦科尔特对军队的呼吁是成功的。虽然知道军队内部有持不同意见的人，^①但在整个11月和12月事件中，军方仍然能保持对政府的忠诚，因而初期的革命被有效地镇压下去了。

贝坦科尔特在停止宪法保证后的第一次行动是针对着兰赫尔和一个共产党主要议员特奥多罗·佩特科夫的。兰赫尔虽然洗雪了所有罪名，但国会决定不给佩特科夫免罪。他以犯有颠覆罪而被监禁。其他共产党员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1961年3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所以使该党转向越来越赞成武装斗争作为推动革命最满意的方式，贝坦科尔特对共产党采取的强硬路线要负部分责任。革命先驱是“左派革命运动”而非共产党。

共产党人曾经度过了焦虑的岁月。在佩雷斯·希门尼斯时代处于非法的党，先是支持贝坦科尔特，然后转而反对他，可是该党总是希望它能对联合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向左转。比如1960年6月在贝坦科尔特遭到特鲁希略的刺客的枪击之后，共产党曾要求允许对贝坦科尔特进行访问谈话以示团结，但遭到他的拒

^① 由加拉加斯军事学校前司令何塞·埃迪多·拉米雷斯上校领导的在1961年2月20日发动的军事叛乱很快地归于失败了。然而，1月23日，当一个新宪法被采用的时候，内政部长宣布因叛乱的威胁继续存在，继续停止民权是必要的。他说，政府已得到军队内部有共产党活动的证据，并称一些前军官集团正在计划挑动混乱。

绝。^①但由于恐怕受到“左派革命运动”来自侧翼的包围，该党就开始采取更直截了当地进行反对的强硬路线，于9月份召开的第二十五次全会上鼓吹击败政府的政策，而不仅仅改变这些政策的侧重点。

随着1960年11月事件后的镇压变得日益厉害，共产党自然而然地开始用赞许的眼光来看待发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也是共产党和卡斯特罗凑合得更加紧密的时候。因此，对古巴游击战的某种狂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加拉加斯共产党人中的一些老保守分子。

但是共产党转向接受武装反对贝坦科尔特的过程是缓慢的。由于“左派革命运动”的组成、以及“共和民主联盟”于1960年放弃联合政府所引起的民主行动党的分裂，虽然促使他们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但是直到1961年晚些时候民主行动党内再一次分裂的时候，共产党才开始考虑他们也许应该去参加开创一个革命局面，使人们感到唯有依靠武力才是正确的途径。

由劳尔·拉莫斯·希门尼斯领导的民主行动党的第二次分裂，夺去贝坦科尔特的另外二十六个议员，从而使他的党第一次丧失了国会里的多数。这一分裂，加上政府在1961年10月和11月间对示威者的进一步镇压，就使得走向公开起义的倾向成为几乎不可避免。^②

^① 曼努埃尔·加比埃西斯·多诺索：《委内瑞拉·行！》，圣地亚哥，海岸出版社，1963年。

^② 1961年11月在委内瑞拉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在加拉加斯发生了左翼的示威。

三 游击战的开始

“当我们首次上山的时候，我们是较多地受到一种思想的影响的，即认为我们的战争将成为古巴式的战争或者成为同古巴游击战争很相仿的战争。我们认为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无非是两三年的事，而游击队员就是要在短期内解决委内瑞拉革命的问题。”

卢文·佩特科夫

1962年这一年在委内瑞拉，就象在危地马拉那样，爆发了第一批游击战争。反对政府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军内)加上执政党的解体，甚至使通常在时机成熟以前不轻易行动的共产党也相信革命形势即将到来。这是拉美游击运动史上一个共产党由于相信就列宁主义意义上讲，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应该支持游击战，因而采取了这样行动的唯一事件。

委内瑞拉最积极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就是道格拉斯·布拉沃，他是法尔孔州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他生于1933年3月。他曾在水泥厂工作、学法律、并且是一个有战斗性的青年共产党员。同埃洛伊·托雷斯和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一起，他曾经是共产党在1957年10月为帮助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而秘密组织的突击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还曾是1959年6月以恩里克·希门尼斯·

莫亚为首的命运不好的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远征队的组织者之一。^①

在1961年的几个月期间，他曾在位于该国东区的图里米基雷山脉，还在西面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湖之间的拉腊州的山脉里秘密组织对游击运动的支持。同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其他领袖一起，他决定当时已经到了可以转移政府对城市注意力的时候了。直到那个时刻，城市运动在政府镇压之下，还是首当其冲的。然而布拉沃指出，游击战争的爆发，并不是由于革命者有着为武装斗争而武装斗争的思想，而是因为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前进道路。^②这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的一个步骤。但直到1962年初，一般群众，特别是军队里才意识到游击队伍正在一些不同的州里形成。

当时在委内瑞拉工作的智利记者曼努埃尔·加皮埃西斯在他所著《委内瑞拉，行！》一书中，对游击运动的开始作了下面一段描述：

正在组织游击小队的最初的一些迹象，是被陆军在1962年1月21日发现的，当时他们正在本国东部苏克雷州“拉斯·加拉帕斯”大庄园进行一次巡逻活动。有两个人被捕和一些训练物资被缴获。三天后，在同一地区的图里米基雷地方，另一有射击场和直升飞机停机坪的训练营地被发现。袭击该营地时，被发现的九个人被捕。

从那时起，这种证据就开始多起来了。1962年2月20日，在法尔孔州接近圣克罗斯·德布卡拉尔地方，一辆载有军事设备和供应品的吉普车被缴获，车上的人逃走了。一周以后，

① 加皮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21—223页，以及序言，第11页。

② 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委内瑞拉：道格拉斯·布拉沃》，《事件》杂志（墨西哥城），1966年12月24日。

这一事件导致了在名叫阿瓜林达地方的九个人的被捕；吉普车上的供应品就是给他们的。3月1日，在安第安地区的一个游击队中心被发现。当场，有十四人被俘（有六个学生、六个农民和两个工人），其中两人在发生冲突中受伤。这发生在梅里达州的拉阿苏利塔地方。同一天，在委内瑞拉另一个角落，波图格萨州的埃尔查拉尔地区，陆军对向比斯库奎方向行驶的一辆吉普车开了火，击毙了一个车上的人。三天之后，他们俘掳了在比斯库奎进行秘密训练的二十三个人。3月24日，在特鲁希略州的阿瓜比瓦地方，另一个营地被发现了。开火后，一个游击队员被击毙，而另外五人被捕。同一天，在亚拉圭州塞罗·阿苏尔地方，游击队同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①五个游击队员和一个下士警察被击毙，十七个游击队员被俘和一个国民警卫队中士受伤。

1962年4月1日，游击队第一次出击。这是发生在该国另一部分的拉腊州。^②

一支游击分遣队袭击了位于乌莫加拉·阿尔多和乌莫加拉·巴奥镇之间的一座原料和车辆仓库（属于公共工程部）。在射击中，仓库看守人被击毙。于是，游击队就用缴获的车辆去袭击乌莫加拉·阿尔多镇的警察所，击毙了一个警察并在撤退时带走了大量的装备。陆军立即展开了一个钳形攻势，其结果是死七人，伤五人，并有二十一人被俘，大部分是涉嫌帮助游击队的农民。陆军在被放弃的一个营地上缴获了发电机和发报机各一部。

4月3日，有十五人被捕，他们被控准备袭击在图里阿莫地方的军事基地。陆军声称他们是来自在加拉沃沃州比里希

^① “亚拉圭阵线”是受特奥多罗·佩特科夫的兄弟卢文·佩特科夫的指挥的，前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于1961年被监禁。

^② “拉腊阵线”是在卢纳尔·马克斯和阿基米洛·加瓦尔东领导之下。

马地方活动的一股游击队。

4月16日，在米兰达州埃尔霍皮托和马卡尼罗地方，其他营地又被发现，有十一个游击队员被俘，其中一人受伤。

在所有这些军事行动中，陆军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六挺冲锋枪，三十七支步枪，十六支猎枪，三支手枪，二十四支左轮手枪，二十一只手榴弹，四千七百三十三发子弹和一百九十三包炸药。

游击支队在该国的其他部分继续崛起：

拉古莱勃拉山丘(米兰达州)

德拉奥萨荒地(梅里达州)

阿罗亚山脉(亚拉圭州)

圣路易斯山脉(法尔孔州)

拉斯帕尔马斯山丘(在特鲁希略和苏利亚州之间)等等。

起先游击队运用的战术是在该国不同地方建立基地或中心点以便分散政府的力量。但虽然看来这个思想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可是这也使游击队阵线不得不分散其精力、武器、给养和人力。这样反而削弱了他们自己而使供应工作复杂化起来，供应品得从城市运来，要到游击支队取得农民的信任，能在粮食方面自给的时候才能不这样干。有些支队（就象在拉阿苏利塔和阿瓜比瓦的支队）遭到了陆军的破坏而另一些则化整为零去加强那些在山区建立起来的比较成功和稳固的基地。^①

这类较稳固的一个小组，就是道格拉斯·布拉沃领导的“何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21—223页。

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游击阵线”^①。虽然他曾在1961年晚些时候被俘监禁，可是他在1962年3月设法脱逃，并设法返回了法尔孔州。

埃利亚斯·曼努依脱·卡梅罗也是属于“奇里诺斯阵线”的，他在1962年6月普埃尔托·卡贝略地方的军事起义之后就离开了陆军，他被称为“埃米利亚诺”，还有老游击队员和“考迪罗”（区领导人）多明戈·乌尔皮诺，他曾越狱逃走^②而在“因迪奥”的化名下展开活动。

“奇里诺斯阵线”第四位重要成员是法夫里西奥·奥赫达，他是1962年7月份参加的。他是在辞去了1958年以来就担任的委内瑞拉国会中“共和民主联盟”的议员的职务后上山去的，由于他作为实际上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的“爱国委员会”头头的地位，又由于他作为远非革命的“共和民主联盟”的一个成员的无懈可击、令人尊敬的经历，奥赫达便成了曾经和委内瑞拉游击队发生联系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

1962年10月12日上山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同其他四位游击队员一起被俘并被判处监禁十八年。^③在狱中，他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我被指控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代理人，重金受雇于（古巴）叛乱军。但是，我的指控者知道这些完全是迷惑人民的无耻谎言，这些人民在许多场合都对我们表示爱戴和信任。就像我在《给德鲁·皮尔逊（一个殖民主义雇佣的记者）的公开信》

^① 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是1795年同一地区发生的奴隶起义的领袖。

^② 他被监禁是由于被牵涉到关于1950年时暗杀佩雷斯·希门尼斯军政府主席陆军中校卡洛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的案件中去（该军政府在1948年曾赶走民主行动党主席罗慕洛·加列加斯）。

^③ 一年之后，在1963年9月15日，奥赫达作了一次惊人的越狱行动，与卢文·佩特科夫和格雷戈里奥·卢纳尔·马克斯一起从特鲁希略监狱逃跑而同游击队重新会合。

中说到的那样,我现在和过去只不过是,将来也不过是一个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委内瑞拉人民的战士。就这样,我拿起了武器,抛弃了城市的舒服生活,离开了国会,离开一切东西去争取国家的尊严,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我和其他人被指控要让古巴革命的一切全部输入到委内瑞拉来并且要复制照搬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些人,其中有贝坦科尔特总统(我提到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并且甚至还是共产党的一个著名的党员)。很清楚这种说法是荒谬而十分可笑的。所有研究革命理论的人们,其中不用谦虚也包括我自己,都知道不同的形势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过程。他们知道委内瑞拉不是古巴,而委内瑞拉的形势和前景是不同于古巴的。^①

1963年8月,在一封《狱中来函》中,他就委内瑞拉革命的性质发表了进一步的谈话:

武装斗争,作为我们所选择的道路的根本部分,不仅是在牺牲中和日常斗争中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愿望和关心的产物,而且也是明白而准确的客观条件的产物。它尤其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形势的表现,而不论多么迟钝的人都不能眼看这一形势而无动于衷。我们本来希望用非军事的方法能和平地决定委内瑞拉的命运,因为这一解决办法可以避免损失宝贵的生命和破坏工具和资源,以用之于进步和发展。但是不幸得很,统治阶级使用了一切办法来加以阻止。因此我们的人民除了使用暴力外,别无其他办法了。……

今天委内瑞拉是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它是一个遍地革命战士,充满严重危机的动荡不定的国家。这一危机使斗争两极化,分成两个潮流,即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维护进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29页。

步、解放和正义的各集团；另一方是保守的殖民主义的和压迫人的各集团。这不是象我们边界内外的许多人借口说成是一个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问题，这必然会把解决的办法限于意识形态方面；更不存在任何所谓“古巴革命的输入”问题，或者是什么把其他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特点所运用的方式方法照搬到我们国内来的问题。非常清楚，委内瑞拉的前景是一次适应于本国的结构，它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生活的民族主义革命，其主要路线也就是受到美帝渗透的那些国家的路线——美帝控制和剥削主要资源，它就凭借了这一经济上的控制来阻碍一项符合人民集体愿望和情绪的政策实现……

委内瑞拉的历史经验，必须加以制服的敌人的力量，以及所谓“合法的代议制的民主”的全无效果（这在过去五年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使我们的人民得出结论，即唯有通过武装斗争即革命行动才能达到民族自由、独立和发展的既定目标。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允许人民去掌握政权、取得废除非正义、特权和奴役制度的一项民主的人民的政策。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

于特鲁希略监狱，1963年8月^①

继法尔孔州的“奇里诺斯游击阵线”之后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游击队伍名叫“埃尔查拉尔”，这一支队伍活动于更南面的波图格萨州。其领袖名叫胡安·维森特·卡维萨斯，他是以“巴勃罗”知名的一个工程师。在1962年8月27日的一封信里，卡维萨斯概括叙述了他的部队所面临的困难：

3月2日，当“埃尔查拉尔”开始军事活动的时候，我们是

^① 《政府公报》(波哥大)，第三年，第16期，1966年7—8月，第23—24页。

比较弱的，我们人比现在少，武器也少。我们甚至不熟悉这些山脉，也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取得农民的信任。

我们还不是真正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同政府的军队相比，我们的人数较少。同他们的武器相比，我们等于没有武装。那么，为什么贝坦科尔特要破坏我们呢？他之所以要破坏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情况，而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明天。^①

这时，同卡维萨斯一起在埃尔查拉尔阵线里的，还有另外两位卓越的游击队员——卢文·佩特科夫和何塞·曼努埃尔·萨埃，两者都是游击运动在此阶段正在吸引来的那一类型领导人的代表人物。卢文·佩特科夫（共产党员特奥多罗·佩特科夫的兄弟）解释了什么使他采取了革命的立场：

直到 1961 年 3 月以前，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商人，一个印刷厂的业主。我艰苦地设法支付了六万五千元玻利维亚银币这一小笔资本，而支付这笔资本确是很不简单的事，如果考虑到做买卖所经受的灾难性经济处境的话。尽管这样，我的工作使我过得还不差，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从来没有付不起我对进口商行和造纸厂等的债务。可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有一天，政府拿走了耗费我那么多劳动和精力的东西。他们使我丧失六万五千元玻利维亚银币并使我养不起我的家口。政府认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不应该拥有印刷厂，因此他们闯进了这个厂并逮捕了工人，这些工人仅仅由于他们在一个共产党员所有的公司里工作而受到六个月的拘押……^②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 227 页。

^② 同上，第 227—228 页。此外，凡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都被撵出民主行动党工会，而且贝坦科尔特亲自出马解雇了公立学校系统里的七百二十个共产党教师。见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共产党是如何计划来争取拉美的》。

佩特科夫兄弟是欧洲移民的儿子。他们的父母亲虽已多年定居委内瑞拉，但父亲是来自保加利亚，而母亲来自并入苏俄版图的波兰。从童年起，卢文就在他父亲的印刷厂里工作。1962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为我们对他作了如下的描绘：

他的不安定、反抗现实和主持正义的性格，使他什么工作都干过：公共汽车驾驶员，委内瑞拉平原上的伐木者，拳击经理人，驯野驴者（驾驭它们）和农民。我们可能会说：不安现状是卢文·佩特科夫青年时代的主要动力。但在同时，这一不安现状心理和反抗精神（也可以讲是不自觉的），连在一起去反对委内瑞拉当时盛行的和现在仍然盛行着的社会秩序。此外，正是这一不安现状心理，驱使他去接触人民，并去寻找他目前以坚定的信念所走的道路。^①

比起“埃尔查拉尔阵线”的其他游击队领袖来说，何塞·曼努埃尔·萨埃出身于寡头势力较大的家庭。他的父亲巴勃罗·萨埃·佩雷斯是民主行动党的一个知名的成员，还是法尔孔州的州长。他曾鼓励儿子从政，但在1960年民主行动党分裂时，何塞·萨埃宁愿跟随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去参加“左派革命运动”。他于1962年参加了游击队，这在委内瑞拉社交界中引起了一些哄动，因为他在上山前同他父亲公开交换了信件，告诉这位州长，他不能再同对屠杀委内瑞拉人民负责的人共同生活了。

1962年秋，切马少校——何塞·萨埃以此知名——被俘了。贝坦科尔特向他的父亲建议把这个孩子放逐出去，可是州长坚持

^① 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在委内瑞拉：唯一的道路——武装斗争》，《事件》杂志（墨西哥城），1966年12月31日。

要让军事法庭来审讯他。他被判有罪，并宣判十八年监禁。^①在狱中，他又给他父亲写了信：

今天我在为一个没有迫害和贫穷的逼人痛苦的新生活而战斗的人们当中占有一个卑微的地位。我正在干着的一切也曾一度是您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您也曾为此受过迫害。我一刻也没有背离过您关于要起来反对独裁者的教导。的确，我们现在彼此站在不同的一边，但我占据了您留给我的位置，使我感到骄傲。每天对人民犯下各种罪孽的士兵和警察有成千上万。他们真正需要这么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一小撮疯子”吗？您也知道所谓“托贝斯行动”的规模竟如此之大，以致连美国殖民军队的军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都参加进去了，践踏了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我们的解放者^②的最好的遗产。……人们可以理解：真相之所以没有透露出来，是因为您和其他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部队中有许多人开了小差，有一些士兵和军官拒绝去打他们的并肩战斗的兄弟。有数十个市警察局成员已经辞职，在警察总局这类机构当中严重缺乏纪律的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为什么轰炸和空中扫射的执行情况同高级军官所命令干的情况有所不同的缘故……

我对您的行为确实感到遗憾。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看着您和他一起垮台，显然并不担忧，这是自然的，可是这使我很伤心，因为我是您的儿子。请设想：被绑着身子、铐着手、又淋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行走十五个小时之后，被带到俘虏我

^① 两年后，在贝坦科尔特下野后，何塞·萨埃被赦，其父亲便把他送到伦敦去念完经济学。可是，他返回委内瑞拉后又去参加游击队。1967年3月初，在米兰达州加拉加斯同军队进行冲突当中他受了伤，两星期后被杀。他的尸体交给其父，埋葬在法尔孔州自己家里所有的土地上。见巴纳德·L·科利尔撰写并刊载于1967年3月26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② 一般指圣马丁和博利瓦尔等美洲大陆的解放者。——译者

的部队司令部里您的面前，我会有什么感觉和想法。请设想：当军事法庭检察官用您所提供的证据对我提出控告时，我会感到多么愤恨。如果我被判监禁十八年的话，那是因为我已经能够理解到迫切需要委内瑞拉的现状进行一次民族主义的改变，以便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①

另一颇为重要的名叫“西蒙·博利瓦尔”的游击小队，活动在拉腊州，是由蒂尔索·平托和前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领导人赫尔曼·莱雷特所领导的。后来，遵照党的指示，这一小队撤退下来而按兵不动了。

虽然游击队活动于该国半数的州里（差不多活动于二十条战线上），可是缺乏统一指挥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② 尤其是，在活动于农村的游击队和活动于城市的、主要是在加拉加斯的战术攻击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所有参加这个早期的游击冒险事业的人，都指出它是没有计划好的，而大部分游击队员都是狂热的学生，他们都受不了游击战争的艰苦。道格拉斯·布拉沃后来写了下面的评论：

① 《号角报》（加拉加斯），1963年2月12日，引自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32—233页。

② 雷吉斯·德布雷在这个时期曾作过下述评论：“1962年后，游击队中心的数量突然增加；这是一种人为的发展，而并不等于游击运动、也不是其进攻能力的真正的发展。实际上，这一勉强的发展（是没有单一司令部的原因和结果），反而削弱了游击队，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游击队在树立自己成为政治—军事的先驱者以及为自己最后（在1966年）提供一个单一的司令部方面进展迟缓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这一自发的、无秩序的‘中心’的扩散（其人员都未经训练而大部分人在开头几个月间就被歼灭），清楚地表明委内瑞拉游击队当时还不是一个按照一个成熟的行动计划进行活动的统一的运动。在（法尔孔、拉腊、特鲁希略、东方各州）第一次攻势后还能幸存的‘中心’当中，没有一个能具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以催化其附近地方的阶级斗争的。这样，直到最近为止，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心’能作为巨大的力量与由现有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分散的权力中心相匹敌。缺少一个真正有权威、有影响的单一的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驱使各阵线变得分散，而这个分散状况又延迟了一个单一领导的到来。”——《革命的革命？》，第79页。

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过份冒险了。虽然我们常讲到战争是旷日持久的，可是当时我们所运用的是象进行政变那样的突击的战术。我们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在一两个战役内把贝坦科尔特推翻，其结果却带来了影响很大的失败，从而阻碍我们安静下来去建立一支游击军队。我们把过多的部队投入了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斗争。^①

德布雷批评了在一大串“中心”处于不同地区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斗争的决定：

对于在这样广阔分散的地区进行活动的游击队提供必要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心之间常常没有政治或军事上的联系。许多这样的尝试，几乎只有学生参加，由于缺乏经验和严格的军事上的准备，不了解地形和没有保守军事机密，以致其结果是悲剧性的。^②

可是，在大部分游击阵线遭到严重失败之后在接近 1962 年底的时候，其中有两三个阵线就开始重振旗鼓，并逐渐表现出一些能持久下去的迹象，特别是在波图格萨和法尔孔两个州是这样。比如活动于乌莫卡罗斯的小队被打败了，但阿基米洛·加瓦尔东承担了在拉腊州组织一个新的运动的任务。这些新的游击队员和老的留下的人员合起来——在阿尔及利亚同名部队的鼓舞下——组成了民族解放军。

虽然游击队里有共产党员，但“左派革命运动”和“共和民主联盟”的成员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游击队还得到军队

① 《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一起》，第 43 页。

②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

当中进步成员的参加。1962年发生了两起反对贝坦科尔特的大的军事起义，使左倾的民族主义的军官参加了游击队伍。

1962年5月4日，委内瑞拉一个海军上校，赫苏斯·特奥多罗·莫利纳在四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协助下，占据了位于加拉加斯东约二百五十哩地方的卡鲁帕诺海军基地。他“对军队、人民和这个国家”广播了下面的宣言：

卡鲁帕诺卫戍司令部通告委内瑞拉人民和战友们，今天，5月4日清晨，我们同人民武装力量一起，决定对这个国家正经历的悲剧性的形势，采取负责的和爱国主义的态度。我们国家中的少数人集团——他们直接从光辉的1月23日民主阶层和军队所作出的英雄主义的努力当中得到好处——以其过份行为把我们国家剥削到了极点，使国家陷于赤贫和分裂状态……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战斗中取得的民主，都从我们人民的手中骗走了。我们不再能听任人民所遭受到的无数的虐政、武断行为、屠杀和拷打来破坏委内瑞拉人民之间的安宁与和睦。这一国家在贝坦科尔特恐怖统治下，正又一次经历着分为两个集团的分裂状态：享有一切保证的人和一无保证的人；受迫害者和迫害者；被监禁者和监禁者。一种歧视人们的无耻的形式把应当属于民主国家所有公民的权利砍掉了。唯有对那些无条件支持这个政府的反民主倾向的集团，宪法保证才真正起作用。国会作出的主要决定被忽视了。人民赋予自己作为人民意志的自由表现的民主政权，并不起作用。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社会各阶层已多次加以公布。经济危机、浪费公款、把国家权利不负责任地抵押出去、政府的腐化和无能，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这一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危机。富者和穷人同样受到了影响。为了平息人民的抗议和不满……贝坦科尔特及其一小撮正在试图运用军

队作为其驯服的镇压工具，重新打开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缺口（这是以前各政权所具有的特点）。我们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民主制度，使宪法真正具有权威，所有委内瑞拉人民的权利和国会的决议受到尊重。这样，在这一真正民主自由的范围内，国家才能重兴经济，为数十万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提高委内瑞拉人民的收入，实行真正的土改，并在更高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其经济。在这一恢复民主的决不退让的决定中，我们还得到军官们、军士们、海军陆战队员们以及驻在本基地的“军队支援团”的支持……

司令员赫苏斯·特奥多罗·莫利纳·比列加斯
陆军少校佩德罗·维加斯·卡斯特昂
陆军上尉奥马尔·埃切维里亚·谢拉
其他九人

加拉加斯 1962 年 5 月 4 日^①

尽管有这些豪迈的语言和他们良好的意图，卡鲁帕诺的起义者没有能长期地继续存在下去。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政府飞机扫射了电台和机场之后，莫利纳·比列加斯海军上校就被迫投降了。起义的重要性在于受到共产党的支持这一事实，该党通常是不愿意让它的名字同军事冒险主义联系起来的。在委内瑞拉国会里所作的演讲当中，共产党议员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解释了该党的推理：

在卡鲁帕诺事件中，我们党的立场是符合党中央一直执行到今天的政策的。5月4日军官们发表的纲领显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显然是一个不符合我们的政治组织所采

^① 共产党参议员庞佩约·马克斯在委内瑞拉参议院的演说中曾加以引用，并转载于《卡鲁帕诺之战：处于斗争状态中的委内瑞拉》，（布拉格），1963年。

取的联盟和立场的纲领。5月4日军官们的纲领是影响深远的、民族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是一个号召全体委内瑞拉人民为争取民主建设而努力的纲领。一方面我们并不同意该纲领的每一个具体方面，但我们要对此纲领总的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我们要支持这一纲领。我们要表示5月4日军官们对委内瑞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已经搞出了一个团结全体委内瑞拉人民的纲领。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我们的党接受5月4日的纲领。我们党将为实现卡鲁帕诺军队5月4日纲领的实现而战斗。5月4日军官们不是卡斯特罗主义者，没有在我国建立一个卡斯特罗主义的政府的意图；他们的宣言表明他们是愿意接受国会的决议的。我们愿意声明：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愿意同5月4日的军官们携手共事，因为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宣布过要建立一个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式政府的复制品的意图。^①

在卡鲁帕诺海军基地短暂地被占领之后，政府立即开始搜查了加拉加斯共产党的总部，并逮捕了一些党员。5月10日禁止了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活动。在确不定起义军官是否得到共产党同情的同时，政府对卡鲁帕诺起义会产生的可能的反响肯定是很紧张的，而且是有理由的。

一个月后的6月3日，在加拉加斯以西七十哩的卡贝略港的主要海军基地上爆发了又一次起义。这一起义的领袖是基地的副司令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和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上校。经过两天的战斗之后（据《纽约时报》一记者说是几年来在委内瑞拉所目睹的伤亡最为重大最野蛮的战斗），起义者被迫投降，虽然有一些人设法逃上山去。非官方估计认为政府的损失超过二百人，而起义者甚至遭受更大的伤亡。

^① 转载于《卡鲁帕诺之战：处于斗争状态中的委内瑞拉》。

就象这一年早些时候爆发的游击战那样，军事起义也是没有作好准备的。原先，持异议的军官曾计划使几个民族主义的卫戍区在该国的各地同时起义，据德布雷认为，这

将作为在加拉加斯和其它主要城市发动群众行动的信号。这计划被政府安全部门揭露了，而被认为是危险的军官和联队在预定日期之前不是被调走就是被监禁了。如果卡鲁帕诺和卡贝略港确是在1962年5月和6月起义了，那是仅仅出于绝望情绪和为了维护(军人)荣誉才这样干的；因为许多人并不想为了还没有发生的起义而进入并殒毙于监狱里。^①

可是也不能把这些起义想象成仅仅是简单的军营哗变。他们在全全国引起了深刻的反响。1962年6月6日，委内瑞拉国会通过了一个动议说明军事起义是“一种不容怀疑的迹象，表示军队的团结已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公共生活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暴力已开始反映出来了”。该动议继续说：起义的根源在于全国所遭到的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影响，所以有此影响，是因为政府不能加以解决，以及政府的管理无能和一贯依靠暴力镇压和在处理公共事务中的采取了党派徇私舞弊的手段。^②

德布雷在结尾中说，军事起义

加速了军队中民族主义左派和战斗的平民这两方面人的会合……但是成就不过这些。要达到即使是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已经存在着的一个平民组织，该组织有其自己的目标和资源，离开军队的人可以加入进去；在委内瑞拉卡鲁帕诺海军陆战队起义之前，法尔孔和拉腊两州已经存在一个游击队的

①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

② 曾引用于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42页。

“中心”了。^①

逐渐地，被打败的士兵们真的奔向各个游击战线，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的力量。起义中失败的军官们是天然的游击的兵源。那些在委内瑞拉的人发现（正象危地马拉的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容·索萨所发现的那样），要再回到平民生活中去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对于具有先进政治思想的人们来说，只有游击队的营地才是唯一的藏身之所。

从军营过渡到游击队营地不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整个军队没有对民族主义军官的呼吁作出反应这一点，必然会使革命者本身重新思考一番。德布雷作了解释说：

委内瑞拉革命者似乎已经从这一挫折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不能期望陆军（即使是其中最最有决心和政治上有觉悟的分子）在革命中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还要克服那些仍然受军队组织控制的许多军官和士官们的抵抗行动：比如，他们不愿意保持机密（军人间的同志关系或者是帮会式的团结关系往往凌驾于政治的分歧之上）或者不愿意放弃军人的荣誉观念——简言之，即不愿接受革命的谦逊。这样，卡鲁帕诺起义者就拒绝向邻近蒂格雷的油田撤退——这里他们本来是可以躲开炮轰而得救的——并拒绝自行解散，借以保存未来人民军队的干部……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向政府部队屈服。^②

尽管如此，确有一些可尊贵的人设法逃奔到游击队那里去。这样的—一个军官就是埃利亚斯·曼努依特·卡梅罗，他成功地同法尔孔州道格拉斯·布拉沃的“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阵线”

^① 雷吉斯·德布雷：《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

^② 同上。

取得了联系。他本来是一个陆军上尉，就差一个月即将被提升为陆军少校，可是卡贝略港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由于他能作为引导其他军官开小差的宣传来源，他立即变得对游击队很有用处。象在危地马拉那样，游击队员竭力不去同陆军闹对立。埃利亚斯·曼努依特从法尔孔山地给他过去的战友们写了下面的信：

你们诸位，我的永恒的兄弟们，都知道我在这里的唯一的理由，是出于对我们国家的衷心的热爱，因为我从来既没有追求过财富，也没有——将来也不会——让我的双手沾上过人民的鲜血。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迫害浪潮的影响，但我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我的妻儿……我非常幸运地能及时理解到现在是作出牺牲的时候了，是离开舒服的生活的时候了，因为国家要求我们这样做。现在已经到了要对我们的“解放者”在地下一直向我们发出的号召作出回答的时候了。光辉的解放军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并为所有的人民争取幸福而建立起来的。我们拥有主权吗？在这一各国参加的音乐会里，今天被卖国贼统治的我们国家没有它自己的歌声，没有委内瑞拉的歌声。它的政府继续无耻地追随和听从其新主子的意志，日甚一日地抵押和损伤我们的主权，破坏我们最神圣的传统。^①

虽然波图格萨州的埃尔查拉尔阵线的领导人胡安·维森特·卡维萨斯自己并不是前军官，但他同样曲意地要对陆军表示友善。^②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 229—230 页。

^② 德布雷作了下面的评论：“敌人反复宣传了一个主题说‘卡斯特罗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现在这样的军队，当然它没有明确地说出应该怎样去理解‘消灭’。在委内瑞拉，这种宣传终于离间了某些同情革命的职业军人，出身民间的青年军官。因此，民族解放军不得不在秘密报刊上强调，民主的委内瑞拉需要有另一种型式的军队，一切善良的人在其中都将有他的地位。他们说明不必一个个地把所有职业军官的肉体消灭掉，也不在有朝一日把他们辞退不用，而仅仅在于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为镇压工具的军队加以消灭。”——雷吉斯·德布雷：《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

当然，在危地马拉，处于托洛茨基主义阶段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曾警告说：犯有镇压罪行的士兵将受到“无情的惩罚”。（见本书第 67 页。）

1962年8月中旬，他听到部队正计划向他在山上的隐蔽处进发的时候，就给司令官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着军队的，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民主制度，他们从来不为个人和党派服务。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向正规军队开过火，只不过是回敬了警察总局发动的袭击，该局是人所痛恨的极权主义的产物。我们还是继续执行这一项政策。今天我们已经命令所有在利维塔道拉山区的游击部队不要同现在动员起来的正规军交锋，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流血地进入这个山区。这个自愿地同意的停火是在今天19日(星期三)零时开始的，并且应被解释为我们方面为避免贝坦科尔特和警察总局希望看到的兄弟之间的残杀所作出的新的努力。停火以警察总局不进入利维塔道拉山区为条件。^①

这一次政府军和警察总局的部队同卡维萨斯的士兵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当远的距离。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34页。

四 民族解放军

委内瑞拉革命运动在 1962 年遭受的挫折是严重的。军事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加拉加斯的战术战斗队被杀掉多人，而在有一些战线上游击队本身也被消灭掉了。尽管如此，鱼龙混杂的各式各样的反对者身上仍然还遗留某些热情来继续对贝坦科尔特政权展开斗争。对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支持，首先来自卡鲁帕诺起义后被宣布为非法的共产党。该党改信武力为时本来已经迟了，此时要运用合法手段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1962 年 12 月党的全会上正式通过了“武装斗争”的政策。

“左派革命运动”处于类似的情况，它象共产党一样也被宣布为非法，它放弃以前那种组织起义的决定，也没有什么好处可得。

第三种人是 1962 年未遂政变后离开陆军投奔游击队寻找安身之所的那些陆军军官和士兵，他们对改行不感兴趣，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游击队能对他们提供他们曾为之受过训练的职业。

这一奇特的联盟——献身的共产党员、乌托邦式的激进分子和不满的军官——在 1962 年过程中全都卷入了某种游击行动中去，而各运动的领袖们就于 1963 年 2 月 20 日在加拉加斯聚首，正式建立了“民族解放军”。他们签署了下列文件：

司令员们和经适当地授权的代表们代表下列团体签署这项文件：

“5 月 4 日运动”(卡鲁帕诺)

“6 月 2 日运动”(卡贝略港)

“文人军人联盟”

“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游击阵线”(法尔孔)

“游击解放阵线”(埃尔查拉尔)和由民族游击指挥部所代表的在拉腊、亚拉圭、安索阿特吉、莫纳加斯、巴里纳斯、加拉沃沃、苏利亚、瓜里科和联邦区等地的战术战斗队和游击队的部队。

鉴于：

现政府已背叛了作为其选举基础的原则，置身于民主主义信仰之外并违反了国家宪法，

官方政策已经把国家引入一次严重危机，它正在破坏委内瑞拉大家庭的团结和平，并威胁着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根本基础，

如果允许现有统治集团利用骗人的选举继续执政，爆发出来的暴力势必形成一场内战，

根据国家宪法规定和普遍承认的原则，起来反对专横地滥用权力是我们的本分，特别是职权的滥用业已导致建立了一个独裁的、分裂的和反民族的政府，我们处于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更属责无旁贷。^①

军官团的职责是：挽救军队，使它能起到捍卫国家主权和共和国主体制的崇高作用。

决定：

1. 建立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目前称之为民族解放军。
2. 批准民族解放军的法规及其纲领。
3. 任命一位民族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司令部和总参

^① 1961年宪法第二百五十条规定：“本宪法决不因通过武力行动而未被遵守，或借宪法规定外之手段加以废止，因而失效。在此情况下，每一公民，不论其已被授予或未授予权力，均应克尽职责，努力合作，使之重新生效。”

谋部。

4. 所有签署这一文件的团体当即成为民族解放军的一部分, 将于同意或批准后接受各种名称。

加拉加斯, 1963年2月21日。

“6月2日运动”代表

司令官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

陆军上尉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

“5月4日运动”代表

陆军上尉赫苏斯·特奥多罗·莫利纳·比列加斯

陆军少校佩德罗·维加斯·卡斯特昂

“文人军人联盟”代表

陆军中校胡安·德迪奥斯·蒙卡达·比达尔

陆军少校曼努埃尔·阿苏阿赫

“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阵线”代表

陆军少校道格拉斯·布拉沃

陆军上尉埃利亚斯·曼努依特·卡梅罗

“游击解放阵线”代表

陆军少校胡安·维森特·卡维萨斯博士

“民族游击指挥部”代表

执行秘书佩德罗·米格尔^①

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军领导人的是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 他曾经是卡贝略港起义领导人之一。从所发表的文件看来, 民族解放军似乎是这一阶段深受其军事来源影响的一个组织。它的目标——象在1963年2月20日的开幕会议上概括的那样——同委内瑞拉军队本身的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 行!》, 第277—279页。

民族解放军的目标：

民族解放军是为国家、人民和委内瑞拉革命服务的一种组织，属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其目的是：

1. 实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委内瑞拉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生活。

2. 保卫完整和丰富的民族遗产。

3. 支持由革命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并监督根据其权力所制定的法律得到实行。

4. 保护人民利益、人民财产与制度惯例。

5. 建立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府。

民族解放军信赖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所指派的机构或在革命战争过程中所指派的机构，作为委内瑞拉人民和参加革命的所有力量之间的团结和意志的表现。

民族解放军通过民族解放军的一个最高指挥部，总部和参谋部接受命令。^①

唯有深受军人传统熏陶的一些革命者，才能制订出下列的荣誉守则：

民族解放军荣誉守则

民族解放军的战术战斗队和游击部队的行动，是青年人和人民对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政府及其帮凶者所犯的卖国罪行和恐怖暴行作出的回答。

这些军事行动是由于受到一些崇高理想的鼓舞而采取的，这些理想就是要为我们的国家服务，实践西蒙·博利瓦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建成一个民主爱国政府。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85页。

鉴于这些原则，民族解放军部队和成员的军事行动将受下列荣誉守则的管制：

1. 民族解放军战斗员唯有出于保卫其生命或在战斗中接到命令时始得使用其武器。

2. 不得对委内瑞拉中小商人、中小制造商、中小农场主或中小手工艺人，也不得对影响平民生活的公用事业造成损害或采取军事行动。大商人、大制造商、大农场主或大手工业者，只要不是政府罪行的帮凶者，其财产也将受到尊重。

3. 战斗员将尽一切可能注意保护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成员的财产，不论其思想如何，甚至采取中立或敌对态度。

需特别注意保证使儿童、妇女、老人或残废者不受军事行动的影响。

4. 军队中士兵的生命及士官和军官的生命，以及市镇警察的生命，在他们没有参与反对我部队的军事行动时，都应受到尊重。

5. 对士兵、士官和军官以及市镇警察，即使在参与反对“民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时，其子女和亲属的生命，均应严格尊重。

6. 战俘将受到尊重，不得加以虐待，其生命必须加以保护。

此项荣誉守则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反将由“民族解放军”有关机构加以处理。

民族解放军总部，1963年2月20日^①

委内瑞拉革命运动是该大陆首先使用民族解放“军”这个名称的。迄今为止，一些游击运动都在他们的名称上加上有意义的日期。在危地马拉的运动就被称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以纪念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87—288页。

1960年11月13日的起义。卡斯特罗在1953年企图占领蒙卡达兵营之后，把他的运动称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者就把自己称为民族解放“阵线”。但是，随着委内瑞拉强调了武装力量之后，象在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那样，就为此后把自己称为民族解放“军”铺平了道路。^①

委内瑞拉人给予他们自己以军事称衔的决定，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象所有拉美革命者那样，由于意识到十九世纪解放斗争的例子，他们就象玻利维亚那样，决定要组成其自己的革命解放军。他们在对委内瑞拉人民的第一次呼吁中，就说明了他们的立场：

四年的暴政已为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局面，招致了委内瑞拉大家庭公开和罪恶的不和以及政府和人民间的分裂……

一小撮统治者和国家大多数人之间的这一不可调和的分裂和敌对状态，在我们社会每一阶层的所有事物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在极其广泛的各个领域，已能看到一次深刻的危机。这是一次民族危机，因为我们的资源已被抵押，我们的财富被奉送，我们的外交政策受到了紧紧的约束，我们的利益从属于强大帝国的利益。这是一次经济危机，因为国家已赤贫化，失业普遍，生产下降，独立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这是一次政治危机，因为警察恐怖重新出现，无耻的徇私舞弊盛行，而一次空前的选举诈骗正在酝酿中。这是一次政府危机，因为为全体委内瑞拉人民治理国家的做法，已被为少数受益者服务的一小撮人不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做法所代替。这是一次军事危机，因为军队的崇高使命已被贬低成为一小撮人服务，这一小撮人嗜权不舍，宠用对现政权的无条件支持者和傀儡们，来破坏军队的内部团结，并把他们组成不正规的武装部队去镇压人

^① 1964年阿根廷豪尔赫·马塞蒂的短命的游击运动把自己称为“人民游击军”。

民，以达到其歪曲军队作用的目的。这是一次社会危机，因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变本加厉，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加，风俗习惯正日益堕落。这是一次道义上的危机，因为抢劫、贪污、盗用公款和犯罪层出不穷，高尚情操的丧失和道德标准的沦亡。

统治集团的顽固和派系情绪已把国家带上武装暴动，带上内战的道路……当权集团将不会和平地或通过选举就放弃其地位。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情况，而目前全国混乱的状态更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政府只能拿起武器来把它打倒。

不用武器，不用武装和组织起来的队伍和不用武装力量来表达人民的意旨，既不可能压制政府的恐怖行为，也不可能战胜其以外国利益和人民敌人的自私打算为基础的资源。

不论在我国或是在别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同外国及其统治阶层如此紧密相连的集团，曾经带着善意或和平地退出政治舞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解放者”要建立一个革命解放军去推翻西班牙的统治的缘故。

委内瑞拉人民又一次地需要建立起武装力量以便时时刻刻对付统治集团的袭击和暴力行动……这是一支受到人民尊敬爱戴的武装力量，随时警惕和准备保卫革命的果实，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存权和领土完整并打垮外国的进攻或干涉。

这些民族解放军的萌芽早已存在。作为对于政府恐怖行为和袭击的回答，游击队伍已在我们国家的城市 and 山里崛起。在过去几年里，就在国家的军队内部，有一些可敬的爱国职业军人受到一帮人的禁锢、撤职、降职、折磨、威吓和污辱。这一帮人不是让国家军队去为国家或人民服务，而是让他们为一伙杀人、贪污和手头不干净的政客们的胡作非为所用，从而玷污了国家军队的名声并歪曲了他们的作用。

卡鲁帕诺和卡贝略港的英勇起义，对我民族表明这些军官，就象其他已站起来的军官那样，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

形势已经成熟，时机刻不容缓，让我们建立这一战斗的崇高的民族解放军，它是革命的武器，是使人民得到挽救的权力因素……来团结一切爱国者，恢复委内瑞拉的荣誉，发扬军队的光辉，完成“解放者”的伟大民族主义理想。

民族解放军总部，1963年2月20日

司令员、民族解放军全国总司令

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①

几年后，在同一位记者讨论委内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来历的时候，道格拉斯·布拉沃作了下面的评论：

对于在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来说，恰恰是作为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支柱的传统陆军军官们和他们的队伍形成了人民的民族解放军的一部分，这一点似乎是奇怪的。但这是委内瑞拉革命中的特点之一。每一国家的每一次革命，均有其本身的特性及其本身的独特之点，就委内瑞拉而言，这些特点之一是在于军官们参加了民族解放军这一事实。

古巴没有发生这一情况，该国的全部军队，连同其军官们不得不予以解散，以便重建服务于人民的军队。委内瑞拉的特点是，随着斗争的进行，这些军队里的爱国军官们将继续参加解放运动，有的是本人参加，另外一些后来连同他们自己的队伍一起来归。^②

委内瑞拉共产党仅仅同意：在同时建立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以负责作出能影响游击运动的政治决定的这一条件下，参加

民族解放军。当然，实际上政治决定会对于游击队的军事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但影响总的战略，也影响到其战术。虽然“左派革命运动”在“民族解放阵线”内有一些发言权，可是它多半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就象它在危地马拉的对等组织（“统一抵抗阵线”）一样。游击运动中的旧军人们在这一时期中还不是足以向共产党提出挑战的重要政治力量，而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纲领中强调军事的价值，他们不得不保守沉默。把游击运动称为“民族解放军”，一方面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是出于抚慰这些旧军人们，使他们能感到他们从来也不曾真正地脱离过国家的“军队”。

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纲领》（颁行于1963年）强调了对这些反戈一击的军官们的福利上的关心：

民族解放军便利了来自敌人阵线的盟友和新的战士转变他们的信仰，加速了军队的变革，为军官和士兵们展开了明确的前景，给予军人们在历史的见证前面挽救自己的机会，从而埋葬了为独裁者们和外国利益服务的专制镇压的传统，掀起人民对于领导军队的腐化的叛徒们的正当义愤。民族解放军的建立为每一个诚实、爱国、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者是革命的军官，提供了一条出路。我们正在建立民主制度，在此制度中我们可以真正地把我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① 加比埃西斯：《委内瑞拉，行！》，第282—284页。

② 1966年9月，《道格拉斯·布拉沃访问记》，刊印在1966年12月17日出版的《事件》杂志所载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的《委内瑞拉紧握武器》这一篇文章里。

道格拉斯·布拉沃曾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一现象是委内瑞拉独有的理由：“这一点存在一个社会上的原因，一个我们必须加以解释的历史的原因，即委内瑞拉军官团的社会成份，不用提士兵了，他们大多数是工人阶级，是工人或农民。军官们也是来自人民的；超过80%的军官们是来自中下阶级的，有一些是农民；还有一些是来自反对美帝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军队总是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地会参加民族解放军的爱国军官的道理。”虽然拉美士兵不一定会参加游击队，但——1968年以来在秘鲁出现的事件似乎表明——拉美军队中确实存在进步团体。不去消灭军队而去把它争取过来这种可能的行动，曾经受到游击队员们暗中的拒绝。这一点当时也许是值得一试的。

理想付诸实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①

《行动纲领》基本上是一个共产党的文件，与党的温和的路线相当一致，虽然该纲领强调“‘民族解放阵线’不是一个共产党组织，而该纲领也未提出对于该国的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该纲领很长——约二十四页——它详细解释了委内瑞拉的形势和需要做的工作。

文件是以叙述面临委内瑞拉人民的实际任务开头的，即：

建立一个主要由进步力量组成并能带领我国渡过即将来临的严重的历史性变化的政府。

这些历史性变化已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中心目标。他们要为我们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一个民主的生活；挽救我们的民族遗产、领土完整和国家财富；建立一个民族主义和人民的革命政府。

要完成这些目标，意味着摆脱北美帝国主义的监护；取消我国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半封建残余；意味着独立的工业发展；保证给予包括城市和农村工人的大多数人一个足够的生活水准；恢复我们在国际领域内的主权，从而制订并实行一项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并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

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团结和组织关心我国独立发展的所有力量，——这是胜利的主要条件，——建立能够打败强大敌人的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保证所拟定目标的实现；表现出要争取自由的毫不犹豫的决心，要打破殖民统治和旧的传统统治阶级和剥削者的控制；在困难面前不动摇，并要表现出

^① 《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纲领》，我所能找到此纲领的唯一的版本是由“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伦敦委员会”出版的一本，但无日期（1964年？）。如需部分文本，见附录四。

我们这一意图的严肃性和坚定性。

《行动纲领》然后谈了一些关于建议建立统一战线的详细情况：

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建立统一战线是今天委内瑞拉最迫切的任务。要建立一个能用“要为国家争取自由，否则毋宁为委内瑞拉而死”这一口号去引导群众的工具。这一统一战线不应把关心击败违宪留任的做法与保证我国独立发展的任何委内瑞拉人民排斥在外，所有平民和军人均应加强其联系，借以实现这些目标。

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职员们、自由职业者、艺术家们、作家和诗人们、思想进步的商人们、诚挚的牧师们、具有各种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政治党派背景的男女公民们、一切要成为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命运的主人和自己财富的主人的人们，都属于这一广泛的解放阵线……

我们的运动是一个争取解放的运动，而不是冒险者们、恐怖主义者或是意气扬扬的年轻人们的工作。我们并不反美。我们是他们的朋友，而且以极大的同情来看待美国人民、他们的进步、传统和斗争。我们把北美人民和同样地剥削和统治我们和他们的美国佬垄断资本家们和战争贩子们绝对明确地区别开来。

在号召工人们、学生们、农民们和士兵们起来支持“民族解放阵线”之后，该文件接着作了一次动人的呼吁，要求每一个人到士兵、上层阶级、官员、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当中去做工作，以便对镇压行动起缓和作用。必须使这些人懂得：他们正支持着一项可耻的和反民主的事业。必须要求他们不向人民开枪。必须要求他们参

加反对政府的斗争，并站在人民一边。

可以从这些纲领中看到，“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极大。虽然这一南美最有趣的党之一后来采取了差不多完全敌视游击运动的立场，它在这一阶段却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的。在古巴，中国，甚至在苏联，未来的游击队员正在受训。革命似乎就在近处。

五 城市斗争：选举与选举之后

尽管在1962年遭受种种挫折，但组成“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的各种力量，就在建立该组织的协议最后于1963年2月20日签署以前，还是相当活跃了好几个月。它们的活动特别着重于破坏美国的设施上面。为了反击1962年10月导弹危机时期美国对古巴施加的压力，怠工者于10月27日破坏了美国控制的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分支)的四个电力站。一周之后，属于莫比尔石油公司，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和一个海湾公司所属的委内瑞拉支公司的四条油管被炸掉了。

1963年2月，在继续其反美活动的过程中，革命力量放火焚烧了在加拉加斯的巨大的塞尔斯·鲁伯克仓库，致使遭受估计达二百五十万美元的损失，同年6月间，美国军事使团的办事处遭受了同样命运。

但并不是所有民族解放军的袭击都是针对财产的。在这一年期间，他们从事了一些壮观的英勇行动，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他们所为之而战斗的事业。甚至在2月20日协议以前，他们已经为了追求公开宣传而进入行动。1月16日，他们袭击了称为“法国绘画一百年”的展览会，这一展览正在加拉加斯美术馆举行。他们带走了塞尚、凡·高、高更、布拉克和毕加索的画，在三天之后即予归还，仅“略有擦损”。

2月11日，三千吨的委内瑞拉货船“安索阿特吉”号在从加拉加斯的拉瓜伊拉港驶向新奥尔良途中，在海上被武装偷乘者所劫持。海盗们在广播词中宣布该船已被民族解放军所劫，正向“友

好领土”行驶中。他们不愿冒险驶向古巴(因为那样就成了公开拥护古巴革命),而是沿着海岸行驶,最后于2月17日在巴西领海下了锚。九个人在巴西得到避难,余者在本人要求下被遣返回委内瑞拉。

8月24日(六个月后)阿根廷著名足球运动员阿尔弗雷多·迪斯特法诺——当时正为里尔·马德里打中锋——被打扮成警察的民族解放军成员从旅馆里劫去。两天后迪斯特法诺即被释放,他告诉记者说,逮捕者对他解释了他们行动的目的性,但由于不了解委内瑞拉的政治情况,因此他不想评论什么。

11月27日,美国驻委军事使团副团长、陆军上校詹姆斯·K·切诺尔特在驾车赴加拉加斯使团途中被民族解放军俘获。八天之后他又出现了,仅衣着略有损坏,他被蒙住双眼丢在近美国使馆的地方,头发上有些鞋油。他告诉记者说,他的逮捕者曾敦促他念“关于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有几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印的。

切诺尔特上校被绑架的后一天,六个十余岁的学生,包括一个女孩,劫持了一架从离加拉加斯西南约二百七十哩的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港口、博利瓦尔城飞来的国内航线上的飞机。学生们在城市上空散发了民族解放军的传单之后,他们强迫飞行员把飞机飞往特立尼达,就在西班牙港降落了。特立尼达当局拒绝给予学生以政治避难权。他们被引渡到委内瑞拉,即以空中抢劫罪而被捕。一周之后,据推测可能是出于报复,发生了机关枪袭击英国大使馆和特立尼达驻加拉加斯大使的事件。

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了达到宣传上轰动一时、狂热地搞出来的巧妙的恶作剧。可是它们是在革命暴力日益发展和镇压日益加紧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度过了1962年的困难得以幸存的一些游击队伍,继续在农村进行斗争,但大部分是孤立而没有什么影响的。主要的斗争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德布雷对当时的加拉加斯作了极好的描绘:

1963年春夏城市斗争最剧烈的阶段，在各个营地上没有一天不同时发生数起交火。日暮枪声开始直响到清晨方才止息。军事活动包括骚扰镇压部队、进行伏击、大规模对敌交锋、甚至包括完全占领某一邻近地区，使这一地区在几小时内变成一个解放区，直到这一狭小地区内结集了大量武装部队使之难于守住时，他们才消散。其目的在于钳制加拉加斯的军事力量，使之疲于奔命，兵力分散，从而加速削弱其士气并促使士兵逃亡——在警察里面已发生多起这类事件。^①

1963年6月12日，当企图对正在博利瓦尔城访问的贝坦科尔特进行暗杀的时候，形势起了较大的转折。他立即命令对所有共产党员和“亲卡斯特罗的极端分子”进行搜捕，从而展开了一个针对左倾分子的新运动。前一年即1962年5月10日卡鲁帕诺起义之后，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活动已被禁止，但现在政府还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10月1日委内瑞拉国会最后决定撤消了给予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国会议员的豁免权。属于这两个组织的二十三个国会议员当即被捕。两天之后，最高法院支持了停止这两个组织的活动的决议。到月底为止，据报道有几百个“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成员被拘禁，包括党的领导人古斯塔沃·马查多博士。

贝坦科尔特的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选择其继承人的选举已定于12月份举行。11月19日，“民族解放阵线”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以便瓦解这一选举。大多数工人不愿意支持这一罢工号召，但加拉加斯中心区出现了两天的示威游行和骚动。至少有二十个人死亡。

十天后，在11月28日，外交部长宣布在帕拉瓜纳半岛沿岸缴

^① 霍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

获了从古巴来的一大批武器。他声称这些武器是从古巴运来的。委内瑞拉政府将该事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后，在1964年2月24日的一个报告中，该组织支持了外交部长的说法。报告说，委内瑞拉“已经是受古巴政府赞助的和指导的一系列行动的目标，这些行动的公开意图是要颠覆委内瑞拉的制度并通过恐怖、破坏、袭击和游击战来推翻其民主政府”。

当列举了在委内瑞拉海岸上发现的武器的具体情况后，报告还叙述了民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计划：

古巴政府方面的侵略政策已经由委内瑞拉当局在1963年11月4日发现的军事行动计划——“加拉加斯计划”所证实，该计划是为了所谓“民族解放军”进行颠覆活动而准备的。照这个计划做，要使用的武器就同所装运来的武器式样相似，数量相当。计划的目的是要占领加拉加斯，以阻止1963年12月1日选举的举行，并夺取这个国家。^①

民族解放军这一时期究竟有无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不能肯定。当时组织者的脑子里很可能没有比瓦解选举更重要的念头。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

尽管有一个抵制运动，还是有约占三百三十万登记选民的90%的人在12月1日参加了选举。（所有委内瑞拉人民，只要年过十八，不论性别与文化，在理论上讲均得参加选举。）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劳尔·莱昂尼博士比其他候选人多得32%的选票，最后他被宣布当选为总统。可是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投民主行动党的票数，与1958年选举相比，下降了15%。

^① 《纽约时报》评论说：“虽曾认为可能从古巴收到另一批装运来的武器，可是帕拉瓜纳半岛的隐藏所发现还是在本半球任何地方被证实的这种活动的唯一例子。这是关于古巴在拉美进行重大颠覆活动的第一个被证实了的例子。这个报告标志着古巴第一次正式地被‘拉美国家组织’的机构指控有具体的侵略活动。”

莱昂尼于1964年3月11日就任。作为要在国内和解的一个姿态,他在就职讲话中宣布:如果共产党放弃暴力的话,对其活动的禁令将予解除。

选举结果显示了弃权运动的消极作用,因而是游击队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道格拉斯·布拉沃后来解释说:“非常客观地说,必须承认受到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支持的‘民主行动党’的胜利,是人民运动的首次大失败。”^①“左派革命运动”的莫塞斯·莫莱罗写道,“在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战争中的一次小接触中”政府得胜了。^②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评论说,选举是人民运动的失败,“而我们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在这次失败中都有一份”。^③

这一失败不可避免地使所有从事于起义活动的团体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在监狱中有更多时间反复考虑问题的许多人,开始感到出狱有好处,而结束游击斗争可能会加快这个可能性。

在此问题上产生分裂的第一批人就是“左派革命运动”。1964年1月,即选举后的月份里,“左派革命运动”的总书记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公开站出来支持和平斗争。他在给“左派革命运动”的信里写道:经验表明委内瑞拉武装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委内瑞拉历史上并未提供游击战争是正确的证明。他辩论说,过去发动的武装斗争无论怎么说都是不成熟的。武装斗争是注定地要失败的,因为实际上,委内瑞拉的农民阶级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革命运动的战略后备军。兰赫尔也作出结论说:既然委内瑞拉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封建社会,那么比起农村的持久游击战争来,城市起义仍然是更加令人满意的一个行动。

兰赫尔在下面作了关于在委内瑞拉农民阶级中所发生的情况

① 《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一起》,第43页。

② 莫莱罗:《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第194页。

③ 委共第六次中央全会批准的决议;曾引用于《最后一点钟报》,第45期,1968年1月2日。

的分析。在1941年曾经占70%的农村人口，到1961年已经大大下降。六十年代开始时，农村人口仅占32%；大部分人口住在城市里。兰赫尔认为这一趋势本身未必能扭转。将来在农村里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潜力。

道格拉斯·布拉沃对此论据作了不同的注解：

据称今天32%人口是在农村，余者主要是在城市里。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首先……加拉加斯的流动人口不能被说成是城市人口，因为居住在加拉加斯棚户区的三十万人把典型农民的风俗习惯带进了城市。甚至当他们来到差不多拥有两百万居民象加拉加斯这样城市的时候，他们仍然带着这些特征。已经证明不可能去掉他们农民的和农村的思想状态。此外，这些人是失业的，不做工作的，还没有进入工业队伍，因而并不能说成是工人阶级；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因为他们既非农民也非工人阶级；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工厂里干过，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不能被划为失业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带进城市的特点，要按照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什么样的棚户区（没有卫生设备，下水道或水等等）而定。^①

兰赫尔从狱中写给“左派革命运动”的信，在这运动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危机。他的总书记的职位马上被撤换了，而由西蒙·塞斯·梅里达接任，但是领导人的改变并没有中止他所引起争论问题的讨论。

共产党人起先并没有支持兰赫尔的论据。在同兰赫尔给“左派革命运动”的信同一个月（1964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庞佩约·马克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暨赫苏斯·法利亚被

^① 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委内瑞拉：道格拉斯·布拉沃》。

监禁时期的党的代理总书记)解释了该党的立场:

在进行武装斗争的不同道路中,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游击斗争上;按目前政治要求的水平来组织、准备和发展游击斗争;把它同城市斗争和军事危机并同群众行动和宣传结合起来。^①

但是就在当月里,庞佩约·马克斯被警察总局逮捕并被监禁了。^②此后,共产党人就开始逐渐走向同武装斗争相敌对的立场。1964年仅仅开始批评把游击战争看作指导反对现政权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的政策,而到了1967年,干脆就变成根本反对依靠游击战的思想了。在1964年5月公布的党中央委员会给委内瑞拉人民的信中,它强调了停止打仗这一点是可以商榷的;认为这是可以同政府讨价还价的东西:

武装斗争开始时的形势,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成千的委内瑞拉人仍然被非法地扣留着,镇压还在继续,对于思想最为清醒的爱国者的迫害也还继续进行。对于非官方群众组织的歧视仍然存在,旨在更大程度上向帝国主义利益投降的政策仍在执行……

12月以来,战斗曾经有过停顿,但我们的敌人显然误认为这就是虚弱的迹象,而不认为这是我们用以表现和平途径还没有最后关闭的行动。

我们共产党人又一次告诉我们的国家:如果一次全面的大赦宣布了,如果公众自由恢复了,如果被禁止的党派的合法

① 庞佩约·马克斯:《加强革命运动团结的必要性》,曾引用于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走向革命权力》。

② 他直到1967年早期才得逃脱。

行动权恢复了，如果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被监禁或流放的军官们重新被允许进入军队并给予充分权力，那么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能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①

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们作出的缓和游击斗争的决定，就是在游击队员他们自己当中也没有引起什么热情。那些带着枪实际上已走出城市去到农村的人的看法，同那些仍然呆在城市（不论是在监狱里，还是藏匿起来）的人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道格拉斯·布拉沃作了辛辣的评论：

于是革命运动本身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采取这一路线的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领袖们，同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情况已有所脱节，而且他们已不再领导武装队伍。实际上，许多人都在监狱里，而这就使他们考虑他们的个人问题多于委内瑞拉人民的政治问题了。我们可以说：领导上的投降政策几乎招致了游击运动的失败，而这在过去，政府尽管通过军事手段，却并没有能达到它的目的。^②

游击队员对于游击战前途之所以有信心，是由于1963年当城市运动受到严厉镇压的时候，他们得以不依靠城市而在农村得到生存这一事实。德布雷写道：“这表明：民族解放阵线同民族解放

^① 1964年5月《委共中央致委内瑞拉人民的信》。曾引用于1968年1月2日，第45期《最后一点钟报》所载《叛国的过程》一文。可是，1964年是共产党队伍里产生了真正分裂的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比如，8月份带领一个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去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多·加列戈斯·曼塞拉告诉中国人说：“武装斗争是今天委内瑞拉主要的斗争形式。我们党已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正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我们决心要取得解放。获得解放的所有合法的道路已被堵塞，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只有通过枪杆子，我们才能迫使美帝放弃被他们视为肥肉的委内瑞拉。”——曾引用于1964年9月4日《北京周报》刊载的文章《武装斗争——委内瑞拉革命的主要形式》一文。

^② 《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一起》，第44页。

军在农村地区的分遣队之间的桥梁可以让它割断，而不至于妨碍后者的发展和自给自足。”^①他继续说，既然城市领导人除了逃往农村游击队已创造出某些小小的安全条件的地区以外别无他途，那么“在游击‘中心’的基础上，政治领导和军事行动的融合，现在就成为可能的了”。这当然就是在古巴所发生的情况，那里对一个被缉拿的人来说，呆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常常要比在哈瓦那更安全些。

德布雷事实上把1963年在委内瑞拉农村所发生的情景，描画得比那些希望停止武装斗争的“左派革命运动”和共产党所描绘的要乐观得多：

在选举前去到农村战线的任何人，都能为道格拉斯·布拉沃在法尔孔州和乌尔比那同加瓦尔东在拉腊州所执行的战略作证：游击斗争正在深入，它采取了政治多于军事的形式。耐心地在每一个小村落或大村庄的农民里面建立支持基点，日常的宣传和联系任务，开垦丛林间新的土地，在战斗员和农民中开展有条不紊的识字扫盲运动，加强保持对村庄和城镇联系的组织工作、供应和宣传情报网——这一切政治组织工作最后达到建立了一个拥有它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司法和自己的无线电中心（法尔孔州早已建立）的固定的革命基地。^②

看来已经盛行于农村地区的这种充满信心的精神状态，同存在于城镇里的失败主义情绪，确是迥然不同的。1964年7月，在离加拉加斯以东仅一小时行程的米兰达州巴奇列尔地区里，一个新的游击“中心”已进入行动。据德布雷称：这个地区“在游击中心开始以前，早就成了秘密活动所要选择的目标了”。^③后来，政

①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战略的几个问题》。

③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

府“发动了一次同时有 B-25 型轰炸机进行袭击的、对所有游击区展开的重大军事进攻。在这之后，它又一次感到可以宣布肃清了几批武装平民。但是事实上游击队各条战线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变得更强大和数量上更多了”。

由于个人的见闻和意识形态上的偏爱，德布雷可以算是对于 1963 和 1964 年间委内瑞拉事件的负责的见证人，而他的证据同阿道弗·吉利关于危地马拉农村形势的证据是非常类似的。但两者看来都是以乐观的态度来观察农村地区的革命潜力的。尽管如此，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农村起义看来确实要比城市里的起义更成功些，而这一因素在关于“农村对城市活动”的持续而热烈的辩论中，是很重要的。

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曾经是赞成城市活动的，主要因为加拉加斯过去在许多场合曾表现出不喜欢民主行动党的一个极为激进化的城市。在另一方面，农村已大部分被执政党所控制，这个党在改变农民信仰方面曾费去很多时间和努力。因此，乍看起来城市活动似乎更为适合。

但是这有它的不利之处。美国作家和当时《时代周刊》驻拉美记者约翰·杰拉西相信民族解放军的城市战术是根本上错误的。他写道，这些战术：

是要通过恐怖主义使居民“两极化”；但对民族解放军不幸的是，那个恐怖主义被引导错了。在一年半还多些的时间里，恐怖主义对准“镇压象征”的警察们。然而，警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一个警察通常是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的人。他来自社会的下层，所以他有他的紧密家庭束缚，由于贫苦家庭往往是大家庭，一个委内瑞拉的警察必然会有许多兄弟姐妹，也许还有几十个堂兄弟。一旦他成了牺牲者后，他的残忍和骄横就很快地

被人们忘却。于是，他就不再是一个政府的象征。这样，“民族解放军”以其“一天杀一个警察”的政策——民族解放军成功地坚持了五百天的一项政策——不仅在下层社会里树立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而且使警察成为受压迫的人。这就难怪当民族解放军要求人民抵制莱昂尼的选举时，它遭到了大大的失败。^①

德布雷对于在委内瑞拉实行的城市游击战所提的详细的、持续的和重要的批评，集中于军事上不利之处：

活动于一个固定的和自然是有限的区域里，城市游击队容易被困住。事实上，它既不能选择时间，也不能选择地点。游击队被迫在晚间活动（营房中只能得到微弱的街灯照明）使战斗员不能被辨认出来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虽然也可以调动邻近地区的一批批人员来避免告密者的威胁，并保证居民的安全。有意识地使街道撤空可以减少无辜的牺牲者，虽然总是有一些人牺牲的，因为子弹会穿透房子的硬纸板或木头墙壁。黑暗可使人民武装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例如熟悉地形、机动性、以及敌人难以运用重武器等。另一方面，在白天，敌人可以搜查屋子，在整个区域里建立岗哨警戒线和发动大规模反击。就地形选择而言，要使一批武装队伍在

^① 见1967年1—2月《越南报道》（纽约）刊载的约翰·杰拉西的文章《拉丁美洲—第二个越南》一文。杰拉西继续写道，“如果民族解放军曾问过它自己‘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它会很快地撇开‘警官们’这个字作为回答。根据民族解放军的推理，委内瑞拉的敌人，甚至连贝坦科尔特或莱昂尼都不是的，因为这些人是美国经济统治的傀儡。因此，唯一的回答该是‘美国’。一个民族解放军的代表几个月前在伦敦时对我这样说过：‘我们花了多次的争论才最后能响亮地说出这一点。我们懂得这一点，但总是很难使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逻辑。如果我们说美国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样我们就将每天杀一个美国人，并加以实行，这样我们怕会失去美国激进运动的支持。我们知道美国激进分子怎么也不会为我们的革命而战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但我们需要借助于越南人民的榜样，使我们羞愧得只能承认美国是我们的敌人。

对大街都有严密控制的地方行动，以便对卫戍部队或分遣队进行突然袭击，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采取这样一种军事行动要冒很大危险，因为撤退线极容易被敌人切断。因此游击队必须把镇压部队引到他们自然地形以外的山里去打。一个时期之后，当后者理解了这原来是陷阱的时候，他们就拒不出动，宁愿在晚上把那些营房放弃给游击队去控制，而不愿意让每次袭击时损失几十个人。可以试用所有的战略把警察分遣队和陆军引进营房，其中有的可以造成一场虚惊：比如就在表面上看来很平静的营房顶上搞一次巨大的炸弹爆炸；当士兵队伍前来查勘现场时，让他们突然陷入一次伏击中。但要点是游击队被困住在营房里面，而政府的战术则很明显：在营房里进驻大量陆军和警察，以致游击队觉得犯不着去袭击他们。在斗争的第一阶段，所有的警察岗哨的确不得不撤离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巨大的乌兰耐塔、西蒙·罗德里格斯和“1月23日”等一片大公寓房子——和营房。但陆军和国民警卫队很快地在屋顶交叉路口和高地的关键地点上建立了机枪位置，这几乎就结束了在城市的战斗。一个战斗者的生命是太宝贵了，不能白白牺牲，幸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错误的荣誉感：委内瑞拉人民没有去进攻。^①

在描述城市战斗问题时，德布雷只不过表达了许多战斗者对于城市战斗的价值的怀疑而已。常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崇拜在农村的活动，看来那是牺牲城市的。在上面这一段文章里面，德布雷提供了答案。

可是，由于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在狱中，因此1964和1965年间共产党人的主要活动旨在争取他们的释放，而不是进行城市恐怖主义。1964年6月，争取赦免政治犯全国委员会成立了，得到了

^①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第46—47页。

党和“左派革命运动”有组织的队伍以外人们的相当大的支持。翌年，即1965年6月，在共产党主持下，“争取赦免委内瑞拉政治犯和民主自由欧洲会议”在罗马组成了。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这时对拉丁美洲表现了异常的兴趣，因此一些观察家暗示苏联不是利用古巴而是利用意大利人充当同本大陆各共产党联系的主要环节。^①要不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共产党员亚历山德罗·贝尔特拉米尼博士，在一个妇女（不是他的妻子）陪伴下于1965年4月4日在加拉加斯机场被捕的话，人们也许不会了解很多关于此事的情况。他们被发现身藏几乎达到三十万美元之巨的一笔款子。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贡萨洛·巴里奥斯宣布说：他们正充当意大利共产党的通讯员，而这笔款子“已预定为帮助委内瑞拉共产党进行一项巨大的阴谋之用”。

奇怪得很，虽然款子充公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受到控告，这就使一些人相信，他们的作用，事实上不是资助进行颠覆，而是在于加强党内那些最赞成结束游击斗争的分子的地位的。这同样地是符合委内瑞拉政府的利益的。

不管是不是受到意大利的钱的影响，争取大赦的运动有了些进展，而共产党对武装斗争越来越有意见了。这影响了“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项新的“行动纲领”，强调了除军事方式而外的活动方式。

“民族解放阵线”宣布说，这个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所以必须为一个长期目标制定其战略。武装斗争将集中环绕于加强农村游击阵线上面，因为这些阵线为长期防御斗争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并提供能够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的解放区。

在城市里，政治工作将着眼于到郊区人民和工厂工人中去组织他们和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过渡性的要求和需要。一切可能利

^① 丹尼尔·詹姆斯：《意大利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作用已经显现：莫斯科的人已在本半球》，《拉美时报》，1965年8月19日。

用的合法和半合法的手段都要利用。在城市中心进行的政治工作,主要旨在为内地游击斗争提供支持。^①

1965年4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七次全会的时候,共产党人已最后决定将来要优先考虑合法的反对活动,而不搞城市恐怖主义或农村游击战。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提出的文件,很清楚地分析了前些时候所犯的错误:

1. 在进行和维持革命战争的方法上仍然存在军事主义思想。军事优先于政治考虑的这一情况,使“用政治来指挥枪”的教训变得毫无意义。这些都是军事统制和官僚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狠狠地加以打击。它们在武装斗争的开始和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宗派主义的立场中起了作用……到现在为止,革命战争似乎已成为一个先驱部队所进行的宗派主义斗争。克服武装革命斗争中的这种缺陷已属必要,如果我们要把这场斗争转变为人民战争的话。

2. 这一武装斗争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总部,足大胆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中行动,取得运动的信任,享有威信,协调斗争,统盘考虑各种行动计划,并能形成城乡各部分之间的连锁环节。

3. 民族解放军内部仍然缺少协调配合;它还没有能把各种武装部队组成一个在单一指挥部领导下的单一体。各部队仍然被分散地指导和领导着。

4. 在武装斗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与各部队领导上缺乏合格的干部有关。

5. 试图解决武器和交通问题所做工作的规模太小和没有成果。这就阻碍了武装斗争规模上的改变。我们仍然以微

^① 曾引用于詹姆斯·D·科克罗夫特和爱德华多·维森特:《莱昂尼以来的委内瑞拉和民族解放军》,《月刊》,1965年11月。

弱的火力来对付一个强大的和装备优良的敌人。

6. 城市战斗部队里还存在相当多的缺点。战术战斗队的状况及其活动的水平已显著下降。停战的间隙没有被用来建立新的部队,提高战斗人员的政治和技术水平,或者用来吸取以前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在敌人后方展开活动的弱点。

7. 在游击部队里,除了他们的成就外,仍然有许多缺点:指挥员和士兵当中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弱点,缺乏军事纪律,还继续进行着骚扰活动,存在着军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缺乏能给我们提供武器和装备并真正能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歼灭性的军事活动,缺乏运用人民的武器方面的知识和实践。

8. 专业工作的进行软弱无力而且墨守陈规。

9. 为进行革命战争而对党和青年进行的训练工作仍然太慢。参加战斗任务的人数还不够。缺乏同游击部队进行积极的合作。完全没有能把准军事和民兵部队发展起来,以便作为民族解放军的后备和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等等。武装战斗了三年之后,我们还是没有能达到目的或者没有适当地组织好武装革命斗争。^①

当然共产主义党派已习惯于作一定份量的自我谴责,而老实承认过去的错误也可能是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可是,对过去指导委内瑞拉进行游击战的方式上这一重大的谴责,很清楚已超出了必要的范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让那些打算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不仅看到前三年期间实际从事战斗和组织工作的人们身

^① 委共中央第七次全会决议,刊载于1965年7—8月出版的第5期《方针报》,(智利,圣地亚哥)。亦见于《民族解放军》以《我们的错误》为题的一个文件,刊载于1964年11月出版的《左派研究》杂志。

上存在缺点,而且要看到游击战本身的缺点。共产党这一策略,使游击队员们感到恼火。他们可以接受批评,但是不准备承认整个战略都错了。

六 游击队员对共产党人

共产党在 1964—1965 年期间采取的正式路线上明显的改变，在游击队各个队伍和那些感到没有理由放弃武装斗争策略的人们当中，立即产生了反应。委内瑞拉虽然从来没有过一个亲华的共产党，但在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之间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争论，表面上却相仿于在本洲别的地方——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的“修正主义”同那些赞成以更战斗的姿态来面对帝国主义威胁的人之间的争论。

早在 1964 年 10 月，道格拉斯·布拉沃和法尔孔州山区共产党地委已经精心制订出同正式路线针锋相对的名为“联合起义”的战略。

〔他解释说〕，联合起义或联合战（有些人们喜欢这样称呼它），是一条战略路线。这一战略路线，是从我们对解放斗争的客观估价出发的，它同样承认并运用持久战的经常因素和临时起义的短暂因素，在我国这两种因素同时交织在一起。^①

这不是以后出现的彻底的“长期战争”的战略，但是它已经大不同于共产党领导所拥护的路线。在整个 1965 年期间，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加紧张了。

道格拉斯·布拉沃恐怕他的论点通不过党的政治局而下达到

^① 道格拉斯·布拉沃给委共中央委员会的信，1965 年 10 月；曾引用于奥赫达：《走向革命政权》，第 18 页。

战斗者和一般士兵当中去，因此他就在 1965 年中期下山到加拉加斯去工作。由于政治局敌视他的想法，并紧紧控制住党的刊物，因此很难使人听到他的呼声。他对党内特权阶层对待他的态度很恼火，1965 年 10 月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概述了他的计划和牢骚：

在冷静地思考了革命运动面临的问题之后，我决定给我们的最高机关写信。我将要说明的大部分事情，在我逗留在这里的五个月时间里已向政治局提出过了……

他一开始就批评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方式：

“民族解放阵线”没有成为正为解放我们国家而进行斗争的一切政治力量的真正组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有机工具，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指挥小组，也没有成为建立在人民其中的一个政治机构。的确，它也曾几次试图有所作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无定形的机构，它并不参与战事任务，而其大多数重大决定是同议会问题有关的。如果我们要使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话，有必要建立这种机构，它将最终给我们的战斗带上人民战争、解放战争而不仅是先锋队战争的标志。

然后，他接下去批评了过去曾支持过游击战的一些政党：

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没有用新的结构来替代他们的旧有结构。既然他们已经注意到有战略经济意义的地区，因此他们不得不强调例如石油和铁的产区，以及加拉加

斯。但是对于游击前线周围的那些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地区，我们必须加以特别关心，因为事实上在这些地区党的力量最为薄弱，而我们也正要在那里建立最雄厚的人民军。我们在这样讲时必须说明，我们不是要象在别的国家里发生的那样，去混淆人民军和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在我们的情况下，组成我们军队与破坏敌人的军事力量的主要战场（农村地区）将是主要军事活动的地区；但既然我们的农村人口只不过是总人口的28%，我们也就很难把我们的解放斗争称之为以农民为基础或甚至是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

由于这个缘故，城市的作用和它们用一切办法来帮助农村游击队从而建立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责任，就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民族解放阵线”、各党派以及其他参加这一阵线的组织，应该在游击阵线正在推进的地区承担起合法或非法任务、政治或军事任务，对权益提出要求等等工作……

道格拉斯·布拉沃并不满足于详细阐述各政党的错误，公开地抨击了共产党特权阶层所持的态度：

对于你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来讲，这些缺点和错误可以从我们政治局内部看得最清楚，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不采用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已经达到扼杀自由表达意志的地步。兄弟的情谊已经不见。会议是在这样敌对的气氛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有害的紧张情绪，阻碍了领导工作的进行。此外，在我们政治局委员内部，还缺乏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配合。

布拉沃继续说，目前该做的是要把游击斗争发展成为人民战争：

当群众开始参加到武装斗争里来的时候，革命出现了新的特性；仅仅由先锋队打的战争在其形式和内容上让位给人民战争了。

带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并不意味放弃为群众提出权益要求或做其他工作。相反，组织和动员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为他们的要求和利益而去战斗。每一部分居民里，都有他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团结各部分居民，并把他们全部动员起来。我们的作用是去寻找这些巧合之点，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爆发社会问题的导火线。比如，许多开始只提具体要求的学生骚动，已转化为具有政治性质的巨大斗争。

许多在前政府时期的“土地占有行动”也超出了它们原来的社会和经济的的要求，而成为反对政府甚至反对社会制度的政治示威。主要的问题是要从意识形态上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并把他们加以动员，先从他们自己的具体利益开始，随后经常不断地提高他们行动的政治性，在到他们变得如此深刻地卷入了这个斗争，以致在使他们明确武装斗争的目的之后，群众最后就直接参加了进去。因为，不同成分的人民迟早会感到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他们会看到：为什么非武装地走向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道路，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此路不通的。

最后，道格拉斯·布拉沃概括了他的起义行动与持久战相结合的概念。他在结束语中说，城市里立即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反帝斗争的性质意味着在农村中进行的持久的战争多半是民族解放行将采取的途径：

关于起义各项因素的情况可加以总结如下：

1. 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讲，城市地区是敌人力量所在的主要中心；7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

2. 在城市地区里，革命运动在其政治和组织工作力量、战斗传统和群众影响等方面，也有其最大的潜力。

3. 因此城市地区，特别是首都，是所有矛盾相对抗最为敏感的地方；首先是敌人自己内部的矛盾；其次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城市行动的反响在短期间内仍然比我们在农村行动的反响要大。随着游击运动取得成就和发展，我们将会克服这个暂时真实的事实，但在目前，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成就，增加对战术战斗队员们的技术训练，并使城市革命运动有所准备，这样才能随时利用各种起义因素，从而导致革命的爆发或加深长期性的危机。

关于取得长期成就的可能性可总结如下：

1. 政治力量、军事和经济的潜力、以及帝国主义给予敌人的内外支持，使他暂时比我们处于较强的战略地位。

2. 由于我们所拥有的经济潜力，我们拥有原料的战略性质，我们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古巴革命的先例，帝国主义对于解放运动的侵略性——象今天所表现的对圣多明各和越南所进行的笨拙的袭击那样——以及目前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不团结，使我们不得不作好进行一场持久的解放战争的准备，因为敌人不会不进行一场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顽固的斗争而就此放弃其猎获物的。^①

^① 道格拉斯·布拉沃来函，曾引用于奥赫达《走上革命政权》，第12—21页。此信的法语译文重印于《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委内瑞拉游击队里》一书中。

道格拉斯·布拉沃在1965年11月即次月就接到了他的回信。回信是采用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写去的(该文件由庞佩约·马克斯、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弗雷迪·穆尼奥斯、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及古斯塔沃·马查多和爱德华多·马查多兄弟所签署)。在这个文件里,共产党领导人在劝告结束游击队活动方面,比他们过去走得更远了:

首先,已发生的某些变化使革命运动不得不修改其战术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武装斗争方面。

概要地讲,形势有如下述:武装斗争已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已被削弱了。目前时刻革命运动不能公开地和正面地面向其敌人。党的武装部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血腥和残暴的镇压,正影响着革命运动组织在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以及对政府政策作出适当回答等方面的能力。

由于继续遭受挫折和失败,并由于它本身的弱点——这一弱点阻碍了成功的行动——如果要使武装斗争不失去其作用的话,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武装斗争的有效性,直到目前为止,武装斗争一直在起作用,使群众有理由认为革命就在眼前。事实上,它已不再起到那个作用,而其前途就要看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措施如何了。

这种软弱无力、仅仅重复类似以前的活动而没有真正重大进展的武装行动,正在:

- (a) 阻碍反对贝坦科尔特之流的猩猩派的政治行动和力量的重新集结。
- (b) 允许贝坦科尔特之流的猩猩派集团维持他们的联盟。
- (c) 对阻止“广泛基础”的迅速瓦解起作用。
- (d) 对于正确的革命运动总战略的信心,也起着破坏作

用,而这一革命运动总战略的基础是在委共三大上奠定,随后又在接连几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得到充实的。

其次:因而,党应该从军事阵线后撤,并建议停止武装行动,借以帮助和重建其部队,并使他们准备迎接一个新的革命阶段,这一阶段,从军事行动观点来看,应包括比以前更多的人数。

在完全恢复以前,在吸收新力量和重新集结全国各方面人员方面取得进展以前,民族解放军的一切军事行动必须停止。

这一军事撤退应配以政治攻势以利掩护我撤退,减少镇压的压力和重新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之,这不是一次新的停火而是更基本的东西。这是一次暂时改变斗争过程的尝试,亦即停止游击队与战术战斗队的行动,而置政治活动于第一线的一次尝试。^①

因此,到1965年底的时候,在道格拉斯·布拉沃与游击队司令员们为一方,同共产党特权阶层为另一方之间,显无共同的立场。随后在12月间,民族解放军总部当时正好有三个没有被监禁或放逐的成员,他们组织了从各条战线来的全体游击队司令员的一次会议,想订出一个将来的行动计划。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成员仅非正式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作出了下列的决定:

第一,改组民族解放军领导,以道格拉斯·布拉沃为其第一司令官,以游击队其他领导人为其指挥委员会成员,理由是唯有实际参加战斗而不是身居城市的那些人,才能在指挥战事问题上具有发言权。

第二,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被提名为“民族解放阵线”执行委员

^① 1965年11月7日的文件,曾引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1967年3月13日在哈瓦那大学的演讲中。他还念了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准备的类似的文件。

会主席，而阿梅里考·马丁被提名为其总书记。这两位，和道格拉斯·布拉沃将组成联合的政治——军事领导。

第三，将召开一次“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的会议，以便在愿意同它联合的各类组织的队伍内部，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整体。^①

三个月后，即1966年3月，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埃利亚斯·曼努依特从伊拉卡拉山以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阵线的名义，发表了“伊拉卡拉宣言”。该宣言较详尽地说明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面临革命运动的问题，并以新组成的“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准备同政府进行讨论的这一新的协商纲领，为其结束语。它包括下列几点：

1. 大赦所有平民和军人罪犯。
2. 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撵出武装部队的军人应一律回复原职。
3. 按照宪法使一切政党合法化，并恢复其职能。
4. 取消警察总局与其他镇压机构。
5. 实行并尊重宪法与法律，所有公民在宪法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6. 经济政策应有利于群众。
7. 停止对于游击队阵线的包围，因这些行动是针对农民的。关闭在卡奇诺、卡布洛和埃尔托鲁托等地的集中营。^②

道格拉斯·布拉沃在1966年9月对记者的谈话中，对新的“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的政治纲领中的重要项目作了概要的说明：

^① 这次会议的进一步详情，见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所著：《走向革命政权》，第22页。

^② “伊拉卡拉宣言”全文刊印在《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委内瑞拉游击队里》一书中。

工业化：

适应我们社会所要求的发展水平的工业化；允许我们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铁，由委内瑞拉人民来加以控制的工业化；允许不仅象现在发生的那样单一的生产，而是多种生产的工业化。事实上由于石油和铁的生产，其他生产形式已被大大削弱，特别是农业。

土地改革：

“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和解放运动所谋求的土地改革，是真正要破坏国内封建主义的结构，把土地交给农民，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贷、医药和机器的一种土改；这种土改将瓦解国内旧的封建主义结构，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而带来工业化并打开新的市场。

我们要使我们的土改去瓦解旧的封建主义结构：目前71.6%的农民只占有2%的土地，而1.5%的地主或农场主占有78%的土地。委内瑞拉70%以上的土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委内瑞拉人的大多数却仅占有2.5%的土地。我们的土改是要对这个结构进行根本的和公正的改变。

国际政策：

这些不爱国的政府，对国内只给有限度的自由，并继续向人民进攻，却实行了一项完全依附于美帝的国际政策。他们没有能表现出一点点委内瑞拉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特点；他们一贯追随美国，甚至对别国的解放运动进行谴责。多年来，委内瑞拉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采取了不公正、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不爱国的立场；在越南革命的问题上，委内瑞拉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府；在英属圭亚那独立的问题上，委内瑞拉政府采取了投降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笨拙的立场。总的讲，其国际政策是完全受华盛顿、受美国指挥的；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和共和国总统都不能对国际政治自由发表

意见。^①

游击队司令员们就用建立起新的“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和发表“伊拉卡拉宣言”的行动发出了挑战。就只等共产党领导人起来应战了，而他们的应战行动也并不缓慢。

1966年3月18日共产党总书记赫苏斯·法利亚和“左派革命运动”前总书记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一起被释出狱（从1963年起他们在狱中一直受难）。他们是左派内部两位主张结束游击战运动的领导人。同时，另外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爱德华多·马查多和古斯塔沃·马查多兄弟两人也被释放。大赦运动已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他们几乎立即开始发动一场反对道格拉斯·布拉沃的剧烈运动。这是共产党人为了反对他们内部异端分子一向搞的惯技。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负责党的军事的赫尔·曼莱雷特，实际上指使了一些他的人不断地去同布拉沃捣蛋。^②虽然布拉沃实际上未被开除出党，但他在政治局的职务已被停止。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很不满这样对待他的同志，于1966年5月底的时候，他给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信：

大多数政治局同志对我们所提建议——其唯一目的，是要帮助解决一些明显的问题，以便给中央第七次全会所同意的路线以更大的力量——的回答，是把提出这些措施的一个
人称为“罪犯”。他们对他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包括暗指他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其他“难听的话”。难道可以对从

^① 1966年9月同道格拉斯·布拉沃的谈话，刊印于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著：《委内瑞拉紧握武器》一书。

^② 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爱国者在委内瑞拉登陆》，《事件》，1966年12月10日。

未表现丝毫软弱行为的人进行这样的指责吗？那么对于那些为了这样或那样理由而建议停止武装斗争和改变战术的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谴责才适合呢？^①

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代表政治局回复了奥赫达：

这个一致通过和不能取消的决定，是不能被误解的：我们不愿承认道格拉斯同志为民族解放军的执行指挥部的头头，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派系集团。我们准备无条件接受党的政治局为了维护我们党的统一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如果我们接受道格拉斯作为民族解放军的第一执行司令员，那么我们就是助长了对共产党的统一所进行的攻击。而由于我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委内瑞拉的革命，因此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怎么也不准备容忍对党进行攻击的任何企图。^②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愤怒地回信说：

承受了种种困难的是我们；担负了主要责任的也是我们。是我们同我们的无私的游击队一起在前线分担了牺牲。因此，就象你不能容忍道格拉斯·布拉沃当民族解放军的第一司令员那样，我们也不再能容忍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牢里或自愿流放的那些领导人的存在。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履行这一决定——借用一下你们发明的语言。

我的团结精神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我赞成党的团结，赞成革命运动的团结，赞成所有委内瑞拉爱国者的团结，以便推动

①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走向革命政权》，第28页。

② 同上。

提供给我国和为我们人民所要求的历史性的改变。但在这个时刻，团结的意义又不同于1月23日那时候的团结了。^①现在关于团结，我有一个不同的概念。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有了进步的理由。

我认为团结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基础。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必须有革命基础。没有武装斗争，没有游击队，没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这种团结就不符合我的概念。没有能力来维护它自己和发展其所产生的变化，这种团结是1月23日式的团结。“从乡村俱乐部到‘乳香树’”式的团结，只能用让步和战术与战略上的撤退来换取。此外，当社会主义已经有一只脚扎根于拉美的这样一个时刻，这种团结是会使人误入歧途的。^②

古巴的存在，自然会使支持古巴革命的一些运动难以坚持说：他们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控制的人民阵线。奥赫达就是首先指出共产党立场中这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的人之一。在另一封也在1966年5月写的给特奥多罗·莫利纳·比列加斯的信里，奥赫达试图说明为什么游击队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的态度不同于那些城里人的理由：

由于我有的是新的思想方法，有的是我差不多连续三年在空气也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山上所形成的思想，我也许已经站到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既然在我们游击部队里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花在理论上，而大部分时间

^① 佩雷斯·希门尼斯在1958年被法夫里西奥·奥赫达领导的爱国委员会所推翻的日子。

^②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走向革命政权》，第24页。“乳香树”是一个加拉加斯著名的左翼工人区。

是花在实际的事务和计划如何向新的地区扩大革命影响，以便更有效地对抗共同敌人和打败长期的封锁等等上面，因此当时我认为这里（在城市里）革命者的主要问题应该包括具体的事务、即属于必要的事情。但很不幸，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已看到，主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讨论怎样去面对和打败敌人袭击的客观现实的计划，而是去查探运动内部的错误，加以扩大，并在小小的争论中阴险地加以利用。因此讲得多、做得不多。而在山上，我们是讲得少、干得多。^①

在月底即 1966 年 5 月 31 日，他给吉列莫尔·加西亚·庞塞写了一封语气类似的信：

我写了好几封信并寄了些很长的文件，其中之一是给你的。其他同志也这样做了。但是我们的话等于是说给聋子听的，没有反应。看来上面并不关心如何解决问题以便加强我们，而是去加剧问题来削弱我们似的。看来一个“转折”和“新战术时期”的前景，要比我们受苦和我们日益增长的困难更加重要。没有回信；没有片言只字，我亲爱的朋友。他们在歪曲我们的态度时，表现得那样急急忙忙，而在我们焦急地寻求有效的、有生气的和言行一致的领导时，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最后，绝望中，奥赫达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信，说明了形势：

亲爱的朋友：这里，总是一直同堆积如山的暂时困难搏斗着，为的是要把斗争置于更稳固和更准确的基础上。在这方

^① 1966 年 5 月 17 日的信，曾引用于奥赫达：《走向革命政权》，第 6—7 页。

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主要步骤就是去解决领导上存在的核心问题以及解决国家机构的问题，象“民族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和民族解放军执行指挥部之类机构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对整个运动的结构进行一次总的改组工作。为此目的，我们正努力工作，以便尽快地举行一次“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全国大会；这一大会将拥有选举和任命之权，以便研究和分析形势，就战略、战术和政治与军事路线进行辩论；并作出任命各级领导人的规章……

我们引导斗争走向新的基地的决心，已使我们提出若干重要问题。首先是改组“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的现有全国性机构、成立临时性机构的问题。我们已决定扩大目前的领导中心。这导致了委共内部的一次危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对道格拉斯·布拉沃采取了制裁态度。他被开除出政治局，被控犯有分裂主义的反党活动罪名。

第二项决定，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以便提高民族解放战争的水平。这是走向夺取政权和获得民族独立的唯一的手段……

游击阵线的高级司令员们已参加民族解放军总部。这一决定是在分析了这些机构目前情况后作出的，由于其他成员不是在狱中就是在国外，因此民族解放军总部仍然活跃着的三个成员的核心，被认为是不足以执行全面的军事上的指导工作的。为了团结革命力量，以便提高民族解放战争的水平，将成立一个单一的委员会来研究和准备关于战略、战术和运动的政治与军事路线方面的理论材料，将在下次全国“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大会上加以讨论。

“左派革命运动”的加入领导机构和大会的准备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进入一个就目前分歧进行内部讨论的时期……

然而，由于委共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所采取的纪律措施，结果产生了一次新的内部分裂。

关于这一新的问题，我得到消息说：在中层和下层甚至在中央委员会本身，都对加于道格拉斯同志身上的制裁表示抗议。已开始散发包含这些抗议的文件。我个人看法，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所采取的纪律措施，显然起因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这是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部分被掩盖了，因为他们集中攻击的是道格拉斯同志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所应用的方法和造成的所谓错误，这些人对我们革命过程中的战略和战术同他有共同的观点。委内瑞拉共产党内部正就两种重大的思想潮流进行辩论。

第一种意见，（存在于党内少数人当中，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势力较大）如下：目前条件允许革命运动在政治战线上采取主动；但要做到这一点，民族解放军必须命令其游击队与战术战斗队后撤。这不是一次新的停战，而是更加根本的东西：我们正在设法改变战斗的方式。也就是说，要开展一个新的战术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不是在战斗方式上进行协调而是要停止游击队和战术战斗队的活动。为了使游击队和战术战斗队能作有秩序的撤退，革命运动能改变其战术，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特别是要保持团结、内部一致，铁的纪律和支持领导人。要取得这些条件，党和青年必须在两条战线上采取行动：首先，要利用说服和所有政治上的理由和论点来支持新的战术上的改变，他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要被说服的人进行讨论。其次，要对冒险主义和挑衅进行积极的斗争，而政治局重要成员向这一机构所提出的两个文件，也就等于冒险主义和挑衅。

另一种意见，在一般党员里有支持的人很多，但在领导机构中支持的人很少。这种意见是以道格拉斯·布拉沃同志为

首的一些人积极主张的。他不仅反对战术的改变，也强烈批评了指导革命斗争的方式。

你能看到，争论的原因是武装斗争问题，而委共的一些领导从一开始就一直反对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对道格拉斯同志采取的制裁，就是转折的开始；这一制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纪律手段来消灭任何反对向新的战术阶段转变的人，在这一阶段里，不是要协调各种战斗形式，而是要停止游击活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关于让更忠实和更坚定的分子参加进去以扩大最高机构的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反对这个措施，并且公开声称这样建立的机构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以此来试图搞臭我们。

我们方面正在坚定地顶住。我们除了欢迎来自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他组成“民族解放阵线”的党派和民族解放军的一些城市队伍的支持外，也非常欢迎委共中下层党员和游击战线所给予的强烈支持。

澄清思想和确定革命道路的时期现在开始了。在使我们处于困难境地的这个形势中，有一个暂时的不利因素：这就是资金问题。政治局一直在管理这一方面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所有给革命运动的援助都集中在那个机构里，而且按照其政策来使用这些资金，也就是说，用经济上的办法来扼杀游击“中心”……

我战斗人员的士气很高，而且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注意到目前困难的程度，但我们肯定将尽快地克服它们。真理将普遍于怀疑论者之中，而且将为我们的前景带来光明。我们决不回头，更不用说加快逃掉！

我们的发言人会讲得具体些，并把有些事情讲得更明确，我们向前走，走向胜利。我们将战斗到胜利。你的朋友法

夫里西奥·奥赫达有力地拥抱你。^①

就在此信寄后几周之内，奥赫达死了。6月中旬，他同道格拉斯·布拉沃一道下山去加拉加斯，最后一次和共产党领导人讨论问题。6月17日他在加拉加斯以外的拉瓜伊拉地方的一幢屋子里被军事情报人员逮捕。四天后，在6月21日，据政府的说法， he 被发现吊死在他的牢房里。他无疑是被暗害了。

在国内危机达到极度严重的时刻，法夫里西奥死了，这对游击运动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奥赫达在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之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此也就成了鼓吹革命队伍中需要团结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是有能力建立一个团结的革命运动的少有的委内瑞拉人之一。在他被害以前，这个运动已经在不断瓦解；而他的死去，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① 此信曾引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1967年3月13日在哈瓦那大学的讲话。

七 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卢文·佩特科夫的民族解放军

谋害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是政府在1966年的反攻中取得的胜利之一。差不多60%的国家的武装力量被卷进去了。为了替奥赫达之死进行报复，民族解放军在加拉加斯组织了一次针对警察总局头子加夫列尔·何塞·派斯的袭击。其后在7月里，它发动了令人难忘的“博利瓦尔行动”。

在“解放者”诞辰周年的7月24日，一批受过极好训练的游击队在法尔孔州海岸登陆。他们从各自接受训练的世界各地向位于委内瑞拉海岸以外的马加里塔岛进发。他们就从那里在现任民族解放军第二司令员卢文·佩特科夫带领下，向大陆发动了进攻。

后来在这一年的9月，当卢文·佩特科夫一批入侵人员得以同伊拉卡拉山里的道格拉斯·布拉沃的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阵线会合的时候，佩特科夫对正在访问的记者就“西蒙·博利瓦尔”登陆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这一行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军事性质的，但它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7月份），委内瑞拉的革命运动正经历着一次危机阶段。因此做一些不但能够伤害敌人、而且又能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从而开展委内瑞拉革命新的战略时期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的确也是迫切需要的。

在法尔孔州海岸的成功登陆，对政府武装部队和美帝来

说，是一次严重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挫折。这不仅表明消灭游击队是不可能的，也表明寡头政治及其假革命的领导人所称委内瑞拉运动的士气沮丧并已被粉碎的说法，是虚假的。^①

据佩特科夫称，在西蒙·博利瓦尔登陆的决定，是上年12月道格拉斯·布拉沃与法夫里西奥·奥赫达就任“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时就作出的。佩特科夫被分派了帮助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游击队潜入委内瑞拉的任务，所有这些游击队员都具有在别的国家（除了在委内瑞拉外主要是在越南）进行游击战术方面的经验。因为这些人都是委内瑞拉情报方面所熟知的，所以他们就不能通过正常的秘密途径回到国内。他们先到马加里塔岛，再从那里相当容易地组织一次登上委内瑞拉本土在法尔孔州海岸上的行动。

政府当局必然声称这一登陆是从古巴发动的。佩特科夫解释说：

委内瑞拉和亲帝国主义的报纸决定发表关于我们这次远征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说这批人是在古巴登船的，并且是由古巴人组成的。报纸在听到登陆消息的时候攻击古巴，这对我们说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总是选定拉美解放运动的先导者来加以攻击。这并不使我们惊奇，因为我们很熟悉古巴人民的感情；因为帝国主义也熟悉他们；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并不保守秘密；因为他对古巴人民和对全世界人所有的讲话里都讲到这点，并再三重复这点；因为谁都知道古巴人民不仅准备对美洲的解放运动而且要对三大洲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形式的援助；因为帝国主义者们都知

^① 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爱国者在委内瑞拉登陆》。

个仍然处于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国家继续进行战斗的时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的信里就讲到过。^①帝国主义必须控告古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要控告苏联或是总的控告社会主义阵营就更困难些；由于知道他们拉美仆从们和走狗们的心理，所以谴责古巴就更容易和更方便些。

我个人相信，古巴人民会以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府的谴责而感到骄傲。每一个人都能运用他的想象力。每一个人都能相信他们所喜欢的事物。对我们来说，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到达这里了。

但几乎在刚到达的时候，这一小批委内瑞拉游击战士就遇到委内瑞拉空军的袭击——这表示要组织完全秘密的登陆是多么困难。这使我们回想起古巴人自己在1956年12月乘格拉玛游艇到达时，很快就碰上了巴蒂斯塔的一个支队。佩特科夫透露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在登陆后的一天，他们就开始轰炸我们，每天这样。山上一天有几次遭到轰炸，不仅是山上，还有农民的田地。他们在这块地方到处丢炸弹，早上、中午有时晚上也炸，整整炸了一星期。

B-26轰炸机和直升飞机每天到来。当我们听到直升飞机时，我们知道扫射和六百磅的炸弹即将到来。这一切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干的。

我可以说不，轰炸对游击队是完全无效的。这不是秘密；下令轰炸的人也知道这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有几

^① 格瓦拉给菲德尔的信里讲到：“其他国家正需要我的棉力来帮助它们。我能干你所不能干的事，因为作为古巴的领导人，你肩负重任。我们分别的时间已经到了。”——曾引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1965年10月3日的讲话。

点理由：首先，以此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武器来吓唬农民，把他们赶出土地并破坏其庄稼，这样他就会离开乡村而不能帮助我们了。这是轰炸的目的之一；另一点就是可以对他们的主子交帐，说他们已经肃清了游击队。

所以一星期后，当他们估计他们可以说已经摧毁了这批游击队的时候，轰炸就停止了。

而游击队员们就设法从海岸向可以避免被袭的山里前进。

佩特科夫最后说，以这一行动为例，就能说明我们革命运动在群众当中享有广大的支持。我们能这样干，是因为尽管政府差不多在同一天发现我们已经登陆，而傀儡军队在我们抵达海岸后没几个小时就开始追击我们，但他们还是不能把我们包围或加以消灭；他们不能把我们消灭。他们没有能做到这点，不是由于魔法的功效，也不是我们变得看不见了，更不是由于这儿不能说的理由。而就是因为委内瑞拉人民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把斗争进行下去。

我们并没有把解放委内瑞拉看成仅仅是解放我们的国家，解放我们所诞生之地。不，当我们讲到解放委内瑞拉时，我们指的是解放整个拉丁美洲。我们不承认拉美内部地理上的边界。我们的边界是意识形态上的边界。我们是按着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解释国际团结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准备好同帝国主义一直斗争到它不复存在的时候为止的原因。

委内瑞拉人民可以放心，我们这些委内瑞拉的真正革命者……已准备牺牲一切，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已准备运用任何办得到的手段来解放我们的国家。我们准备放下武器，除非委内瑞拉获得自由和主权。

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充满信心，我们的战斗将会有效地

支持那些今天正给我们帮助的人。我们把国际团结看成是双边的，我们认为：在友好国家给予我们物质和道义援助的时候，当一个民族援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效地运用这些援助，那么我们也是在援助他们。当我们袭击敌人袭击傀儡军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支持帮助我们的人，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支持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支持三大洲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确信我们正在帮助世界人民取得反对美帝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的胜利。

到1966年底为止，活动于委内瑞拉的唯一重要的游击运动，仅剩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卢文·佩特科夫的游击队运动了。虽然共产党装模作样要维持各游击阵线，事实上这些游击阵线已完全不活动了，而该党也无意再使他们活动起来。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道格拉斯·布拉沃首先说明新的“民族解放军”的组成情况，然后阐明它在委内瑞拉革命历史中的重要性，最后概括了它的纲领：

有人一再说：民族解放军都是由共产党人所组成的；另有人说：它只有“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这些人都错了。民族解放军是由共产党人、“左派革命运动”成员、“共和民主联盟”和来自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所组成的。的确，我要告诉你们一些大概会使你们惊奇的事：在民族解放军里，就在这里，你会发现有来自民主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共和民主联盟”和其他方面的当权派或在过去七年里曾经当权过的人们。^①

布拉沃然后回顾了前八年的全部历史，最后他说爱国委员会

^① 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委内瑞拉紧握武器》。

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未能组成自己的军队：

对于为自由而战斗的世界人民来说，我认为建立一支武装部队是最根本的。

有两个最近解放运动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事实，而它们的经验在建立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方面是有用的。在1958年1月23日清晨，一个人民群众和爱国军官的联合运动推翻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政府。人民都上了街。八十万加拉加斯人民接管了街道。人民重获自由。各种工会涌现了；一个空前的群众运动传遍全国。然后人民掌握了宣传通讯工具；人民有了报纸和电台，人民上了街，人民毫无疑问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美帝的权力和保守的地方寡头政府的权力把军队——他们的镇压工具——保持原封不动。而由于1月23日崛起的运动是被称为“爱国委员会”平民运动，该委员会并没有建立起其自己的解放军，因此使美帝国主义和地方的寡头政府能够渐渐地从防守转入了进攻，并逐步收复失地，以致最后能使贝坦科尔特掌了权。

“爱国委员会运动”，这一在1958年推翻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的起义运动，由于缺乏武装部队而吃了亏。但在古巴并没有发生这类情况。在古巴，1959年1月1日那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带了起义军队掌了权；他们摧毁了敌人军队。可是，报纸、电台和各部门仍然在反对革命运动的那些人的手里。古巴寡头政府和美帝的关键人物仍然占据革命政府中的重要职位。

但由于革命军队变成了一支人民的军队，而革命军队已摧毁敌人军队，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解放运动能够把寡头们和帝国主义者从他们仍然占据的位置上赶了出去。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可以依靠一个强大的武装运动，一支由工

人、农民、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民的军队。

这就是古巴政府赖以实行巨大改变的基础，不象我们在委内瑞拉的遭遇。1月23日我们搞了一次巨大的群众运动，一个巨大的工会运动，一个巨大的学生运动，但我们没有人民的军队。^①

以摧毁旧的军队为重点，是全拉美游击队的中心思想。德布雷在他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这一论点似乎很有意义的。军队是镇压性质的，而在巴拿马等地方对军官团所进行的思想灌输，看来是为了要保证使那些具有进步的民族主义左派的观点（象图尔西奥斯·利马或埃利亚斯·曼努伊特·卡梅罗这样的人的观点）的军官日益减少。尽管如此，这一论点当中还存在一点不足。实际上，革命政权，不论在古巴或在中国，都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一个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确，可以争论说，某些传统的军人特点——比如说纪律和服从——在发展过程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说，六十年代早期拉美军队的性质是反动的，那么自然会认为，只有把军队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才有可能产生一次真正的革命，那么在六十年代末期，在某些拉美军队中出现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表示也许从他们内部进行颠覆是可能的。

^① 同道格拉斯·布拉沃在1966年9月的谈话，刊印于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著：《委内瑞拉紧握武器》一书中。

八 共产党人对菲德尔

1967年初在加拉加斯发生了一次事件，这一事件有使游击队和共产党间潜在的争论趋向公开之势。3月1日，外交部长的兄弟和前社会安全系统头子胡利奥·伊里瓦伦·博尔赫斯博士在加拉加斯被绑架。两天后，在城外二十哩地方发现了他的身中三弹的尸首。据警察称，在他的尸首附近有民族解放军的传单，上面赫然写着：“我们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三个政治领导人。”

除了这些传单以外——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民族解放军所发的——就没有别的东西可资证明谁该为这一谋杀行为负责。据一位记者说，伊里瓦伦是“当前委内瑞拉最受憎恨的人”。他提高社会安全税，但同时却没有作任何事来改善社会福利。也有一种讲法说：伊里瓦伦泄露了一项右翼反政府的阴谋。因此，他已左右树敌了。

他被暗杀的次日，共产党即迫不及待地自称该党光明磊落，并未插手此事。一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加拉加斯大学教授埃克托尔·穆希卡宣布说：该党断然和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一活动形式，因为这一做法与革命丝毫无关。他说当天早上，他以个人及其家属的名义，给被杀者之兄即外交部长拍发了唁电。

在上月即2月份设法逃出监狱的三位共产党领导人庞佩约·马克斯、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和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于3月5日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认为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和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方法，不仅不是革命的行动，而且有害于事业的，因此必须加以摒弃。

可是，次日，在哈瓦那《格拉玛报》上，就出现了由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死后接任“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全国指挥部主席的埃利亚斯·曼努依特·卡梅罗签名的一个声明。当时他正好在古巴：

劳尔·莱昂尼政府以最近胡利奥·伊里瓦伦·博尔赫斯的处决为借口，发表了一项新的法令，停止了宪法的保证，这是日益削弱与害怕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的表现。

最近……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全国指挥部发表了一项公报声明，对于每一个被政府暗害的革命战士，爱国力量将报之以用革命方式来惩办三个政府中的人。（这些人对镇压和我国——这个国家正被为美国人服务的叛贼所控制——的贫困，负有责任。）

关于三个失踪了并在后来发现被政府谋害的革命领导人的案件，尽管上诉了法院，要求提供其行踪的情况以及其妻、母在报上发表了声明，但全部归于无效。

就象我们在加拉加斯散发的传单上所宣布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决定要以革命的正义来惩办胡利奥·伊里瓦伦·博尔赫斯的理由……

一场反对那些人民的敌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卷入目前委内瑞拉的情势）的殊死战，将继续进行下去……委内瑞拉人民不再是无依无靠的了，它现在已拥有一支武装起来的坚决的先锋队，这一先锋队将随时保护他们，为其死者复仇，并领导它取得最后胜利，取得其最后和彻底的独立。

战斗将进行下去，直到胜利或死亡。

司令员埃利亚斯·曼努依特

“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全国指挥部主席

哈瓦那，1967年3月4日①

委内瑞拉共产党对此事件的发言人埃克托尔·穆希卡匆匆回答说：“曼努依特的声明，就象这一可怖的罪行那样，使人惊愕，而且一张属于兄弟党的报纸《格拉玛报》竟让篇幅用于如此过份的言词……”他的声明强调“断然反对对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兄弟所犯的罪行与这一精神失常的声明，这一声明是由一个被公开开除出共产党的该党过去的党员所发表的，而此人所以被开除，是因为他企图象道格拉斯·布拉沃、卢纳·马克斯、弗雷迪·加尔克斯、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和其他人一样，要利用民族解放运动的名义来分裂共产党，并采取不同的路线”。声明最后告诫“民主运动不要受到迷惑并被拉入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的挑衅中去，这一挑衅是作为从共产党开除出来的分裂主义者和冒险者现在正针对着该国发动的新的进攻的一部分”。②

同时，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正在准备同游击队大干一场。据来自加拉加斯的电报，前海军上尉和游击队司令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在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里说，将以革命正义制裁伊里瓦伦·博尔赫斯博士的凶手们。由前游击队领导人赫尔曼·莱雷特、蒂尔索·平托和佩德罗·维加卡斯特昂三人共同签署的这个文件声称，“那些冒用我们所领导的战斗组织的名义的人，已变成人民敌人的秘密侦探和帮凶”。

这一共产党人对已脱党的游击队员所进行的公开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置之不答的。的确，赫尔曼·莱雷特和其他人名义上还是一个游击队组织的头头，因为该党虽已转到反对游击战争的立场上去，但是从来也没有正式地结束它所控制的游击阵线。他们还停留于萌芽状态而没有开始行动。赫尔曼·莱雷特与其他人无权代表一个“战斗”的组织。

① 文本见《格拉玛报》，1967年3月6日。

② 1967年3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

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决定要在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之间的争论中插一手。他在前一年已收到了法夫里西奥·奥赫达的来信，并已越来越关心地注视着该党同游击队疏远的情况。对《格拉玛报》进行的攻击，必须回答。这一次，他就选择了对哈瓦那大学学生作一年一度的讲话的机会——1959年进攻古巴总统府的第十周年。

菲德尔解释说，关于伊里瓦伦之死，他一点也不了解此人的生前经历，也不知道谁应该对杀死他这件事负责。可是，他讲得很明确，他不热心于这一革命行动的方法：

我们的看法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干那些结果反而有利敌人的事情，绑架了人，后来这人尸体又被发现了。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尽管我们对敌人的残忍是多么愤恨。我们对战斗中的被俘者还给予优待。

革命者应该避免采取象专搞镇压的警察那样的行动。我们对其死因，谁干的，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或者是否由革命者干的，都一无所知。我们的公正看法——这是所有革命者都有权发表的——是认为如果是革命者所干，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敌人将用来反对你，而人民也就不能够区别你们和敌人了。

但在批评了那些这样干的人之后，菲德尔然后对委内瑞拉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攻击，谴责它的领导人叛卖了游击队。

委共党员同样无节制地进行了反击，责备菲德尔要把自己树立成为拉美的教皇。“道格拉斯的反党派”即将被打败。共产党明确表示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参加下次竞选的计划。

1967年4月，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自从1961年第三届大会以来的第八次全会，以便讨论由于道格拉斯·布拉沃决定

在山上组织不受党控制的联合的“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所引起的严重局势。会议是在加拉加斯大学里举行的——这是处于越来越敌对的环境里的一个传统的左翼据点。

全会的主要议程是要批准党关于放弃武装斗争并参加竞选的决定，并且要用呼吁团结来保证党的大多数党员不站在道格拉斯·布拉沃一边。有一个正统的共产党人就这样解释说：“极左派要把党推向幕后，分裂它并破坏它的企图，是我党的团结和生存受到的最严重的考验之一。”^①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最后说，近期所犯的错误已导致了一个危险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下，列宁主义的组织和领导原则常遭到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准则不被遵守而且高一级的委员会被忽视了。^②

涉及武装斗争的决议，用了这样的措词，以致可能使人得出结论，认为该党既赞成武装斗争又赞成和平道路。于是，有一个决议证实了“以采取武装斗争方式和规定非和平的革命道路为委内瑞拉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轴心这一决议的正确性”。可是这仅仅强调了该党以前决定的正确性。但这仅是肯定党以前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罢了。全会认为：在1962年，国内的一种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但又指出：“从1963年开始，斗争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型式已开始转变。经济情况已逐渐有起色。”在1963年选举之后，“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已变得明显，而起义的条件……变得更不利了，最后形成了现在面对我们的形势。”

一项决议最后说，今天，政治和社会形势的“特点是：力量对比上和武装斗争条件上，已发生不利于我的变化，民主运动的削弱，革命力量的孤立和不团结，以及由于为1968年普选作好准备

① 胡安·罗德里格斯：《委共政治路线的新奇之点》，刊载于《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7年9月号。

② 同上。

对国内政治生活所施加的影响”。只有利用选举运动，才可能恢复人民力量的团结。

全会对该党没有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1963 年的选举运动，特别感到难过。

我们应该参加选举的——暂时停止武装活动——而把重点放在着眼于重新集结民主反对派的一项广泛的联盟的政策上面；这样做就可能在选举中击败贝坦科尔特主义，而无论如何也能建立一个广泛的左派群众运动。

后来，一位全会参加者写道：

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并不拒绝把游击战争的经验作为武装斗争的一个特定形式，也并不认为在我国的游击战争已经过时（“党认为我国的游击战争，如果按照我们革命的特点来进行，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把在农村地区进行的游击战争看成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一点，将会是机械地搬用在别的国家行之有效但并不符合我国特点的经验。

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即我国人口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已城市化，急进主义化的群众和革命的主要动力是集中在城市里。我们也从另一事实出发，即外国垄断资本——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经济——和本国资本的主要工业中心设立在城市和邻近地区。再则，在本世纪初以来的委内瑞拉历史表明，主要政治冲突的爆发和解决通常都是发生在城镇里面。革命武装行动因此大部分都采取爱国军人和平民一起搞城市起义形式。特别是在 1958 年 1 月事件之后是这样。

换言之，中央委员会会议认为游击运动是在委内瑞拉和

为委内瑞拉的一种辅助的斗争形式。我国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和事态的进程，完全证明所谓游击队伍是一个与现在的共产党相对立的“真正的共产党的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也证明所谓游击运动是任何民族革命斗争的决定性的、战略性的力量的说法是错误的。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批判性的讨论，对目的在于要确定党的战略路线的集体的思想是有帮助的，它同坚持以往错误的分裂主义者的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就象中央委员会会议注意到的情况那样，“党的背叛分子以夸大游击运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正把它引向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失败的道路上。”更有甚者，“这一低估城市工作的偏向，削弱了总的革命活动。”^①

最后，党的全会决定必须正式把道格拉斯·布拉沃开除出党。正象新的总书记庞佩约·马克斯后来费力地指出的那样（赫苏斯·法利亚当时正流放于欧洲）：

布拉沃并不因为领导一支游击运动而被开除，因为有些中央委员会委员，主要是西蒙·博利瓦尔和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阵线的蒂尔索·平托和阿尔弗雷多·马内罗等仍然是游击阵线的头头。布拉沃是因为背叛党的纪律，因为建立了分裂党的平行机构和因为犯了分裂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给他的惩罚，是因为他企图破坏委内瑞拉共产党，并代之以无组织的和非马列主义的机构。^②

卡斯特罗在1967年8月哈瓦那召开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

① 胡安·罗德里格斯：《委共政治路线的新奇之点》。

② 见庞佩约·马克斯给《国民报》（加拉加斯）的信，1967年5月。

议”上的一次重要讲话里又回到了对委共的攻击。他指控说，共产党人“差不多已经做到了既非帝国主义也非那个政权的镇压力量所能做到的事”。他进而指责该党右翼领导的背叛。使卡斯特罗恼火的部分原因可以从他的国内问题中去找，这个原因不在委内瑞拉，而完全在于古巴革命的发展史。卡斯特罗关于古共内部的右翼“小宗派”的问题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也达到了高峰，而其结果是共产党的一个“老保守”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于1968年1月坐了班房。但是卡斯特罗很明确地厌恶委共党员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卡斯特罗分子”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这一重要的争论，正是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一支游击运动而差不多完全没有得到当地共产党的支持的时刻发生的。^①

^① 见本书第五部分。

九 一个共产党人的结论？

1967年以来，委内瑞拉的游击队仍然活动着，但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这一年的5月，象是要以更加戏剧性的形式来表示拒绝委共所提出的理论似的，古巴人就让他们自己直接地卷入了委内瑞拉的游击活动了。5月8日，一艘来自古巴的小船在米兰达州海岸登陆。船上有四个古巴人和一批在古巴受过训练的委内瑞拉人，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参加阿梅里考·马丁和左派革命运动已建立游击阵线的埃尔巴奇列尔地区的游击战斗。委内瑞拉的武装部队正等待着这一小股人员，但就在跟着发生的战斗中，其中一个名叫皮科的古巴人溺死了。远征队的头头名叫安东尼奥·布里奥内斯的古巴人被枪杀，而其他两人则被捕了。他们当中一个人后来发现缢死在他的牢房里面。

古共书记承认古巴人参加了这次登陆，但他否认他们曾经是古巴武装部队的成员。5月18日发表的一个古巴的声明宣布说：“我们的党，同因为帮助委内瑞拉革命者而牺牲的安东尼奥·布里奥内斯的利他主义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姿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两个月后，在试图离开委内瑞拉以便前去哈瓦那参加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时候，阿梅里考·马丁自己也被捕了。从此，左派革命运动和道格拉斯·布拉沃两者的游击队均处于逐渐削弱的状态。有些人批评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革命者的援助太少太晚了。如果古巴的援助在1962和1963年间似乎真的有起义成功的可能性的时候来到游击队之手的话，那么这个援助或许能起决定

性作用。但这已经是事后的智慧了。也许，最能概括委内瑞拉在这些年里所犯错误的情况的，该算是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了，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智而又最不教条的一位成员。一度是游击队的支持者，后来他和共产党一起反对游击队。但是他的兄弟卢本继续从事战斗，而这一种同仍然在进行战斗的游击队员之间的家庭联系，使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能以更加同情的眼光，观察这一问题。

下面是刊载于1968年1月出版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上面的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同记者的一段谈话，这一谈话总结了委内瑞拉游击队的经验：

我们今天并不是处于真正的武装斗争的状态，而只不过是武装起来的一些部队而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部队，根据该党的决议，目前并没有进行军事活动；还有一支道格拉斯·布拉沃领导下的部队只进行一些偶发的活动，另外属于“左派革命运动”的两支部队，情况也差不多。但那是农村地区的情况。城市里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参加了道格拉斯·布拉沃的那一部分城市地下组织的人在政府的反击中已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左派革命运动”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残存的城市武装已极为微弱和不活动了。

在问到继续存在的游击部队情况时，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作了下面的回答：

先讲，在队伍的组成上已起了激烈的变化。起先，他们差不多完全是由城市的人组成的（大部分是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后来有一些农民参加了进来。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道格拉斯·布拉沃的纵队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的，虽然我

不知道“左派革命运动”的人是否也如此。

游击队员主要是农民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比过去容易生存下来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在展开活动的地区土生土长的并且与当地人民有联系；他们也已习惯于农村的艰苦生活并更有条件去取得食物，接触村里的朋友，和寻找隐蔽的所在。

他们所以能生存下来，也是由于他们在农民当中进行了政治工作。有人把不进行战斗的游击队比喻为飞行中机器出了毛病的飞机，它的命运注定要完蛋的。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虽然打仗的时间加起来要比不打仗的时间少得多，但不打仗的时间已被有益地利用去做人民的工作，去扩大社会基础，并用来招募新队员和建立防御。所以我们好的和坏的经验两者都有很大的意义。以拉腊州的西蒙·博利瓦尔阵线为例，它是有相当战斗经验的最重要的游击队中心，曾给敌人几次沉重的打击。在1963年初被搞垮之后，它又设法进行了改组，但是它直到1965年中期才参加战斗。在这两年的间隙中，我们的游击队做了重要的政治工作，在约有十万人人口的拉腊、波图格萨和特鲁希略等州的农村中扩大了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势力。

对农民的工作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进行的，虽然我们肩上还背着枪。游击队的势力扩展到约一百二十五个村子这样相当广阔的地区，有些村子还相当大。我们的大错是我们公开地进行工作，在村子里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部队在大的山区里自由活动，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已能完全控制了。然而，当陆军发动了一次攻势的时候，告密者就提供了我们的人和他们的帮助者的名单，差不多有二百个人被处死，而且我们的大部分政治组织都被摧毁了。

但我要说清楚的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当时已产生了一

个社会基础，尽管有陆军发动的攻势和我们公开进行工作的错误，这一基础仍然有效地起着作用，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地下组织，这一组织帮助我们的游击队避免遭到歼灭，这样他们就能重新开始作战而赢得如 1965—1966 年那样可观的成就。我所讲的成就，意指军事上的成就，不仅仅是在政治影响上的收获而已。我们打了几次高度有效的仗，并有效地打击了陆军，伏击了部队，并学会了把炸药当作游击队的重炮来使用。总之，我们游击队在拉腊州所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我们队伍在不打仗的两年期间对人民所做的工作。

你能看到，关于把一支军事上不活动的游击队比喻作发动机坏掉的飞机，是并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的。我们的经验却证实了它的反面。现在也是这样，当我们的游击队不在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象一架要摔下来的飞机，因为他们 在山里进行着艰苦的工作，扩大其同农民的政治联系。

然后，当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被问到关于道格拉斯·布拉沃和他的一伙人的情况时说道：

目前，布拉沃一批人主要是存在于外国宣传报道中，虽然它开始时是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当布拉沃同党决裂的时候，他接管了我们城市的军事地下组织和法尔孔州的“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游击阵线”的大部分，还接管了拉腊、波图格萨和特鲁希略三个州的“西蒙·博利瓦尔阵线”的十九个人，这就是一支相当大的部队，是数量上最大和装备上最好的一支部队，还拥有 一个强大的城市军事地下组织。

布拉沃的战术是要发动他的所谓武装攻势。可以预料，他的攻势是以惨败告终的。如果陆军和警察能成功地破坏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军事机器的话，那么对道格拉斯·布拉沃的

军事机器就能起到双倍的破坏作用，因为布拉沃没有党支持他，因此没有政治后盾，而且它在人民当中既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的部队在警察反击面前退缩了，而他的城市部队，在1967年头六个月里的三次大的警察行动中实际上差不多已完全消灭。不仅是布拉沃的城市机器的原来成员，还有从山上下来“增援城市”的游击队员也被逮捕了，其结果他的游击纵队的力量大大减弱了。

这时在他的同事当中爆发了分歧。随后分裂发展了，他们之中有些人现在到国外去了。所以有根据认为布拉沃的一批人正在分裂。我正试图作到尽可能地公正，因为在派别分歧出现的时候，任何一方通常总是说另一方最坏的话。但是我可以做到更客观些，因为我的兄弟是在另一方，而我和他手足情深，并为他的失败感到难过。此外，在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杰出的人物，我们同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还是存在着，因为仅仅在最近以前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尽管他们作了不幸的选择。他们是由于长期的武装斗争未见显著效果因而受到挫折的人，是有些象那些认为可以通过阴谋或恐怖行为来重振一个衰落中的运动的“古老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他们仍然是燃烧着革命的火焰的好人，而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失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们整个革命运动的失败，影响到总的运动，因为人民难于在各派之间加以区别。人民所看到的是遭受挫折的武装运动——一幅没有取得真正胜利的运动的伤心惨目的图画，报纸报道着被杀和被俘的人数，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有告密的叛徒。这些自然在武装斗争和革命运动中产生不良的影响。

最后，检查一下下列事实是耐人寻味的：道格拉斯宣布说一旦他的一派摆脱了“右倾”的共产党政治局以后，委内瑞拉的战争就会迅速扩大。可是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道格拉斯·

布拉沃依然如旧，而战争呢，远非扩大，反而平息下来了，而且布拉沃寄予其游击纵队的希望，期待他们能经常战斗，使战火燃遍全国，推翻政府并建立革命政权——这一切希望都归泡影，甚至在他的一派的领导人当中，也是这样。

在军事上说，我们的形势是严重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正活动在两条阵线上——在东、西两面。他们是比布拉沃的武装力量更大的力量，而且也大于“左派革命运动”，该运动也有两条阵线。我们正在改组：这是我们的总路线的一部分，该路线在暂时停止武装行动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政治攻势上面。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组织工作，因为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对我们来说，武装行动仍然是主要方法，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达到革命的或民主的变革。我们委内瑞拉的经验教导我们，没有武装斗争，革命运动就不能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改造和加强我们的机器，当一旦客观上的演变，与我们的政治工作和重新恢复同群众的联系工作创造了一个革命形势的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能比以前更有效地作战。

在被要求就目前游击战斗的情况最后再谈几句的时候，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回答说：

我准备这样讲：现在对游击运动有一个真诚的和现实的重新估价。在实质上，游击战从来没有被放在我们的政治斗争的前哨，也不是我们武装斗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些决定性的战斗——那些有可能取胜或我们遭受失败的战斗——是在城镇里打的。就我看来，如果1962年时我们能把爱国军人和革命者的起义同城市里的武装斗争正确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本来是可以取得胜利的。1962年1月份我们已接近了胜利：塔奇拉州的运输罢工在几天内就发展成为一次全国性

的运输工人的罢工，并同加拉加斯的人民起义结合了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在武装部队内部已经拥有一个有效的机器，而这一机器，如果我们能使它起作用的话，那么一次革命的胜利本来是很有可能的。

后来的一些陆军起义（虽然它们是本世纪委内瑞拉的第一次真正的革命起义）就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了。在卡鲁帕诺起义的时候没有存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人民当中也没有酝酿什么行动来帮助传布这一起义。所以它远远没有起到能够在人民当中点燃起革命星火的作用。卡鲁帕诺的战斗是比较短促的，没有给人民以武器，也没有别的驻军参加进来。在主要海军基地的卡贝略港情况有所不同，那里三天的战斗发展为一次造成五百人伤亡的人民起义。那里，武器被分配给从堡垒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游击队和城市居民。

人民和一些武装队伍同政府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空军轰炸了卡贝略港，就象该港是一座敌人的城市一样。政府不惜使用了火箭导弹和重炮。但是卡鲁帕诺起义和政府的反措施当时已这样地削弱了我们的机器，以致我们已无法取得其他驻军对卡贝略港的支持。对事态毫无准备的加拉加斯和其他城市的人民，也没有能取得支持。

谈到城市武装斗争问题，我应该说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加拉加斯的经验，是相当重要的。那里，民族解放军有五支队伍，每支队伍有一百零一个人员。每一支队伍都拥有被称为后援的基地——这是有着秘密隐匿所，一个医疗站和法律事务处，各种运输站和武器弹药隐藏所的一个体系。广泛的联系使我们队伍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必要时它们可以自行隐蔽，它们有相当大的财力，并得到人民的支持。许多部队的成员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学生，所以富有的家庭也是一种支援的来源。

这些部队在行动中是高度有效的，它们的计划是那么详细和准确，以致有时会显得过了头。比如，对加拉加斯美国军事使团的袭击是准备得很完善的，特别是在侦察工作方面，因此就取得了胜利。

这些队伍不仅从事于小股的军事行动，它们还领导整个城市的市区居民同警察和陆军之间的大规模的战斗。我们同志在巷战当中所表现的坚忍无畏简直不可思议。加拉加斯的山头对警察和部队来说都变成了堡垒和梦魇。在任何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之后，警察把市区封锁起来进行的搜查，通常差不多搜不到什么东西（战斗者和武器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因为先锋队同地区的人民紧密结合着。我们珍视这一经验，它肯定将在不远的将来产生效果。

总之，我们对过去的活动所作的分析表明，虽然游击战争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可是它不是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在我们的国家里，游击队活动有赖于城市中的发展；游击队伍没有城市的帮助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他们无此就不能发展。^①

特奥多罗·佩特科夫所作的这一最后结论是重要的。早些时候，农村游击队惊奇地发现它们可以没有城市的帮助而生存下去。但是要达到政治上的有效性的话，它们还是需要能做到比仅仅保证其生存所需要的更多的工作。委内瑞拉游击队已经证明：在无掩蔽的地形上长期生存下去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它们能够从这一点前进到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影响还有待于证明。

^① 《委内瑞拉选举前之动向：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同志的一次谈话》，《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8年4月号。

第三部分

哥伦比亚的暴力

一 “暴力”时期及其遗产

“在 1948—1953 年血腥的内战中，一群匪徒烧毁了一个保守党的富有地主的家，杀死了他的监工和两个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留下地主在他那燃烧着的庄园面前迷惘地徘徊。此人震恐之余，反反复复地咕哝。‘这却是为什么？为什么？’

“而轻蔑的回答则是：‘因为你是富人，而且还是白人。’”

——弗农·李·弗卢哈蒂：《百万人的舞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有两个受左派影响的游击队组织在哥伦比亚活动，一个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受莫斯科共产党人控制，溯其根源将近有二十年。另一个是民族解放军，具有菲德尔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生还是最近开始的。卡米洛·托雷斯神父属于后一组织。在哥伦比亚历史上，他是盖坦以来最杰出的人物，死后又仅次于切·格瓦拉而成为本洲的烈士之一。

在哥伦比亚可能发生革命游击运动的条件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但重要的在于提出哥伦比亚人的两点独特之处。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在 1966 年当选总统时只获得投票额中的 20% 的选票，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发现这个国家的政治

程序上有些事情是极不正常的。65%有选举权的人根本不投票。只许两个性质没有什么差别的政党进行竞争的选举协定所导致的挫折，这是革命者认为不得不用武力摧毁现存制度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更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暴力和内战的背景，这一背景使得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各国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S·韦纳特，曾令人赞赏地总结了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早期如此震动哥伦比亚社会的事件：

从1946年到1953年，由对肉体的袭击到惨无人道的农村暴力行为，席卷哥伦比亚的大部分地方，并触动从家庭到教会每一种社会组织。它是如此地普遍和深入，以致哥伦比亚人觉得它最适当的名称便是总称为：“暴力”。暴力在各个地区的强烈程度虽不同，但在哥伦比亚内地却到处出现。仅哥伦比亚同大西洋、太平洋、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交界的地区才得避免。暴力对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和摧残，言之难尽。谨慎的估计表明，从1949年到1958年之间的暴力行为中，死去了十三万五千人^①。许多人逃避暴力来到托利马的一个市镇，调查研究者发现：在五百零九户中有五百零三户曾丧失若干近亲，而迁来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本是地主；至于这个市镇本身，暴力行为在1950年前后就毁掉了四个咖啡厂和五个铸铁厂。同样的情况无疑遍及其他好几十个市镇。

暴力存在于整个1946—1953年期间。1946—1947年

^① 这个数字出于赫尔曼·古斯曼·坎波斯：《在哥伦比亚的暴力》，第三世界出版社，波哥大，1962年，第292页。古斯曼作了下列的分类统计：

被杀的农民八五、一四四人，其他平民三九、八五六人，军队六、二〇〇人，警察和国家公务人员三、六二〇人，共计一三四、八二〇人。他把因伤致死的那些人包括在内，算出这个数字到达十八万人。他认为1949—1962年间的正确数字是二十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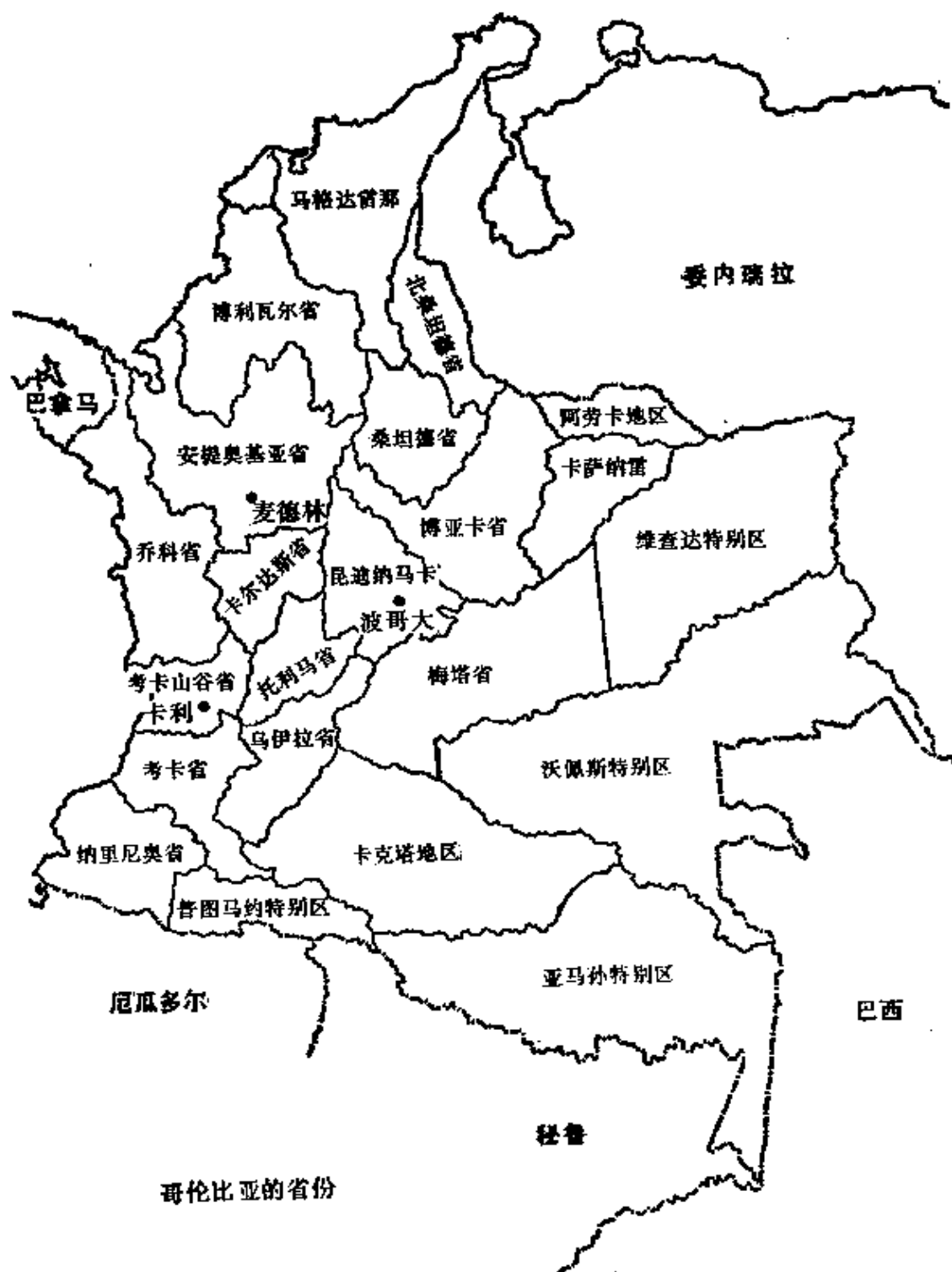


图 3

(按原图译制)

期间，即在自由党人统治了三十年之后刚由保守党人担任总统职务后不久，暴力开始以小规模形式出现。1947年4月，“自由党”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就十五个省中十一个省里的五十六个市镇的暴力行为提出了一份证明备忘录。1948年2月，在波哥大的一次大集会上，他作了“争取和平的演讲”，要求维护公共秩序。1948年4月的“波哥大事件”之后，暴力行为增加了，而在1949—1953年劳雷亚诺·戈麦斯担任总统期间则达到了顶点^①。

比“暴力”发生的规模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随之而来的惊人的野蛮行为。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诺曼·A·贝力写道：

虽然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如果不是因为出于几乎不可置信的残忍而干出大量屠杀、伤残和肢解的话，或许还不会名之曰“暴力”。致人于死以及使人痛苦的某些手法，搞得那么通常而普遍，以致它们被定名为诸如“凌迟”；即把活生生的受害者的躯体一点一点地切成小块；又如“穿孔”，即在人体上戳几百个小孔，使受害者慢慢地流血而死。发明了名为“杀猴子”、“剪法兰绒”、“剪领带”等等肢解和砍头的创造性形式。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吊死是平常的事情。政治“犯”从飞机上被扔出去，婴儿被刺刀戳死，小学生被集体强奸，有些年仅八岁。未出生的胎儿被残酷地剖腹取出而填之以公鸡，耳朵被割掉了，头皮被剥掉了，等等。我们这样详述的目的，在于指出：至少就带有一些自发性的运动而论，我们这里涉及的，乃是现代

^① 理查德·S·韦纳特：《现代社会前的暴力：农村的哥伦比亚》，载《美国政治科学周报》，1966年6月。参阅罗纳德·H·麦克唐纳：《政治抗议和投票事件上的冷淡抵制：哥伦比亚事例》，载《美洲经济事务》，秋季号，1967年；本文说：“暴力时期给哥伦比亚政治文明留下了烙印，这种烙印最好刻划为政治上的冷淡抵制、沉默忍受和顾虑恐惧。”

无比残忍的一种现象^①。

虽然“暴力”时期是在1946年保守党人当选总统之后以小规模形式开场的，但在1948年自由党领袖盖坦被暗杀后就真正大干起来了。

正如1954年阿本斯总统的垮台使危地马拉此后的全部历史改变了颜色一样，哥伦比亚当代史上主要的事件便是1948年的“波哥大事件”——盖坦被暗杀后发生的三天民众起义，这次起义使这座首都城市变成了废墟。波哥大的劫掠以及随后在农村的暴力行为，显示了蕴藏在哥伦比亚人民情绪中的潜力是多么惊人。盖坦——一个具有极妙的手腕和魅力的政治人物——如果能活下来，把这种巨大的有生气的力量带上建设的途径，哥伦比亚在暴力、落后和挫折中经历的二十年，或许就会大不相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63年写作时）认为：

哥伦比亚过去十五年的历史，只能理解为这样一种说法，即一次典型的社会革命的失败，或者可以说是流产。至少从1930年之后，由于连贯性的历史发展，哥伦比亚在准备着一次社会革命，按逻辑应会产生某些类似菲德尔主义的东西，产生一个与共产党人密切共事的人民左翼政权。事实上，这个运动达到了它的高潮，有了明显的起义形势，处在可以实行夺取政权的时刻。何况在1948年4月，起义确实自发地爆发了，而且得到波哥大的警察的大量支持。但是没人去指挥它，组织它。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的完全无组织的人民运动，由于领导人被暗杀而被破坏了。等到共产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已经太迟了。结果国家陷入了过去十五年

^① 诺曼·A·贝力：《哥伦比亚的暴力》，载《美洲研究杂志》，1967年10月。

来流行的混乱、内战和地方无政府状态。^①

由于奇妙的历史巧合，当阿本斯执政的最后时期，埃内斯托·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出现；同样，当盖坦被暗杀的时候，卡斯特罗也在波哥大；而且目击了随后发生的起义。^②他作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反帝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成员而到达，这个代表大会是与1948年3月30日开幕的第九次泛美会议同时举行的。当时冷战刚开始，新从欧洲胜利归来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曾莅临这个重要的泛美会议，并对他的南方邻邦说，美国的金钱虽然只能用于欧洲，但“受外来鼓动的、针对美洲各共和国的制度、和平和安全而搞的颠覆活动的问题”，却是杜鲁门先生的政府相当关心的。与他表示同样关心的还有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马修·李奇微将军。

在会议议事日程的项目中，有在拉丁美洲还残存的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问题。当时在胡安·庇隆操纵下的阿根廷政府，正处在维护该国对福克兰群岛和英属南极洲的主权的运动中，因此，阿根廷的代表与他的一些同事一起，在会议上毫不反对卡斯特罗的学生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哥伦比亚的革命形势》，载《今日世界》第19卷，1963年6月。哥伦比亚执政党自由党，1946年分裂为以盖坦为首的左派和以加夫里尔·图尔拜为首的右派。这就导致保守党人奥斯皮纳·佩雷斯先生当选总统。自由党人参加了他的政府，但是盖坦完全控制了他的党之后，他就着手破坏原有的两党合作制。1948年3月和4月在波哥大召开泛美会议以前不久，他把自由党人全部从内阁里撤了出来。他如果活着，就会在1949年当选总统，从而在哥伦比亚历史上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看来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在某种意义上，豪尔赫·盖坦可能就是哥伦比亚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死，使哥伦比亚左派失去了一个真正深得人心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塞尔·尼德甘，《世界报》，1966年2月8日。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波哥大事件中活动的始末，见胡莱斯·杜博伊斯：《菲德尔·卡斯特罗：叛乱分子，解放者，还是独裁者？》，阿根廷格里哈博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第18—23页；又见赫伯特·L·马修斯：《古巴故事》，纽约，1961年，第140—144页。

4月9日，卡斯特罗和其他学生代表预定正午在自由党报纸《时代报》办公室访问盖坦。盖坦在靠近国会大厦（那里正举行泛美会议）的办公室里度过了清晨，但当他从那里步行到报馆大楼时，就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所枪杀，凶手当即被群众弄死了。^①

盖坦先生被袭击的几分钟内，武装群众就开始抢劫，并纵火焚烧城市中心的公共大楼和商店，美国大使馆成了这次猛烈袭击的对象，但是大使馆的人员打退了袭击，他们在大楼里救了好几个小时的火……泛美会议所在地开会的国会大厦也被毁坏了，会议的大量设备连同它的档案被毁或者被抢走。外国的外交使团和会议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虽然在城市各处避难，得免于伤害，但在波哥大火势猖獗的几天内，他们在食物供应、动力和照明设施以及其他游乐场所中断时还是吃了相当的苦头。^②

4月12日，当无人领导的自由党人已同意再度参加保守党内阁以后叛乱渐次平息时，国务卿马歇尔谴责“国际共产主义”鼓动这次叛乱。他把它描绘为战后共产党人在西半球的第一次重大尝试。他警告说，“关于我们在这里对于当前局势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认清，这次叛乱是全世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哥伦比亚或者拉丁美洲的事情。”为了不甘落后，英国大使吉尔伯特·麦克勒斯也断言，这次叛乱已有了共产党人鼓动和指挥的一切标记。

^① 盖坦跌倒在人行道时，一个彩票叫卖者向凶手冲去，另一个人从咖啡店跑出来，用一把椅子向凶手头上猛砸过去。一眨眼，群众就集拢来围住凶手，他们确实把凶手踢死了。他的形象被毁损得如此厉害，以致不能辨认容貌而不得不从他身上的文件来验明他的身份。——弗农·李·弗卢哈蒂：《百万人的舞蹈：在哥伦比亚的军事统治和社会革命，1930—1956年》，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00页。这是关于现代哥伦比亚唯一最好的书，它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伟大经典著作之一。

^② 基辛斯：《当代档案》，第9236页。

实际上，共产党人似乎不曾料到此事，而且表现了他们一贯对推进革命缺乏积极性，拉丁美洲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罗伯特·J·亚历山大认为：

波哥大事件的幕后如果真有共产党，这些事件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群众控制了这座城市四十八小时，如果有坚决的领导，就能够推翻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关于波哥大叛乱值得注意的一点事实是，政府没有垮台。相反，总统保住了他的地位，而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新的联合政府的形成，则是这次叛乱仅有的一个直接政治结果。

在波哥大事件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哪里也见不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希尔维托·维埃拉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自由党报纸《时代报》的办公室里，那里当然是不会遭到攻击的。^①

在波哥大事件之后，哥伦比亚沦于暴乱和无政府状态。自由党人拒绝参加1949年的总统选举，而保守党的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便在无人反对中当选了。^②

^① 罗伯特·J·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50—251页。当然，所缺乏的就是“坚决的领导”。即使共产党人决定去领导、组织、控制或者“支持”波哥大事件，他们是否确有领导人能把它引到胜利的革命的结局，还是一个疑问（希尔维托·维埃拉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领袖）。

^② 下列关于波哥大的统计数字表明：自由党人的抵制几乎是全部的。

1949年6月议会选举：保守党人二〇、〇〇〇人 自由党人六三、〇〇〇人

1949年11月总统选举：保守党人二〇、一八一人 自由党人二七人

二 共产党人和独立共和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整个时期，挂上自由党或保守党招牌的游击队，在哥伦比亚农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理查德·韦纳特说：

不少证明文件证实了这种意见：传统的对政党的忠心而不是阶级的敌对，形成了暴力的基础。在安提奥基亚省，一帮对抗者的头头在1953年7月间写过，他曾见到一个人被警察割了舌头，警察向他们的被害者解释说：“我们把它割掉，这样你就再也不会叫嚷自由党万岁了。”^①

然而，“暴力”时期大部分的暗杀和暴行虽然是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干的，哥伦比亚共产党则利用了无政府状态组织了自己一支不大的农民游击队。

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以来，多半是由于盖坦主义的高涨，哥伦比亚共产党曾处于衰落状态。盖坦，而不是任何共产党领袖，吸引了许许多多哥伦比亚穷人的支持。1945年总统竞选时，共产党人作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他们要求党员选举自由党的右派、前共产党员加夫利尔·图尔拜，而不是选举盖坦。自由党人选票分散的结果便是保守党人的胜利。共产党人在选举运动中虽然称盖坦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他失败之后，则转而支持他。^②可是盖坦遇刺时，共产党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如一则报道所说的：

^① 理查德·S·韦纳特：《现代社会前的暴力》。

^② 罗伯特·J·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第249页。

“全体中央委员都在自由党全国指挥部的办公室里，等待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命令。人民在巷战中死去，没有任何政治指导。”^①

随着共产党所采取的每一个动摇的步骤，它的最积极的党员脱党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差不多只剩下一些余党。而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小组，为自己的目的开始吸收农民(大部分是自由党人)入党。

共产党人并不是没有组织农民的经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新成立的共产党趁着1928年和1930年间特克恩达马地区发生农民骚动的时机，说服比奥塔地区的农民，保卫他们已经夺得的土地。干部走出波哥大去帮助他们。

在最初几年，地主阶级没有力量用武力扑灭这一运动，就决定尽可能把比奥塔地区孤立起来，并对已发生的事情秘而不宣。政府对人民极端蔑视的心理，使他们幻想这样的群众试验总会失败，他们便决心等待它烟消云散。可是，比奥塔的农业很快变成有利可图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经济利益网。邻近的商人，甚至地主都来同农民打交道，这些农民被他们有条理而良好的处理事务的方法所吸引。封锁于是失败了。^②

比奥塔的农民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司法人员，无论从哪

① 拉斐尔·H·加维里亚和卡拉卡·莫埃斯昌泼：《在哥伦比亚的斗争》见《轻骑》(巴黎)，1967年4—6月。

② 桑蒂亚戈·索拉尔泰：《哥伦比亚军队试图消灭独立的农民共和国》，载《世界报》，1966年1月31日—2月1日(索拉尔泰是出席1966年1月哈瓦那三大洲会议的哥伦比亚代表团成员)。然而，比奥塔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乐园。阿道弗·吉利写道：“从外部是不能搞垮比奥塔的。可是，与共产党人在人民阵线时代的向右转相类似，比奥塔的内部已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了。获得土地的农民，不是受党的领导的鼓舞去开展他们的运动，而是被鼓励去发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富了，于是‘红色的比奥塔’化为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而真正的比奥塔则成为个人发迹和官僚主义统治的基地。”——阿道弗·吉利：《哥伦比亚的游击战争和农民共和国》，载《每月评论》，1965年10月。必须想到，吉利是以托派观点来写的，因而不会过分同情正统共产党人的活动。

一点看，他们都是自治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反游击战运动中，哥伦比亚军队对他们只好听之任之。^①

对于这种农民组织具有将近二十多年实际经验的共产党人，很善于利用盖坦死后年代里发生的近乎无政府状态。^② 1949年11月，在保守党候选人戈麦斯因没有反对党而赢得总统选举时，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较通俗地称为“群众自卫”的政策。共产党的干部开始用“必须用群众有组织的暴力去反对反动派的暴力”这个口号，把“暴力”时期的幸存者聚集在他们能够自卫的地方。哥伦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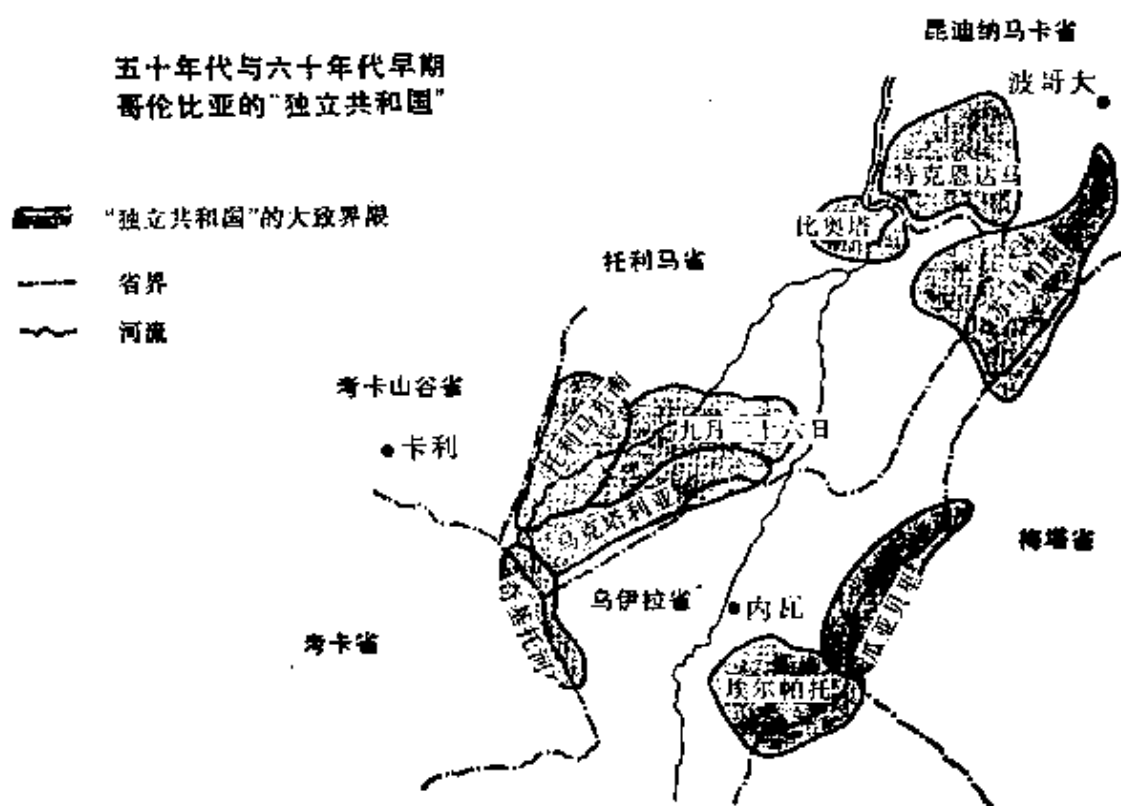


图 4 (按原图译制) 卡克塔地区

① 罗伯特·J·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脚注，第252页。

② 据一位作者说，虽然共产党的“小干部力图渗入游击运动，但自由党的民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方针以及共产党的软弱的领导，却阻止普遍接受共产党的协助。共产党人赠送了这么多的文献和组织程序，使得游击运动沿着毛泽东所发展了的典型路线组织起来了。但是领导人无疑是理想主义的和精力充沛的青年自由党人。共产党人试图利用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分化，把战争转变为阶级斗争。但使它惊慌的是，许多战斗是由传统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间的打群架和公开劫掠所构成的”——鲁塞尔·W·拉姆齐：《在朝鲜和苏伊士的哥伦比亚营》，载《泛美研究杂志》，1967年10月。

亚共产党员阿尔维托·戈麦斯在1967年4月《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的一篇论文里,描述了发生的情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一千多个农户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山脉中心的托利马省“埃尔·戴维斯”区里来,成年人组织在党里,青年人组织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里,孩子组织在所谓“苏克雷营”里,妇女则组织在她们自己的委员会里。这是从事游击队活动的第一个紧密结合的武装团体。托利马省的整个南部不久就为游击战所支配了。许多杰出的战士,诸如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西罗·特鲁希略、伊绍罗·约萨、阿方索·卡斯塔涅达(理查德)、哈科沃·弗里亚斯·阿拉普(黑人牧童)以及伊萨亚斯·帕尔多,在埃尔戴维斯经受了烈火的洗礼。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拉丁美洲领导的第一个主要的游击战争的中心,现在的游击队便继承了这些战士的传统。

不过,武装的农民运动的第一个阶段(1949—1953年)也有阻碍斗争全面发展之处。运动既没有统一的军事——政治领导,也没有旨在夺取政权的明确纲领。它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很大人力资源而在政治上并不一致的各个团体的聚合,根本谈不上共同的斗争计划。自由党、保守党、共产党各自领导他们自己的运动,追求的目的也完全不同。对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来说,游击运动乃是加速政党之间的斗争的一种手段,这种斗争助长了只有用军事接管才能解决各种争端的幻想。保守党人主要是想利用他们的战斗队来保持独裁统治。共产党人则致力于联合各个不同的团体,并设法在博亚卡省召开一次游击队会议,但未能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① 阿尔维托·戈麦斯:《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力量及其前景》,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7年4月。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总喜欢对谴责他们没有支持游击战的左派批评家援引哥伦比亚的例子。因而,强调以下事实,即远在古巴革命发生并使游击战成为极普遍的战略之前,“埃尔·戴维斯”就是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中心”。

这个会议通称博亚卡会议，是共产党人为了使游击队小组有更加革命的方针而组织的。它于1952年初召开。据共产党领袖希尔维托·维埃拉说，“游击队全国会议宣布，它支持通过在游击队统治地区组织人民管理委员会进行夺权斗争，它还草拟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纲领。”^①

无论如何，过高地估计共产党人在“暴力”时期的作用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由党的农民打保守党的农民的一场内战，而后者是被政府煽动的，共产党人只不过起了配角的作用而已。^②

赫尔曼·古斯曼在他关于“暴力”的书中，在描述农民占领的“盖坦”区的气氛时，对共产党区域的情况多少加以渲染：

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共产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都为逃避迫害到盖坦区来；革命组织给他们土地、药物并保护他们；它要求新来者的唯一条件就是不要怀恨那些持有不同政治观点或者不同宗教观点的人。他们谁也没有放弃原来的政治态度或者宗教态度，他们只不过是加上了一种新的态度——共产党的！^③

后来以马克塔利亚独立共和国著称的盖坦区，原本是费尔明·查尔伊·里孔在1949年创建的。他被称为“黑人牧童”，是一位农民领袖，也是“暴力”时期初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哥伦比亚共产

① 希尔维托·维埃拉：《在马克塔利亚时代的哥伦比亚》，载《新民主》，（本期题为《约翰逊先生往何处去？》）1965年7—8月。

② 一位论“暴力”时期的作者，曾按被害人所加入的政治组织，作出1960年由于政治暴力致死的详细分类：自由党六百十一人；保守党六百四十六人；共产党六人；政治关系不明者一千四百六十八人，总计二千七百三十一人——阿隆索·蒙卡多·阿维略：《“暴力”时期的局势》，波哥大，1963年，第9页。此书着重揭露共产党人在“群众暴动”中的作用，但作者不得不承认他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因此用这样的标题。

③ 赫尔曼·古斯曼：《在哥伦比亚的“暴力”时期》，第161—162页。

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他们的刊物上以哈科沃·弗里亚斯·阿拉普的名字出现。

马克塔利亚位于托利马省和乌伊拉省的边界上，有一个时期，境内似乎包括了四千左右的农民。它控制了一块将近二千平方哩的地方，根据1915年那里曾有过的囚犯流放地而命名的。它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没有公路可通。在“共和国”里，政府的拘票是行不通的，在很多情况下，捕捉逃避法网的罪犯时，地方政府的官员必须请求游击队的头头相配合。^①

据说，“黑人牧童”在1960年1月被一帮敌对分子杀害了，继承他的是一位更为传奇式的人物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马鲁兰达也叫佩德罗·安东尼奥·马林，享有“神枪手”的绰号。他同“黑人牧童”一样，是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就领导这个国家一支最重要的游击队的活动。

由共产党主管的其他独立共和国，有奇基托河，苏马帕斯，阿格里阿里和瓜亚贝罗。在奇基托河（位于乌伊拉、托利马和考卡三省的边界上），大约有四百人已经武装起来。他们是由有时以“西罗市长”闻名的西罗·特鲁希略·卡斯塔尼奥领导的。全国政府在这里也没有控制权。卡斯塔尼奥与地方当局之间有一个协定，据此，他们承认在他控制下的领土自治权。协定如遭破坏，游击队的头头即行反抗。1962年，政府的军队进入他的领土后，特鲁希略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强硬的信：

如所周知，五年多来，无论从我们方面或者市政当局方面，在这个东考卡的领土上，都没有反对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动乱和攻击。很清楚，除了那些可能干扰和平而实际上又容易处理的小问题之外，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和宁静之中。然

^① 蒙卡多：《“暴力”时期的局势》，第364页。“独立共和国”这一用语似乎被戈麦斯的儿子阿尔瓦罗·戈麦斯·乌尔塔多所普及，游击队本身却不用它。

而,自从2月23日以来,这里的两个农户,却遭到了不是出于私人争吵而是由于武装部队的残忍袭击。……①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著名的人物,或许就是游击队首领胡安·德拉·克鲁斯·巴雷拉,二十世纪初,他生于博亚卡,长期来是个坚定的盖坦主义分子。1950年之后,他是位于昆迪纳马卡省南部的苏马帕斯“独立共和国”的首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放弃了游击斗争,被选到众议院去。1960年,在为古巴《波希米亚》杂志写的一篇论文里,他设法解释,哥伦比亚的这些武装农民根据地,何以一向不能取得象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夺取政权那样的全国规模的效果:

“我们有多至两万五千个武装人员,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武器的质量是差的。由于我们处在本国的内陆,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通向海港的出路,因而不能靠船运来接受武器。我们实际上被政府的军队所包围,又没有城市的支援。那就是说,与古巴发生的情况相反,我们不能指望大城市那些采取行动和搞破坏的组织帮助我们瓦解暴君的走狗的士气。”②

在哥伦比亚,“暴力”几乎完全限于农村。象在加拉加斯和危地马拉城算是很平常的恐怖手段和残忍行为,在波哥大却从来不知道。委内瑞拉的城市游击队如果能有哥伦比亚那种规模的农民暴力配合作战,委内瑞拉的革命或许就不会这样失败。同样,哥伦比亚的农民如果能依靠有效的城市组织,他们就可能越出“独立共

① 蒙卡多:《“暴力”时期的局势》,第366页。特鲁希略·卡斯塔尼奥于1968年被害。

② 胡安·德拉·克鲁斯·巴雷拉:《我的山,我的枪,和我自己》,载《波希米亚》(哈瓦那),1960年8月7日。

和国”的界限，扩展开来，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波哥大，当时政府的反对党宁愿用操纵选举或者军事政变等比较容易的办法。

1953年6月，保守党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被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所废黜，针对游击队的一切军事行动便立即中止。新总统宣布了全面大赦。他说，对那些愿意自首的人，将马上给予物质援助。一大批人趁此机会而投降了。^①

然而，许多共产党人集结在他们的萌芽时期的农民共和国里，不理睬那个大赦。但是当各方面人人都在放下他们的武器的时候，游击队是难以兴旺起来的。整个国家都对战争感到厌倦了。阿尔维托·戈麦斯曾根据他的党的观点对形势作了说明：

“1953年是经历痛苦的一年，自由党的五千多个游击战士，曾在东部平原活动，向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独裁统治投降了。随后，自由党的其他队伍也学了样。共产党人虽然数量较少，并被迫撤退到托利马省南部，却在继续斗争。‘黑人牧童’、伊绍罗·约萨和曼努埃尔·马鲁兰达在后来称之为马克塔利亚的地带开始军事活动。西罗·特鲁希略转移到了有农民斗争传统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考卡省。这一地区后来叫做里奥奇基托。

共产党领导了第二个阶段的游击战争（1954—1957年）。在比利亚里卡和康达伊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进行了六个多月的阵地战。每一米土地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进一步抵抗已不可能时，许多农民便转移到南方，到托利马和乌伊拉省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这一“事实”，即“在1953年内战末尾的仅仅五天里，六千五百名起义者放下他们的武器；从非正规军队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哥伦比亚的革命形势》。

去，游击队接着在梅塔和卡克塔地区重新部署。这次进军是由1955—1957年与敌人作战的机动团来完成的。阿方索·卡斯塔涅达指挥的一个纵队转移到埃尔·帕托和瓜亚贝罗地区去。”^①

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独裁统治，最初是受自由党人欢迎的，他们乐于见到他们的大敌保守党人终于被推翻。开始时，他的政变确实象要把曾经使这个国家遭到的那一阵剧烈的暴动压下去。但是在戈麦斯鼓动下的内战，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创疤。最初打仗的理由被遗忘了；由于悲痛的被害者亲属想要报复，战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而言之，罗哈斯·皮尼利亚显得在结束这场“暴动”上是无能的。此外，他作了想延长掌权期的种种表示，就象他以前的许多军事领袖一样，在比较贫困的社会阶层中也有一定的名望。他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而当这些倾向越来越明显时，无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变得惊慌了。要求一个军人恢复法律和秩序是合理的，但寡头政治的两个政党，哪一个也不高兴看到他们的政权永远被篡夺了。

随后在1956年7月，自由党领袖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旅行到西班牙，同保守党人、前总统戈麦斯进行谈判。他们共同筹划建立一个反对罗哈斯的统一战线。

1957年4月，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领导人联合宣布，他们将支持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作为预定在1958年总统选举中反对罗哈斯的候选人。巴伦西亚在卡利进行竞选活动时，罗哈斯试图逮捕他。但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巴伦西亚终于挫败了罗哈斯的计谋，而派到他家监视他的军队便撤回了。5月10日，一批高级官员通知罗哈斯说，他必须引退。

^① 阿尔维托·戈麦斯：《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力量》。

阿尔维托·耶拉斯再次飞到西班牙同戈麦斯协商。他们达成一项协议，——12月经公民投票批准，——根据这一协议，从1958年起的十二年里，^①国家一切选任的和政府的职位，都将在两党之间平分。关于总统职务，非正式地同意两党将支持单一的候选人。后来，民族阵线——以后即以此闻名——由一项宪法修正案批准了。这个协议延长到十六年，还同意总统职务必须由两党轮流担任。于是，在拉丁美洲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最可恶的选举分赃。

1958年5月，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以二百五十万张选票当选总统，他的唯一敌手，一个意见不同的保守党人，敌视民族阵线的豪尔赫·莱瓦，只得到六十一万五千张选票。

很多人虽然欢迎罗哈斯·皮尼利亚统治的结束，但对于什么样的人接替他的位子的热情确是有限的。自由党的全部盖坦主义分子都敌视民族阵线。更左的各个集团看出，仅代表寡头政治的两派政府虽然是联合的，但要解决国家的基本问题则几乎不可能。

^① 原书有误，应是十六年，参见原书另一处(312页)的年份。——译者

三 “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革命行动统一阵线”

“在哥伦比亚，人人都那样自然地谈论着有关代议制的民主政治。那里多年来只有两个平分权力的政党，这种寡头政治已经达到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政治的顶峰。他们分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四年由这党执政，另四年由那党执政。毫无变化。这就是选举的民主”——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64年12月在联合国的发言。

使哥伦比亚的政治紧紧掌握在自由党和保守党领袖手中的“民族阵线”的闹剧仅仅演出了六个多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于1959年1月在古巴取得了政权。古巴事件在哥伦比亚影响之大，同在这个大陆的其他地方是一样的。曾看到佩雷斯·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的垮台——这两个独裁者似乎象征着拉丁美洲那么多的坏事——也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加拉加斯和哈瓦那大街上游行示威的哥伦比亚人，弄不懂罗哈斯·皮尼利亚倒台之后他们为什么那样受骗，在很多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眼里，罗哈斯·皮尼利亚跟古巴和委内瑞拉暴君是一丘之貉。阿尔维特·耶拉斯·卡马戈同

足以使哈瓦那和加拉加斯的群众着迷的卡斯特罗比起来又能作出些什么贡献呢？

似乎令人着迷的，当然不仅是卡斯特罗的诺言。打了十年游击战的哥伦比亚人，不能不对这个游击队发动战争二十五个月内就接管政权的国家发生兴趣。情况是不相同的，但“游击队”这个名词对哥伦比亚人一定会有所反应。结果，反对“民族阵线”并对古巴革命深表同情的整批整批的政治集团在哥伦比亚出现。然而，必须强调，这些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显然是不重要的因素。波哥大不象加拉加斯，决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左派示威运动。它实质上是一个保守的城市。甚至学生在政治上的积极性也比委内瑞拉的学生要差些。

最重要的半革命组织是“工人学生农民运动”。这个组织是在1960年1月由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拉罗塔的学生创建的，最初引起这个组织成立的事件，是波哥大公共汽车费的上涨。但是从这样一桩小事开端，却爆发了哥伦比亚第一个菲德尔主义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试图在考卡山谷省从事一些政治组织活动。但在1961年5月6日拉罗塔被害以后，它就失去了活力。另一学生费德里科·阿朗戈到他自己被害为止，也一直力图把这个运动继续下去。

这个运动在任何意义上来说也不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它赞成选举上的弃权主义，并且反对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和平”和议会的路线。在它的一份活动报告中指出，“早在中苏争端发生之前，它就成功地揭露了‘贵族式的’总书记希尔维托·比埃拉·怀特及其集团的改良主义、和平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论点”。^①

另一个集团是“革命行动统一阵线”，与“工人学生农民运动”成立的时间大致相同。它由盖坦的女儿格洛里亚·盖坦和她的丈

^① 拉斐尔·H·加维亚和卡拉卡·莫埃斯昌泼：《哥伦比亚的斗争》，载《轻骑》1967年4—6月。

夫路易斯·埃米罗·巴伦西亚领导。这个运动主要为希望恢复盖坦主义的知识分子所组成。

比这两个运动更正统的是自由革命运动，它构成自由党的左翼。1960年它获得自由党选票的20%，1962年获得36%，但是它不同于委内瑞拉各左翼政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各省。它在波哥大没有什么影响。它的领导人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是自由党前主席的一个儿子。自由革命运动虽然容纳若干前游击队的领导成员，特别是胡安·德拉克鲁斯·巴雷拉，但并不公开鼓励游击队的活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产生的那些游击小组，大抵是由加入“革命行动统一阵线”或“工人学生农民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关于武装斗争如何能用来促进革命的观念，无疑是明确的。必需走到农村去，并对“暴力”时期存在过的老游击队进行改组。在短时间内，这种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政治领导的农村鼓动，将会扩展到城市，而哥伦比亚革命就会取得古巴那样的成就。对这个值得赞赏的方案，唯一的障碍是，“工人学生农民运动”显得异常缺乏领导，再就是对政治纲领简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共产党人当然反对这些青年革命家的活动，他们把这些青年革命家充其量看作是浪漫主义者，最坏就简直看作是冒险家了。哥伦比亚共产党党员拉蒙·洛佩斯曾说明过党在这个阶段的态度：

有些革命团体，它们主要由被武装斗争的浪漫主义思想冲昏头脑的青年人所组成，在没有当地农民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在政府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完全丧失信任以及发展武装斗争的若干其他因素还不具备的时候，就从事武装活动。

共产党人希望所有热衷于进行游击活动的革命团体都有明确的敌情观念，有适当的准备。革命者没有权利故意自取

灭亡，因为任何集团的失败——或者由于指挥战斗的准备不当，或者由于错误地对待群众——只能使人民士气低落，而增强敌人的力量。

相反，敌人却需要这种由浪漫主义革命者所发展的“不惜任何代价的武装斗争的理论”，以引诱那些正直而志在献身的、但还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革命战士去采取不成熟的武装行动。因为这使反动派能破坏这样的战斗组织，从而使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效能丧失信心，而且已经在六个事例中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

特别应提到的是，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维查达的游击队。这个将近有一百人组成的队伍，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短暂的攻击战。但是它再也不能继续保持攻势而不得不退为防御，由于这支队伍孤立无援，这种防御就导致了完全的失败。类似的情况在这个国家中部的博亚卡港也发生过，那里有支武装部队遭到占优势的敌军的突然袭击，并且被消灭了。这些青年革命者一般都遭到反动派的毒手。^①

当然，洛佩斯是在几年以后根据事后观察才这样写的。回顾起来，“工人学生农民运动”早期所作的努力似乎多少是空想的。例如洛佩斯讲到的在维查达特别区的那支游击队，它较富于喜剧的特色，而严肃政治运动的性质倒很缺乏。这支游击队得到“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革命行动统一阵线”的支持，并且受图略·巴耶尔医生领导。他的副手是罗森多·科洛梅纳雷斯。他们在某地招募了一二百人，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前游击队员。维查达地处东方平原，这块哥伦比亚东部的广阔平原，伸展到委内瑞拉南部。在“暴力”时期，它曾经是自由党游击队的重要地区，中央政府对它从

^① 雷蒙·洛佩斯：《哥伦比亚游击斗争的新阶段》，刊载于《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月刊，1967年2月。

未有过多大的控制。

巴耶尔于1963年在加拉加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叙述过他的不寻常的经历：

自从1959年我对一家哥伦比亚药厂制造劣质药品提出了有充分证据的报告以后，我就遭到了迫害，……

一个叫做“黑手党”的恐怖组织开始与我为难，于是我便避难于委内瑞拉。我在阿亚库乔港的医院当过医生，后来又替司法部当了印第安人的医生和哥伦比亚的名誉领事。

我把地方长官和在卡雷尼奥港活动的“蒙特福特神父传教团”正在盗窃维查达的公共卫生和教育预算经费的情况，向哥伦比亚外交部和弗朗西斯科·何塞·乔斯大使报告之后，我便辞职了。

当这个地方长官开始迫害起维查达的移民——主要是“自由革命运动”的成员——的时候，我无代价地为他们服务。^①

所以，当巴耶尔被捕时，他可以拿自己仅仅担任过医生来辩护。没有证据说明他曾是游击队员，审讯就撤消了。

这支游击队最显著的胜利是俘获了一支有四十名哥伦比亚士兵的小队。因为巴耶尔当时不知道怎样处置他们，便打电话给中央政府要求派一架民航飞机来把这些士兵带走。

比较重要的是古巴人对哥伦比亚平原不时发生的这种活动发生兴趣。有一次，阿尔瓦罗·巴伦西亚·托瓦尔上校手下的陆军查获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巴耶尔队伍中的一个知识分子拉蒙·拉罗塔写给切·格瓦拉的：

^① 《号角报》(加拉加斯)，1963年3月19日，引于阿隆索·蒙卡多：《暴力行为的一种情况》，第430页。

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
哈瓦那，
古巴。
亲爱的同志，

我希望伟大的古巴革命每天都在前进，因为古巴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其他被压迫人民在一切领域内争取自己的自由并建设我们非常渴望的社会主义社会，带来鼓励。

阿尔弗雷多·马林同志将详细地给你报告我们革命的最初活动和我们革命的目的。他将把我们的一些基本文件给你看，例如：革命守则，最低纲领和其他文件。

这里，各种左派运动正越来越团结在民族游击队司令部的周围，司令部是由各武装团体和各左派运动的代表组成的。属于这些左派运动的有盖坦主义运动和“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他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以保证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带给你这封信的阿尔弗雷多同志，就是这个司令部的成员。我们懂得：正如菲德尔同志所一贯坚持的那样，如果要获得革命的胜利，团结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菲德尔同志甚至提出过，如果要求古巴革命政府宣告同我们团结一致的话，团结更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在全国各地最早的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是不够的，半因检查制度和全国范围的包围状态，半因革命部队方面缺乏装备。

在游击队的活动范围里，农民从多方面帮助我们。其中很多人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装备给这些未来的游击队员，我们未能接受他们。

在我有幸回到你的自由国家以前，请接受你的同志的紧

紧的革命拥抱，

拉蒙·拉罗塔^①

于洛斯·利亚诺斯某地，1961年12月7日。

假定这封信是真的——看来没有理由说它是假的——然而，它除了表明古巴人方面的友好关心之外，没有表明什么东西。的确，图略·巴耶尔甚至留下记录指出切·格瓦拉并不特别关心当时在哥伦比亚的尝试。他在1968年的一次会见中，对一个法国记者讲了如下的经历：

我曾同切·格瓦拉会见过，当时他还在古巴，会见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是在他的工业部长办公室进行的。我同他长时间地谈到了有关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游击队问题。我谈到了总体战，还谈到了需要改变战略并修改古巴方式而采取某种更有效的战略和方式。可是他却用捷克共产党人在他的“要创立二个、三个、许多个越南”的著名信件发表后要用来反对他的同样的论据来回答我。他认为这种意见多少有些法西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后来，当他回到了游击队的时候，他就要写出完全相反的东西。^②

^① 蒙卡多：《暴力行为的一种情况》，第407—408页。

^② 乔治·迪罗伊：《格瓦拉以外的，游击战……》，载《费加罗报》，1968年2月1日。

四 马克塔利亚的陷落

哥伦比亚的左派政治集团大都在古巴革命鼓舞之下激增起来。其中许多集团一直在利用农村动荡的局面来发动它们自己的游击运动。这一事实迫使政府——无疑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来考虑“肃清”那些共产党独立共和国的任务。^①如果对民族阵线的政治反抗能达到卡斯特罗同巴蒂斯塔斗争那样的规模，那么，马克塔利亚、苏马帕斯和埃尔帕托等农民占领区就能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庇护所，并从这些地方策划和发动较大的游击战役。

民族阵线一开始就尽力来改善那些最容易发生暴力行动的地区的情况。共产党作家阿尔维托·戈麦斯解释过这种手法：

耶拉斯·卡马戈政府（1958—1962年）对游击地区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对“受暴力影响的地带”采取所谓复兴措施。这个政策的要点是：通过贷款来增进生产和建筑住宅，向农村进行渗透，以及滥许愿心。采取这种复兴措施是有选择的，其目的在于赢得这些地区农民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前游击队员和他们的领袖的支持，或者至少要他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对居民依旧不信任政府的那些地区，则拒绝经济援助。这些地区的地方组织和以往一样都受到迫害，他们的很

^① 据共产党人说，中央情报局1960年的一个报告“列举了这些地区，并强调指出，以最快速度废除它们乃是政府的责任”。——见洛佩斯：《哥伦比亚游击斗争的新阶段》。

多领袖，特别是前游击队员，还遭到杀害。^①

然而，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所说：“对政府大力发动的一场反暴力运动反应的冷淡，其效果有几分象在转动一个没有鸡蛋的搅蛋器”。^②

在1961年期间，政府向独立共和国发动强烈的口头恐吓，而1962年初，陆军第六旅便奉命进攻马克塔利亚。据老资格的共产党领袖希尔维托·比埃拉说，这次战役共动员了五千一百五十四名兵士，一千一百五十四名军士和一百八十九名军官。这些部队全部受过反游击战的特殊训练。^③

初次的进攻不很成功。农民记下许多次胜利，并缴获大量弹药。与此同时，在城市里，共产党和“自由革命运动”组织了一个声援马克塔利亚农民的运动，迫使耶拉斯·卡马戈——那时是他执政的末期——撤军。马克塔利亚好象暂时是安全了。

然而，在1963年，陆军深入到农民占领区搞清查运动。1964年1月1日，耶拉斯的继任人莱昂·巴伦西亚宣布，政府已经决定在年底以前摧毁那些独立共和国。5月1日，“马克塔利亚战役”开始，卷入了大约一万六千名兵士——几乎占哥伦比亚陆军的三分之一。

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始实行新的反游击战战略的第一个国家，这个战略在肯尼迪政府的最初的几年就展开了。希尔维托·比埃拉把划分战略的阶段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一阶段：准备和组织：部队一经受过反游击战的训

① 戈麦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② 《纽约时报》，1963年1月9日。

③ 希尔维托·比埃拉：《在马克塔利亚时代的哥伦比亚》，载《新民主》，1965年7—8月。

练,就要派遣间谍进入那个地区并招募情报人员。为此目的,成立了“军民行动”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军队以施主的面貌出现,给农民带来了礼物(衣服,医药补给品,由美国慈善机构供给的食品),内科、牙科治疗,修筑桥梁、公路和学校。

第二阶段:接着,搞突然袭击,把一个大规模的心理战计划付诸实施。采取措施核实居民人口。这是建立游击封锁区的第一步。

第三阶段:第二步,试图把武装起义集团孤立起来,以便摧毁它们。

第四阶段:用心理战术把武装起义运动有计划地分割开来。利用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领袖们的野心、人类的弱点或者游击队指挥部的错误等所引起的内部分裂。这是争取那些很可能要继续进行斗争的游击队员的一种尝试。

第五阶段:最后阶段是用以前用来摧毁那个地区的美援,对战区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建”。

“马克塔利亚战役”的第一阶段——军民行动——是一个包围和侦察运动。可是爆发了战争。陆军试图封闭一个庞大的包围圈,而过去的自卫运动也就立即变为游击战争。

经过一连串冲突之后,哥伦比亚和美国的战略家们改进了他们认为是突击战术的那些措施。他们以为这些战术是如此有效,因而邀请哥伦比亚和外国随军记者来观战。^①用许多直升飞机发动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其目的是切断游击队指挥部的退路并摧毁它。整个军队由直升飞机以象树顶那样的高度空运到两间农民茅屋附近,游击队指挥官马鲁兰达和约萨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那里。

自然,这个地方是戒备着的,游击队没有受到损失。他们

^① 少有的事件。1965年在秘鲁,不准记者进入战区;而1967年在玻利维亚,反游击战役的军事详情不到最后几周是难于获得的。

按照计划退到了山上。政府、陆军参谋部、哥伦比亚资产阶级报刊和美国出版物如《生活》周刊，对此大肆宣扬，叫嚷“赤色分子在安第斯的挫败”以及“马克塔利亚的最后占领”。但是战斗只是刚刚开始。

游击队加强了他们的山上根据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陆军则开始计算它死亡的人数。^①

另一个共产党人阿尔维托·戈麦斯试图解释——解释时带有一些困难——为什么马克塔利亚的陷落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些自卫地带是攻不破的。相反，它们会陷落在敌人手中的可能性是预见到了的。然而，我们同时把这些地区当作未来运动的根据地，当作人民武装运动的中心。

检验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在于实践。马克塔利亚战役是证明我们政策正确性的鉴定。陆军投入全部现代武器和反游击战的经验来反对马克塔利亚。但是，马克塔利亚也作好了打游击战的准备。这不仅仅是出于一时冲动而使用武力，因为熟悉过去经验的这个地区的领导人，研究了敌人以往所取得的胜利，并且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游击战思想为指导。

马克塔利亚被侵犯之前，本身不是一个军事行动地带。但是它的领导们早些时候在周围地区所做的工作为后来作战打下了基础……

无论被侵犯以前或者以后，马克塔利亚的农民都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然而，从来没有打算过让妇女和儿童跟随着游击队，或者使农民的牲畜和个人财物加重这些游击队的负担。疏散家属预先就计划好了，以便在这个地区只留下那些能带

^① 比埃拉：《在马克塔利亚时代的哥伦比亚》。

武器的人。家属则送到邻近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为作战人员补充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作战计划事先已拟定了。陆军发现自己面对着再分成小组的游击队在部队设置的圈套内外活动。政府部队一进入这个地区，游击队立即跟他们交战。陆军虽然终于占领了马克塔利亚，但它处处遇到布雷区和埋伏，在不断阻击之下受到显著的损失。游击队很快就转移到丛林山区去。政府部队碰不着他们，而游击队却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陆军虽然占领了马克塔利亚中部，但它不能拉起警戒线把整个五千平方公里的地区隔离开来，而选择战场的主动权却让给了游击队。^①

然而，尽管共产党人能在每一次重大的失败中看到新的胜利，但马克塔利亚的陷落必须被认为是对革命的重大损失。而且这不仅仅是马克塔利亚的问题。这个根据地一旦失陷，那些由农民领袖们已经控制了多年的地带也被政府轻而易举地搞掉了。里奥奇基托和瓜亚贝罗陷落了。而最后，在1965年3月，《纽约时报》宣称：政府部队“捣毁了有十三年之久的埃尔帕托共产党独立共和国……。战斗机和直升飞机空运了几个营的步兵和国民警察队到这个地区去占领战略点，现在正在进行扫荡中。”随着埃尔帕托的陷落，“独立共和国”只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

他们或许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象比奥塔的农民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养肥起来，而且过得舒舒服服。他们发展的前景受到严格限制。可是一旦陆军把农民从他们的家园赶出去，他们就使国家的稳定受到更大的威胁。他们被连根拔以后，除了走游击队的道路之外别无办法，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革命了。

现在哥伦比亚共产党手里掌握着一个真正的游击队运动，这

^① 戈麦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多半是出于偶然而不是事先计划的。多年来，他们鼓动了许许多多农民相信共产党的绝对正确。可是就是这些农民，由于听党的指示结果被逐出了家门，党的领导人不得不作了些敏锐的思考，对于这些忠诚的人们阐明失败的原因。首先，他们责怪“工人学生农民运动”的极左分子制造陆军是能够被打败的幻想：

从1964年的斗争开始，游击队知道敌人现在较为强大，而且实际上拥有无限的资源……。党指出有必要抛弃陈旧的人民武装斗争的观念并清除使我们遭受不必要牺牲的自夸和浅见。武装农民正确地理解这种警告。

然而，有些革命者曾认为（至今有些人还认为）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夸大了敌人所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声称，这种估计和夸大造成了群众方面的消极性。但是经验已经表明谁是正确的。^①

其次，共产党统治集团的不满落在政府本身。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尔瓦罗·德尔加多在一篇称颂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文章中指出：

我国人民现在进行的武装斗争不是我们造成的。当农民被迫拿起武器的时候，合法斗争的可能性还没有完全消失。被农民独立运动的声势吓破了胆的反民族政府，向农民发动了进攻。这场武装斗争是敌人强加于我们的，农民在我们的领导下毫不犹豫地起来应战。堵塞通向合法的、民主政治斗争道路的是阶级敌人。我们是在为民主权利而战斗，因为这个政权正在不断地削弱这些权利。我们没有要群众在一切情况下都作出最大的牺牲。我们告诉他们：必须组织起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而且在一个阶段或另

^① 洛佩斯：《哥伦比亚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一个阶段中很可能还需要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不是一个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的问题。事实是我们必须战斗。我们不能选择或者规定斗争的形式。哥伦比亚共产党人既不受任何一种特殊斗争形式的约束，也对当前事态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多样性，而是因为群众的实际战斗和人民的团结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

1964年7月20日，打了几乎三个月的仗之后，农民在马鲁兰达的领导下从马克塔利亚撤退下来稍事休整。他们召开了游击队大会，起草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法案，号召没收大地产并把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②

正如中央委员会委员、哥伦比亚共产党内一位有些自行其是的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后来所说的：

这样的公告不是由一个单纯地方性的孤立集团而是由最先进的共产党组织发出的。这是对被用暴力撵出家门的农民进行长期和耐心教育的成果，这些农民在这些组织中找到了他们政治愿望的表达方式。这个历史事件标志着革命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单纯自卫的消极概念已被抛弃到后面了。^③

1964年9月底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在哥伦比亚南部活动的全部游击队和自卫队（他们是被陆军从独立共和国驱逐出来的）联合起来。这次会议建立了南方游击区，这是被撵农民的一个松弛

① 阿尔瓦罗·德尔加多：《哥伦比亚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月刊，1967年9月。

② 关于《马克塔利亚游击队的土地改革纲领》见附录五。

③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哥伦比亚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最后一点钟报》，第47期，1968年1月30日。

的联合运动，它为共产党所小心监护着。

这次会议在决议中宣布，“在进攻马克塔利亚的第一阶段之后五个月，游击队的机动部队获得了对政府的反游击战战术的全胜。”并且乐观地补充说，“以机动游击战术为基础的武装革命运动是不可战胜的，它能抵抗兵力远为优越的敌人，从马克塔利亚的情形来看，农民支队奋战一万六千名政府军队就是一个见证”。^①

农民游击战虽然是共产党“发动”的，但是，对于怎样打游击战则没有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整个1965年期间，马鲁兰达游击队和其他残存的独立共和国的活动特别沉寂，结果使德布雷公然地藐视哥伦比亚共产党近年来的革命成就，他在同年早些时候写道：

自卫作为一种体制和一种现实，今天已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告终了。

有农民自卫区的哥伦比亚，和有工人自卫区的玻利维亚，在这两个国家里，这种观念获得了路线的力量。这两个“颠覆核心”在几个月内都被陆军肃清了：经过悲壮的战斗之后，哥伦比亚南方的马克塔利亚于1964年5月被占领，玻利维亚矿区于1965年5月和9月也被入侵。这个双重的挫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告终，并证明某种意识形态的消亡。革命运动应彻底承认这种灭亡，这是很必要的。^②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答复说：

说是马克塔利亚被正规军占领就意味着哥伦比亚武装斗争的挫败和消灭，这种总括的陈述，是对“自卫”的不同阶段的

① 引于戈麦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

错误评价，也是对时间因素的一种错误评价。就在那篇论文《革命的革命？》发表时（1966年1月），马鲁兰达同志领导的部队已经转而采用机动的游击战术，并且给哥伦比亚陆军以空前最沉重的打击。直到1964年，消极的“自卫”概念可以受到非难。在这个组织声明“现在我们是游击队”之后，整个拉丁美洲确实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坚决的、严肃的和有经验的游击部队。^①

后来，在1967年，以共产党没有充分强调游击队的作用为理由，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向共产党提出辞职。但是1966年1月召开的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表明，从某些方面讲，哥伦比亚共产党对游击队的立场，要比委内瑞拉共产党对游击队好些。然而，用语的形式虽然不一样，哥伦比亚共产党人对于武装斗争的热情，实际上并不比委内瑞拉人更高些。^②

哥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强调，哥伦比亚游击斗争是走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前面的。共产党已感到不能一方面“袖手旁观”，一方面“等待革命时机成熟”。“武装侵犯”必须以“游击抵抗”来对付。

虽然如此，游击抵抗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正统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群众斗争”更具有决定性。

由于哥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支持，南方游击队组织在1966年4月召开了进一步的会议，并决定成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把农民武装运动改称为游击战运动，是由于共产党面临其他左派的反对，需要显得比实际上更为革命。在一篇由一个正统共产党人所写的讨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建立的文章中，人们可以察觉到一种几乎狂热的关心，要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并且要证明共产党控制着哥伦比亚的革命局面：

①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哥伦比亚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② 关于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央报告的一章，见附录六。

哥伦比亚是一个生死斗争的场所。这场斗争的中心是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它的总部为首的游击战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统一的军政领导，遵循共产党中央机构决定的路线。为了适应我国革命进程的需要，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集中了农村地区武装行动的领导。担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总部的领导职务的，乃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如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西罗·特鲁希略、哈科沃·阿雷纳斯和伊绍罗·约萨等，他们全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成立大会的决议为基础的战斗计划，注意到了国内的具体情况和一般情况。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农民，这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些人从1950年以来就从事武装斗争。我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可以说基本上是共产党人努力工作的结果。^①

可是，当1966年6月《人道报》记者访问哥伦比亚党的总书记希尔维托·比埃拉时，他却坚持说：

我们的党……仍然认为哥伦比亚目前还没有革命的形势。城市的武装斗争是不予考虑的，因为这样一种斗争，同一些小党派所搞的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差不多。……游击战争实际上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②

① 戈麦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② 《人道报》，1966年6月3日。

五 民族解放军

“在我国，经过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一个可与马埃斯特腊山游击运动相比拟的、由城市里的政治干部领导的，取名为‘民族解放军’的革命游击运动已经取得第一次胜利、巩固和获得人民的支持。

哥伦比亚陆军多年来不得不集中它的大量兵力对付‘自卫区’这个事实……大大地帮助了民族解放军的创建。”

——一个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的日记

正当哥伦比亚陆军发动了对马克塔利亚的进攻并迫使神枪手组织他的农民追随者转入一个流动的革命活动时，由法维奥·巴斯克斯·卡斯塔尼奥领导的一群学生，正在考察在桑坦德省开辟一个游击“中心”的可能性。巴斯克斯与神枪手不同，他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共产党党员。他的思想根源属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运动”，而不属于更稳重的共产党。他约生于1937年，他的父亲是自由党的农民，在“暴力”时期被杀害了。他的社会出身似乎同委内瑞拉的道格拉斯·布拉沃非常相象。

但他怎样着手组织他的民族解放军，详情不大清楚，虽然从他同墨西哥编辑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1967年中期的一

次会见中，能够搜集到某些资料。

据说，一群学生作了某些初步调查之后，在一位名叫帕门尼奥的农民的茅屋里与一些农民会面：

象我国的大多数地区一样，这个地区是非常适于起义的。

农民对各种诺言感到厌烦，也饱受欺骗；对和平，等待选举，以改善他们老是恶化的处境，感到不耐烦。他们的祖辈作为农奴死去了，他们的父辈也是这样，如果情况照样继续下去，类似的前途就会等待着他们的儿辈。没有旁的解决办法：他们准备支持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是完全必需的。有人说：“没有武器”。我们回答说：“敌人有武器”。我们走遍这个地区，把最坚决的一些人召集拢来。这些最初的步骤需要采取极端安全的措施，严守秘密；任何泄漏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政府的镇压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他们已具有多年的暴力镇压的反动经验。我们挑选了游击队的核心，一共十八个农民。我们深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开始过着游击队的艰苦生活。那是1964年7月4日。游击队生活的第一阶段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隐藏求生；第二，侦察地形；第三，队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第四，在农民中建立支援革命的根据地；第五，建立一套情报和联络网。我们具备了些什么条件这么干呢？当然，我们虽预先详细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非常坚定和果断地走的这一条路是正当的，而且是唯一的。但是除了这些客观上分析的因素外，我们还有农民的支持。他们提供我们给养和最好的猎枪，由于这些条件，我们进入了西马科塔，从而结束秘密活动的第一阶段。^①

^① 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II)，决不后退一步》，载《事件》（墨西哥城），1967年7月1日。

西马科塔靠近圣维森特，是1965年1月7日即“工人学生农民运动”成立六周年纪念日解放军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场所。二十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穿着橄榄绿服装，只用打猎的来福枪装备着，黎明时进入这个市镇，并占领了两个小时。据《经济学家》一位通讯员报道：

他们抢劫了一家政府贷款所约四千美元；另外抢劫一家啤酒批发站和一家私人住宅，又得一千美元。袭击者……切断市镇外围的交通线，在朝着圣维森特方向撤离之前，发表了演说，宣布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的战争，并声明他们来是为“攻打政府而不是攻打人民的”。^①

民族解放军的何塞·安东尼奥·加兰支队所属的游击队，留下一篇宣言：

西马科塔宣言

由各种寡头政治的政府所发动的，并由巴伦西亚——鲁伊士·诺沃亚-耶拉斯的腐败政权继续施行的反动暴力，已是一种用来镇压革命农民运动的有力武器。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它是一种有力的统治武器。

教育掌握在商人手里，他们发财致富是由于使我们人民愚昧无知而造成的。

土地由异常贫穷的农民耕种。农民及其家属力气使尽了，却让在城市里过着象国王一样生活的寡头得到好处。

工人拿的是饥饿工资。他们被外国和本国的大公司折磨

^① 《经济学家》，1965年8月28日。

得穷困和屈辱。

年轻的拥护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感到苦恼。他们不是被迫为统治阶级效劳就是死亡。

城乡的中小生产者，都受到残酷竞争和外国资本及其在国内的奸细走狗的信贷垄断而破产。

属于全体哥伦比亚人民的财富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了。

但是，已感到剥削、贫困和反动暴力鞭挞的我国人民，正在起来准备战斗。革命斗争是全体人民推翻欺诈和残暴的现行统治的唯一道路。

我们，作为民族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在为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而战斗。

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人民都要联合起来推翻这两个党的寡头政治。

农民们，工人们，学生们，自由职业者们以及希望使哥伦比亚成为合乎诚实的哥伦比亚人的国家的诚实的人们团结万岁！

不解放毋宁死

民族解放军

“何塞·安东尼奥·加兰”阵线

卡洛斯·比利亚雷亚尔

安德烈斯山

(法维奥·巴斯克斯·卡斯塔尼奥)(维克托·梅迪纳·莫隆)

巴斯克斯在同墨西哥记者的会见中继续说：

这是我们反抗统治我国人民的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分

子的法律的公开声明。我们这种做法，就是让我们的人民知道，现在有一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武装先锋队。尤其是，拿下西马科塔的主要目的，是向人民指出一条革命的路线：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有效方法。

民族解放军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下层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起义。根据我们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是广大被剥削人民所进行的一种战争——我们认为，当一切纯粹的政治斗争手段已使尽时，广大群众必须提供武装先锋队以保证夺取政权的斗争继续下去。而且，由于反动寡头政治——同美国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贪婪和残酷，我们确信他们不会允许人民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我们深信，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手段上面，就是上了反动派的当。

要公认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解决我们民族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困难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灾难要落到我们敬爱的拉丁美洲人民头上。但是，否认它那是不诚实的……我们这一代，我们拉丁美洲青年，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并为革命战争作好准备……因此完全必要发展游击部队，以便形成一支民族解放军，这支“民族解放军”为争夺政权而能同寡头政治及美国帝国主义战斗，并将能取得政权，组成一个民主和革命政府，在我们哥伦比亚执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纲领……

巴斯克斯所讲的民族解放军的纲领，是在进攻西马科塔时第一次公布的。^①

同拉丁美洲其他的游击队运动一样，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军没有军阶。只有两个例外，是已故的——帕门尼奥“队长”以及卡米洛·托雷斯“司令”。帕门尼奥是个二十三岁的农民，就在他的茅屋中建立了解放军。

^① 原文见附录七。

关于游击队队长的职责，法维奥·巴斯克斯也有同切·格瓦拉类似的非常坚定的见解：

他不准离开战斗岗位，也不可以到城市里去。他的使命是同他的队员们一起在前线。他回城市环境的唯一理由是攻占敌人的阵地。

1964年年中，正当哥伦比亚陆军开始向马克塔利亚开动的時候，民族解放军还处于筹划阶段。但1965年1月对西马科塔的袭击，由于把桑泰德地区以北的马克塔利亚的哥伦比亚陆军的某些部队牵引出去，这就多少减轻了马鲁兰达和他的部队所受的压力。尽管这样，巴斯克斯的独立游击队同受共产党控制的马鲁兰达的游击队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不好的。

1965年初，民族解放军要求同共产党的一位领导成员会见。1965年5月15日，有一个人来了，他们讨论了他们彼此的经验，虽然没有讨论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一个月后，一位特使从马鲁兰达的“南方游击区”来到桑坦德，又没有解决什么明确的问题。

在1966年1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时，为重新建立联系，民族解放军给马鲁兰达发了一封贺信。

[法维奥·巴斯克斯后来说]我们了解，游击队在这次会议上主动与民族解放军加强团结，而且寻求怎样才能举行一次有我们参加的全国游击队会议的方法。我们立即回答，请问是否能由我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同马鲁兰达同志商谈，以研究我们双方活动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对于所有这些提议，我们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让我看看我们下个月是否能够这样做。

1966年4月，南方游击区的第二次会议举行了——在会上正式建立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会议最后决定：斗争的下一个步骤应当同一切革命者合作。民族解放军认为这似乎是乐观的，但是一直到1966年8月，他们仍然没有收到马鲁兰达对1月发去的贺信的回答。因此，在8月间，民族解放军发了一封更进一步的信件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声明它要求合作的愿望——说实在这也是必需的：

考虑到民族解放军是一个完全非法活动的组织，它与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哥伦比亚寡头政治的压迫、剥削和镇压的工具进行公开的战斗，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由南方游击区（其政治方针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确定的）——由马鲁兰达同志所指挥的英雄游击队所展开的这个战斗，就我们来说，基本上意味着与我们的革命团结。所有为同其他游击部队——尽管是最近成立的——进行合作、了解、协调和团结所作的一切努力，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共产党的答复是简短的：

我们党已经把你们的活动通知了马鲁兰达同志，你们的活动没能使我党满意。作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的党及其司令马鲁兰达·贝莱斯本人，认为如你们所建议的那种关系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们接受共产党的政策。

当然，民族解放军同哥伦比亚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与道格拉斯·布拉沃同委内瑞拉共产党相处的经验是非常相似的，虽然委共比哥共更希望结束游击战。巴斯克斯解释过这个情况：

关于在委内瑞拉斗争的情况已经讲了许多；提到过休战和回到和平的方法。但是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掩盖着一种真相：背弃。可是无论如何，总有信任人民、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的人们。有始终忠于“誓死解放委内瑞拉祖国”这个口号的人们——象道格拉斯·布拉沃及其同伴们，经历过许多艰苦而没有背叛人民的人们。

革命的过程使真正和杰出的人民领袖涌现出来。人民在选择领袖时会迷惑、受骗，但在选择过程中会揭穿不称职领袖的假面具，而推出杰出的领袖以及那些没有失掉信仰的人，那些人不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把次要的因素、个人的因素放在斗争之上的人；那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是仅仅为了破坏而参加运动的人。

这是对正统的亲莫斯科共产党人的一种稍为隐蔽的攻击，而当巴斯克斯在讨论国际团结问题时，他的态度变得鲜明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在重复格瓦拉给三大洲会议的祝词中的严正言辞：

这不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世界上一切革命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是同人民订立的一种非常严肃的契约，而对那些执政党来说，这种契约甚至更为重要。

正当美国帝国主义每天派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并且在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狂轰滥炸乡村和居民住宅区的时候，这种义务变得格外光荣；这正是我们革命者应该为了需要团结的人而明确、坚决、牢固和无条件一致地更好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自由的民族应一致起来，不要去议论谁是正确的，也不要去议论那个国家去领导国际运动，而是要强调越南是正确的，并且正在流血，要强调在革命者争

论的时候，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对它认为弱小的民族采取残酷行动。那是最需要真正国际团结的地方。应该同古巴团结一致，这个光荣的岛屿已成为一面盾牌，在它的面前美帝的可耻的长矛已经不止一次地折断。

至于拉丁美洲，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各组织之间应该团结，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交流经验以改正错误，并且为了协调拉丁美洲的起义，在可能的地方还应该采用其他民族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这应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主要目的。

我们认为，我们向越南和古巴提供最好和最可靠的团结，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开始民族解放武装斗争。

巴斯克斯的第二司令官维克托·梅迪纳·莫隆进一步指出：

有一个问题最使我们烦恼。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的人和运动，都自称是革命的并用空话和宣传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关于这点，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我国革命者当中，特别是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自从1948年以来，哥伦比亚的农村被政府的暴力所破坏，这种暴力开始于官方的镇压，结果造成由农民领导和指导的大规模游击运动以反抗采取镇压手段的政府。然而，正是由于被自由党（该党由哥伦比亚寡头们所领导和控制）的知识分子领导人所出卖，这个运动没有成为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便停顿了。不管怎样，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在哥伦比亚出现了一些团体、运动、个人，从各方面利用报纸、演讲和传单表明为夺取政权和完成哥伦比亚的革命。他们支持武装革命斗争。

无论如何，古巴革命同我国罗哈斯·皮尼亚的独裁的垮台，并回到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客们的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政

治，是同时发生的。这就使那些支持促进选举斗争并组织选举运动的人们，同那些鼓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间发生冲突。在罗哈斯·皮尼利亚倒台之后，共产党是唯一具有革命理想的党派。但是同时他们又建议同自由党内所谓进步成份，例如以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博士为首的“自由革命运动”组成广泛的政治阵线。与此同时，追随古巴革命方式的那些人却指望武装解决。他们与共产党和“自由革命运动”的命令、战术和战略有着明显的冲突，那时“自由革命运动”在哥伦比亚是最有代表性的左派运动。这时出现了以安东尼奥·拉罗塔（主张武装斗争的学生领袖）为首的“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同共产党的官方领导有重大的争论和冲突，共产党的领导人员正在集中精力帮助组织“自由革命运动”，以便参加在独裁统治倒台之后举行的选举。我们认为，“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在武装斗争的想法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的作风，他们如何实行武装斗争的实际打算，以及同农民的联盟，等等，正象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那样，都是错误的。“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几次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尝试失败了。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正在考卡省北部从事创建武装组织的时候死了，这可以说是在运动的衰退中的决定性的打击。

那时候也出现几个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左派运动，其目的不是选举而是军事。这样，“革命行动统一阵线”就把几个这样的组织建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革命行动统一阵线由伟大的人民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的女儿格洛里亚·盖坦和她的丈夫路易斯·埃米罗·巴伦西亚所控制。不过，因为领导人逗留在波哥大，这种运动的组织甚至连一分钟也维持不了。

此外，还有比查达运动，图略·巴耶尔被卷进去了，这个运动由于它的组织方法，轻易地被陆军镇压了。“革命行动统一阵线”实际上并没有支持很久。

所有这些都发行了大量小册子，发表了很多演说，但在组织一支革命游击队上是完全失败了。

此外，近几年中，特别是最近，在我国出现了一派，脱离了共产党并创立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人，那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追随中国路线的一个支派。这个集团也出版大量的宣传品，并号召武装斗争；它是支持革命战争的。看来这些先生一干起什么事情来时也都是失败的。关于这个集团在国内各地所作各种尝试的失败，我们已有十分详细的报道……

我们认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怀着机会主义的目的：有些人企图利用群众支持武装斗争的情绪；而另一些人却企图在革命队伍里尽力据有革命的地位和赢得威信，代替那些真诚地采取革命立场的人，其中许多人为了争取实现他们的理想，准备牺牲。我们可以十分坦率地说，在哥伦比亚的革命运动中，有一大批骗子，诡计多端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以及那些已经使武装革命斗争的正确纲领成为吃饭手段、成为伪装的手段和多少解决个人问题的手段的人。

目前，有一个特别使我们困惑的问题，而它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有关的。在当前，“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实际上是拥有游击队并正在开展日益扩大的军事活动的仅有组织。

文件、公开的声明这样说：哥伦比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创建有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件事情使我们困惑，因为我们对革命战争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我们认为，一切游击队战士的英勇奋斗，必须认真和明确地向着革命战争的目标，向着同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所决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目标前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上采取了鲜明的立场。他们尽管意识到游击战争的重要和存在，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同起义运动的需要是不相符的。它同起义战争的基本设想是相抵触的。它的政治主张太抽象了。由于过份强调了传统的民主、和平的解决办法，象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扩大群众活动和搞合法活动而引起了混乱。我们认为，要使哥伦比亚革命战争的发展成为可能，共产党必须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前途采取更加鲜明的主张和更为明确的立场。

然而，当共产党人决定表明他们立场的时候，“民族解放军”却不大喜欢它。在1965年初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共产党人透露了他们离开同“民族解放军”合作到底有多么远。

“爱国解放阵线”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运动的几个意识形态问题有待澄清。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外，还有一个在1965年成立的独立组织，“民族解放军”。党极想同这个组织一起工作，但是，它有否定我们党的作用的倾向——最近反映在对我们的公开攻击中——使联合难以达成。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本部的十月（1967年）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号召“民族解放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大会指出：“我们重申我们寻求同‘民族解放军’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团体联合的政策，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联合和兄弟般的合作，就不可能确保革命运动的任何重大进展。我们正在打一场由帝国主义及其当地代理人对我国人民发动的战争。因此我们号召上述团体停止他们对共产党的攻

击,因为这些攻击只能有利于有权、有钱和有工具来打击革命运动的那些人。”

本声明对企图否定共产党的作用并人为地使游击运动对抗党的论点,是一个有力的回击。这种论点,把城市工作同乡村工作,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合法工作同非法工作,在山区的战士同在市镇的战士割裂开来。这个论点的鼓吹者声称,把一切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政策是“不好”的,断言游击队运动“产生”了党。在哥伦比亚,发展的过程就证明了这个概念的谬误。武装斗争正是由党在群众中广泛工作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武装斗争实际上是革命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事实上,为了团结,这些争端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正在消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给民族解放军的信中说:“帝国主义及其当地的代理人对我国人民挑起战争,其目的是在阻止革命的进行。我们革命者必须联合起来,而且我们并不认为联合就意味着一个组织从属于另一组织。”在向共产党致敬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宣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本部第一次大会向共产党、党的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致敬。我们的政策,都是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表达的党的政策为指导的”。^①

法维奥·巴斯克斯的“民族解放军”面对马鲁兰达的游击队对正统的共产党这种始终不渝的忠诚,除了单独前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① 海梅·冈萨雷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载《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月刊,1968年2月。

六 卡米洛·托雷斯和教会

哥伦比亚的寡头政治及其民族阵线，虽然有军事能力扑灭马克塔利亚和其他“独立共和国”，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政治愿望或者能力去解决哥伦比亚社会更为基本的问题。他们把症状错认为疾病本身。“暴力”是由于哥伦比亚特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绥靖”国内的广大地区并不能引起变化和发展，除非改变制度本身。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在局势中使它更加丧失勇气的许多因素之一，是全体居民对待它的每项活动都漠不关心和冷淡。“暴力”连同多年来不恰当的政治活动，使得大部分哥伦比亚人不受政治家们的诱骗。“民族阵线”，即在寡头政治下两个竞争集团之间平分权力果实而达成的协定，乃是一个骗局。绝大多数哥伦比亚人一眼就看穿了它。1962年，当号召投票支持“民族阵线”的总统候选人——一个叫做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的老保守党员——时，百分之七十的选民都弃权了。

这种高比例的弃权在以后的选举中反覆发生。不难断定，这是对“民族阵线”的抗议。但是由此推论在哥伦比亚国家里，就一定有一个没有党派关系的“无党派者”大集团，能够被争取过来赞助某种新型的政治，这是否正确？在盖坦被暗杀之后，哥伦比亚政界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卡米洛·托雷斯神父认为是这样的。他念念不忘仍在党派外面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广大哥伦比亚群众。他断定，唯一有价值的政治活动应把这些“无党派者”组织成为一个有效的自觉力量。1965年10月，他写道：

这方面的组织,对于一种革命运动的形成和夺取政权,将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当实现了这一步骤,哥伦比亚就会见到实现革命转变所必需的广大群众运动,而这种革命转变由于盖坦的被害、暴政的出现以及其他政治运动里存在着的真正缺点而受到挫折。当这种转变终于到来时,那些容许甚至助长寡头政治长期统治哥伦比亚人民的各种条件——历史的基础——将被扫除净尽。^①

卡米洛·托雷斯不是正统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人。假如他没有到山里去,也没有同游击队员一起进行战斗而被杀死,他就会仅仅以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造反的神父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他的英勇牺牲使他与切·格瓦拉一道并列在拉丁美洲左派的伟人祠里。

1929年2月3日,他生于波哥大一个十分体面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幼年时,虽然跟随双亲到欧洲旅行,但大部分的学校教育是在波哥大接受的。他在国立大学花了一个学期读法律,可是他放弃了这个学科,决心成为一个神父。他进入一个多米尼加神学院,从那里他到了比利时著名的卢万大学,读了一年的社会学。

回到波哥大,他就当了国立大学的牧师,并成为社会学系创办人之一。由于为两个被非法开除的学生辩护,他与学校当局争吵,因而被解除了学校牧师的职位。此后,他当了高等公共行政学校的校长,研究合作社问题。在高等公共行政学校里,他帮助创办一个社会管理学院,同时,又受委派为红衣主教在哥伦比亚土地改革所理事会的代表。这两个工作给他很多机会周游全国,进行讲演

^① 《统一战线》,1965年10月28日。引自赫尔曼·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现状和命运》,特别新闻处,波哥大,1967年,第149页。(这本书接着由墨西哥城二十一世纪书店出版)。

和组织有关土改的讲课，关于这点，他发表了强烈的观点：

我发觉哥伦比亚土地改革所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充分关心对农民进行教育。我所谓教育，不是形式上的教育，因为学校和一些合作社已建立起来，这里所说的教育，是指提高农民觉悟的非正规教育，以便将来能使农民组成一个巨大的压力集团，这个集团能把这种假土改变成由农民来实行的真土改。^①

正如许多年青的拉丁美洲人关心获得组织结构上的根本变革那样，这也是卡米洛·托雷斯的巨大兴趣。农村或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市镇的广大人民群众，怎样才能被引导到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自己提出政治要求，而不是由他们没有参与的政府来满足他们所设想的愿望呢？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同卡米洛密切合作的一批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事情。

卡米洛·托雷斯对哥伦比亚前途的关心，是在卢万大学初次被唤起的。1954年，他在那里是“哥伦比亚社会—经济研究团体”——由若干在大学学习的哥伦比亚学生所组成的——有名领导人。他一回到波哥大，就卷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计划，其中有些计划是多少被政府公开支持的。卡米洛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影响，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在两个阵营都插入一脚。一方面他是寡头政治的一个执政者，一个教士，一个在学术上对当代苦难根源的探讨者；另一方面，为与人民交谈和亲自发现哥伦比亚的真实情况，他又是一个完全甘愿抛弃这个上流社会的地位，深入小市镇和国内最落后的地方的人。作为一个教士，他多少能够脱离党派政治，因此，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左派的失败开始进行长期查询的时

^① 关于土地改革的演说，1965年6月20日。引自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36页。

候，卡米洛是被人民相当尊敬地听信的一个人物。

哥伦比亚的基本问题，与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是相似的。在危地马拉，左派不得不自问，阿本斯的改良主义政权为什么这样容易垮台，而从那时起，军人统治为什么几乎不成问题。当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援发生了作用，但是在危地马拉的社会组织中，难道也没有一些妨碍着出现一个能够维护自己权力的人民政权的根本性事物吗？

在委内瑞拉，问题在于发现曾经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的人民起义，为什么在贝坦科尔特—莱昂尼的统治下会失败？当对形势的肤浅分析便可断定国家处于大革命的边缘时，一种政权，不想进行可能导致发展的社会—经济变革，怎么能够维持自己的权力呢？

哥伦比亚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一种政权，本身已经表明了无能解决这个国家固有的种种矛盾，为什么遇到的不是人民的愤怒，而是漠不关心呢？当陆军进入马克塔利亚时，游击队简直不能得到一点援助。

在国立大学的社会学家中，逐渐出现一种想法：哥伦比亚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推到革命方向的脆弱组织。相反，它显然是非常坚韧而有弹性的。任何未来的革命家想利用确实存在的危机形势以前，对于这点作更深入的理解乃是必需的。

左派甚至没有真正懂得它需要什么；它确实不知道把那些反对民族阵线的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因此，将近1964年底时，卡米洛自己搞出了一个最低纲领。1965年3月17日在麦德林的一次集会上公布了这个纲领，接着以“人民统一运动纲领”的名称发表了。^①

卡米洛“纲领”的发布，震动了整个哥伦比亚，并且触发了一场天主教会历史上多得得的大规模的教会争论。天主教的等级制是哥伦比亚寡头政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对于一个骚动的神父

^① 原文见附录八。

加以抑制，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卡米洛本人阐述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开始发表纲领时，就到我的教会的上级主教那里，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告诉他。他甚至没有向我要一个抄本。然而，在这次会见中（我得知罗马教廷早已晓得我的纲领）我被通知马上离开我担任的公共行政高等学校校长的职位。^①

解除了卡米洛在大学的工作之后，教会在它的统计部门中，给他一个从事研究波哥大城市的工作，薪水很低。这点薪水无论如何不够供养卡米洛以及经济上向来基本上依靠他的母亲。他请求至少让他在大学继续授课。这也被拒绝了。然而，出现了送他回到卢万大学去完成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可能性。他常常盼望这个可能性，并且，从教会统治集团的观点来看，当他的声望迅速增长的时候，这样一个解决办法能够合适地使他离开这个国家。

5月22日，应国立大学联合会的邀请，他在波哥大作了关于他精心拟订的“纲领”的讲话。这次在首都的集会，比早期在麦德林的集会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几天以后，没有通知卡米洛，哥伦比亚的红衣主教路易斯·孔查·科尔多瓦发表一个紧急声明，宣布送卡米洛到卢万的计划不是教会当局施加压力的结果。他补充说，托雷斯神父的“纲领”有很多观点“与教会的教义是不相容的”。

卡米洛立即请求红衣主教列举在他的“纲领”中同教会的教义不相调和的论点，但是，红衣主教答复说，因为托雷斯神父对此是完全熟悉的，没有必要逐一细说了。

^① 《与奥托·博伊·索托会见》发表于1966年9月14日《民族报》（智利），重印于诺尔维托·阿贝赫：《卡米洛·托雷斯：这个游击队的神父》，A·培尼亚·利略编辑，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第141页。

卡米洛和教会之间的破裂为期不是很遥远的了。早在3月20日,在卡米洛发表他的“纲领”的麦德林会议以后第三天,他已写信给红衣主教请求允许放弃神父的职务:

当我选择从事圣职时,我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为教会和为哥伦比亚服务的最好方法。但在当了十多年的神父之后,我感到在教会、哥伦比亚和我自己的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俗人就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的。确实,我相信这些情况迫使我在世俗界中采取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我不能放弃,否则就要妨害我忠于基督、忠于教会和忠于哥伦比亚。

卡米洛假如不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对天主教教会统治集团的运动,包括对教会财富的攻击,事情仍然可以暂时平息的。在六月中旬发表的一次访问记中,他作了如下的解释:

哥伦比亚教会的最大障碍,是兼有财产权和政治权,正如圣保罗指出的那样,这使教会重视“人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智慧”。我谈到的财产权和政治权,是由领导人的态度造成的,他们用经济和法律保证来维护这种财产和政治权力。那就是教会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原因。

尽管基督说过:“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奉事神,又奉事玛门”,但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哥伦比亚的教士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甚至比西班牙还落后。世界上唯一进步的教会无疑是贫穷的教会。

6月20日,卡米洛在无线电广播中宣称:“即使没有革命,我也赞成没收教会的财产。”

但是,红衣主教已经忍无可忍了。两天以前,他发布了一个声

明,警告忠诚的天主教徒与这个危险的神父来往的危险性。

波哥大红衣大主教认为这是良心上的责任,告诉天主教徒们,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是有意识离开天主教会的教义和训令而走上邪路的。

打开罗马教皇的通谕,可以充分认识这个可悲的真理。更为可悲的是,当国家正主要由于用很大代价来反对暴行而经历着危机的时候,托雷斯神父却滑得那么远,竟至主张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

卡米洛·托雷斯神父的活动,与他的神父地位和他穿的法衣是不相容的。托雷斯神父的两种身份可能会使一些天主教徒去追随他的纲领中提出的主义。它们是错误和有害的。

6月22日,卡米洛去见红衣主教:

一个朋友问:“你们的会见怎么样?”

卡米洛回答:“唉,是这样的。我们互相问好。我告诉他,我要他对我说,我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哪些观点违反了教会的教义。”

红衣主教回答说:“我的答复已在6月18日声明中说了。”

卡米洛争辩说:“我希望安抚我良心的事,是请阁下指出我的错误所在。”

红衣主教说:“注意我的声明,教士不应该干预政治。”

“阁下,我认为作为一个神父和教徒,我能请求对话。”

“不,我没有什麼再要说了。声明中都有了。”^①

6月24日,卡米洛要求红衣主教,是否可以免除他履行一个神父的形式上的义务。两天后,红衣主教同意他应该还俗。

^① 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19—20页。

七 卡米洛·托雷斯和“统一阵线”

卡米洛一经离开教会，就能够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组织“人民运动统一阵线”，关于这个阵线，最初在他的麦德林演说的“纲领”中已提到过。首先他同“民族解放军”接触。7月6日和7日，他同法维奥·巴斯克斯以及“民族解放军”的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那时以前，“民族解放军”的游击队曾经活动了六个多月，取得一系列光荣的军事胜利。但是他们缺乏大的城市组织，而他们如果不建立一个同他们的观点一致的城市组织，他们就得注定留在丛林地区，不能进一步对市镇发生影响。因此，“民族解放军”对卡米洛的“统一阵线”发生兴趣，如果能实现，那将证明这完全是那种无宗派革命团体，这种团体在古巴已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月的下旬，卡米洛写信给法维奥·巴斯克斯，把自己的活动告诉他：

亲爱的埃略兄弟和同志：

革命进展得非常好。库库塔，奥卡尼亚，孔本西翁，里奥德奥罗，布卡拉曼加等地群众的情绪似乎是一致的。在每个地方，我尽力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预测前途。“统一阵线”的协作委员会在每个地方（除了布卡拉曼加）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存的政治团体成员占少数。与“同志们”^①相处，一开始就有许多困难，因为他们要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

^① 指哥伦比亚共产党员。

似乎慢慢儿谅解了。他们给我们不少帮助。我依旧坚持需要组成地方委员会,首先讨论和传播政纲并发行报纸,然后建立各地区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将对“统一阵线”发出夺取政权的指示。我曾尽力阐明夺取政权的问题,例如,向他们指出:出现了象我们现在这样的紧急状态的时候,我们不能只以示威方式去接收一个哨所或者一个市镇。当农民能够控制一个农场,一个大庄园,整个一个地区,一条道路、一个工厂、一个市镇的时候,才能赢得政权。如你所能了解的,这一切引人想到造反是必需的。你也会懂得,如果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一切的。在这个鼓动群众的运动中,我同你在山中相处的经历,对于我一直是一种鼓励、榜样和支持。

我还按照我们所商定的,在每一个市镇留下一、二个人秘密地进行工作。当然,他们必须受到考验,但是真金不怕火烧。

我将担任报纸的编辑。经理是伊斯雷尔·阿霍纳;助理编辑是胡利奥·科尔特斯;技术主任是印刷工会的一个会员。

能有一个“民族解放军”的卫兵是很好的。我非常感谢你和“民族解放军”在布卡拉曼加和在桑坦德周围巡行中的极好合作和效能。

望你保重。

你的同志和弟兄,

阿尔弗雷多^①

1965年7月22日

两周以后,他再写信道:

亲爱的埃略:

对你的8月7日来信,十分感谢。上次给你写信以后,我

^① 引于卡米洛·托雷斯:《解放或毁灭》。

们作了一次旅行,经过海岸的大部分,埃尔巴利,最后经过麦德林。我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常找到了一些人,做我们所需要的事:支持游击队的斗争,并同游击队一起战斗。我个人关于选举弃权的意见,已被敌人当作“统一阵线”的见解,现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并且产生了政府反对党(洛佩斯和“全国人民联盟”)中的第一批敌人。我甚至不想使教士们中立,因为他们人数很多,但是我曾同罗哈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现在他的反对意见已不那么激烈了。当然我们应该考验他……他几乎与他们所有的人熟悉,这对今后也是重要的……

阿尔弗雷多

1965年8月7日

“民族解放军”是拉丁美洲唯一的菲德尔主义的游击运动,它认真地感到必需组成一个能团结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城市群众运动,如同古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那样。卡米洛在1965年10月给《统一阵线》写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一运动中的若干问题:

“人民统一阵线”是几年来的经验和考虑的结果。在促使各反对派政治集团和其他不满现状的哥伦比亚人联合起来的努力中,有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缺乏足够的广泛基础;第二,缺乏明确的目的。广泛的基础可能受宗教原因、传统政治思想、派别感情或对领袖的忠诚的影响。联合必须在具体目的的基础上提出来以团结所有哥伦比亚人,而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或私人的友谊。“人民统一阵线”的战斗纲领,只有在它取得政权以后才能实行。纲领的唯一新特点,是寻找共同的革命目的,而不涉及党派或宗教的纠纷。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贫穷的自由党人

或贫穷的保守党人，“自由革命运动”的革命分子，共产党人，罗哈斯·皮尼利亚的“全国人民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人，特别是这些派别以外的革命者等等，都能接受这个纲领。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如果我们能从纯技术和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而没有意识形态的副作用，纲领将导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将是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社会主义。

通过谈论革命纲领，你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但是，当你说到革命包含着国家的根本改造，即用科学和技术实现改革以帮助群众时，许多人就望而却步了。

作为纲领的支持者，我们认为夺取政权是实行纲领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作出一个战术的决定：战斗到最后，并使用寡头政治留给我们的任何手段去夺取政权。

这并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后果，因为教会本身曾对正义战争规定了条件。但事实上，许多“革命家”是不想战斗到底的。

一个提倡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哥伦比亚摆脱美帝国主义的纲领，对于也正在为走向社会主义并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各种运动，是不能忽视的。虽然这些运动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从科学的、积极的和实际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同我们最接近的。这种团结实际上使许多喜欢谈论意识形态而不喜欢实际革命的懦怯的“革命家们”离开。

关于“统一阵线运动”，有些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它是已经开始的最迅速的群众运动。最近，不少新战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前来参加。有些人是为了捞取好处而来，又失望而去。有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政党，但怎样来又怎样去了；非常之快。当“统一阵线”的路线越来越坚定而明确，革命阵营的追随者将逐渐减少，而且回到他们开始起步的地方；或者等待我们发动了革命，然后再参加革命。

尽管有开小差的，有虚伪的谣言和背叛，对于哥伦比亚人民来说，主要的事情是毫不动摇地前进。决定的因素，将是不愿他们的孩子们将来责备他们背叛历史和革命使命的穷人。他们应该懂得我要战斗到底，而且，即便只剩下我和少数坚决的人，我要继续与他们一起战斗。

虽然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对于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来说，重要的事就是决心坚持到底。^①

尽管卡米洛热心于社会主义，他的观点很难被说成是极端主义。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象国内事务方面的思想一样温和的：

在一定的团结基础上，“统一阵线”不希望在它的国际政策上引起不和。它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立场，是以哥伦比亚应当享有完全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主权的愿望为基础的。它保卫根据自己的方式为此而奋斗的任何运动，不论在拉丁美洲或者在第三世界。当“统一阵线”可能不完全同意一种运动时，它认为它的活动是积极反对任何扩张主义者和好战政策的。因此，我们对智利的“弗雷”表示同情，但没有作理论上的妥协；对巴西的“古拉特”表示同情；正如我们也认为墨西哥政府的某些行动是值得赞许的。

我们还认为对古巴的任何攻击，不仅是对于马蒂的国家的问題，而是牵涉到整个拉丁美洲。我们不同意那些看问题太简单化的人的意见。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古巴今天是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首次试验，也是在我们贫穷和不发达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民群众觉醒的信号。我们还强烈

^① 《统一阵线》，1965年10月14日，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86—87页。

抗议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

作为民族主义的榜样，埃及事件是重要的，虽然不能完全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对发展中的国家的态度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有决定性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顾这样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已引起了某些主张束缚性援助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活动。

除此而外，我们的中立采取同一切民族友好的路线，并且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地化斗争。^①

卡米洛在 1965 年下半年的工作，主要是周游全国，在各种政治集会上演讲，并为他的运动的刊物《统一阵线》写文章。8 月 26 日，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出版了。这是一种周刊，定价一个比索，大约是普通报纸价格的两倍。它有八页，差不多立即销售了五万份，是哥伦比亚新闻史上前所未有之事。

卡米洛是不知疲倦的人。在 1965 年 8 月到 12 月之间，他给哥伦比亚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团体写了不下十二封重要的“信”，把“统一阵线”的纲领同它们的特殊利益联系起来。

对于“统一阵线”的支持，最初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是热忱的；1965 年 7 月 22 日基督教民主党人宣称：

我们认为，表明我们与卡米洛·托雷斯神父的纲领和最近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相同，并且与它团结一致，是我们的一项责任。在根本问题上，这些目标是符合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意见的。

“自由革命运动”从未正式对“统一阵线”承担义务。但是它的

^① 《统一阵线》社论，1965 年 9 月 23 日，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 146 页。

领袖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有一次对卡米洛说“我们是同意你的。尽管我们可能有一、二点保留意见，对支持你的纲领我们将不加反对”。但在实际上，“自由革命运动”总是极其热中于选举的进行，既不赞成弃权，也不赞成到山上去。

各式各样的左翼小团体，如“革命行动统一阵线”和亲华的共产党，开始支持卡米洛，可是，等到他们以为卡米洛对保守的团体过于妥协以后，就不支持他了。

共产党人起初也是支持他的。卡米洛在9月2日发表于《统一阵线》的一封“信”中，对他们是特别友好的：

我曾说过，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神父，我是一个革命者。我认为共产党具有真正的革命要素，因此，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神父，我不能是反共的。

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我不是反共的。因为反共要迫害我们的同胞，他们要抗议的不论是否共产党人，都要抗议，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穷人。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不是反共的。因为共产党的道路对于解决贫穷、饥饿、文盲、缺少住房以及对人民必需的设施的缺乏等项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和科学的解答。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不是反共的。因为我相信，反共就不免对共产党所支持的一切作全面的谴责，而在这些事情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全面地谴责他们，意味着对合理的事情和不合理的事情都加以谴责，这是反基督教的。

作为一个神父，我不是反共的。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正的基督教徒。

我不会参加共产党。不论是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作为

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神父，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但是，为了共同的目的：为了反对寡头政治和美国的统治，为了人民夺取政权……我准备同他们共同战斗。

卡米洛的意图，是抱着用“统一阵线”把反对现存体制的最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的观点，尽量做到没有宗派性。他跟共产党攀谈以后，接着便转向社会的其他方面，首先是转向基督教徒：

天主教信条的基本点是爱他的邻人。这种爱如果是真诚的，它就必然是有效的。福利工作、救济品、几所免费学校、一点点住房计划以及所谓慈善事业，如果不能把足够的食物给大多数饥饿的人，不能把衣服给大多数无衣穿的人，不能把知识给愚昧的人，那末，我们必须寻求更有效的手段，把幸福带给群众。

这些手段不会由掌权的少数特权者去寻找，因为一般地说，这些手段将迫使少数人放弃他们的特权。

因此，我们必须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以便把它交给贫苦的大多数人。如果做得对头，这就是革命的目的。这少数人如果不使用暴力抵抗，革命就可以是和平的。革命就是实现这样的政府的手段，这个政府把食物给饥饿的人，把衣服给无衣穿的人，把教育给愚昧的人；施仁布德；爱邻人，它不仅是偶然地、任意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大多数。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仅对基督教徒来说是允许的，而且对于那些认为革命是实现我们爱大家的事业的唯一有效和大规模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必须的……

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写信给工联主义者,批评那些相信拉丁美洲工会过于重视维护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的人:

具有象城市工人那样为组织起来而战斗的这种传统的团体,在哥伦比亚是没有几个的……

人们说,工联主义者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寡头。我不同意。由于受寡头政治的剥削,即使是在垄断企业中工作,并且分享他们一部分特权的工人,也已经采取了公开的革命立场,或者至少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采取了这种立场。

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哥伦比亚的工人阶级为团结和组织人民去夺取政权,必须作出一切努力。

在争取当前利益的每个小规模斗争中,决不可忽视这个事实,即只有在哥伦比亚大多数人民夺取政权后,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要求。

象拉丁美洲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所有支持者一样,卡米洛充分意识到努力使部分军人转而相信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一封“给军队的信”是不可少的:

我有几次曾看见穿着制服的农民和工人——其中我从未见过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殴打并攻击构成哥伦比亚人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学生。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从来没有在军士或者军官中间发现有寡头政治的成员。任何人一看到下列鲜明的对照,即一方面是大声疾呼革命的哥伦比亚群众,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少数特权家族而镇压人民的一小部分军人,必然要问自己,这些出身于群众的人,怎么能去迫害他们的同伴。

卡米洛在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军人支持寡头政治之后，他断言：革命以后，军人实际上会生活得更好：

士兵们：“统一阵线”保证团结人民并组织他们去夺取政权。不要错过了在战场上会合，在那里，我们将对这个压迫你们，也压迫我们，压迫所有哥伦比亚人的寡头政治，给以致命的打击。

最后，卡米洛写信给社会上多半会给他最大支持的两部分群众，农民和学生：

根据人口普查，农民人口已经下降。但是这些调查认为，生活在居民超过一千五百人的市镇的人是城市人口。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生活在乡村。

除了人数以外，最重要的事，是农民对国民收入作出最大的贡献。出口商品的90%是农产品（咖啡、香蕉、烟草、糖）。没有农业，我们没有办法输入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和食物。不幸的是，农民的劳动如同这个制度下的一切事物一样，只是帮助了一小撮人。那些经营各种联合企业的人（如咖啡种植主，棉花种植主，联合果品公司，香蕉种植主，烟草栽培主，等等）以及那些经营银行（特别是共和国银行）的人，占有了全部利润。政府所获得的利润，用于他们所谓的经常费用，那就是说，付给文职官员（为了保持各党派之间的平衡，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并购买旧武器来屠杀那些出钱购买这些武器的农民。

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同他们在现行制度下所受的待遇之间相对照，是显然令人愤慨的事。

我们的农民已经懂得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懂得他们正在

为什么事做好准备。他们不是瞎冲，也不拒绝战斗。寡头政治已悍然宣布紧急状态，不准人民在公共广场上集会。象在麦德林，它们正在用机关枪扫射群众了。当我们不能在市镇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到农村去。我们不能从那里跳到海里去。我们必须坚持，必须战斗。那就是为什么农民必须作好准备，组成五人到十人的“统一战线”突击小队；清除这个地区的人民的叛徒；准备好食物和衣服的贮备；作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不要让他们自己被激怒，当形势不利于人民的时候，不要抵抗。

寡头政治将继续坚定人民必须支持革命力量的信念。为什么西马科塔游击队没有被剿灭？正是因为农民的支持。

寡头政治既然不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农民就不得不对从市镇来的革命者，工人和学生，给予掩护。

现在他们必须团结和组织起来，以便为我们准备好，并开始进行长期的最后斗争。

在“给学生的信”中，卡米洛提醒他们对于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不发达国家中，学生是一个有特权的集团。贫穷的国家花了很大费用才有为数不多的毕业生。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就已有的大量私立学校和大学来讲，金钱已成为教育的决定因素。在一个有60%半文盲、8%中等学校毕业生和1%专业人员的国家中，学生是能够分析哥伦比亚形势，并把它同其他形势相比较，进而想出可能解决办法的少数集团之一……

对于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危机，我不愿意固执己见。我要做的一切，就是鼓励学生接触第一手的资料来源，考虑时

机、他们的责任和必须做的事情。我个人相信,我们正在越来越接近哥伦比亚革命的开端。但是唯一有些权威来讲这话的人,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接任了人民的领导职位,没有一点家长作风,愿意学习而不是教训人,他们就能够对正确的时机作出客观判断……

尽管卡米洛周游全国,有了初步的效果,但是不久就使人开始感到“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不够明确。然而,当卡米洛和《统一阵线》的编辑刚把政策规定得更确切些,他们立即在阵线的内部引起不满。首先撤消支持的是基督教民主党人。

事情发生在9月17日到19日在麦德林举行的工人、学生和农民团结代表大会上。大会辩论的范围,环绕着武装斗争问题,对古巴采取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以及选举弃权诸问题。

基督教民主党的出席人对卡米洛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提出异议,而且特别使他们不安的,在他们看来,是由于共产党控制了“统一阵线”。卡米洛坚定地认为他自己同基督教民主党的左派是一致的,便立即同基督教工会组织,即“拉丁美洲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更保守的代表们闹翻。

在麦德林会议的余波中,桑坦德省的基督教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下列的宣言:

1. 考虑到卡米洛·托雷斯在麦德林的工人、学生、农民大会上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而忽视了“拉丁美洲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基督教领袖埃略多罗·阿古德洛·里维拉,卡米洛的“统一阵线”应大部分归功于他,并且只有跟他在一起,卡米洛才能证明他是自称的基督教徒;

2. 考虑到卡米洛那个命名不当的《统一阵线》周刊所曾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向,以及在阵线的一切会议上对

基督教社会民主党的忽视；

3. 考虑到我们具有比“人民统一运动纲领”更为进步的纲领；

我们宣布：

1. 我们撤消对卡米洛·托雷斯的运动的支持；并且声明，作为基督教徒，我们不能玩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法，马克思主义者在选举上的力量，我们是不了解的；

2. 我们向桑坦德和哥伦比亚的人民斥责他们正在企图玩弄伎俩，他们利用卡米洛·托雷斯使运动看起来是基督教的，而实际上却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胡利奥·塞萨尔·科尔特斯和海梅·阿雷纳斯领导的；

3. 我们声明，哥伦比亚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才算是革命的，只有我们一如既往热情提倡的自由革命，才能拯救哥伦比亚，才能使哥伦比亚摆脱一切帝国主义者，它们想通过它们的资本家和共产党走卒来剥削哥伦比亚；

4. 我们禁止桑坦德的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以个人或作为一个党派参加“统一阵线”的各种委员会，我们特此通知公众，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是由卡米洛及其同志所领导的“统一阵线”的组成部分；

5. 我们要求桑坦德的人民，在基督教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以便建立一支单一的人民部队能够实行我们提倡的自由革命。^①

^① 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144页。“基督教民主学生会”没有这样苛刻。当卡米洛提倡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们才动议反对他：“在‘学生社会民主运动’方面，直到卡米洛·托雷斯神父作出用游击战争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之前，一直把他作为哥伦比亚革命领袖加以支持，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游击战争并不是一种革命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学生舆论界和向全国指出，去年9月在麦德林举行工人、学生、农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并没有撤消对卡米洛·托雷斯神父的支持，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虽然由于他和我们两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不是在学说上）的某些混乱，使关系紧张起来。”——“基督教民主学生运动”文件，写于卡米洛死后，引于前书第144—145页。

由于这一初次分裂的信号，其余的人立即想同样干起来。“工人学生农民运动”，这个比早些时候更加固执己见的组织，发表了一个对“统一阵线”不抱幻想的说明：

真正的“统一阵线”，必须以贫苦的和中等的工人和农民的战斗联盟为基础；仅仅从有关的左翼反对派得到若干人，或者简单地去鼓动群众，或通过某种组织去引导这种鼓动，那是不够的。卡米洛·托雷斯提出的“统一阵线”的想法，鼓动了被剥夺的群众，但是除了提出需要组织他们外，没有再前进。“统一阵线”的建立，不能靠怀有革命愿望的各派别的不足信的首脑之间组成的脆弱联盟，不能单纯地靠煽动群众，也不能靠把不是贫苦工人和农民的人划成群众，工人农民由于他们对革命的认真性和人数众多而吸引了其他方面的人。只为个人之间的联盟而努力，而不认真设法组织一个作为“统一阵线”精髓的被剥削阶级的联盟，只会刺激当前左翼派别中许多无耻的和机会主义领袖的野心和自负。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不强调需要组织一个人民革命所要求的“统一阵线”。

现在显然缺乏一个引导并集合群众进行斗争的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而这些群众是“统一阵线”设法要集合的。几个集团为了那个一点也不统一的领导权明争暗斗，部分是由于托雷斯神父方面过多的自由主义，因为他坚决认为联合越广泛越好谁也不应排斥。结果是修正主义分子各种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连众所周知的敌人的代理人“民族主义先锋队”分子^①也混进来了。

^① 《工人与学生运动》，1966年1月7日第三次大会（日期不详）文件，1966年在波哥大刊行小册子，引于前书，第147—148页。

有些人对卡米洛的政治观点表示异议，有些人反对他对现有的政党和选举都缺乏热情。卡米洛则认为，对选举必须抵制，并且还认为在上次选举中曾弃权的70%的大多数哥伦比亚人，可以指望他们参加“统一阵线”的行列。这两个意见，都没有被赞成“阵线”基本纲领的团体的领袖们所广泛接受。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团体的活力而要搞竞选，很少的人相信能简易地使“无党派者”转而支持“统一阵线”。

在9月16日的“给无党派者的信”中，卡米洛已经非常接近于提倡在“统一阵线”之外组织一个新的政党：

在最近的选举中，寡头政治还不需要伪造选票（我们如果听任举行下一次选举，他们就只好伪造大量选票）。

弃权者果然是选民的极大多数。70%的哥伦比亚人没有投票。任何有一点哥伦比亚人民观念的人，象我参加过群众集会的随便哪一个人，必然得出结论，即不投票的人是反对“民族阵线”和寡头政治的。

不投票的人一般地说是没有加入政治集团的革命者。虽然已加入统一阵线的政治团体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反宗派精神，已允许它们获得更多的成员，大多数已经加入统一阵线的哥伦比亚人，却没有先加入现有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应该懂得，统一阵线的主要活动必须是组织“无党派者”……

“无党派者”的组织必须从基层由下而上地建立起来，有它自己的领袖和严格的纪律，但不要过于依赖领袖。当前，他们之间的主要联系，是我已向哥伦比亚人民提出的“统一阵线”的纲领。也许在开始的时候用我的名字太多了，但是只要它有利于为革命而进行鼓动和组织，它就是非常有用的。然而，犯已使其他革命运动失败的同样错误，这是幼稚的。我们

都目睹寡头政治如何暗杀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的。我们都看到人民的反应不是团结在革命领袖的周围，而是跑到那些靠人民的支持进入总统官邸而出卖革命运动的寡头政治的领袖那里去。我们都看到：没有组织的人民如何在敌人强大的城市里努力战斗。我们都看到过人民漫无目的的东奔西走，焚烧掠夺，而不是退到敌人较弱和革命者力量较强的农村里去。

我们正在同寡头政治进行赌赛。在我们建立起“无党派者”的坚强组织之前，它们可能扼杀我们。我想，监禁我或者审判我的做法是太愚蠢了。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到暗杀。关键的事情是，如果暗杀发生了，哥伦比亚人民必须得到准确的指示。

首先是退到农村去，不留在城市里战斗。

其次是在农村的组织有能力支持进攻之前，不要搞进攻战……

群众示威，革命的热情和鼓动，如果它们立即转化为农村地区的组织，都是有益的。

每一个普通的农民，每一个普通的工人，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自觉到有责任同几个同伴和朋友一起组织一个“统一阵线”的指挥部，不要等候指示或命令。

他们必须集合起来：

1. 讨论并宣布“统一阵线”的纲领；
2. 散发并资助《统一阵线》这份报纸；
3. 执行立即行动的命令；
4. 联系其它指挥部，在街道、区、工厂、学校和大学、城市、地区和省区组织指挥部；
5. 任命参加 1965 年 12 月 11 日或 12 日举行的盛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选举弃权本身并不是革命的武器；它必须同有力而积极的组织和纪律结合起来。“无党派者”，党外的革命者，必须由无组织的和软弱的群众转变为一个破城槌，决不停止打击现行制度，直到它崩溃为止。

这样一个纲领很难号召各种政党在统一阵线的格局内进行协作。这些党派本身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利用“无党派者”。9月份《统一阵线》的一篇社论使事情弄得更糟，这篇社论实际上不是卡米洛写的，却把他的论据向前推进了一步——也许比卡米洛所希望的更前进了，因为卡米洛从未公开吐露过赞成建立一个政党。《统一阵线》的文章中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在70%的选举弃权者和“无党派者”里面好战的一部分人之间，并不存在分裂或和解的问题，因为我确信他们是由相同的人组成的。双方都加入广泛的革命人民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统一阵线”将承担这一必要的任务：把这个运动转变为真正的哥伦比亚革命政党。^①

对此立即有反应。“统一阵线”内部现有的革命团体害怕起来了。有一个团体以下列的声明申诉道：

考卡山谷“统一阵线”协调委员会，在有共产党、“自由革命运动”的强硬路线派、人民民族主义先锋队、山谷省工人联合会、独立工会集团、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房屋中心、无党派者和学生的代表们所参加的本月22日大会上，通过下列动议：

^① 里卡多·巴伦西亚：《无党派者：为什么摒弃政党》，《统一阵线》，1966年9月16日，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135页。

1. 在你所编辑的第4期报纸中,把“统一阵线”描述为一个新的政党,它要把选举弃权的广大群众聚集起来,这些人在理论上被认为属于无党派者。

这种观点,在你的“给无党派者的信”中,是含糊地表达的;而在胡利奥·塞萨尔·科尔特斯和里卡多·巴伦西亚的文章中,则是公开而直接地表明的。后者说,“统一阵线”将是“真正的哥伦比亚革命的党”,而无党派那部分人将是“基本的支持者”。

这种新的处理意味着“统一阵线”概念的根本改变,并带来一切政治后果。现在很清楚,统一阵线并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纲领基础上,努力去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运动;它不是各政党和其他组织的一个联盟;而确实是由无党派者组成的一个新的政党。

如果接受这种观念,首要和最严重的后果,是我们这些作为不同政党成员的革命者将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或者我们脱离我们的党加入无党派者的行列,或者我们留在我们的党内而不能加入“统一阵线”。

你不会不知道,“统一阵线”作为无党派者的政党的这种观念是闹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而这同你在开始时所表现的并使你赢得群众支持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我们自然不赞同这个观点,并甘愿为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和席次先后的统一阵线去进行战斗,准备对付任何分裂企图。显而易见,我们并不反对无党派者方面的人成为一个革命党。相反地,我们认为这将是哥伦比亚革命过程中前进的一步。但是不能把这个党组织起来对抗其他革命组织,也不能把它与“统一阵线”等同起来。

2. 胡利奥·塞萨尔·科尔特斯和里卡多·巴伦西亚的文章,含有对各党的不负责任的诽谤,这些党现在构成了你也

在内的统一运动的一部分。科尔特斯先生当提到无党派者以外的其他“统一阵线”成员时，就说是“小革命团体”或简单地说是“反对派”。里卡多·巴伦西亚益发傲慢，因为他说，这些“团体”由于它们无能实现哥伦比亚革命而已被人民抛弃了。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群众追随这些专栏作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色的革命工作，但是我们认为，不管追随他们的人有多少，也不管他们对于革命有多大功勋，他们都没有权利采用这样的说法。

因此，我们驳斥这些文章中充满种种诽谤的说法，并且认为：它们对于人民的团结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在“统一阵线”的队伍中，应有更多的革命警惕性。

我们很想在我们的报纸《统一阵线》上公布这些论点。^①

在《统一阵线》196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卡米洛请求大家镇静，他写道：

当前，让我们互相尊敬，让我们为革命而融合相处，而不是要求荣誉和革命中的优先地位。让我们继续组织那些尚未被组织起来的人们。让我们以他们所愿意的名称称呼他们：“无党派者”，“参加统一阵线者”或“革命者”。我不赞成领袖在组织之上的观念，但是如果领袖是服从组织的理想的，我们目前可以承认他们。如果人们愿意自称为“卡米洛主义者”，只要他们组织起来了，就让他们这样叫。这不是一个新的党，也不是一个新的运动，这是未被组织起来的人们的一个新组织，因而他们好参加“统一阵线”，参加革命，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只好接受自己所不愿接受的新名称。

^① 《统一阵线》，1965年10月7日，引自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135—136页。

很明显，在“高标准”上将有分歧。让我们不要夸大那些分歧，而要为革命而融洽相处。人民将为无党派者决定一个名字。要是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他们就会作出决定……

但是很深的意见分歧是不易加以弥补的，在如此短期内迅速建立起来的“统一阵线”，差不多同它兴起时一样迅速地消散了。它的短促的历史说明了要说服拉丁美洲左派团结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菲德尔以他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设法统治了古巴，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一个领袖因仿效他而获得成功的。游击运动的失败，特别是在玻利维亚，往往可以归咎于各游击“中心”不能团结左派来支持它们。卡米洛·托雷斯在哥伦比亚的经验，表明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

八 卡米洛·托雷斯和游击队

卡米洛·托雷斯为尽力维护哥伦比亚各种反对党之间的团结,弄得筋疲力尽,幻想破灭,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军”的游击队。1965年12月,他放弃了在狂热年份常去的公开讲坛,退到山区的秘密根据地,于1966年1月发表了一个宣言,阐明了他的道理:

哥伦比亚人:

多少年来,我国的贫民等待着开始反对寡头政治的最后斗争的战斗号召。

当人民绝望透顶时,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欺骗人民,用新的言词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平静下来,结果终归导致同样的结果:人民遭殃;特权阶级得益。

人民需要领袖,而且找到了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这样的领袖,寡头政治却杀害了他。当人民要求和平,寡头政治却在全国到处扩大暴行。当人民不能再忍受暴力而用有组织的战争去夺取政权时,寡头政治就制造出一个军事政变来诱骗游击队投降。人民要求民主,他们却再次受到公民投票和“民族阵线”的欺骗,这两者带来的只是寡头独裁。

人民不再相信他们。人民不相信选举。人民懂得合法的手段已经用尽。人民懂得只有靠武装力量才是唯一的办法。他们奋不顾身,准备冒着生命危险,以便使哥伦比亚人的下一代不做奴隶;以便使那些现在愿意献出生命的人的孩子们享有教育、房屋、食物、衣服,尤其是尊严;以便使哥伦比亚人将

来能有摆脱美国势力的自己的国家。

一切真诚的革命者不能不认识到，剩下只有武装斗争的道路。不过人民正期待着领导作出榜样，亲自参加，并发出战斗的号召。

我要告诉哥伦比亚人民，现在是时候了。我没有辜负他们，我走遍了城镇从事团结人民，并组织人民夺取政权。我要求我们大家都应一心一意为这些目标奋斗，直至牺牲。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寡头政治想要组织另一次选举丑剧；候选人先是辞职，然后又接受；两党委员会；以空想以及那些不仅自己守旧而且还出卖过人民的人为基础的革新运动。此外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

我已参加了武装斗争。我打算在哥伦比亚山区战斗下去，直到为人民赢得政权。我已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因为我觉得那里有与“统一阵线”相同的理想。在基层，在没有宗教或者传统的党派分歧的农民中间，我觉察到他们有团结的愿望和存在着团结。这里没有向其他方面、其他运动和党派的革命者打仗的愿望。没有利己主义的领袖。他们要把人民从寡头政权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在人民享有全部权力之前，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他们接受“统一阵线”纲领的目标。

一切哥伦比亚的爱国者都应为战争而动员起来。有经验的游击队领导人将在全国各个角落开始起来反抗。同时，我们必须警惕，我们必须收集武器弹药，进行游击训练，同专家商谈，招募士兵，搜集物资和药品，准备长期斗争。

让我们在胜利有把握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让我们考验那些自称革命者的人并清除叛徒。我们必须行动，但是不能急躁。在长期战争中，有朝一日每个人都要行动的，重要的事情是，到了那个时刻，我们要为革命准备好。每个人都不需包办一切，我们应该分担工作。“统一阵线”的战士们已经

首先带头行动起来了。让我们耐心等待，并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

人民的斗争应该成为民族的斗争。我们已经开始了，但任务是长期的。

哥伦比亚人：让我们响应人民和革命的号召。

“统一阵线”的战士们：让我们执行我们的命令。

为了人民的团结，奋斗终生。

为了使人民组织起来，奋斗终生。

为了人民夺取政权，奋斗终生。

奋斗终生，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战斗到最后。

走向胜利，因为决定战斗到底的人民，总会取得胜利。

遵照民族解放军的口号，走向最后胜利。

不要犹豫……不解放毋宁死！……

卡米洛·托雷斯

1966年1月于山区

卡米洛·托雷斯参加了游击队的消息，使整个哥伦比亚感到震惊，甚至连国外也感到他这一决定的影响。《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评论说，这个消息“在显赫的经历上”增加了“一层色彩”。它断定卡米洛·托雷斯的这一姿态是选错了时机：

他要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现在很小，因为最近几个月来哥伦比亚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取得了戏剧性的好转。1965年上半年，这个国家几乎处于灾难的境地。通货膨胀，比索严重贬值，资金抽逃，失业，国内外投资降到最低限度，立法机关和巴伦西亚总统之间的显然不可救药的争斗，以及自由党推出的候选人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退出这一年的总统选举，所有这些凑合起来，成为一幅阴暗而危险的画面。“暴力”

——罪犯和政治盗匪行为、绑架和恐怖政治的长期混合体——虽然减弱了，但是至今还在扰乱着。

今天的情况几乎各方面都已倒转过来。1965年通货膨胀率从80%降到45%；11月份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已保证给予一笔约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的一揽子贷款；所得税增加了；卡洛斯·耶拉斯改变了他的主意，同意竞选总统。这一定可以保证哥伦比亚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担任总统的十六年政治计划继续下去，巴伦西亚博士现在确有把握做完他的任期。

虽然阴影依然存在，但托雷斯神父选择了一个不幸的时刻，作出他耸人听闻的行动——而且方式也不妙。如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哥伦比亚需要的是渐进，而不是革命。^①

1966年1月17日，报刊上登出了对游击队运动的如下的分析：

陆军最近决定进攻在东哥伦比亚某一地区活动的所谓民族解放军，前神父卡米洛·托雷斯几天前参加了这支解放军。

官方透露说，高级官员和陆军旅长们在12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开了会，对由这个新的过激分子集团所造成的局势，作了仔细的分析。

民族解放军的露面，再次证实国防部于11月5日披露的、一股具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新型暴力，已经在这个国家出现。

在军事司令官会议上，听取了驻扎于布卡拉曼加的第五旅旅长阿尔瓦罗·巴伦西亚·托瓦尔上校的报告以后，断定了所谓民族解放军对国家的安定并不表现为任何严重的

^① 《纽约时报》，1966年1月22日。

威胁。

会议推断，这个组织是由具有明确目的的过激分子领导的，如同用武力强加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样。

会议透露，已经采取特殊措施，防止过激分子突然扩散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决定对加马腊(马格达雷那)和圣·维森特·米古里(桑坦德)两个市镇之间的广大地区实行封锁。

军区发言人说，应当加快在这个地区的军—民行动，陆军应当警惕，防止民族解放军的新袭击。^①

一个月以后，1966年2月15日，卡米洛·托雷斯在战斗中牺牲了。有关他的死亡情况，下列说法是他的传记作者所能发现的最可靠的说法：

游击队跟踪巡逻队已好几天了。根据对地形的了解和战略的有利条件，〔政府军的〕伏击按时作好准备。陆军部队分为两个小组，中尉在第二小组，离开领先的小组有几码。当这一小组进入这个地区时，游击队领导人用他的“马德生”枪扫射，四个士兵倒下了，随着战斗的趋于激烈，其余的士兵散开了。卡米洛试图从大约五呎以外被击中的一个士兵那里拾起一支步枪，他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受伤了。领导人问他是不是受伤了，卡米洛回答道：“他们击中了我，不过我还能去取得它。”领导人大声对他说：“回来！”但是卡米洛再次力图去取得武器，这样暴露了自己，并受到了致命伤。一个游击队员力图抢出他的尸体，也被打死了。他是一个青年农民，设法进入了卡米洛倒在那里的火线。

这次冲突中，还有两个游击队员被打死了。这次损失是一个进入很有利位置的军曹造成的，他是一个反游击战的老手。

^① 《世纪报》，1966年1月17日，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196—196页。

同时，中尉已开始了包围战，但被游击队的增援小队阻止了，他在离卡米洛很远的地方受伤倒地。一个携带手榴弹的游击队员好几次受命投弹消灭这个军曹，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这个晚上他开小差了。是不是由于叛变、害怕或者慌乱的缘故呢？

当他们知道有被包围的危险，并且不可能抢出尸体时，余下的游击队员便穿过里奥苏西奥，撤退到他们的根据地去了。^①

这个月的月底，民族解放军就卡米洛·托雷斯之死，发表了声明：

民族解放军怀着深切的哀悼和对寡头政治的痛恨，讣告哥伦比亚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者，伟大的革命领袖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神父牺牲了。事情发生在今年2月15日我们部队同“民族阵线”的反爱国军的一支讨伐队的遭遇战中，在这次冲突中，我们英雄的战士勇敢地抵抗敌军，使他们遭到严重伤亡，缴获了几门远射程武器和各种军事设备，再次挫败敌军想消灭我们的企图。可是，我们遭到了牺牲五个英勇爱国者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在他们中间，有被反动派枪杀的无可取代的卡米洛，连同力图从危险中抢救他的其余的坚强同伴。

官方暴力犯下的这种新罪行，是对我国人民摆脱寡头政治和美帝国主义的丑恶枷锁的崇高努力所进行的征伐行动的结果，它迫使人民在国家利益的圣坛上献出我们最好的儿子的鲜血。

卡米洛英勇地牺牲了，他懂得领袖必须作出榜样。他决不同意逃避危险。他知道战争是危险的，却承受了这种危险，

^① 《世纪报》第203页（古斯曼没有指明出处，但暗示这个说法最接近事实）。

因为他坚信他的牺牲终将化为火花，可能是决定性的火花，它将把哥伦比亚人民满怀憎恨和决心去反对那个支持不公正和可耻的制度的政府部队的所准备的战火点燃起来。……

但是，由于他的殉难，这种思想激发起来了。他的理想已被工人接受。作为对他的纪念的献礼，我们要力求实现他所十分强调的人民团结。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和诚实的人民，要以整个身心把战斗英雄在民族解放军队伍中遗下的岗位接替过来。在卡米洛的榜样坚定地指引下，我们的力量必将加强。对他的怀念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战斗精神和对寡头政治走狗的憎恨。我们的人民要消灭那些应对我们伟大领袖死亡负责的人。我们要加强战斗到底的决心，因为，正如卡米洛教导我们的，“战斗至死的人民，总会赢得胜利”。

农民们：通过增强民族解放军的战斗单位，我们将实现没有宗教的或者传统党派分歧的农村地区的团结和农民的团结。

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当你们的斗争同游击队战士的努力取得密切结合时，你们的斗争便将不再是没有效果的。

工人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解放斗争，最后决定于你们的手里以及你们的阶级组织。

军官们，军士们，以及士兵们：停止你们的镇压活动，不要做寡头政治及其卖国政府的杀人工具，不要用象卡米洛那样纯粹是为国家寻求尊严的人们的鲜血，沾污你们的双手。

神父们：以卡米洛的殉难，作为爱邻人可以献出一切，而一无所求的伟大榜样。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站在人民一边。

最后，我们号召所有的人民组织，为我们敬爱领袖的遗体提出积极的要求，把它的遗体从杀害者的魔爪中抢回来。让

我们把它的坟墓当作一座国家纪念碑。

为了人民的团结,奋斗终生!

为了使人民组织起来,奋斗终生!

为了人民夺取政权,奋斗终生!

不要犹豫……不解放毋宁死!

民族解放军

法维奥·巴斯克斯·卡斯塔尼奥,

维克托·梅迪纳·莫隆^①

发自山区,1966年2月

卡米洛·托雷斯的牺牲,是民族解放军衰落的开始,这在当时虽然并不明显。可是,正同切·格瓦拉一样,死后的卡米洛·托雷斯,比他的生前是一个更为有力的象征,特别是在国外。两位革命家,他们的主义的确切性质已经被遗忘了,他们的榜样则永远活着。^②

^① 《起义》(特刊号),1966年3月1日,引于古斯曼·坎波斯:《卡米洛》第204—205页。

^② 1968年2月,在蒙得维的亚有五十多个来自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的“革命的基督教徒”,他们中有教士也有俗人,开会讨论了将于1969年3月在波哥大召开“卡米洛·托雷斯会议”的准备工作。乌拉圭警察允许召开,但不同意赫尔曼·古斯曼主教进入这个国家。

会议是由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组织的,他是一个阿根廷神父,率领着阿根廷的“卡米洛·托雷斯指挥部”。1967年5月1日,在翁加尼亚将军出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弥撒仪式上,加西亚·埃洛里奥宣读了一个革命宣言,与会群众大为震惊。他设法逃脱了,但是后来不得不过着流亡生活。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参与者,是乌拉圭工人神父胡安·卡洛斯·萨发洛涅,他会同古斯曼主教、比利时人R.P.保尔·布拉夸脱和墨西哥神父佩德罗·德·欧塞卡迪亚在哈瓦那写了一个宣言,确认“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作了最科学的分析,并给群众的革命行动以最有效的鼓舞”——非德尔于1968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文化会议上的闭幕词中的名言。

这次会议提出两项呼吁:(1)要求抱有各种信仰的基督教徒都投身到革命斗争中来;(2)痛斥美国人对越南实行种族灭绝的干涉,“基督教徒必须负起责任来反对这场战争,因为拉丁美洲将是1970年的越南。”

还有,会议给保尔教皇发了信,要求他不要进行他预定的前往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的旅行。(见卡洛斯·玛丽亚·古铁雷斯所写的文章(《世界报》,1968年8月6日))。

九 人 民 解 放 军

哥伦比亚在1968年1月开始了拉丁美洲唯一的崭新的游击运动。它所受到的鼓励既非来自哈瓦那,也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北京。它称为人民解放军,从毛泽东那里得来的多少有些夸大的称号。智利亲华杂志《马列主义事业》刊登了一篇宣告这个新的游击战冒险事业发生的论文,作者说明了这个运动的背景:

反对希尔维托·维埃拉修正主义领导——奉行在哥伦比亚搞选举而放弃武装斗争的路线——的斗争,要追溯到1959年波哥大地区委员会背叛的时候;此事导致建立一个支持游击中心的团体。其后,在1962年召开的会议上,马格达雷那地区委员会背叛了,并提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改造共产党。这个革命原则恢复的结果,在1964年3月召开了全国会议。最后于1965年7月,经过意识形态上的紧张讨论,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开除了维埃拉和他的修正主义集团。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清洗了机会主义分子,便着手组织人民战争。^①

这次会议,亲华分子称为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采用了新的纲领和组织。在政治决议中,新的党提出的观点,同当时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意识形态路线是没有区别的:

^① 《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战争》,见《马列主义事业》(智利圣地亚哥)第一期,1968年5-6月。

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革命的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当前世界的政治局势表明，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①

但是，比解放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

它是革命斗争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必须坚持下去，直至取得胜利。

决议继续痛斥那些中国人心目中的敌人：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那里人民革命的果实被夺走，重新遭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南斯拉夫事例充分证明，急需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对付修正主义产生的一种后果，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已经出现。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特别涉及拉丁美洲的情况，决议断言：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反对本国寡头政治势力的内战，很快就会发展为彻底反对美国军队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斗争将是艰苦而持久的。在我们大陆目前的条件下，农村是人民战争的当然战场。

决议暗示，直到现在还缺少的唯一事物，就是引导人民潜在革

^① 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北京周报》，1965年8月20日。

命热情的先锋队的党：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使哥伦比亚不满现状的群众的部分政治自觉，提高到完全政治自觉，并领导他们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

带着这些思想上的丰采，新的亲华的哥伦比亚共产党创立了，虽然不能证明中国政府曾对它有多大的关心，但它是这个大陆上少数受到北京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党。

哥伦比亚亲苏的共产党人看到他们过去的同志离去，一定会感到高兴。一个党员写道：

在(团结)方面的困难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起的，他们以正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使用的同样手段企图干预我们党的工作和引起混乱。他们培植那些体现着最消极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过激革命者”小集团，鼓动无政府主义的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悲剧式地坚持、人为地甚至强制地逼迫人民投入他们不明意义也无所准备的战斗。^①

脱离亲苏党的集团的规模多大，没有估计，但是若干证据暗示，有些马鲁兰达的游击队员离开了他，去帮助组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游击队员，这些人其后形成了人民解放军。^②

这些新的亲华游击队员于1968年1月6日在科尔多巴省的阿尔托西努地区进行战斗。两年前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做了工作，

^① 何塞·卡多纳·奥约斯：《哥伦比亚共产党人建立人民的团结》，见《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通报》，第30期，第52页，引于诺曼·A·贝利：《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纽约沃尔克，第105页。

^② 见《共和国报》(波哥大)，1965年6月30日，并参阅《游击战：中国和苏联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技能》，见《中国通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11—12月。

组织农民并武装农民成立所谓“地区爱国委员会”。他们在2月间发表的第一个重要宣言，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少的引证。新的运动强调它不是一个“游击中心”；它已“从人民的内心里面”成长起来。^①

据一项资料说，美国少校拉尔夫·“爸爸”·谢尔顿（他曾训练过俘获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突击队队员），后来被派往哥伦比亚对付哥伦比亚发生的新的游击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准备了下述关于人民解放军的评论：

在哥伦比亚东北部活动的人民解放军，不是哈瓦那所支持的一支典型的游击部队，因为人民解放军不承认甚至拒绝从那里来的指示。在过去作了有效的教育工作的基础上，他们有真诚的农民支持。他们的领袖是武装起来的，生活在那个地区，显示了他们已经吸取其他民族的经验，并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教训，正在拉丁美洲进行一种新的斗争方式。他们同城市的联系是不容易发现的。^②

人民解放军虽然遭到哥伦比亚陆军很严重的打击，但它设法保持它的组织不受损失。在1969年初，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呈现了一幅罕见的景象，夸耀有三个游击运动正在活动，这些运动受着共产主义世界各极的外来意识形态的鼓动，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对于他们的事业不能说有多大帮助。

① 这一著名文件的原件，见附录九。

② 《哥伦比亚人民战争》，见《马列主义事业》（智利圣地亚哥），第4期，1968年11--12月。

第四部分

秘魯的灾难

一 秘 鲁 的 背 景

不稍稍留意一些秘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就难以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秘鲁兴起的两次革命运动。因为这两次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乌戈·布兰科是一位斗争性强的托派分子，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党的不满分子——都十分关切秘鲁农民的状况。农民在现在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利，因为农民是文盲。由于农民操克丘亚语或艾马拉语，所以农民是文盲。没有学校能教他读或书写这种语言，而对他来说，西班牙语没有什么用处。^① 1940年人口调查表明：秘鲁印第安居民年龄从六岁到十四岁的人当中有88%完全没有接受教育。^② 最近三十年来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数字有过显著的改变。1961年人口调查显示了十七岁以上的全体居民中，39.8%是文盲。根据教育部在1962年发表的数字，40%的学龄儿童根本不可能进入学校，主要由于缺乏学校和师资。^③ 这些没有享受正当权利的儿童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构成这个国家居民中最大的一部分。^④ 当印第安人实际上继续处于国家生活的边缘上，老的腐朽的寡头政治仍将保持统治。

① 根据一位共产主义者的作家：“有二百万农民只能操克丘亚语，五十万只能操艾马拉语，然而国内没有一所学校用农民的土语去教他们。”——塞萨尔·莱瓦诺：《秘鲁游击斗争的教训》，《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6年9月号。

② R. J. 欧文斯：《秘鲁》，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93—94页。

③ 《新闻报》（利马），1963年3月6日。

④ 根据1961年7月的人口调查，秘鲁的人口有一千零四十二万零三百五十七人。乡村人口大约占53%，而城市人口占47%。大约50%是印第安人，10%是白人、黄种人或黑人，而40%是白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种人。

如果印第安农民有了教育和选举权，他向他选出来的议员要求的第一样东西将是土地。现在他没有土地。他为别人无报酬地工作。数字本身作了说明：目前在秘鲁有九百万公顷的可耕地和可利用的天然牧场，3%的土地所有者占有83%的土地，而其他97%的土地所有者占有留下的17%的土地。^①缺少土地、缺少学校教育和缺少政治影响，使得秘鲁印第安人同样缺少其他各种东西。在利马每二千居民中有一个医生，而在革命活动主要中心的库斯科方面每四万人才有一个医生。在普诺省数字更低，每五万八千人才有一个医生。^②

这些印第安人生活上被剥夺和处境不满意的例子，多至不胜枚举。但是他们命运的关键是土地。乌戈·布兰科把他们的要求归结为一句口号：“不得土地毋宁死”，这一口号的一部分是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部分从墨西哥革命者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那里拣来的。路易斯·德拉普恩特曾以秘鲁土地状况为题，写了他的大学学位论文，他把土地改革作为他的游击运动的政治纲领的中心部分。^③

土地也是大城市问题的根本所在。秘鲁居民的10%居住在环绕利马和其他大城市的污浊的贫民区中。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于1966年公布的关于秘鲁的报告作了如下的阐述：

由于缺少工资待遇较好的职业，多数居民经济能力低下，这大概是贫民区的决定因素。但是毫无疑问，应当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和现象的本源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土地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土地改革和扩展供农业用的土地。^④

① 里卡多·莱特斯·科尔梅纳雷斯：《为土地改革而斗争的现代纲要》，《经济和农业》（利马），1964年2月。

② 欧文斯：《秘鲁》，第93页。

③ 论文以《秘鲁土地改革》为名公开出版，社会实验出版社（利马），1966年。

④ 《秘鲁：农业部门的土地占有和社会经济发展》，由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赞助下完成，泛美联盟出版，1966年，第259页。

正和其他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一样，秘鲁有着种种地理特征，这在其他地方，是只有在一个洲的范围内才具备的。路易斯·德拉普恩特本人是一位极其关心他的国家构成的人，而且充分了解地理对政治的影响，他写下了关于秘鲁的多样性的一幅动人图景：

安第斯山脉盘踞在我们国家，象脊骨一样把它分为两个部分。西部是一条濒海的陆架，这一区域名为沿海区。向东去是一片广大的内陆，缓慢地低斜和没入亚马孙盆地，这个沿海区是一片濒海的长条状陆地，由于少雨，95%的地方是无人居住的。虽然地理位置处于热带，由于冲击着海岸线的洪保德寒流的作用使得气候温和而且干燥。从安第斯西坡汇集雨水的河流形成了小河谷，它们横贯这一荒芜了的地带，并且决定着城市的位置。秘鲁的主要城市位于沿海区。肥沃的沿海区的土地都在垄断公司手中（象在秘鲁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土地主要用于生产棉花、甘蔗和一些其他粮食。秘鲁的工业主要位于这个地区之中，而约80%的工业集中于利马。因为有近四百万人居住在——沿海区内，它可称为秘鲁的资本主义区。

以“山区”知名的多山地区是一座巨大的迷园：有着盖雪的山峰和深邃的河谷；有叫作“高地”或“哈莱阿斯”的大平原，靠近峰顶有贫弱的植物带和位于河谷中的难以通过的林地，大多数林地伸向亚马孙丛林，并且依高度和地形的不同，有着冷而干的气候或温和的与热带的气候。“山区”是秘鲁最大而且居民最稠密的区域。这里盛行着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大庄园制。土著的村社，即印加人的原始性“艾柳”组织，在对抗大地主的强夺，对抗村社内部的个人主义影响的持久斗争中残存着。在公社的内部和在一般的农民中间，集体的工作方

法和互助互帮的情感仍然流行。这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地区。极大部分土地用于粮食生产和牧养牲畜。最重要的采矿中心也位于这个区域之中，为来自本地的约二十万工人提供了多半是临时性的职业。这个山区大约有七百万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白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种人。这一山区反映了真正的秘鲁，封建的秘鲁，印第安人的秘鲁。

“丛林”区是一广阔的大部无人居住的地区，在那里，河流提供了唯一的通路，那里植物茂盛。它的居民包括白人、白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和未开化的人在内只有三十万人。位于安第斯山斜面上以“丛林眉毛”知名的高地，由于土地的富饶，由于它的地形和气候，有供短期内开发的巨大潜在能力。这些高地主要用于热带水果的生产和牧畜。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遭到雨水泛滥的低地，拥有大量的森林资源，这些低地是无人居住而荒凉的。沿河散见一些小集镇，居民依靠出售木材、药草、野兽、毛皮等为生。本地的或外来的企业在所谓开拓计划的掩盖下垄断了最好的土地，美国人所有的莱特尼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控制了四万公顷以上的土地。^①

政治背景可以扼要地讲讲。三十年来在秘鲁有一个党和一个领袖独占着想改革或者甚至关心革命的人的活力。这就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它于1924年成立，从一开始就是由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② 每当“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看来正在赢得一次选举时，军方就出而阻止它取得政权。但在三十年以后，

^① 路易斯·弗·德拉普恩特·乌塞达：《秘鲁的革命：概念和展望》，《每月评论》，1965年11月号。

^② 从术语上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党。这一秘鲁的分支名为“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见哈里·坎特：《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运动的思想意识和纲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德布雷称之为“一种拉丁美洲的（中国）国民党”。

甚至更早些，“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失去了革命精神。它开始认为美国可为秘鲁解决大部分问题。虽然军方继续反对“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大选举中获胜，但它之所以这样作，与其说是保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不去推翻秘鲁的上层各阶级，毋宁说是一种反射行为。上层阶级这一集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他们无意依据立法来否定自身的存在。

以“八年统治”知名的，从1948到1956年的八年之中，秘鲁被军人独裁者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统治着。虽然在1950年他以使自己被选为总统的惯常方式来把他的政变合法化，但他仍然是一个军事独裁者。“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共产党在这一整个时期内被禁止了。

1956年，前总统曼努埃尔·普拉多（他先前曾在1939—1945年期间担任过总统）接替了奥德里亚，他是一个反动分子，他和秘鲁的统治阶级一样，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损公肥己之上。他的统治时期号称“共存”，其特点是：以承认“人民革命联盟”的合法状态为交换条件，从他们那里取得支持。

1962年6月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三个最主要的候选人是阿亚·德拉托雷、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和奥德里亚将军，贝朗德代表他的“人民行动党”。贝朗德和德拉托雷都得到略略超过五十万的选票，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人恰好领先。奥德里亚将军所得票略低于五十万。^①

前总统普拉多维护秘鲁最杰出的统治者的传统不遗余力，而当阿亚·德拉托雷有希望当选总统时，尽管（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观点同普拉多简直无甚差异，军方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干涉。1962年7月18日，一个军人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宣布新的选举将在次年6月进行。委员会的首脑尼古拉斯·林德莱·洛佩斯将军是一

^① 但指出以下一点是有兴味的，即奥德里亚在利马和利马的港口卡亚俄获得的票数都比其他候选人为多。三个左翼候选人在两地间只获得10%的票数。

位“道德重整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美国那时仍在肯尼迪总统所谓开明的全盛时期，它迅即中断了同秘鲁的外交关系，并停止了军事援助。但是，不用说这种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军人委员会许诺下一次选举将自由举行，他们不会再去干涉。美国实业利益集团接受了这一新政权。^①美国政府对秘鲁军人的关于什么叫做开明主义的领会深为感动，于8月17日恢复了外交关系。军事援助也于10月重新开始。

在下一年6月的选举中，贝朗德设法获得了比阿亚·德拉托雷多出近十万张的选票，这是不足惊异的。^②军方信守了他们的诺言，让贝朗德当了总统。

秘鲁社会的性质及其政治制度曾经被很多的秘鲁和外国学者周详地研究过。^③对此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也不准备在此试图作为争论的评判人。我不管秘鲁社会在事实上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我所关心的是游击队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想法。^④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于1964年2月7日在圣马丁广场上作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对秘鲁的情况作了有趣的分析，同时也解释了秘鲁的革命者为什么摒弃选举的道路，为什么他们感到秘鲁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⑤

他讲了寡头政治执政者的统治历史，选举的舞弊以及军人的

① 欧文斯：《秘鲁》，第185页。

② 见理查特·W·帕奇：《秘鲁1963年的选举》，《美国大学实地研究人员报告》，1963年7月。

③ 特别要参看弗朗索瓦·博里卡德：《现代秘鲁的权力和社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还有阿尼瓦尔·基哈诺：《现代秘鲁社会的性质、形势和倾向》，《思想评论》（哈瓦那），第16号，1968年5月。

④ 《每月评论》的编辑们特别责备德拉普恩特，因为他把秘鲁描绘成部分“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我受的教育使我相信欧洲的封建制度，除了十分不纯的形式而外，只延续了两个世代，因此很难认为在拉丁美洲还残存着封建制度。显然那里有租佃制度使人回想起封建主义，但是拉丁美洲从根本讲，与其说是封建主义的受害者，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封建主义只是一个方便的贬词，用以形容那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情况。

⑤ 见附录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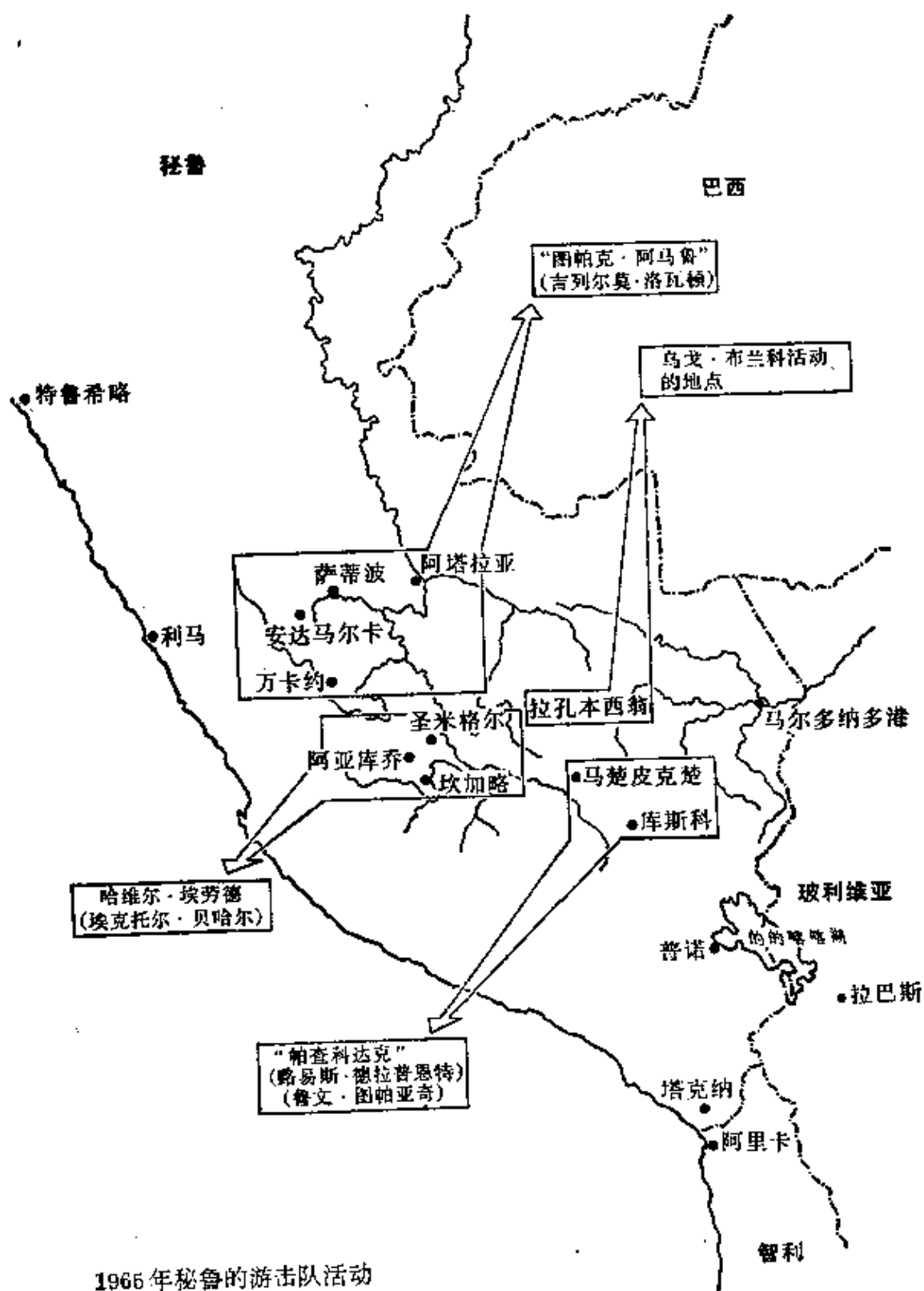


图 5

(按原图译制)

干涉，并且正是针对着这种背景发生了虽然为时短暂但却是重大的革命运动，首先是由乌戈·布兰科所领导的发生于 1959—1963 年间的运动，接着是德拉普恩特本人于 1965 年所领导的运动。虽然，它们主要都发生在拉孔本西翁山谷地区，可惜它们没有同时发生。因为乌戈·布兰科的运动，主要是由迫切需要游击队支持的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组成的，而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运动大部分由于缺少有组织的农民的支持而失败。乌戈·布兰科的农民夺取了土地，但没有枪杆子去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德拉普恩特的武装得很好的游击队，则没有农民可保卫。

道理是简单的。政府在 1963—1965 几年中，即在布兰科失败和德拉普恩特继起之间，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令。土地改革虽然绝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却使他对未来抱有幻想，从而阻抑了他的革命热情。^①更为重要的是军队袭击了乌戈·布兰科取得胜利的地区，血腥的镇压使得珍惜其家属生命的农民，不再指望一位革命的大胡子作他的救星。

^① 土地改革法第 1444 号法令，特别适用于拉孔本西翁地区，在这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这一法令于 1963 年 3 月 28 日由军人委员会制定。

二 乌戈·布兰科和拉孔本西翁山谷

“乌戈·布兰科是秘鲁游击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战斗得顽强，但是镇压是强烈的。我不知道他的策略是怎样的，但他的失败并不表示这一运动的终止。这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失败，而这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当我们从《格拉玛号》上准备登陆时有很大危险，即我们全体有可能被杀害，菲德尔说道：‘我们作出的榜样比之我们自己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这是同一回事。乌戈·布兰科业已作出了一个榜样，一个良好的榜样，他尽其所能作了斗争。但是他遭到了一次失败，人民的力量遭到了一次失败。这不过是一个即将过去的阶段。”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1963年7月于阿尔及尔

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大约于1933年生于库斯科。^①他是

^① 下面的记述直接取自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和农民起义》，胡安·梅希亚·巴卡出版社，利马，1967年。

一位律师的儿子，虽然他的母亲是农民出身。他曾在库斯科的国家科学学院学习，但除了因驱逐院长而被迫参加一次学生罢课行动外，他很少显露他的革命倾向。库斯科本身是一个激进的城市。它使人怀念着在十八世纪晚期掀起反抗西班牙人的伟大的图帕克·阿马鲁。当正统的共产党仍然是国内一支革命力量的时期，最近几年来它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该党给这个城市以及它周围的郊区以激进的影响。

乌戈·布兰科离开库斯科的学院以后，旅行到阿根廷，进入拉普拉塔大学的农学院。虽然布兰科的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资助他，他却宁愿靠劳动所得来完成大学学业。他很快在左翼政界活跃起来，但他不参加正统的共产党而是选择了参加托派。那个时候，阿根廷共产党正在强烈反对庇隆；而庇隆政府尽管有它的错误，还是热烈反帝反美的，因此获得相当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

布兰科在一个名为“工人的话”的托派组织中很活跃，这个组织由拉普拉塔大学教授乌戈·布雷斯萨诺主持。布雷斯萨诺化名为纳乌埃尔·莫雷诺进行活动，后来与秘鲁的革命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

1956年末，布兰科从阿根廷返回秘鲁，他在那里立即加入了“革命工人党”，这是一个托派的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它的见解和“工人的话”是相同的。曾经写过乌戈·布兰科的唯一传记的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说：布兰科在当时早已在思考为了在农民中间着手工会运动而回到库斯科去，这个工会运动将成为未来革命活动的基地。^①但事实上，他在1958年前并未回到库斯科定居。正象在阿根廷时一样，他力图与他急于想要帮助的那个阶级同心同德。他开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象他们一样穿着，分担他们的工作，讲他们的语言——克丘亚语。^②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76页。

② 我听别人说，他讲得并不好。

乌戈·布兰科主要是一个农民组织者——其中之一。因为库斯科是一个共产党的城市，它的周围区域曾经受到共产党组织者的宣传影响。但这并不是多余之事。把农民组织进工会的工作是无止境的。这些组织者和未成熟的革命者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本身存在着分歧。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要算共产党和托派之间的分歧最深刻了。因此，乌戈·布兰科除了同地主作斗争而外，还不断同当地共产党所固守的利益进行争论。

秘鲁、危地马拉和巴西是托派分子一直最为活跃的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但是，秘鲁却是托派分子找到了一位土著领袖的唯一国家，这领袖本人是这种信仰的坚决的传播者。本书所论述的游击战运动都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现在看到在安第斯山一万呎高处经常活动的一位农民领袖在赞扬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优点，这稍为可以打破一些单调的气氛。下面的文件是在1962年末写的，当时乌戈·布兰科的影响业已低落。这是他写给拉孔本西翁山谷的同志们的一封信，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这封信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识形态中的托派倾向：

拉孔本西翁山谷和拉雷斯的同志们：

我以愉快的心情给你们写信，这种愉快是战士在身经百战以后看到战争的胜利临近时的感受。我也深感满意，因为你们看到我们已经奉行和继续在奉行的路线，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现在，我觉得更为深切感激地缅怀莱昂·托洛茨基同志，是他在1905年深谋远虑地指示了这一方法。同志们，追随着他的“不断革命”的方法，我们正在到达胜利。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把托洛茨基—列宁主义信条的一些普遍原则记在心里，是紧要的。

工人阶级将通过暴力而不是合法形式取得对他们权利的

承认。

同志们，我们正在体验这点：我们正在通过怠工、罢工、集会、违反资产阶级法律来瓜分土地以及没收财产（这也是违反资产阶级法律的）等方法而走向胜利。

机会主义的方法，即“波克科丘温拉克”^①的方法，业已证明是不行的。我们已经看到法庭申诉案例、送备忘录、派代表到政府去请愿、发电报、参加选举、推选候选人等方法都不中用。

考虑到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等待资产阶级合法政府的恩赐来取得我们的胜利。相反，我们在我们地区中业已打碎了那个政府的权力，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工农政府，有它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办事方法和自己的法律。那就是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不是等待资产阶级政权内的改革或折中措施。

只有一个工农政府才能解决国家迫切的问题。

拉孔本西翁和拉雷斯的群众是农民，而作为他们的领袖的我们，具有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教义。

当农民开始在他们合作社的田地或工厂工作时，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

我们工农一定要在全秘鲁取得政权，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正如我们在一些地区早已做的那样），目的在于解决国家的主要问题：土地改革（或宁可称之为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和工业化。只有一个工农政府，而不是“人民民主”或“民主联合”，也不是从资产阶级选举形成的其他七拼八凑的政府，通过在革命中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取得政权，才能实现这些任务。

运动的胜利有赖于它的壮大蔓延。

① 看来这是印第安语“机会主义”一词的音译。——译者

工人在一个地方取得的任何进展、任何胜利；任何一种战斗，无论是一次罢工、一次怠工、土地的占有、财产的没收等等，在它未深化以前应该扩展。

俄国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它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乔皮马约的土地革命在它没有伸展到那整个山谷以前是不能前进的，而土地革命未在全国实现以前这个山谷也是不能前进的。

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学说，其孤立主义的和反革命的精神是危险的，自杀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要同这种理论上的邪说作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他遭到暗杀的原因。我们必须更加关心运动的扩大，而不是运动的加深。

让我们没收在这一山谷中的所有的庄园，正如我们在“帕尔太班巴”所做的那样。如果地主加入工会并遵守它的决定的话，将分配给他们合适的房屋，并将应作的改善通知他们。

秘鲁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国家，并带有一些封建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革命必须是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

秘鲁不是一个封建的国家，它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原料的落后生产者，帝国主义国家以他们高度发达的工业把这些原料转制成产品，并以特别昂贵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的国家不是封建性的，因为它既不只为内部消费而生产，也不是自给自足的；我重复一遍，它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从上面所述，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就封建和前资本主义方面而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分配土地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措施。就资本主义方面而论，即从工厂、矿山、对外贸易、工业化的大农场等而言，它是社会

主义的革命。此外,即使在我们地区的落后的地产中,我们的革命也正在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地主的货物、收获、牲畜等都在转变为工会的社会主义财产。

我们革命的这个方面,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学说的最为明显的又一次肯定。

秘鲁革命的进程正在标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学说的完结,这一学说错误地认为:我们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他们称之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当地的资本家,将会和我们联合起来参与我们反抗地主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战斗。我们正在证明所有这些都是谎话,又一个机会主义的捏造。

不得土地毋宁死!

我们必胜! ①

这封信是在乌戈·布兰科已经开始感到共产党人对他攻击的全部压力时写的。在四年以前,即1958年,当他初去拉孔本西翁时,事情曾经是比较顺手的。

一位佃农让给了他位于这一山谷中的乔皮马约区的自己租用的一块土地的一部分。② 乌戈·布兰科于是以一个转租农的身分,作为一位工会组织者而开始生活。

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写道:

于是他开始进行工会运动去组织农民,唤起阶级意识,除了卫生学问题之外,他还教导他们关于工会主义的知识,澄清本地区各种问题,把他们自己各种权利的常识谆谆教诲他们,

① 从乔皮马约来的信,时间约在1962年10月,曾引用于玛丽亚·阿·马尔皮卡:《革命传记》,社会实验出版社,利马,1967年8月,第468—471页。

② 在“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关于秘鲁的报告中,拉孔本西翁内的农民状况部分写得较好,见第206—209页。

组织文化工作(包括创办学校)和卫生工作,还有筹建医疗站。简言之,为农民的利益而作了巨大努力。^①

在他的教育活动中,他甚至终于禁止了古柯叶和酒精饮料的广泛应用。

当他初到拉孔本西翁山谷时,那里只有六个工会。它们几乎完全把力量花在合法的事务上了,据阿道弗·吉利的说法,它们对于维持库斯科左派律师的威望比对农民本身更为有用。^②可是乌戈·布兰科在三年之中,单在拉孔本西翁一地,曾建成了一百四十八个工会。^③他本人是他的工会(即乔皮马约的)出席拉孔本西翁和拉雷斯的地方农民联合会的代表。后来他是后一机构派往库斯科省农民联合会的代表,在那里他作为负责土地改革问题的书记而工作。

这种活动当然是直接按照托派理论所要求的那种路线来执行的。在某一种意义上说,乌戈·布兰科只不过是另一个工会组织者,虽然他特别适合这项工作。他写道:

农民在他们为土地改革而斗争中所得到的新工具是农民工会……这将是秘鲁人民未来政府的基础,是革命政府的基础。^④

他的第一个工会刚组织起来,接着他就着手组织罢工——主要为了改善待遇和改善工作条件。因此,早在1959年,在帕查·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75页。

② 阿道弗·吉利:《秘鲁游击队的工会》,《前进》周刊,1963年8月。必须再次提醒读者吉利是同情托派的,这使他敌视正统共产党的活动。

③ 小韦斯利·克雷格在他的《拉孔本西翁的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到那里有“六十个以上”。他也估计这个山谷中有一万到一万一千个小佃农。

④ 乌戈·布兰科:《我们革命的道路》,(利马),1964年。

格兰德、乔卡马约和乔皮马约的庄园就发生罢工事件。这些罢工立即被称为非法的，据当局宣布：因为这些工会是非法的，所以罢工必然也是非法的。

比利亚努埃瓦说明这种情况如下：

佃农的罢工意味着什么？这只不过是停止工作。那就是对所有主拒付地租，而这种地租是用劳动去支付的。老板在罢工中失去了他应得的无偿劳动，在收获季节这种损失会是极其重大的。佃农则得到了额外的利益。因为他不必为所有主而工作，他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处理他自己的一块土地。虽然他有自己的土地要种，这些罢工是成功的。老板被迫让步，农民获胜。结果是工会如同野火一样传遍这一山谷。^①

除了乌戈·布兰科所作的努力而外，其他托派组织者，革命工人党的分子也在其他地方活动，特别是在普诺和阿雷基帕。

他们对于把农民组织进工会的效果十分乐观，遂于1960年11月在阿雷基帕召开了一个革命工人党的大会，并规划出一个起义的纲领。起义的形式是游击战争。关于实施这个计划的决定得到全体一致通过。比利亚努埃瓦认为：许多代表未必能认识到他们投票的意义。

加以考虑的各种因素研究得可能非常肤浅而过于乐观，他们可能过高估计了某些主观条件。但是，表决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是事实。

也许每位代表的心底里认为他们所作出的结论纯属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它永远不会付之实施，^②因此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77页。

^② 同上，第79页。

批准这一“起义路线”并不花费多大的代价。

但无论如何，这个大会显然已经认识到革命工人党独自行动的弱点。他发出的建议之一是组成一个“革命阵线”，这个阵线将把秘鲁的左派环绕着单一的革命纲领而联合起来。这个大会也向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称为“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第四（托洛茨基的）国际要求出谋献策和提供援助。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知道了出现在秘鲁农民中间的活动后，早已于1960年8月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召开了它的领导人的一次集会来讨论这种形势。现在，应秘鲁“革命工人党”的呼吁，它于1961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开了一次会，秘鲁、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来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革命工人党”在阿雷基帕大会上规划出来的秘鲁的提纲被接受了，并同意向秘鲁资送金钱和受过训练的干部。同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尽可能促进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巴西、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起义活动，以加速本大陆的革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指望：在巴西弗朗西斯科·胡利亚奥领导的农民组织和危地马拉容·索萨领导的农民组织中，开展与秘鲁相似的起义。

就提供干部而论，“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迅速地实现它的诺言。1961年6月阿根廷托派分子阿图罗·“切”·佩雷伊雷抵达利马，同年10月R·克罗斯和一位西班牙人乔斯·马托雷尔跟着到来，后者在大战期间在“法兰西抵抗”组织中工作过。这三个人都是“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阿根廷支部的成员，并有过长期的革命经历。

他们工作得迅速而有效率。他们保证《革命工人党报》定期出版。他们组成新的党小组，并和各种较小的组织建立联系。《革命工人党报》传播了阿雷基帕会议的思想，就是需要形成“秘鲁革命

单一的党”，这个党将把所有的革命的左派团体环绕着单一的纲领联合起来。

6月间在库斯科建立了一个“革命阵线”，而在12月间形成了“左派革命阵线”，它是由“革命工人党”的一个工会和若干曾经集结在“左派革命联合派”内的无党派团体组成的。

里卡多·莱特斯·科尔梅纳雷斯曾经说明了左派革命阵线面临的诸问题：

“左派革命阵线”在利马已经聚集起一支有相当水平的理论队伍，并已建立起一支大约有六十个成员的军事组织，虽然它只是在城市里的。国际托派组织立足于多少是夸大其词的正统的国际主义之上，把它最精干的人送到了秘鲁。外国托派团体出现于利马，并且积极地工作，小心谨慎地执行他们党的指示。时或有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来访，这些领导人经常住在国外。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国家的崭新的事，并且对秘鲁左翼组织长期以来所习惯的政治落后环境来说，立即显得过份了。整个政治机构同较强的军事机构奇特地与错误地混杂在一起。然而，它们两者全没有真正强烈地联系这个革命轴心的另一端，即农民的一端，库斯科和拉孔本西翁的领导者们……①

马托雷尔一到利马，就派佩雷伊雷去库斯科和乌戈·布兰科一道工作。佩雷伊雷着手准备和组织游击队，而布兰科则把现有的农民运动转变成更为坚定和更为团结的力量。

① 里卡多·莱特斯·科尔梅纳雷斯：《秘鲁：革命、起义、游击队》，《轻骑》（巴黎），《马尔皮卡》一书，第476—478页中曾加引用。同一文章署名“阿梅里科·波马鲁纳”发表于《思想评论》第一期。它首次发表在《伊比利亚半岛纪行》，第6期，1966年4—5月。

不久，乌戈·布兰科的老政治顾问，“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首领乌戈·布雷斯萨诺本人从阿根廷到达秘鲁。他马上和各左派组织的领导人商讨。然而，立即显见那里存在着下列两派之间严重不和的种子：活动在库斯科外面的一派所考虑的是组织一个游击运动；而在利马的布雷斯萨诺一派，除了支持由农民夺取土地和组织农民武装去保护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而外，无意支持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第一次意见不合的表现形式，是库斯科派拒绝考虑在利马同其他组织者会见。他们感到库斯科是显然合适的会见地点。后来说服了库斯科人值得到利马去跑一趟，此事总算摆平了，佩雷伊雷终于被派去参加1962年在利马召开的会议。

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是筹款问题，这的确是整个事业的基本问题。1961年12月人民银行的一个支行被“没收”，但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总数是十万零五千索尔（约合四千美元），其中近半数是新票子，这些票子由于警察知道它们的号码而不能使用。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原来说要提供八百万或九百万阿根廷比索（约合十二万美元）的津贴，但是比利亚努埃瓦怀疑是否有人相信真的会提供这样大的数目。^①可是，乌戈·布雷斯萨诺到达利马后不久曾宣布：要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结束他的组织支部在阿根廷的帐户，并且把五十万索尔（约合二万美元）一笔资金作为贷款交给秘鲁支部。布雷斯萨诺安排在1962年2月交出这笔钱的一半，余下的部分将不晚于3月15日转来。

乌戈·布兰科对于金钱的需要愈来愈迫切，因为有两个计划中的会议要举行，其一是拉孔本西翁和拉雷斯的农民会议，另一个是库斯科省的农民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中，“左派革命阵线”和共产党之间势必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共产党早已计划把乌戈·布兰科开除出“农民联合会”。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93页。

但是到了规定的时刻，布雷斯萨诺的钱并没有到来。1962年3月11日阿图罗·佩雷伊雷从库斯科被派往利马去向“左派革命阵线全国理事会”领取必要的资金。“全国理事会”知道布雷斯萨诺无意实践他的诺言，早已着手计划第二次“没收”——这次是对准在米拉弗洛雷斯的信贷银行的分行，米拉弗洛雷斯是利马最豪华的郊区之一。但是此举的计划尚未准备好，而同时库斯科区的组织者的心情日益愤激，预备孤注一掷。3月末，“左派革命阵线”在库斯科的“省理事会”向利马递送了最后通牒，要求在4月5日前在库斯科召开一次全国会议。如果此事遭到拒绝，库斯科的领导人扬言要接管“全国理事会”。

当上述最后通牒到达利马时，正遇上布雷斯萨诺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他立即谴责库斯科组织者缺乏纪律，并且命令撤除了包括乌戈·布兰科在内的一些人的职位。

4月1日，“左派革命阵线”在利马的城市小组终于取得了他们计划用于袭击信贷银行的卡车，并于4月12日把这一行动计划付诸实施。此事完全成功，攫取了总数近三百万索尔(约合十二万美元)的巨款。

于是决定把五十万索尔立即交给库斯科。三十万索尔交予布雷斯萨诺，而其余的钱留给在利马的一位秘鲁人去购买武器。

除了金钱而外，包括佩雷伊雷、马托雷尔和其他一些人在内的几个重要领导人也预定到库斯科去。问题是如何安全地把他们连同这笔钱转移到那里去。在袭击米拉弗洛雷斯的银行以后，所有从利马外出的道路已被严密地监视起来，并且当局对于在库斯科区谣传着的起义是如此的恐慌，以致要进入库斯科而不受到搜查，在事实上已是不可能的事。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乃是把他们分批(每批一个或二个人)按不同的路线送走，但是布雷斯萨诺却另作决定，要他们暗藏在一辆货车中一起出走。

库斯科的组织者坚决反对这样疯狂的计划，并且建议这辆货

车至少要径向拉孔本西翁山谷开去，而不去冒险进入库斯科。他们并且非常反对钱随同人一起带去的想法。但在利马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领导人的主张，却同样坚决。人和钱将要在—辆货车中转运到库斯科。比利亚努埃瓦苛刻地评论道：

看来，“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领导人真好象不愿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偏要使战士和领导人的神经受到—次考验，宁愿不必要地玩火，从而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境地，更坏的是宁愿危害起义本身的可能性。^①

从接着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些话毫不过份。1962年4月24日晚间，—辆雇用的货车（内有一隐蔽的分隔小室），藏着九个人从利马开出。他们经过三天和十五个警察哨所以后，到达离库斯科三十公里内的利马塔姆巴。

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几位从库斯科来的“省指挥部”的成员。这些人提议改变计划。这辆货车不是直驱入城，而要在几公里以外停车，人员必须按分开的路线上路，并在不同的时间出动。但是，从利马来的小组领导人拒不接受这个建议，货车继续它的征途，于凌晨二时抵达库斯科。

隐蔽在车里面的九人中的四个人还来不及下车，—队巡逻警察就突然出现了。佩雷伊雷开了火，他击伤了一个警察，但他和另—个人立即被捕。其他的人设法逃避了，但警察在佩雷伊雷身上搜到了总数达四十三万八千索尔（近—万七千六百美元）的钱。

同—天晚上，即4月28日，在这辆货车被俘获后几个小时，从利马来的幸存的领导人同从库斯科来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讨论事情将如何进行。马托雷尔接代了佩雷伊雷，因为乌戈·布兰科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120页。

和他的两位主要助手早些日子已被布雷斯萨诺降了级，必须从利马派另一个人去接管“左派革命阵线”在库斯科的“省指挥部”。

在这辆卡车离开利马前的夜晚，布雷斯萨诺在一篇动人的告别讲话中说道：他将在次日飞往库斯科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全国会议。可是在第二天，布雷斯萨诺却搭乘飞机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5月4日那一天，埃尔南·博希奥向公安部门自首了。他不仅是这笔钱的主要接收者，而且是“左派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秘鲁代表之一。

乌戈·布兰科与国际托派运动的联系就这样终止了。^①事实证明这是灾难性的，但是正如容·索萨在危地马拉一样，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给他以足够的支持，使得他很少选择余地。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本书上面的记叙是从他那里摘录的），或许把布雷斯萨诺描绘得过分卑鄙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悲痛的插曲。里卡多·莱特斯曾简短地总结了所发生的事：

这个组织在利马已经开始活动。突击小队的行动成功地没收了两家银行，为革命斗争提供了资金。这个组织的多数成员在这些战斗之后本来要到库斯科去接触在乡间工作的组织。他们还要进而发展这样的战术，即把农民取得土地的“动员”，同环绕着一个领导人和一些基本口号而专门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工会组织协调起来，并且最终还要同即将建立的游击队结合起来……。

在利马，政治领导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而政治领导人和军事单位之间存在着甚至更严重的分歧。加之，所有这些人 and 国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破裂点。其中两个因素显

^① 并可参看贡萨洛·阿尼·卡斯蒂略：《游击队秘史》，《马斯·阿利亚》出版社，利马，1967年。此书载有审问“左派革命阵线”成员抢劫银行之事。

得特别重要：一个因素是使用什么和分配什么以及作何用途和保存的问题，这是引起和国际领导人之间麻烦的主要点。另一个因素是指挥系统的问题，以及对于应采取的战略路线完全缺乏知识的问题。这是造成政治局和军事组织之间困难的原由。当付诸行动的时间已经逼近时，讨论到了究竟是否要有一个政治领导，如果需要，它是否应该高于军事领导。^①

乌戈·布兰科按照他自己的设想，只能继续创建农民工会，而很少有其他事可干。但是他随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不得土地毋宁死”^②的口号下，鼓动农民奋起夺取土地。他以拉孔本西翁“农民联合会”土改书记的职位发布了下列法令：

1. 每一个工会的大会将要任命从其自身内部产生的“土地改革委员会”。
2. 佃农和转租农自动地转变为他们耕作的土地的所有者。
3. 未开垦的土地分成小块加以分配，先从最贫穷的农民开始。
4. 只要种植园所有主的态度并非一直是凶暴成性的，那么人们替他耕种的那些种植园所在的土地仍将保留为他所有。如果他的态度是凶暴成性的，这种耕地、还有可能涉及庄园房子，将归工会集体所有，作为学校或其他之用。
5. 为老板们服务的官方当局不得干预，因为唯一正确了解土地实际的人是农民自己。

乌戈·布兰科被托派抛弃，还遭到全拉丁美洲共产党方面的持续攻击，使他变得日益孤立。要记住拉孔本西翁山谷本身的孤立状态——他仅以一条窄轨和外部世界沟通，主要用于输送从库斯科去马楚皮克楚的旅客的单线铁路——因此，要把他的革命思想传布出去的希望是很小的。他帮助组织起来的夺取土地运动，被1962年临近年终开进山谷的警察和军队很快地野蛮镇压下去。在此同时，乌戈·布兰科本人遇到了更为严重的麻烦。

这个山谷中一个有钱有势的地主，强奸了一位名叫蒂武西奥·博拉尼奥斯的农民的妻子及其一个小女儿。然后，这个地主象往常一样控告农民在威胁他，并且要他到民卫所去解释他的行为。当一名警官来到，告诉这位不幸的农民，必须向民卫所报告时，博拉尼奥斯回答说：他决不肯这样做。这个警官于是派两名警察去拘捕这个抗拒的农民。可是，这两个警察在途中碰见了这个地主和其他几个人，当他们进入博拉尼奥斯茅屋的射击距离内的时候，他们都醉了。于是，他们派一个小孩前去告诉博拉尼奥斯，要他立即到民卫所去。这个孩子回来时告诉说：博拉尼奥斯已经答应在第二天来警察所。随后这个酒醉和激怒了的地主下了马，抽出他的左轮枪，击伤了这个小孩的左臂。

当孩子的母亲最后找到这孩子时，她立即向奥卡亚拉农民工会的总书记蒂武西奥·博拉尼奥斯控诉。^①博拉尼奥斯立即要出发去基利亚巴姆博镇，想在法官面前揭发这桩罪行，但是另一位农民向他建议：把它的申诉先和乌戈·布兰科讨论。

布兰科召开了这个工会的会议，听取了博拉尼奥斯的诉说，然后组织一个小组于第二天同他一起去普西乌拉镇。乌戈·布兰科虽然知道这个地主和他的手下人是何等凶暴，但他毕竟是一位革命者，就计划要从普西乌拉警察所取得武器。

1962年11月13日下午5时，布兰科把自己的小组留在警察

^① 原文如此。——译者

所的外面,而只身进去。他找到了一个警卫,即昨天曾被派往拘捕博拉尼奥斯的兵士之一,并且他向他解释,由于地主的手下人是武装的,他的人也需武装起来。布兰科于是要求这个警察交出警察所中的所有武器,这个人拒绝了,接着布兰科用他的左轮枪威胁他。这个警察试图开火,但布兰科先开了火。在一次对射以后,这个警察受伤倒下。后来,他死去了。

但是,这次对哨所的袭击,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布兰科和他的人只设法夺得三枝步枪、一支左轮枪和一些弹药及装备。而且他们已不再是来调查这个地主罪行的小组,反而变成杀死一名警察的亡命者。

从此以后,乌戈·布兰科就逃亡了。农民们在严厉镇压之下常常转而反对他。共产党人也对他作反宣传。里卡多·莱特斯评论道:

这一事态的发展,非但没有引导、加强和巩固农民群众(这些群众曾跟随着他经历了骚动和罢工的整个过程),反而主要由于警察的镇压而使得他们比从前更退缩了。布兰科面对此事,感到他不仅被他自己的组织,即“左派革命阵线”所抛弃(这个组织在利马、然后在库斯科都被警察破坏了),而且现在也被农民所抛弃了。农民们由于没有政治的或理论的训练,也没有武装起义的真正经验,他们重新陷于绝望,实在不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乌戈·布兰科于1963年5月29日被捕。他被监禁,后来受审讯,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在卡亚俄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坐牢,从事写作,有时也接见来访的报人。

三 哈维尔·埃劳德在马尔多纳多港之死

就在乌戈·布兰科被捕的那一个月，即1963年5月，援助已在路途中了。一批年轻的秘鲁知识分子从古巴回国，计划用武装来援助他。这些人当中有一年轻的二十一岁的诗人哈维尔·埃劳德。他是秘鲁上层阶级的典型产儿，就读于英国人在利马开设的私立学校马克阿姆以及天主教大学。但是，他背叛他的教养，成为极其短命的革命者。或许由于他的贵族经历或者由于他有成为一位诗人的希望，他的死亡在秘鲁引起了一次大骚动。后来，当游击队于1965年再次兴起，有一条战线就命名为哈维尔·埃劳德。

秘鲁军方曾提出下列导致他的死亡的战斗的报告。^① 1963年5月2日那一天，有两只小船停泊在秘鲁国境线上玻利维亚一侧、靠近名为“特雷斯·巴兰卡斯”庄园的马努里佩河中。大约有四十个人上了岸。他们在那里和两个玻利维亚共产党人接触，即罗伯托·索里亚和阿维拉多·莫拉卡米·巴卡。莫拉卡米已和一个秘鲁人结婚，他负责带他们越过国境进入秘鲁。他于5月6日和大约十五个人一起出发，穿越丛林行走。他们先到一个名为圣玛丽亚的庄园，然后转向阿伊林加约克和本区最大的城镇马尔多纳多港。

5月14日那一天，一个马尔多纳多港的警官得知有一群可疑的人住在旅馆中。他们一共六个人，包括哈维尔·埃劳德在内，警察查看了他们的证件之后，就把他们带往当地的警察所。但刚一离开旅馆，他们随即动手对付监视他们的那三个警察。一个警察

^① 《秘鲁游击队及对它的镇压》，陆军部，利马，1966年，第29页。

被击毙。那六个游击队员设法逃脱，但他们不可能走得很远。当晚他们当中的三人被捕，第二天即5月15日，在拉卡丘埃拉地方发生一场交锋，哈维尔·埃劳德被击毙。逃脱的两个人隔不几天也被捕了，其中一人越过阿波森托的国境，在玻利维亚被捕。

一个比较同情的编年史家里卡多·莱特斯曾提供了不同的情节：

这个革命小组大约由三十五人组成，他们受过游击战训练和具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其中一些人曾是秘鲁左翼政党的成员，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些政党，其原因常常是与采取武装行动的需要有关……。

战略和战术上的计划是武装进入秘鲁，横越两百哩长的丛林（它位于国境和乌戈·布兰科所领导的农民正在战斗着的谷地之间），给予农民以他们显属需要的军事援助。这一小组将组成一个核心，它和这一区域中的农民采取联合动作，直至取得政权。小组的成员都有很大的毅力和勇气，他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少数人来自工人阶级、甚至农民家庭。几乎全部都是大学生……。

1963年5月15日事件的经过如下：这个小组的先锋同当地前来逮捕他们的警察之间在马尔多纳多港的街上发生了一次小冲突。接着发生的事是军队和持有搜捕武器的当地地主追捕革命者。这伙人已经警戒了好几天，因为当游击队在马尔多纳多港附近的一个丛林区出现时把革命者暴露了。追捕持续了好几天，年轻的得奖诗人、革命的战斗者哈维尔·埃劳德牺牲了，他是前卫人员之一……①

1963年写的（但直到1967年才公布的）一封给秘鲁报纸的

① 里卡多·莱特斯·科尔梅纳雷斯：《秘鲁：革命、起义、游击队》。

信,更为详细地表达了实际上所发生之事,但是它没有讲明这个小组在马尔多纳多港干过什么和计划干什么。这是从这个命运不济的“游击中心”脱险的人们写的:

穿越了四百哩的丛林后,我们于5月14日上半夜到达马尔多纳多港,疲倦、饥饿和生了病。我们已经在三天前越过了和玻利维亚交界的国境,我们梦想从这个城市(它是秘鲁领土的一部分)开始,我们能够合法地旅行回家了;这是我们横遭拒绝的一个权利。

我们完全记得,当我们跨进马尔多纳多港时,我们听得到贝朗德的选举演说。扩音器发出诸如“秘鲁是秘鲁人的,革新和革命”一类的声音,洋溢空中。

可是,当我们正在一个旅馆登记时,我们被一群警察和几个秘鲁刑事调查警察无礼地打断了,他们要检查我们的证件。尽管这些证件都合乎规定,我们被押送到警察所去。当我们对这种专横和不公平行动提出抗议时,他们说我们可能是走私者。于是我们要求他们搜查我们的随身行李,他们拒绝这样做,横蛮地坚持要逮捕我们。在这一短短的路程中,我们继续抗议,因为这样的处理是没有理由的。当还有半条街要走时,我们拒绝跟着这个队走。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刚从古巴归来,古巴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们曾在那里学习,并且发现民族解放的创造性进步所能取得的成就。

由于秘鲁政府撕毁了宪法,不准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从那里自由地回来,我们试图秘密地回国。如果我们想以正常的方式回来,可能会被捕和放逐,因此我们在拉巴斯会合,并决定穿越马德雷·德迪奥斯的丛林进入国境。

当警察在查维斯旅馆门口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记得成

百的秘鲁人未经审讯而被监禁并关押在牢狱中；“埃尔·塞帕”的地狱似的居住地以及名气很大的“弗朗顿”。很自然，用不着任何事先商量，我们大家决定只有一逃了事。但是总有人先动手，而这就是警察自身。当我们提出抗议时，带队的军官威胁我们，并且发出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我们听不懂，却使得警察去摸取他们的手枪。

查明谁首先开火，这是不可能的了，虽然他们说是我们中的一个，但没有足够的细节。不论怎么说，当我们按不同方向跑开时，的确发生过互相射击。要找出谁发射的子弹杀死了桑·哈拉巡官或找出谁打伤了我们的同伴内尔松·罗德里格斯的脑壳底部（相差几分之一吋幸而未曾杀死他），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那天晚上我们的两个人被捕了（由于我们不熟识这个城市，我们陷入一道死胡同里），而其他的人被凶恶地追捕，同时杰出的秘鲁诗人哈维尔·埃劳德·佩雷斯被杀害了……

第二天的下午，埃劳德和埃利亚斯试图渡过马德雷·德迪奥斯河时遭到突然袭击。成百的人目击他们被屠杀的情况。把他们从河水中打捞起来的独木船主人的作证表明：警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用步枪和机枪开了火。我们请哈维尔的父亲豪尔赫·埃劳德博士以感动人心的言语告诉我们这一经历吧：

……“我的儿子在马德雷·德迪奥斯河的中央飘流，没有桨，不需要任何射击就能捕捉到他，尤其是他的同伴曾扯起过一面白旗。尽管如此，警察和他们煽动起来的平民，向着他们平射了一个半小时，甚至使用了打猎用的子弹。当我儿子的同伴呼喊：‘停止射击’时（据居民告诉我，他们靠近开枪的河岸），一个队长喊叫：‘开火，我们必须干掉他们。’一位中尉（他比较人道，也比较尊重禁止向一个没有武装和受了伤的

敌人开火的战争法规),制止了这次射击,但是太晚了。一颗爆炸的子弹在我的不幸儿子的腹中造成了一个大洞,他的身体还被许多子弹所击中。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儿子的肉体生命,他以他的二十一岁的青春和他的幻想,曾经试图着手结束邪恶,他说过要从我们国家消除掉这些邪恶……。”^①

哈维尔·埃劳德是“秘鲁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者,获奖的一本书的书名即《河流》,出奇地和他的戏剧性的死亡发生联系,他早是国际上公认的拉丁美洲第一流的年轻诗人之一。他的一首诗刊载在法国出版的世界诗选中。

罗伯托·巴斯克斯与埃劳德一起,也被警察杀害了,他是一位贫农,他坐在独木舟中,这只独木舟在射击开始前接近了埃劳斯和埃利亚斯。巴斯克斯受到突然袭击,他所能做的只是跳出船外,吊住船尾,因为他不会游泳,他向他们呼喊不要伤害他。从岸上发射来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脑壳,使他永远缄默了。

追捕的凶猛,从首都派出来的巨大增援,以及当他们查问我们关于“乌戈·布兰科”和他们认为携带着冲锋枪来的另外四十个我们的假想朋友时所给予我们的“难忘”的质问,表明了警察采取行动是出于害怕;这种害怕同六个筋疲力尽的学生所能造成的实际危险是不相称的,他们所带的武器只是最远射程为五十码的手枪,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地通过这个区域。

原小组里的那些尚未能远远穿越到马尔多纳多港的人在无线电中听到了冲突的消息。他们根据“事要三思而后行的原则”,就撤回玻利维亚,并度过了一段焦虑的辰光,设法避免落入玻利维亚警察之手。他们有两年不在公众面前出现,虽然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组织了“五月十五日运动”,来纪念马尔多纳多港的冲突。这个小组由

^① 罗格尔·梅尔卡多:《秘鲁游击队》,第55—60页。

埃克托尔·贝哈尔领导，开始在阿亚库乔省的万塔地方的农民中工作。以后，它成为民族解放军的核心。

稍后，在1967年切·格瓦拉死后，玻利维亚亲华共产党举出了马尔多纳多港事件是秘鲁亲苏共产党叛卖的又一例子。

马尔多纳多港是秘鲁靠近玻利维亚边境的一个市镇，是蒙赫修正主义分子^①第一次叛卖的地方。秘鲁游击队按照你的指示，^②停留在玻利维亚受蒙赫和它的集团的保护和指导。由蒙赫兄弟两人亲自向玻利维亚的圣罗曼^③所领导的政治警察告发了这些游击队的到达。蒙赫和圣罗曼有联系，业已完全证实。秘鲁政府察觉到了游击队以及他们正在进入秘鲁领土的事实，结果是他们中的几个人在越过国境线后立即遭到杀害。革命诗人哈维尔·埃劳德的坟墓是修正主义者叛卖的一个见证。那些设法返回玻利维亚境内的游击队员成为避难者而得到解放，他们到玻利维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们^④的家里居住，这样表明他们对蒙赫及其集团的谴责。有一些人目击马尔多纳多港所发生事件，他们能就以下两点确立历史的真理：谁把他们交给修正主义分子之手？修正主义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⑤

有关发生于马尔多纳多港事件的确切的经过，在未来一些日子里将仍是暧昧不明的。埃克托尔·贝哈尔在他的有关1964年秘鲁游击队一书中写道：还有一系列事件的解释现在尚非其时。^⑥

① 马里奥·蒙赫，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③ 根据安东尼奥·阿格达斯的说法，圣罗曼是帕斯·艾斯登索罗的政治警察的头目，曾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训练。

④ 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亲华分子。

⑤ 引于亲华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奥斯卡·萨莫拉1968年7月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刊于《时代报》(科恰班巴)，1968年7月14日。

⑥ 埃克托尔·贝哈尔：《秘鲁，1965年：关于游击战经验的笔记》，“美洲之家”，哈瓦那，1969年。

四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 “左派革命运动”

当乌戈·布兰科的威信显著地衰落的时期——约 1962 年年底——另一革命人物到达基利亚巴姆博和他会面。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虽然在那个时期没有达到乌戈·布兰科那样的名声，却因为他于 1959 年领导一个重要的激进主义者小组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分化出来，并组成“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而被政界赐予恶名。

德拉普恩特是秘鲁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他在最令人感动的拉丁美洲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中，同切·格瓦拉和卡米洛·托雷斯齐名。（乌戈·布兰科与其说是一位游击队领袖，毋宁说是一位农民组织者。）他生于 1926 年，是地主的儿子。他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领导人阿亚·德拉托雷的远亲，自幼就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支持者。在 1948 年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发动的军事政变期间，“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被宣布为非法，德拉普恩特和其他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一起被监禁，后被放逐。他在墨西哥住了几年，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和他自己地位相似、被禁止回国的其他拉丁美洲左派人物。

他于 1954 年秘密地进入秘鲁，其目的是为了准备一次反对奥德里亚独裁的起义。许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参与了这一谋划，虽然领导人没有参加。德拉普恩特和他的同伴在他们的计划成熟之前，就被出卖和遭到逮捕。他再一次身入囹圄。从他的小组计划中已知的少量材料看来，他们试图重复 1952 年玻利维亚革

命的经历,这次革命在一个和秘鲁相似的国家中,在极短时期内终于实现了巨大的转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准备发动一次游击战运动。

1956年选举前几个月,德拉普恩特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了。他回到特鲁希略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土地问题,1957年他完成了题为《秘鲁走向土地改革》的毕业论文(1966年末以《秘鲁土地改革》为题出版)。

那时,他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他赞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一般反共产主义的见解。他在他的论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摆在美洲和全世界面前的,一面是神圣的救世主所展示的公正、和平和慈爱的神圣道路,这条道路不幸到目前为止尚未进到社会——经济的高度,另一面存在着印第安农民彻底觉醒的迫切危险,它可能被国际共产主义用作宣传的讲坛。

德拉普恩特如同许多拉丁美洲的左派一样,他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主义,他和为加勒比海事件所激发的许多其他有希望的青年人在一起,因此,他于1959年7月,即古巴革命成功后仅仅六个月,就亲身到了古巴,这是毫不足怪的。

这次访问机会是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土地改革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全洲各地的许多代表。他们到来交换意见,并讨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按照古巴经验进行土地改革的可能性。德拉普恩特不久就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就古巴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展开热烈的辩论:“要紧的是判断我们是否在讨论一次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说,要区分这一次改革是资本主义者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德拉普恩特又说古巴的改革法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承认和尊重所有权”。他于是问多尔蒂科斯,古巴的土地改革法实际上是否如此。多尔蒂科斯回答道:

“就你的定义而论,我将要稍微改动一下词汇。这个土地改革法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资本主义是怎样一回事的话,我也不认为可以把它描述成资本主义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不许可大土地持有者存在……因此,我不能按字面接受那个定义。”

德拉普恩特争辩道:“我是根据现代土地问题思想作出这一区分的,这种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就是尊重所有权的一种改革……”

这时,古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位代表插了话:“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法律体系给你一种经验,用来规定一个土地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非资本主义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被说成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代表”的德拉普恩特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们秘鲁代表在这里代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主义’说话,这个党在拉丁美洲过去三十年中一直所号召的,正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目前正在实行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曾经尝试过,但是从未获得成果。我们是古巴伟大经验和这一土地改革的最忠诚的保卫者,而且我们将从中吸取许多要点,列入我们自己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中去;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词汇。”

他然后恢复了上述攻势,要求古巴代表下一定义,他还举出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中国土改的例子,并宣称:这些改革“我们都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革。”他还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所创议的这个资本主义,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曾经说过的,是具有正义和自由的资本主义。”

古巴代表再次发言,问这位秘鲁人:

“当他根据‘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正在实现的历史转变过程所决定的用语对它加以描述时，他是否不应当使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未曾用来描述自己的形容词。”他还说：“我们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这正是我们的一个实质性部分……”^①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领导人对于许多年轻党员对古巴革命所抱的热情是不赞同的。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内部，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拥有相当人数的一个集团早已对领导人的政策深感失望，这种政策的特点是以牺牲这个党在三十年革命斗争中曾经坚持的每一政治原则而去追求参与政权。因此在1959年10月当“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第四次大会召开之际，德拉普恩特和其他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这个动议既批评了曼努埃尔·普拉多政府，也批评了支持那个政府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领导人。结果是他们被停止党籍，9月12日他们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内组成一个委员会，名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保卫原则和内部民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提醒党注意党应该要坚持的原则。

这个团体其后成为“起义军委员会”，一年以后，在1960年11月终于和母党切断联系，其名称简化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

同一月，“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产生了它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文件，即“契克拉约宣言”。这一文件主要是埃克托尔·科尔德罗的作品，他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过去的成员，远在1959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已经离开这个党，后来在阿根廷学习马克思主义。文件主要篇幅是对秘鲁国内形势的分析，它比“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本身多年来发表的东西远为激进。

^① “第一次全国土地改革座谈会”，哈瓦那，古巴，引于马里奥·马尔皮卡：《革命传记》，第501页—504页。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的大部分政治工作在于倡导一个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1961年11月，即他们从原“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独立出来一周年，“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土地改革法草案。这一法律草案以油印形式传阅不久以后，它终于在1963年末在卡洛斯·马尔皮卡的《反大庄园的殊死战争》一书中印了出来。这本书的内封面上，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在《“左派革命运动”的土地改革：向寡头政治挑战》的标题之下，写了下列字句：

为了完成“八年”和“共处时期”的暴徒们杀人流血的历史委托，“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第一次全国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秘鲁土地状况概观，作为领导在乡下的农民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1960年和1961年期间，几个委员会共同整理出一份土地改革法，由下院议员卡洛斯·马尔皮卡·席尔瓦·桑蒂斯班于1961年11月6日提交国会。

各个委员会由卡洛斯·德拉普恩特同志、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博士、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加斯科博士、马克西莫·贝莱斯莫罗、路易斯·伊维里科·马斯、路易斯·佩雷斯·马尔皮卡博士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农民、工人和学生所组成，他们以各种方式致力于起草和修改这一个秘鲁人民斗争的文件。

值得提出的是，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革命烈士之一、哥伦比亚的“工人、学生、农民运动”的创始人、安东尼奥·拉罗塔^①参加了本草案的讨论，古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胡安·瓜尔维托·卡瓦列罗博士和费尔南多·阿古亚尔以及阿根廷同志豪尔赫·阿马尔和奥尔加·马丁也参加了。

^① 参看哥伦比亚部分，本书第233页。

我们谈到的法律草案，并不包含秘鲁土地问题的一种社会主义的阐述。它毋宁是在所规定的某些情况下的一个斗争工具，其主要目的在于开始农村改造的过程。

把这种研究转变成一项法律草案，并把它放在国会面前的用意是表示：我们的运动，即使只有两年的历史，已经能够对于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决办法和认真的解释，并且已经克服了陷入空泛讨论的陈腐倾向。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象我们这样一种法律草案，尽管是有意识地按照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来草拟的，它势必被编成档案，束之高阁，置于脑后，因为它含有针对大地产庄园的正确的和有份量的建议，而大地产庄园和美帝国主义是使我们国家贫穷和落后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次向普拉多和奥德里亚之徒、“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代表的寡头政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挑战。这证明人民必须充分了解：不管这些组织戴上什么样煽惑性的假面具，由于它们的本性，使它们不能从事这个国家的变革。我们所目击的这个政府的“土地改革”的滑稽剧，是他们甚至不能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最后证明。

当我们起草这个方案时，我们是非常现实的。我们完全知道，现成的激进措施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确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城乡被剥削或被轻视的阶层团结起来。这主要是建立起共耕土地的人、农奴、移民、各种类型交租的佃户、佃农、临时性和季节性劳工以及小农场主和中农场主的统一战线，这些人和进步的工人、技工、学生、教授和技术人员在一起，能够摧毁共同的敌人：大地产大庄园主。

印第安公社是我们讨论的法律草案的柱石。我们从这种公社开始，希望走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公社。我们引入传统的

印第安组织形式,是为未来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为我们信任人民、信任革命,因为我们得到十分明确的思想意识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路是在前进中走出来的,我们不在最高的理论化上花费时间。我们想开始这个过程。我们正在准备着开始长征。^①

1962年6月,当“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领导人感到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任何联系是一种负担时,他们决定再次更改名称,提出了“左派革命运动”——用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民主行动党中分出来的起义者所采用过的同一名称。改名后组织的总书记是德拉普恩特。

根据一种说法,德拉普恩特对“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的一个叫弗朗西斯科·萨米恩托的成员(在1961年期间的一次战斗中)的被杀应该负责。因此他被监禁了一年。在这一时期中,他越来越相信需要对激进的农民提供武装支持。他同许多秘鲁“左派革命运动”的其他成员虽然曾去过古巴,可是决不盲目接受古巴的革命道路。在“左派革命运动”的队伍里,也没有就需要走游击斗争道路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某些人觉得,政治条件还不成熟,而农民的革命潜力则被夸大了。

但是,德拉普恩特对于必须做的事,已具有一个合理而明确的概念,于是在1962年10月他就去基里亚巴姆博地方同乌戈·布兰科进行了会见,因为乌戈在发展农民斗争问题的观点上大体相同。

乌戈·布兰科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在1962年10月间的会面,本来是应当具有历史的重要性的,但实际上仅成了历史的脚注。虽然这一会面的结果,从事后看来,是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同意保持各自的意见,但当时发生的情况究竟如何,并无直接记载。两

^① 引于马里奥·马尔皮卡:《革命传记》,第506—509页。

者之间的分歧,超过了共同之点。当时,乌戈·布兰科到处坚持要在农民中建立民兵的主张,可是他的主张怎么也没有能接近德拉普恩特的立场,而后者则坚决认为只有在山上建有固定基地的大规模的游击运动,才能为农民提供所需要的防御。

除了在这些战术——军事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外,他们在思想上也是距离很大。德拉普恩特虽然出身是一个天主教徒,并且是一个“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的战士,但现在他是一个古巴牌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那个阶段,这一意识形态同乌戈·布兰科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之间,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象德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指出的那样,即使这两位革命者之间能够设法达成某种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们两人也并不是可以完全地自由行动的人。^①两者背后都各有其组织,使他们不能不加以考虑。要是德拉普恩特能以其“左派革命运动”总书记的身份,去接近“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政治局进行试探,从而达成了一项持久的协议,这样做就会显得考虑更周到些。可是这一想法立刻就变得荒谬了。因为“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同乌戈·布兰科之间的问题,已经是够多的了。他们不能再接受德拉普恩特这样的对手。

本来可以想象,几年之后,他们的道路可能更接近些。196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没有象他在1967年那样转到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独立的立场;而在1967年,本大陆的卡斯特罗分子运动已经具有这样的特点,那时(1967年),乌戈·布兰科也已成为古巴伟人祠里“一位颇孚众望的拉美英雄了”。^②在后来几年里,乌戈·布兰科本来可以摆脱“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对德拉普恩特的游击理论给予更多的支持。但是

^① 见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131页。

^② 戴维·亚历山大:《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主义》,《现代》月刊(巴黎),1967年3月。

这纯粹是一种推测。德拉普恩特死了；乌戈·布兰科被判监禁二十年，正在服刑。

无论如何，古巴为什么帮助“左派革命运动”，却不帮助“左派革命阵线”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利亚努埃瓦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乌戈·布兰科的托派立场使然，还不如说是由于菲德尔熟悉德拉普恩特并同意他的观点的关系——德拉普恩特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同他自己的观点颇为相仿——而他本人同乌戈·布兰科，也许更重要的是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书记处”的领导毫不熟悉。

另一秘鲁左派组织“革命先锋”的一位发言人，在其署名“西尔德斯特雷·孔多鲁纳”于1966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就这一情况作了下面的说明：

布兰科的托派立场，和他所领导的运动的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他对来源于高度合理化思想体系的战术和战略计划的灵活运用一事又不太信任，而这一立场对古巴游击队的胜利发展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倾向的“卡斯特罗主义”的发展来说，如果不是反对的话，也已经是处于反对的边缘了。看来这些就是古巴帮助“左派革命运动”而抛弃布兰科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人们考虑到：没有得到有组织农民的支持，游击战争就肯定不能发展，那末，古巴这种决定就显得很奇怪了。在农民当中扎根最深、在农民运动中享有最大威信的组织，恰恰是“左派革命阵线”，而且布兰科是最受尊敬、最为人服从的领导人。在另一方面，“左派革命运动”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①

^① 西尔德斯特雷·孔多鲁纳：《秘鲁革命斗争最后阶段的经验》，《革命先锋》（利马），1966年。

两位革命者这次会见给人留下的全部东西，只是有关一次错过机会的回忆，看上去也纪录了他们在基里亚巴姆博地方联合举行示威情况的一部电影，其中有两人对群众讲话的场面，这一电影后来在哈瓦那放映过。^①

到了1964年，“左派革命运动”开始较严谨地阐明其立场。本书前面引用过德拉普恩特于1964年2月7日在利马圣马丁广场所作的长篇讲话中，概述了其政策中的某些要点。几个月以后，即同年7月间，“左派革命运动”发表了它的主要政策性文件：《世界革命形势下我们的立场》。这基本上是埃克托尔·科尔德罗、里卡多·纳普里和吉列尔莫·洛瓦顿三人所草拟的，但这一文件是以德拉普恩特2月讲话里概括的许多想法为依据的。

“左派革命运动”并不赞同中国的立场，但这一文件针对俄国的和平共处政策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该文件承认帝国主义很可能发动一场第三次世界核大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和平共处的决定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指出，在平等的和主权国家之间，虽可以和平共处；但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这就不能想象了。殖民地人民和被剥削阶级必须进行一场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可能导致革命战争。

“左派革命运动”这一文件认为，这样一场斗争实际上是对和平共处的一种贡献；因为那些目前处于附庸地位的国家，通过为自身争取解放的战斗，正在帮助人们削弱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后方。这是避免一场第三次大战的最好办法，因为，即使帝国主义最后真的发动了一场战争，他们也只能在不那么有利的条件下去打了。无限地延迟民族解放革命，将不会有助于和平共处，也不会减少人类遭受核武器毁灭的危险。既然帝国主义从来也没有放弃它的战争计划，那么这样一项政策就会使帝国主义空出手来。

^① 比利亚努埃瓦：《乌戈·布兰科》，第131页。

我们也不能设想，通过长期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上胜过资本主义阵营后，将会为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到新的国家。革命只能通过各别国家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展，至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所遵循的道路，将是暴力的道路。

“左派革命运动”这一文件继续说，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处于被剥削状态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苟安于这一不稳定的和平局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外来的解放。他们早已置身于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行列。

历史表明，革命道路贯通于不发达国家之中。除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而外，所有已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不发达的。由于宗主国里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条件比前一世纪已有不可估量的改善，所以很自然现在的先锋队是由那些感到更紧迫地需要革命的人们所组成。通过为他们自己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也对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左派革命运动”这一政策文件继续阐明，“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和最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半殖民地”，因此拉美的革命必然是统一的。在“北方这一巨大怪兽”仍然活着的时候，本洲没有任何革命会安全可靠的。古巴革命标志着拉美革命的开始。这是为解放拉美所作第二次巨大努力的胜利的开端。但是要象古巴已做的那样，再由一个国家单独进行一次真正可靠的革命是很困难的。拉美革命很可能将由本大陆所有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对这个帝国主义怪兽发动一场伟大的战争而进行。

文件还说，唯有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引导人民脱离不发达状况。而这必须是一次人民手持武器进行的革命。危地马拉革命所以失败和玻利维亚革命所以倒退，就是因为没有把人民武装起来。

文件响应中国人的说法，说革命的道路必须通过农村。

这些国家里的农民,不仅是人数最多的阶级,而且是最受剥削的阶级。土地问题是关键性问题。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对着这一问题,所有改良的努力都已失败了。因此,农村是整个系统最薄弱的部分。

农村也是最易受攻击的地方,因为国家的权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里,那里封建寡头政权和资产阶级已建造了不易攻破的堡垒,这些堡垒摧毁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因此城里的工人阶级需要乡间农民的援助来破坏这些碉堡。

秘鲁经历着空前深刻而持续性的革命前阶段。“如果革命受阻而且革命党派失败了,这不是因为不存在条件——条件久已存在,甚至比古巴的条件更好——而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左派革命运动”文件继续说,直到现在的趋势,还是循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在城市里进行斗争,使城市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核心。

这一错误的观点,没有能考虑到当时围绕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考虑到下列事实,即当俄国资产阶级接管政权的时候,它们早已在这一政权里面获得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能够用闪电式的打击来进行接管。但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就从来没有在旧政府里占有过任何一份权力。

文件是带着一种乐观的语调结束的。它说,如果还缺乏某些条件的話,它们会被创造出来。革命必须从现在开始。“群众将会响应进行一场革命的号召,这一革命,由于它最初的一些胜利,会给他们指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①

^① 《我们的立场》,《起义之声报》(利马),1964年。事实上,前些时候在1963年2月出版过一个政策文件,题为“左派革命运动:主义和纲领的基础”,由《起义之声报》出版。我没有能搞到一个副本,但是阿梅里科·波马鲁纳在《秘鲁:革命、起义、游击队》一书中,有多处提到这一文件。

在这一重要政策声明发表后不久的1964年7月间，“左派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就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而进入地下，开始组织游击斗争了。起先，他们的游击队隐匿所是在山上。德拉普恩特写道：“我们考虑把一场人民战争从安第斯山脉推向沿海，从农村推向城市，从省里推向首都。”他留下了一份十分完整的纪述，说明他认为他所计划的游击战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也许是拉美任何游击队领袖所作的最完整的叙述了。^①首先，他谈到农民：

我们认为，我们起义的过程，将采取具有真正土地革命特点的新形式，而农民的群众性行动则将以袭击大庄园开始（这些庄园是大地主从村社和农民手中霸占过来的），这一袭击将由革命党的秘密据点和委员会所领导，并将得到游击队伍的支持。农民将组织其自己的防御民兵，并将根据他们的思想水平和革命热情，编入游击小队或起义军队伍。

其次，德拉普恩特说明了农村地区的游击行动是如何会跃进到城市的：

工人阶级继续它的激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先从矿工和农场工人中开始。还有，贫民区的失业者和就业不足的人们，因处于被人漠视、遭遇不幸的地位，所以他们能认识到国内普遍存在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悬殊不均，这些人住在城市里，有的人充当寡头政府的仆役，有的是被剥削的劳工，有的是流动摊贩，更有的只是寡头生活和行为的目睹者：这些寡头夸耀着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奢侈的住宅，而对人民则异常冷漠和轻视。因此，这些制度下的牺牲者，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

^①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秘鲁的革命：概念和前景》，《每月评论》1965年，11月。

就很容易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冲击力量。

在这一人民战争的概念的范围里，游击队起着社会骚动的催化剂、起义军的种子、宣传和组织的工具的作用，还起着思想和军事学校的作用。

第三点，他考虑了游击斗争对建立一个适当的政治组织所产生的影响：

左派的团结，是这一前景的另一重要方面。我们把这一团结看成对发展斗争并把斗争引向高潮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相信这个团结将在斗争的过程中产生……

我们相信秘鲁革命的党将在起义过程中自行形成，而其干部和领导人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我们不用一个党的标签，我们如实地把自己称为一个运动，这一运动希望能成为秘鲁革命的党的发起人。

我们认为，起先只要具有某些最基层的党组织并在群众中建立一定的威信，然后我们必须致力于起义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在游击区的准备工作阶段和随着活动开始，准备工作更加深入之后，就可能去建立党，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唤醒群众、并把他们结合到武装斗争中去了。这包括从最高水平的人民斗争即武装斗争开始，然后通过武装斗争，我们将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并把群众争取过来。

第四点，德拉普恩特解释他的信念，即革命的客观条件在秘鲁是存在的，而主观条件则可以创造出来：

毋须再谈客观条件了，因为它们不仅现在已经成熟，而且一直是成熟的。我认为在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基层社会结

构和上层社会结构的条件,象我们国家这样不公正、这样腐败和这样古老。

至于主观条件,我们开头这样想,即它们还没有完全成熟,但起义过程的开始,就会触发其发展的因素,其发展的方式为任何人所不能预料。而且我们必须强调,主观条件之所以尚未达到其必要的成熟程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左派政党和组织在培植基础工作上的无能所致。

第五点,(切·格瓦拉曾认为可以让美国进行干涉,以便激起民族主义的反应,但远在格瓦拉阐明这一看法以前,德拉普恩特早已写好这一点了。)德拉普恩特断言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从革命斗争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干涉是有其积极的方面的:

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将会不顾一切地动员其巨大的资源来扼杀本大陆的解放战争。我们觉得美国对我国进行的干涉,将肯定地会比对别的国家来得快,因为五角大楼完全意识到,在拉美心脏地区起义的胜利或发展,会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将成为动员和加强人民的觉悟来反对外国剥削者和干涉者的积极因素……。

我们的民族革命斗争将迟早成为本大陆的革命斗争,因为我们各国的人民是同样地渴望解放的,而且一个国家的进程,将帮助别的国家变得更激进,并且使他们以符合其本身实际情况的办法和形式去参加斗争。

最后,德拉普恩特说明了“左派革命运动”的起义计划,是以下面的原则为基础的:

1. 客观和主观条件都已存在,后者即使尚未完全成熟,

也将在斗争过程中成熟。

2. 被剥削群众必须立即建议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3. 初期的战略和战术,必须采取游击战;然后采用运动战或甚至阵地战。

4. 由于我们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及我们的地理特征,起义必须从山岭或东安第斯山脉的陡峭的山坡上开始发动。

5. 根据我国幅员的大小,在我国缺乏地理上的完整性,缺乏运输系统,以及它的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些情况下,组织几个游击中心以发动和发展斗争的做法是可取的。

6. 游击活动的影响,将有助于建立和发展党,和有助于开始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觉悟,并且把他们结合在城乡的斗争里。

7. 由于我们的情况是一个遭受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几重压迫的不发达国家,我们必须把被剥削阶层: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团结在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代表的工农联盟所领导的统一战线里去。

8. 秘鲁的革命是本大陆和世界进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进程要求在每一方面和每一阶段都有进步的统一的形式,以便打败那些正在整个大陆勾结起来的寡头和帝国主义的势力。

根据这些原则,德拉普恩特开始在安第斯山组织一些起义的中心,这些中心将在一定时间准备就绪,以促进秘鲁的革命。

时机似乎很顺利,在秘鲁全部近代史中,1963和1964两年掀起了最惊人的农民骚动的浪潮。不管这是不是乌戈·布兰科和象他的人的活动所引起,或者是由于支持土改的巨大政治宣传的

结果(这种土改永不会实现), 那些年代里在安第斯山谷和平原所发生的农民事件, 都是没有先例的和大部分无法加以解释的。^①

^① 特别参阅赫尔里特·维塞尔、乌戈·内拉、里卡多·莱特斯三人的著作和“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关于秘鲁的报告中谈到农民骚乱的章节。

五 “图帕克·阿马鲁”和吉列尔莫·洛瓦顿

接近 1965 年 5 月底的时候,各“游击中心”的首领在德拉普恩特的总部即第六号营房举行集会。该营房位于马拉奴拉村上面的梅萨-佩拉达地方,马拉奴拉村本身就在乌鲁班巴河上的马楚-皮克楚地方的因卡大镇下游一些距离的地方。到会的有吉列尔莫·洛瓦顿、马克西莫·贝兰多、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加斯科、埃利奥·波托卡雷罗·里奥斯和鲁文·图帕亚奇等人。

根据陆军部的报告,游击队的原来计划是打算在洛瓦顿和贝兰多·加尔维斯领导下的图帕克·阿马鲁小组正在静悄悄地进行准备的萨蒂波区开展活动的。接着,在陆军部队被诱入该区的时候,游击活动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即在北面,费尔南德斯·加斯科正在接近厄瓜多尔边界地方组织一个“游击中心”,还有阿亚库乔附近的农村地区也有“游击中心”。最后,以梅萨-佩拉达地方为基地、在图帕亚奇和德拉普恩特本人领导下的“帕查库特克”小组将行动起来。同时,支持游击队的政治运动将在秘鲁所有的大城市里发动起来。

“左派革命运动”究竟有否把事情组织得象陆军所想象的那么妥当,还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关于活动于阿亚库乔地方以东由民族解放军的埃克托尔·贝哈尔领导的这一支队伍,在 1965 年 6 月以前,似未证实其参与制订“左派革命运动”的计划细节。

等到游击队伍充分组织好和准备好,并进入他们各自的地区而站稳脚跟之后,领袖们就在德拉普恩特的营地举行了集会,并草

拟了长篇的“革命宣言”。这一宣言在全国广为散发，而看来这也就是秘鲁当局最早获悉的关于爆发一次有计划的游击行动的一点消息。

这个文件长约十五页。这里只要引用一下该游击队向政府所提要求的一段话就够了：

“左派革命运动”手持武器，并深知它正确地表达了人民的心情，特提出下列要求：

第一，立即解散国会。这一国会，除了少数例外，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狼窝。它是改变这个国家的不公正社会结构的一切企图的巨大障碍。它是财政部的一个负担，因而也是人民经济上的负担。现在不仅已经表明国会是无用的，同时表明它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二，宣布一次大赦，并让那些因政治和社会的罪名而被拘禁、受迫害和被审判的人得到自由。对那些最近犯有屠杀人民之罪的文官或军人，立即给以严厉惩罚。

第三，实行一项真正的土地改革，这意味着，

——完全和最后消灭大地产，将其所有权的全部立即归耕种这一土地的农民所有。

——立即归还盗占印第安人公社的所有土地，并对造成的损害和榨取的非法利润予以赔偿。

——立即取消所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契约；对遭受劳役之苦——以各种不同的交租形式为基础的劳役——的农民给予赔偿。

——没收沿海、山区和丛林中的大地产和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公司的地产，其中包括属于大地主手中的土地而将分配出去或者要分给适当的农民集体的土地，但没收对象以中等规模以上的财产为限。

——在这一没收过程中，那些耕种他们本身的土地并能增加生产的中、小地主不包括在内，应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帮助他们提高其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力。

——对农民的生活和劳动的所有方面，国家机构应给以优惠的待遇，以完成农业改造的过程。

第四，对工人、公私企业的雇员、自由职业者和技术人员，应给予可按生活费用加以调整的维持家庭生计的工资。

第五，进行一次城市改革，以取消房地产主制度和因此获得的利润，使目前的住户成为房地产所有者，但中小房地产主不在此例，他们将获得特别待遇。

第六，立即收回秘鲁的石油，要求国际石油公司（秘鲁）赔偿损失，偿还所获取的不合法的利润，终止象马科纳、托凯帕拉和勒图尔诺等公司以本国自然资源同帝国主义公司签订的各项合约。

第七，完全收回国家主权，摆脱帝国主义所加的一切桎梏；驱逐所有帝国主义的文职或军职“顾问”和代理人；终止一切危及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条约和契约；同世界上一切国家重新建立外交、文化和贸易关系。^①

秘鲁游击队的传记家罗格尔·梅尔卡多对德拉普恩特所采用的策略即在游击队还没行动起来以前，就宣布游击队的存在，是有些意见的。游击队在他们实际开始战斗以前，就公布他们的存在的做法，究竟是否明智呢？这样做大概是要把农民鼓动起来，让他们意识到：这不象政府不久要想说的那样，仅仅是少数几个偷牛贼的问题而已。但是这样做的用意，也在于鼓动秘鲁的左派，使他们采取更坚定的立场。“革命宣言”里包括了要求左派团结起来的热情的呼吁。

^① 《对秘鲁人民的革命宣言》，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20—136页。

1965 年的秘鲁
 安达马尔卡-萨蒂波
 由吉列尔莫·洛瓦顿率领的
 图帕克·阿马苏斯阵线活动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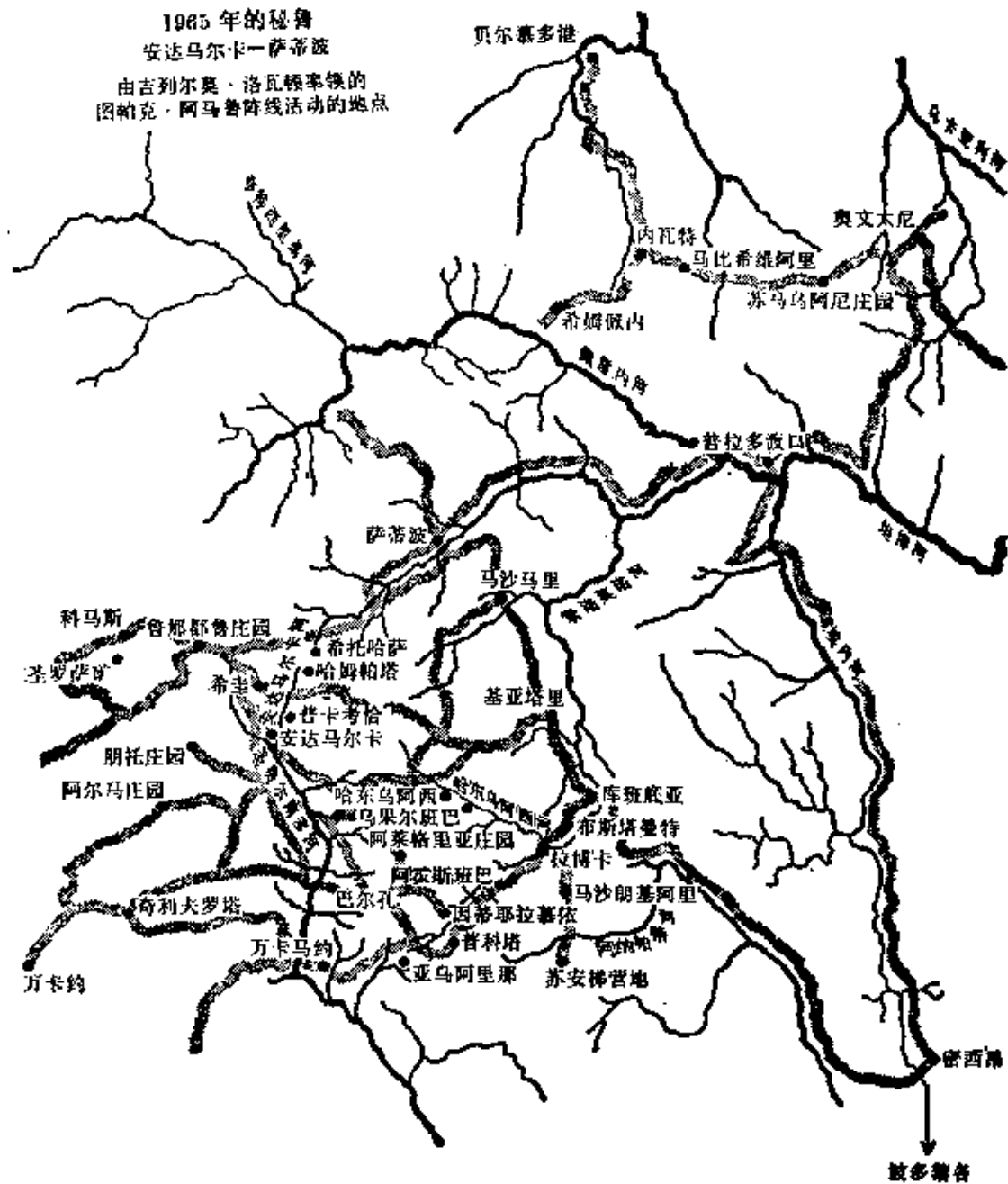


图 6

(按原图译制)

“左派革命运动”不再声张就行动起来。首先开始斗争的，是吉列尔莫·洛瓦顿领导的活跃于国家中心地区的图帕克·阿马鲁的队伍。他们是1965年6月开始活动的。

他们的基地就在安达马尔卡村附近，该村位于同名河流的沿岸。这一农村地区的四周尽是山地。国防部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下面事件：6月7日游击队在安达马尔卡河上游哈姆帕塔一带地方抓到了两个民卫队员。他们是被派去调查关于游击队活动的谣传的，但是因为游击运动即将行动起来，所以两天之后就把他们释放了，但扣留了武器和装备。

6月9日那天，战役是以游击队袭击圣罗莎矿区的炸药库开始的。他们逃走时带了大量的炸药，并以此炸毁了马腊尼翁河上的一座桥梁。他们还洗劫了鲁那图略庄园。完成这一任务之后，他们就撤退到安达马尔卡和哈姆帕塔之间的普卡科恰地区。

同时，第二支队伍袭击了安达马尔卡的民卫据点，并缴获了在里面发现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十天之后的6月18日，游击队在三个不同地方进行了袭击：他们爆炸了在科马斯地方的另一座桥梁，洗劫了朋托庄园的电力厂，并从阿尔马斯庄园带走了牲畜。^①

同时，7月14日，一支警察分队从安达马尔卡出发进入该区进行巡逻，以便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晚他们到达哈姆帕塔，第二天在希托哈萨附近地方就遇上了一次不大的伏击。从游击队观点看来，这一次伏击是失败的，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在信号发出以前就开了枪。

可以理解，上述是陆军所提供的关于游击运动的第一批事件的官方报告。显然，把游击队描绘成专肆破坏财产的一群匪帮，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游击队方面对此所作的叙述，包括在吉列尔莫·洛瓦顿于6月20日大概是写给德拉普恩特的一封信里：

^① 《秘鲁的游击队及其镇压》，第47页。

亲爱的同志们，

我借行军途中一次休息之便，给你们写这封信，并再一次同我们的组织进行联系。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许多话要说……

我们的首次行动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实际上已完成了国家形势所要求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既然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所有任务，我们就要开始武装斗争了。我们相信，事态已证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的确相信，形势已发展到超出我们想望的地步。报刊和电台已报道了我们的首次行动，虽然自然是有所歪曲的。报道内容，基本上包括袭击一个矿区和炸毁就在鲁那图略庄园前面到萨蒂波路上的一座桥梁。还有一批人对这一庄园进行袭击，和另一批人对安达马尔卡警察局进行的袭击，都发生于同一天里。前一天，我们不得不在同一地区抓了两个警察，他们进入我们的势力地带就是为了调查关于我们已进入这一地区的谣传。我们在去目的地的路上，碰上了他们。交火后，我们放走了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两次行动都非常成功。我们在矿区里、庄园里、桥梁旁和城市里，到处进行了武装的宣传。我们举行集会，并从卡车上一路分发了商店里的粮食，这些卡车是我们所缴获的，事毕后我们就不加损坏地归还。第二天一整天，我们成了我们的势力地带的主人，这个地带范围很大，包括几个地区和许多村落。我们在采取行动的9日那一天，于……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分配了我们的死敌胡利奥·达维拉的所有财物，此人尽管只是一个小农场主，但也虐待和剥削农民。他还是一个恶讼棍。

次日即11日，我们收拾了阿莱格里亚庄园（该庄园属于我们的一个最凶恶敌人和穷人的祸害劳尔·里维克所有）。警

察早就在安达马尔卡，离开庄园约一天的路程。我们把这个庄园变成了一个公社，它的东西(牲畜和农产品)就分给农民了。同一天，我们沿着最危险的道路出发去骚扰敌人，并在其他道路上观察他们的动静。我们建立了阵地。我们一直等到15号中午，敌人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就来了。我们在等待敌人的时候所得到的农民的支持——供应物品，提供情报和输送新的人员——真使人不能想象！具体细节可以写一本书，或进行一次长谈。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预定同敌人进行第一次遭遇的时间已经到来。在那个时刻，我们想起了那些在昂高依、乔亚伊、安塔、乌尔科斯、西古安尼、帕斯科山丘、拉奥罗亚等地方和在国家运动场被杀害的无依无靠和手无寸铁的人，那么多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惩罚！

他们大约有五、六十个人，装备很好，大多数人持有手提机枪。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一个同志就放了一枪，使我们前功尽弃了。打那时起，我们就开始退却了两三天，改换了阵地，但并不停止骚扰敌人。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全体聚在一起，从错误中接受教训。我告诉他们，我们没有遭受损失，使他们安心。

有三、四个并没有卷入战斗的农民被枪杀了，大概是拷打之后杀害的。另外一些人在监狱里，处于最糟糕的境遇之中。警察正在散布恐怖，并焚烧农民的草房。许多人同家属一起住在山洞里。但是我们的农民确实非比寻常，他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为了双方的安全起见，我们不能不暂时避开群众，但我们也已经采取了措施，去同他们保持联系和领导他们。

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以便进行新的突袭，取得新的支援，并准备继续战斗。这一次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离开了险境，而反应也各不相同。局势对我们

极其有利；很有可能扩大战斗，并证明群众和我们的同志们，甚至在炮火下面，还是坚强的革命者。

我想我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吧，虽然我还想对你们再谈一些具体的东西。虽然一路上有人倒下，有人流汗和诅咒，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加乐观和具有信心。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第二个时刻，开始了武装斗争而感到骄傲。

对全体同志致以游击队的问候，

带着对我们胜利的信心，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兄弟们，

吉列尔莫·洛瓦顿

于因蒂·耶拉慕依

1965年6月20日

附笔：那开了枪的同志是领导人之一。他已回到队伍里来了。^①

就在洛瓦顿写这封信的同一天，即6月20日，有二十九个士兵的一队人从万卡维利卡派遣到万卡马约去阻止游击队向南移动，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地带。带领这一分队的陆军少校得知普科塔地区有游击队的消息后，就决定向此方向移动。但6月27日在近亚乌阿里纳的地方，他和他的士兵中了洛瓦顿的第二司令官马克西莫·贝兰多·加尔维斯所布置的埋伏。有七个士兵死亡，后来陆军指控游击队抓去了巡逻先导队的两个人，并把他们折磨致死。游击队方面关于亚乌阿里纳地方的伏击的叙述，后来是在《起义之声报》上公布的：

在亚乌阿里纳地方，得到农民帮助的十七名游击队员，遭遇了数量上差不多两倍于我的有手提机枪、轻机枪和手榴弹的装备齐全的敌人军事部队。游击队方面只有效率差得多的

^①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53—156页。

武器、土制手榴弹加上他们的勇气。战斗是由司令官马克西莫·贝兰多领导的。游击队杀敌九名，伤敌数名，俘敌十二名，其中一名是军官，没有加以虐待当即释放。

在关于亚乌阿里纳双方遭遇的具体情报的基础上……我们断然声明：陆军部和寡头政府的报纸上关于两名警察人员（迪奥赫内斯·巴尔德拉马和欧塞比奥·加尔维斯·西尔维拉），在亚乌阿里纳被游击队俘获和拷打后加以杀害的报道，完全是虚假的。

提到的警察人员，是人所共知的工人、农民的谋害者，民卫队少校奥拉西奥·帕蒂尼奥所带领的分遣队的先导人员，他们正向十分接近“图帕克·阿马鲁”游击队的安全地带的因蒂·耶拉慕依地方推进。主管这一地带的司令官贝兰多，决定去切断他们前进的道路；要取得成功，他必须在让上述先导人员即两名警察通过这个地带后，使他们陷入埋伏。在该纵队被歼之后，先导人员虽被切断去路，但向交火后正在撤退的游击队开了火。游击队不得不设法打退这一袭击，因此枪杀了两名警察。这之后，这一地区被掐断了。几天之后，镇压部队又回到原地，在他们发现了尸首后就散布说这两人是没有参加战斗而被野蛮地折磨致死的。这一切很显然完全是不真实的……

游击队过去一向是优待俘虏的，将来也要如此。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亚乌阿里纳地方同一次的遭遇中，贝兰多司令官抓了民卫队中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军官：这一事实即使是寡头政府的走狗，也不能加以否认。当人民游击队领导人接受这些人的投降时，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的生命会受到保护的。他还指出，虽然他知道：如果是游击队员被捕的话，等候他们的将是非常不同的命运，可是游击队总是愿意这样优待俘虏的。于是他就以有限的供应品和所许可的条

件，对分遣队的五个伤员予以包扎治疗。最后在告别时，他对他们说：很抱歉，不能为他们再做什么了，因为这将对他的游击队员发生危险。^①

亚乌阿里纳的伏击事件已相当严重，足以使陆军意识到他们正对付着的不仅是一伙家畜的盗窃者了。因此，他们在6月和7月份里就准备好了涉及范围极广的反措施。在哈乌哈地方最接近游击区的重要空军基地，成了运输部队的重要中心地点，他们用飞机去发现和监视游击队的活动。海军的以伊基托斯为基地的河上武装部队受命加强对上乌卡亚利河的控制。他们同陆军合作，在坦博、佩雷奈和埃内等河流巡逻。

陆军部的报告继续说：

武装部队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一项深入的宣传和警戒的运动，通过飞机和直升飞机上的扩音器以地方语言来传布信息，还散发数以千计的传单下来，这样该地区不管是识字或不识字的农民，就都不会因无知或恐惧而同游击队合作。

为便利在圣费尔南多、曼塔罗、埃内和索诺莫罗河之间地区进行肃清和重建秩序的工作，告诫居民不得同陌生人与形迹可疑分子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应设法把此种分子逮捕，并送交当局。要他们明白，反抗维持秩序的部队——它起到保卫国家主权的作用——就是帮助了颠覆活动。还警告他们，未经政府部门许可，私藏武器或爆炸物，是犯罪行为，隐藏秘鲁或外国的间谍或特务，也同样是犯罪行为。

已知极端分子撤退时惯用的伎俩，是以本地居民作为向导或人质，因此警告他们：那些通敌者，将作为同谋者加以

^① 《起义之声报》，第46期。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57—168页。

逮捕与惩处。

最后,为避免肇事地区发生无辜被害者起见,妇孺应远避任何可疑事物。^①

因为游击区里没有完善的公路,部队只能用卡车送到郊区。7月19日有两连人推进到公路条件所允许的最远的地方——北面到希圭,南面到达奇利夫罗塔。^②在奇利夫罗塔地方,他们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一机场终于为两架直升飞机提供了一个基地。然后,奇利夫罗塔这一批人向东朝它们万卡马约的前进基地进军,同时在希圭的这一连人则南下圣费尔南多山谷向巴尔孔地方进军。

他们在进军过程中抓了几个同游击队曾有联系的农民,并且得到了证实在普科达、因蒂亚阿慕依、阿霍斯班巴、哈东乌阿西和乌果尔班巴等地方确有游击队扎营地。有一队人开始从巴尔孔向因蒂亚阿慕依推进,在7月30日那天,同游击队发生了一次冲突。于是这一队人不再向因蒂亚阿慕依继续推进,而是转向南面去,同从万卡马约出发而向普科塔推进的另一队人会合了。经用机枪扫射和秘鲁空军的两架飞机对这一地区彻底轰炸之后,该两连士兵于8月2日占据了普科塔地方。^③

次日即8月3日,该部队即开始向因蒂亚阿慕依行进。途中发生了另一次冲突,而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发现游击队早已离去。他们留下足够的士兵来看守普科塔和因蒂亚阿慕依,主要人马继续前进去占领在阿霍斯班巴、乌果尔班巴和哈东乌阿西等地的游击队扎营地。除了在乌果尔班巴发生了小接触外,这些地方未经过战斗即被占领了。

①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55页。

② 同上,第57页。

③ 同上。

所以,在采取攻势后的两、三个星期内,陆军为扫清了山区感到庆幸,该山区曾被游击队选定为他们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洛瓦顿和贝兰多的武装力量采取了标准的游击战术,他们宁愿撤退而不去同敌人进行主力战,这样,陆军在哈东乌阿西和库班底亚两地部署了四十名士兵之余,还能够允许其余人马分为机动小组四出巡逻,查看游击队是否真的已经离去。他们这样干,基本上就是要以他们的出现,来表明现在是他们,而并不是游击队,才是统治的力量。

可是,游击队并未走得很远。移动于基亚塔里和库班底亚之间的巡逻警,在8月9日遭到了伏击,这对陆军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游击队选定在索诺莫罗河沿岸森林地带开展活动。他们的基地是建立在布斯塔曼特地方,该地处于库班底亚和哈东乌阿西河同索诺莫罗河的会合点之间。该地区大都属卡姆勃印第安人居住,该族印第安人是半土著部落,以慍悍闻名。陆军部报告称:卡姆勃族人袒护游击队,而很少同陆军合作。不幸得很,我们手头还没有游击队方面谈到在游击战爆发之前,在卡姆勃族内部做准备工作的报告。旅行经过该区的一个美国记者诺曼·高尔,对此有些批评的看法。他写道,洛瓦顿“是明显地企图同好战的卡姆勃族进行合作的,其方式就象二次大战期间武元甲将军同越南东北山里的部落所合作的方式那样。可是,其不同点在于:武元甲在进入战斗前,同他的部落民族在政治上已做了两年的工作,而秘鲁游击队同卡姆勃族则仅以散漫的方式工作了还不到六个月时间……”^①然而,事实依然是:卡姆勃族,一般而言,还是忠于游击队的。而且他们为此忠诚付出了代价。诺曼·高尔写道:秘鲁陆军的镇压行动

导致了几百个卡姆勃族人的死亡。在这一地带工作的美

^① 诺曼·高尔:《切·格瓦拉的遗产》,《评论》杂志,1967年12月。

国传教士报道说，秘鲁空军轰炸了一些卡姆勃族的村庄。^①可是，在游击起义仍然存在的同时，一所训练秘鲁农村警察进行反起义活动的专门学校就在美国开发署的主持下在该区建立起来了。

8月9日的伏击，加上更北面的萨蒂波地区发现大胡子的谣传，似乎已经使陆军意识到他们是兵员不足的。因此，一支新的分遣部队被空运到萨蒂波，然后他们从那里行军两天后到达库班底亚。另有八十个人的一批士兵，从南面调到埃内河上游的密西昂地方。有了这些增援之后，他们才推进到布斯塔曼特的游击兵营。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游击队的迹象，而被抓的两个卡姆勃人泄露了他们已向南朝马沙朗基阿里去了。

在一个多月里，游击队和陆军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接触。然后，在9月22日的晚上，游击队对仅有三十名士兵据守的普科塔发动了进攻。

据陆军方面称，这是游击队方面的一次绝望的行动，而且进攻已被击退。游击队方面的报道则较为乐观：

在普科塔地方，在司令员吉列尔莫·洛瓦顿亲自领导的同敌人的一次交战中，游击队就在骑兵巡逻队的兵营里把他们的一支精选队伍击败了，缴获了大批食品和武器，并使他们遭受重大的伤亡。这又一次证明了：只要革命组织能领导群众，并使他们走上游击战争的正确道路，人民是能够打败任何强大的镇压力量的，没有任何敌人是不可战胜的。^②

^① “以一切办法向全世界谴责镇压部队在安达马尔卡、普科塔、巴尔孔、阿雷斯班巴以及布斯塔曼特和萨蒂波的卡姆勃族定居地区，对手无寸铁的农民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效的和可恨的屠杀，是一项民族的责任……”——《左派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会议概况》，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61页。

^② 《左派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6页。

连同亚乌阿里纳地方的一次冲突，普卡塔的占领在游击队的记录中成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战役之一，而在此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就向南撤退到布斯塔曼特以外的苏安梯地方的基地。

不久，陆军又重新跟踪他们之后，从北面和南面两个方向朝苏安梯营地移动。最南面的一队占了突然袭击的优势，于10月2日在苏安梯发生了一次重大冲突，看来游击队在这一次冲突中受了损失。根据陆军发表的数字，有十一名游击队员死亡和十七名被俘，而包括当时不在苏安梯的洛瓦顿和贝兰多等人，重新向靠近马沙那里的索诺莫萨河的下流一带转移。^①

就是在这里，美国的“顾问”们设有总部。

11月初，陆军接到消息说：游击队正计划向北进行一次突破而渡过佩雷内河。贝兰多·加尔维斯曾被派往贝尔慕多港口，推想是去核实一下这条路线的情况的，可是他被一个卡姆勃族人出卖给那里的驻军。他被捕后，就被转移到萨蒂波地方，据陆军报道，他在那里曾试图自杀，^②从而受伤不能复元，并在12月7日用飞机送往万卡约的途中死去。游击队方面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则更加骇人：

手无寸铁的被俘者不仅被残酷地杀害了，而且他们是死于酷刑，正同英勇的司令员马克西莫·贝兰多就义时的情况一样，贝兰多与萨蒂波的农民领袖帕乌卡尔卡哈同志一起被俘，并同遭杀害。亚乌阿里纳战斗中的胜利者遭到拷打后几天不省人事。他们要知道司令员吉列尔莫·洛瓦顿指挥的队

^① 我有意在这一段里不引用许多伤亡数字，因为，即使陆军的报道就这个数字而言，看来还是相当正确的，但显然还有许多遗漏。对苏安梯的袭击可能造成了十一个游击队员的死亡，但死者也可能就是农民。

^②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64页。

伍的所在，但雇佣军并没有能知道。由于不可能把他的死装得象自然死亡的那样，因此就把他放上直升飞机，从上面扔下来(这时他还活着，只是失去知觉)，扔进安第斯山的峡谷里去。我们这样陈述，是根据完全可靠的情报来源的。^①

11月末，游击队从马比希维阿里经过苏马乌阿尼庄园向奥万特尼行进。然后于12月初，在他们折回内瓦特的时候，碰上了正在等待着他们的陆军部队。游击队损失了八个人，其余的人向南行进，朝佩雷内河回去。12月14日在希姆佩内地方发生了一次小冲突，然后于12月22日，一个名叫弗洛里·安埃雷拉·门多萨(海梅·马丁内斯)的领导人在近库阿特西里基河的地方被杀。两周之后，陆军加紧了对洛瓦顿及其余部的包围圈。他们于1966年1月7日在近索特西基河的地方被杀了。^②

然而，关于洛瓦顿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还存在一些疑问。最初他被提到死于12月中旬在希姆佩内发生的冲突中，但这一提法后来被否认了。1月6日的利马报纸又宣布他已在前一天的一次冲突中被杀，而且他们引用了来源于亚历杭德罗·谢拉尔塔将军的话。^③后来，这位将军似乎否认说过任何话，而且在1月18日“左派革命运动”发表的公报中，也坚持认为关于洛瓦顿的消息完全是虚假的。他们指出当时没有象10月份德拉普恩特死后那样发表任何陆军公报。

利马《商报》1月7日发表了一项正式的陆军公报，声称洛瓦顿“未曾被俘，故不可能在拘留中。他所带领的队伍业已解散在逃”。^④

① 《左派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59—160页。

②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64页。

③ 《世界报》，1966年1月12日。

④ 《吉列尔莫·洛瓦顿真的被杀了吗？》，《世界报》，1966年1月。

不管确切情况如何——看来他多半被俘、受折磨而被处置掉了——拉美左派和他的法国妻子，仍然相信他可能还活着。^①

^① 雅克林·埃吕奥·德洛瓦顿：《跟着洛瓦顿的足迹走去》，载于《最后一点钟报》。

六 “帕查库特克”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

由吉列尔莫·洛瓦顿指挥的“图帕克·阿马罗”游击阵线设法生存了六个月。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鲁文·图帕亚奇所领导的“帕查库特克”阵线就不那么幸运。陆军一开头对于他们所在的地区已大体了解，而且能在游击队发动首次攻势以前，就在这一地带布满了部队。这一地区也特别荒凉。“帕查库特克阵线”预定在拉孔本西翁山谷里展开活动，该山谷曾一度为乌戈·布兰科的活动场所。但是德拉普恩特的总部是高踞于梅萨佩拉达高地之上的。秘鲁陆军关于游击队的记载，对该地带作了很好的描述：

梅萨佩拉达是东安第斯山脉（在近库斯科省的拉孔本西翁一带）中有“丛林之眉”之称的山脊上的一个高原。它长约四十余哩，宽十二哩左右。它的平均海拔为一万二千呎，而环抱该高地的四座山谷，约高三千呎左右。读者由此可以得知，四周的山谷和该高原的最高点之间存在着约九千呎的差距意味着什么。除了地形崎岖起伏而外，高大浓密的丛林从高地最下面覆盖到半腰，其最高处则处长着又长又密的“依楚”草^①；而且经年累月大雨不止，清晨浓雾弥漫。读者还应记住气温的悬殊：高地的最下面平均在华氏 75 度，而顶上常在零度；综合这些情况后，读者就能对梅萨佩拉达的地势形成

^① 生长于安第斯山作饲料和盖草屋用的一种草类。——译者

一个很好的概念了。^①

陆军于1965年8月末进入该地区,这是在洛瓦顿的队伍已采取行动,而德拉普恩特还没有开始发动攻势以前。“左派革命运动”为庆祝这一事件,发表了一项公报:

1. 起义是按照计划好了的扩展、动员和发展的过程进行的,不仅在中部各省是这样,而且在南部的阿普里马克、库斯科和阿雷基帕省,以及北部的利贝塔德、卡哈马卡和皮乌腊省也是如此。

官方公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一方面讲到只是一批很少的、确实是为数极为微细的极端主义者和犯罪分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报道数以百、十计的游击队员的死亡或被俘。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他们是一小批人,或者所报道的死者不是游击队员而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们呢?把这些农民杀害是为了要吓唬人,是为了要解决那些头子们和他们的寡头政权和帝国主义主子们的嗜血欲吗?

在报纸和电台上,镇压部队和寡头政权及其雇佣文人们都说游击队胆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敌人,还因为他们要撤退,要乘人不备突然袭击,还要搞埋伏。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些都是游击战的战术,有朝一日我们就会进入打运动战或阵地战的阶段,那时起义军队将以旗鼓相当之势,同雇佣军进行大战。胆怯一词,对那些听命于当权者和分享赏赐的那些人,是更适用些。在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胜利即将来临之日,就会有机会来听听和念念这些新闻报道了。那时我们就会想起这些学舌的鹦鹉和耍笔杆的人了。

2. 寡头政权的国会(除了八位议员是可尊敬的例外),通

^① 陆军部文件:《秘鲁的游击队》,第31页。

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修改了刑法和军法的一些条文，为那些攻击现行秩序的人们，订立了死刑和剥夺国籍等等的条款。这一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只是暴露了寡头政权及其国会中的仆从们的惊慌失措而已。

我们将以人民的名义，对下列人等判处死刑：一切集体屠杀犯、一切卖国贼、一切间谍、一切参与吮吸人民鲜血的寡头们、一切百万富翁窃贼们以及一切利用职权进行幕后交易和贪污腐化的人们。这些决定，将在进行斗争时期和胜利之后，在城市和乡村里付诸实施。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让我们警告这些寡头以及仆从们：他们气势汹汹，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已作好一切准备，要使我们的国家摆脱贫穷、剥削、无知、不正义、不发展、不独立、行政腐败、不道德，全盘危机和彻底破产的状态。

3. 佩德罗·贝尔特兰是第一个购买国防公债和民主债券的人。这些银行家将为国内信用提供三分之一的资金。而大实业家、大出口商、大进口商和大矿主等也将学样跟上。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那些在工人工资的一索尔上面，在劳动者食品里的一盎司食盐上面，或者在农产品价格的一分钱上面，都要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人，遇上要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能挥金百万，毫无吝色。他们为武装部队出钱，以维护现有秩序，换言之，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他们的特权以及用人民血汗积累起来的财产。警察和士兵是雇佣来反对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的，他们保护大剥削者、百万富翁——本国罪恶的唯一根源。“反对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借口，被用来维护卑鄙的、反爱国主义的利益。他们所谈到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指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的矿区、他们的银行、他们的百万家财、他们的买卖、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的利润。这就是他们称之为濒于危险的国家。

4. “左派革命运动”的游击行动，一般地被说成是“共产党”的活动。“反对共产主义”，是寡头及其仆从们所玩弄的人所共知的把戏。可是我们必须说清楚：在中部、南部和北部的游击队，是属于“左派革命运动”的。的确，共产党的两派都声明反对我们，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的充分支持。“左派革命运动”不属于共产党的任何一派。“左派革命运动”也不属于任何托洛茨基集团。“左派革命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运动。“左派革命运动”支持左派的团结，但认为必须在斗争过程中而不是环绕着咖啡馆的桌子达到的团结……

“左派革命运动”支持国内不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或大地主妥协的一切进步和爱国阶层的团结，团结在一个广泛的反寡头、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里面，没有宗派主义，没有保留，没有歧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吁下列人们团结起来的理由：一切诚实的人们和军民中的真正爱国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机关工作者、农民、中小地主、中小商人、中小企业家、运输工人、矿工等等，以及艺人、艺匠、军人（包括官兵）等等。

5. 我们的战斗纲领，在我们向秘鲁人民发出的革命呼吁书里早已明确提出……①

6. 现在要看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们的行动了。我们已经说过话了，并且已见诸于行动。内战正威胁着整个国家。我们不能为这一暴力行动负责。我们正通过游击战争方式，以革命的暴力来回答针对工人、农民的反动暴力。没有任何人和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们的运动。革命正在发展，并正引向反对人民敌人的胜利。我们的纲领是完全明确的，并且没有人能否认它体现了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情绪。

① 见本书第 371 页。

7. 我们拒绝假基督教徒和秘鲁教会的大主教和首席主教所提出的一切条件,他们正为死刑辩护,并使教会为寡头政权及其走狗们服务。对于那些在我国的工农遭受杀害的时候不哼一声的人,那些对饥饿、贫穷、失业,不公正的情况和穷人遭到的剥削一无作为的人,那些忘记了基督真理的人来说,这实际上是谴责他们自己,并且暴露他们自己是剥削者的仆役——本国罪恶的唯一根源。

8. 武装起来的左派革命运动号召一切阶层的人民投入战斗!胜利是我们的。游击队正在扩展。武装斗争正横扫全国。解放即将临近。今天的星星之火,明天可以燎原,把那些假爱国者、谎言者、恶棍、刑吏、伪善者,所有指使对人民犯罪的人统统烧尽!

秘鲁革命万岁!游击队万岁!

“左派革命运动”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打倒寡头政权、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

“左派革命运动”民族革命司令部司令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

1965年8月30日

于安第斯山①

但仅有革命意图的宣言,是不能打退秘鲁军队的。陆军于8月末到达这一地区之后,随即使农民感到它的出现。同游击队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是在9月9日那一天。据说至少有一个美军反起义专家帮助计划和指导这一次袭击。② 9月20日,五个陆军分遣队开始在梅萨佩拉达最高点行动,同一天就占领了游击队六号

① 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93—198页。

② 《纽约时报》,1965年9月12日。

营地。作为说明气候条件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士兵在远征的这一阶段冻死了。^①四天后，陆军又占领了三号和四号营地。虽然游击队在9月25日下午作了英勇的努力想收复四号营地，但没有成功。

陆军部的报告接着说：

我们继续加紧军事行动，以阻止游击队重新集结，并便于占领和摧毁仍由他们据守的基地。同时，空军在白天进行了几次空袭，来扰乱反叛分子并抵消他们的力量。重型12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提供了晚间进行骚扰的火力，使他们在晚上也不得不处于戒备状态以防不测。这一些军事行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梅萨佩拉达高地较高地带是无人居住的。

然而，游击队方面描绘了一幅很是不同的图景：“用凝固汽油弹和烈性炸药对该高原进行饱和轰炸后引起了燃烧，杀害了农民。”^②《纽约时报》记者在10月份写的文章里说：“空军的飞机每天以凝固汽油弹和机枪火力袭击可疑的游击队集中营地。”^③

在这种情况下，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已没有希望在梅萨佩拉达的荒凉的山坡上生存下去了。可是，他们已被包围，要想脱逃已不可能。他的队伍里有一个成员叫阿尔维诺·古斯曼的，由于经不起这种紧张的考验，就离开游击队向警察自首，并且和盘托出了游击队隐藏的所在。这样由于他们自己队伍里出了叛徒，因此游击队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由德拉普恩特本人和鲁文·图帕亚奇带领的一支游击纵队，

① 陆军部文件：《秘鲁的游击队》，第66页。游击队坚认陆军所称冻死的士兵，实际上是死于伏击的。（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84页）

②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86页。

③ 《纽约时报》，1965年10月8日。

在不顾一切地突破陆军日益加紧的包围圈的过程中，于10月23日在近阿马依班巴地方同陆军发生了遭遇战。游击队员们有的被俘，有的被杀。关于德拉普恩特和图帕亚奇的结局如何，还存在一些疑问，但看来他们已经被俘并在两天之后遭到枪杀。这支队伍仅仅活动了一个月。

七 埃克托尔·贝哈尔和“哈维尔·埃劳德”

当民族解放军于9月25日在洛瓦顿和德拉普恩特两人所控制的地区间进入战斗行动时，看来秘鲁军方是大吃一惊的。在埃克托尔·贝哈尔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是1962年就存在的革命组织，1963年5月发动马尔多纳多港游击事件，哈维尔·埃劳德就是在那次事件中被害的。民族解放军为游击斗争作好准备工作，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洛瓦顿小组在1965年6月开始行动时，它还不认为它本身已对于全面展开革命活动都作好了准备。无论如何，由于铭记了德拉普恩特的团结的号召，它认为除了开始游击斗争而外，别无其他可以选择。9月9日，民族解放军和“左派革命运动”的代表在利马签定了一项联合声明，保证相互支援：

秘鲁革命的武装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件事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变化的性质。现在游击战争已经开始，秘鲁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解放一定会紧跟武装斗争而来。

这种形势对革命的团体提出了团结的问题，而团结却是在行动中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左派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军了解到这一点，双方同意在协作的基础上改善彼此间的关系，以便在建立全国协作指挥部时起共同面对解放我国的各项任务。

斗争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的、反帝的和民主的人民革命，它

是建设社会制度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而这个社会制度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将完全恢复民族的主权，并将实现我们的宿愿，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屹立于本国、本大陆和全世界。

实现这些目标，只可能是在工农联盟领导下有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被剥削的中等阶级、下层中等阶级和所有国内反对土地地主所有制制度、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那些爱国阶层支持的人民斗争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他们构成秘鲁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继承了我们最光荣的传统。留给我们这些传统的是印加人，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人，象曼科·印加、胡安·桑托斯、图帕克·阿马鲁、普马加瓦，为独立战争和为共和国而斗争的那些英雄们，以及过去几十年来为解放人民而献身的人们——其中包括中尉巴列霍斯、农民马伊塔、诗人哈维尔·埃劳德等。^① 本协定并不排斥任何其他组织，如果它们抱有与本协定同一的宗旨和要求，欢迎它们的参加。

“左派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军这两个组织完全认识到：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将会推动那种强有力的秘鲁革命统一政党的形成，它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现秘鲁革命过程的主要工具。这两个组织认为它们本身就是这个工具的创始人。

誓死解放我们的祖国！我们一定能胜利！

利马，1965年9月9日^②

^① 1962年5月时，中尉巴列霍斯是胡宁省豪哈城内一所监狱的管理人，乘汽车从万卡约城到那里大约要走三十分钟的路程。为了急欲得到一个政治组织的支持来开始举行一次起义，他同一个托洛茨基组织叫做“革命工人党”的一个成员取得了联系。这两个人同一个叫做马伊塔的农民头头，共同策划一次就能点燃起社会主义革命之火的起义。他们占领了上述的那座监狱，但不久就陷入了军队包围之中。巴列霍斯和马伊塔都牺牲了。详情参看阿梅里科·普马露那：《秘鲁：革命、起义和游击战》，《伊伯利亚半岛纪行》，第6期，1966年4—5月合刊本，转载于哈瓦那出版的《思想评论》，第1期。

^② “左派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军”的联合声明，1965年9月9日，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81—182页。

10月，在它的第一次主要战斗后不久，民族解放军发表了一个宣言，陈述了它的具体看法：

自贝朗德就任共和国总统以来，我国和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那种状况，并不曾有过根本上的改变。

忘记了自己的竞选诺言，贝朗德越来越对寡头集团的压力屈服，肆无忌惮地走了他前任所走过的道路；为了换取让他留在台上的许诺，他听凭国际石油公司、塞罗德帕斯科公司和其他美国垄断集团攫取我国的石油、铜、铁、铅和锌；他利用农民的贫困，搞了一套使人啼笑皆非的土地改革，而这一套土地改革却不触动那些大的庄园；他用武装力量残暴地镇压了人民。

我们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统治阶级决定使用全部暴力。在对人民以实行凶暴而闻名的政党控制之下，贝朗德托庇在美国国务院的魔爪之下，出卖了我们的民族主权和独立。

对我国的那种无情掠夺和剥削并未停止。现在仍然继续着。人民群众却要求结束这种状况。

追随图帕克·阿马鲁、普马加瓦以及其他反殖民主义斗争领袖们传给我们的那些革命传统，我们提出民族解放和必须建立武装部队的号召。

1962年，来自工人、农民和学生等方面的政治领导人决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来建立民族解放军：武装斗争和团结的政策——它们彼此是辩证的统一物，相互补充。

武装斗争将会使人民群众日益相信自己的力量。但除非立足于广泛的团结的基础之上，人民群众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打败寡头集团的强大力

1965 年的秘鲁
马尔县

哈维尔·埃劳德阵线
埃克托尔·贝哈尔指挥的民族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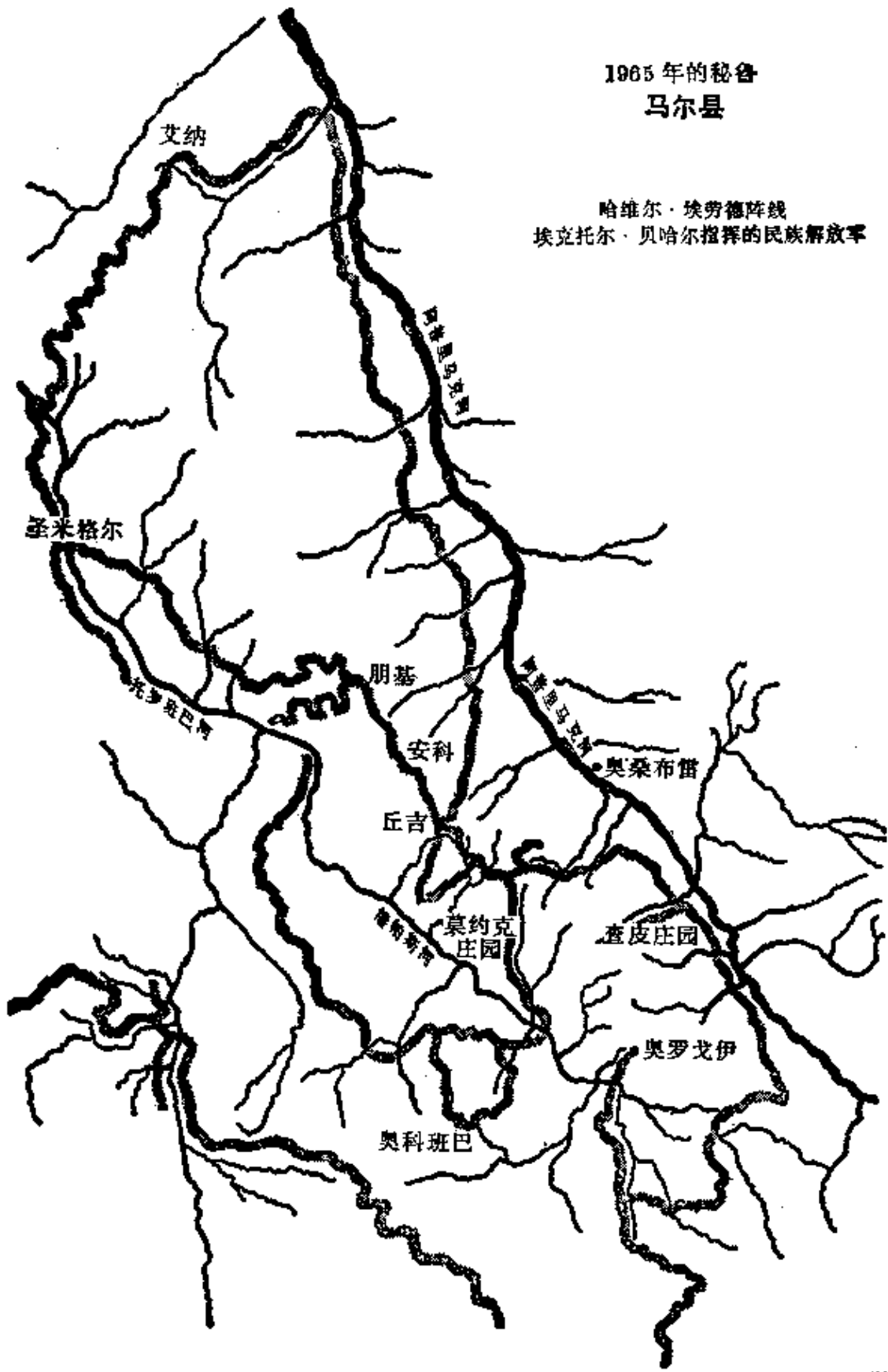


图 7

(按原图译)

量。分裂主义永远是压迫者最有效的武器。敌人永远企图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因为敌人知道内部闹不团结的人民群众是容易制服的。

这就是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成为人民队伍中站在敌人方面的危险同盟者的原因。

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创造出真正群众性的团结。我们并不相信为暴力而使用暴力。但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寡头集团惯用暴虐与政变专事剥削人民的国家中，我们不能欺骗自己和人民，宣扬什么和平的道路。

我们认为必须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人民战争来作为对寡头集团罪恶的暴行的答复。

过去几十年解放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用游击战争的手段是可以对付一支庞大和装备精良的政府军队的。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和所有已经打败帝国主义或正在打败帝国主义的战争的各国人民的教训。

建设一个强大民族解放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在全国进行游击战争，最后打败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

我们团结政策的当前目标，是组成一个能使所有人民群众都参加进来的广泛战线。

这个战线将不是背着群众长期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将是人民武装斗争阶段的高峰，在这个阶段中，行动把所有群众的力量都汇集到一道来了。

无人有权自命为群众的领导，除非他在实践中证明他能站在群众的前头，并能带领群众走向胜利。领导群众并不是什么特权，而是群众拥护所付托的严肃职责。

属于“左派革命运动”的光荣部队，如“图帕克·阿马鲁”、“帕查库特克”、“普马加瓦”等，在胡宁和库斯科两地开辟了游击战线，用它们的革命榜样来证明：人民战争已经开始了。

民族解放军向人民宣布：在阿亚库乔省又开辟了一个游击战线。

民族解放军通过埃克托尔·贝哈尔同志指挥的哈维尔·埃劳德游击队，开始了第一次的武装宣传行动。埃克托尔·贝哈尔是革命忘我精神的光辉榜样。

在杀人不眨眼的卡里略兄弟两人所拥有的查皮庄园中，二千名农民受着剥削，一年中要无偿地为他们兄弟作九个月的工。从九岁起，农民的儿女们就开始了整天干活的苦日子；如果他们看管的家畜有了走失，他们就必须作更多的活来赔偿。农民的妻女被奸污，并被抢去成为这两个人面兽心的地主的奴婢。没有一个人的劳动是得到报酬的。

1962年，有的农民对卡里略兄弟的那种惨无人道的虐待提出了抗议，但是他们却被残酷地杀害了。

1963年，在再也不能忍受的情况下，农民们把卡里略兄弟捉了起来。他们去找法院的负责人，但是他们自己却被逮捕了，罪名是盗窃家畜和农作物。

联系到这些事件，佩德罗·贝尔特兰所拥有的属于麦卡锡分子和寡头集团的报纸《新闻报》自然很委婉地于今年10月4日在它的第6版上作了如下的报道：“警察局也记得这个庄园中的农民对于卡里略两兄弟一向是不客气的。一年以前，他们把两兄弟中的一个光着脚，嘴里塞了东西拖到阿亚库乔，说这个家伙有严重的不法行为。警察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以防止造成犯罪事故。”《新闻报》就是这样报道的。

1965年9月，农民们在民族解放军的武装支持下，在查皮庄园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对卡里略兄弟及其走狗所犯罪行的判决，伸张了革命的正义：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胡宁、阿亚库乔、库斯科的游击队万岁！

农民及其与游击队的团结万岁！
打倒残酷杀害手无寸铁的农民的那些凶手！
打倒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
民族解放军万岁！^①

民族解放军就是这样于9月25日开始了它的军事行动，拿下了查皮庄园，枪毙了庄园主卡里略兄弟。这种明显的疾风暴雨式的开端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游击队作了如下的解释：

对于阿亚库乔省马尔县查皮庄园的庄园主贡萨罗·卡里略和米格尔·卡里略两个杀人犯的处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正义行动，可以与图帕克·阿马鲁对西班牙人地方长官阿里亚加处以绞刑一事相媲美。印加声讨西班牙暴君的那些话，也正是我们声讨这些杀人凶手的话。印加说：“他的恶行，使把他打倒一事变成一件好事。”查皮是一所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包括了几乎六个村子，其中，潘头和朱邦两个村子彼此相距很远，需要走几天的路。这个庄园大得就是骑马也要用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这两个地主有自己的武装打手，并且不愿意地方当局离他们太近。最近的民警岗位离开地主的大院也有五天的路。气候是温暖的。除了酿制罗姆酒的蔗糖和古柯而外，庄园还出产优良品种的咖啡和可可。牲畜很多。所有生产都依靠农民的无偿劳动。这些农民为了换取小块土地来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不得不在庄园的土地上无偿工作并为地主放牧……这里好几百户人家都备受压迫，甚至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人都没有；更谈不到有什么学校和医疗站了——虽然在1962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① 《在阿亚库乔的新游击战线》，是“民族解放军”于1965年10月所发表的一个宣言，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88至191页。

1960年，贡萨罗·卡里略和米格尔·卡里略两人杀害了一个名叫瓦曼的农民。这两人给这个农民加上了偷窃的罪名，把他支解了，并把支解的尸体挂在庄子的进出口处，来吓唬农民。但是当时正在提出工资要求的农民们却造了反，捉住了贡萨罗·卡里略，把他当作一个犯人绑了起来，送到邻近庄园的警察派出所。当然地方当局不但释放了这个犯了罪的地主，而且还把农民们的头头埃内斯托·瓦曼(被害人的一个亲戚)逮捕了，现在仍关在阿亚库乔的监狱里。这件事，连同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卡里略兄弟所犯的其他种种罪行(强奸妇女、拷打农民、焚烧茅舍等等)，在1964年的《工人和农民报》中都是有报道的。

对于处决这些罪犯的正义行动难道还会有任何怀疑之处吗？^①

理卡多·莱特斯对于这桩事件的经过，曾作过如下的叙述：

游击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阿亚库乔省的山区处决两名地主。他们首先把农民集合起来，他们自己决定清算这两个家伙多年来所犯的罪行。这件事是在地主庄子附近的战斗中进行的。当这件事处理完结之后，农民们避免同警察接触，撤退了。在这两个地主及其狗腿子死后，几世纪来受着剥削和压迫的印第安人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再强迫他们作那些奴隶劳动的工作，也没有人再向他们勒索他们的一半或四分之三的收成了。事实上，他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在过去为庄园主而劳动的土地上，他们所有的人现在都可以共同为自己而劳动了。游击队把这种作法向他们作了解释，并在上述行动后立即付诸实施。到了警察进入庄园时，已

^① 引于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186—187页。

经束手无策了。警察对农民发动了进攻，这引起了农民对警察更大的愤慨。警察留下一队人守卫庄园中的这片空地（地主的庄子 and 地主进行压迫的其他具体标志都被烧光了），但是这队人却不能阻止农民耕种他们自己的那片土地，并从土地上收割全部收成。没有新地主能取老地主的地位而代之，因为如果这样，很明显，他的下场将不会比老地主更妙。^①

由于全部兵力都已经用到图帕克·阿马鲁和帕查库特克两个游击战线方面，因此拖了很长一个时候，直到11月25日即帕查库特克游击队已经被消灭之后，政府军队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这个新的威胁。这时候，政府军决定把攻下梅萨佩列达的那支部队派到哈维尔·埃劳德游击队活动的地区。他们于12月6日进军，半月之后，在12月17日那天，碰上了游击队，遭遇战的结果是贝哈尔的副手理卡多·莱昂牺牲了。在12月下旬和次年1月上旬之间，两方又发生过几次战斗。但是由于贝哈尔在战斗中下落不明，“哈维尔·埃劳德战线”事实上也就不再存在了。后来贝哈尔为政府军队捕获监禁。

1965年的游击战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由于某些原因，邻近厄瓜多尔边境由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加斯科率领、在极北部活动的曼科·卡帕克游击队，根本就不曾投入战斗过。六个游击队员在10月18日至11月5日期间为政府军队所捕获。他们为政府军提供了有一支游击队队伍正计划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情报。得悉费尔南德斯·加斯科的主要根据地是在塞罗内格罗，三支政府军的队伍于12月11日开始向该地区集结，但是搜索到该月月底还一无所获，搜索的行动也就取消了。游击队这时已转移到了厄瓜多尔。

^① 理卡多·莱特斯：《秘鲁：革命、起义、游击队》。

八 共产党人和游击队

秘鲁共产党对待德拉普恩特游击队的态度，只能从它全面反对切·格瓦拉的论点的关系中得到理解。格瓦拉的论点是：“并不需要等待革命具备所有的条件；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①正如前面所讲，这个论点得到德拉普恩特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正统的共产党人却认为革命的条件是不能按这样的方式人为地促其实现的。（当然，共产党反对乌戈·布兰科，却是更加直截了当地反托洛茨基主义了。）

秘鲁共产党人塞萨尔·莱瓦诺在他的一篇分析秘鲁游击队失败的文章中，曾经写道：

主要的结论是：在一个人民身受贫困和地主暴力之苦的国家中，游击队的斗争是可以赢得群众的同情的。但是除非那里或多或少具备成熟了的革命客观条件，这种同情就不可能被利用和被发展成为积极的支持。游击队运动顺利成长的第二个条件是领导游击斗争的政治组织所表现的比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自觉性。^②

当1965年6月9日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第一次投入战斗行动时，共产党就碰到了采取什么态度的困难问题。按照塞萨尔·

① 切·格瓦拉：《游击战》。

② 塞萨尔·莱瓦诺：《秘鲁游击斗争的教训》，《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第9卷，第9期，1966年9月。

莱瓦诺的说法，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共产党就宣布它与游击队是团结一致的。^① 但这儿有一个条件：“秘鲁共产党的立场可以更准确地说是批判地对游击队的支持。”而且莱瓦诺还补充说：“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对于发动游击斗争所选择的时间是否恰当抱有怀疑，指出在作出这项决定时，不但要考虑这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地区农民的态度和情绪，而且也要考虑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

纵然共产党还有这些疑虑，不过它也看到游击队有成功的可能。从而它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游击队的态度，就成了一个经常念念不忘的问题。1965年8月，中央委员会开会“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新形势”。它分析中的出发点根据下列四个基本前提：

(1) 应当把游击斗争和起义加以区别；在有的情况下，起义是人民战争的最后阶段。

(2) 为了发动起义——换言之，即转入到夺取政权，革命形势是必要的。^② 但对于出现游击运动，这却不是主要的条件。

(3) 游击运动本身并不能创造出一个革命形势。

(4) 只有在革命形势成熟起来的情况下，游击运动才能发展。

^① 在《秘鲁的游击队》一书中，罗格尔·梅尔卡多写道，他曾经向秘共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要一份秘共对于游击队的声明，但这时秘共还没有什么可以向他提供的东西（原书第146页）。不过，德尔普拉多却印发了一份在退休将军塞萨尔·A·潘多领导下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叫做“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这份于1965年7月公布的声明说，“民族解放阵线”同情游击战争，而且预计游击战争是会爆发的；不过，“如果认为只有通过某一个特定的先进集团的行动才能取得胜利，那将是一个错误”。

^② 每个共产党人在遇到疑难问题时，总是随时请教列宁的。按照列宁的观点，一个革命形势必须具备某些客观条件：（1）一个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政治危机；（2）被压迫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恶化；（3）真正群众性运动的高涨。塞萨尔·莱瓦诺评注说：“显然，1965年8月在秘鲁并不存在这种革命形势。”

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说，虽然由“革命左派运动”以及后来又由埃克托尔·贝哈尔的“民族解放军”（即“五月十五日运动”）参加的武装斗争，是“对农民暴行的反应”，但必须指出的是：“使武装斗争变为主要斗争形式并变为秘鲁人民当前主要任务的那种革命形势，在我国还不存在。”

[莱瓦诺评注说]，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土地改革。虽然土地改革仅仅在事实上农民已经夺取了土地的地区开始实行，很明显这项改革会把一部分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使农民暂时滋长了某些幻想。此外，要求把油田国有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对政府可能采取某些有效措施的希望也就重新抬头了。

应当谨记：一般的人民群众还没有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对联合政府的那种言行不一的、失败主义的和煽动性的行为完全看透。而且，“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奥德里亚全国联盟”两者所形成的联盟，也仍然拥有一定的（虽然不大）政治资本可以利用。^①

从共产党方面说，游击战斗爆发所造成的不利局面是：这件事直接使政府采取了镇压共产党的行动。事实上，共产党被认为犯了那种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它自身的战略部署被打乱了。中央委员会正确地注意到反动势力正在利用游击斗争：

- (1) 发动一场镇压左派力量的运动；
- (2) 使这些左派力量孤立于民族和民主力量之外；
- (3) 诱导目下当权的妥协的资产阶级倒向赤裸裸的反动

^① “奥德里亚全国联盟”是前总统奥德里亚将军的政党。这个党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勾搭起来，结成一个很不神圣的同盟，共同反对贝朗德。

方面。

(4) 用弥补某些分歧 (主要指“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军队的长期的对立)的方式,把最反动阵营中的各种力量重新加以组合。

在支持贝朗德改良主义政策方面,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部主张都被游击斗争一事破坏了。但是由于怕失掉激进派的支持者,共产党又不能袖手旁观。因此,虽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态度,它口头上却相当对武装斗争表示赞助。

[莱瓦诺事后写道],没有必要重申秘鲁共产党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武装斗争的。我们最近的党代表大会明白指出:虽然共产党人希望我国的革命过程能沿着非暴力和不流血的道路前进,但是鉴于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那些传统手段,和平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党代表大会声明说,非常可能,秘鲁革命的道路将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最近几个月中,统治集团对游击队、对农民的斗争和对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一般地说只是加强了这种可能。

但是为了怕共产党的忠诚拥护者,根据上面那段话,就认为共产党是赞成德拉普恩特的活动的,莱瓦诺连忙就列举了“左派革命运动”的各种错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不曾把它的活动同共产党的活动很好配合起来:

“左派革命运动”的错误不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时间不适当,也在于它的领导不屑和游击运动之外的其他左派力量相配合,特别是不屑和共产党相配合。现在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从游击斗争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教训。许多错误、缺点和叛变是可以事先防范的,许多英勇战士的牺牲是可以避免的——如

果领导斗争的这些集团不是对我们的党怀有这么大偏见的
话。

但是,事实上发生的情况,使人不得不感到:上述的那种偏见
是对的。

虽然在理论上对武装斗争发生兴趣,亲华秘鲁共产党在支持
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的问题上,却并不比亲苏的正统共产党更为
热心一些。亲华共产党是在1964年1月的大会上成立的,但是从
一开始,它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反对修正主义而不是用
在推动游击战争的方面。^①

当游击队于1965年中期在安第斯山区进入行动时,亲华共产
党起初是保持沉默的。政治局在9月和10月里曾举行过几次会议,
除了声明“秘鲁武装斗争的开始标志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②以外,几乎没有作过什么别的事。直到11月15日和16日,即
在德拉普恩特死后,亲华共产党才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来
讨论当前的形势,并对该党为什么不支持游击队一事作了解释。^③

① 这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分裂出来的,正式为北京所承认的党。根据中国方面的
消息,成立大会参加者的大多数是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秘鲁十七个区中十三个区
委会的代表。参看《北京周报》,1964年1月14日和1964年5月22日的两期;以及欧内
斯特·哈尔普尔林:《北京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见《中国季刊》,1967年1—3月号。
亲华共产党的领导是萨图尼诺·帕雷德斯。

② 《北京周报》,1966年1月7日。

③ 亲华共产党说这是“第五次大会”,因为它认为自己代表了正统的党,而亲苏的
党则是一个分裂出去的集团。从亲苏的材料上看,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问题在亲华共
产党中造成了一场混乱。不过,塞萨尔·莱瓦诺写道:“出版《红旗报》的这些分裂主义者
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竟把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其他‘左派革命运动’的游击队领袖说
成是冒险主义分子。结果是一部分学生脱离了该集团并组成了自己的‘民族解放武装
力量’。这个组织(它不从事游击活动)现仍然和我们党保持联系。此后,分裂主义者的
反游击队的立场还造成进一步的连锁反应:在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中,以萨图尼诺·
帕雷德斯律师为首的一个集团开除了以何塞·索托马霍尔律师为首的另一个集团,指
责后者犯了种种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修正主义’。这些就是分裂主义者的左倾机会主
义所造成的结果。这些分裂主义者开始时宣称武装斗争是唯一正确的斗争形式,但是
以后到弹雨横飞时却赶快下令退却,把那些信赖他们的真诚而被引入歧途的人抛给命
运去摆布了。”

它的结论颇值得我们在此处以较长篇幅加以引用：

秘鲁的社会冲突通过游击战方式的武装斗争的开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左派革命运动”主动地开始了这场斗争。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甚至当我们有必要从这次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和目的的观点上，来对此项运动的各种活动、并对其在我国国内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是否适当的问题，作一个恰如其份的分析时，也必须正视此点。

“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其中有一些人还不曾有过无产阶级化的经历，而更有不少的人，包括它的全国领导人在内，过去是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中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他们这些人不曾受到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有联系。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他们身上的宗派主义、高高在上和独断独行的作风。这就是阻碍“左派革命运动”承认我们党是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原因。宣称我国共产党只有两个派别，并说“左派革命运动”是不曾卷进这个派别之争中的新左派，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敌对态度阻碍了他们的组织和我们党之间的友谊关系的发展。在1964年1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①后，“左派革命运动”好象是看到了一个可以从它手中夺取武装斗争主动权的敌手，从而这点也就支配了他们的行动。这一倾向也促使其他小集团的出现，这些小集团同样地企图把武装革命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想法在“左派革命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势力，特别因为它在发动武装斗争时认为自己在军事上已经过充分训练了。“左派革命运动”考虑到了国内的一般形势，却从不曾考虑到有利于发动武装斗争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它考虑到的仅仅是那些主观因素，诸如训

^① 即亲华共产党成立大会。

练它的武装部队之类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因素,诸如广大群众的情绪或他们的痛苦,它却不曾加以考虑。它既不曾把统一战线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也不曾想到革命是靠群众来实现的,而且没有任何革命政党能够单枪匹马把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认为这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时间并不是最有利的时机的理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游击斗争导致了各种力量的更大的分化和矛盾尖锐化两项事实。游击斗争也有力地揭露了亲帝国主义寡头集团的野蛮和压迫的本性。游击斗争中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将来革命的发展来说,都是很有用的。这就是秘鲁(亲华)共产党对于在战斗中牺牲的“左派革命运动”前领导人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以及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所有革命者深致敬意的理由。我们认为:不让武装斗争的烈火被扑灭,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这里,我们宣布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下去。

不要忘记发动武装斗争主要取决于主观条件成熟的程度。众所周知,秘鲁存在着革命形势,它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构成的,这些条件要求对秘鲁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革命的解决方案。至于主观条件中,有一些基本上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战斗意志旺盛的程度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程度;另一些则取决于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政党准备工作的严密程度。这两种条件都在成熟起来。但还应指出的是:客观条件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另一方面,主观条件则主要取决于准备和进行革命的意愿。等待主观条件自己发生,并不是对待革命应有的态度,因为主观条件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创造、发展和组织这些主观条件。当这些主观条件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再发动武装斗争就可能夺取更大的胜利。但是如果革命力量所进行的准备活动一旦被发现,那么,反革命力量就会迫使革命力量不得不提前行动,这种情况有时也发生。这就是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原因。

秘鲁武装斗争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客观条件可能为主观条件的成熟铺平了道路。由于敌人的力量不但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所唾弃，而且是建筑在土崩瓦解的基础之上的东西——它是外强中干的，所以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纵然很猖獗，但革命的力量（暂时虽然还弱小）加上它们事业的正义性、我们人民的英勇传统以及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终将日渐强大起来，并将最后打败反革命的力量。

秘鲁〔亲华〕共产党重申了它的指导原则，即打败革命的敌人的唯一道路，是采用人民的革命战争手段。这就是说，把群众的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战斗两者加以协调，相互结合起来。正如在去年10月扩大政治局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武装斗争不应局限于一些脱离群众的小股武装集团的参加，也应把作为当事人的群众算在里面。否则，甚至在游击队队伍可以依靠自然环境继续生存下去的情况下，这些队伍也不能发展得使人民也跟着它们走；这意思就是说，城市工人必须在阶级和革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也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没有城乡工人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可能失败”。这项发表在“左派革命运动”遭受梅萨·佩列达的挫折以前的声明，证明它是正确的，因为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游击队在库斯科地区只有薄弱的或者说几乎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在这个政治局的文件中所写下的要点曾经正式通过，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的三大法宝是共产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说法的根据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单枪匹马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所有被压迫的阶级团结在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阵线之中。这并不仅仅是革命政党或左派政党联盟

的问题。如果这仅是联合左派的问题，那么，这种联合就不是一个统一战线了。统一战线必须主要地以工人和农民为基本群众；它必须吸引没有积极投入左派政党活动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此外，必须谨记：除了〔亲华〕共产党而外，秘鲁并没有另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拥有任何群众支持的革命政党。因此，在武装斗争开始后，组织统一战线就是一项绝对必要的斗争任务，以便把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学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阶层等都团结进来——其中，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处于领导阶级的地位。

应当指出的是：同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不可能组成真正的统一战线的，因为这些家伙不是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的各色各样的代理人。他们企图歪曲或者破坏革命。此外，这些反革命集团都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争取与那些对敌人公开进行战斗的人们的团结，就是当务之急。“左派革命运动”如能摆脱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而能与我们党结成联盟并与广大群众联系起来，那总是件好事。这就是我们党对“左派革命运动”敞开达成谅解的大门的理由——不管他们和我们之间有多少分歧。而且，团结只有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才能形成这一点，也不应忘记。除了共同目标而外，我们还须在与群众并肩战斗的道路上，努力协调我们的各项行动。

鉴于“民族解放阵线”^①的失败——这是几个公开与〔亲华〕共产党决裂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进行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革命活动的结果——秘鲁〔亲华〕共产党争取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爱国解放阵线”，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紧密地与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结

^① 这是一个正统共产党所控制的外围组织，不是一个游击运动组织。

成联盟,把革命进行到底。^①

关于中国对待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态度,也许这是现有的、最清晰的一段叙述了。

^① 引自1965年11月16日秘鲁(亲华)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油印文件中的结束语部分,第13—18页。

九 游击队的总结

“革命的信心自然是根本的，但它本身却不足以使一个小小的先锋队面对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部队，敢于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孤注一掷。”

——阿梅里科·波马露纳

1965年的秘鲁游击队伍在进入战斗后的六个月之内就被消灭了。但是这次失败，并不曾使秘鲁左派中间关于武装斗争是好是坏的争论停止下来。发起组织主要游击队队伍的“左派革命运动”曾在1966年初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并提出了下列的结论：

(1) 在北部，我们的革命活动，并未达到发动和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那种政治和军事水平。在军事行动开始不久后，两支武装部队合并了，这意味着该地区的工作遇到了挫折。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不管从战术上或从战略上看，并没有必要在两地同时开始行动。纵然受到了这样的挫折，我们的组织的政治和军事部门仍然留在原地区，而且它们的结合和扎根工作还取得了好成绩，以致政府军队不能摧毁它们。政府进行了多次围剿，12月中仅在一次围剿中就动用了一万人，另外还加上厄瓜多尔军队的一部分很强的部队。最近，我们的部队遵循全国指挥部的命令，没有与敌人进行过正面的接触。

(2) 在中央地区,“图帕克·阿马鲁”游击队作了不少与当地农民联系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战斗中表现得生气勃勃,十分出色。但是它因“左派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的弱点而受累,未能更好地利用游击队在农民中所鼓舞起来的热情和支持。

在中央地区活动的“左派革命运动”的游击队说明了:甚至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对反动部队的胜利也是可以争取得到的。亚乌阿里那、普古塔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都证明了此点。

“左派革命运动”的代表大会对于中央地区游击战争所进行的分析说明:我们部队战士们所受的挫折,并不完全由于反动部队在地面上、在空中和在河流上的全副武装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而主要是由于游击队伍自身所犯的战术上的错误。

(3) 在南部,建党工作以及在建党基础上组织群众的工作都进行得顺利。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武装行动一定会取得群众积极的支持。可是当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却忽略了对游击队自身装备的重视。军事方面准备不足,使游击队无法保持主动。此外,“左派革命运动”的总书记路易斯·德拉普恩特是在南部战场上的消息也被暴露了——这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块地方,使指挥的后方变成了前线。不管怎样,地雷阵和游击战斗还是在保卫这个地区中发挥了作用,使反动部队有一个时期无法前进。同时,游击队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游击队员的士气也由于该地区自然环境的艰苦和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得有所低落了。

一个偶然事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帮了反动势力的忙并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就是出卖祖国和革命的叛徒阿尔维诺·古斯曼的罪恶行为。这个家伙忍受不住游击战斗的饥寒艰苦,发生了动摇,终于向反动部队投降,供出了游击队的

全部军事秘密，这样使敌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了。

古斯曼这个叛徒在帮助反动部队实现它的目标方面特别有用。他是这个地方的人，曾经积极地参加过这个地方中乌戈·布兰科领导下的农民斗争。他长时期一直是最突出的一个游击队队员。由于他的战功，他被他的战友们推荐到区域委员会中工作。在区域委员会中，他负责游击区的准备工作。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个人所掌握的“左派革命运动”的情况，使他成为敌人搜索和摧毁总司令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同志指挥下的游击队主力的最有力的武器。

虽然游击队在他投敌前几天已经发觉这个人那种腐朽的精神状态，但是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①

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埃克托尔·贝哈尔在一次谈话时，议论到游击队必须依靠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农民。

问题 9：农村群众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何？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游击队？民族解放军又在农民中间作了那一种政治工作呢？

答：不少左派分子现在仍然重覆着敌人的污蔑，说什么我们失败了，因为人民不支持我们。没有比这个更不符合事实的了。由于对“左派革命运动”中我们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有切身的体会，现在我就来讲一讲我自己的经验。

当农民开始发觉这个地区有了武装人员时，他们的最初反应是一种好奇心。他们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为什么而战斗。他们是热诚的，并且极欲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以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熟了，我们

^① 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第 167—169 页。

和他们成了朋友，我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地帮助他们。我们变成了护士、教师、顾问，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在此之后，他们才向我们吐露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清楚地了解他们处境如此贫困的原因；也有不少人有过一些战斗的经验——因为他们曾经当过矿工，并曾经企图组织过工会。他们的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一个：大庄园。自然，他们要求我们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家家户户过去把钱冤枉地用在无休止的打官司上面，而官司却永远打不赢。庄园中的工人事实上是奴隶，他们完全懂得地主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因此，我们游击队的行动总是针对着这个地区的大庄园，让政府的军队去保护那些地主。

到了这年年底，我们实际上成了这个地区唯一的掌权者。不少农民参加了或者正在准备参加我们的队伍。

对于他们和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宝贵的经验。我们现在才体会到，所谓革命的或咖啡店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离开秘鲁的现实和人民又是多么远——多么遥远！我们现在才体会到秘鲁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的原因。在开始时，甚至于我们的语言对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学习用他们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和他们谈，谈那些他们容易了解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为什么要革命。我们政治工作的基础放在使他们能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赶掉地主并不是革命的终结，革命还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在别的地方仍然还有许多象他们一样的被剥削的人。秘鲁的农民不是一下子就打定主意的，这是事实，因为他们对问题总是要想好几遍。但是一旦拿定主意，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的决定可能很单纯，但也很深刻而且很合情合理。这就是我认为秘鲁革命不仅要进行几个月而是几年的原因。但当革命

终于到来之时，它将是美洲最深刻的和最壮丽的一次革命。农民必须有所准备，而这正是现在我们所作的事——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队伍的一般成员，而是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这个经验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所有左派来说，都是有用的。不少人说，由于农民在政治上还未觉醒，所以革命的条件还不存在，因此首先必须向他们灌输革命的思想使他们觉醒起来。我们告诉这些人说，他们是不懂得农民的。我们的策略应当适应秘鲁农民的心理状况。我们不可能长此等待下去，直到有了一个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时才认为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了使农民政治上觉醒起来，你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不应象某些宣传者、工会组织者或偶然来访的客人那样，下车伊始就不知所云地谈了一通，然后拔腿就走，去向党或城里的头头汇报了。我们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保卫农民以反对地主及其走狗，并教育农民使其认识到武装和组织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挺过敌人的镇压生存下去。生存对游击队来说，是个责任，因为只有能在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有力地向人民证明：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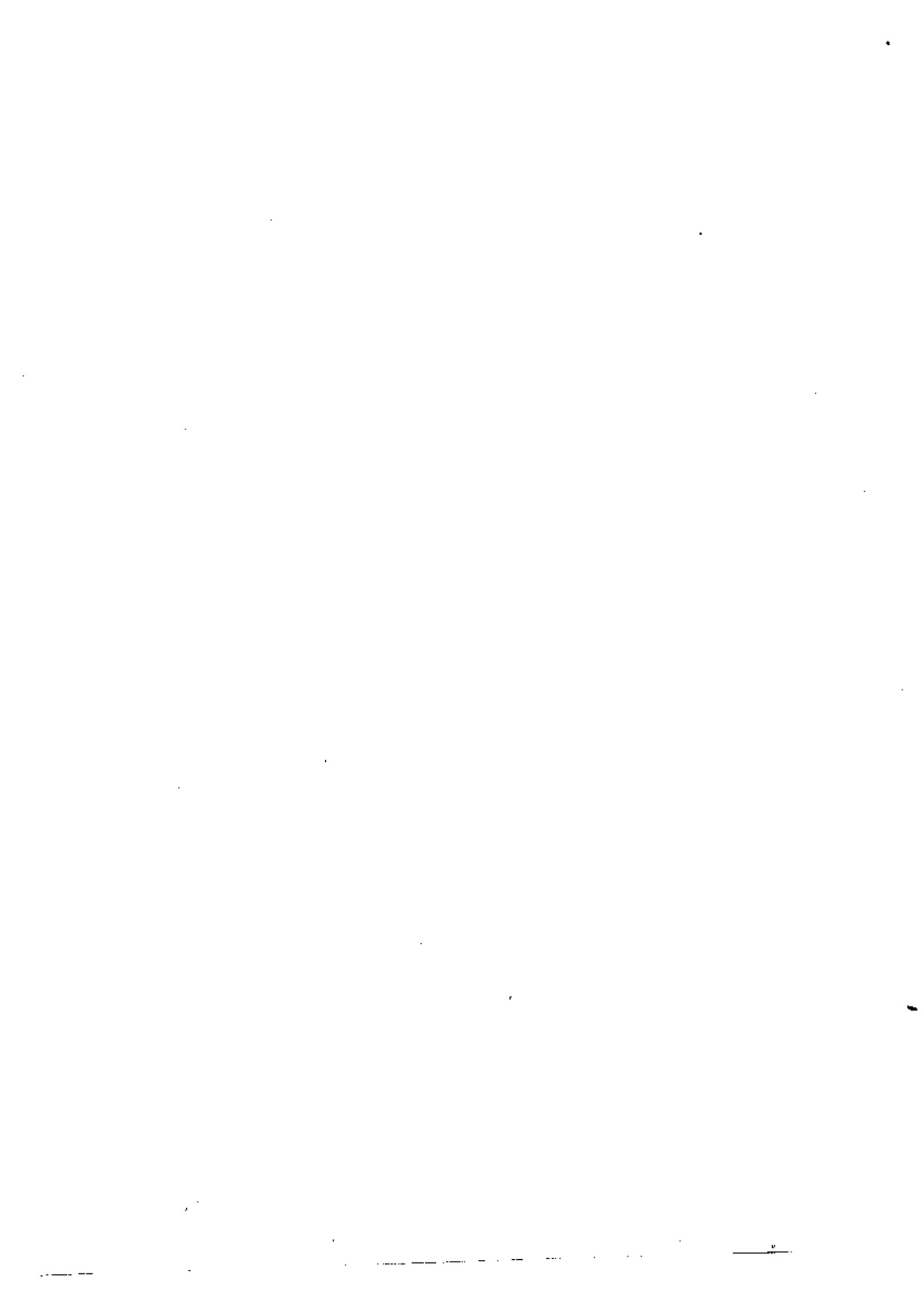
对于那种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秘鲁农民具有一种“富农”的意识，厌恶从事革命的活动，贝哈尔上述那段引人入胜的分析，就是一剂纠正这种看法的、必要的良药。在乌戈·布兰科和德拉普恩特进行活动的拉孔本西翁谷地一带，如果这种看法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贝哈尔的论证说明这种看法在民族解放军

^① 这是与埃克托尔·贝哈尔的谈话，发表在秘鲁民族解放军的刊物《舆论》中，1967年，重新发表在《秘鲁：与游击队员的谈话》一文中，《思想评论》（哈瓦那），第6期，1967年7月。

活动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贝哈尔的批评意见，指出那种根据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来概括农民的意识做法，是多么危险啊。

“左派革命运动”的分析，完全没有回答游击队是否得到农民支持的问题。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结为“战术上的错误”和“叛卖”。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在失败后不久的时期也许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绝不应从1965年的游击运动相当容易地被打垮一事中就假定说，秘鲁的一场土地革命就必然永远地被排除掉了。在秘鲁高原的地带，农民的不满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只要时候一到，这种不满的浪潮就能冲垮寡头集团及其美国盟友所建立起来控制他们的种种堤防。

1968年10月，秘鲁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剽窃了不少左派的政纲，从而可能推迟真正秘鲁革命到来的时日。但是当它终于到来，以解放生长于本大陆上那个最令人瞩目的阶级之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正如贝哈尔所说，它将成为美洲最深刻和最壮丽的一次革命。



第五部分

玻利维亚的悲剧

一 豪尔赫·马塞蒂和萨尔塔游击队

1967年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插曲，是开始进行全洲革命的深思熟虑的尝试。从一开始，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就曾是这一想法的热心倡议者。他曾经坐在哈瓦那他的办公桌后面，同拉丁美洲的许多革命家谈论达六年之久。他曾经注视着遍及拉丁美洲各国游击战运动的起伏，而且最后他终于决定：这是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巨大经验与威望投回到游击斗争的时候了。正如卡斯特罗在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的闭幕词中所说的那样：

“在我们流亡墨西哥期间，格瓦拉同志就已参加我们的行列，而且从第一天起，他就时常明确地表达下列意见，即当古巴斗争完成之日，他将在另一地方履行其他任务，而我们也经常对他许诺：任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任何情况都不会使我们要求他留在我们国内或者阻止他实行那种愿望、那种要求。而且我们完全忠诚地信守对格瓦拉同志的诺言。”^①

起初，他的设想是投向阿根廷，这在即使是象切那样民族主义意识不很浓厚的一些人，也会很自然地有此想法的。人们很难认为：他从不想到要在那个几乎资产阶级化到极点 的社会中去搞革命。^②有若干迹象暗示：在1963年豪尔赫·马塞蒂所领导的向塔塔加尔和萨尔塔进军的不幸的游击队远征中，格瓦拉曾经插手过。

豪尔赫·马塞蒂是阿根廷记者，曾于1958年到马埃斯特腊山

访问过菲德尔和切。随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古巴游击战的书，名曰《斗争的人和哭泣的人》。古巴革命以后，他被切邀请到哈瓦那，并帮助建立古巴新闻机构拉丁美洲通讯社。他于1961年辞职，据信大部分是由于他同拉丁美洲通讯社社内旧派共产党人之间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古巴人的嫉忌，因为他是阿根廷人，却当上了古巴新闻社的头头。

他经常抱有在阿根廷发动一次游击战运动的想法。他过去虽然是一个庇隆主义者，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同1959年在图库曼的乌图隆库司令的庇隆主义者游击战运动有任何关系。但在他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以后，他把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计划秘密返回阿根廷。

1963年6月，他在靠近阿根廷边境的一个玻利维亚农场内安身。同他在一起的有三个古巴人，其中有一个叫里卡多或叫帕皮，后来在格瓦拉的玻利维亚远征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同年9月，马塞蒂同一小集团人越过边境进入阿根廷的萨尔塔省。他的一伙称为“人民游击队”，他本人则以塞贡多司令的名义从事活动。^③他们的下落很少人知道。他们被警察渗透进去，绝大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6年1月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的闭幕式上的演说。

② 1959年1月在卡瓦尼亚要塞中同格瓦拉举行的一次有兴味的访问，多少弄明白了他对于古巴和阿根廷的态度。“我遇到菲德尔，并且立即向他表明：拥护他的见解和理想。我应募志愿加入他的队伍，不仅作为一名医生，而且作为从事正义事业的战士。早些时候，我曾经从我的本国逃出来，而不去向庇隆独裁政权作战。但是，青年人躲避其对于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一代的责任，就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我必须为此偿还我的欠债，而且我希望我已经在古巴把这项欠债抵消了。”——拉费尔·奥特罗·埃切维里亚：《关于一个革命的报道：从巴蒂斯塔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太平洋出版社，（圣地亚哥），1959年，第46页。

③ 这个故事引自里卡多·罗霍的书《我的朋友切》。罗霍认为马塞蒂决定把自己称作塞贡多（意即第二位的）司令，暗示还有一个第一司令亦即切·格瓦拉。其他迹象暗示这两个阿根廷人给他们自己起了军用化名，但格瓦拉以著名的阿根廷高卓人（南美洲一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马丁·费罗的名字为化名，马塞蒂的化名则为另一著名的高卓人塞贡多。里卡多的真名没有记载，这是令人惊异的，因为他的地位很重要，而且在1967年玻利维亚的远征中大多数古巴人后来都经证明是谁了。

部分人被俘获、拷打和枪决了。马塞蒂本人从没有被发现过，但他不是被枪杀就是死在丛林中了。

里卡多·罗霍认为：他们可能曾经希望同哈维尔·埃劳德的秘鲁游击队连结起来，后者在1963年5月的马尔多纳多港中死去多人。罗霍还指出：阿根廷当时的条件，不足以使游击战暴动得到成功。虽然军人在1962年推翻了文人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可是他们让大选在1963年7月中举行。获得当选的候选人是阿图罗·伊利亚，他被军人准许执政到1966年。这样，当马塞蒂希望开始游击战运动时，阿根廷有一相当温和的文人政府。^①

毫无疑问，格瓦拉是有志于在阿根廷干番事业的。这是他的本国，他熟悉它，而且也许有可能从马塞蒂的失败与错误中作出建设性的事业来。此外，他有古巴人里卡多的协助，后者曾经参与马塞蒂的远征计划，幸而活着下来，而且愿意再去第二趟。

但从开头起，格瓦拉强调斗争应具大陆规模。假若从古巴革命以后在大陆上起伏的游击战争，不是孤立的爆发，而是有统一指挥和协调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也许会大不相同。如果把阿根廷选作目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这种斗争应当沿着安第斯山脉迅速发展玻利维亚和秘鲁去，同时发展到乌拉圭与巴西的热带丛林，再从那里同早已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建立的运动连成一片。

1964年当切开始严肃地想到他本人有可能亲自回到实际战争中去时，情况看来很有希望。巴西的军事政变把南里奥格兰德州州长、前总统若奥·古拉特的姻兄弟莱昂内尔·布里佐拉的精力发挥出来了。布里佐拉逃亡到乌拉圭后，忙于详细研究发动一次游击运动的可能性，来反对把他的国家抢过去的一群上校匪

^① 1968年9月，古巴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哈瓦那举行集会来纪念豪尔赫·马塞蒂，我也参加了。由他的儿子为那幅描写他同切·格瓦拉在一起从事游击战的画像揭幕，并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重印着同阿根廷运动有关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个文件是马塞蒂在1963年7月9日从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营地写给阿图罗·伊利亚的公开信，另一封信是写给“农民同志”的，日期是1964年1月，寄自萨尔塔山中。

帮。^①在秘鲁,在乌戈·布兰科的运动垮台和哈维尔·埃劳德不幸死亡以后,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尔莫·洛瓦顿以及格瓦拉的姻兄弟里卡多·加德亚正在分别作出努力,以便在秘鲁高原上重振旗鼓。而在玻利维亚,自1952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权,于1964年11月被莱纳·巴里恩托斯和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所推翻。反对军事独裁者的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并非全是不现实的。

^① 正如本书开始时所说,关于巴西以及弗朗西斯科·儒里奥在穷困的东北部农民中从事的斗争,不在本书范围之内。关于布里佐拉,也只在这里草草提到。因此,把在1963年岁暮访问他时记录下来的他的看法的简短片断附在这里,也许是有用的:“他(古拉特)和我(布里佐拉)由于政治碰在一起,而且我们有相同的观点。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属于这样一种人,即想把农民茅舍的墙壁粉刷一下,让它们好看些,但仍旧把他们自己的高楼大厦保留给自己。他不知道这个高楼大厦应该成为当地合作社的总部。由于共产党和弗朗西斯科·儒里奥所造成的错误,我们曾经有过许多问题。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儒里奥有着很大的功劳,就是把居民中最受压迫的部分即农民唤醒了。并且我们相信:所有的错误将会被克服的。我们并不反共,我们欢迎任何爱国的巴西人为了其本国的解放而斗争。拉丁美洲问题必须用民族解放的话来讲。没有民族解放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革,因为贫困是不可能改革的。”——布里佐拉访问记,引自维克托·里科·加兰《巴西的危机》,《每月评论》,1964年4月号。

二 中 苏 分 裂

“要查问那些特别是自称‘亲华’派组织或政党之所以失败，未免太令人烦厌乏味了。在其组织的初期，由于它们的纲领和诺言，很能吸引一批忠诚而有决心的战士。可是不久，它们的工作方法，它们的政治路线上的喧闹的机会主义，对于它们本身在武装斗争上的公开路线的伪善的破坏，使革命阶层（主要是青年）把它们抛弃了。”

——雷吉斯·德布雷：
《革命的革命？》

1964年看来是对革命者提供许多机会的一年，同时也是中苏分歧愈益扩大达到无可挽回的破裂的一年。它对于古巴和整个大陆革命计划的冲击，几乎没有比这更富有破坏性了，因为拉丁美洲正统共产党中许多最富于战斗性的成员蜂拥到新的亲华集团中去。而那些曾经叫得最凶的支持卡斯特罗同志的人，现在只能听毛主席的声音了。早在1964年1月，秘鲁共产党已一分为二，其他共产党包括玻利维亚党在内也预期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

际此共产主义世界的艰难时期，对此是生手的古巴领导人，避免倒向任何一方。1964年8月，格瓦拉对一群访问古巴的美国大

学生解释道：

“中苏分歧对我们来说是最悲伤的事件之一。在这些分歧中，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我们试图运用我们的影响来解决它们。但现在它们正在发生着，我们把它们的情况告知人民，我们的党正在讨论它们。我们党的立场是不讲谁是谁非。我们选择我们的立场；正如人们在美国电影中所说的那样，‘任何相似纯粹是巧合’。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庄严地继续下去。”

古巴人并不公开支持中国人，但显然偏爱中国人的着重武装斗争，而不喜欢苏联人的和平共处愿望。他们自己的革命经验以及他们几乎每天对抗着离他们的海岸只有九十哩的美帝国主义，使古巴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经济上的需要又使他们紧紧地留在俄国阵营之内。然而，古巴人尽可能不表示自己的立场。当俄国人于1965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试图组织成为把中国人赶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讲坛时，古巴人首先不愿参加。最后，当他们前去出席会议时，他们拒不表态。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却远为紧密地委身于支持莫斯科。附属国被容许的独立程度，远为超过附属党被容许的独立程度。因此，当1964年11—12月间在哈瓦那举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来讨论对于莫斯科会议所采取的共同态度时，就已撒下了后来发展成为古巴同拉丁美洲各正统共产党之间冲突的种子。

在这次会上，他们的分歧暂时作了相当平和的弥补。古巴人同意反对“派别”活动，使正统共产党人感到满意，而反过来后者同意支持在若干指名的国家内的“革命战士”，从而满足了古巴人的愿望。^①

^① 文件参阅附录十一。

但文件上包含严重的矛盾。许多革命者“受到严重的压迫”而且实际上在从事战斗，这些人本来是各共产党正要予以支持的，但也正是这样的人在从事“派别活动”。就是这样，这个文件也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愉快，而且可能加速了上年就在全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分裂倾向。哈瓦那会议之后两个月，1965年2月，格瓦拉到了北京，他在那里受到显然冷淡的接待。会议派出的官方使者的遭遇并不比他好些。哥伦比亚共产党人希尔贝托·维埃拉曾经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哈瓦那会议指定了由九个拉丁美洲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把拉丁美洲各党建议通过双边或多边讨论，通过所有马列政党一次或多次会议来保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意见书交给苏共和中共。

不妨说(不谈细节)，这个委员会前往莫斯科会见苏共领导人，后者表示完全同意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案，并且说，如果可能，苏共将毫不迟疑在文件上签名。

在苏共赞同了决议案中各点之后，委员会前往北京，同中共代表团讨论这些观点。双方交换意见，并继续同毛泽东会谈，结果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下面立场：

(一)中共中央委员会不能终止公开论战；它不认为论战会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二)中共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拉丁美洲各国党决议案中包括的谴责派别活动部分，它不会放弃其下列决定，即支持它认为反帝和革命的人们，即使他们被开除出各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坚持：他们有权建立新党……

鉴于中国领导人绝对不同意拉丁美洲的决议，委员会决定结束它的工作，并在一个特别公告中将此行结果告知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并将副本送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

委员会。^①

中国路线代表的行动主义虽然经常具有吸引力，但古巴领导人在任何阶段从没有表示过赞同中国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强行破裂的决定。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远在中苏破裂以前就曾有过分裂的倾向，因而熟悉这种历史的负责的革命党人，决不愿意把这种倾向提升到新原则的高度。格瓦拉也不例外。并没有迹象证明他是反对1964年11月哈瓦那会议的决定的，虽然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却从没有被中国人的教条主义态度所吸引。正象菲德尔那样，他在他的著作中斥责俄国人和中国人双方进行令人厌倦的争吵，认为这只能使拉丁美洲的革命任务更加困难。

而且实际上，在玻利维亚，中苏分裂引起了古巴革命党人的主要问题。看来没有疑问，当马塞蒂在阿根廷从事游击运动的初期，格瓦拉就曾同各种玻利维亚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曾经解释道：

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前，切就曾同该党领导人和战士们建立了联系，号召他们帮助南美洲的革命运动。其中有些战士，得到党的允许，多年来在各种任务上同他合作过。党内分裂产生了新的情势，使得原来同他一起工作的战士们发觉他们自己分属于不同的阵营。^②

当马塞蒂于1963—1964年在阿根廷进行活动期间，古巴人里卡多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拉巴斯进出，同玻利维亚共产党保持接触。说实在话，由于中苏分裂所引起的在南美洲的许多争论之一是：亲

^① 希尔维托·比埃拉：《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会促进团结一致》，《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8年9月。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必要的序言》，见《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华共产党人责备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介入破坏阿根廷游击队的行动中。^①

1964年10月，在玻共分裂以前，切·格瓦拉同玻共战士奥斯卡·萨莫拉讨论了萨莫拉拟在共产党外建立一个革命团体来献身于武装斗争。萨莫拉本人留下了这次会见的记载：

“1964年9—10月，居住在古巴和欧洲的一群玻利维亚青年大学生一致同意开始战斗，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成立革命先锋队来求得玻利维亚的解放。我们认为：要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在现有玻共党的领导机构之外建立一支马列主义的力量。因此我到古巴去寻求援助。在那里，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表示他支持我们对于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腐化领袖的斗争。他是支持在玻利维亚的武装斗争的，认为武装斗争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同切〔他当时是古巴工业部长〕这些谈话中，他在任何时候从没有表示他有意要在玻利维亚或世界上任何地方领导武装行动。在同切谈话结束时，双方同意不把这些已经作出的决定告诉当时的玻共领导人，

^① 1968年7月，当时亲华玻共党〔按即玻共（马列）——译者〕头头奥斯卡·萨莫拉写给菲德尔一封公开信，题为：“古巴指导玻利维亚游击战，并对其失败负全部责任”。萨莫拉的谴责毋须太认真地对待，他具体谴责“修正主义者”对游击战运动的出卖：“阿根廷，塔塔加尔。阿根廷青年的游击战运动被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修正主义者出卖了。你〔菲德尔〕不顾你们驻拉巴斯大使馆递文以及直接在哈瓦那获得的充分情报，即蒙赫及其集团出卖了秘鲁游击战运动，竟亲自决定委托蒙赫和他的‘党’在玻利维亚领土上会见并训练阿根廷游击队。这个游击队刚越过边境就在塔塔加尔碰上阿根廷警察。玻利维亚政治警察的头子圣罗曼将军也从修正主义者那里获知这些事。当1964年我在哈瓦那同埃内斯托·格瓦拉谈话时，他同意我的看法，即对塔塔加尔惨事的负责人是蒙赫，因为他同玻利维亚警察有联系；格瓦拉自己的话是：‘塔塔加尔发生的事情是蒙赫出卖了阿根廷人，而菲德尔是知道这事的。’阿根廷修正主义共产党从蒙赫那里经常掌握游击队运动的情况，尽管根据协议：阿党不应该知道这些事，因为游击队是在阿共党外进行活动的。你以古巴共产党名义签字，还有马里奥·蒙赫和比托里奥·柯都维亚签字的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邀请，是同掩盖在塔塔加尔发生事情的需要密切相联的。”——奥斯卡·萨莫拉：“古巴指导玻利维亚游击战，并对其失败负全部责任”，《时代报》（科恰班巴），1968年7月14日。

而只告诉你〔菲德尔〕。”^①

可是，这种决定正是在拉丁美洲的中苏裂痕行将爆发为公开破裂的时候作出的，古巴人正拚命试图不站在任何一方。而在1964年12月，哈瓦那举行了所有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会议，旨在求得一种妥协。萨莫拉继续写道：

在1964年12月……在各修正主义共产党会议开预备会期间，你擅自把我同切的谈话告诉蒙赫，并且把在古巴的一群马列主义大学生置于修正主义党控制之下。你同意蒙赫的见解，即同我们的团体断绝一切关系，当时你把我们这一团体称之为“派别”。那就是你把修正主义会议的决议付之实施来反对马列主义力量的情况。你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因为是蒙赫本人于1965年1月在拉巴斯亲自告诉我的，他自吹“赢得了他的最大政治胜利”。

对待他的“派别”活动，格瓦拉本人是否就古巴行将采取的态度作了任何具体诺言，那是可以怀疑的。^②总之，1964年12月哈瓦那会议以后，古巴肯定地站出来反对分裂运动了。可是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萨莫拉及其亲华同事们服从北京发出的信号，大意是说：破坏“修正主义者”的最好途径是分裂他们的党。1965年4月在“二十世纪”大锡矿区举行的会议上，萨莫拉及其同志，由矿工

^① 奥斯卡·萨莫拉：《古巴指导玻利维亚游击战，并对其失败负全部责任》，《时代报》（科恰班巴），1968年7月14日。

^② （按照蒙赫的说法）1966年格瓦拉向正统共产党人马里奥·蒙赫解释道：“在我的一生中，关于看待人的问题上，我犯了少数错误，其中之一是关于奥斯卡·萨莫拉的。萨莫拉来到古巴要求援助，并且告诉我们：为了夺取玻共的领导权或分裂它起见，他将煽动派别主义。我说：我同意派别主义，只要它是同游击战争一并出现的。萨莫拉同意了。他回到玻利维亚，把他的诺言和他所接受的援助忘得一干二净，并把他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现在我们跟他和他的一伙毫无关系。”——马里奥·蒙赫来信，刊印在《现状报》（拉巴斯），1968年7月25日。

领袖费德里科·埃斯科瓦尔领导，建立了亲华的玻利维亚共产党。^①当时出席大会的，还有另一矿工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他后来又组成一个意见不同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徘徊于莫斯科与北京两党之间。

玻利维亚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显然被这种发展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立即召开会议来考虑“反党分子的分裂活动”。

按照玻共中央委员豪尔赫·科列·奎多的说法，有着“空前的大分裂”。它影响着有共产党组织的十四区中的六个区。在拉巴斯、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三个主要城市中，分裂的损害并不太大，但在另外三个区中，“需要时间来重新吸收和重新教育支持分裂者的一大群”。

对于1967年玻利维亚游击战运动的分析，若不强调中苏分裂对于玻利维亚革命左派的严重影响，那是不可能完整的。虽然如是，但在许多方面，玻利维亚所受的影响仍比其他国家为小，这是由于共产党只是许多自称拥有独一无二革命方案的政党之一。有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玻利维亚有它的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即革命工人党，它虽然象共产党一样是严重地分裂的，但它强烈地同情游击战。左翼民族主义革命党也有若干主张被人们视为革命的。它已经从旧有的执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分裂出来了；它的领袖胡安·莱钦虽然有点机会主义，但他并不忽视游击行动的可能性。有些迹象表明，他对在玻利维亚开展中的事情是有所领会的，但他不可能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予以帮助。

^① 按即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埃斯科瓦尔任第一书记，1966年他逝世后，由萨莫拉继任第一书记(参看《各国概况》第1000页)。——译者

三 拉巴斯的准备工作

“假若真有从某些外国或从本国遥远地区开始斗争的意图，显然必须从秘密成员小规模密谋运动着手，在行动时毋须群众支持或被他们知晓。”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游击战》

1965年4月，格瓦拉从古巴“失踪”了。在他于1966年初返回古巴来计划拉丁美洲革命以前，他在刚果耽了几个月，也可能去过越南。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并使亚、非、拉革命领导人聚在一起的三大洲会议，更促进了革命观念。格瓦拉本人没有出席会议，但许多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领导者出席了，而且看来古巴人对他们施加了不少压力，要他们认真担当支持革命战士的任务，因为他们于1964年11月在哈瓦那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已经这样许诺过了。

在古巴设计的开始大陆革命的原来计划，包括：格瓦拉返回阿根廷，使马塞蒂撒下的游击战余烬复燃，同巴西的布里佐拉和秘鲁的“中国人”密切合作，并利用玻利维亚作为避难所和训练基地。^① 1966年初，路易斯·德拉普恩特的游击队运动被歼灭了，但

^① “中国人”——胡安·巴勃罗·昌格是秘鲁人，他与1965年以及更早的秘鲁“民族解放军”游击战计划有关系，但并没有参加战斗。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巨大能力和热忱的人，他相信仍有足够的残存者并可招募足够的新的志愿人员来复活游击运动。在原来的计划中，玻利维亚处于次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缺乏现成的当地干部去组织游击战争。虽然如此，仍要玻利维亚共产党人在怎样进行具体计划来促进玻利维亚的革命的问题上开动他们的脑筋。

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曾在古巴出席三大洲会议。五个月以后，1966年5月，他又到那里并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对这次会见留下如下记录：

1966年5月在古巴为我安排了一次同菲德尔·卡斯特的会见。在会见过程中，他在夸奖我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后说道：与其找别人，他毋宁要求我协助保护一位我们双方都知道是优秀革命者的同志通过玻利维亚。这位同志有一切权利返回他的本国，菲德尔要我亲自选择四个可靠的同志保护他过境，如有可能，以后跟他一起去。我同意他的请求，他要我保守秘密。然后他提出对玻利维亚共产党人提供无条件的援助，并说他赞成由玻利维亚人进行玻利维亚革命；他许诺不插手玻利维亚的内部事务，并把那些在古巴受训而现在想要回到本国的大学生留下来。我感谢他这一切。

当我回国后，我向书记处汇报了这种要求以及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也汇报了提供的援助。^①

除了提供四个人而外，还要求蒙赫“在巴西事务上同布里佐拉取得协调”。^②

^① 1968年7月15日马里奥·蒙赫写给玻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刊印在《现状报》（拉巴斯），1968年7月25日。

^② 《庞博日记》，1966年9月22日。这一日记刊印在丹尼尔·詹姆斯所编《切·格瓦拉的全部玻利维亚日记及其他俘获文件》，斯太因与台书店，纽约，1968年。关于这一日记的问题是迄今只用英文刊印。刊印在《现状报》上的西班牙文本，我认为是从英文本转译而不是西班牙文本原文。

如果我们想起，蒙赫在这次哈瓦那旅行期间接受两万五千美元作为促进玻利维亚革命之用^①，也许会有助于说明蒙赫随后不正派的态度。玻共从来不很富裕，蒙赫之所以同古巴人在一个他不同意的计划上合作，多少是由于他不得不依靠古巴的资金。从共产党人观点看来，经常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古巴人也许会选定通过玻利维亚其他革命团体来开辟他们的活动。

接着蒙赫对古巴的五月旅程之后，里卡多被送到拉巴斯去，会同蒙赫提供的四个玻利维亚人，开始组织计划中大陆斗争的玻利维亚方面工作。看来在任何阶段玻共都没有被告知哈瓦那计划的细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切·格瓦拉将要成为这个整体计划中的组成部分。

1966年5月至7月间某一时候，基本战略变更了。是玻利维亚而不是阿根廷，选作“具有最好条件”的国家。^②因此玻利维亚将成为大陆革命的总部。原定在阿根廷开始斗争，然后北向发展到玻利维亚，现则决定在玻利维亚开始，再往北发展到秘鲁。除了玻利维亚似乎要比阿根廷更可作为明显的选择地点这一事实而外，很清楚，古巴人极难在阿根廷找到可能开辟一个游击中心的任何团体。

有些迹象表明，秘鲁人曾经希望把优先权给秘鲁。当计划的变更告知“中国人”时，他显然感到失望。可是古巴人意识到：1965年秘鲁游击战垮台以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获得解释。由于不仅有叛卖的暗示而已，显然古巴人认为建议格瓦拉从秘鲁开始活动是不适当的。^③可能这也说明，为什么宁愿选择玻利维亚，而不选象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游击运动已经站住脚跟。除了格瓦拉显然宁愿在某些新地方开始活动而不想插入现有运动的区域，在白手起家的运动中叛卖的危险或许要略小于站稳了脚

① 《庞博日记》，1966年10月24日。

② 同上，1966年9月28日。

③ 同上，1966年8月6日。

跟而且又被很深地渗透了的运动。

在玻利维亚运动失败以后，许多人怀疑玻利维亚是否宜于进行成功的游击斗争。但在当时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善的选择。雷吉斯·德布雷于1965年写道：“玻利维亚是主客观条件结合得最好的国家。这是南美洲内社会主义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唯一国家。”^①

在第一次伏击战以后十天，我于1967年4月为《前卫报》写稿时，对于为什么选择玻利维亚，试作说明如下：

假若你是一个拉丁美洲游击队领导人——譬如说，具有古巴经验、绰号叫“切”的人——你将选择哪个国家作为你的革命新基地呢？委内瑞拉不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点。反恐怖主义部队的力量是很强的，就在复活节前，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何塞·萨埃尔在其父亲做省长的省内被杀害了。危地马拉太小了，不够条件成为实际的“第二个古巴”，而且那里的领导也遭到惨祸。一个关键人物路易斯·图尔西奥斯于去年年底在一次车祸中神秘地丧命。在哥伦比亚，暴力具有本国独特的色彩；要把它转上真正的革命轨道是很困难的。秘鲁的游击队渐渐消失了，其中一个领导人死了，另一个在禁锢中。

那是直到上周拉丁美洲一切游击队活动的全貌。只要看一看地图，细心的观察者就会见到：有一个国家，假如各种条件都正常的话，游击队可以从一个价值无比的战略基地进行活动。

受人尊敬的圣地亚哥报纸《信使报》在最近一篇主要文章中解说道：“玻利维亚为游击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它的领土包括最难进入的地形，在山地和高原以及热带森林区都是

^①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还有《经济学家》杂志（1967年8月12日）写道：“如果这真是非德尔·卡斯特罗的‘新越南’之一，这至少在心理上是一次潜在的胜利。没有一个南美洲国家要比玻利维亚处于更恶劣的情况来对付游击战争。”

如此；它在物质条件上的落后，使居民易于接受煽动宣传；现代交通的缺乏，阻碍了政府军事力量的行动。而且游击队可以从玻利维亚渗入拉丁美洲的心脏，因为它同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秘鲁和智利交界，而越过边界的区域是孤立而难以到达的。”

这份报纸虽然避而不说，还可以加上下列条件：玻利维亚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只有三十镑，这个国家单靠出卖锡作为一种不稳定的收入来源，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印第安人。相同比例的人口是不识字的。确实这是革命游击战的一个天堂。

……假若游击队能够自行支持的话……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创建切·格瓦拉经常梦寐以求的永久性“革命中心”。在南美大陆上的这样一个基地将使委顿的非德尔主义者的精神复活，远不止玻利维亚本国而已。^①

同年7月，两个古巴人庞博和图马到达拉巴斯，带来了改变计划的更多细节。^②要说服玻利维亚人在玻利维亚而不在阿根廷革命是一项艰苦的斗争。两个古巴人一到就立刻同里卡多接触，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讨论。首先，他们拿新计划同蒙赫根据5月间菲德尔的要求而配备的玻共四个成员讨论。四人中最重要的是一对兄弟，科科·佩雷多和因蒂·佩雷多。四人赞成发动一次游击战，但他们很快就透露给古巴人：玻共领导方面对这计划缺乏热忱。

但在7月28日那一天，里卡多同蒙赫举行了一次会见，会后他相当乐观。他在写给格瓦拉的报告中说：蒙赫“似乎已决定担负

① 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下一次革命》《前卫报》，1967年4月6日。

② 庞博是哈里·比列加斯·塔马约的绰号，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图马是格瓦拉很亲密的同志，迄未查明其真实姓名。

任务并建议按计划一道进行,虽然他建议与山地斗争的同时,在首都举行一次起义来唤醒人民。为了山地上的斗争,他许诺把他最得力的二十个人同他一起开始工作”。^①

可是里卡多认为这是应该让蒙赫知道格瓦拉本人将参与这个计划的时机了。而庞博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同玻共讨论中的若干点,只能等待格瓦拉到达后亲自加以澄清。

一星期后,蒙赫的外表上的热忱全部消失了。当里卡多向他要求除了原已许诺的二十人之外再增派人员时,蒙赫回答道:“什么二十个?”并且说“他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委员发生了纠纷,他们对他施加压力,不要介入武装斗争,他们感到最近的选举〔7月〕是一个成功,因为他们得到三万二千票,大约比他们以前所得票数增加一倍”。庞博悲哀地评论道:

从我们所取得的没有多少的进展中,可以看出有些事是渺茫的;更确切地说,关于参加斗争的决定是很不确定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僵局;我们面临着对此事没有多少热情的问題。事实上姆比利(即里卡多)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仰人鼻息;可怕的漠不关心。只有我们从事一切组织工作,而他们则全然不帮助我们。^②

8月19日蒙赫和里卡多之间又有一次会见。蒙赫不但不拿出额外的人,实际上甚至威胁说要抽走业已同古巴人一起工作的四个人。又一次看来主要问题不在蒙赫本人,而在于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委员公开敌视任何种类的游击斗争。

正当与玻共讨论的同时,古巴密使也同计划中的秘鲁游击中心的组织者经常保持接触。“中国人”在拉巴斯的代表是一位秘鲁

^① 《庞博日记》，1967年7月30日。

^② 同上，1967年8月8日。

左派，名胡里奥·达格尼诺·帕切科，以“桑切斯”知名。7月底，他先被告知业已作出的重大战略决定，即先从玻利维亚开始斗争，然后在秘鲁进行。曾经作出安排，即“中国人”团体中某些人应按原定计划送至玻利维亚接受训练。可是在新的计划之下，秘鲁新兵只能希望主要在实际战役条件下受训，并将参与在玻利维亚发动的战争。随后他们将同若干古巴人一起撤出，投身于计划中的秘鲁游击中心。“中国人”对于首先发动玻利维亚游击中心并不乐意，但由于古巴人掌握钱袋的绳子，他们的决定只能算数。

除了桑切斯与蒙赫而外，在拉巴斯的古巴组织者也同莫伊塞斯·格瓦拉保持间接的接触，他是奥鲁罗区矿工领袖，领导着从萨莫拉和埃斯科瓦尔的亲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一小集团意见不同的共产党人。看来莫伊塞斯之进入古巴计划大部分是由于他早已同“中国人”的秘鲁团体保持联系。无论如何，桑切斯（“中国人”的代表）曾与莫伊塞斯有交往，其间这位秘鲁人试图探明这位玻利维亚人怎样计划把他自己公开表示的武装斗争信念付诸实施。8月23日，当古巴人同蒙赫以及正统共产党人的关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有可能要更偏重于依赖莫伊塞斯·格瓦拉。但是没有人能够十分确断他的才能或忠实可靠程度。

庞博在那一天的日记中评论道：

我们讨论了使用〔莫伊塞斯〕格瓦拉的想法一旦获得批准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桑切斯建议不把指定的行动和集中地点告知〔莫伊塞斯〕格瓦拉，等等。他提议最好对莫伊塞斯的组织来一次实地考验，虽然这也许要破费一点钱。为此目的，要求他把他的手集合在科恰班巴，准备起义。将给他十五天的时间去做这事，并要他算出这需花多少车旅费、房租等等。这样，我们将肯定，他是否真有随时可以起义的任何人手。

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关于莫伊塞斯·格瓦拉的是否可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里卡多认为他是“一个制造麻烦的针刺，不可能真正起义造反”。桑切斯则认为他有“一些价值”。庞博最后下结论道：

我们必得承认他已经说出他的决定，即公开为了我们的路线——游击战而斗争。他手下的人是一群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矿工）、农民，是献身于战斗的人们。几乎全部战士都打定了主意准备参加战斗，共有二十个人。

如果不是有下列事实，即在9月初，另一密使帕乔从古巴的切那里携带新的指示到达拉巴斯（帕乔的原名是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蒙特斯·德奥卡），莫伊塞斯·格瓦拉的可靠性问题就不至成为这样重要的焦点。首先，切意在更多地依靠莫伊塞斯·格瓦拉而少依靠共产党本身。其次，他的最初的游击中心，要在贝尼河开始，它位于玻利维亚的北部，靠近秘鲁，而不在该国南部靠近阿根廷和巴拉圭之处开始。第三，雷吉斯·德布雷这位年轻法国人（曾在哈瓦那任哲学教授，1964年访问过玻利维亚）正被从哈瓦那派到玻利维亚来审查游击中心地址是怎样选择的，并确定莫伊塞斯·格瓦拉的忠诚可靠性。

这个消息使早已在拉巴斯的古巴人难于接受。首先，里卡多感到他是亲自与正统的共产党人联系的人。他的一切交道都是同他们打的。他们并不是不合作的，而他对于莫伊塞斯·格瓦拉以及他的一伙几乎一无所知。其次，早已作出行动区的选择：古巴人已经决定，圣克鲁斯区较之贝尼河更合适，而且7月间科科·佩雷多早已在尼阿卡瓦苏河上购置了一座农场。

拉巴斯的古巴人被哈瓦那的新命令弄慌了手脚，准备了一个备忘录给切〔格瓦拉〕，讲了迄今为止他们活动的概要：

我们要让你知道,为了组织这场舞蹈,我们是同玻党和埃斯塔尼斯拉(即蒙赫)建立我们的一切关系的。……把磋商的优先权给〔莫伊塞斯〕格瓦拉集团,使我们处于困难的境地。此外,由于在这之前的种种事情,我们感到这样做并不对头,因为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统一的中央指挥机构,其中将包括玻党和〔莫伊塞斯〕格瓦拉两方面的人们。^①

古巴人在向格瓦拉的这个报告中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尼阿卡瓦苏区。这是在热带,有人居住,宜于筑洞,而且在经济上是重要的:

尼阿卡瓦苏这块地产位于圣克鲁斯省的西南部,座落于植物茂盛的山区,但这地区一般缺水。这块地产本身却水源充沛。尼阿卡瓦苏处于一个峡谷地区,东边是皮里伦达斯山,西边是印加瓦西山区;它们的最高峰就是它的东西边界。这些山脉绵亘向南,同阿根廷的萨尔塔山脉相连。这个农场的北面同伊里皮蒂地产相接,该地产无人占用,产权也属于伦贝尔托·比利亚,就是把农场卖给我们的那个人,他住在靠近拉古尼亚斯的叫作特拉萨斯的农场,离尼阿卡瓦苏约二十公里;南面同西罗·阿加拉尼亚斯的农场相接,他是饲养猪的人。地产距离圣克鲁斯—卡米里公路上的圣克鲁斯二百五十五公里,比较孤独。不用进入拉古尼亚斯就可以到达这座农场;如果走古铁雷斯以南约六公里的一条小路,拉古尼亚斯离尼阿卡瓦苏二十五公里。

农场共一千二百二十七公顷,并有大量森林。在这基地上,合法的掩护计划是养猪,稍后建立锯木厂。

^① 《庞博日记》,1967年9月10日。

重要之点是，往北可以通过山地崎岖和树木茂盛的区域到达巴列格兰德；从此以往树木渐稀。往南可以通过类似性质的地形到达阿根廷。^①

但是，远较尼阿卡瓦苏庄园的位置使古巴人更感头痛的是共产党人的问题。雷吉斯·德布雷已于9月到达，除了侦察贝尼河以审查在那里建立游击中心是否合适外，他也同亲华的共产党人进行接触。这事不久就传到马里奥·蒙赫的耳朵里去，在这个月中旬他提出要会见里卡多请求解释。他告诉古巴人他不喜欢德布雷似乎将同亲华分裂派结交订约。

古巴人有些生气地对蒙赫说道，他们不知道德布雷的使命，但他们也根本不喜欢玻共的活动。庞博在他的日记中冷酷地写道，“我们借此机会指出几桩事情”：

1. 他们对游击战争显得没有信心。2. 他们并不把自己组织起来；不如说，他们认为游击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们补充说他们正集中全力准备总起义，而把游击战争看作是次要之事。我们问他们迄今做了些什么，他们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坐等他们二十年。^②

古巴人和玻共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极度紧张程度，以致蒙赫——无疑是在中央委员会压力之下——试图取消他早已作出的诺言。10月初从古巴的切·格瓦拉那里传来澄清的信息，似乎完全改变了帕乔带来的决定：

我们对于〔莫伊塞斯〕格瓦拉是一点儿也拿不准的。我们

① 《庞博日记》，1967年9月11日。

② 同上，1967年9月24日。

只是同他合作而不受他约束。不要为了我们、埃斯塔尼斯拉〔蒙赫〕同〔莫伊塞斯〕格瓦拉之间的政治关系而烦恼。重要的事情是保证具有必要的条件。

现有的农场尼阿卡瓦苏是好的。另外弄一所，但不要转移武器前去直到我通知你为止。^①

到此阶段，切·格瓦拉似乎渴望：在他到达玻利维亚以前，不要作出同玻共关系的最后决定。他到达日期定为 11 月初。

^① 《庞博日记》，1967 年 10 月 4 日。

四 尼 阿 卡 瓦 苏

1966年11月初，一个乌拉圭商人阿道弗·梅纳·冈萨雷斯到达圣保罗，他是从西班牙坐飞机来的。他道经巴西到拉巴斯，在那里他从巴利恩托斯总统的新闻情报局长冈萨洛·洛佩斯·穆诺斯手里搞到一张证书，声称他是“‘美洲国家组织’的特使，专事研究与搜集存在于玻利维亚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情报的”。证书还要求一切国家机关与私人“同阿道弗·梅纳先生合作，以便利他的调查研究工作”。

手持这件文书，梅纳这位秃顶而戴眼镜的中年人，带着几个同伴，继续前往位于寒冷的安第斯高原与东玻利维亚热带之间的玻利维亚第二大城市科恰班巴。在这里，梅纳同一个长着浓密的小胡子的大学生豪尔赫·巴斯克斯·比亚尼亚取得联系。巴斯克斯当时的年龄近二十八岁，是玻利维亚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温伯托·巴斯克斯·马奇卡多的小儿子，曾在德国读过几年书。他是玻共的战士。

巴斯克斯提供了两辆在玻利维亚东部很多的日本丰田牌吉普车，他们四人出发驶行了两天到达玻利维亚东南部一个小镇拉古尼利亚斯。该镇有一中央广场，通向几条街道。镇上建筑物给人深刻的印象，虽有不同程度的朽烂。它们的繁荣时期是在二十年代，当时该镇是一个重要的牲畜饲养区的中心。但到三十年代，由于玻利维亚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繁荣终止了，该镇从此陷于萧条状态。拉古尼利亚斯衰退的一种原因是，在该镇往南坐吉普车一小时半路程可以到达的卡米里的玻利维亚石油工业发展

了。卡米里这个约有两万居民的兴旺市镇，有着拉古尼利亚斯缺乏的一切繁荣与活力。卡米里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伯托·巴斯克斯·马奇卡多的远见，他同一群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者于三十年代晚期建立了玻利维亚石油矿藏管理局。

一过拉古尼利亚斯，豪尔赫·巴斯克斯离开阿道弗·梅纳，将一辆吉普车藏在路旁，驾驶另一辆到他购得的农场去，沿着沙路驱车往北一小时半，靠近尼阿卡瓦苏河的岸边。尼阿卡瓦苏周围区域的特色是数以百计的峻削的丛山，这些丛山被满覆着繁茂热带植物的深而不能穿越的峡谷所分离。巴斯克斯的农舍名曰“卡萨卡拉米那”，是盖有波状铁皮屋顶的两间小屋。

巴斯克斯把他的来访者留在屋里以后，再沿沙路回到拉古尼利亚斯，把阿道弗·梅纳以及另一吉普上的东西载上车带回来。这样复杂的安排是有它的必要的，因为从拉古尼利亚斯到“卡萨卡拉米那”的半路上，另有一所农场叫“埃尔平卡尔”，它的主人西罗·阿加拉尼亚斯对于豪尔赫〔巴斯克斯〕的活动非常怀疑，认为他正从事古柯硷的不法制造。玻利维亚的这一区域，离巴拉圭边境不到一百五十哩，是以便于走私者出入而著名的。太多的吉普车上下旅行于这条到“卡萨卡拉米那”的路上，也许会使西罗·阿加拉尼亚斯相信其中有一宗有利可图的买卖，他也许可以插上一手。

当第二次驱车回“卡萨卡拉米那”时，阿道弗·梅纳告诉豪尔赫〔巴斯克斯〕，他实在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从1965年4月他从古巴不见以后，似乎已从世界上消失了。

〔格瓦拉在那天晚上他的日记中刻薄地评论道，〕当比戈特^①知道我是谁时，几乎把车子驶出峭壁，让这辆吉普搁浅

^① 比戈特在西班牙语中是“小胡子”意思。这是豪尔赫·巴斯克斯的绰号。他也以喽罗知名。

在悬崖边上。为此我们必须步行约二十公里，到达农场时已是午夜以后了。

到达尼阿卡瓦苏农场后，格瓦拉致力于若干决定性的严酷革命任务。虽然他的副手已经完成了若干初步的活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同阿根廷人和秘鲁人的联系还只粗具规模，而游击队的城市联络网还有多方面须待部署。^①

在格瓦拉到达玻利维亚以前，建立秘鲁游击中心的计划早已在准备中。“中国人”曾经兴奋得格格咬牙要在几个月以前发动游击战，他现在正等待会见切来协调计划。11月底，里卡多带消息说，“中国人”就在这个国家，并急于要送二十个秘鲁人到玻利维亚游击中心来受训。

“中国人”于12月2日到达营地。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决定他应回古巴报告情势。并同意他应得到些武器，五个秘鲁人应派到玻利维亚与秘鲁交界处的的喀喀湖对岸的普诺区，以便安排把武器偷运过境。几个月内，在玻利维亚游击队开始其活动以后，“中国人”将派两个、也可能五个秘鲁人到尼阿卡瓦苏受训。

“中国人”在去过一趟哈瓦那之后，1967年3月回到尼阿卡瓦苏，按原约定带来两名秘鲁人。格瓦拉在他的3月20日日记上评论道：

我同“中国人”作了预备性会谈。他要求拨给每月五万美元，共拨十个月，而哈瓦那方面曾经关照他就此事同我洽谈。……我说我在原则上同意，但他们在此后六个月内必须开

^① 在格瓦拉的日记中，没有提到同布里佐拉和巴西人取得接触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巴西游击中心已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了，时间约与玻利维亚相同。但是一星期后，巴西的游击战士们只得放弃。他们染上了黑死病，被迫投降了——这是在南美洲丛林中可能遭遇的自然危险的一幅可怖图景。

始战斗。他认为他能部署十五名战士在阿亚库乔区归他指挥。我们还同意他现在就可引领五名战士前来，以后再派十五名；他们将被遣送前来，接受武器和战斗训练。

格瓦拉计划给他三万元，这足以资助他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开始游击战争。格瓦拉写给菲德尔的字条中多少挖苦地说，“中国人”似乎不很象一个游击队领袖，但那是他的问题。^①

为阿根廷游击中心所作的安排较少进展。古巴人用来组织一个阿根廷基地的主要中间人，是德国出生的阿根廷女子叫塔玛拉·本格，以塔妮亚知名。她已被安置在拉巴斯好些时日，并且似乎是在组织玻利维亚游击中心的预备阶段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格瓦拉在12月记道，他有意派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同两个左翼阿根廷人联系，一个是记者霍萨米，另一位是画家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塔妮亚是要去联系他们并要把他们带到尼阿卡瓦苏来讨论的。但到1967年1月底还没有他们的消息。

随后塔妮亚确曾同霍萨米联系过，但他不能前来：

塔妮亚进行了联系而且人们来了，但照她的说法，他们让她坐在他们的吉普里一直开到这里；她原计划耽上一天，但事

^① 这张字条是格瓦拉用“密码与隐色墨水”写给菲德尔的。它是由检察官伊里亚脱上校在审讯雷吉斯·德布雷时读出的，刊在1967年11月14日《现状报》上。

^② 经常有人硬说塔妮亚是一个俄国间谍。有些故事甚至暗示她是格瓦拉的情妇，并且她要为出卖游击队负责。这些责备毫无证据，而且似无疑义，这些故事是（美）中央情报局捏造的。原来的故事刊载在德文报纸《星期日世界》上，这张报纸以耸人听闻著名，而不是严肃认真地报道新闻的，它旨在透露于1961年从东德叛离的一个名叫京特·梅内尔的人，如何招募塔妮亚为特务来侦察格瓦拉的活动。即使这在1961年是真实的（这看来很不可能），也难以因此得出任何有确实根据的结论说：塔妮亚在1966—1967年也有相同的行为。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曾经向我解释说，他如何被在拉巴斯的中央情报局联系人诱导到注意这篇文章，并如何帮助把它刊载在玻利维亚报纸《日报》上。《纽约时报》的国务院记者本杰明·韦尔斯也印载了它，而丹尼尔·詹姆斯在伦敦《观察家》报又拾起这牙慧，而且以高度耸人听闻和不正确的文章把它传开了。说塔妮亚是格瓦拉情妇的故事，似乎是由詹姆斯捏造的。

情变得复杂化了。第一次霍萨米不能耽误，第二次甚至不同我们接触，因为塔妮亚在这里。^①

可是无论如何，布斯托斯曾于3月初来到尼阿卡瓦苏，格瓦拉同他作了下列安排：

我建议现在他应当作为在霍萨米、赫尔曼和斯坦波尼领导下几批人之间的联络员，而且他要派送五个人到我这里来开始训练……如果他们接受的话，他们应当在阿根廷北部开始进行侦察，并送给我一份报告。

如果说，格瓦拉初抵玻利维亚时，阿根廷和秘鲁游击中心还处于未开展的状态，那么玻利维亚游击中心本身也是一样——尤其是它的城市地区组织更是如此。格瓦拉于12月2日写道：“联络网还在其幼稚阶段”，而在1月初，游击队还只在讨论城市联络网的初步安排。年底在尼阿卡瓦苏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把任务分配给已经在拉巴斯同古巴人工作的秘鲁联系人桑切斯，并决定温伯特·巴斯克斯（豪尔赫的兄弟）和另一玻利维亚人罗多尔福·萨尔达诺也应留在拉巴斯。运动的司库是一个玻利维亚女子洛约拉·古斯曼，是一个共青团员。她也要耽在拉巴斯，但她的姊妹要驻在卡米里。另一个联系人要放在圣克鲁斯，还有一个则安在苏克雷附近。

格瓦拉显然对于早先作出的安排不很中意，1月15日他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他耽在营地给城里的干部起草一些指示。1月22日写完了。^②几天后洛约拉到达营地，并将文件带回拉巴斯。

^① 《格瓦拉日记》，1967年3月21日。

^② 这些长篇指示是为了组织一个城市联络网来支持农村游击战而发的，它们业已在哈瓦那公布，并载入墨西哥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版本中。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它们被译成英文。

比所有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游击战本身招募人员的问题。到年底，尼阿卡瓦苏游击中心已经得到十七个古巴人的全数补充，这些人都是格瓦拉的朋友，愿意同他一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努力来促进大陆革命的。要找到玻利维亚人是更困难些，这是格瓦拉在头几个月里经常挂怀的事。诚然，他有一次曾经写道，有三十或四十人的基地就可以开创一个游击部队，但除非他能够得到更多的玻利维亚人，这个游击中心将从一开始就很危险地依靠古巴人。有些迹象表示，古巴人在那里的用意主要是承担训练和顾问的职能，而尼阿卡瓦苏基地是用作训练游击战士的基地，随后这些战士将分散到秘鲁和阿根廷的游击中心去的。

招募玻利维亚人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下列事实，即格瓦拉不依靠城市中的主要政治组织。事实上有些共产党干部随时准备而且等待着参加游击队，但除非得到蒙赫发出“去吧”的指令，他们就无法行动。而除非在蒙赫与格瓦拉之间举行一系列政治讨论之后，这又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格瓦拉依然不能找到玻利维亚人。他在12月底写道：“玻利维亚人是好的，虽然人数很少。”一个月以后的结束语还是旧调重弹：“使玻利维亚战士加入的问题，成为比我们的其他计划较难完成的问题。”情况一直依然如故，事实上游击队力量经常是不足的。

五 新的“穆里略呼声”^①

“中午，我们祝酒干杯，标志这一个日子的重要历史意义。我作了答辞，指出这一时刻标志着大陆革命新的‘穆里略呼声’。我强调说明，我们的生命同革命这件大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1966年12月31日

在尼阿卡瓦苏扎营的开头六个星期里，格瓦拉日夜操心的大事，是蒙赫和玻共的态度。除非取得共产党人的合作，关于未来的大陆斗争就很难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一切事情都搁起来了。兴奋得格格咬牙地要在秘鲁开始游击战的“中国人”之到达尼阿卡瓦苏，使格瓦拉感到有些为难，但如不把事情同蒙赫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蒙赫本人曾经留下在1966年最后几个月的不安情况的记述。他认定尽管他正进行准备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争，古巴人和雷吉斯·德布雷实际上却正在绕过正统共产党作出计划：

^① 佩德罗·穆里略是拉美独立运动最早领袖之一，当时玻利维亚地区的土著。1809年丘基萨卡、拉巴斯居民推翻地方殖民政府，成立土著控制的委员会。西班牙殖民军进行镇压。穆里略领导抵抗，不久失败被捕，据说临刑前疾呼：“我死了，但没有人将能扑灭我已燃起的火炬。”——译者

在8月和9月选举以后，正当我们准备作出我们的有效帮助，并挑选和训练我们的军事部队以及建立党的兵力之际，我感到在国内别处另有计划正在进行，在党的组织以外正建立起一个密谋，并且我正从各方面得到错误的报道。一个欧洲籍知识分子周游国内，更增加了我的疑惑。最后我面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密使并告诉他，我不同意在国内正在进行的事情，我决不容忍外国干涉。我指出这破坏了菲德尔提出的协议，我还说我将把这一切提请玻共中央委员会注意。密使答道，并没有破坏协议，他们纯粹是在采取预防手段，至于欧籍知识分子的旅程则与此无关。

10月，我把我认为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告诉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派一代表团到古巴去讨论情势，并把我们的立场让他们知道——玻利维亚革命应由玻利维亚人来进行；我们建议召开一次拉丁美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们也重申我们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①

蒙赫被邀请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他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在回国途中偕同著名玻共党人豪尔赫·科列·奎多访问哈瓦那。

12月，我到达哈瓦那，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了另一次谈话，并告诉他我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心。他答道，对于我曾经与之谈话的密使的态度表示歉意，并再一次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见解，即玻利维亚革命应由玻利维亚人来进行。我告诉他我肯定要过问这件事，并且使他铭记召开另一次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的需要。然后，他邀请我同埃内斯托·切·

^① 马里奥·蒙赫来信，载在《现状报》，1968年7月25日。

格瓦拉同志会谈一次，他说后者是在靠近玻利维亚的一个国家内。稍后将告诉我会见的地点，总在靠近边境的某处。我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至于建议中的各国党会议，他说这要看同格瓦拉达成的任何议协而定。他再次告诉我要把谈话保密，而且只能在事后谈到它。它批评我没有把以前的会见严格保守秘密。

这次讨论以后，菲德尔给格瓦拉发了下列电报：

Czo 第 24 号

亲爱的拉蒙：斯塔尼斯拉〔蒙赫〕的访问是要求我们澄清：帕皮〔即里卡多〕的行动是指向国内或指南面，同我的协议是不是帮助南边而将国内计划留归他掌握。他也一再埋怨帕皮，说帕皮没有履行协议来帮助他进行他的计划。这种情况造成混乱，科列并借此压斯塔尼斯拉，要后者一经通知随即离党。他〔蒙赫〕横竖正想这样做，因为他正在计划率领他的军事集团离党，并且举行起义，不同党妥协，或至少使党保持中立。他看到：如果他要依靠党，就不会有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他在与你谈话之前暂缓离开党。他认为同你联合，还是以总书记地位而不是以党外身份为好。你要从现场分析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方式。我提议他应同你会谈，因为你是这次行动的战略领导人，而这次行动的开端是无法确切预见的。意外的事件可能导致行动不在南方而在斯塔尼斯拉的地区内开始。一提到你的名字，给他深刻的印象，他断然地答道：他将在任何地方追随你，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暂定会谈日期为 12 月 25 日至 30 日之间；帕皮将规定确切的日期与地点。为了给他参考，我告诉他会见将在国外。我不能说斯塔尼斯拉的最后态度究竟是什么，但他也许可以引

进些优秀的人。……送这信的人是斯塔尼斯拉所派并受因蒂控制的十人小组的头头。其余的人将在12月底离去,看你能否把他们安排进去。顺致问候。莱切,12月14日。①

近1966年12月底,蒙赫回到拉巴斯,然后由里卡多、塔妮亚和秘鲁联系人桑切斯伴同,来到尼阿卡瓦苏。他同格瓦拉的会见是不幸的。宣传拉丁美洲进行游击战的好处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得不同一个二、三流的共产党官员争论。但把他们的力量相比一下,争论的双方是多少相等的。格瓦拉有想象力和神秘性,并有二十个人早已立足在丛林中。他还有经费来源。而蒙赫控制着党的机构。②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中,共产党人最后否决了那种使古巴革命家得以掌权的论点。而且它标志着在拉丁美洲以及世界政治中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看到共产党对左派统治权的告终。

格瓦拉曾经对于所讨论的问题作了如下简洁有力的说明:

同蒙赫的谈话是从一般性问题开始的,但他马上转到他的根本前提,用三点基本条件来概括:

(1) 他将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但会争取党保持中立,并将

① 全文加上照相本刊载在《日报》(拉巴斯),1967年10月31日。“拉蒙”是格瓦拉的密码代号(是从胡里奥·科塔萨尔一篇短篇小说中取来的);莱切是非德尔的密码代号。

② 庞博在他1966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说明了格瓦拉对于蒙赫的财政控制:“蒙戈[切]告诉我们他预备向埃斯塔尼斯拉(蒙赫)摊出的论点的概要……说他在玻利维亚并无政治权力。可是他认为他有足够的指导军事行动和控制财政的经验。因为这正是需要金钱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中苏两国要求援助,向中国人说明,毋须由中国方面承担任何政治义务,我们可以出一封信派(莫伊塞斯)格瓦拉(到中国去)见周恩来,我们也可以派马里奥(蒙赫)同他的一个伙伴到苏联去,这样他们至少会告诉我们,他们愿意捐献多少。”

为此斗争罗致干部。

(2) 只要革命在玻利维亚进行，政治与军事领导就应由他担任。

(3) 他将负责同其他南美政党进行联系，试图说服它们支持解放运动(他举了道格拉斯·布拉沃为例)。

我答道：第一点应由他作为党的书记自己作出判断，虽然我认为他的立场是一大错误。这是摇摆的、随风倒的立场，并将保护那些因为他们的欺诈而该受到谴责的人在历史上博得美名。时间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关于第三点，我告诉他我不反对他的劝说，但是他会遭到失败的。要求柯都维亚去支持道格拉斯·布拉沃，等于要求他去支持他自己党内的造反。时间仍会说明结果如何。

至于第二点，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我应该是军事首脑，对于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含义。讨论到此结束，我们的会谈兜来兜去，成为恶性循环。^①

蒙赫对此会见有两段记述，两者都提供了他自己在思想上如何活动的若干线索，即使他在报道格瓦拉确实所说的话时，多少是有些歪曲的。按照蒙赫的说法，格瓦拉讲了下面的话：

“我要在事先把有些事情同你讲清楚，以免我们之间将来发生任何恶感。事实上我们欺骗了你。我要说，这不是菲德尔的过失；这是我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他要求你根据我的请求做些事情。开头我有别的计划，然后我变更了这些计划。我在这里，这是我的解放区，而且我不准备放弃它，即使我只有同我一起来到这里的人们。请原谅你同他谈过话的那位同志〔菲德尔的密使〕，他是很好的、完全可靠的同志，但他不是一

^① 《格瓦拉日记》，1966年12月31日。

个政治家，而且未能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我知道他对你很粗暴……我耐心地等着你，我非常需要对你讲许多事情，但主要是因为 I 要求你同我们耽在一起，作为领导起义的政治头头。”

在这段令人震惊的开场白以后，讨论开始了。下面也是蒙赫的说法：

我们开始会谈。我把早已熟知的情势摊在他面前，但它们需要详细给以解释。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的恶性循环，是由下列观点引起的，即玻利维亚革命应由玻利维亚人来进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可以无条件或在必要时合作。随后我们谈到我们从事革命在计划上的分歧，也谈到政治局不能从属于军事指挥部，因而革命的政治首脑不能从属于军事司令员的事实。最后我们讨论了在革命军队内部成立党小组，政治局与政治首脑在选择政治委员、提升职务以及计划行动时应起的作用，等等，等等。

由于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要求应当允许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调停。格瓦拉答道，他经常为他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作出计划并付诸实施，而不顾一切障碍，把阻塞在他的通道中的任何人一扫而光。“你可以对此随便怎么想，但这不象你，你想到的是政治原则；你喜欢把我的原则叫作什么都可以，甚至称之为个人原则也可以。要紧的事是我必须是第一把手。”

他问我：我的立场是否有伸缩性？我说没有。然后我问他同一问题，他也回答说没有。

蒙赫老是急于为他自己的立场辩护，对于这一方面作了详细

的说明：

当格瓦拉同志首先提出这个主题时，他说，不论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或曾经在哪里获得最好的经验，他认为拉丁美洲整个一洲是他的母国；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要在任何地方战斗，把美帝国主义驱逐出境并建立社会主义。他的初意是要在某一个别的地方，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战斗，但他得出结论，玻利维亚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群众的经济困境、日益增长的饥饿与贫穷、严重的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人民中的伟大战斗精神、薄弱的反动势力与镇压力量、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政治不稳定，等等，等等。这是建立游击队、革命队伍来促进人民斗争的有利情势。游击队的好处是集合反帝势力并把他们引入武装斗争；战斗的蔓延扩大以及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公开干涉，会使其他国家产生新的中心，于是游击战争遍及整个大陆。这种斗争也许要持续十年或十五年，但若通过任何别的方法，玻利维亚也许很不幸地要成为最后被解放的国家之一。有鉴于此，格瓦拉同志要求我作为政治首脑参加战斗，同时说清楚，作为军事首脑，他有绝对的指挥权。

我答道，我将在三个条件下参加：1. 召开一次全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来协调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动；2. 在国内建立一个广泛的政治阵线，把所有的人民团体和反帝团体，包括玻共在内，组成单一的革命指挥部；3(a)，玻利维亚革命计划应当联系到群众经验与意识觉悟，而不应单纯基于游击战；3(b)，政治或军事领导权可以在我的手中，或者在不管哪一个主张革命指挥部的人的手中，但无论如何军事领导权应当从属于政治领导权。为了帮助革命，我将辞去我的一切政治职务，这是我总想做的事。

与游击战计划相反，我拟出了一项我认为更适应玻利维

亚情况的计划,其主要之点如下:为了武装斗争的目的,训练玻共和其他革命力量;集合并组织全国规模的人民武装力量并使之军事化;协调城市、矿山、乡村和山地的同一时刻的行动;在一场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时刻开始战斗,而不是单纯作为一次罢工的延长或作为一次政府镇压的反应。

格瓦拉同志用悲观的评论来压低头两点;但他接受它们,并说对他来说,第三点是最有价值的。他说,我的计划意味着长期的训练,巨大的革命组织,并在斗争开始前无限期的等待。他还说,他担心,假若我的计划付诸实施而成功,这可能限于一国,忘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假若如此,我几乎肯定地将集中精力于巩固玻利维亚的革命,同帝国主义打交道来谋求出海通道。^①

在我这方面,我指出,如果不考虑现有条件和人民的经验,他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他的计划会导致草率的行动、牺牲、游击战的失败以及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政府的轻易胜利。最后我讲清楚:政治或军事领导权关系着执行一项计划,实施一条路线,因此军事领导权应从属于政治领导权。

我们两人的观点是全然相反的,因而不可能对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有鉴于此,并考虑到没有必要讨论细节,我中断了这次会谈。

一年多以后,1968年1月,蒙赫向玻共提出一份报告,详尽说明在尼阿卡瓦苏讨论的精确内容。他详举他向格瓦拉陈述的六点细节。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同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遵循的意识形态路线背道而驰的。格瓦拉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1)拉丁美洲革命

^① 玻利维亚在拉丁美洲独特之点,是四周都为陆地。在1879年的“太平洋战争”中,它把它的太平洋海岸地区丢失给智利了。历届玻利维亚政府的目标,一直是想收回它的滨海省份。

将具全洲规模；(2)每一拉美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特征，这赋予拉美革命以潜在可能性；(3)古巴也有这些特征，因此古巴革命提供了一个使革命可望成功的革命样板；(4)中苏分歧是对于革命活动的一种障碍，对待争论双方采取的唯一正确立场是保持中立；(5)革命战争中政治决定必须操在军事指挥者之手；(6)革命是由善于利用现存种种条件的人们的决定所引起的。

对于构成格瓦拉意识形态面貌的每一个决定性观点，蒙赫持有相反的立场：

格瓦拉试图把他的革命理论在我们国家内付诸实践。我试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关于玻利维亚革命可能遵循的方向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向他说明的若干理由如下：

毫无疑问，拉美各国人民有着许多联系、许多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从布拉沃河(墨西哥)南岸直到巴塔哥尼亚(阿根廷)的各国人民都是相似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看看过去两大帝国就够了：阿兹台克人(在现在的墨西哥)和印加人(在现在的秘鲁)，此外还有玛雅人、契勃察人、阿拉乌干人以及其他许多部落；所有这些人民都生活于相似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水平上，虽然他们的文字与习惯多少有些不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政权控制了本洲，用火和剑征服了它的人民，同他们混种繁殖，把比较进步的生产方法强加于它，克服了过去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本洲。

然后我向他指出，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了三个世纪以后，于1809年开始了殖民者的最后斗争，这花了约五十年，但绝大多数国家在1820年至1830年间获得独立，有的略早一些，有的略迟一些。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者被赶出以后，产生了几个国家，并不完全出于某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心血

来潮。这些国家的诞生有它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由,这些因素导致本洲的分裂,尽管有许多共同的问题、联系和革命愿望。

当这些国家建立以后,原有的差异加剧了,有自相残杀的斗争、流血和国家的支解。沙文主义型的民族主义和报复主义受到鼓励,因而统治阶级试图巩固他们的统治,资本主义在发展着,而帝国主义变得更为凶恶。今天,所有拉美国家除古巴而外,都是生活于有封建主义痕迹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下。纵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全洲各国人民的共同纽带和任务则无异致。面临这种情势,美帝国主义是按无所不包的全洲性战略来行动的,它支持各国的傀儡,这些傀儡又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支持来互相支持。因而各国人民的态度应该是组成反帝的统一阵线。但是我们不应当得出一般化的结论,以为革命有在各国同时胜利的可能性,或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一次就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拉丁美洲的形势,对革命的两类可能性,都包括在内的。重要的事情是,如有必要,便在一个国家内进行革命;如有可能,则在一国以上进行革命;在不忽视运动的国际意义的前提之下,革命尽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发动。无论如何,这应该是第一步;后来当革命发展时,这种情况可以变更。

蒙赫然后对格瓦拉阐述第二个观点,他继续讲下去:

现在称作玻利维亚的地区,最初是由土著部落居住的。它们受到艾马拉人的控制,后者已经达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然后全区受到克丘亚人控制。它成为印加帝国的一部分,那就是现在的秘鲁,以库斯科为帝国首都。这个帝国从今日的哥伦比亚南部延伸到今日阿根廷与智利的北部。当西班牙

牙移民来到时，他们发现这些民族处于从原始共产主义向较高级生产方式发展的过渡时期。西班牙移民用武力把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这个地域及其人民起先成为利马(属秘鲁)总督辖区的一部分。后来则作为查尔卡斯检审法院，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它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总督辖区的一部分。

在一般西班牙殖民地上，政治区划几乎觉察不到，因此革命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行动，至于他们是在何处生长或何处生活，那是不关紧要的。图帕克·阿马鲁行动的地区跨及秘鲁和玻利维亚。革命者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两地同时保持接触。在大陆的这一地区，在殖民地时期，一定的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因素出现了，使它同其他地区有了差异，形成了玻利维亚的国家基础。后来，在独立之后一百五十年期间，早先在封建寡头政权之下，后来又在帝国主义之下，它同其他国家的差异愈益尖锐，引起了恶感与冲突，直接有利于共同敌人。尽管如是，尽管我国是同它交界诸国中最落后的国家并处于沉重的帝国主义压力之下，它却作出了其他一些国家没有达到的相当开明的变革，这在拟具革命计划时是不应当忘记的。

我提到的第三点有如下列：人类是向一个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后是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没有人对此有争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由俄国人于1917年11月7日开辟的。今天，三分之一人类生活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人们从不同的出发点到达了社会主义，克服了一系列的障碍和困难，从失败与挫折中接受了教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于布尔乔亚——基本的资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结果。

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赢得了最初的胜利，是由于法国军队在一次资本主义战争中败于普鲁士军队之手，而法国布尔乔亚也被普鲁士布尔乔亚所削弱了。可是战争中的敌对双方（却是同一阶级）很快签订停战协定来对付工人阶级并拯救资产阶级政权。这样，普鲁士布尔乔亚与军队帮助了法国布尔乔亚与军队去粉碎巴黎公社。在俄国，1905年沙皇军队败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使俄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举行起义，赢得一些早期的胜利。但是两国政府很快达成协议，以便对付革命而加以挫败。两个帝国主义力量联合在一起来阻止俄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的胜利。1917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为革命准备了舞台背景。沙皇军队的失败与俄罗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削弱和丢脸，使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举行伟大的革命起义。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行动，选择了恰当的起义时刻，因而保证了胜利。俄国革命使党所起的作用大有威信，并且表明起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中国革命的背景不全相同。这个背景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纷争日益加剧因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由于在其边界上存在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才容许中国人进行长期的内战，最后取得胜利。在内战中，不但党而且人民军队赢得了威信。

古巴革命的背景又不相同。它是由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世界舞台上的对抗，加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组成，虽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不象过去那样大了。这是游击战争的背景，起初只有有限的目标，但后来则无限发展。共产党的作用在这里削弱了，而大规模武装革命运动却涌现出来，后来变得更为激进更为巩固了。

这些便是人民解放斗争中三个最显著的例子，而并没有忽视欧亚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经验，他们的革命过程无疑也有

各自独特之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道路来赢得他们的胜利的，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十四个例子而不是三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与农民结成联盟，所有这些人民打败了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基本上是靠武装斗争，但在能够按照每一国家的特殊条件来动员群众的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之下。这些革命既有共同之处，亦有独特之点。

所有这一切指出：实行武装斗争的每一方式都是独特的，它们之中没有一次是重复的，因此要把它普遍化就是错误的。作为马列主义者，我们不能指望重演同样的具体历史条件，这样做会使我们对于革命方式作出绝对普遍化的结论。相反，很明显，必须寻求和发展新的方式。历史指出了这一点。

蒙赫向格瓦拉提出的第四点是：承认各国革命采取不同方式这桩事实，可以使人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争论：

社会主义力量迅速战胜帝国主义的愿望，要求一切反帝力量尤其是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一致，而这个要求又使人们有必要站队来强化团结，避免由于保持中立而扩大分裂。这是重要的而且是不能回避的。

俄国革命的胜利诞生了苏联，它通过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一切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决不会回到资本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在天堂上获得报酬而战斗，而是为了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些。一个更完善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对于人类最大的吸引与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和平共处政策不应该同妥协政策混淆起来。

苏联共产党无疑是马列主义的保卫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会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这样，苏共就是最了解

所有国家的革命问题的党。这只是承认它作为反帝斗争领袖的角色。此外，苏共也从没有自称有此权利。中共领导人无视这点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无疑，中国人民曾有许多成就，许多胜利。但这并不赋予那些领导人以自充其他各国人民裁判者的任何权利。他们自称是苏联缔造者的最好继承人，但又痛诋苏联；他们说他们赞同工人们，却不赞同其工作，而工人所以成为工人，就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是不能倒退的；我们仍然盼望中国人民重新参加这个大家庭，虽然这可能是迟缓而痛苦的。

面临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些分歧（这些分歧又引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较小的分歧，而这正象第一种争论一样，主要是由机会主义所造成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求得团结一致，因为分歧的情势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总是怕有统一的革命阵线而不太怕分裂的阵线。

讨论中提到的第五点是有关领导权的，而这不是偶然提出的。政治领导从属于军事领导不同于军事领导从属于政治领导。革命问题根本上是政治的，虽然在解决革命问题时军事因素起着作用。政治决不能全然和永久从属于军事考虑。政治问题关系到党，而军事问题关系到军队。顺便要说一下，当我们谈到党和革命军的作用时，我们心目中考虑到党与游击队两种力量的现况，考虑到作出变革，来提高党与游击队的水平，以适应情势的需要。最后，要党公开或隐蔽地从属于军队乃是一种观点，而军队从属于党则是另一种观点。军事作为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作为军事中一部分，这是对待革命的正确提法。

第六点涉及革命不能用命令或随心所欲地加以计划和预定。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成熟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这种因

素并不全靠人们的意志。人们可以催促其成熟，加快它的发生，但不可能制定时间表。革命起因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不单是由于人们的愿望。^①

蒙赫在当时是否说了所有这些话，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他本人不愿意卷入格瓦拉计划的思虑周到的一种自圆说法。但不论辩论的确切过程如何，最后却完全陷于僵局。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调和截然相反的观点。

讨论结束以后，格瓦拉让蒙赫走到集合在一起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那里去，同他们进行谈话；其中许多人是蒙赫的私人朋友，他们对于已经出现分道扬镳的情况感到悲伤。按照格瓦拉的记述，蒙赫“同所有这些人都谈了话，并让他们在留下来或支持党两者之间任择其一；他们都选择留下来，看来这对他是一个打击”。

到了中午，全体伙伴为虽无玻共的正式支持而决定仍然干下去的重大意义举杯庆祝。格瓦拉把这个时刻同喊出拉丁美洲第一次独立斗争的呼声——“穆里略呼声”相比拟。第二次全洲革命已经开始了。

蒙赫于次日离此前往拉巴斯。格瓦拉告诉他的游击队，他们将“同一切愿意干革命的人们团结起来”，但他预见到在游击队中的“玻利维亚人将经历困难的时刻以及在精神上极度苦闷的日子”。格瓦拉本人显然一半预料到并欢迎这次决裂。对于格瓦拉来说，玻共是忠于形式的。他在他的日记中记道：“蒙赫的态度在一方面可能减慢我们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为我摆脱任何政治妥协。”到1月底，当情况稍为明朗的时候，他写道：

玻共现在对我们施展明枪暗箭，我不知道它要走到什么

^① 《玻共与切·格瓦拉之间的分歧》《最后一点钟报》，第49期，1968年2月27日。

地步,但它阻挡不了我们前进,而且从长远看来,这将成为好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它)。最正直忠实的与斗志最旺盛的人们将同我们在一起,即使他们要经历严重程度不同的内心斗争。

同蒙赫的会谈结束以后,格瓦拉开始安排会见从奥鲁罗来的主张中国路线的矿工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莫伊塞斯·格瓦拉于1月下旬来到尼阿卡瓦苏而且似愿同意切所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莫伊塞斯应当解散他自己的团体而让它参加到游击战运动中来,并不应在“关于国际或国内意见不合问题上有所争论”。按照切的记述,莫伊塞斯·格瓦拉“很懂事地接受一切”,并同意于2月份把他的第一批人带到尼阿卡瓦苏来。

六 背叛与行动

“游击队战士应当永远不让自己讲一个无用的字，即使是对他自己的亲密战友，因为敌人经常要把间谍引进游击队伍中来，旨在发现其计划、地点和生活方法。”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游击战》

尼阿卡瓦苏营地头几个月的计划是进行训练。一旦阵地筑好以及藏置供应配备的岩洞挖好以后，军事训练就可开始。1月21日格瓦拉报道：“我们打了一次演习战；在某几点上失败了，但一般来说是叫人满意的。我们必须在退却战上加紧练习，这是这次演习中最薄弱的环节。”接着在1月底，他计划了一次长途进军。目的是在侦察尼阿卡瓦苏以北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情况，并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以发现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可以依靠的人民。

实际上这次进军是灾难性的。它暴露了游击队面临在丛林中生存问题时的极端脆弱性。当游击队于几个月以后试图返回这个区域时，军队知道他们曾在那里耽过，并且正在等待他们。整村整村居民都被传去讯问过，全区撒下了伪装成农民的情报员。

长途行军预定六个星期。格瓦拉把绝大多数游击队伍带走，包括十五个古巴人和十二个玻利维亚人。他把两个古巴人安东尼

奥和阿图罗以及两个玻利维亚人坎巴和“塌鼻子”留在尼阿卡瓦苏营地。他们要等待莫伊塞斯·格瓦拉征募的、预定于2月中到达的一批八个玻利维亚人以及在古巴受训后回国途中的另一批五个玻利维亚人的来临。

格瓦拉对于留守营地的人们，留下了详细的指示：

至少每三天联系一次；有四个人时，要有两个人武装戒备；放哨的事，一分钟也不要疏忽；新招募来的人根据一般的准则进行训练，但他们除了必要知道的事以外不应当知道得更多；营地内要清除一切个人所有物品，武器藏在森林中，用一个帐篷覆盖着；贮备的钱要经常放在营地内，由一个人贴身带着，除了附近的溪流外，已经开辟的道路要有人巡逻。

二十七个游击队员于2月1日出发。他们直往北进，于2月8日造一浮桥，于洪水季节越过格兰德河。在该河对岸，靠近马西库里河流入格兰德河处，他们遇到第一个农民，名叫奥诺拉多·罗哈斯。他终于出卖了游击队并致许多队员于死地。而在当时，他似乎相当友好。但格瓦拉曾有过怀疑：“这个农民属于典型的一类，能够帮助我们，但又不明白可能冒头的种种危险，因此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游击队在格兰德河北边游动达一个月，同农民们聊天。然而，他们是谨慎的，只接触他们听说可能会持友好态度的人们。但在3月间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的旅程中，先遣部队的领队——一个名叫马科斯的古巴人，在发现了他的人员因饥饿而晕倒时，决定把他们带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屋中。他们令人惊异地违背游击战争的规则，来到这个名叫埃皮法尼奥·巴尔加斯的屋子里，随身携带他们的枪枝，并冒充为一队墨西哥地质工作者。再难得有人 would 会编造比这更不象样的故事了。后来，还在这个月份，当格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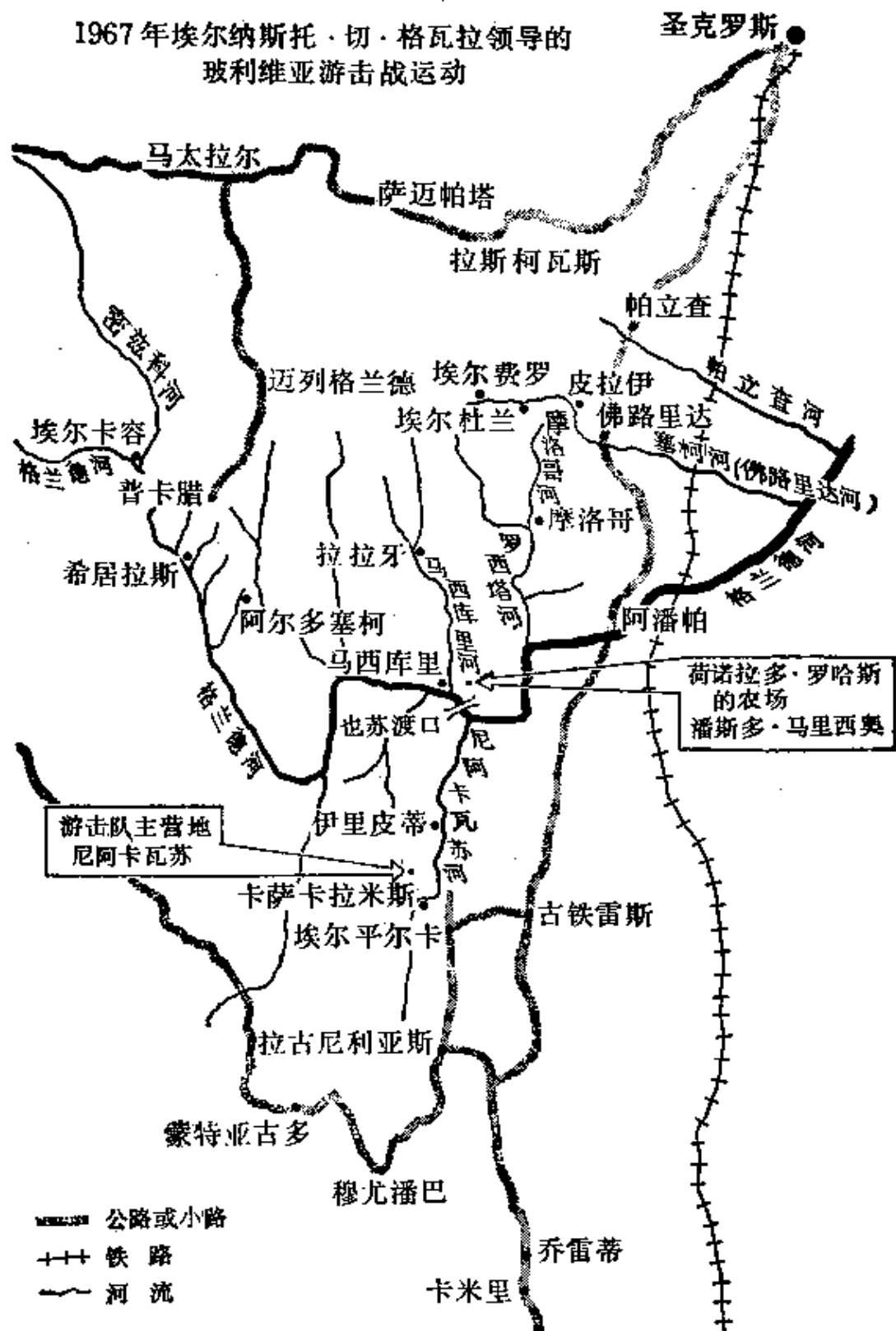


图 8 (按原图译制)

拉听到已经发生这事时，大为光火，撤了马科斯的先遣队领队职务。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当马科斯这一批人离开屋子回尼阿卡瓦苏时，巴尔加斯沿路跟踪他们。在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后，他继续跑到卡米里，把在这区域内出现古怪的武装人员的情报向当局告发。

但是游击队中其余人员，在格瓦拉的领导下筋疲力尽、饥饿不堪地于3月间第三周末回到主要营地时，有更坏的消息等着他们。当2月间他们外出期间，莫伊塞斯·格瓦拉招募的八个人来到了。（后来切评论道：“水平很差，两个逃兵、一个‘多嘴’的囚犯、三个应当驱逐、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其中两个人，维森特·罗卡巴图和帕斯托尔·巴雷拉耽了三个星期，然后作出决定：他们已经厌倦了。德布雷说明了发生的事情：

3月11日，在还没有任何人考虑军事行动时，莫伊塞斯·格瓦拉一伙中的两个人被选派出去打猎，于早晨七时离开游击队中心营地，携带枪枝去到河边。但他们不是向右朝东去猎地，而是消失在西边，朝卡米里走去。他们是第一批两个开小差的人。

在他们到达拉巴斯以前（据他们说，他们是向那里去“呈送他们的报告的”），他们于3月14日在区内被捕了。

当天他们作了很详细的供述，因为其中之一过去同刑事调查局和政治警察有联系。^①他在他的供认中说（我把它引用过来）：“他参加游击队是去搜集情报的，他认为上报这种情报就会获得报酬。”他的书面供词见证据第30页及以下。由于

^① 维森特·罗卡巴图虽曾充当警察局的密告人，他并非有意渗入游击队。但当他被俘后，他认识到他的情报对警察当局是多么有用啊。他有异常好的记忆力，他不但非常精确地描述了营地和岩洞的情况，而且也讲到了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各种工作的详细情况。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参加游击队时，他告诉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克达斯，“假若你有一个象我那样的丈母娘，你也会加入游击队的”。

它们不能当众宣读，我要求官员们仔细阅读。他们可以从中看出关于游击队组织的确实描述；在巴列格兰德四周侦察的人数（连切·格瓦拉在内共三十人），游击队员的国籍、姓名、计划、营地的位置、路径、拥有无线电，等等。……你们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切用假名拉蒙出现，而且可以知道他何时与怎样来到玻利维亚、他的伪装、他的工作、他的所有物品、他们怎样等待他来到主要营地，等等。……那时营地的头头安东尼奥把他们当作一般同志，不隐瞒任何事情，甚至把本来还保密而由切及其同伴自 11 月以来拍摄的全部照片给他们看。因此他们不等格瓦拉回来就离开了。他们自己供述了他们怎样立即充当（政府）军队在陆上和空中的向导，然后于 3 月 23 日以前被送到拉巴斯总部去完成他们的报告。然后，似无疑问，莫伊塞斯·格瓦拉一伙中另一成员“鸚鵡”于 17 日毫无抵抗地被俘获了。他证实了他的同伙的供词，并立即被用作向导，给军队指明怎样到达营地，它是怎样防卫的。……

使军队能够对于尼阿卡瓦苏计划以前的游击队情况了解全貌的第三种情报来源是向导人巴尔加斯，一个穿军装的平民，他于 23 日在引导军事纵队前往营地时中了埋伏。从巴列格兰德来的这个人，被游击先遣队领队马科斯和他的全部武装人员拙笨地访问过。他们于 3 月初冒充外国地质工作者见过他，目的在购买食物，因为同切在一起侦察这个区域的游击队陷于真正的饥饿之中。这个巴尔加斯心怀疑惑，从巴列格兰德追踪他们到尼阿卡瓦苏，然后迳往卡米里向第四分区司令告发。这个，加上阿加拉尼亚斯的一再报道以及马科斯和先遣队突然在他的工人们面前出现，自然会引起军队出动并开始攻击。3 月 16 日，他们打进科科·佩雷多的屋子（“卡萨卡拉米那”），死了一名士兵。在后来几天中，军队已经极精确地测定营地位置之后，巡逻队越逼越近。侦察飞机整天飞临这个

区域的天空。由于农庄和通往卡米里的道路被封锁了，存粮很少的游击队员们被切断了食物供应；不但如此，他们还遭到出人意料的围困，并同格瓦拉和他的人员分离。格瓦拉一行原讲3月1日回到尼阿卡瓦苏营地，却花了三个星期才到达那里。曾经派使者将此未能预料的情况向他们告警。同时，负责中央营地的马科斯，在安东尼奥的赞助下，基于他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防卫的理由，决定放弃这个中央营地而撤退。当切于〔3月〕20日到达时，他发现游击队在政府军队开进以前撤退。他认为这种撤退是失败主义的标记。他撤了马科斯的职，把所有的人都带回主要营地，并决定保卫它，反抗任何军队的攻击。为了切断军队的前进，他派出六个人的小队，在尼阿卡瓦苏峡谷中离营地约三刻钟路程的地方设立据点。在3月23日埋伏战以前发生的事情，对于这次游击战运动的后来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和致命的影响。^①

格瓦拉于3月20日回到尼阿卡瓦苏中央营地。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失败的气氛笼罩一切，有着全盘紊乱的可怕印象；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前一天他已经接到事情出了差错的告警，因为他们看见一架小飞机在他们头上打转。在他到达以前，其他古巴人已经决定在军队前进之前撤退，而不去组织一次进攻。格瓦拉很恼火。“有谁听说在同敌人作任何接触以前就退却的？”他在尼阿卡瓦苏的狭长峡谷中组织了埋伏队伍，军队的先头部队于3月23日清晨中了埋伏。在河流的峡谷咽喉处，军队对隐伏的游击队是无能为力。六个士兵和一个中尉被打死了，还有七个人被俘，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

虽然从游击队观点来看，这次伏击战完全成功了，但是毫无疑问，游击队员们还没有充分准备开始一次游击战运动。他们人数

^① 德布雷在卡米里审判庭上的辩护词。

很少，他们同城市中政治组织的联系还是极初步的，而且他们在困苦的训练性行军之后都感极度疲乏。格瓦拉于3月中评论道：他自己很虚弱，成员的士气很低落。另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有过早被发觉的可能性。他在11月底曾写道：“按计划是要等待其余的人（从哈瓦那）来，使玻利维亚人数至少增加到二十个，然后开始行动。”3月，他的游击队伍得到二十个玻利维亚人的补充。1月底他曾写道：“现在开始实际的游击战阶段”；一个月以后：“下一阶段将是交战，当然是决定性的”。

就他们行动的规模而论，这个传奇无可避免地最终会泄露出去。其实，游击队存在这样长的时期而没有被侦察出来，倒是令人惊异的。3月初，在拉巴斯已有流言蜚语，大意是说在该国东南角正有些怪事发生。天主教办的日报《现状报》散布谣言道：在圣克鲁斯区（拉古尼利亚斯北二百五十哩）正在形成一帮武装之徒，是由“革命工人党”、“左翼民族革命党”和亲华共产党组成的。^①这个消息立刻遭到政府的否认，但经过两星期的关于游击队与不寻常的军队调动的进一步谣传之后，《现状报》于3月21日刊载一个大标题，宣布国内正在进行卡斯特罗-共产党人游击战。第二天流传到外边的新闻还叙述了游击队和军队之间的一场冲突。据说——令人惊异地准确——游击队是由一个古巴人和两个玻利维亚人领导的。^②

关于3月23日较大伏击战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发布，直到3月27日巴利恩托斯总统才在国家广播电台里最后讲了这次冲突的细节。他说格瓦拉同游击队有牵连。^③

^① 1967年8月6日《现状报》（拉巴斯）上，有关于头几个月游击队活动的很好纪要。

^② 《每日画报》（圣地亚哥），（安莎社电讯），1967年3月22日。

^③ 这是根据美联社在拉巴斯的通讯员豪尔赫·卡内拉斯的报道，他的电讯刊载在《信使报》（圣地亚哥），1967年3月28日。同一天《现状报》上刊出的文本，并未提及格瓦拉的名字。4月1日，巴利恩托斯总统告诉报界，他本人认为格瓦拉已经死了。（合众国际社电讯，每日画报，1967年4月2日。）随后数月，他继续发表互相矛盾的声明。

政府武装部队临时总司令豪尔赫·贝尔蒙特·阿地莱斯将军(奥万多将军是从华盛顿之行回国途中正在欧洲)向报界证实了这消息,说他听到两个游击队员讲起格瓦拉是在那里。因此,从最初起,玻利维亚当局就能够把游击战的爆发,说成主要是外国人引起的。政府关于伏击战的正式公告说:“国家领土受到大多数依附卡斯特罗—共产党人路线的不同国籍人们组成的武装集团的侵略。他们还有国内若干极端主义政治集团的参加。”

游击队开小差者把工作做得到家。他们告诉军队当局:格瓦拉曾两次盘桓在尼阿卡瓦苏营地,并且随时可望回返。格瓦拉本人则在他的3月27号日记中写道:

今天消息出来了,几乎垄断了广播电台的节目,并发表了一大串公告,其中包括巴利恩托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显然,开小差者或那个被俘者招供了,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讲了多少与怎样讲的。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塔妮亚已经被辨认出来,这意味着两年来有效而耐心的工作化为乌有。现在人们很难离开这区域。……晚上我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会上我们制订了我们未来的计划。^①

游击战争经决定继续进行。游击队自称为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他们要做的第一桩事是建筑一个新的岩洞,俾能放进他们所有的一切——发报机、药品、枪枝与军火。开小差者所做的工作太到家了,显然军队已经知道现有岩洞所在地方。但炸开峭壁需要时间,尤其是有侦察机飞行的时候,这不可能做到。炸开新洞的任

^① 由于提到这点,人们谴责塔妮亚“出卖”了游击队。事实上,她在卡米里郊外乔雷蒂离开她的吉普车,并借其他方法向尼阿卡瓦苏营地进发。由于各种事件的突然袭击,她不可能离去,因为她在卡米里及其四周地区是太知名了。当然,事实上远在军队找到她的吉普车以前,损害已由三个开小差者造成了。

务交给莫伊塞斯·格瓦拉，他从前是个矿工，是善于处理炸药的专家。但他直到4月1日才完成这项任务，两天之后游击队完成移转他们的物品的工作，并最后准备放弃营地。他们于4月3日离开原地。

同时，军队已经探索前进，接近“卡萨卡拉米那农舍”。游击队撤出他们主要营地的次日，即4月4日，军队越过了南北走向的河流，并且凭借从开小差者所得的情报，到达了营地。几天以后，首批记者两名，即圣地亚哥《信使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到了。《泰晤士报》记者莫莱·萨勒所作关于营地的记述如下：

我们发现一个有充足设备的野营厨房，其中大炉灶至少可以烤制一百个人食用的面包。就近是一个茂盛的园圃，生长着蔬菜，还有一处屠宰房，在那儿曾用砍刀将骡子宰割。从肉类的情况看来，我判断这个营地撤出不超过三天。

沿小路略进，在树木和蔓藤的浓荫覆盖之下，有一所设备齐全的野战医院。我发现抗菌素的空包、包扎用品和器械，是意大利、英国、西德和美国制造的。医院大帐篷的帆布外罩已被取去，但我看见一张手术台和病人在外候诊的若干座位，都是用丛林木料做成并用缠绕植物捆扎的……

再往前一百码是宿舍区。在这里，有五十多个土制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是在某处秘密工厂中用空的果汁罐头和装有炸药的一段段煤气管焊接而成，并用雷管引火……

从宿舍区被扫除出的一整堆废物中，我找到了在丛林中拍摄的切·格瓦拉医生的一张照片，以及一份译成西班牙文的北越武元甲将军的演说词。

游击队营地显示了有秩序撤退的一切迹象，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并试将一切文件加以烧毁。鉴于有一堆用过的弹药筒箱，可以推断，营地的一部分曾经用来进行

武器训练。

在此同时，游击队已朝东北方向移到古铁雷斯村，并于4月10日在尼阿卡瓦苏河岸边的伊里皮蒂附近同军队打了一次大仗。游击队赢得了另一次胜利。十个玻利维亚士兵被打死了，其中有两个军官，在鲁文·桑切斯少校指挥下的三十个士兵被俘获了。但也有一个绰号“黄头发”^①的古巴游击队员在伏击战中被杀。

在3月23日第一次伏击战后，军队和玻利维亚政府一度陷于混乱的状态，不能决定究竟要做什么或者怎样认真地对付游击队的威胁。巴利恩托斯总统派空军司令列昂·科列·奎多（玻共领导人豪尔赫·科列的兄弟）到邻近国家阿根廷、巴拉圭、秘鲁和巴西去。但许多观察家似乎认为玻利维亚正在利用游击队来博取即将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的国际同情，并争取增加美援。^②

伊里皮蒂的第二仗迫使人们不再轻易看待游击队的威胁了。美国人开始输送军用品、直升飞机与顾问，玻利维亚政府则紧紧箝制住国内的左倾团体。4月12日五个美国军事专家从巴拿马到达，来建立反游击战训练学校，但估计需要六个月才能训练出一队“突击队员”。同一天，玻利维亚政府在大部分东南地域宣布戒严，并禁止玻共与托洛茨基派革命工人党的活动。

事实上美国人已经在上月间悄悄地调查游击队活动。当《现状报》于3月初首次刊布传闻，说有游击队在圣克鲁斯地区活动时，美国常驻玻利维亚军事使团的四个成员，由一个流亡在外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名叫奥雷略·埃尔南德斯的古巴人伴同，

^① 根据三联书店出版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第122页称，那天死亡的游击队员叫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绰号“黄头发”。——译者

^② 参阅我的文章《拉丁美洲：下一次革命》，载《前卫报》，1967年4月6日。

飞到圣克鲁斯现场考察这些报告的实际。^①一个月以后，使团团长约瑟夫·P·莱斯上校同罗伯特·“爸爸”·谢尔顿少校到达圣克鲁斯来寻找开始反游击战训练的地点。4月15日宣布反游击战训练将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开始，由谢尔顿少校负责其事。

由于情况紧急，原定4月举行的每年招募计划，提前于3月下半月实施。这样凑了六百名玻利维亚未经训练的新兵、约二十名美国特种部队以及中央情报局所豢养的少数古巴流亡者之后，“爸爸”·谢尔顿开始了拉起一支反游击战队伍的任务。

^① 1967年期间，约有六个古巴流亡者为中央情报局在玻利维亚工作。虽然内政部长安东尼·阿哥达斯知道他们的活动，但他们并不归他控制。他们是另行活动的，而同在拉埃斯佩·兰萨的美国军事总部取得密切联系。

七 雷吉斯·德布雷

“雷吉斯·德布雷同我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那些我认为可以掌握世界未来的地方。你知道，我到亚洲去，那是世界的未来。要不，我会到俄国去。俄国仍然是未来；但世界的未来不是玻利维亚。雷吉斯·德布雷却到那里去，一无所获。时代已经变了。”

——安特烈·马尔劳，引于《世界报》，
1967年10月27日。

埋伏战之后头几个星期，由于过去没有计划招募作为战士的若干“来访者”的出现，使游击队的机动性大受影响。3月初，同秘鲁和阿根廷的主要联系人——“中国人”和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来到，同格瓦拉进行讨论，还有法国革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他早已于去年下半年到了玻利维亚国内。

雷吉斯·德布雷于1940年9月2日出生于巴黎，是乔治与雅尼纳·德布雷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是位律师，母亲是位著名的保守派政客。第二次大战期间，这家子住在巴黎。德布雷历来是一个聪明勤勉的孩子，于十六岁就通过会考获得哲学奖金，次年他开始准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1959年他十八岁半，以第一名考入这个严格的学校。

作为奖励,他的父母于1959年7月送他到美国去旅行。当他在迈阿密的时候,他找到一只小船载他到古巴去作一次短期旅行,那时正是古巴革命的第一年。他于11月回到巴黎,开始在高等师范学校攻读。

1961年他去南美洲旅行了几个月。1963年7月他获得哲学学位以后,出去为法国电视台拍摄关于委内瑞拉的电影。他在那里遇见一位委内瑞拉革命者伊丽沙白·布尔戈斯(后来于1968年2月他在卡米里同她结婚)。然后他开始从陆上通过除巴拉圭以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各国的长途旅行,直到1964年底才回巴黎。在回忆了他的经历以后,他定下心来,撰写关于拉丁美洲的第一篇长篇论文,题为“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刊载于1965年1月份让·保罗·萨特所编的《新时代》。

他在法国又回到他的哲学研究上来,于1965年7月获得更高的学位。他在南锡大学任教几个月。然后于1966年1月回到古巴,根据法古技术文化合作协定,担任哈瓦那大学哲学史教授。他在那里搜集关于古巴革命战争的材料,使他着手写作他的长篇论文《革命的革命?》,于1967年1月在哈瓦那出版。它立即在古巴以及全洲其他国家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明白说出了古巴方面直到那时只在私人谈论中提到的对于各正统共产党的批评。德布雷于8月间回到巴黎作短暂停留后前往玻利维亚,他把9月份用在探索贝尼河方面。

他回到古巴,但在1967年2月,他又离开哈瓦那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去。他从那里前往安托法加斯塔,搭上火车越过阿塔卡玛沙漠,爬上高原,来到拉巴斯。

3月初德布雷到达尼阿卡瓦苏,表面上是一位记者。后来他说明了他所做的事情:

我是〔法国出版商〕M·马斯庇罗和墨西哥杂志《事件》派

到这里来的。是M·马斯庇罗指示我怎样到这里的。我这次旅行的用意是访问切·格瓦拉。……我于3月初进入玻利维亚。按照M·马斯庇罗的指示，我于一个星期二傍晚六时遇见一个叫安德列斯的玻利维亚人。我同布斯托斯先生一样，接到相同的指示。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妇女以后才会合到一起，她的名字我是后来从报纸上知道的，当时她自我介绍叫塔妮亚。是她把我们带到这里的。^①

可是当他们到达尼阿卡瓦苏营地时，格瓦拉还在格兰德河以北作他的侦察性旅行。德布雷得等上两星期才能会见他。

后来，他说明他在营地活动的性质如下：

不谈我这角色的细节，我要强调：当我来到主营地旨在充分地分享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的理想时，我要求分担游击队员的义务和艰苦生活，在营地内外站岗守卫，帮做炊事工作，整理屋内以及其他日常任务。因此我要求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按照我到达的次序，把我列入值勤名册中；因为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把我看作仅仅是耽在旅馆里的来访者，双手拢起睡大觉，而我的同志却疲于为我送食物，守护我的睡眠。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直到3月20日我能够同切谈话。尽管我是作为记者来到这里，我那时亲自要求切找别人替代我的工作，不要把我看作来访者，并在同那里的玻利维亚人磋商以后，让我参加游击战。但他拒绝我的要求，说我向外边世界报道他在那里以及报道他的目标的任务，同战斗一样重要。然后决定：我应当尽早离开这区域，而且我虽然可以

^① 事实上，“安德列斯”是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捏造出来“使当局离开线索的”。参看路易斯·冈萨莱斯与古斯塔沃·桑切斯：《大叛乱：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小林书店，纽约，1969年，第83页。

也应当参加营地的日常杂务，但不可以也不应当看作一个游击队战士。^①

格瓦拉对于德布雷成为战士的想法并不热心。他写给菲德尔的信中说：“我认为他的体质条件不够好；”他又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他本来要同我们耽在一起，但我要他回去在法国组织一个援助网；在他回国途中可以顺路到古巴去，而这同他的愿望是一致的，他想同他的同志结婚并且生个儿子。”

在3月23日第一次伏击战之后，游击队有必要疏散一些非战斗人员。德布雷说明如下：

忽然情势变得很复杂。同外界的交通已经很困难。在营地的四个来访者中，切决定布斯托斯和我取道古铁雷斯首先离开，至于为“中国人”和塔妮亚则制订了一个更谨慎的计划，因为他们对于革命更为重要。在取道古铁雷斯的企图失败以后，我再一次同切谈话要参加游击战，他婉转提到我缺乏生活在丛林中的经验，并且说：对他来讲，从这区域来的一个农民要胜于从城市来的十个知识分子。这说服了我：我在外边比在里边更有用，尤其在那些孤立的时刻，因此我决定仍作为一个来访者的身分离开游击队，正象我到达时一样……

假若在4月初当我要求切让我立即参加游击队时，他回答道：“你体质上是够条件的，是能胜任的，习惯于丛林战和习惯于乡下生活；你的记者工作可以在后来让别人来做，用不着急急报道；同我们耽在一起好了。”那末我就会愉快地耽下来作为一个战士，作为游击队战士，准备奉命到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去战斗。革命者是多么愿意在切的命令之下去战斗啊！再没有比这更可高兴的了。不幸，由于营养不良，我在那

^① 德布雷写给他的法官们的信，1967年10月12日。

时病了(正象我开始供述时指出的那样),而切对于我在体质上是否合适没有多大的信心。①

切所作的第一个计划,是把“来访者”取道古铁雷斯村加以疏散,这个村子位于尼阿卡瓦苏河以东,从卡米里到圣克鲁斯的主要公路上。这一计划失败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已被军队占领了。在伊里皮蒂伏击战以后,游击队向西南转移。本来希望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至少能够取道穆尤潘巴村离去,并走出游击区前往苏克雷或科恰班巴。

4月20日凌晨,德布雷和布斯托斯离开游击队,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上一天到达的一位英国籍智利人、自由摄影记者乔治·安特留·罗斯,他们三个人走到穆尤潘巴村。②在村中主要街道上,他们被截留并受到玻利维亚刑事调查局的盘问。他们被俘几分钟后,德布雷的身份已被萨路斯蒂奥“鸚鵡”揭露,后者曾当矿工、士兵,最近从游击队逃走,并早已证明其为军队的有用工具。他声称他曾经在尼阿卡瓦苏营地看到过德布雷,并向军队告发他是一个游击队员。这三个人被刑事调查局押解给军事当局。

幸而在这镇上有一位《现状报》的记者。不然的话,他们也许会失踪得毫无痕迹了。他给他们摄了照片。他们是很幸运的,因为4月21日从拉巴斯拍出的第一批电报说,在同游击队打一次遭遇战后,一个阿根廷人和一个英国人被俘了,还有一个法国人“勒内·德布雷”可能被杀了。③电讯还报道,德布雷在哈瓦那共产党体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这阶段,一切记者都从穆尤潘巴、卡米里以及游击区其他市

① 德布雷在卡米里的辩护词。

② 罗斯所讲他的经历,刊入《埃尔西利亚》(圣地亚哥),1967年9月;也刊入《常绿评论》。

③ 《信使报》(圣地亚哥)刊载美联社电讯,1967年4月22日。

镇中被驱逐出去，因此得不到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报道。但最后公告三个人都活着。看来相当清楚，军队曾经接到命令要杀掉德布雷，但后来这道命令撤销了。这三个人被打了一顿，分别拘押在卡米里区的不同监狱里，直到7月初为止还被禁止与外界接触。后来，罗斯被释放了，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则均被处以三十年的监禁徒刑。

民族解放军在其存在的六周期间，能够给予国内与国际上以冲击性的影响，远远超出其实际力量。而且由于德布雷被俘，扎扎实实有一大批外国通讯记者——尤其从法国来的——来临现场。甚至戴高乐总统也写信给巴利恩托斯总统要求对德布雷宽大处理。但是游击队本身，虽然由于声名远扬而感到高兴，而其地位决不象某些新闻报道要人家相信的那样坚强。

八 共产党人袖手旁观

因过早开始游击战行动以及随后孤立于城市之外所造成的主要灾难之一，是同玻共切断了联系。当蒙赫于1月初离开尼阿卡瓦苏营地时，他说他将于下周提出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从而玻共与游击队之间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可是，格瓦拉于同月晚些时候弄清楚，蒙赫不但没有辞职，而且他还同“从古巴来的三个人”谈过话，“劝阻他们参加游击队”。无论如何，党的决定权现在主要掌握在豪尔赫·科列·奎多和西蒙·雷耶斯之手，这两个人于2月间前往哈瓦那同菲德尔再度讨论其事。1月下旬格瓦拉接到古巴来的信息，宣称正在等待这两个玻利维亚人来临：“菲德尔提醒说：他将倾听他们要讲些什么，他并将严厉对待他们。”2月14日，格瓦拉收到了从哈瓦那传来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详情：

我们翻译出从哈瓦那来的一份密码长电。它的主要点是关于同科列会谈的消息。在会谈中，他说过去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个任务具有大陆规模；既然是这样，他们准备合作搞一个计划，他们愿意同我商量细节：科列本人、西蒙·罗德里格斯与拉米雷斯将同来。还告诉我，西蒙说他决心帮助我们，而不顾党作出什么决定。

格瓦拉收到的电报如下文所载：

在最近举行的同科列—西蒙的会谈中，科列说：蒙赫曾

经告诉〔玻共〕书记处，这次行动是国家规模的，这正在引起混乱。已向科列讲清楚这次行动的大陆规模与战略内容。这消除了关于这次行动的混乱想法，他同意这次行动要在全国一级进行领导。他要求同你一谈，来讨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如何合作和参与。科列、西蒙和拉米雷斯要来看你。他们立即离此前来。……印象良好……我认为可以搞出一些名堂来。……他需要经济援助并训练他的人手。我们将把结果告诉你。^①

格瓦拉显然没有对玻共的这一新建议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在月底的日记中评论道：“……玻共的态度至少是继续采取两面手法与迟疑不前，虽然当我同新的代表团会谈时，还有一点需要澄清，而这也许是有决定性的。”而使格瓦拉最感烦恼的事实是：正当玻共领导人好象作出关于游击战领导权的建议的同时，他们却把那些流露出有志于支持游击战的任何青年共产党人排除出共青团运动。其中之一，游击队司库洛约拉·古斯曼就已成为这种党内清洗的牺牲者，还有实际上已在尼阿卡瓦苏同格瓦拉一起战斗的其他人们。3月间，格瓦拉告诉集合在一起的伙伴们，他对于玻共新动议的想法：

我指出：科列计划到这里来并讨论今后将做些什么的同时，把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已经同我们在一起的团员开除出团。这里重要的是事实；同事实不符的空话是无关紧要的。

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无意拒绝会见他们。德布雷曾经证实这点：

^① 引自玻利维亚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哥达斯于1967年10月30日在拉巴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所宣读的文件。全文见《日报》（拉巴斯），1967年10月31日。

当布斯托斯同我离开游击队时，切正在等待从外边〔我指拉巴斯〕来的其他人——真正的使者。不幸他们从未来过。根据切的严格命令，任何游击队员都不得离开集体去到城市做任何事情。切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严格要求，成为游击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旦进入丛林，他不允许任何战士回到平原。同时，他们也不可能从平原去丛林，于是存在着这种可怕的误解，彼此等待对方的来临，以便决定非常紧急的事情。^①

但是从拉巴斯玻共领导人的公开宣言中看来，一旦游击战争实际爆发，他们并不过分急于同格瓦拉重建联系。3月30日由马里奥·蒙赫与温贝托·拉米雷斯签署发出的宣言中说：党的书记处号召同游击队“团结一致”，但也证实，党的政治路线不因国内东南部爆发起义而有任何程度的改变：

玻利维亚同胞们！

游击战争已在这个国家开始了……

共产党表示同爱国游击队的团结一致。这个立场的最积极方面无疑是，这次斗争将有助于为玻利维亚人指出取得革命胜利应遵循的最好途径。

参加游击队伍的问题越出党组织与纪律范围之外，因为玻利维亚人有权利与义务来对于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民斗争的途径作出贡献。

玻利维亚共产党有它自己的路线，并将保持和发展这条路线，这路线是在它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的。它从不隐瞒它

^① 我把“llanos”一字译成“平原”(plains)。可是在游击战术语中，它通常是指城市，同游击队活动的乡村区相对照。

要根据具体历史情况与必然性所要求的手段来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为玻利维亚人民服务的人民反帝政府，唯一的条件是由他们自己的党领导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由广大群众参加行动。目前情势并不根本改变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的路线与目标；但它确实要求更大的努力、牺牲和纪律。^①

鉴于这个文件，在一个月以后的4月底由尼阿卡瓦苏地区民族解放军的城市联络网发出的呼吁，就应被看作是在直接号召共产党战士蔑视他们的党的命令：“‘民族解放军’号召玻利维亚人民亲密无间，团结一致，而不问其政治色彩如何。”

这个文件是这次运动期间游击战运动公布的唯一呼吁书。在5月间刊布的一个智利记者的访问记中豪尔赫·科列·奎多解释道：

事件发生的情况是：国内东部游击队同正规军队进行交锋，是在游击队预定战斗日期以前。……这意味着，游击队开始战斗，是在城市与矿区运动发动以前。它也并不与现有政府的崩溃形势相符。

这位智利记者然后开始更详细地询问这位玻利维亚共产党人。这是一篇有揭露性的访问记：

记者：我有这样的印象，即直到现在，游击队没有取得国内城市地区群众行动的支持。

科列：目前左翼政党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举行谈判，旨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各个政党、矿工们、工厂工人们以及进步的中等阶级都参加进来，不但从积极支持并与

^① 引于《世纪报》(圣地亚哥)，1967年4月29日。(着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

游击队合作着眼，而且旨在提出经济、社会与政治要求，以提高群众的战斗精神，进而夺取权力……

记者：你不认为推迟发动城市中的群众行动，会不利于游击队的生存么？

科列：游击队的生存是经过从长研究的战略军事问题。我们从不认为游击队有被军队打垮的可能性。就行动的次数而论，这部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术计划。无论如何，主动权总在我们手中。

记者：在城市中准备群众行动需要多长时间？

科列：这个问题是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被推翻后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密切相连的。那个政党已分裂成几个集团，现在必须澄清某些情况，并把那些最坚决的派系引入战斗。另一方面，在“左翼民族主义革命党”中，矿工尽管是多数，却不得不同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打内战，这些知识分子要同从军队到美国大使馆的一切人们保持良好关系。这就推迟了我们正在要求的反帝政治团结的过程。

记者：这是不是说游击队并不是计划中的最重要部分？

科列：这是说，游击战、造反是战斗的一个方面，但它显然不是我们正在承担的唯一活动。这些活动是互相依赖的联合行动。你应该懂得，当城市群众、矿工和农民的战斗精神鼓起来时，游击队将越战越强。

记者：你会认为，玻利维亚游击战争的爆发，是你们党内古巴路线的胜利么？

科列：我们相信，游击战争在玻利维亚爆发的时机是恰当的。我们认为各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各国的斗争条件来解决它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众行动会有助于求得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团结，并一举而扫除关于立场问题的一切猜疑——例如，被人认为所谓亲莫斯科的各政党的立场，硬

说它们反对用军事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和平共处是苏美之间的政策，因为它们企图避免一场热核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共处要强迫我们共产党人在我们国家内放弃阶级斗争或反帝斗争。这从我们现在支持游击战的立场中很可以看出来。^①

但尽管科列硬说他的党正在支持游击队，事实却是，他或玻共都不准备接受游击队的建议，即组成一个广泛的反帝阵线以尼阿卡瓦苏山地丛林而不以矿区或拉巴斯作为焦点。德布雷对此并不惊奇。他在《革命的革命？》中写过：

在武装斗争开展以前要结成这样一个反帝阵线是很困难的，假若希望它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阵线，而不是选举期间所建立的联盟或是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订立的合约。组成广泛的反帝阵线是通过人民战争来实现的。^②

四、五两整月，格瓦拉似乎全神贯注于军事，以致在他的日记中不大注意到玻共是否提供援助。但在5月底，他未作进一步评论地写道：“通过科列，玻共许愿它要合作，表面上没有什么保留。”这可能是引证智利人的访问记，因为他也许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过。

6月中，格瓦拉的游击队找到一个孩子保林诺，这孩子似乎准备以交通员身分进行帮助。他们要他送若干信件到最近的大城市科恰班巴去。他们希望通过他来同城里和玻共取得联系。格瓦拉在月底写道：

① 何塞·戈麦斯·洛佩斯为《闪光》杂志访问豪尔赫·科列·奎多的记录；引于《世纪报》(圣地亚哥)，1967年5月14日。

② 雷吉斯·德布雷：《革命的革命？》，第126页。

甚至同党也欠缺联系，虽然我们通过保林诺试图取得一些结果。……我们最紧急的任务是要同拉巴斯重新接触来补充我们的药品和军需供应，并从城里争取招募约五十人到一百人，即使在行动中战士的人数从未超过十人或十五人。

7月中，游击队员们在再去保林诺的村里时，就找不到他的形迹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军队已经通过这个区域。游击队员们问了保林诺的熟人，“他们不知道保林诺想干什么，只晓得军方因为他曾经充当我们的向导而正在找他。”

这是游击队要同城市取得联系而作的最后努力。但格瓦拉继续焦急地收听无线电广播关于整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消息。值得重提一下的是，游击中心的目的不在制造一次革命，而是为一次革命创造条件。格瓦拉认为，把一群人插入早已是爆炸性的政治局面中，可以导致一种积极的效果。在早几个月期间，他显然感到一切正按计划进行。5月底他报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战役使军队遭受损失而我们则一无伤亡……这是胜利。”6月中他写道：

有兴味的事情是国内的政治震动——有惊人数量的关于勾结与反勾结的传闻。看来游击队作为催化剂的可能性很少比这更清楚的了。

一个月以后，7月14日，他以相似的心情写道：

真正革命党和玻利维亚社会党已退出〔巴利恩托斯的〕“革命阵线”；农民们由于巴利恩托斯同长枪党结成联盟，向他提出警告。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

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下一周他又提到：“有着关于巨大政治危机的消息，而且我看不到这种危机将怎样结束。”6月间政府军队已经占领高原上的矿区，这连同格瓦拉游击队的存在，在拉巴斯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危机。假若玻共或某个以城市为基地的其他政党有着准备并且能够利用这种情势，尼阿卡瓦苏游击中心也许能达到它的目的。但拉巴斯反对党政客们竟软弱无力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不能握住对他们提供的时机。

格瓦拉的另一论点是游击中心可能惹起美国干涉。早些日子他就对此论点很抱乐观。4月间他写道：

美国人宣称派往玻利维亚的军事顾问是原定计划的一部分，而与游击战无关。也许我们已出现在一个新越南的第一个回合中。

月底他下了如下断语：

似乎可以肯定，美国人将在这里用实力进行干涉。他们早在派送着直升飞机，显然还有“绿贝雷帽”。

然而，以后到了7月底，他似乎猜测到美国的干涉可能会对他的游击战理论产生相背离的影响，他写道：“政府中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但美国正在给予小额信用贷款，这按玻利维亚标准来讲是大有帮助的，它有助于缓和人民的不满。”也许这是格瓦拉在制订关于在拉丁美洲创造“第二个越南”的必要性这种论点时忘掉了的一个方面。美国的弓有许多根弦，而并不是所有这些弦都是属于军事的。

九 华金的命运

4月份头三个星期，游击队战略主要是决定于要送走“来访者”^①的需要。4月10日在伊里皮蒂发生冲突，是由于他们（“来访者”）试图前往古铁雷斯。这条出路被封锁后，游击队就走向穆尤潘巴。格瓦拉的计划是在那里行动一小段时间，然后北退，大概是要抵达他于2月间侦察过的地区，即格兰德河北边。但当游击队一行试图护送走德布雷和布斯托斯的困难期间，他们丢下了由古巴人华金率领的后卫队。这个后卫队除了华金而外，包括两个古巴人和五个玻利维亚人。他们于4月15日离开主队，华金接到的指令是“在这地区内显示一下实力，俾能压住敌人的机动性”。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要等我们三天；三天以后他要留在区内，不作任何正面的战斗，等候我们回来。”格瓦拉一行继续向穆尤潘巴挺进。4月16日，格瓦拉发现塔妮亚和古巴人亚历杭德罗掉队得厉害。他们两人都发高烧，因此决定要他们连同另一玻利维亚人和秘鲁医生参加后卫队。次日，格瓦拉为进军速度很慢而恼火，命令四个走得最慢的玻利维亚人留在后边参加后卫队。莫伊塞斯·格瓦拉的身体情况也很坏，他也参加了后卫队。

这时华金一行共有十七人，其中许多人都有病而需要恢复健康。摆脱了他们以后，格瓦拉一行包括十二个古巴人、两个秘鲁人和十三个玻利维亚人才能以较快速度前进。但是对于一个游击队来说，二十七个人是稍微少了些，而在几天以后，使格瓦拉非常焦急的是听不到华金的信息。嗣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战略不能不

^① 指德布雷等一行。——译者

是设法寻找迷失的一行。不幸，他们是注定永不重聚了。

5月整月，格瓦拉一行留在尼阿卡瓦苏区寻找华金。第一个周末，他们回到他们的一个老营地，补充已经减得很少的食物。军队士兵已经离开这个营地，但他们很巧妙地守在卡萨卡拉米那。到月末，这一行开始沿铁路线北进，这条铁路是作为卡米里与圣克鲁斯之间的交通主线的。格瓦拉断定华金已朝北走，因此认为在格兰德河以北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他。

现在他开始在大致象一个四边形的地区内活动，北边以圣克鲁斯到科恰班巴的柏油路为界，西边以马太拉尔通过巴列格兰德到普卡腊的很坏但尚可通行的路为界，南边以格兰德河为界，而东边则以圣克鲁斯-亚奎巴铁路线为界。这个区内有两条重要的河流，都是流入格兰德河的：马西库里河朝南流，弗洛里达河则往西流。整个区域都是山地，丛林复盖，并被深谷所阻断。实际上没有什么公路，只有小路，偶有走成的路。极少人住在那里。

玻利维亚陆军第八师在前外交部长华金·塞特诺·安纳亚上校的指挥下，把一个营放在阿瓦波，还有一个连放在马西库里·阿瓦霍，以防止游击队越过格兰德河。但在6月10日，游击队未遇阻击就偷过了这条河。可是，有一农民告诉阿瓦波的军事总部，总部随即派九十名士兵组成的队伍朝南开去。次日有一次小的遭遇战。

这次交锋以后，军方认为游击队已经越过格兰德河重新走回尼阿卡瓦苏去。但事实上，他们扭头往回跑，继续北进。6月19日他们在摩洛哥村附近重新出现，那里有若干农民居住。但其中两人是从巴列格兰德主要基地派到摩洛哥的谍报官员，他们乔装成农民来监视游击队的行动。他们被游击队所俘获，但两天后被释放了。从那里把消息带回巴列格兰德，报称游击队又往北移。军队于6月26日赶上他们并在皮拉伊附近打了一次遭遇战。一个士兵被打死，两个受伤。在游击队方面，格瓦拉最亲密战友之一图

马被打死了，庞博受了伤，必须扶上骡背行走。

在此阶段，玻利维亚当局十分惊恐，因为皮拉伊离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公路不远，事实上离圣克鲁斯城也不远。但游击队并不继续向北进军，而是朝西进入许多河流汇合的区域。这是全然进不去和接近不了的区域，按照塞特诺上校的说法，他们可以耽在那里好几年而不被发现。7月3日，一个乡下人向驻扎贝尔美霍的军方报告，游击队已在这片很困难的地区。

三天以后，7月6日晚十时，游击队进入圣克鲁斯-科恰班巴公路上的拉斯奎瓦斯。听到这消息后，圣克鲁斯当局电话通知驻留萨迈帕塔的军队沿公路前往拉斯奎瓦斯。可是，游击队员们正听到这段电话对话，因此对军队行动已经摸到了底。他们征用了一辆旧的公共汽车，并于十二点三十分刚过午夜，到达萨迈帕塔。这时，负责军官正在把军需品发给他的军队。他听到一辆卡车的声响，没有提起他的步枪就奔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游击队。

在随后一阵混乱中，打出了一枪，杀死了一个士兵。游击队在公路干线上的电话局停留了一下，把电话机拆下来，并讯问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药品。他们需要抗菌素以及治气喘病的一些药品。

冒险进入萨迈帕塔是一次引起外界注意的突击，过后游击队又往南退到进不去的区域，并失踪了两星期。7月19日他们被发现在埃尔费洛，同月27日在埃尔杜兰发生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冲突。一个向导被杀，一个士兵受伤，而游击队则毫无损失。7月30日再往南面又发生一次冲突。由于先遣队司令的错失，军队死了四个人，受伤六人。游击队有保尔和里卡多两人丧亡，帕乔一人受伤。他们还丢失了十个巨大的背包。

同时，华金一行继续在格兰德河南面尼阿卡瓦苏区进行活动。由于有塔妮亚在一起而又不可能为她找到一条逃离之路，再加上某些队员持续生病，他们的机动性受到阻碍。可是，7月20日这

一行在蒂库恰附近打了一仗后，发生了第一起开小差者，从高原来的两个玻利维亚人，名叫钦戈洛和欧塞维奥的，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在战斗的混乱中开了小差。他们出发前往苏克雷，却在穆尤潘巴附近的丘利亚亚库村试图卖掉一支步枪。感到慌张不安的农民报告了军方，随即开始追踪这些开小差者。在蒙特亚古多，他们以五元钱的代价把这支枪卖给了当地学校校长。他们继续前进，当他们暂停下来要泅渡蒙特亚古多河时，他们遭到鲁文·桑切斯少校的突然袭击，这个军官就是在伊里皮蒂伏击战后被游击队俘获过的那个人。

开始这两个孩子否认曾充当过游击队员，但用一支枪略加威吓，就使他们泄露他们确曾当过游击队的队员。然后他们开始同军方合作，进而透露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尼阿卡瓦苏的岩洞——亦即3月23日伏击战以后建筑的那些岩洞。他们于8月4日领军队找到第一个岩洞。其余两个则于随后几天内找到。^①

这些岩洞的发现是游击队遭受的最严重挫折之一。格瓦拉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这是他们给予我们的最难忍受的打击。”仅在五天以前，他曾派三个人回到尼阿卡瓦苏打开其中一个岩洞去搬取他所需要而在对萨迈帕塔的袭击时他们所不能获得的药品。现在他只得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的情况下来克服气喘症了。这是对格瓦拉个人的坏消息，而对于整个游击队来说，岩洞被搜获的含义是十分严重的。现在他们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回去给新招募来的队员找寻供应品或发武器了。军队不但俘获了格瓦拉的药品，而且也搜取了供应品与无线电设备，这些都是关系到游击队的任何未来发展的紧要物品。现在他们被孤立得与世隔绝了。

更严重的是有关城市联络网的照片和证明文件被俘获了，特

^① 这一记述引自达克：“两个报童害死玻利维亚游击队”，《国际公认》（拉巴斯），1968年2月第2号。

别是一张照片，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游击队员坐在因蒂·佩雷多与科科·佩雷多之间。这就是洛约拉·古斯曼这位游击队城市组织的司库，她曾于1月间访问过尼阿卡瓦苏营地。她随即被认明并捕获了；而且依据从她屋里搜出来的材料，连同从岩洞里俘获的材料，当局便不难一网打尽城市中支持游击队的一批人。

8月中游击队得以生存（且不要说成功了）的唯一希望，是重新结聚他们的力量。不知道是由于什么魔术般的巧合，格瓦拉一行和华金一行都开始各自朝向他们于2月间访问过的农民奥诺拉多·罗哈斯的屋子走拢。没有一方知道另一方也有此意图，但到月底，格瓦拉从北边，华金从南边，彼此相向逐步靠近。

8月30日，华金一行出现在格兰德河北边，到了奥诺拉多的农场“普埃斯多毛里西奥”，这个地方在巴西库里河的东岸，就在巴西库里河从尼阿卡瓦苏河上游一些地方流入格兰德河之处。当晚六点钟，这个小农场的狗开始叫起来，三、四个游击队员出现了。他们发现三个农民正在那里吃晚饭。游击队员买了一些东西，并把这些农民监禁起来。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农民正象格瓦拉一行早些时候碰到的一样，实际上是由士兵伪装的。其中一个设法逃出来，没有穿上鞋子通宵走路，于次日晨到达拉拉哈，他发现军队的军官们正在那里打排球。在此同时，游击队撤退到农场后面的山上去。

以拉拉哈为基地的军队急忙开回“普埃斯多毛里西奥”，那里的主人奥诺拉多告诉他们，他已同意于次日指点游击队在什么地方渡河。华金原计划绕道回往尼阿卡瓦苏。军官把六个人放在河的一边，二十九个人放在河的另一边，这些士兵从早晨六点钟一直等到傍晚五点钟。那时，有一个游击队员布劳略出现了。他渡过这条河并看看一切是否稳妥。然后他招手叫其他队员跟进，一共有十个人。当他们正在河中泅渡时，岸上的射击开始了。他们试图丢掉背包进行还击，但在齐到胸口的河水中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最后两个人塔妮亚和华金还能够还击，但也只是短暂的。整个一批人都被消灭了。后来把他们的尸体运到了巴列格兰德。这是玻利维亚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格瓦拉一伙就在次日赶到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不可能同华金一行汇合，乃向西塔纳斯方向移动，最后于9月24日进入小村庄“阿尔托塞科”。

早晨五点钟，当最早一批村民走出屋外的時候，他们发现他们的整个村庄已被游击队员们控制了，这批人正占据着要冲地点。游击队员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讯问电话所在地，它是安在村长家里的。他们闯入他的家里，并将电话线割断了，虽然事实上这架电话机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通话了。^①

一小时后游击队“头头”到达了。当地农民说他是骑在骡子上来到的。这人中等身材，披着长发。他似乎是病了，农民们不得不帮他跨下骡子。

游击队购买了衣食，然后在离村约二百米的一座被废弃掉的半毁的屋子扎营。他们一共约有二十个人，日间休息。

当晚八时三十分，他们在一所学校里组织村民开了一次会议，由因蒂·佩雷多和切·格瓦拉主持会议。因蒂讲道：“你们一定认为我们是疯子，所以象这样打仗。他们说我们是匪徒，但实际上我们是为我们而战斗，是为工人阶级而战斗，为挣钱很少的劳动者们而战斗，而军人们却挣大钱。你们只是为他们做工。而他们究竟替你们做过些什么呢？唷！我们刚刚割断这根电话线，以为它是通话的。现在看来，它甚至是不通话的。你们在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你们正象所有的玻利维亚人一样，被他们抛弃了。这就是我们在战斗着的原因。”

因蒂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呼吁任何有志的村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一起战斗，直到“最后推翻巴利恩托斯”为止。但在这时，格瓦

^① 这段记述引自艾德温·查孔：“游击队占领阿尔托塞科五十二小时”，《现状报》（拉巴斯），1967年10月4日。

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们要求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参加，而不是强迫你们。我们从不采取强迫手段，但是任何人只要有意参加的，都将受到很好的接待。”

然后切开始他的演说。也许为了试图提高他自己战士们的士气，而不是要想感动村民们，他说：所谓塔妮亚、华金与其他游击队员于8月底在伏击战中被杀并由军方在巴列格兰德展出尸体，乃是假的。“军队方面说它已经打死了华金和我们的其他同志。但这是谎言，这不过是军队的宣传手法。他们在巴列格兰德展出的尸体是从墓地运去的。他们并没有打死游击队员。这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因为仅在几天以前，我还同华金通过信息。”

讲了半小时以后，切结束了他的演说。“我们将在每一个国家战斗，把它从美国压迫下解放出来。你们曾经听到圣多明各的事情。它是象玻利维亚一样的国家。美国人进入那里并且屠杀了只要求改善生活的许多农民。同样的事件也将在这里发生。这就是我们正在从事战斗的道理。”

但在当夜晚些时候，有个农民走近一个年轻而没有胡子的游击队员，问他是否能参加他们的队伍。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发疯，你还看不出我们已经受够了么？哎！我们自己甚至也不知道怎样从这里脱身。”

事实上，切与科科曾经同村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区域通向四方的道路，并且试图获得军队踪迹的情报。次日，他们向伊格拉拉斯方向前进；但是9月26日他们却在那里跑进了玻利维亚军队的阵地。科科·佩雷多和另外两人（包括古巴人米格尔）被打死了。

在这阶段，由于塞特诺上校把刚在美国特种部队在拉埃斯佩兰萨训练结业的六百名新的玻利维亚“突击”部队投入战斗，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因此，在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内遍布了军队。此外，军方还得到了两个原游击队员的协助。其中之一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弗洛雷斯（即莱昂），是一个开小差者。另一个是奥尔

兰多·希门尼斯·巴桑(即坎巴),他是在科科死后一天由于掉离其他游击队员并由于用光了子弹而被俘获的。两人都提供了游击队去向和情况的情报。从他们的证词中,似乎没有疑问,剩下来的一伙要想突围而去。他们曾在阿尔托·塞科购买衣服和刮胡子刀片。但事情也很清楚,他们已被包围,而且只有很小的逃出机会。他们在伊格拉斯区域设法顶了十天,但于10月8日下午一时半陷入了一群士兵的阵地。

十 切·格瓦拉的被俘与死亡

“游击队战士必须永远不为任何理由而让受伤的战士处于敌军摆布之下，因为这势将置他于死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从交战区转移到安全地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并冒最大的危险。”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游击战》

1967年10月8日星期天的早上，由切·格瓦拉率领的十七个人的游击队，躲藏在尤罗峡谷这个狭隘的树木繁茂的峡谷里，循着这个峡谷往下便通到格兰德河——一条从玻利维亚心脏地带往下流向亚马孙河去的大河。他们在空旷的高处看见军队的移动，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入极端艰难的境地。他们显然已被四面包围住，唯一可能逃出的路线在于通往格兰德河的峡谷。格瓦拉评论道，如果他们在下午一点钟以前被迫卷入一场战斗，情况就会恶化；但如果他们能够坚持到四点钟不进行交锋，他们就可以脱险，在夜幕掩护下逃离。

他征求六名志愿队员在必要时用火力掩护主要队伍从峡谷地面上溜下去。从自报的志愿队员中他选了因蒂·佩雷多，此人从两星期以前他的兄弟科科死亡以后已成为队里玻利维亚人的头

头。他还选了另外两名玻利维亚人达里奥和“塌鼻子”以及三名古巴人庞博、贝尼格诺和乌尔瓦诺。庞博已经当了他的卫士达八年以上。

这队敢死小组刚进入阵地，射击就开始了，时间刚过下午一点钟。格瓦拉率领的主力队迅速开始滑下峡谷直趋格兰德河。但他们不知道包围圈事实上已经密合，而且不久他们就冲进了在峡谷入口处守候着的士兵的阵地。适得其反，倒是那些志愿担任最危险任务的一伙设法逃了出来。格瓦拉一行本该比较容易对付局面的，却陷入大占优势的兵力之下。

格瓦拉本人腿部中弹，他试图在一名玻利维亚矿工威利的协助之下脱险。后来逃到智利的庞博说道：“我们试图援救他，但不可能做到。我们的人少而他们的人很多。”

切和威利被俘了。一起被俘的还有帕乔与“中国人”，他们也受了伤。虽然一名玻利维亚军官用无线电叫直升飞机来，但因战斗还在进行，飞机在峡谷中着陆就被认为不安全的。把被俘者押解到了附近村庄拉伊格拉。从巴列格兰德军事总部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载有一名玻利维亚上校和费立克斯·拉莫斯；后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雇用的古巴流亡者，配合着圣克鲁斯郊外美军基地进行活动已有数月之久。拉莫斯据信在古巴时便已认得格瓦拉，当场盘问了他，但没有取得任何情况。

军事当局虽在原则上已经作出决定，即格瓦拉一经俘获，立予枪决——正如90%的游击队员落入军队之手时一样——，但只要玻利维亚的军官们没有接到从拉巴斯来的直接授权，他们并不急于履行这项命令。而这项直接授权并未立即到达，因此格瓦拉得在拉伊格拉过夜。假若他能够活着被飞机载送到巴列格兰德，那里驻有两、三位当地或外国新闻记者，那么就不可能证实后来成为官方编造的故事，即他是在战斗中因伤致死的。

次晨黎明，军区司令官华金·塞特诺上校从巴列格兰德乘直

升飞机到达,以便确认被俘者是否真是格瓦拉。九点钟前不久,这架直升飞机载着上一天在战斗中打死两个玻利维亚士兵从拉伊格拉出发到巴列格兰德。当天上午晚些时候,这架直升飞机又回到拉伊格拉,带来了执行枪决的命令,它是从无线电传送并由总统巴利恩托斯将军与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签署的。于是安顿在村庄学校教室里的格瓦拉便被一个微不足道的玻利维亚军曹马里奥·德兰枪杀了。威利以及其他被俘者也随即被就地处死了。

下午一点钟,塞特诺回到巴列格兰德,并向等待在那里的新闻记者宣布了格瓦拉伤亡的消息;当天傍晚五点钟,这架忙碌不停的直升飞机把他的尸体从拉伊格拉运来,放在巴列格兰德医院的洗衣处。在这里调度的,是另一个中央情报局人员,也是古巴流亡者爱德华多·冈萨雷斯,而拉莫斯则藏在幕后。^①

那天(星期一)以及第二天,当局给予新闻记者以一切便利,察看格瓦拉的尸体;但到星期三,尸体已经不见了,这便引起猜测:玻利维亚当局正设法不让格瓦拉的兄弟前来验尸,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赶到现场,但为时已迟。有一系列无法证实的谣传,说尸体已被埋掉或被火葬,两手和头已被割断。事实上,尸体于星期二午夜用一架小飞机从巴列格兰德运出,随机出发的有两个玻利维亚军官和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尸体的最终去处,至今没人知道。正象有些人揣想的那样,它也许被拐带到美国在巴拿马的基地了。更可能的是它被摔出飞机,落在某一荒无人烟的地带了。可以肯定的是,它永远不会被找到了。

玻利维亚人阻止人们查询追究。那些对新闻记者谈论过多的高级军官受到了责备或者丧失了升官的机会。低级军官则被送往

^① 路透社记者克利斯托佛·罗伯同我,当天都在巴列格兰德。我们听别人说,负责调度的那个头发脱落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是拉莫斯,罗伯就据此把这个名字写在他的报道中。但安东尼奥·阿哥达斯明确地对我说,拉莫斯事实上是在拉伊格拉。我们在巴列格兰德整天看到的人则是冈萨雷斯。

国外留学。有格瓦拉处死迹象的拉伊格拉学校教室，现在被关闭了，并预定予以拆除。但是物证尽可毁去，而有力的神话则将流传下去。

星期天早晨在盖布拉达特育罗峡谷里的十七个游击队员，其中七个人于次日午刻死去。除了同切一起被杀者而外，有两个古巴人（阿图罗和安东尼奥）和一个玻利维亚人（阿尼塞托）于星期日下午在战斗中被打死。切一行十一人中，只剩下四个人——玻利维亚人保罗和查帕科、秘鲁人欧斯塔基奥以及古巴人莫罗——有时以“医生”知名。

这四个人永远不能同因蒂·佩雷多率领的六个人重聚。当因蒂一行设法突破军队布置的包围圈时，这四个人仍困在包围圈内。他们于10月12日同军队交锋两次，在波特雷罗·埃尔·纳兰哈尔打死了四名士兵和一个向导。但到10月14日，他们在米斯盖河与格兰德河汇合处的埃尔卡洪岛上被俘获了。他们曾经试图渡过这条河流。当天晚上，他们在监禁熟睡中被枪杀了。

因蒂的敢死队是最幸运的。他们留在这个区内长达一个多月，只损失了“塌鼻子”一个人，是11月15日在离马太拉尔十五公里处的一次冲突中被打死的。

活着的三个古巴人和两个玻利维亚人，挣扎着到达科恰班巴，由他们的支持者隐藏下来。两个玻利维亚人因蒂和达里奥决定留在玻利维亚，但是三个古巴人（庞博、贝尼格诺和乌尔瓦诺）则由城里的另外两个玻利维亚人伴同，旅行到高原，于1968年2月越境进入智利。他们被准许从那里回到哈瓦那。

在格瓦拉游击战运动期间，玻利维亚革命究竟怎样呢？假若它是革命的，那么它在革命的国家中具有它独特的性质，即近在十五年前，它曾经有过一次够得上说是真正的革命。

1952年以后，上层阶级逃掉了，军队被解散了；在人口中占优势百分比的大量印第安人，依仗着所取得的公民权利，依仗着土地

义

改革，进入近代社会体制之内。但是革命的方向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不久革命领导人内部就发生了纷争。曾经发起这些变革的大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权力的腐蚀作用的压力下分裂了。1964年后，一次政变使巴利恩托斯和奥万多上台执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领袖们只得流亡国外。

土地改革的效果以及农民对此改革的确切态度，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因为在这场游击战运动期间，玻利维亚社会中另一潜在的激进成分即矿工，实际上是处在斗争之外的。在早几个月里，矿工们显得坚定地支援游击队。从矿区无线电广播站源源发出赞成武装斗争的宣传。在“二十世纪”大锡矿区有着矿区内部的一处射击场，矿工们正受游击战的训练。在矿工联合会的集会上，号召矿工们出钱捐助给游击队事业。

但在1967年6月，巴利恩托斯总统对此进行压制。军队开进矿上。矿工和几十个无辜的人被枪杀了。无线电播送器销声匿迹了。矿工只能对于游击队暗中支持而不能公开活动，虽然有一大部分本可调用于游击区域的军队必须留在矿上，以便强迫矿工们保持中立。

与此相比，农民阶级则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对于1952年革命后发动的土地改革的效果，很难作出任何有确实根据的概括。它在某些地区是成功的，但在另外地区是失败的，有些地区则全然无所触动。如果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那倒是令人惊异的事。自给自足的农业上的种种问题，决不能用简便地通过一纸法令的办法予以解决。

较之单纯落后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自1964年巴利恩托斯把他的老领导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赶出国外以后，某些地方的老地主从阿根廷和其他国家偷偷地回来，要求恢复他们对农民阶级的控制权利。在某些地区已有迹象表明，法律的执行开始使地主得到的利益胜过农民，并且在若干场合，农民不能按法定权利取

三批

得土地而必须出价购买。农民协会的激进的领导人已经悄悄地被比较驯服的一些人代替了。

所有这些,如果是大规模发生的话,很可能构成一项重要的因素来引起居民日益增长的不满,虽然也不难得出结论:农民阶级中的很多人,即使没有由于〔当局〕不守诺言而确实弄得情绪沮丧,他们至少也是以冷眼看待世事的,因此不能成为一支有效的激进政治力量。大部分农民可能对于早已得到的东西感到满足,并且暂时心安理得地支持巴利恩托斯。巴利恩托斯对他曾经亲身参与的1952年革命的各项成就势必不会公开提出反对,不论他是怎样尽量试图召回那些1952年以前的人物来支持他本人的相当摇摇欲坠的政治地位。在某些地区,巴利恩托斯确实能够集合武装的农民举行反对游击队的示威,虽然这些集会很可能是经过幕后策划的。

土地改革能在某些情况下在实施中对抗农民的事实,显然可以同五十年代南越的情势相比拟,当时在南越实施的土地改革加强了地主的权力,也确实使农民们对于吴庭艳政权更加疏远。

正象南越一样,玻利维亚是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两方面受到美国支持的。从1952年以后,它的经济就已经操纵在美国人的手中,1958年在西莱斯·苏亚索总统政权下开始接受军事援助,那时正是矿工的武装被缴械而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所建立的“民团”被解散的时候。

美国人在维阿查(拉巴斯)训练了两个团来看守首都。然后训练了一个高山营并以查拉柯罗(奥鲁罗)为基地来看守矿山。一个突击营放在科恰班巴来监视农民,还有一队有河流作战经验的部队守在极北的里维拉尔塔,因为美国人认为这是游击队从巴西越境到秘鲁去的地区。最后于1967年,在圣克鲁斯郊外拉埃斯佩兰萨训练了另一突击营。1965年开始进行反游击战训练,虽然那时称之为“勘乱”(训练)。后来,它又改名为“国内治安与开发”。

人们也不应当低估美国对于玻利维亚国内情报工作所出的力。游击队的城市联络网是不会被发现的，如果玻利维亚的谍报机构没有得到〔美国人〕协助的话。玻利维亚人也不会想出在游击区散布乔装成农民的士兵。玻利维亚外交部长在10月间的一次“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出现的压倒一切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说不是玻利维亚人准备好的。在格瓦拉死亡的那天以及在此前一星期以内，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很多人员出现在巴列格兰德。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格瓦拉之死与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消灭，使拉丁美洲武装斗争的战略过时了。但这将是过高地估计了游击队。在这块大陆的任何地方，暴力革命的前景从来没有怎样特别好过。1967年3月以前，当玻利维亚游击战第一次成为新闻时，游击战运动就处于退却状态。秘鲁的游击队被扫除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与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面对着内部分歧以及外部敌人而处于守势。但尽管有这些挫折，许多人继续准备支持武装斗争。玻利维亚游击战的爆发与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成立鼓舞了他们；前者的失败与后者之显然软弱无力，未必能够抑制那些胸中充满革命怒火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格瓦拉之死将是一种启发，一种挑战，而不是战略上错误的证明。

有些人认为格瓦拉选择玻利维亚是错了，说是那里的农民本质上是保守的，急于想保持住从1952年革命中取得的少量东西。但这没有击中要点。格瓦拉战略中的武装斗争，旨在为一次成功的革命“创造条件”。只有毛坚持游击队必须“如鱼得水”那样进行活动。

在玻利维亚东部，很少有“水”。游击区以缺少人口著称。游击队确曾遇到的有些农民诚然是对他们抱有敌意的，但可能并不比在马埃斯特腊山头六个月里的古巴农民更抱敌意一些。游击中心的发动阶段经常是最困难的——阿根廷的萨尔塔游击中心甚至

在它从秘密阶段冒出头来以前就被摧毁了。

也许有人会说，农民们并不太保守，也并不缺乏要求土地的渴望，而是游击队的知识分子气息太浓了。有一次，华金这一批人到一个农场去向住在那里的农民购买食物。他们试图把他争取到他们的事业方面来：

他们说：“当民族解放军胜利的时候，你会有拖拉机、学校甚至有一所大学。”

农民问：“什么是大学？”

游击队的发言人回答道：“大学是高等学校学生去读书的地方。”

“谁是高等学校学生？”

“那些读完了中等学校的人。”

“那么他们又从那里来的呢？”

“他们将从你们自己那儿来。”^①

然后游击队走他们自己的路，而把弄得莫名其妙的农民留在后面。

但如果从这段关于互不理解的颇为可悲的故事中得出结论说，游击队在他们探讨该为玻利维亚做些什么事情时完全错了，那也是不对的。假若他们能够生存得更长些，人们倒可以更好地判断，尽管有过1952年的革命，玻利维亚是否仍然处于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之中。就现在的情况而论，那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无论如何，可以合理地肯定说：农民们从土地改革所得到的东西是无法确保的。今天的农民尽管漠不关心，明天，他们也许要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利而战斗，因为不论巴利恩托斯政府的外表如何，从根本上说，它同农民的利益是处于敌对地位的。它对矿工们也是同样

^① 《日报》(拉巴斯)，1967年8月19日。

敌对的。矿上的情况几乎可以作为资本家压迫的教科书例子：军队开进来了，工资减半，工会被摧残了。不满弥漫全矿区，而且缺乏真正的出路。

在这些环境之下，游击队对于玻利维亚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的分析，并不离题太远。他们的错误也许在于未能说明，他们的游击中心所引的火种怎样能使全国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在他们为革命“创造条件”的努力中，他们选择了一个漠不关心的地区，使他们在丛林中的生活甚至要比通常游击战争所遭遇的更为危险些。即使是切这样自毛和武元甲以来最重要的游击战争代表人物、自里昂·托洛茨基以来最浪漫的革命家，而且也许是自博利瓦尔以来最伟大的拉丁美洲人，也会发觉这个任务超出他的能力以外。

结束语：是革命的失败吗？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①

——卡尔·马克思

目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中有其深厚基础的一场论战正在进行，这是一场关系到游击战对于促进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革命变革有多大价值的论战。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以强有力的论据来结束这一论战，而是为使这一论战更有成果、更具说服力提供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译者

料。因为当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斗争尚在进行的时候，这一论战是不能结束的。本书谈到古巴革命以来在拉丁美洲涌现的主要游击战运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马克思在1848—1849年的经历后曾经做过的那样）：“除了很少几章之外，……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十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自此以后，在本书谈到的国家里，没有再度出现这种成绩，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其他常常被忽略的国家里，游击中心理论，或者它的变种不可能马上获得成功。在小小的尼加拉瓜，索摩查象巴蒂斯塔那样进行残酷的统治，人们不是可以确实感到已经播下一次成功起义的种子了吗？

1967年中，一队青年人，多数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跑到尼加拉瓜中北部山区开始进行训练，收集武装，储藏粮食。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一支训练有素的小分队，曾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有过作战经验，追上了游击队，打死了其中十五名。在死者中，发现十名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他们之中有些曾经在古巴受训，有些曾经在东欧受训。

接着，在尼加拉瓜城市爆发了共产主义的恐怖行动。在莱昂，执政党国民自由党一些政客的住宅挨炸，在马那瓜，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军曹在街上被枪杀……

鉴于这些事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看来至少仍然有力量发动个别的恐怖事件，不管它目前有没有力量象1967年那样出动一支游击部队。^①

^① 外交事务委员会泛美小组委员会小阿米斯特德·I·塞尔登在1968年10月提出的专门研究报告：《共产主义在加勒比海的新战略》，第10页。

这伙青年人是不是奥古斯托·桑地诺的后继者呢？在社会民主的乌拉圭，这个拉丁美洲的“瑞士”，“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十八世纪由于反抗西班牙统治而被烧死的伟大的印加酋长图帕克·阿马鲁的精神后裔——已经使人感到它的存在。

在专家们的心目中，人口只有二百五十多万的小小的乌拉圭，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游击运动的国家。这个游击运动拥有大约一千人，包括一些民族优秀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是一支潜在的精锐部队。这个运动看来与包括古巴在内的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

不仅如此，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图帕马罗斯”标志着拉丁美洲游击战的新发展——把重点放在城市游击战活动上，它的鼓吹者希望这将比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乡村地区树立的榜样取得更好的效果。

去年，“图帕马罗斯”已经给乌拉圭民主政府，造成一系列巨大的震动，而且华盛顿也感觉到它的影响。他们炸毁电台，抢劫许多银行，窃取武器和烈性炸药，并且组织一连串的罢工和暴动……

这个组织的核心代表着乌拉圭政治上和职业上的优秀分子。据信“图帕马罗斯”在政府各部、各银行、各大学和各有势力的工会中占据着重要的职位。^①

1968年10月，惊慌失措的墨西哥政府，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当着外国记者的面，在城市里屠杀了九百名学生，这必然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换言之，不管我们想象如何客观，目前我们对拉丁美洲社会进

^① 马尔科姆·W·布朗：《一小队社会名流反叛分子不断袭扰着乌拉圭政权》，《纽约时报》，1969年1月23日。

程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不容许我们多少正确地描绘未来的面貌。可以有根据地认为,革命的来临,将发生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即使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作者,尽管他拘泥于过去的看法,但并不过分敌视游击队,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思想不成熟、或对国家的情况没有适当了解的一群人,也可能跑到山区发动一场革命。当条件已经成熟,但还不明显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当然,经常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一群革命者,不管阶级斗争阵线的具体情况如何,便决定采取武装行动。采取这种行动时,可能正好碰上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首先是群众热情的问题)。这时,武装斗争便能依靠群众的支持,便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并发展成为一次胜利的革命。经验证明,如果在积聚力量的阶段,便开展武装斗争,这种斗争,可以成为加速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①

但是,在不排除将来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必须从过去十年的有关失败中,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必须弄清楚,游击战运动对遭受的失败应负什么责任。与许多人的主张相反,它们不应对未能发动一次革命负责。这并不是它们的直接目的。它们的目的是为革命创造条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和重大的区别。游击队的态度并不倾向于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已经成熟,而是认为拉丁美洲需要一次革命。因此,革命者的任务,并不是跑到山区,那里挨饿和受压迫的群众,马上把他当作救星看待。革命者的任务,应该象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派那样,到农村去,唤起消极被动的农民,使他们懂得他们受迫害

^① 谢菲克·汉德尔:《拉丁美洲革命者大陆战略的回顾》,《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评论》,1968年4月号。

的性质。当人民觉醒并动员起来时，革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要这样做，就只有拿起武器。因为，在那里，政治鼓动，组织农会，举行罢工，常常都是非法的。只要有起义的最初迹象，得到国家支持的当地地主，就使用他们拥有的力量予以镇压。德布雷在他早期的文章中，曾经阐明这个问题：

没有文化的农民，既无报纸，又无收音机，世代代窒息于封建制度的“社会和平”下，刚有一点反抗迹象，就被大庄园主的秘密警察杀害。他们不可能通过思考、反省和阅读就觉醒过来，或获得政治觉悟。他们只有通过与他们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能解决他们物质问题的人的日常接触，才能达到这一步。他们投身于革命战争，得到反抗镇压和在解放区进行有限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从宣传土地改革的效果来说，从敌人手里，夺得一小块属于大庄园主的肥沃土地，较之一百本附有图片的乌克兰国营农场小册子的效果更大。^①

确实，游击队的努力，至今收效甚微，但是大陆各国共产党（它们活动时间要长得多），甚至争取进步联盟的理想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支配着更多的款项）也是如此。因此，游击队的失败应该与关心拉丁美洲社会和经济变革所有组织的失败，联系起来观察。

那么，游击队迄今在创造革命条件方面，缺乏成就的特殊原因又是什么呢？最好是从最明显的原因着手：

（1）美国进行干涉。根据小阿瑟·施莱辛格为肯尼迪执政年代所写的历史记载，美国加强对游击战的关注，几乎是肯尼迪总统和华尔脱·罗斯托一手搞起来的。1961年5月老挝危机后，总统首先开始对游击战表示关心。这是“从当参议员时就有的的一种念

^① 雷吉斯·德布雷：《拉丁美洲的长征》。

念不忘的心事”。^①不久他便“亲自拟定”反游击战指示。他要罗斯托调查陆军在对付游击战方面做些什么。

他很快被告知说：布拉格堡特种部队的兵员不满一千人。他看了战地手册和训练记录后将其扔在一边，认为训练活动过于“薄弱”和不充分。他阅读了毛泽东和切·格瓦拉论述游击战的材料后，命令陆军也照样去做。（他在乡村度过周末假日时，常常杜撰象“游击队与人民之间必须如鱼得水”一类毛泽东格言，给他妻子消遣。）他要他的军事助手克利夫顿将军把陆军反游击战的标准装备给他看，他检视后，很不满意，命令陆军改进这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最重要的是他指示布拉格堡特种部队司令部扩大它的任务，以对付不发达国家丛林和山区游击战的挑战；而在此以前，它的主要任务却是训练干部，在一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在战线后面活动。不顾陆军官僚机构的反对（它在原则上厌恶另行成立高级指挥系统），肯尼迪恢复了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作为一支新部队的象征。^②

据施莱辛格说，热衷于反游击战的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③1961年秋，成立了一个在马克斯韦尔·泰勒领导下的“反暴乱委员会”，其任务是发展“国家对付非正规战争的能力”。

对于反游击战产生这种新的关注的背景是：美国对拉丁美洲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09—310页。

③ 谁也不应该对已故罗伯特·肯尼迪对待拉丁美洲的极端主义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格瓦拉死后，他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古德温在《纽约人》发表的文章中，坚认美国对玻利维亚的干涉是正确的，而玻利维亚人枪杀格瓦拉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明折衷派的看法。

的军事兴趣不断增长,在古巴革命的压力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就已经发生这种兴趣。当时,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从1903年开始就成为美国的领土)建立了“南方司令部”。目前,这个司令部与欧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和亚洲司令部一起,仍然组成美国的四个大陆军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拥有一个由五百或六百名陆、海、空军军官组成的参谋部,地下办公室,后勤基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火仓库,和许多训练游击战、反颠覆、步兵、伞兵等学校。1962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国派遣了二万名以上的军官,到那里去学习反颠覆战争的新伎俩。

特种部队(绿贝雷帽)四个世界训练基地,其中也有一个设在巴拿马(其他三个设在南越、冲绳和西德)。仅1965年一年,这些部队在拉丁美洲执行了五十二次反颠覆的特殊任务,包括把伞兵部队降落到游击区去。^①1966年和1967年期间,这些部队曾经支援危地马拉陆军,并且在游击队手里遭受过几次失败。1967年,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城外建立了一个以陆军少校谢尔顿·“爸爸”任司令的特种部队训练营地,其任务是训练一营玻利维亚“突击队”,并监视玻利维亚的反游击活动。在委内瑞拉也有两支特种部队在作战。1967年底,特种部队还曾经在尼加拉瓜出现。

越南的经验教训,虽然使美国人在大规模卷入自己部队方面持节制态度,但他们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军事和情报活动确实很活跃。中央情报局对于迅速结束玻利维亚的游击中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暴乱”专家们把“民政”计划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上,这在使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失去农民的支持方面似乎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计划只是使士兵有事可做而已。

游击队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陆军部队几乎一直比游击队处于上风地位。没有一个游击小组拥有凝固汽油弹。不难得出结

^① 《拉丁美洲反颠覆的军事部署》,《拉丁美洲问题》,第7期。

论：对于怎样指挥游击战，现在反游击专家比多数游击队员懂得更多。

(2) 左派缺乏团结。拉丁美洲左派之间很少能够做到团结一致，游击队把左派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努力已遭到明显的失败。卡斯特罗经常强调团结的必要性，而且有理由相信，游击队组织往往只有在优先处理与其他组织的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古巴的援助。可是事实上，在革命前时期，古巴革命运动本身就没有团结起来。菲德尔曾经费尽心机要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树立为领导力量，但总有一些头头不接受他的命令。然而当时的古巴，每一革命组织起码多少都为推进革命事业做点事情。而今天的拉丁美洲，许多革命组织，或者只管自己，或者相互攻击。

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游击战运动除非得到现有政治组织的赞助和支持，否则在其早期阶段就会夭折。实际上，这里指的就是必须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虽然也有例外。秘鲁运动、玻利维亚运动的失败，危地马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极端脆弱，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适当组织起来的政治基础。当然，古巴以及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军是例外。由于共产党完全改变态度，游击队组织目前得不到赞助和支持。这种情况，对于根基已经巩固的组织，象委内瑞拉的民族解放军或者危地马拉的起义军，虽然不一定是致命的，但确实使事情更为困难。

(3) 左派缺乏责任感。与一般想法相反，拉丁美洲各大学，并不是充满着一挥帽就准备上山的大学生。游击队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取得农民的支持，而在于从城市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游击队的组织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下述意见表明，古巴人经常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存在着比古巴当时好得多的革命条件。如果这些国家未曾发生革命，这是因为许多自称为革

命者缺乏信念……

不幸，具有坚定信仰和高度事业感，既有理论修养，又能用事实说明理论的革命者为数过少。如果当具有这种信念的革命者出现的时候，即使寥寥无几，在具备革命客观条件的地方，革命就会发生。历史创造客观条件，而人们创造主观条件。^①

那些否则会上山的人，所以缺乏信念，部分原因在于游击队没有把自己处境讲得确如其分。虽然古巴革命具有这样的初步效果，证明拉丁美洲的革命是可能的，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当随后未能继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时，这种榜样的影响便逐步消失。导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表明，苏联并不准备在保护它的盟国方面承担风险；而美国在圣多明各登陆一事则表明美国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另一稍微类似古巴事件的出现。正如格瓦拉在1961年指出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古巴得到教训……。在我们二十个共和国中的任何一国，它将不会再受一次出其不意的震动。”

游击队试图利用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他们几乎欢迎外国的镇压，希望借此机会激起民族主义的反应。格瓦拉清楚地意识到：游击战争在对付一个非常明确的敌人，特别是一个将会唤醒人民潜在民族主义意识的外国敌人时进行得最好。他的“建立越南”的计划，就是在考虑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但实际上，美国却能够以最大限度的残暴行为和最低限度的直接卷入挫败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

(4) 对本国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例如，玻利维亚游击队看来并不了解自从查科战争^②时期以来，卡米里—巴列格兰德地区一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1966年7月26日的演说。参见我的文章：《拉丁美洲的越南缺少游击队》，《前卫报》，1967年7月19日。

^② 1932—1935年间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为争夺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战争。——译者

直是一个军事要地。当地居民并不敌视军队而是习以为常了。秘鲁德拉普恩特游击队处于容易与该国其他地区切断联系的孤立地带。其他一些游击队，在属于塞罗·德帕斯科公司所有的土地上活动，那里的条件与邻近地区迥然不同。

上述种种是普遍缺乏了解的部分情况。除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报告以外，很少有人研究拉丁美洲农村的情况。越深入地探索这一问题，就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不仅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而且山谷与山谷之间，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由于一时往往弄不清楚的原因，游击队能够在一个小村庄得到支持，而在另一个小村庄则得不到支持。对居住在玻利维亚的卡米里、马西岸里和圣克鲁斯半径一百哩内的农民甚至也不能一般对待。他们在不同的租地制度下劳动，处于悲惨境遇的不同阶段。许多人认为该地区农民所以没有起来革命，是由于1952年玻利维亚通过了一项土改法的缘故。这种看法忽略了许多地区土改从未实行过这种细节。

* * *

事实与普遍的认识相反，拉丁美洲社会两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农民和城市群众——都不是特别革命化的，虽然他们都生活在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困境之下。农民常常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外，多半不受中央政府的影响（除非从被剥夺的意义上说），他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村庄或山谷。当他们果真起来造反时，政府不需费多大气力就使他们平息下去。在秘鲁，镇压和有限的土改双管齐下，使已经焕发起来的革命热情丧失殆尽。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执政党，吸收机灵的农民参加政府机构。哥伦比亚则鼓励农民相互争斗，使他们不向地主进行斗争。危地马拉在美国鼓励下采取的极端野蛮的镇压，已经足以控制住潜在的反叛农民了。

城市无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那些居住在圣地亚哥的贫民区、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利马的工人区，或者住在加拉加斯的茅屋里的人们的生活条件是悲惨的。这些不幸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觉察到贫富之间的鸿沟。如果拉丁美洲有谁因革命而燃起新的希望的话，这应该是他们。可是实际上，城市居民在服务行业中工作的比在制造业中工作的为多，他们模仿上层阶级的举止，想挤进后者的行列而不想取代之。^①他们对革命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

既然农民和城市群众并非燃起革命烈火的直接燃料，为什么游击队集中在乡村而不集中在城镇呢？

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必须承认游击队并没有忽视城镇。格瓦拉在尼阿卡瓦苏扎营的时候，给城市干部发出详细的书面指示；委内瑞拉的道格拉斯·布拉沃经常全神贯注于加拉加斯的形势；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在城市活动中，以牙还牙，为他们死难的同志们报仇雪恨；只要考虑到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在游击战略中，城市起着重要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游击队重视农村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古巴革命者在马埃斯特腊山取得的胜利，推动了古巴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斗争。部分也反映了游击队不再相信正统共产主义者几十年来重视城市的主张。同时经验表明，在加拉加斯和圣多明各（以及在玻利维亚的矿区），镇压部队轻而易举地便控制住城市起义者，并使他们无能为力。

城市起义还意味着在迅速夺取政权之前，需要进行一场短暂的流血战争。游击战原理则要求进行一场持久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战争，由此去创造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漠不关心的群众将逐渐觉醒。如果今天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即使下周爆发的一次城市起义，使某一“革命”组织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这样，通过城市政变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府，将与今天的游击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使淡漠、疏远的农民转变成为一支革

^① 见克劳迪奥·贝利兹编辑的《拉丁美洲的妥协政治》。

命的力量。游击队争辩说：既然迟早必须动员拉丁美洲的农民，现在（在革命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展这项工作要有利得多。

游击队强调农民对拉丁美洲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这或许是游击队对发展理论作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贡献。除几位先进经济学家以外，游击队是唯一的一个组织，强调农民将对克服拉丁美洲目前的落后状态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上文我虽然说过必须从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总的失败中来剖视游击队的失败，但强调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这些组织中，只有游击队单独把农民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分离出来。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并不能代替农业合理地组织起来，这是关于拉丁美洲最起码的常识。不论现在或是直到本世纪末，都不能指望工业能够为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人们提供工作。可以想象得出，引进资本集约化技术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大陆的粮食问题，但这只能起到加速这种趋势的作用：把在乡下找不到工作的人赶到城市去，成为城市的不充分就业者。要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基础，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它把农民动员起来并使他们留在土地上。想使拉丁美洲从史前阶段一跃成为福利国家，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遗憾的是大多数专门研究拉丁美洲发展问题的人，都赞同这种想法。古巴是拉丁美洲全神贯注于农业部门的唯一的国家，而受古巴启发的游击队则是预见到农业部门对未来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唯一的组织。^①

最后，现在就可以看到，拉丁美洲过去十年的游击战经验，即使只能对美洲大陆的未来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而对美洲大陆以外却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是抄袭其他大陆的

^① 很遗憾，在这里我只好同休·托马斯分手了。他写道：“古巴不断加强对农业的强调，这对一个肥沃的岛屿来说的确具有某些意义，但对于象墨西哥、秘鲁，或者玻利维亚那些土地不能供养更多人口的国家来说，却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意义。”——休·托马斯：《古巴的十年革命仍在实验中》，《泰晤士报》，1969年2月17日。

思想的，现在第一次向外输出某种东西。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位世界性的政治代表。南非洲的黑人运动（特别是在罗得西亚和葡属殖民地）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游击斗争是唯一的手段，能够拖垮骑在他们头上的白人政府。由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来到哈瓦那参加1967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旅程赋予游击战运动以新的重要性——不再局限于本半球的南半球。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新的左派一般越来越把自己与卡斯特罗、格瓦拉、雷吉斯·德布雷和胡志明等同起来；许多新的极端分子议论着用‘游击战’来反对美国本土的‘殖民主义’；事实上这些极端分子把黑人战士看作激烈变革社会的革命先锋，正如黑人战士自己认为的那样。”^①在西欧，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

这种发展对拉丁美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拉丁美洲依赖外部达到这样的地步，它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自力更生发动一次革命。一次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只有当美国自己感到进行干预将得不偿失时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美国帝国边缘发动革命的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趋于土崩瓦解。在巴黎和芝加哥事件之后，这种前景并非绝对不可能。新近的事态发展，似乎说明美国在玻利维亚比在伯克利更为强大，在国外比在国内更易于使用海军陆战队。

然而拉丁美洲游击队已经引起了一种重要的链锁反应。如果没有前一年发生的玻利维亚事件，那么1968年5月巴黎事件就不可能采取它所采取的形式。格瓦拉和德布雷已经使青年一代失去对正统革命左派的信任，现在一支崭新的庞大的革命力量正在世界的都市地区兴起。由于尼阿卡瓦苏事件而获得新的推动力的思想，经过巴黎事件的渲染，现在又回到了拉丁美洲。发生在196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夕的墨西哥大学生起义，是受到法国五月革

^① 克里斯托弗·拉希：《黑人的风波》，《纽约书评》，1969年2月29日。

命的直接影响的。拉丁美洲城市里先进的大学生不断起来造资产阶级标准的反,这种活动形式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样板。

同时,即使游击战运动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但它们已经在为未来的变革奠定基础。休·托马斯教授曾经指出古巴革命的各种特点,其中之一是:在卡斯特罗“后面有一种真正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在古巴过去六十年的政治中是根深蒂固的,整整这六十年几乎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度过”。^①他得出结论说:古巴革命本身“是一系列受挫折的革命的顶点”。1965年《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在报道委内瑞拉游击队时指出:许多分析家相信游击队是在“完成一项长远的显然是微小的目标。这就是建立一种存在(即使是变动不定和未起作用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军队受到挫折,使政府受到影响,而首先是使在委内瑞拉政治中有着深厚(虽然是潜伏的)基础的推崇革命心理保持下去”。

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当他们在拉丁美洲布满失败和虚假革命的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探索前进时,很可能会感到那些战斗在山区、不可能有成功机会的小团体,实际上对于培育真正的革命传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革命传统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① 休·托马斯:《古巴革命的起源》,《今日世界》,1963年10月。

附 录 一

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 危地马拉，1964年12月

1965年将成为特别重要的一年，危地马拉社会主义革命将有巨大的跃进。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并成熟了。为此，我们必须手拿武器，制定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纲领，使“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能够领导群众取得胜利。

我们必须在游击战争武装行动的基础上，在整个地区组织占地和夺地运动，组织大学生罢课和占领大学、学院，举行示威游行；在全体工人中酝酿一次总罢工以支持复兴和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共同纲领。

下一阶段必定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扩大游击战争；起初秘密地，然后公开地在南部、西部的大种植园和联合果品公司领地上发展村委员会和农业工人联合会，使工会和劳工委员会与游击斗争联合起来。在这一阶段必定有新的一部分群众参加到直接的游击斗争中来。

游击战争在前进。遍及整个游击区，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农民委员会，村委员会和农场委员会各种组织正在蓬勃发展，这些委员会秘密地执行它们的任务，它们不仅支持和帮助游击队，而且参预和决定农民自己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农民委员会“已经组成武装的农民自卫队，由继续在田地上劳动但也参加某些武装游

击行动的农民组成”。

把游击战争扩展到我国新的区域，涌现新的游击中心和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

城市里正在酝酿着新的工人斗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计划开展一个运动，以争取危地马拉有组织工人的支持，为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领导中心”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大学生斗争与游击队

〔在大学生中间〕……人们看到危地马拉广大群众不满情绪和革命骚动的最直接的表现。

大学生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参加支持游击队的组织工作；赞助、鼓励工人斗争并与之团结一致；推进组成工人学生联盟的工作，去反对佩拉尔塔·阿苏迪亚资本主义专政……

〔宣言满意地注意到“大学生协会”已经起来支持游击战争，指出：〕

除了发表宣言和游行示威支持游击战争以外，“大学生协会”必须同时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它必须把圣卡洛斯大学的群众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公开表示大学生组织与由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和路易斯·A·图尔西奥斯司令指挥的农民游击队和农民自卫军团结一致……它必须在大学生里组织集会，作出声援，刷大标语，书写和分发传单，使城市里充满声援游击队的种种表示。

我们号召“大学生协会”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和所有其它准备支援斗争的大学生组织结成一个单一的阵线。

士兵和游击队

我们号召官兵们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合作，拒绝参加

部队的镇压行动，秘密地组织反对他们长官的士兵委员会，举行起义，带着武器和装备投奔游击队，与农民群众保持友好关系，秘密地准备监禁和审判他们的长官并集体地投奔他们的阶级弟兄——游击队和农民这一边来。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警告所有参与镇压群众的军官……今天或明天，他们所有的罪行将受到群众的审判，他们每个人都将对屠杀、肆意攻击和折磨农民群众和政治犯负直接责任。在革命胜利之前或之后，他们将受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采取过的那种无情的惩罚。

恐怖主义的应用

城市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或固定于恐怖主义的框框之内。在首都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和“起义军”是以自己名义对打击城市和山区敌人的一切行动直接负责的组织。

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依靠单纯的恐怖行动来推翻政府，恐怖行动这种斗争方法只使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专政受到最低限度的影响。它的目的是要把军事行动与社会斗争结合起来。

不论是山区或城市的游击队，他们整个斗争和一切行动都有其既定的政治军事目的：首先是促进、帮助和鼓励各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创造条件来推广全体被剥削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专政和争取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有组织的社会斗争。^①

^①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曾经在别处对恐怖主义的效用作过以下的论述：“恐怖主义从未消灭过一个阶级或推翻过一个政府。它只应被用作支持其他行动的补充活动。例如，举行罢工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政体，当罢工进行到某一时刻，消灭敌人的三个或四个领导人将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它将在敌人的行列中引起士气低落、惊慌失措和混乱，从而使我们可以取得进展。”——阿道弗·吉利：《危地马拉的游击战运动》(2)，第23页。

争取建立大陆的单一反帝战线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特别号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游击队、自卫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同志们联合举行一次游击战会议，由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代表出席参加。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斗争经验和斗争形式，交流组织联合斗争，相互支援及把游击战争和革命战争扩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策略。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建议会议在上述三国任何一国的“游击队控制的自由领土上”召开，并且坚决主张“这次会议必须在1965年举行”。

资本主义专政和选举闹剧的危机

依赖帝国主义援助的资本主义专政，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虚弱，它本来不需求助于诸如选举和制宪会议等假面和闹剧……

[宣言有一节回顾了“世界革命”在遥远的越南、刚果、坦桑尼亚等地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等共和国取得的“胜利”后，继续写道：]

北美帝国主义未能打败南越社会主义革命一事，彻底暴露了它的社会脆弱性……

与危地马拉劳动党和起义军的分歧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不得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对妥协、动摇和改良主义倾向进行政治斗争，这些倾向力图以所谓“民主民族革命”虚假的前景来束缚

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上特别具有这些倾向性……

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领导，拥护赫鲁晓夫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妥协的路线，拥护苏联的特权阶层。它肆意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以他们的政策，推进世界革命，推进许多国家诸如刚果和南越的革命，后者已经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提供有效的支援。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纲领制定的依据是〕……我国群众、古巴、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志们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作斗争，与“和平相处”、“和平方式”等妥协政策作斗争的经验。

如果不武装群众，不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前进……即不可能象古巴那样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最低纲领包括：〕……无偿剥夺帝国主义者的公司和资产，剥夺联合果品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土改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一切帝国主义使团，取消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军事和政治条约；加强与古巴革命的团结……

危地马拉、拉丁美洲、全世界的工人们、学生们、农民们，武装起来！^①

^① 我没有能够找到刊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文。这是引自刊登在1965年7月26日《拉丁美洲时报》的英语摘译译文。

附 录 二

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决议（1965年）：“组织群众，团结群 众，开展人民革命战争”

危地马拉人民正与他们的压迫者进行战斗。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者、地主和资产阶级寡头政治，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特权，早已剥夺了危地马拉人的一切自由和权利。

既然不可能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革命力量已经走上留给我国人民的唯一道路。他们决定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用武力为危地马拉革命铺平道路，组织并推进人民革命战争。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革命不能通过选举来实现。

两年前，“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四月十二日革命运动”和危地马拉劳动党一致同意在起义军的旗帜下协调和联合各自的力量，从而开始了我国标志着团结的武装斗争。起义军的性质很快就为人民所了解，并且赢得了农民、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的尊敬、热爱和积极支持。

组成起义军一开始就存在的错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起义军司令部及其所属机构的严重失算和不正确的、行动迟缓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以及后来存在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领导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持续不断的分裂和挑衅活动，导致体现着武装运动团结一致的起义军的停滞不前，其后起义军由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退出而分裂了。“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在其所

谓“拉斯米纳斯山宣言”（这一“宣言”已被其他组织和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所拒绝）中，把自己打扮成为正在我国开展的武装斗争的唯一体现者。

容·索萨司令领导下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战士们，他们心地正直，勇敢善战，可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的影响，已经走上了损害危地马拉革命运动的道路，对此我们深感遗憾。然而，我们依然从团结的精神出发，向他们伸出兄弟般的双手。我们确信我们将在同一路线上会师，而且迟早将为一切决心用武力战胜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爱国的革命分子赢得胜利。

就“四月十二日革命运动”而论，他们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已经宣布暂时退出起义军。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因为置身于我国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之外，要想克服缺点并加强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来自我国主要“抵抗区”、“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危地马拉劳动党和“爱国劳动青年团”的代表，得到我们组织、地区和游击队的全权委托，聚集在一起分析形势，并把我国大有发展前途的斗争置于一个单独的统一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之下，我们的斗争由于民族危机气氛和革命运动的高涨而蒸蒸日上。

危地马拉革命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它将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建立起来为止。由土地问题和帝国主义统治引起的矛盾和问题现在阻碍着这一过程的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在夺取政权时必须处理的问题。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的不合理分配，一小撮地主占有广阔的地区，而成千上万个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受剥削下的最起码的生活；在于虽然资本主义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半封建生产关系却占着统治地位；在于帝国主义者控制着国家的生活，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损

害我国的民族尊严，并无耻地干预我国的各种活动。因此，在现阶段，危地马拉革命具有土地革命和反帝的性质。

可是，这些矛盾的解决是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危地马拉的最终目标联系着的。我们充分了解这是同一过程密切联系着的两个阶段，但是我们也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有认识这一现实以后，我们才能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或者换言之，才能明白在建立革命政权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托洛茨基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以前，就宣称要解决社会主义问题，这种狂热而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冒险主义和挑衅，正如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一样。刊登在《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各种纲领，除若干要求之外，基本上都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相当混乱的。

我们乐于与“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同志们合作，但是坚决反对他们的托派倾向。我们并不想在目前时机把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反列宁主义倾向来审查，它的比革命还要革命的言词在群众中造成混乱并把群众引入歧途。我们只希望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托洛茨基分子并不是从对国家现实作专门分析，而是从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发展得出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推论。这种推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分析国内发展过程的矛盾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危地马拉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

越南南方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南越人民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武装斗争，而北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南越人民根据国内矛盾来确定他们斗争的性质，把他们的斗争看作是反封建、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第四国际领导上提供的社会主义革命公式，托洛茨基分子很想将其作为共同的样板套到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实际情况上去。这种倾向不仅在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和托派分子第

七次代表大会上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各国托派分子明确表达的类似主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显然，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错误和危险的，尽管它用似是而非的革命空谈包装起来。

如果再加上托派分子持续不断的分裂和挑衅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加强团结或革命斗争，而确实是上了敌人的圈套。

第三，把每一群众运动都归结为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从这种主观臆想出发来描述革命，是完全错误的。确实，应当把群众的迫切要求与革命运动的利益联系起来。但不应该由此推论出群众已经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因为显然而可悲地并不存在这样的觉悟。

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觉悟程度，而是为历史所证实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群众自发创造的，而是在斗争中为他们所接受。列宁自己曾经说过：群众自己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是从外部给予他们的。列宁说，群众自己达到的充其量只是一种集体主义意识。

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动力。为了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革命领袖和革命组织必须经常学习群众的实际经验。但是不应该象托洛茨基分子那样，把群众的创造力看作是全能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们推崇自发运动，这是一种与真正的革命运动格格不入的倾向。

第四，托洛茨基分子关于武装斗争的概念是与人民革命战争的概念背道而驰的。托洛茨基分子从主观愿望和世界革命总公式出发，竭力争辩说，一次迫在眉睫的武装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群众也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危地马拉的托派分子，当他们被迫也谈论起游击战运动的时候，却把游击战看作是最落后的斗争形式，并且实际上呼吁举行武装起义，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托派分子（他们在世界各国都有组织）四十年来的所作所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许多问题，但是没有必要。我们想强调

的是托派分子分裂立场的严重性，他们利用“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威信去迷惑群众。

那么，谁是危地马拉革命的朋友？谁是危地马拉革命的敌人？

综上所述，工人、农民和城市中等阶层是推进危地马拉革命的社会力量。美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地主和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其他成分，如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斗争进行过程中将向两极分化。他们是必须加以考虑并使其保持中立的中间力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动摇性，它与帝国主义妥协并出卖革命的倾向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将取决于它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举动。

因此，革命政权必须依靠革命动力的支持，即依靠摆脱了琐碎的和机会主义的考虑并赢得群众支持的政治组织。我们说过，人民革命战争是通向政权的道路，群众将在革命战争发展过程中参加进来，而革命战争则把群众集合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我们必须暴露议会斗争和合法手段这种完全无望的倾向，并与之作斗争，这些议会与合法斗争的方法只是对军事独裁有利。

我们把危地马拉革命看作是这个伟大革命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在拉丁美洲方兴未艾，而英雄的古巴革命则是这一过程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世界革命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殖民主义体系日趋没落，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同时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和矛盾更加尖锐化。美帝国主义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目中无人，但由于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怒潮高涨，美帝国主义正在失势。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计划，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友谊来往。我们公开宣布我们的行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分析和方法作为指南，历史已经证明它的普遍准确性。

我们将遵循这些共同准则，综合我们人民和国家的最迫切的问题、要求和希望，以便正式制定出一个革命纲领。它包括通过一次深刻的土地改革把土地交给农民，巩固工人阶级的既得利益和权利，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准，实行激烈的结构改革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最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抵抗区”、“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危地马拉劳动党和“爱国劳动青年团”代表大会决议如下：

1. 在“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抵抗区”、危地马拉劳动党和“爱国劳动青年团”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临时革命领导中心，组织和推进人民革命战争。

2. 承担对起义军的全部领导权，采取各项步骤重新组织游击区和抵抗区，并根据战争的需要，保证各部队行使其职能。

3. 根据情况需要，采取主动步骤尽可能团结一切反对军事独裁和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并为建立一个单一的军事和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我们号召我们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和起义军全体战士加紧训练，加强战斗性，组织和动员群众，用敏捷和勇敢的战斗的方法，充分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坚定地献身革命事业，直至牺牲自己。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号召一切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热烈地参加革命战斗，并组成起义军的战斗组织。

我们号召危地马拉人民忠于自己的原则和优良传统，忠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未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他们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战争，以便一劳永逸地清除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我们对于已经牺牲的战士将永志不忘。对于他们的怀念将不仅鞭策我们去消灭杀害他们的凶手，而且鞭策我们去为危地马拉人民建设一个幸福的未来，为了对人民服务，英雄们既不吝惜自己

的鲜血,甚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坚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危地马拉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我们将永远忠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忠于劳动人民的伟大事业。^①

^① 见《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报道》,第56期,1965年10月20日,第41—47页。

附 录 三

起义军宣告脱离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声明

1968年1月(摘要)

赋予领导中心的任务是使“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组织工作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样,城市里的领导中心试图制定一切军事行动计划,而军事部门与各委员会则将其付诸实施,以便适应对事实上的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

由此产生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是政治组织工作。这种双重倾向加剧了运动内部的冲突;没有一个集中的司令部,造成一些新的不成熟的游击中心的出现,它们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参加讨论并解决我们的分歧。已被解散的“爱国劳动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和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开始在各地区组织支援基地,以便建立武装部队。这并不说明运动的真实发展或发动进攻能力的加强。由于意见分歧造成的力量分散(这既是未能建立一个单一指挥结构的原因,也是未能建立一个单一指挥结构的结果)阻碍了“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的发展。

将近1965年底,出现了第一份“为制定战争第一阶段策略提供的资料”。这一阶段被称之为“由于敌人比我们强大而采取防御战略”。据此,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人民参加战争,组织游击区,组织抵抗,组织地下斗争并且利用各种斗争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是一般地组织群众,组织起义军的秘密委员会,同时使党得到加强、恢复和发展。换言之,提高群众的觉

悟,把他们争取过来,带领他们作为战斗员参加战斗,带领他们到基地网去,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军事组织。这一目的不是通过军事战斗,而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来达到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采取过早行动引起敌人的警惕,并在我们组织起来以前实行镇压……”

按照他们第一阶段的策略,“政治军事”组织“环绕”军事行动、自卫组织或游击队进行工作,但不要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从各方面主要是从政治上照顾这些组织,保证它们不仅在斗争策略方面,而且在革命纪律方面不犯错误”。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指导所在地的军事单位的行动,而只是“循循善诱地以革命战争思想,战斗决心,献身精神去勉励战士们”。这些就是危地马拉劳动党(统治集团)的策略。显然,这些从未向敌人宣战,缺乏战斗决心的人不可能是宣传家和组织者。这些人想依靠谈话和讲演把战斗意志灌输给那些已经拿起武器从事战斗的人……

战斗了四年之后的资产负债表如下:三百名革命者在战斗中牺牲,人民中有三千人被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政权杀害。危地马拉劳动党(统治集团)出主意而起义军则去拚命牺牲……

当敌人消除了他们的分歧并准备利用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发动一次我们从未对付过的经过周密思考的攻势时,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领导仍然由于该党领导集团的无能和犹豫所引起的内部纷争而处于瘫痪状态。1966年5月30日图尔西奥斯司令指出:“‘危地马拉劳动党’,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过错,未曾发挥它的先锋作用。这是引起中央委员会进行部分改组的危机的原因,这一危机仍在持续并将进一步恶化。”按照图尔西奥斯少校的说法,这次危机牵涉到“新与老之间的斗争,保守思想、机会主义思想与坚持原则和革命思想之间的斗争,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另一不明确的、静止的、跟着别人走的具有强烈修正主义色彩路线之间

的斗争……”

1966年10月，图尔西奥斯司令死后，“起义军”领导上开始在游击部队是不是我们运动的先锋、要不要一位司令等问题上进行争论（起义军领导人几乎都是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集团的成员）。由于没有把我们一切力量集中在“埃德加尔·伊瓦拉游击阵线”周围，由于没有承认我们的同志塞萨尔·门德斯作为图尔西奥斯少校合法继承人的权威，以便把战斗推进到敌人的营盘去，我们的力量仍然处于分散状态，而起义军实际上没有一位司令员……

缺乏单一的指挥结构阻碍了武装斗争精确战略的形成。缺乏这种战略阻碍了正确战术的设计。缺乏单一的指挥结构使游击队仍然处于隔绝状态。城市部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既无战略指导，也无战术指导。起义军隶属于一个政党，它的右翼领导从未置身于战争之中……

危地马拉劳动党，特别是它的领导，不再是一个革命的工具。工人和农民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组织，其领导集团不是一个空想的团体，而是一个采取重大行动的团体，它有能力通过游击斗争促进工农联盟。这就是现在的“起义军”以及它的单一的指挥结构所提供的。

在反对敌人、军队和警察等暴力的斗争中，游击队起着组织和动员作用。它把农民的力量集合起来，把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团结起来，并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缔造民族的团结。危地马拉劳动党领导集团很早以前就落在各种事件、斗争形势和已经成长起来的起义军的后面。我们的组织不必再依靠这样的领导，它的局限性和弱点已在我国革命斗争过程中暴露无遗。

由于找不到解决政治领导这一问题的其他办法，游击部队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军事办法，并使自己成为革命的政治军事领导。

在此时刻，一个具有决心和觉悟的核心，不再依靠过去的领导、过时的概念和过时的方法，毫不犹豫地承担确实指导战争的任务，只有这个核心的革命的团结一致才能够领导危地马拉的革命运动向前迈进，领导人民取得最后和彻底的胜利。

战争不能由作出让步的人们来指导；也不能由那些因为对自己有利而把“政治军事斗争”这一名词神秘化的人们来指导。不能由那些伪装不惜牺牲自己、全心全意参加斗争、其实只是关心自己政治资本和自己组织的人们来指导；不能由那些等待着（现在仍在等待）撤退时机而把战士们的生命作为赌博的人们来指导。

有些人只停留于说空话而不在实际中检验他们的观点，我们与这些人的分歧是一些难于解决并毫无意义去解决的分歧。正如图尔西奥斯司令经常说的：“出人头地的地位是在日常斗争中赢得的，领导权是在正确行动的过程中得来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共产党不曾发挥自己的作用，它将丧失力量并毁灭自己。别的组织，其他观察事物更透彻的革命者将取而代之。他们将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革命并组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在战争中我们不能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武装斗争的和革命的政治领袖将是“那些参加武装斗争并且被证明有能力在战场上指导斗争的人物”。

在我们这里很难想象一位政治干部可以同时不是一位军事干部。许多真正的人民领袖已经在游击斗争中诞生。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那些不会从军事方面指导战争的政治领导人将没有立足之地，也不是说从今以后军事领导人不再需要政治委员了。目前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游击战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我国革命斗争的政治领袖。把“人人应该准备并愿意在任何时刻参加战斗”的口号改成“人人都在战斗”这一新的口号的时刻已经到来。

向格瓦拉司令和图尔西奥斯·利马司令的战斗榜样学习！

为了危地马拉不是战胜就是牺牲！

拉斯米纳斯山, 1968年1月10日。

游击队之年

起义军司令部代表:

卡米洛·桑切斯司令, 巴勃罗·蒙桑托上尉, 索科罗·西卡尔
上尉, 安德罗克莱斯·埃尔南德斯中尉, 拉米罗·迪亚斯中尉

附录四

“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纲领

1963年

“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声明：拯救我国的基本财富是当务之急。石油政策应当寻求清楚明确的目标。^①按照我们的观点，石油政策的目标是在于：

1. 提高委内瑞拉分得自己财富的分额。根据1944年的梅迪纳法令处理石油红利的分配。根据萨纳夫里亚法令修订赎买限额和计算依据资料，但要把石油开采税从生产费用中除去。把石油价格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应用程序修订法决定价格。我们将精心地制定出一个纲领，使国家能够直接参预石油工业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审查，就象下议院在1960年一致通过的那样。

2. 通过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制订我国自己的石油政策。采用实物缴纳石油开采税。

国家石油商船队。

国家石油炼油厂。

^① “委内瑞拉完全依赖石油，而且越来越是这样。在1945年，石油占委内瑞拉外汇收入的92%，占预算收入的31%，而只占用8%的劳动力。在1962年，石油占外汇收入的92%（与1945年相同），占预算收入的63%（增加一倍以上），而只占用1.4%的劳动力。同时，失业从1945年的6%飞速增加到1962年的17%（以及现在的20%—1966年）。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如果由国家占有和分配石油利润的话，可以给委内瑞拉每个家庭（按六口计算）三千美元的可靠收入。”——约翰·杰拉西：《拉丁美洲——下一个越南》，《越南报道》，1967年1—2月。

垄断国内石油消费。

发展瓦斯工业。

建立国营委内瑞拉销售公司,参加国际市场活动。

3. 为石油工业工人制定一项社会福利政策。

保证大多数技术人员由委内瑞拉人担任。

4. 我们将认真遵守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有关签字国签订的协定,使这些协定发生作用。我们知道当有关各国政府接管本国石油资源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是最有效的。我们同样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与改善委内瑞拉对拉丁美洲石油市场的商业地位并不矛盾,与我国根据我们的利益分配最重要的销售市场的努力也不矛盾。这些紧急措施将为我国最终实行整个石油工业国有化准备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将永远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不管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决心实施这些措施。民族主义民主政府本身的生存有赖于此。各石油垄断资本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尊重委内瑞拉的法律和主权,并接受通过协商与国营石油公司解决矛盾的良好愿望,但是这并不限制委内瑞拉行使主权制定最适合我国民族利益的措施,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方针。

为了挽回委内瑞拉国家财富:

铁: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废除与北美垄断资本签订的非常不合理的协定,并着手按照现行法律将钢铁工业收归国有。

北美投资: 委内瑞拉有权占有自己认为合适的部分,只要北美政府对我们这种权利采取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北美投资将受到尊重。

北美以外的外国投资: 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并不反对英国、荷兰、法国、西德、加拿大、瑞士、瑞典、日本等国的投资。它们的投资将受到尊重。民族主义民主政府愿意增进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今天这些关系之所以减弱,是由于北美垄断资本和北美政府统治着我国的缘故。这些非北美企业采取任何措施,都

必须服从我国为捍卫自己主权而制订的国家安全条例。

土地改革：“民族解放阵线”宣布自己的土地改革纲领，这一纲领是在加拉加斯召开的第一届农民会议通过的，后者现在已组成由拉蒙·基哈达领导的农民联合会。为了完成这一改革，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必须使农村的群众取得改革的成功，大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农业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以及就业水平的提高。

工业化：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将得到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在一个长时间内，私营工业的发展与国营基础工业的发展两者之间不存在着矛盾。资本家能够为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由于群众购买力的提高，进口的减少（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政府对私营企业技术革命的支持，这个市场将进一步扩大。民族主义民主政府不仅将从政治上保护民族资本家免受北美垄断资本的压力，而且为了增加国民生产，还将帮助他们取得原材料、机器和技术人员。政府将大规模地大力发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石油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由于卡罗尼河流的电气化，制铝工厂和铁路网的建立，整个东南部地区将为之改观。

对外贸易：废除掠夺性的美国委内瑞拉互惠条约。与所有国家（不管其政府制度如何）发展多边贸易。

劳工政策：民族解放阵线采纳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三届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将确保工人阶级行使就业、休假、劳动保护、补偿金等宪法权利，确保他们组织起来和同工同酬的权利。

关于贷款：民族主义民主政府认识到委内瑞拉需要特别多的资金来推进它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向国际资本市场宣告：委内瑞拉只接受这样的贷款，它是长期低利的，并且用于建设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生产力的从事再生产的工厂。我们将不把我国的金融活动局限于世界的某一部分。我们将考虑存在着社会主义世界及其对我国工业发展提供贷款的有利条件。

对外政策：“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伊格纳西奥·路易斯·阿尔卡亚总理 1959 年 2 月对外交使团讲话中体现的外交政策纲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在平等与真诚地尊重一切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国际合作。

2. 确认并坚决捍卫我国的独立和民族利益。

3. 不干涉。委内瑞拉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和维持外交关系，不管它们的国内制度如何。

4. 执行这样的对外政策：同情和联合一切为争取独立和自决而战斗的人民，反对任何不承认人的尊严、民主或正义的政策。

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将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信奉和平共处政策，与拉丁美洲各国、与北美人民特别是他们之中的进步分子和革命阶层保持密切关系。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对外关系将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准则；把争取和平看作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对外关系中的基本任务（给联合国的信）。由此委内瑞拉将恢复它在国际组织中的声音，不再是北美统治者一个单纯的傀儡。

反对过高生活费用的紧急措施：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任务之一是降低工人和中等阶级的过高生活费用。新政府将对房租、电力、电话、自来水和交通费用采取措施，管理基本商品的价格并降低普通人民负担的重税。所有这些将成为新政府最初将要采取的措施。

附录五

哥伦比亚马克塔利亚游击队的土地纲领

1964年7月

马克塔利亚游击队的土地纲领

哥伦比亚的农民、工人、学生、手工业者、革命知识分子、男女同胞们：

我们是开始于1948年的革命运动的核心。自从那时以来，我们这些中科迪勒拉山脉心脏地区的托利马、乌伊拉、考卡和巴列以南的革命农民，变成听任大产业主、大畜牧主、企业、掌握官方政策的老板们和暴力鼓吹者摆布的牺牲品。我们一向是执政寡头宣布和实行的“血与火”政策的受害者。

在十五年中，向我们发动了四次战争。一次开始于1948年，一次开始于1954年，另一次开始于1962年，我们现在正遭受浩劫的这一次战争开始于1964年5月18日，那一天军事司令部公开宣布：“马克塔利亚战斗”开始了。

我们是大庄园主暴虐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哥伦比亚这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掌握在与这个国家最反动的蒙昧主义者勾结的最落后的教权主义者手里。因此，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忍受一个腐败制度的一切兽行之苦，成为我们的命运，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大庄园主垄断土地和在美国统治下生产和出口单一作物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要与军队、飞机、高级军官和美国专家作战。这就是为什么配备着最现代化和破坏性武器的一万六千人投入反对我们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采用经济封锁，发动顽固到底的围攻，发动地面和空中攻击，最后甚至使用细菌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美帝国主义要把几亿、几十亿比索和美元消耗在武器、装备和支付间谍、告密者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收买一些人的良知并使其堕落下去，要屠杀、迫害、监禁在斗争中支持我们的哥伦比亚人，而我们则是一场残忍、不人道的灭绝战争的牺牲品。

我们用一切手段力图阻止这场反共战争（不爱国的反人民的战争）转变成为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我们是为变革制度而战斗的革命者。我们曾经依靠哥伦比亚宪法规定的合法道路——群众性的民主斗争，探求和争取这一变革。但是我们被粗暴地关闭在这条道路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是必须用种种方法完成我们历史使命的革命者，我们被迫探求另一条道路——依靠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从1964年7月20日开始，我们成为一支为实现下述纲领而战斗的游击队：

第一，代替资产阶级虚假的土地改革，我们提出一项能收到实效的革命的**土地改革**。它将在哥伦比亚农村的社会结构方面引起剧烈的变化，在没收大地产为一切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基础上，将土地完全免费地分给耕种这些土地或愿意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①

革命的**土地改革**将为农民提供农具、耕畜、设备和住宅，使他们能够合理地耕种土地。土地改革对于急剧提高农民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水准，使他们摆脱失业、饥饿和文盲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对

^① 根据1969年发表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哥伦比亚1961年通过的**土地改革法**，直到1967年，授给土地证的只有五万四千户。无地农户的总数是四十万，每年增加10%——见《哥伦比亚：美国援助史的实际调查》。

于挣脱大庄园制度的镣铐和提高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土地改革将没收美帝国主义者占有的土地，不管这种土地占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管这些土地用于什么目的。

第二，在大地产或国营产业上的一切定居者、佃农、分成制佃农，将得到他们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废除一切落后的农业经营方法，如分成制，由小农支付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在农村建立基本经济单位。每一基本单位拥有土地的最低限额是：上等地（如果是平坦的）为三十公顷，其他土地根据其肥沃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确定类似的限额。农民与放债者、投机商、官方和半官方的代办处订立的全部债务契约将一笔勾销。

第三，耕种自己土地的富裕农民的地产将不受侵犯。保护各种集约耕种方式。不论根据社会原因或经济原因，都不应该把大农场分割开来，将利用大农场来发展计划生产，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第四，革命政府将建立规模广泛的信贷体系，按宽大的偿还条件为个体农民和紧随着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提供种子、技术援助、农具、耕畜、马具和机器等。建立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和官方农业实验站网。在农村建立足够的公共卫生事业。为农民提供教育以扫除文盲，并为农业劳动者设立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奖学金制度。^① 大大增加农业劳动者的住宅，并修筑连接各农村生产中心的道路。

第五，为农产品规定有利可图的基本价格。

第六，保护印第安人的公社，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耕地，将被地主掠夺去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并使他们的耕作方法现代化。印第安人公社将享受革命土地改革的一切成果。同时尊重公社的集会与民意机构、尊重他们的生活、文化、语言及其内部组织，把公社的

^① 前页脚注关于哥伦比亚的研究报告说：在“争取进步联盟”时期，哥伦比亚的文盲人数从五百万增加到六百万。

自治组织放在更为健全的基础上。

第七，实行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要依靠工农联盟和把参加变革制度斗争的哥伦比亚人联合起来的统一战线，这是摧毁哥伦比亚古老的大庄园结构的唯一保证。完成这一革命的土地改革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将为消灭大地产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因此，本纲领认为争取在我国一切民主、进步和革命力量中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认为坚持战斗，一直到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这个政府（它是实现哥伦比亚人民期望的绊脚石）最终灭亡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号召全体农民、工人、学生、技工、小厂主、准备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那一部分民族资本家、民主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切希望变革以取得进步的左翼和中间派，我们号召你们大家都来参加为建设一个哥伦比亚人的哥伦比亚，为争取革命的胜利，为树立一个民族解放民主政府的伟大的革命和爱国斗争。

马克塔利亚，1964年7月20日。

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伊绍罗·约萨，达里奥·洛萨诺，伊萨亚斯·帕尔多，塔尔西索·瓜拉卡，帕梅尼德斯·昆卡，罗伯托·洛佩斯，赫苏斯·梅迪纳，路易斯·帕尔多，里戈维托·洛萨达，米莱亚姆·纳瓦埃斯，胡迪斯·格里萨列斯，赫苏斯·奥尔蒂斯，罗赫洛·迪亚斯，米格尔·帕斯库亚，伊斯赖尔·巴尔德拉马，费德里科·阿尔达纳

（下面还有一千多位战斗农民的签名。）^①

^① 见《政治文件》（哥伦比亚共产党刊物），第43—44期，1964年8—9月。

附 录 六

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央报告的一章 1966年1月

哥伦比亚游击运动的新阶段，是从马克塔利亚农民进行坚决抵抗时开始的。这一阶段揭示以下几点：

1. 武装抗击敌人对马克塔利亚、埃尔帕托、瓜亚贝罗、奇基托河、南托利马和其他地区的进攻，证明从群众中产生、表达他们愿望、并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游击战运动是不可战胜的，不管这时敌人的力量多么强大，也不管把战斗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条件尚未成熟。

2. 以农民游击战形式出现的武装斗争，甚至在我国出现可以称之为革命形势以前，就已经在哥伦比亚进行着。如果哥伦比亚革命运动一面等待革命形势成熟才开展武装斗争，一面袖手旁观，坐视这支力量被消灭，这将是消极和可悲的。必须以农村的游击抵抗和武装斗争来对付敌人的武装进犯。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应当把斗争扩展到城市和工人区。

3. 群众斗争与武装游击斗争之间不存在着矛盾。游击战是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游击战只有在它具有群众性，在它发源于群众，在它忠实地体现群众的当前和历史利益的地方，才能得到发展和传播。最近几年，有些革命者不依靠农民群众，不取得农民群众被动的和主动的支持，便想开展武装斗争。他们的经验表明，唯心主义的计划使军队、警察或者受地方当局和地主控制的匪徒们

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4. 我们党提出的群众自卫政策，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有些地区没有充分把它付诸实施，另外一些地区由于低估了警察和军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进展而使自己受到削弱。

军队向农民发动了系统的大规模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把群众的自卫行动转变为如火如荼的游击战运动，是正确发展了我们关于在哥伦比亚特殊条件下开展革命斗争的概念。同时，我们协调各种作战方法，把重点放在对每一特殊地方，特殊情况最为合适的形式上。这样做，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正确说明，而且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逻辑地应用于我国的社会过程。

5. 在那些根据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计划而受到攻击的地区，游击活动已经成为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些地区，各种斗争形式都要服从于这一主要的形式(武装斗争)，它必然成为开展其他群众活动，保护人民各种组织的基础。此外，政府军在受侵犯地区的集中，为主动采取游击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

6. 游击战运动正在一系列农民区域发展壮大，虽然绝大多数哥伦比亚人民继续利用更广泛的、更多样化的、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形式。群众运动采取下列形式：战斗性的学生罢课，顽强不屈的工人罢工，造成公务员罢工和民政工作的广泛停顿。我国人民还采用既不能称之为和平的也还不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其中一种是占据城市未加利用的土地，面对着当局和警察的压力，无家可归的人在這些土地上搭起了木头小屋。虽然这些群众运动几乎都是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但当农民游击运动和城市中心工人、学生群众斗争更好地互相配合起来时，这些群众运动的目的和斗争方法是会得到提高的。

7. 虽然农民的游击抵抗仍然不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它成了人民对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这一制度实行的恐怖主义政策作出的最有效的回答，它日益强大起来，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

革命因素，一个对群众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因素。由于寡头政府大规模地恢复对人民使用暴力，以农民游击行动为起点的武装斗争已经成为哥伦比亚的基本力量。

8. 当前发展起来的游击战运动比过去的游击斗争更为明确，具有更高的水平，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以往的经验，更主要是它具有一个明确的革命和反帝的内容，并把人民夺取政权作为它的中心目标。美帝国主义按照“拉索计划”的目标和所谓“预防战争”的原则，强化反对我国人民的武装干涉，哥伦比亚新的游击战运动对此作出了具有爱国意义的回答。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到帝国主义的干涉：美国军事代表团加紧插手武装部队；美国直接从财政上资助在农民区域采取军事行动，“贷给”各种反对工人的战争武器——飞机和整队整队的直升飞机。这样，在哥伦比亚采取恐怖主义暴力政策的原有因素中（大地主的贪婪，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现在又加上美帝国主义干涉这一新的因素。^①

^① 《哥伦比亚在斗争的道路上》，《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社论，布拉格，1966年第76—78页。

附 录 七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原则和纲领

1965年1月

民族解放军是根据哥伦比亚人民拥有一支战斗的有觉悟的武装部队的需要诞生的,这支武装部队能够向敌人发动正面进攻,从而为哥伦比亚人民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与我国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这项制度将使群众摆脱世代代遭受的剥削,这项制度将使我国人民有可能取得发展和进步,并为发展和进步指明方向。

我们在对哥伦比亚形势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美帝国主义或是跟随美帝国主义的我国寡头政治,都不可能让群众和平地取得政权。他们势必要进行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并想借此一劳永逸地打垮人民为实现得到自由、工作、民主和正义的合理希望而进行的斗争。

国内外剥削者的本性是侵略和贪得无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发现自己不得不组织起来对付官方的挑衅,不得不采取主动,依靠反对剥削者的人民战争以发动革命的攻势,利用武装斗争和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进行的人民战争,以便达到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民族解放政府这一目的。

民族解放军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它把为人民取得政权作为战略目标。它努力争取建立一个民主革命阵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现存制度下受到影响并决心通过斗争来改变它的中等阶级中的进步分子。

民族解放军为在我国完全实现下述基本纲领而战斗：

1. 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使我国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寡头政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保证人民得到充分的社会平等；给人民以完全的民主自由；给妇女以法律权利；解放群众的创造力，保证人类的尊严得到尊重，保证所有的哥伦比亚人得到自由的发展。

2. 进行名副其实的土地改革，包括废除大地产、小块田地和单一耕作，把土地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给耕种它的农民；为农民提供农具、信贷、肥料、种子和工具，鼓励农业机械化和效率高的耕种方法；建立适当的分配系统，断绝中间商人、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援助，发展灌溉系统、电力、住宅和足够的交通网。没收属于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大地主的大地产，对国民经济有利的地产将分别予以保留。强调建立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强调农业生产计划化，使种植作物多样化，强调发展畜牧业。

3. 发展经济和工业，方法是：保护民族工业，鼓励半重工业的发展，没收属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卖国寡头的工业产业。保护和帮助不从事投机的小厂主和商人。通过科学的计划工作，工业的多样化，发展一个建立在我国自己资源和努力基础上的独立经济。我们将力求保证劳动大军的充分就业。

实行地下资源国有化，有效地加以开发，以利于国计民生。制定并执行电气化、灌溉和利用农村水力资源的计划。从集体利益着眼，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为我国人民服务。

4. 实行住宅建筑计划，进行城市改革，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卫生服务和充足的住宅，消灭房屋所有者通过长期抵押进行剥削的现象。连根拔除城市和乡村的贫民窟、木头小屋和棚户区。

5. 建立人民信贷系统，肃清放债者和经纪人，促进经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6. 建立全国公共卫生计划,在不加重国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向每个阶层的居民提供医疗、药品和医院方面的援助;发展预防医疗并与地方风土病作斗争。在城市和乡村建立保健中心和医院。切实保护儿童和老人,发展社会保险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机构来制定和执行公共卫生计划。

7. 制定一项筑路计划,协调国民经济并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提供有效的服务。集中并有计划地制定此项计划,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把道路筑到农业区和畜牧业区;由国家经营交通事业并根据国家机构专门计算出来的费用确定运费。

8. 实行教育改革,扫除文盲,改进城乡教室的建造和具有教学能力的师资培训工作。实行免费义务初等教育。改革教学大纲使其与国家的需要和现代知识相适应;使教育与国民生活相结合,并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归国家办理,从而使各大学履行其社会职能并跟上科学的进展;使人民能够进入大学;使教学中的蒙昧主义和教条主义得以肃清,并使大学发挥其作为哥伦比亚劳动者的知识和文化先锋的作用。建立一个国家科学研究院,统一现有的各个科学研究院,并为各高等教育中心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为学生建立宿舍和食堂,制定一个广泛的奖学金计划。扩展公共图书馆网,并为学校提供必需的学术资料和教学资料。鼓励运动与体育教育。政府负责保护、鼓励和发展民族文化、民间艺术,保护民族艺术家和作家。同样,广泛出版其他国家各种具有大众形式和民主形式的艺术和文学。

9. 使印第安居民参与国家的生活和文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土地、语言和传统,并发展他们的文化生活。授予印第安居民和哥伦比亚人相同的权利。

10. 思想和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完全分离。消除种族、性别、

肤色、社会出身或宗教信仰方面的任何歧视。

11. 奉行以相互尊重、人民自决、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独立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保卫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废除有损民族尊严的协定，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代表团。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12. 建立一支永久性的配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人民军队，以保护人民的胜利果实，捍卫民族尊严，作为人民最坚强的支柱。这支人民军队开始将由民族解放军各部队组成，并与我们战斗部队赖以建立的群众保持密切和经常的联系。

人民军队保卫我国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它不再是镇压世界任何民族的工具。

不解放毋宁死！

民族解放军

法维奥·巴斯克斯·卡斯塔尼奥

维克多·梅迪纳·莫隆

附 录 八

卡米洛·托雷斯争取人民团结运动的纲领 哥伦比亚, 麦德林, 1965年3月

争取人民团结运动的纲领

麦德林, 1965年3月17日

致全体哥伦比亚人：工人阶级、中等阶级、地方行动组织者、工会、合作社、互助团体、农民联合会、工人组织、印第安人、所有进行反抗的人们、男人和妇女、青年人、所有与传统政党和新政党没有联系的人们，对上述所有的人们，我们提出下述纲领，以使哥伦比亚工人阶级团结在具体目标周围。

出 发 点

1. 为了使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必须由现在掌握政权的人作出必要的决定。
2. 现在掌握着政权的人是少数人的经济集团，由他们作出有关国家政策的重要决定。
3. 这个少数人的集团永远也不会作出影响自己利益的决定。
4. 作出有利于多数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决定，必然要影响这个少数人的经济集团的利益。
5. 由于这些情况，必须改变政权的结构，以便由有组织的多

数人来作出决定。

6. 哥伦比亚不存在着能够组成新政权基础的社会力量。必须迅速组成这一力量。

7. 目前多数人反对各传统政党, 反对现存制度, 但他们没有取得政权的手段。

8. 需要组成的政治机构应该包括多方面的力量, 最大限度利用新政党、传统政党中不满现实的分子、非政治组织和一般群众的支持。它应该有一个专门性的规划, 并使其建立在围绕原则而不是围绕一位领袖的基础上, 以避免形成小集团、玩弄蛊惑人心的手法和个人主义的危险。

目 标

(一) 土地改革

实行耕者有其田。政府将委派土地检查员把土地证发给分得土地的农民。政府在提供信贷和技术帮助的情况下, 有权要求按照国家农业计划组成合作社或公社来耕种这些土地。

禁止土地买卖。无偿征用据认为公共福利需要的土地。商品生产的农业将逐步取代自给自足的农业。

(二) 城市改革

1. 参照土地改革的性质和效果进行城市改革, 协调土地信贷协会、中央抵押银行、建筑师协会、哥伦比亚建设协会等的计划, 协调与公用事业有关的一切团体和公司的活动。

2. 城镇住宅归居住者所有。允许依靠房租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人继续收取房租, 只要他们能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3. 城市改革主管人员认为未曾充分利用的任何住宅的屋主, 最终将被处以罚款, 罚款用于国家的住宅建筑计划。

4. 根据城市改革需要, 没收城市和城郊未造房屋的空地, 用

于住宅建筑计划。

(三)公司改造

废除自由企业,代之以合作社和公有企业制度。作为第一步,有限公司全体会议投票将按人数计算而不按资本股份额计算。允许所有工人成为公司的股东,他们由工会组织起来,平等地参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分红。由有关工会根据情况决定工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按同等机会与资方参预其事。

尊重有组织工人的意见,扶助和鼓励多重工会主义。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条例,保护工会的自由。

(四)合作主义

强调发展信贷和储蓄、销售、生产、建筑、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制度。在国家法律允许的群众组织的民主计划范围之内,合作主义将是合法的。

(五)自治活动

鼓励作为民主计划基础的城乡自治活动。作为根本措施,在公民自由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并成为国民生活的细胞以前,活跃市政生活。

(六)计划工作

制定一项法定计划,以减少进口,使出口多样化并有所增长。在短期间内力争使所有进口商品限于直接促进国家发展的资本货物。

对外贸易政策应从各方面直接促成拉丁美洲团结的增进与发展。

(七)税收政策

对每月收入在一千和五千比索的人施行累进税。把高于五千比索(1965年)而不是投资于官方计划规定的部门的超额收入收归国有。任何组织都必须付税。低于五千比索(1965年)的家庭收入的工资免于课税;若非家庭收入的工资应照现行规定课税。

(八) 货币政策

增发货币只限于为了发展这些生产部门，其产品迟早将进行交易。流通的货币量将减少到与实际的交易量相一致。哥伦比亚政府支持在国际贸易中采用金本位制。

(九) 国有化

1. 由政府掌握银行、医院、诊所、制药厂、药房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

2. 由合作社企业或公社企业经营公共交通事业，不然的话，也可由政府经营。

3. 自由经营报纸、电台、电视和电影，但要服从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给予的监督。

4. 政府为全体哥伦比亚人提供免费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束以前尊重父母的意见，中等教育之后尊重学生的意见。实行中等或技术义务教育。对于没有履行义务使其子女受教育的父母，将给予具有法律性质的制裁。通过增税为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5. 在国家有可能为石油工业提供资金的情况下，将由哥伦比亚政府经营石油生产。石油租让权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给予外国公司：

(1) 同时在我国建立炼油厂；

(2) 哥伦比亚政府得到 80% 的利润；

(3) 厂房设施在十年内归还我国政府；

(4) 哥伦比亚工人和技术员的工资至少要与同工种的外国人相同。

(十) 对外关系

哥伦比亚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十一) 公共卫生

与卫生服务事业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是政府工作人员。

作为起点，按人口和专职人员数计算，指派每一专职人员负责

一定数量的家庭。

政府为全体哥伦比亚人提供社会援助。

(十二)家庭政策

惩罚遗弃儿童的父母。法律将有效地保护妇女和儿童。

(十三)社会犯罪行为

社会犯罪行为除我国刑法已经规定及已经提到的抛弃家庭者外,还应包括下述种种:放高利贷,囤积,投机,逃避资金,走私,在报纸、电台、电视或电影里进行诽谤,用伪造新闻,不完全和有倾向性的报道把舆论引入歧途。

(十四)武装部队

把用于镇压目的的预算减少到最低限度。年满十八岁的哥伦比亚人,不论男女都必须担任公民服务两年。用公民服务代替兵役制。

国家干预:

1. 教育
2. 经济
3. 新闻

紧急措施:

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1. 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动员个人和团体接受本纲领的运动。

2. 在1965年3月、4月和5月期间,由同意本纲领的各个运动的战士们分发和宣讲本纲领,以取得个人和社会的拥护。

3. 凡拥护本纲领者将组成“人民运动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该统一战线是在尊重各团体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纲领的同时,显示行动中的团结一致。

4. 在每一城市,或者可能的话,在每一区或县,由赞成本纲领

的人们组成一个行动委员会，每一委员会选举一名主席和副主席。

5. 1965年5月31日召开各地方(省、特别区、州)委员会主席会议，会议目的是选举出席波哥大会议的代表。

6. 会议选出的代表将于1965年7月20日在波哥大举行大会，确定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目标以及它在总统选举中的立场。

7. 大会还将选举一个政治委员会，由各有关运动和我国各自然区的代表组成，以协调统一战线的各种运动。

8. 现在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依靠人民的创造性和努力，他们通过自治活动、农民联合会、工会、学生组织、职业团体、政党等已经组织起来了。

(十五)大学改革

大学是自治的并由校长、教师、学生组成一个公社，以发展文化为目的。禁止政党、军队和宗教渗入大学。大学在发展文化总任务范围之内，还应从我国特点出发，研究和解决国家各种问题。

(十六)印第安立法

废除现存的印第安立法。鼓励印第安人充分参加国民生活，与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及义务。

附 录 九

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宣言：

人民解放军万岁

1968年2月

无产阶级政党的铁拳——人民解放军已经诞生并投入战斗。这就是说，现在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它是革命政权的根源和种子。

这一事实改变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从一个没有武装的被统治阶级变为一个具有强力地位与敌人战斗以夺取政权的阶级。这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获得对大多数农民的领导权。

这支武装部队并非一个游击中心；它不是一个或更多的游击队组织。它不是一队武装起义者；它不是一支民兵队伍；它比上述任何一种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它在阶级斗争中诞生。解放军是在人民中间诞生并且发展起来的，人民为了和统治阶级对抗，正在精神上、思想上和军事上把自己武装起来。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火焰在农民群众的乾柴中燃起的熊熊烈火，这些农民群众一向被侮辱、被虐待并被践踏在地上直到他们被迫起来战斗。

这并不是行将发生的事情，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它说明了敌人为什么混乱不堪，寡头政治为什么胆战心惊，群众为什么纵情欢呼，大部分无产阶级为什么

恍然觉醒。在此以前，无产阶级由于被引进不得要领的、毫无意义的、眼光短浅的和得到可悲结果的斗争而被弄得精疲力竭、处于无所作为和漠不关心的状态。

这一事实使我们组织的某些成员大吃一惊，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或者溜之大吉，或者企图利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火扑灭。似乎他们能够以灿烂的阳光来扑灭烈火！似乎他们能够用毛泽东思想的熊熊火炬来停止革命的进展！

敌人面对着农民起义、夺地运动、逮不住又数不清的游击队和民兵队伍，正在成长的政权和人民突击小队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件，吓得目瞪口呆，慌做一团。比这更可笑的是口头上以战争为游戏的人，他们活象拿着塑料手提机关枪的小孩，突然在他们面前碰到来福枪冰冷的金属和爆炸的火光而惊慌失措。

寡头们异口同声地叫嚷：“打倒人民武装力量，我们将把它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未卜先知地说：“他们将死亡，我们将是唯一留下来的。”革命者则高呼：“我们将取得胜利，人民解放军万岁！”

人民解放军在哪儿？在许多地方。可就是不在人们认为它存在的地方。如果他们需要问明方向，“人民解放军”既在农村，也在城市。它公开活动吗？说得对。它秘密活动吗？也不错。它来自于群众之中，有如泉水从岩石中潺潺流出，它生活在人民之中，有如盐存在于海水之中。

它的后备兵力有如树根那样分枝四布、纵横交错。它的躯干是富有战斗精神和觉悟的人民——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学生和无数的爱国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奚落它，这只能使它更为坚强。人民的敌人不能不使群众的境况恶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为人民武装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使社会冲突炽热化，使人民对他们的憎恨逐步转化为一场人民战争。

恐怖独裁的残暴本性，受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寡头政府的反

人民性质,现存社会制度(它无力解决人民的问题而只是被用来侵犯人民的利益)的不人道性质,以及不可克服的危机,为斗争事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农民、民兵、游击队以及人民解放军各团各部队将愈来愈频繁地举行起义。基础深厚的新的后备力量和供应基地,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民政权,必将逐渐发展壮大。到那时,我们将会跨前一大步,并将象今天我们热烈欢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来迎接人民解放军的诞生一样,欢呼这些地区成为哥伦比亚人民共和国最初的根据地。

想消灭人民解放军吗?不可能。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值得庆幸地是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必须采取统治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无法制定和实行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与它们的本性和利益相抵触的。

当人民的敌人试图实行一项应急政策来对抗人民战争的时候,他们只能求助于诸如“拉索计划”、“安第斯计划”、“战略村”、“团结人民”、“使用者协作”、“民事军事行动”等臭名昭著的诡计。所有这些诡计都带有陷阱的臭气,出卖原则的气味,刽子手给受磔刑者喝醋的滋味。它们揭开了大规模屠杀人民的第一幕。

人民解放军万岁,因为它的成立改变了许多事情,并为被压迫、被牺牲的群众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从前,当一名工农子弟年满十七岁的时候,他必须加入敌人军队。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

从前,当一名士兵觉悟到他不能再为老板们去与人民为敌、杀害农民和工人的时候,他只能丢掉武器、开小差逃掉。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

从前,当一名农业工人遭受折磨、虐待和解雇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往往失掉自己的阶级身份,变成一名乞丐或罪犯。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

从前,当一个农民被夺去土地或者按分成制分得的收成时,他

甚至不能吭一声。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并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夺回自己的土地。

从前，当一个学生因争取自由而遭受迫害，被征召到反动军队服兵役，在混乱和贫困中过着局限的漫无目的的生活时，贫民窟和失业是他唯一的下场。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

从前，当一名小土地所有者独立自主的幻想最终破灭的时候，他只好丢掉一切希望。现在他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

从前，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认定自己不能适应现存制度的时候，他们由于具有斗争意志但缺乏斗争手段而感到痛苦。现在他们可以扩充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不成为奴隶而成为高尚的人。

从前，提出群众要求的唯一办法是在枪托林立的情况下举行抗议、诉苦或请愿。现在群众的要求在人民军队越来越有效的支持下，就象一股洪流，这股洪流汹涌澎湃，流向更高的目标，以推翻敌人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人民的国家为其最终目的。

人民中间无数妇女，过去只能依靠贫困、奴隶制和当娼妓过活。现在她们的道路是开阔而光明的，她们可以加入人民解放军辅助部队的行列，用她们的手缔造一个真实的祖国，使自己也得到光荣。

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政党的铁拳，由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在思想上、精神和物质上武装起来的部队，已经着手改造哥伦比亚。他们用战斗开始写下的光辉篇章将成为群众自觉编写的一部新历史(哥伦比亚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最初篇章。

由于这一点，由于它未来还要完成的事业，由于它以曙光照耀着新的航程，由于它汇集着种种希望，“人民解放军”万岁！

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并以全力支持它，这是哥伦比亚人民的新理想。

谁说我们把人民解放军置于我们党之上。恰恰相反，我们把

它看作是迄今我们党进行的最伟大的工作，没有党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人民解放军”。

谁说我们把人民解放军置于“人民解放阵线”之上。恰恰相反，除非我们和“人民解放阵线”的发展采取同一步调，人民解放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谁说我们把“人民解放军”置于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之上。恰恰相反，人民解放军将替被侮辱被杀害的群众复仇，它是群众要求最坚强的支柱，是一支完全为人民服务的强大部队。

谁说我们把“人民解放军”置于人民战争思想之上。恰恰相反，它是人民战争最好的体现，是人民战争最真实和最高级的形式。

别让谁由此把我们叫做黷武主义者，因为我们是这样来欢呼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作答的：“是的。我们相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战争是万能的。”^①

人民解放军万岁！^②

^① 原文如此。毛主席的原话见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是这样说的：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译者

^② 《马列主义事业》（智利，圣地亚哥），第1期，1968年5—6月。

附 录 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在利马市 圣马丁广场的讲演 1964年2月

利马市人民：

我们都已经听到了1962年(1963年重复一次)选举运动的竞选政纲。全体秘鲁人民都是见证人,因为当时的候选人、现在的共和国总统(贝朗德)不怕麻烦地在全国旅行,使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甚至象他带有蛊惑性地说过那样,骑过一头驴子。贝朗德·特里在他各种声明中,给秘鲁人民指出“共处”的毛病,从而使我国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燃起新的希望。

让我们对奥德里亚政府和“共处”的起源、态度和后果作一快速的分析,以便充分了解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出新的选举闹剧。

1948年奥德里亚的军事政变得到了“全国农业协会”的财政支持。“八年统治”是一个为地主寡头利益服务的政府。

“复辟者”掌握政权后便使货币贬值,取消对外贸易管制,甘蔗、棉花种植者和矿山所有者的利益而服务;制止群众的革命进展;并把国民财富拱手送给美国垄断资本。这就是说,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这就是为什么秘鲁拥有百万家财的大地主和大垄断资本,凑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款项,贿赂军人发动了这次政变,在秘鲁建立了血腥和残暴的统治制度。

1956年随着对“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禁令的撤消,曾经燃起一些希望。不幸的是,1956年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政治上和

精神上都瘫痪了。它的领导集团已经完全抛弃了它赖以建立的理论原则；决定与人民的传统敌人进行交易；它的领导者腐化堕落了。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家伙。他们之中的一些领导者现在仍在各工会窃踞高位，充当糖业巨头和美国垄断资本的走狗。

这是唯一的方法，来说明在 1956 年他们怎么能够与从 1939 年至 1945 年一直迫害、监禁和谋杀“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革命成员的那些刽子手结成联盟。它说明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领导者和叛徒儿子之间达成了谅解，其结果便是“共处”。

“共处”是代表寡头统治中的金融界和土地所有者的政治体制，得到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政党的支持，并得到帝国主义大垄断组织的保证。

曼努埃尔·普拉多代表着寡头统治中的金融界；佩德罗·贝尔特兰是土地所有者的首领；阿亚·德拉托雷和普里亚莱体现着中等阶级拙劣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他们今天是偷选票者、破坏罢工的工贼和叛徒。

这样的制度不用说是为大地主、银行老板和美国大公司服务的。为了平息群众的抗议怒潮，他们就屠杀人民，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则把我们这些反对投降和出卖行为的人开除出来。他们指使暴徒镇压敢于起来造反的人们，或对付那些只不过表示不同意的人们。他们贿赂坚决拥护他们的支持者。在国家各级机构中腐化现象日益加剧。

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现在我们要谈 1962 年了。贝朗德在六年竞选运动中揭发“共处”缺陷的讲演，打动了部分人民的心。贝朗德和他的人民行动党在意识形态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力图从寡头统治中的大地主和金融寡头手里把政权夺取过来。独立后的秘鲁始终

处于地主的统治下。地主阶级或者自己直接进行统治，或者通过他们的一个军事或文职帮凶进行统治。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在几十年前就掌握了政权，而在秘鲁，1919年、1930年和1945年的尝试都失败了。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经过七年人民革命之后在1917年掌握了政权。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资产阶级，利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乘机发展并夺得了政权。巴西的赫图利奥·巴尔加斯和阿根廷的多明戈·庇隆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最著名的实例。

秘鲁的资产阶级，迟至1963年才依靠费尔南多·贝朗德，依靠人民行动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这次接管政权是不彻底的，迄今地主仍然占有部分权力。秘鲁资产阶级是虚弱的，因为它未能发展起一个独立的民族经济。现在的议会代表着寡头统治中的大地主和金融寡头，他们是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同时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奴颜婢膝的走狗。秘鲁资产阶级是地主和金融寡头的附属物，与我国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资产阶级的虚弱性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曾经对摧毁封建制度起过革命的作用。完成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任务。但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在象我们这种情况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不再能够领导反对国内外剥削的斗争了。

我国的资产阶级，以及与秘鲁类似的其他半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再能够执行它的革命使命，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需要有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市场。

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剩下的市场，已被首先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秘鲁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被卷进了这种瓜分，从而处于帝国主义大垄断资本、主要是美国垄断资

本的控制之下。

不仅如此,我国的大地主阶级,由于其切身利益而与这些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大地主寡头把其他作物置之不顾,仅仅生产出口到帝国主义国家去的原材料^①。生产和出口糖、棉花、矿砂之类的原材料,以及进口制成品,这是地主寡头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攫取大量财富的主要来源……地主寡头和美国垄断资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勾结,是我国独立发展和进步的羁绊。为了尽可能替寡头们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已经造成了我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控制着政权和军队。

因此,秘鲁的任何革命都必须打击这些集团。秘鲁革命必须是既反对寡头政治,又反对帝国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秘鲁资产阶级处于它目前虚弱和不成熟阶段,是没有能力领导这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寡头政治的革命的。因此对它来说除了号召群众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可是资产阶级深知,如果它这样做的话,除非群众得到他们的一切要求,否则将把资产阶级踩在脚底下。对资产阶级来说,群众比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资产阶级宁可得过且过,妥协让步。为了分享一些权力,它用竞选诺言来愚弄群众。然后为了继续握有政权,它便出卖群众而依附于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保留政权的唯一道路是出卖人民。

具有高度发展的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秘鲁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已经太晚了。它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市场。只有群众,他们不要维护任何剥削制度,才能够勇敢地起来反对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制度,并承担一切后果。

现在是人民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① 进一步参阅卡洛斯·马尔皮卡:《秘鲁的主人》。

资产阶级过迟地登上历史舞台

在秘鲁历史上资产阶级姗姗来迟。六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把它充分暴露出来，并证明它的失败。如果它在三十或四十年前登上历史舞台的话，它或许能够发挥某种历史作用。我说的是“或许”。但在目前秘鲁、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形势下，资产阶级除了与地主和帝国主义勾结，继续剥削和镇压群众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贝朗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应当很好地理解它。贝朗德的失败并不是一个人的失败。人民行动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的失败也不是一个联盟或一个政党的失败。它是资产阶级作为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阶级的失败。

如果从地主、帝国主义分子及它们的走狗那里所能希望得到的只是屈辱与贫困，如果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解放运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工农联盟必须夺取政权，使我国永远摆脱大老板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们的统治。

那些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应该抛弃这种希望了，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在我们这种国家里，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资产阶级不再能起什么作用了。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将在以工农联盟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内发挥他们的作用。

不再存在着资产阶级完成变革的问题，也不再存在着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下述事例看清这一点。行政当局提交给议会的一项土地改革法案，虽然该法案是软弱无力的，还是被搁置起来。众议院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甚至不是一位共产党人，而是共和国的副总统也说这样的土改简直是一种骗局。总统府炮制出来的拉布雷亚和帕里尼亚斯问题是另一种骗人的把戏。^①事实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只能是骗人

^① 拉布雷亚和帕里尼亚斯是属于国际石油公司的两个油田。几十年来这两个油田一直是民族主义者争论的题目。迟至1968年，才被胡安·贝拉斯科将军的军人政府收归国有。

的东西。资产阶级既无能又踟蹰不前,在我们这种国家里,它与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紧密勾结。它只不过是后者的附属物而已。

资产阶级还害怕被剥削群众的革命力量。

因此只有天真的人们才会相信资产阶级的诺言。这句话也适用于仍然留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人民行动党里的那一部分人和青年。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留在那些政党里,这些政党,代表一个早被历史抛在后头的阶级,只能给他们带来出卖和疑惑。他们必须纠正并抛弃这种希望。他们必须认识到:秘鲁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除非出现了一个革命先锋队,它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反帝的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and 开辟道路。

让我们恢复革命一词的原意

很有必要对革命一词作几点澄清。我们相信象这样的会议有助于使情况明朗化,有助于提高人民的觉悟,加强他们的革命信心。左派有责任在动员群众和提出深思熟虑的答案方面赢得人们的尊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也是秘鲁革命群众的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宣传革命,保证革命不仅仅是人们嘴上,诗歌里,头条新闻或者文件里的一个字眼而已。革命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首先是一项需要有坚定决心、大公无私和牺牲精神去完成的任务。有关革命的种种议论如果不是阐明革命意义并且提高人民觉悟的话,那便是废话。甚至最卑鄙的卖国贼也在谈论着革命。革命一词已经被贬低了。

几十年来,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都曾经宣传过革命。当革命政党的领袖决心与已经战斗在安第斯山的农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即将来临。当革命政党的领袖走上街头参加工人、学生的行列,为他们的权利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时候,革命即将来临。最为重要的是,当宣传革命不仅仅促使一时的、单纯的感情冲动,而且这种宣传能使人民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革

命即将来临。

许多人对革命事业抱着怀疑态度。这是由于犯了错误，由于某些“左”翼分子走了错误的道路，由于接二连三的失败，由于我国人民连续不断受骗所造成的。

秘鲁的危机是属于一项制度的危机

我们相信秘鲁的危机是属于一项制度的危机。拉丁美洲新近的经验清楚表明：民主代议制只不过是一出闹剧。它维护一项剥削、附庸和贫困的制度。民主代议制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把希望寄托在一项歧视和欺骗的制度上，这是严重的错误。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一个圈套而已。

应该毫不含糊地告诉人民，如果说经典式的选举制和议会制在前一历史阶段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毫无用处了。

法国革命，即 1789 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在摧毁了封建结构以后，不得不创立一种制度形式，使人民主权不仅用投票来表达，而且永久性地在人民意志的各种工作中表达出来，并使人民通过议会制度而受治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目的就在于此。

自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我们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发源于欧洲为使其人民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机构制度已经变成镇压人民的工具。这种机构制度是人民获得解放的障碍，是人民取得进步的羁绊。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情况。选举变成挥舞亿万金钱的舞蹈。选举是谎言、欺骗性的诺言和贿赂组成的大杂烩。普选权具有歧视性质，因为人民中的大多数由于不识字和不会书写而不能参加投票。议会变成反动分子、寡头统治者以及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最无耻的走狗这一伙人的黑窝。

选举和交易——一条死胡同

鉴于上述种种，左派革命运动^①不曾参加 1962 年和 1963 年的总统选举以及去年的地方选举。由于我们坚持这一路线，人们对我们肆意污蔑，甚至左翼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们是正确的。

有一次我曾经说过：如果秘鲁人民在一次规模巨大和费钱很多的竞选运动中倾听了各左翼组织的立场，寄以信任，投革命者的票，如果选出的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是革命者，即使在这种纯属假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付和解决秘鲁的问题。

我虽然提到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假定和会引起误解的，因为左翼各政党都没有每次竞选运动需要花费的四千万到五千万索尔这笔钱。资产阶级各政党和帝国主义代理人从信托银行、人民银行、国家农业协会、委内瑞拉卖国贼贝坦科尔特政府、国际石油公司、塞罗·德帕斯科公司、马科纳矿业公司、托克帕拉公司等等，得到捐赠。……它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在 1962 年的竞选运动中花了四千万到五千万索尔，在 1963 年也花了同样多的款项。你不能和他们相比。此外，他们掌握着各种东西，他们拥有为他们服务的镇压工具：政治权力、警察、侦探等等；他们控制着报纸、电台、电视等手段；他们占有交通工具；他们的行动得到当局的保护；他们有钱可以雇人等；他们杀人而得到庇护。他们拥有一切。

当左派选择竞选作为他们斗争的主要方法时，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最近竞选运动的后果：无穷的野心、分裂主义、失败、怀疑主义、混乱和放弃自己的真正目标。

但即使回到上述革命者取得胜利、选出一个革命的议会这种假定，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因为当选举结束时，问题并没有解决。寡头政治控制着选举机器，可以进行舞弊，或者改变选举的结果；如果舞弊不能得逞，他们可以策划阴谋，把获胜的候选人

^① “左派革命运动”是德拉普恩特缔造的左派政党。

及其追随者投入监狱，或者宣布选举无效。甚至如果获胜的革命者被授予总统的绶带，可以肯定，当他初次采取革命步骤时，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将以监禁或流放来对付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有一头看门狗守卫着寡头政治与帝国主义的利益，除非把它赶走，不可能有解决的办法。

政治权力是受军队保护的经济权力的表现。现有的制度十分完整，它拥有各种方法、手段和机构，它唯一的职能就是维护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设想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将满面笑容，通过协议、密约，和好听的话双手把实权交出，这种想法是虚妄的，天真和幼稚的。

我们必须离开迷信选举和议会主义这条老路。现在秘鲁人民需要换一种语言。尽管我国农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政治知识，他们现在正在教导我们怎样说话。我们切勿走错误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再在人民中造成混乱。让我们告诉他们想要听的东西。我们切勿跌进寡头政治为我们布置下的选举陷阱。让我们不再对通过密约或选举取得政权或分享权力抱有任何幻想。

菲德尔的道路

拉丁美洲新近的经验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看一看古巴吧！菲德尔的古巴证明有可能做到以下几点：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在离美国海岸只有九十海里的地方发动一场伟大的拉丁美洲革命；小国可以把美资炼油厂收归国有；收回大糖业公司，并在其中建立合作社；开始实行工业化并加速经济发展过程；结束土地和住宅垄断，使城市居民成为他们居住的住宅的所有者，使耕者有其田；扫除文盲并使人人都享受完全免费的教育。总之，抵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宣传，反击它的外交和军事压力，恢复爱国主义思想、独立精神和民族意识，这一切都有可能做到。

古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具备一

个条件：人民推翻了特权集团和侵略集团赖以生存的镇压工具。古巴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制度的解体，国家的彻底改造，革命意识的复活和加强，这一切只是在人民武装起来的基础上达到的。应该让那些还在谈论着“卡斯特罗独裁”，谈论着“少数共产党人压制着古巴并使古巴流满鲜血”的人们知道，卡斯特罗政府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工人把武器放在工厂附近，农民把武器放在合作社附近，学生把武器放在他们的院系或学校附近。有五十万男女接受过革命的军事训练，他们拥有保卫他们的革命和政府的武器。让民主代议制的代表人物也象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把武器发给人民，看看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是最民主的，谁是最得人心的。让他们把武器发给人民，看看他们能否继续掌握政权，看看他们能否象古巴革命领袖那样领导着他们的人民。

拉丁美洲革命正在兴起

不仅古巴的经验是可贵的。整个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着革命的过程。委内瑞拉的游击队仍然在山区战斗着，卖国贼贝坦科尔特的部队无法使战斗在法尔孔州、拉腊州、亚拉圭州和波图格萨州的爱国者就范。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专家，忠诚的士兵，他们用新的语言说话，引导美洲人民沿着解放的道路前进。美国所有的援助和顾问都不能使这一遍及城乡的过程停顿下来，这是重演博利瓦尔^①和派斯^②在他们全盛时期创立的业绩的过程。

哥伦比亚的游击队正在托利马省、乌伊拉省和比查达特别区进行战斗。在危地马拉的山区里，有三支战斗部队正向帝国主义及其武装傀儡挑战。

尼加拉瓜，也存在着紧跟桑地诺脚步前进的游击队。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爱国者正在农村按照游击战术进行战斗。在厄瓜多

① 博利瓦尔·西蒙：(1783—1830)南美洲革命家。——译者

② 派斯·何塞·安东尼奥：(1790—1873)委内瑞拉革命家。——译者

尔, 尽管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武装镇压, 革命方兴未艾。

虽然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在经济方面与社会方面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不同, 这些国家的革命也在取得进展。巴西东北部的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南部的工人、学生和中等阶层, 依靠他们自己的方法取得迅速的进展, 而巴西的寡头政治日益衰弱并由于本身存在的许多矛盾而陷于四分五裂。阿根廷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强大的工人阶级不断提高革命觉悟, 而寡头们和军人轮换夺取政权, 并且由于自己的拙劣无能而日趋没落。

今年智利人民将有机会看破左派从事的选举道路。组成“人民联盟”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相信他们有可能通过选举取得政权。他们相信寡头执政者和帝国主义会和平地放弃他们的利益并毁灭枷锁。这种空想很快地将在今年的选举中化为乌有^①。那时智利人民将会象我们秘鲁人, 厄瓜多尔人, 哥伦比亚人, 委内瑞拉人, 中美洲人, 巴西人和阿根廷人一样, 认识到人民取得解放的道路不可能是民主代议制, 因为这种类型的民主只不过是束缚人民手脚, 使人民仍然处于受压迫受侮辱地位的一种圈套。

革命正在全世界胜利发展

革命不仅在拉丁美洲大踏步前进, 其他大陆的人民也正在使自己得到解放。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政治地理现在已经没有用处, 正如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在最近的将来也将成为无用的一样, 因为新的共和国正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诞生。这些新的共和国是我们时代伟大的世界革命的成果。它们之中有许多国家完成了把自己从殖民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任务, 并且使自己得到彻底的解放, 而另外一些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奴役后, 就落到美帝国主义手里, 后者力图取代过去的殖民压迫中心。人民不会沿着错误道

^① 德拉普恩特是正确的。在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中当选者是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 而不是“人民联盟”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

路走下去，因而斗争在继续。

光荣的阿尔及利亚，经过七年强弱悬殊和英雄的斗争，才获得独立。撒哈拉炎热山区里的农民游击队，以及阿尔及利亚沿海各城市，甚至法帝国首都——巴黎的工人和学生，打败了五十万配备精良的法国军队，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这些法国军队提供了武器。今天新的共和国坚定地沿着真正民主的道路前进，满怀信心地去获取社会主义。

越南南方的游击队，使配备有美国顾问、美国武器、美国飞机、兵舰和直升飞机的几十万伪军遭到严重损失。英雄主义思想在增长，解放区在扩大，整个人民变成一支军队，而敌人则胆战心惊，溜之大吉。

我们还应记起北朝鲜，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的朝鲜人民，把美帝国主义和十六个派兵和提供武器的仆从国打得落花流水，然后经过艰苦奋斗，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最完整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关于人民解放斗争的事例，由此得出结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革命迅速发展的阶段。革命不可控制地传布于全世界，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我们所处的世界，其主要矛盾是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毛泽东同志作出的主要贡献。革命道路通过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通过所有被压迫的国家。解放斗争是坚定不移的。和平共处是和解的道路。它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妥协。期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赛中取胜；停止人民的斗争；散布别的国家会把我们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希望，这一切使自己在精神上跌进新型殖民主义的泥坑。这简直是否定我们作为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革命是人民搞的。各国人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办法使自己得到解放，同样地，不论从一国，还是从国际范围来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进行合作。

上述种种提醒我们：秘鲁的革命并不是孤立的。秘鲁的革命就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而拉丁美洲的革命就是整个世界的革命。

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迅速发展和所向披靡，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今天的变化幅度，若在早先时代，需历时几世纪之久），这应归功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以及它在各方面取得的胜利。

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发展壮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只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光辉的1917年10月革命的成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大战结束时，增加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

1945年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口从二亿五千万增加到十二亿左右。这就是说，在地球的三十亿居民中，有十二亿人（占三分之一以上）已经摆脱了压迫和剥削，享受着机会均等和按照各人完成的工作和能力来分配社会产品的自由。反动派可以强词夺理地说：世界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阵营。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多数国家是受剥削的，因而它们都想摆脱国内外剥削者的奴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的人民是这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是这样。例如，美国的黑人，正在为结束可憎的种族歧视而斗争，他们抛弃了消极的抗议，而采取了坚决和公开的对抗来反对那些自夸为基督教徒和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这些家伙却仅仅因为皮肤颜色关系而把人民踩在脚底下。几个月以前，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使佛朗哥专制制度大为震动。法国工人正在不屈不挠地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国的工人也是这样。因此，骤然看来，或者在反动派眼里看来属于多数的，其实只是属于少数的垄断资本家、特权阶层和寡头执政者，他们将被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工人，在其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扫除干净。

让我们加强对人民和革命的信心

仅仅对世界作这样一次鸟瞰，就足以加强我们的革命信心。我们必须对人民具有信心，对革命具有信心。有人或许认为左翼在数量上是少数，这是不真实的，因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总是多数。被压迫群众在革命过程一旦开始时，将不再受骗，不再相信谎言。他们将摆脱对泥足偶像的崇拜。他们一旦团结起来，将永远消灭他们传统的剥削者。

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我们并非少数。我们代表着多数，因为真正左翼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属于这样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便能开创解放我国的过程。

有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和中小厂主、专家和学生）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内的工农联盟，才有可能改变不公正、腐败、落后和希望幻灭种种现象。

我国正在经历着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是制度崩溃所造成的恶果。我们革命者应该能够激发人们对世界革命的新的信心，激发对正在全世界胜利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信心。

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一样是善良和诚实的。但我国人民也是轻信的。我国人民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惊人的品质。已经有多少鲜血多少牺牲灌溉了革命这棵大树。我国人民曾经相信别人和牺牲自己一千零一次，但是他们一千零一次被出卖了。

我们必须防止我国人民再度落入某一冒险家的圈套并由此陷于希望幻灭的状态。必须使他们明白自己正在受骗的真象，从而使他们抛弃那些骑在他们头上为剥削者服务的家伙。为了避免再度受骗，为了防止人民轻易相信与他们命运无关的事情，为了使他们明白他们是拙劣的谎言或反动政党的受害者，我们必须不断地

使人民明白这一点。思想信念是我们说服群众的主要武器。让我们成为政治的宣传者和教育者。让我们以我们的榜样和明白易懂的教育来提高我国人民的革命觉悟。

同志们，我们应该明白：革命是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历史事实。我们相信思想与行动的变革只能来源于人民。我们应该明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不可能有什么变革。我们确信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先锋队才有能力领导解放斗争。让我们忘掉选举和政治交易吧！让我们以新的语言来说话。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走在斗争的前头。我们愿意告诉受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剥削或扔在一边的所有人们：只有在工农联盟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才有能力把我国人民从他们已跌进去的黑暗深渊里拯救出来。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为这次会议专题讨论的问题而拟定的口号：

停止镇压！

让我们制止贝朗德资产阶级政府的杀人魔掌。让我们随时准备制止镇压的魔掌，并永远地把它斩断。我们要告诉贝朗德及其追随者：杀害农民不会阻止革命而是加速革命。对付人民的暴行有各种各样形式，现在已经达到极限。我们确信每一次屠杀和镇压暴行只能使我们把用来埋葬寡头政治、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墓穴掘得更深。

立即把石油收归国有！

国际石油公司必须付清拖欠政府的债务。政府应该没收国际石油公司的设备，以抵偿债务！

一切出卖国家的人都是卖国贼！

我们要求贝朗德政府实现他的诺言。不许再欺骗人民。立即

从外国人手里收回石油资源。停止在石油问题上的乒乓比赛。比赛双方是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行政当局和固守在议会里的寡头统治者。石油便是在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之间来回飞速旋转的灼热的乒乓球。

事实很清楚，不需要制订一项特别法律就可以责令国际石油公司付清它由于开采权而拖欠政府的一亿五千万美元。他们必须付清拖欠的一亿五千万美元，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按照发展部长最近在议会发表的证词，国际石油公司的设备仅值九千万美元。政府应该接管这些设备，国际石油公司必须付清差额。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当局依据行政法就能索取欠款。它可以使用强制手段，没收，以债权人身分参加销售工作，并索取售价，抵偿债务。如果他愿意提出一个爱国的要求，并实现选举诺言的话，这是合法可行的道路。当然国际石油公司和秘鲁大垄断资本必定会不择手段进行威胁，必定会大开支票进行利诱。不言而喻，在一个道德败坏的国家里，在一个贪污、寡廉鲜耻、虚伪、投机取巧、懦弱、漠不关心盛行的国家里，威胁加金钱，压力加报酬，往往会产生效果。这是唯一的答案，可以说明那天在众议院石油委员会发生的事情。当时该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在签署了一个文件以后，突然改变主意签署另一个包含着放弃他们的立法职守和出卖国家财产的文件。

对此，我们向全国宣布：所有那些交出石油、与国际石油公司妥协的人为卖国贼；宣布那些没有为秘鲁收回地下资源和设备的人为卖国贼；宣布那些豁免国际石油公司债务的人为卖国贼。并让所有直接或间接与此有关的人员注意：叛国罪是要按军事法庭法律处理的。

取消大地产和奴隶制！

耕者有其田！

进行农民的土地改革！

关于土地改革，我们要求的是一项农民的土地改革。它意味

着立即归还从印第安人公社夺来的土地；没收包括甘蔗种植园在内的大地产；毫无例外地剥夺糖业大王，他们依靠剥削我国工人，夺取最好土地并利用自由贸易的缺陷和世界市场的有利价格而暴富起来。

它是这样的一种土地改革：恢复公社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利于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并鼓励他们参加合作社；提高农业各部门的技术水平；扩大耕地面积，为全国服务，而不是象迄今为止那样只为少数人服务。总之，国家需要一项名副其实的土地改革，使农民摆脱各种封建束缚，摆脱贫困和迄今为止度过的拮据生活。这只有通过消灭各种形式的大地产才有可能做到。

为团结而战斗！

为革命而团结起来！

在行动中团结一致！

自从“左派革命运动”在1959年12月12日^①开始其政治生命以来，它一直为左派的团结而战斗。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去争取这种团结。我们深受各种阴谋、误解和出卖之害。“左派革命运动”仍然并将继续为团结而战斗，但决不是为竞选运动的团结而战斗；请注意，决不是为提出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候选人的团结而战斗。我们并不寻求这种团结。因为为这种团结我们宁愿象迄今为止那样，走自己的道路。如果团结是为了与农民并肩战斗，共同反对寡头政权，是为了使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话，那末我们举起双手热烈欢迎这样的团结。

这次盛大会议可以成为我们伟大解放斗争事业的开端。当前我们斗争的基本目标是：推翻封建制度，赶走美帝国主义，这两者狼狈为奸，压迫我国人民。我们将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就是说，我们提出一种新型的民主革命，一种反封建反帝国主义

^① 这是“左派革命运动”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分裂出来的日期。在若干时间以后，它才采用“左派革命运动”这一名称。

的革命，它以工农联盟为领导，而工农联盟是以把我国所有深受剥削、压迫和附庸之害的各阶层联合起来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当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将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

革命是我国人民剩下唯一可走的道路

尽管秘鲁左派目前仍有分歧，他们正在逐步走向团结。左派通过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自我批评假使是革命的，就必须是真实的，严肃的和没有保留的。极其重要的是自我批评将产生新的行动，它不再走错道路，不再以虚假的希望和危险的混乱去鼓动群众，不再使群众迷失方向，离开通向自由和正义的道路，革命的道路。

是的，同志们，革命是我国人民剩下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应该承认：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忽视、被剥削的我国农民弟兄，正向我们讲授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他们正在进军。他们在军乐的伴奏下，举起他们的军旗和背带，携着他们的妻孥，用他们粗犷但神圣的声音朗诵一首史诗的最初篇章，这首史诗将由永恒的安第斯山坡胜利人民昌盛的后代来结束。

秘鲁革命万岁！^①

^① 引于罗赫尔·梅尔卡多：《秘鲁游击队——左派革命运动：从意识形态说教到武装行动》，利马人民文化基金会，1967年，第66—90页。

附录十一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原则的 团结，斗争的团结”，哈瓦那 1964年12月

原则的团结，斗争的团结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在1964年末举行了一次会议，各党都派了代表参加。

会议是在兄弟般的气氛，以及对共同问题抱着坦率谅解和同情的精神中举行的。

会议富有成果地交流了大陆各国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会议特别注意与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加强团结的问题。

与古巴的团结

在作出的决议中，特别强调：

与古巴更加始终如一地和更加有机地团结在一起的必要性。对此作出贡献的各个组织、个人和政党，不仅是履行一个国际主义者和拉丁美洲人的义务，同时也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自由、尊严和未来。

在种种任务中，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反对经济封锁和扩大贸易的斗争；谴责入侵准备和反革命分子他中央情报局及其特务分子的活动；对美帝国主义发动和

指导的反对古巴人民及其政府的诽谤运动迅速作出反应；发动一个宣传运动，宣传古巴革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持久性运动

关于支持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会议建议：

鼓励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开展反对镇压的持久性战斗，以代替时断时续的游行示威和发表孤零零的声明。

积极支持现在正在遭受残酷压迫的人们，譬如说正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海地进行战斗的人们。

支持拉丁美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波多黎各和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运动，支持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属圭亚那的自治运动，支持把福克兰群岛归还给阿根廷，支持加勒比海英属和荷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支援委内瑞拉

在整个大陆规模上，发动拉丁美洲全体人民积极支援委内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

加强与正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开展反帝斗争的巴拿马人民的团结。

继续开展蓬蓬勃勃的运动，争取释放被捕的共产党领袖，其中最知名的有：委内瑞拉的赫苏斯·法利亚，古斯塔沃·马查多和庞佩约·马克斯；厄瓜多尔的佩德罗·萨德；巴拉圭的哈克斯·斯特芬·亚历希斯；巴西的马里奥·阿尔维斯，伊班·里贝罗和阿斯特罗希尔多·佩雷拉。

争取释放一切被迫害的爱国者、战斗工人和民主人士。

发扬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团结友爱精神，通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拉丁美洲各独立工人中心，促使各企业工人加强反抗斗争。

原则的团结

会议还强调各党加强接触,交流经验和情报的必要性。

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争吵非常关注,并通过一项决议,其要点如下: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在集会交流经验的时候,重申它们积极争取在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原则和1957年、1960年纲领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心。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认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争取世界和平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获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此我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巨大分歧感到深切关注。这种分歧有导致分裂的危险,并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可乘之机,鼓励他们进行侵略。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团结铺平道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谅解和同情,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引起增大分裂危险,妨害友好和建设性对话,阻碍各党在一起克服现有分歧的可能性,阻碍把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力量的努力联合起来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强调共同的观点,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做任何必需的事情,以取得原则团结的胜利。

停止公开论战

由于已经发生的分歧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希望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并强调需要找到适当方法,根据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互关系准则的友爱精神,解决争论的问题。

会议同样认为各党内部的团结,对于进行各国的革命是至为重要的。

因此,任何派别活动(不管是那一种类的,或者什么原因引起

的)应该断然拒绝。

会议认为应该采取坚决的步骤，切实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如发起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议，并召开一次或几次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参加的会议。

大事记

(书中未提到的各国大事用仿宋体字表明)

1958年

- 1月 危地马拉 伊迪戈拉斯将军选举获胜
委内瑞拉 佩雷斯·希门尼斯被法夫里西奥·奥赫达的“爱国议会”所推翻
- 4月 古巴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号召的总罢工失败
- 5月 委内瑞拉 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汽车被捣毁
哥伦比亚 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当选总统
- 6月 秘鲁 乌戈·布兰科在拉孔本西翁河谷建立农民协会
戴高乐将军任法国总统
- 8月 古巴 共产党领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马埃斯特腊山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 12月 委内瑞拉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选举获胜；加拉加斯暴动

1959年

- 1月 委内瑞拉 卡斯特罗访问加拉加斯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巴蒂斯塔逃往圣多明各

- 4月 巴拿马未成功的起义
- 5月 古巴 卡斯特罗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
- 6月 古巴 通过土地改革法
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未成功的起义
- 7月 秘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访问古巴
- 8月 委内瑞拉 在加拉加斯的反政府示威
海地的未成功的入侵
- 10月 秘鲁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造反者”（“左派革命运动”）退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 11月 在巴拉圭一度出现游击队；米高扬访问墨西哥
- 12月 在图库曼（阿根廷）乌图隆库司令领导庇隆主义者游击队

1960年

- 1月 哥伦比亚 安东尼奥·拉罗塔建立“工人学生农民运动”
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
- 2月 古巴 米高扬访问古巴
- 3月 古巴 艾森豪威尔命令中央情报局训练古巴流亡分子
- 4月 委内瑞拉 “左派革命运动”退出民主行动党
- 6月 古巴 美国炼油厂被征收
- 8月 拉美托洛茨基主义者会议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
- 9月 古巴 第一个哈瓦那宣言
- 10月 危地马拉 学生揭发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的出现，计划入侵古巴

- 委内瑞拉 六名“左派革命运动”成员以颠覆罪名被捕；加拉加斯暴动
- 古巴 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发言
- 11月 危地马拉 图尔西奥斯·利马和容·索萨举行武装起义
- 秘鲁 革命工人党在阿雷基帕开会表决赞成游击战争
- 古巴 格瓦拉访问北京
- 约翰·肯尼迪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击败理查德·尼克松
- 12月 古巴 秘鲁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 1961年
- 1月 古巴 美国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 4月 古巴 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背景的流亡分子入侵猪湾并被击退
- 拉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会同意帮助和组织秘鲁、巴西和危地马拉的农民运动
- 5月 哥伦比亚 安东尼奥·拉罗塔被杀害
- 拉斐尔·特鲁希略总统在多米尼加被刺
- 6月 秘鲁 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到达并成立“革命阵线”
- 7月 危地马拉 亚历杭德罗·德莱昂被捕杀
- 8月 古巴 格瓦拉到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出席“进步联盟”的开幕式
- 巴西总统夸德罗斯辞职
- 9月 委内瑞拉 民主行动党进一步分裂
- 10月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起义

11月 秘魯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造反者”向议会提出土地改革法草案

12月 秘魯 “左派革命阵线”成立；人民银行分行被抢劫

1962年

1月 古巴 古巴被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

2月 危地马拉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进入行动；危地马拉城起义

委内瑞拉 各种游击阵线开始活动

古巴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3月 危地马拉 帕斯·特哈达上校领导下的“十月二十日游击阵线”成立

厄瓜多尔一度出现游击队；阿根廷弗朗迪西总统被军队废黜

4月 秘魯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在库斯科被捕

5月 委内瑞拉 在特鲁帕诺发生军事叛乱；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被停止活动

哥伦比亚 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博士当选总统

6月 委内瑞拉 在卡贝略港发生军事叛乱

秘魯 阿亚·德拉托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造反者”成为“左派革命运动”

7月 秘魯 军事政变

阿尔及利亚独立

10月 委内瑞拉 马拉开坡电力站被破坏

秘魯 乌戈·布兰科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会见

古巴 导弹危机

11月 危地马拉 空军起事被击溃

12月 危地马拉 各游击阵线与共产党联合建立起义军

委内瑞拉 共产党第四次全会决定支持武装斗争策略
秘鲁 乌戈·布兰科牵连枪杀警察事件

1963 年

- 2 月 委内瑞拉 民族解放军正式成立
- 3 月 危地马拉 伊迪戈拉斯总统被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上校推翻
- 秘鲁 土地改革法令在拉孔文西翁实施
- 5 月 秘鲁 乌戈·布兰科被捕; 哈维尔·埃劳德被杀害
- 6 月 秘鲁 费尔南多·贝朗德竞选总统获胜
- 玻利维亚 豪尔赫·马塞蒂在玻利维亚农场建立他的阿根廷的游击组织
- 7 月 阿图罗·伊利亚当选阿根廷总统
- 8 月 玻利维亚 卡特维矿工罢工
豪尔赫·马塞蒂在萨尔塔(阿根廷)建立“人民游击队”; 禁止核试验条约
- 11 月 委内瑞拉 美国军事代表团代理团长被绑架; 委内瑞拉截获来自古巴的军火
肯尼迪总统被暗杀
- 12 月 委内瑞拉 普选中劳尔·莱昂尼及民主行动党获胜, 左派抵制

1964 年

- 1 月 委内瑞拉 左派革命运动的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赞同游击斗争
- 秘鲁 建立拉美第一个亲中国的共产党
- 2 月 秘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在圣马丁广场(利马)发表演说

- 3月 古巴 格瓦拉写信给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4月 巴西总统古拉特被军队逼迫下台
- 5月 哥伦比亚 对马克塔利亚开始进攻
- 玻利维亚 帕斯·埃斯登索罗当选总统——没有反对者
- 7月 委内瑞拉 在巴奇莱克斯省开辟新的战线
- 哥伦比亚 马鲁兰多发出一个农民宣言；民族解放军开始秘密活动
- 秘鲁 “左派革命运动”的政策文件出版，强烈批评和平共存
- 10月 危地马拉 “埃德加尔·伊瓦拉阵线”(图尔西奥斯)的领导者同意“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 委内瑞拉 道格拉斯·布拉沃精心计划的“联合起义”策略
- 苏联赫鲁晓夫被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所代替
- 11月 玻利维亚 帕斯·埃斯登索罗被巴里恩托斯将军和奥万多将军推翻
- 约翰逊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击败戈德华特
- 12月 危地马拉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发表第一个拉斯米纳斯山宣言
- 古巴 哈瓦那拉美共产党会议；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说
- 1965年
- 1月 哥伦比亚 民族解放军进入行动
- 2月 危地马拉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被枪杀
- 哥伦比亚 埃尔帕托的“独立共和国”被政府军消灭

- 古巴 格瓦拉访问北京并在阿尔及尔开会的亚非团结会议上致词
美国开始轰炸北越
- 3月 危地马拉 “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与起义军分裂;共产党积极援助游击队
- 哥伦比亚 卡米洛·托雷斯拟订其“人民团结运动纲领”
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
- 4月 委内瑞拉 共产党第六次全会主张合法斗争
- 玻利维亚 亲华的共产党在西格洛本特开会成立
- 古巴 格瓦拉在古巴“失踪”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革命和美国的干涉
- 5月 危地马拉 国防部副部长被枪杀
- 哥伦比亚 政府宣布戒严
(1968年12月解严)
- 玻利维亚 胡安·莱钦被放逐;总罢工;戒严
- 6月 哥伦比亚 卡米洛·托雷斯辞去教士职务
- 秘鲁 左派革命运动游击队开始行动
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被布迈丁上校废黜
- 7月 哥伦比亚 亲华的共产党成立
- 8月 秘鲁 暂时停止宪法保证
- 9月 秘鲁 “左派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军签署联合公报,民族解放军开始行动
- 10月 危地马拉 革命党领袖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被枪杀
- 委内瑞拉 道格拉斯·布拉沃说出他对共产党的不满
- 秘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被杀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遭屠杀
- 11月 委内瑞拉 共产党拒绝布拉沃的观点

- 秘鲁 亲华的共产党开会说明何以不支持游击战争
- 12月 委内瑞拉 道格拉斯·布拉沃和法夫里西奥·奥赫达成立新的“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
- 哥伦比亚 卡米洛·托雷斯参加民族解放军游击队
- 1966年
- 1月 秘鲁 拉瓦顿被杀害
- 古巴 在哈瓦那举行三大洲会议
- 2月 哥伦比亚 卡米洛·托雷斯被杀害
- 3月 危地马拉 26个著名共产党员被捕并在事后被杀害；胡利奥·塞萨尔·蒙特内格罗竞选获胜
- 委内瑞拉 几个委内瑞拉共产党领袖获释出狱
- 4月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正式成立
- 5月 危地马拉 容·索萨最后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断绝关系
- 委内瑞拉 道格拉斯·布拉沃被开除出共产党
- 玻利维亚 马里奥·蒙赫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讨论玻利维亚情况
- 6月 委内瑞拉 法夫里西奥·奥赫达被捕杀
- 玻利维亚 “里卡多”在拉巴斯开始组织活动；巴里恩托斯将军当选总统
- 阿根廷的伊利亚总统被奥翁加尼亚将军免职
- 9月 玻利维亚 德布雷到玻利维亚，离开后在1967年3月重回
- 10月 危地马拉 图尔西奥斯·利马丧生，由塞萨尔·蒙特斯继任
- 11月 玻利维亚 格瓦拉抵尼阿卡瓦苏
- 12月 玻利维亚 格瓦拉同马里奥·蒙赫摊牌

1967 年

- 3 月 委内瑞拉 胡利奥·伊里瓦伦·博尔赫斯被绑架并枪杀；
卡斯特罗攻击共产党
- 玻利维亚 在尼阿卡瓦苏的第一次伏击
- 4 月 古巴 格瓦拉给三大洲会议的信发表
- 6 月 玻利维亚 政府军占领锡矿并宣布戒严
- 古巴 柯西金访问古巴
- 以色列侵略埃及
- 7 月 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在巴西被缺席判处九年徒刑
- 8 月 玻利维亚 华金的游击部队覆灭
- 古巴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
- 10 月 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被捕遇害
- 11 月 玻利维亚 雷吉斯·德布雷被判三十年徒刑

1968 年

- 1 月 危地马拉 “起义军”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被枪杀
- 哥伦比亚 人民解放军开始行动；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自 1948 年起断交
- 古巴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及其他共产党员被捕
- 3 月 危地马拉 共产党成立自己的起义军；危地马拉大主教被绑架
- 4 月 危地马拉 “白手团”的领袖被枪杀
- 6 月 玻利维亚 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同意将格瓦拉日记抄本送交古巴
- 8 月 危地马拉 美国大使约翰·戈登·米恩被绑架未遂遭杀害

-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 10月 秘鲁 贝朗德总统被胡安·贝拉斯科将军废黜；国际石油公司国有化
- 11月 尼克松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击败汉弗莱
- 1969年
- 1月 玻利维亚 宣布戒严
- 3月 危地马拉 撤销 1955 年颁布的禁止同共产党国家贸易的法令
- 委内瑞拉 基督教民主党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就职
- 4月 委内瑞拉 共产党合法化；共产党员获释出狱；对游击队员提出大赦；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 玻利维亚 巴里恩托斯总统在飞机失事中身死，由副总统西莱斯·萨利纳斯继任
- 6月 秘鲁 公布土地改革法
- 9月 玻利维亚 西莱斯·萨利纳斯被奥万多将军废黜；因蒂·佩雷多被杀害
- 美国驻巴西大使伯克·埃尔布里克被绑架并以十五名政治犯为交换获释
- 10月 玻利维亚 海湾石油国有化
- 12月 危地马拉 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 巴西游击队领袖卡洛斯·马里格拉被杀害